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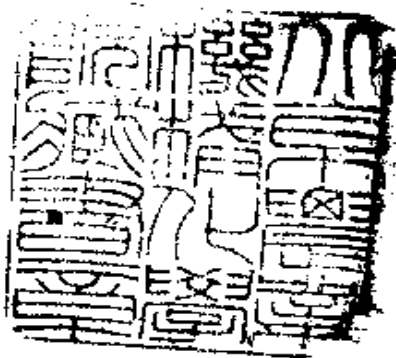


斯大林文集

1934 — 1952

斯大林文集

1934 — 1952



人民出版社

参加本书编译工作的有张瑞亭、江显藩、蒋素琴。
参加译文审订工作的有孙岷。

斯大林文集

SIDALIN WENJI

(1934 - 1952年)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2印张 491,000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书号1001·1240 定价4.55元



编辑说明

为了便于读者学习和研究斯大林的著作,我们编辑了这部《斯大林文集》。

根据俄文版翻译的《斯大林全集》第1—13卷,包括斯大林1901年到1934年1月的著作。本文集则是斯大林1934年到1952年的著作的汇编。

文集主要收录斯大林这一时期的文章、讲话和谈话,同时也选收了一部分比较重要的书信和电报。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给英美政府首脑的书信和电报已收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中,本文集未加选用。

文集中全部著作都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绝大部分著作原来有中译文,这次对照俄文原文作了一些校订,小部分著作是根据俄文原文新译出的。

文集中标有星号*的标题,是编者拟的。

编者加的一些简要注释,作为脚注放在当页。书后附有人名索引。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

1984年10月

目 录

1934 年

给新乌达村集体农庄青年学校少年先锋队队员和

小学生们的信	1
关于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	2—8
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1934 年 7 月 23 日)	9—26
关于《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	27—29
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	30—32
在接见冶金工作者代表团时的讲话(1934 年 12 月 26 日)	33—37
一	33
二	35

1935 年

致苏联电影总局舒米亚茨基同志	38
* 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二次代表大会 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 的讲话(摘录)(1935 年 2 月)	39—40
*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招待“五一”阅兵参加者 时的讲话(报道)	41

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高等院校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935年5月4日)	42—48
在卡冈诺维奇地下铁道通车典礼上的讲话 (1935年5月14日)	49—50
*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招待铁路运输工作者时的 讲话(报道)	51—53
致巴黎《人道报》加香、多列士、古久里	54
致著名科学家康·爱·齐奥尔科夫斯基同志	55—56
附录：齐奥尔科夫斯基给斯大林的信	55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接见集体农庄种植甜菜的 女突击队员时的讲话(1935年11月10日)	57—59
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35年11月17日)	60—75
1.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	60
2.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根源	65
3. 新的人才和新的技术定额	69
4. 最近的任务	72
5. 简单的几句话	74
在先进的男女联合收割机手会议上的讲话 (1935年12月1日)	76—82
在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先进的男女集体 农庄庄员会议上的讲话(1935年12月4日)	83—84

1936年

和美国斯克里浦斯—霍华德报系总经理罗伊· 霍华德先生的谈话(1936年3月1日)	85—95
---	-------

- *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苏联英雄契卡洛夫、拜杜科夫、
别利亚科夫时的讲话(报道).....96—97
- * 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何塞·迪亚斯的电报.....98
- 关于苏联宪法草案(1936年11月25日在全苏苏维埃
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99—129
 - 一 宪法委员会的成立及其任务99
 - 二 1924—1936年在苏联生活中发生的变化..... 100
 - 三 宪法草案的基本特点 107
 - 四 资产阶级对宪法草案的批评 112
 - 五 对宪法草案的修改和补充意见 118
 - 六 苏联新宪法的意义 128
- * 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审定委员会的
报告(1936年12月5日)130—132
- * 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信133—135

1937年

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

两面派的办法(1937年3月3—5日在联共(布)

- 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和结束语)136—175
- 一 政治上的麻痹大意 137
 - 二 资本主义包围 140
 - 三 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 142
 - 四 经济胜利的阴暗面 147
 - 五 我们的任务 150
- 结束语 160

关于联共(布)历史教科书 给联共(布)历史教科书

- 编者们的信176—179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招待冶金工业和 煤炭工业领导工作人员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时 的讲话(1937年10月29日)·····	180—181
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 演说(1937年12月11日于大剧院)·····	182—187

1938年

给伊万诺夫同志的复信(1938年2月12日)·····	188—195
附录：伊万诺夫给斯大林的信·····	194
* 给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儿童读物 出版社的信(1938年2月16日)·····	196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高等学校工作人员时的讲话 (1938年5月17日)·····	197—199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	200—231
*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英雄的“祖国号”飞机机组时 的讲话(报道)·····	232—233

1939年

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 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3月10日)·····	234—287
一 苏联的国际形势·····	234
1. 资本主义各国的新的经济危机。争夺销售市场、 原料产地以及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	235
2. 国际政治形势的尖锐化，战后和约体系的崩溃， 新的帝国主义大战的开始·····	239

3. 苏联和各资本主义国家	244
二 苏联的国内形势	247
1. 工业和农业的进一步高涨	248
2. 人民物质状况和文化状况的进一步提高	259
3. 苏维埃制度的进一步巩固	263
三 联共(布)的进一步巩固	266
1. 改善党的成分的办法。划小组织单位。使领导 机关接近基层工作	267
2. 挑选干部, 提拔干部, 配备干部	269
3. 党的宣传工作。对党员和党的干部的马克思 列宁主义教育	272
4. 几个理论问题	275

1941年

广播演说(1941年7月3日)	288—294
关于第一〇〇、一二七、一五三、一六一步兵师分别 命名为第一、二、三、四近卫师的命令(摘录)	295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 (1941年11月6日在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296—310
四个月战争的经过	297
“闪击战”的破产	298
我军暂时失利的原因	301
“民族社会党人”是些什么人?	303
德帝国主义者及其军队必然灭亡	306
我们的任务	308
检阅红军时的演说(1941年11月7日于莫斯科红场)	311—313

1942年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指示信(1942年1月10日)·····	314—318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第55号。1942年2月23日 于莫斯科市)·····	319—324
* 给苏联科学院院长弗·列·科马罗夫的两个电报 (1942年春)·····	325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第130号。1942年5月1日 于莫斯科市)·····	326—332
答美联社记者问·····	333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第307号。1942年10月9日 于莫斯科市)·····	334—335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五周年 (1942年11月6日在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336—348
1. 后方的组织工作·····	336
2. 苏德战场上的军事行动·····	337
3. 关于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	340
4. 苏联、英国和美国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欧洲盟国的战斗联盟·····	343
5. 我们的任务·····	346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第345号。1942年11月7日 于莫斯科市)·····	349—352
* 给朱可夫的电报·····	353
答美联社记者问·····	354—355
* 给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指示(1942年秋)·····	356—357

致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乌克兰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乌克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	358—359
* 关于剧本《前线》的一个电报(1942年)·····	360

1943年

最高统帅给西南、南方、顿河、北高加索、沃罗涅日、 加里宁、沃尔霍夫、列宁格勒各方面军部队的命令·····	361—362
最高统帅给顿河方面军部队的命令·····	363
最高统帅命令(第95号。1943年2月23日于莫斯科市)·····	364—370
最高统帅命令(第195号。1943年5月1日于莫斯科市)·····	371—376
答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问·····	377
为英美军队在北非的胜利致邱吉尔和罗斯福的贺电 (1943年5月8日)·····	378
答英国路透社首席记者问·····	379—380
最高统帅给罗科索夫斯基大将同志、瓦图京大将 同志、波波夫上将同志的命令·····	381—383
最高统帅给波波夫上将、索科洛夫斯基上将、罗科 索夫斯基大将、瓦图京大将、科涅夫上将的命令·····	384—385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第269号。1943年9月8日于莫斯科市)·····	386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六周年 (1943年11月6日在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387—400
1. 战争进程中根本转折的一年·····	388
2. 全民支援前线·····	392
3. 反希特勒同盟的加强、法西斯同盟的瓦解·····	396

最高统帅命令(第 309 号。1943 年 11 月 7 日于莫斯科市)	401—404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第 313 号。1943 年 12 月 7 日 于莫斯科市)	405

1944 年

最高统帅命令(第 16 号。1944 年 2 月 23 日于莫斯科市)	406—411
最高统帅命令(第 70 号。1944 年 5 月 1 日于莫斯科市)	412—416
答《真理报》记者问	417
最高统帅命令(第 152 号。1944 年 8 月 20 日 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418—419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七周年 (1944 年 11 月 6 日在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420—432
1. 德国处在两个战场的夹攻中	421
2. 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的伟大功勋	424
3. 反德同盟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和平与安全问题	428
最高统帅命令(第 220 号。1944 年 11 月 7 日于莫斯科市)	433—436
最高统帅命令(第 225 号。1944 年 11 月 19 日 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437—438

1945 年

最高统帅命令(第 5 号。1945 年 2 月 23 日于莫斯科市)	439—442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第 8 号。1945 年 3 月 5 日 于莫斯科市)(关于《军事思想》杂志和《军事通报》杂志)	443—445
在签订苏联和波兰共和国友好、互助和战后 合作条约时的讲话(1945 年 4 月 21 日)	446—448

最高统帅给作战部队的命令(第 346 号。1945 年 4 月 27 日)	449
告红军和盟军书(1945 年 4 月 27 日)	450
最高统帅命令(第 20 号。1945 年 5 月 1 日于莫斯科市)	451—454
告人民书(1945 年 5 月 9 日)	455—456
最高统帅给红军和海军部队的命令(第 369 号。 1945 年 5 月 9 日)	457
致《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	458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红军将领时的讲话 (1945 年 5 月 24 日)	459—460
致《少先队真理报》	461
最高统帅命令(第 370 号。1945 年 6 月 22 日)	462
*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胜利阅兵式参加者时的讲话 (1945 年 6 月 25 日)	463
最高统帅给苏联红军和海军部队的命令 (第 371 号。1945 年 7 月 22 日)	464—465
最高统帅命令(第 51 号。1945 年 8 月 19 日于莫斯科市)	466—467
告人民书(1945 年 9 月 2 日)	468—470
最高统帅给红军和海军部队的命令(第 373 号。 1945 年 9 月 3 日)	471
 1946 年	
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1946 年 2 月 9 日)	472—484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第 8 号。1946 年 2 月 23 日 于莫斯科市)	485—488

给拉辛同志的复信	489—496
附录：拉辛给斯大林的信	493
就邱吉尔先生的演说答《真理报》记者问	
(1946年3月13日)	497—502
答美联社记者埃迪·吉尔摩问	503—504
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命令(第7号。1946年5月1日	
于莫斯科市)	505—507
答《星期日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亚历山大·沃斯	
先生问(1946年9月17日书面提出的问题)	508—510
答美国合众社社长休·贝利先生问	
(1946年10月23日接到的问题)	511—515
和埃利奥特·罗斯福的谈话	516—519

1947年

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命令(第10号。1947年2月23日	
于莫斯科市)	520—522
和美国共和党人士哈罗德·史塔生的谈话的记录	
(1947年4月9日)	523—534
贺词	535—537

1948年

在招待芬兰政府代表团的午宴上的讲话	
(1948年4月7日)	538—539
对华莱士先生的公开信的答复	540—541
答《真理报》记者问	542—544

1949年**答美国国际新闻社欧洲分社社长金斯伯里·史密斯**

先生问(1月27日接到的问题)545—546

1950年**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547—586**

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 547

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 答叶·克拉舍宁尼科娃同志 571

答同志们 577

答桑热耶夫同志 577

答德·别尔金和斯·富列尔两同志 578

答阿·霍洛波夫同志 581

1951年

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587—592

关于原子武器问题答《真理报》记者593—594

致共同社编辑局长岩本清先生595—596

1952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597—672**

对于和1951年十一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 597

1.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 597

2.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604

3.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问题 611

4. 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问题以及关于消灭它们之间的差别的问题	616
5. 关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瓦解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加深的问题	620
6.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问题	622
7. 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问题	625
8. 其他问题	629
9.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国际意义	632
10. 改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办法	633
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	634
关于尔·德·雅罗申科同志的错误	642
一 雅罗申科同志的主要错误	642
二 雅罗申科同志的其他错误	652
答阿·弗·萨宁娜和弗·格·文热尔两同志	664
1.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	664
2. 关于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的办法问题	666
答美国一些地方报纸编辑提出的问题	673
致苏联少年先锋队队员	674
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52年10月14日)	675—678
答《纽约时报》外交记者詹姆斯·赖斯顿问 (1952年12月21日接到的问题)	679
人名索引	680—690

给新乌达村集体农庄青年学校 少年先锋队队员和小学生们的信^①

新乌达村(东西伯利亚边疆区)集体农庄青年学校的少年先锋队队员和小学生们, 沙特汉诺夫、巴图罗娃、格奥尔格诺娃、丹尼洛夫、道尔日耶夫等同志:

回信迟了, 请原谅。你们的祝贺使我很感动。祝你们身体健康, 并在学习和社会工作方面获得成就。希望你们顺利地完成学业, 成为我们国家需要的有干劲、有学问的工作人员。

我和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送给你们一份小小的礼物: 一部无线电装置, 一台留声机和一些唱片。我想, 你们的无线电广播站现在可以正常工作了。

我代表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向你们致敬。祝你们一切都好。

约·斯大林

译自《列宁斯大林论青年》
1938年版第328页

① 新乌达村是东西伯利亚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 斯大林于1903年秋—1904年1月被流放在这里。1934年1月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幕之际, 适逢斯大林从这个流放地逃出的三十周年, 该村的少年儿童写信给斯大林表示祝贺。本篇是斯大林给他们的回信。——编者注

关于恩格斯的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①

现在我把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②一文分发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我认为必须把下述几点意见附在这篇文章之前。

阿多拉茨基同志建议在最近一期纪念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二十周年的《布尔什维克》上,刊载 1890 年在国外第一次发表的恩格斯的著名论文《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假设有人建议把这篇文章刊载在恩格斯的文集中,或者刊载在一本历史杂志上,那我认为是十分正常的。但是,现在是建议我们把它刊载在我们的战斗性的《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刊载在纪念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二十周年的那一期上。可见,有人认为,这篇文章可以当作一篇指导性的文章,或者不管怎样,从说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问题的角度来看,总是一篇对我党工作人员极有教益的文章。然而,恩格斯的这

① 本篇是斯大林 1934 年 7 月 19 日写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一封信。
——编者注

②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是维·伊·查苏利奇以劳动解放社《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的名义约请恩格斯撰写的,由德文译成俄文连载于 1890 年 2 月和 8 月《社会民主党人》第 1 集和第 2 集。这一著作当时还用德文、英文、法文、波兰文和保加利亚文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并出版了单行本。该文中译文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13—57 页。——编者注

篇文章，从它的内容中就可看出，尽管有其优点，可惜却不具备这些性质。不仅如此，它还有许多缺点。如果文章发表时不加批判，这些缺点是会把读者弄糊涂的。

因此，我认为在最近一期《布尔什维克》上发表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是不适宜的。

这些缺点是什么呢？

1. 恩格斯在说明俄国沙皇政府的侵略政策并对这种卑鄙龌龊的政策进行应有的抨击时，他用来解释这种政策之所以产生的，主要不是俄国军事封建商人上层对出海口、海港，对扩大对外贸易和占领战略据点的“需要”，而是指导俄国对外政策的是一帮似乎是万能的和非常有才能的外国冒险家，这帮人不知为什么处处走运，事事走运，这帮人使人惊讶地克服了达到自己冒险目的的所有一切障碍，以惊人的狡诈欺骗了欧洲所有的统治者，终于使俄国成了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

恩格斯这样来说明问题，可能使人觉得完全不可思议，但可惜这竟是事实。

下面就是恩格斯文中相应的地方。

恩格斯说：“对外政策，这毫无疑问是沙皇政府所擅长的、而且是非常擅长的一个方面。俄国外交界形成了某种现代的耶稣会，它强大到在需要的时候甚至足以克服沙皇的任性，足以在自己内部取缔贪污腐化，而在周围更广泛地传播这种贪污腐化之风。最初这一耶稣会主要是由外国人组成的，其中有：科西嘉岛人，如波茨措-迪-博尔哥；德国人，如涅谢尔罗迭；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人，如利文^①。它的创始人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是外国人。”

^① 卡·奥·波茨措-迪-博尔哥，伯爵，1814—1835年先后任俄国驻巴黎公使和大使，1835—1839年任驻伦敦大使。卡·瓦·涅谢尔罗迭，伯爵，1816—1856年任俄国外交大臣。赫·安·利文，公爵，1810—1812年任俄国驻柏林公使，1812—1834年任驻伦敦大使。——编者注

“至今只有一个真正的俄国人哥尔查科夫在这个教团中身居要职；他的继任者冯·吉尔斯①的姓又是一个外国姓。”

“正是这个最初由外国冒险家组成的秘密团体，把俄罗斯帝国变得现在这样强大。这一帮人以钢铁般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追求既定的目的，不惜背信弃义，阴谋叛变，进行暗杀，也不惜卑躬屈节，重金购买，不因胜利而陶醉，不因失败而气馁，踩着千百万士兵的尸体和至少是一个沙皇的尸体向前进，——这一帮人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对于使俄国的边界从第聂伯河和德维纳河扩展到维斯瓦河以西，直到普鲁特河、多瑙河和黑海，从顿河和伏尔加河扩展到高加索以南，直到奥克苏斯河和亚克萨尔特河②的发源地，他们的作用超过了俄国所有的军队；正是这一帮人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③（见上述恩格斯的文章）

可以认为，在俄国历史上，在俄国的外交史上，外交界就是一切，而沙皇、封建主、商人和其他社会集团则是不足道的或者几乎是不足道的。

可以认为，假设指导俄国对外政策的不是象涅谢尔罗迭或吉尔斯这样的外国冒险家，而是象哥尔查科夫等人那样的俄国冒险家，那么，俄国的对外政策就会走上另一条道路了。

十分卑鄙齷齪的侵略政策决不是俄国沙皇所独有的，这一点我不来谈了。尽人皆知，侵略政策也是——不是在较小的程度上，甚至是在较大的程度上——欧洲各国国王和外交家所具有的，其中包括拿破仑这样一个属于资产阶级类型的皇帝，他虽然并不是

① 亚·米·哥尔查科夫，公爵，1854—1856年任俄国驻维也纳大使，1856—1882年任外交大臣。尼·卡·吉尔斯，1875—1882年任俄国外交副大臣，1882—1895年任外交大臣。——编者注

② 奥克苏斯河即阿姆河。亚克萨尔特河即锡尔河。——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6—17页。——编者注

出身于皇室，但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中却成功地运用了阴谋、欺骗、背信弃义、阿谀奉承、残暴行为、收买、暗杀和纵火。

显然，也不可能不是这样。

大概恩格斯在写这篇抨击俄国沙皇政府的文章（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是一篇很好的有战斗性的抨击性文章）时，写得有点兴奋了，由于兴奋，所以一时忘记了某些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情。

2. 恩格斯在说明欧洲局势和揭示日益逼近的世界大战的原因和前景时写道：

“决定着欧洲当前的局势的是以下三个事实：（1）德国吞并阿尔萨斯-洛林；（2）沙皇俄国力图占领君士坦丁堡；（3）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所有国家中更加炽烈地燃烧起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高涨是这个斗争的标志。”

“前两件事实使得欧洲分裂为现在的两大军事阵营。德国的吞并把法国变成俄国反对德国的同盟者，沙皇对君士坦丁堡的威胁把奥地利，甚至意大利，变成德国的同盟者。两个阵营都在准备决战，准备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争，一场将有1 000万到1 500万武装的士兵互相对峙的战争。只有两个情况至今阻碍着这场可怕的战争爆发：第一，军事技术空前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新发明的武器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在一支军队中使用，就被另外的新发明所超过；第二，绝对没有可能预料胜负，完全不知道究竟谁将在这场大战中获得最后的胜利。”

“只有当在俄国发生这样一种转变，使俄国人民能够永远结束自己沙皇的传统的侵略政策，抛弃世界霸权的幻想，而关心自己本身在国内的受到极严重威胁的切身利益时，这种世界战争的全部危险才会消失。”^①

“……俄国的国民议会为了克服哪怕是最主要的内部困难，也很快就会坚决打消一切发动新的侵略的意图。”^②

“欧洲正好象沿着斜坡一样越来越快地滚向规模空前和力量空前的世界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3—54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53页。——编者注

战争的深渊。只有一个东西能够阻止它，那就是俄国制度的改变。这种改变将在最近若干年内发生，这是无庸置疑的。”^①

“……一旦沙皇政权这个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垮台，整个欧洲的风向就会完全改变。”^②（同上）

不能不指出，在这些说明欧洲局势和列举导致世界大战的原因的话里，忽略了一个后来起决定作用的重要因素，即争夺殖民地、争夺销售市场、争夺原料产地的帝国主义斗争这个当时就已有极重大意义的因素；忽略了作为后来的世界大战的因素的英国的作用，忽略了德国和英国的矛盾，这些矛盾当时就已有重大意义，后来对世界大战的发生和发展，起了几乎是决定的作用。

我认为，这种忽略是恩格斯文章的主要缺点。

从这个缺点产生了其余缺点。现在不妨指出其中的下列几点：

（一）**过高地估计了沙皇俄国力图占领君士坦丁堡这件事在促使世界大战日益逼近这方面的作用。**诚然，恩格斯起初把德国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当作大战的因素放在首位，但后来，他把这个因素放到次要地位，而把俄国沙皇政府的侵略意图放到首位，断言，“**只有当在俄国发生这样一种转变，使俄国人民能够永远结束自己沙皇的传统的侵略政策……时，这种世界战争的全部危险才会消失。**”

这当然是夸大了。

（二）**过高估计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俄国的国民议会”（资产阶级议会）在防止日益逼近的世界大战方面的作用。**恩格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7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56页。——编者注

斯断言，俄国沙皇政府的覆灭是防止世界大战的唯一手段。这显然是夸大了。设有“国民议会”的俄国新的资产阶级制度不可能防止大战，至少是因为大战的主要推动力在于主要的帝国主义强国之间的帝国主义斗争这方面。问题在于，自从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失败（19世纪50年代）以来，沙皇政府在欧洲国际政治中的独立作用就开始显著地下降，而到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沙皇俄国实质上起着欧洲主要大国的辅助的后备军的作用。

（三）**过高估计了沙皇政权的作用，认为它是“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恩格斯语）。俄国沙皇政权是全欧洲（以及亚洲）反动势力的强大堡垒，这是无可怀疑的。但要说它是这个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那是使人怀疑的。**

必须指出，恩格斯的文章的这些缺点，不仅有“历史价值”。它们还有，或者说应当有极重要的实际意义。其实：**如果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斗争被忽略了，不被看作是日益逼近的世界大战的因素，如果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帝国主义矛盾也被忽略了，如果德国吞并阿尔萨斯-洛林这一大战的因素被放到了次要地位，而把俄国沙皇政府力图占领君士坦丁堡当作大战的更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最后，如果俄国沙皇政府是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那么，比如说，资产阶级德国同沙皇俄国的战争就不是帝国主义的、掠夺的、反人民的战争，而是解放的、或者几乎是解放的战争，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未必可以怀疑，按照这样的思路，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14年8月4日决定投票赞成军事预算并宣布保卫资产阶级祖国免受沙皇俄国的侵略、免受“俄国野蛮行为”的侵害等口号的堕落行为，就可以得到开脱。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 1891 年（恩格斯的文章发表一年之后）给倍倍尔的信中谈到日益逼近的大战的前景时直接说，“德国的胜利因而将是革命的胜利”^①，“俄国要是发动战争，那就前进，冲向俄国人及其同盟者，不管他们是谁”^②！

显然，按照这样的思路，那就不可能有产生革命的失败主义的余地，不可能有产生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政策余地。

恩格斯的文章的缺点就是如此。

看来，恩格斯对于当时（1890—1891 年）已缔结好了的矛头针对德奥联盟的法俄同盟，甚感不安。因此，他的目的是要在自己的文章中攻击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使它失去欧洲的首先是英国的舆论的任何信任，但是在实现这个目的时，忽略了许多其他的极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所以造成了文章的片面性。

既然如此，是否还值得把恩格斯的文章刊载在我们的战斗性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上，作为指导性的文章，或者至少是作为极有教益的文章呢？因为很明显，把它刊载在《布尔什维克》上就是默然给它作这样一种推荐。

我认为是不值得的。

约·斯大林

1934 年 7 月 19 日

译自 1941 年 5 月《布尔什维克》
第 9 期第 1—5 页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8 卷第 159 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 185—186 页。——编者注

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

(1934年7月23日)

威尔斯：斯大林先生，承蒙接见，不胜感谢。不久以前我去过美国，和罗斯福总统作了一次长谈，我想弄明白什么是他的领导思想。现在我来拜访您，是想详细地问一问，您在做些什么事情来改变世界……

斯大林：做得还很不够……

威尔斯：我有时候游历全世界，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观察在我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斯大林：象您这样的大活动家，并不是“普通人”。当然，只有历史才能表明一个大活动家的重要性，但是无论如何，您并不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观察世界的。

威尔斯：我不是故意谦逊。我是指我竭力用普通人的眼光，而不是用有党派的政治家或十分重要的国务活动家的眼光来看世界。这次美国之行，给了我极强烈的印象。旧的金融界在崩溃，全国的经济生活以新的方式在改造。列宁当年曾经说过，要“学习做生意”，要向资本家学习这一点。现在资本家应当向你们学习，以便领会社会主义精神。我以为，在美国，问题是在于进行深刻的改造，是在于建立计划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您和罗斯福是从两个不同的起点出发的。但是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有没有思想上

的联系、思想上的血缘关系呢？例如，我在华盛顿就曾经看到了这里所进行的事情：扩大管理机关，建立许多新的国家调节机关，组织各种各样的行政机构。象贵国一样，那里也是领导本领不够。

斯大林：美国的目的是和我们苏联的目的不同。美国人所追求的目的，是从经济紊乱、经济危机的基础上产生的。美国人希望不改变经济基础，而在私人资本主义活动的基础上摆脱危机。他们力求把现存的经济制度所招致的破坏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在我们国家里，您知道，旧的经济基础已被破坏，建立起了完全不同的新的经济基础。即使您所说的那些美国人能够部分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即把这种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不能消灭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无政府状态的根源。他们还保存着这种一定要导致而且不能不导致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制度。因此，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谈不到改造社会，谈不到消灭这种产生无政府状态和危机的旧的社会制度，而只是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坏的方面，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极端的表現。这些美国人主观上也许认为他们是在改造社会，但是客观上在他们那里还保留着现今的社会基础。所以，客观上是不可能对社会进行任何改造的。

计划经济也是不可能有的。什么是计划经济呢，它有一些什么特征呢？计划经济力求消灭失业。我们假定，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可以做到把失业减少到某种最低限度。但是不论哪一个资本家，从来不会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完全消灭失业，消灭失业工人后备军，因为失业工人后备军的使命，就是压制劳动市场，保证工资比较低廉的劳动力。您看，这已经是资产阶级社会“计划经济”中的一个破绽。其次，计划经济要求加强产品为人民

群众所特别需要的那些工业部门的生产。可是您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扩大是按照完全不同的动机来进行的，哪一个经济部门的利润率比较高，资本就流向哪一个经济部门。您永远不能迫使资本家自己受损失，同意较低的利润率，以便满足人民的需要。如果不摆脱资本家，如果不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原则，那么您就不能建立计划经济。

威尔斯：您的话有好多我是同意的。但是我想着重指出，如果整个国家接受计划经济原则，如果政府逐渐地、一步步地开始彻底实行这个原则，那么最终金融寡头就会消灭，盎格鲁撒克逊人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就会建立起来。罗斯福的“新政”口号具有巨大的效果，而且据我看来，那是社会主义的口号。我觉得不要强调两个世界的对抗，要在当前环境下力求确立一切建设性力量间的共同语言。

斯大林：当我说在保存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下不可能实现计划经济原则时，我丝毫不想以此贬低罗斯福的卓越的个人品质——他的主动、勇敢和坚决。毫无疑问，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首脑中间，罗斯福是一个最有才能的人物。所以，我想再一次着重地说，我相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实行计划经济，但这个信念绝不意味着怀疑罗斯福总统个人的能力、才干和勇敢精神。但是一个最有才干的统帅，如果环境对他不利，他就不能达到您所说的那种目的。当然，在理论上并不排斥这样一点，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逐渐地、一步步地走向您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解释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个目的。但这种“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呢？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意味着稍微抑制一下个别最不受抑制的资本主义利润的代表者，稍微加强一下国民经济的调节原则。所有这

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只要罗斯福或现代资产阶级世界的任何其他首脑，采取任何认真的办法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基础，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完全失败。要知道银行不在罗斯福手中，工业不在他手中，大企业、大农场不在他手中。要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私有财产。无论是铁路也好，商船也好，都掌握在私有主手中。最后，熟练劳动者大军、工程师和技师，他们也都不在罗斯福手中，而是在私有主手中，他们都是为私有主工作。不可忘记国家在资产阶级世界中的职能。这是一个组织国防、维持“秩序”的机关，征收捐税的机构。真正的经济是很少与资本主义国家有关系的，它并不在资本主义国家手中。相反地，国家是掌握在资本主义经济手中。因此，不管罗斯福有多大的精力和能力，我担心他不会达到您所说的目的，要是他真有这个目的的话。也许，经过几代以后，可以稍微接近于这个目的，但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很少有可能的。

威尔斯：也许我比您更相信从经济上说明政治。由于各种发明和现代科学，强大的力量得到了利用，这些力量导致把人们更好地组织起来，使人的集体更好地发挥作用，即导致社会主义。不管社会理论如何，把个人行动加以组织和调整，已成为客观的必然。如果从国家监督银行开始，进而监督运输业，监督重工业，监督一般工业，监督商业等等，那么这种无所不包的监督就等于把国民经济一切部门国有化了。这也就是社会化的过程。要知道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并不是象黑与白那样水火不相容。它们之间有着许多中间阶段。有与土匪行为相近的个人主义，也有与社会主义意义相同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实现计划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经济组织者、熟练的技术知识分子，而这种知识分子是可以一步步地争取到社会主义组织原则方面来的。这是最主要的。因为首先

是组织，然后才是社会主义。组织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组织，社会主义思想也就只是一种思想罢了。

斯大林：个人和集体之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应当有不可调和的对立。不应当有这种对立，是因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是不能撇开个人利益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给这种个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满足。此外，社会主义社会是保护个人利益的唯一可靠的保证。在这个意义下，“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对立。但是难道能否认阶级之间的对立，有产者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无产者阶级之间的对立吗？一方面是有产者阶级，他们掌握着银行、工厂、矿山、运输业、殖民地种植园。这些人除了自己的利益、自己追求利润的欲望以外，是什么都看不见的。他们不服从集体的意志，他们力求使任何集体都服从自己的意志。另一方面是穷人阶级、被剥削者阶级，他们没有工厂，没有银行，他们为了谋生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他们被剥夺了满足自己最起码的需要的可能性。这些互相对立的利益和欲望，怎么能调和起来呢？据我所知，罗斯福并没有找到调和这些利益的途径。经验告诉我们，这也是不可能的。您对于美国的情况要比我知道得清楚些，因为我没有去过美国，主要是根据书报来观察美国情形。但是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方面，我却有一点经验，这种经验告诉我，如果罗斯福真的企图牺牲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来满足无产者阶级的利益，那么资本家就会拿别的总统来代替他。资本家们会说，总统可以上台下台，我们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如果某一总统不能保卫我们的利益，我们就另找一个。总统能拿什么来反抗资本家阶级的意志呢？

威尔斯：我反对这样简单化地把人类分为穷人和富人。当然，有专以发财为目的的一类人。但是这些人，难道不也象在这里一样被认为是障碍物吗？有一些人不是以发财为目的，他们有一定数量的钱，希望投资，由此获得利润，但是根本不认为这是自己活动的目的，这种人难道在西方很少吗？这些人把投资看作一种很勉强的必要。有一些有才干的和忠心耿耿的工程师、经济组织者，他们的活动不是受发财而完全是受其他刺激推动的，这种工程师、经济组织者难道很少吗？据我看来，有一个为数众多的实在是能干的人们组成的阶级，他们意识到现存制度的不能令人满意，他们的使命是在将来社会主义社会里起巨大的作用。近几年来，关于必须在广大的工程师、飞行员中间和军事技术界等等宣传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想，我已做了许多，想了许多。对这些人作直截了当的阶级斗争宣传，是没有用的。这些人懂得这个变为血泊的世界是处在怎样的状态中，但是他们认为你们那种简单的阶级斗争的对立是毫无意义的。

斯大林：您反对简单化地把人分为富人和穷人。当然，有中间阶层，也有您所说的技术知识分子，在这种知识分子中间有很诚实的好人。在这种知识分子中间也有不诚实的坏人。什么人都有。但是人类社会首先是分为富人和穷人、有产者和被剥削者，撇开这个基本划分，撇开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就是撇开基本事实。我不否认中间阶层的存在，这些中间阶层不是站在这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中的一个阶级方面，便是在这一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或半中立的立场。但是，我重说一遍，撇开社会的这一基本划分和两个基本阶级间的这一基本斗争，就是忽视事实。这一斗争正在进行，而且还要进行下去。这一斗争的结果，是由无产者阶级、劳动者阶级

来决定的。

威尔斯：但是劳动的、劳动效率很高的、可是并不穷的人难道很少吗？

斯大林：当然也有小土地占有者、手工业者、小商人，但决定各国命运的并不是这些人，而是生产社会一切必需品的劳动群众。

威尔斯：但是要知道有各种各样的资本家。有只想牟利、只想发财的资本家，也有甘愿牺牲的资本家。例如，老摩根，他就是只想发财，他简直是社会的寄生虫，他只是把财富聚积在自己手中。可是我们看一下洛克菲勒，他是出色的组织者，他是组织石油销售的模范，值得仿效的榜样。或者看一下福特。当然，福特是很狡猾的，自私自利的，但他不是你们正要学习的合理化生产的热情的组织者吗？我要着重指出，最近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里，对于苏联的社会舆论已经有了重大的转变。其原因首先就是日本的态度和德国的事件。但也有不单是从国际政治产生的其他一些原因。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广大的各界人民认识了以私人营利为基础的制度正在瓦解。在这些条件下，我以为不应该过于强调两个世界之间的对抗，而应该竭力把一切建设性运动、一切建设性力量尽可能地结合起来。我觉得我比您更左些，斯大林先生，我认为世界离开旧制度死亡的日子已经很近了。

斯大林：当我说到只想牟利、只想发财的资本家时，我根本不算以此来说明，他们都是一无所能的最不中用的人。他们中间有好多人无疑是具有很大的组织能力的，这一点我绝不想否认。我们苏联人向资本家学习很多东西。就说这个被你说得那么糟糕的摩根，无疑也是优秀的能干的组织者。但是，如果说到立志改造世界的人们，那么，在那些一心一意专事营利的人中间，当然

是找不到这种人的。我们和那些专事营利的人站在对立的两极上。您说到福特。当然，他是能干的生产组织者。可是难道您不知道他是怎样对待工人阶级的吗？难道您不知道他毫无道理地把多少工人抛到街头吗？资本家是和利润血肉相连的，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他和利润分开。资本主义将被工人阶级所消灭，而不是被生产“组织者”、不是被技术知识分子所消灭，因为这一阶层不能起独立的作用。要知道，工程师、生产组织者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愿望，而是按照别人的命令、按照主人的利益所要求的去做工作的。当然也有例外，这个阶层中间也有摆脱了资本主义欺骗的人。技术知识分子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创造“奇迹”，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利益。但是他们也能带来巨大的害处。我们苏联人对于技术知识分子有不少切身的经验。十月革命以后，一部分技术知识分子不愿意参加新社会的建设，抗拒这一建设，实行怠工。我们曾经多方努力把技术知识分子吸引到这一建设中来，对他们用了各种办法。经过不少的时间，我们的技术知识分子才走上了积极帮助新制度的道路。今天，他们当中优秀的一部分已站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最前列了。我们有了这一经验，就决不低估技术知识分子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我们知道，他们既能造成危害，又能创造“奇迹”。当然，如果经过一次突击就能使技术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脱离资本主义世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但这是空想。难道能够从技术知识分子中找到很多决心跟资产阶级世界决裂而献身于社会改造的人吗？据您看来，比方在英国和法国，这种人是很多的吗？不，愿意同自己的主人决裂而去改造世界的人是很少的呀！

此外，要改造世界，就应该有政权，这一点难道可以忽视吗？威尔斯先生，我觉得您非常低估政权问题，您根本没有想到它。要

知道即使有美好愿望的人，如果不能提出夺取政权的问题和没有掌握政权，他们能做出什么来呢？最多他们只能协助夺取政权的新阶级，而他们自己是不能把世界翻转过来的。为此，就必须有一个巨大的阶级，这个阶级可以代替资本家阶级，成为象资本家阶级那样握有充分权力的主人。这样的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当然，应该接受技术知识分子的帮助，而反过来又应该给技术知识分子以帮助。但是不应该认为技术知识分子能起独立的历史作用。改造世界是一个巨大、复杂和痛苦的过程。要完成这个巨大的事业，必须有一个巨大的阶级。远航必须有火船。

威尔斯：是的，但要远航，就必须有船长和领航员。

斯大林：对的，但要远航，首先就必须有火船。要是没有船，那么领航员算什么呢？是一个没有事做的人。

威尔斯：火船就是人类，而并不是阶级。

斯大林：威尔斯先生，看来，您是从一切人都是好人这个前提出发的。可是我没有忘记，有很多的坏人。我不相信资产阶级的好心。

威尔斯：我回想起几十年以前技术知识分子的情形。那时候技术知识分子很少，但是事情很多，每个工程师、技师、知识分子都找得到应用自己知识的机会。因此，这是一个最不革命的阶级。今天技术知识分子太多，他们的情绪急剧地改变了。以前甚至听也不愿听革命言论的熟练知识分子，现在对革命言论感到兴趣了。不久以前我应邀参加了我们英国最大的科学团体皇家学会的宴会。主席的演说赞成社会计划化和科学管理。三十来年前，该学会甚至没有人会听我刚才说的话。而现在领导该学会的，是具有革命观点和主张科学地改造人类社会的人。你们宣传阶级斗争，

是没有估计到这些事实的。情绪在改变。

斯大林：是的，我知道这一点，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在陷入了绝境。资本家正在找寻但又找不到一个符合这个阶级的尊严、这个阶级的利益的摆脱绝境的出路。他们可以部分地爬出危机，但是他们是找不到可以使他们昂着头走出来而根本不损害资本主义利益的出路的。当然，广大的技术知识界都感到了这一点。他们很大的一部分开始觉悟到，他们跟那个能够指出摆脱绝境的出路的阶级有共同的利益。

威尔斯：斯大林先生，什么是革命，而且在实践上是怎样，您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是否群众自己会在某个时候举行起义呢？您是否认为一切革命都是少数人进行的这一事实是确定的真理呢？

斯大林：要革命就必须有领导革命的少数人，但是最有才能、最忠诚和最有干劲的少数人，如果不依靠千百万人的哪怕是消极的支持，他们也会束手无策。

威尔斯：哪怕是消极的支持吗？也许是下意识的支持吧？

斯大林：部分地也依靠半本能的支持，依靠半自觉的支持。但是没有千百万人的支持，最优秀的少数人也是无能为力的。

威尔斯：我观察了西方的共产主义宣传，我觉得这种宣传在现代条件下听起来是完全不合时宜的，因为它宣传暴力行动。这种主张以暴力推翻社会制度的宣传，只有在某一暴政实行绝对统治的时代才是适当的。但是，在今天的条件下，统治的制度反正在毁坏，本来在解体，就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暴动上，而应该放在效率上，放在本领上，放在生产率上。我觉得暴动的调子已经陈腐了。在那些建设性地思考问题的人看来，西方的共产主义宣传是一种障碍。

斯大林：当然，旧制度是在毁坏，在解体。这是真的。然而人们正在作新的挣扎，正在用另一些方法，用所有的办法来捍卫、拯救这个正在灭亡的制度，这也是真的。您从正确的断定中作出了不正确的结论。您正确地断定旧世界是在毁坏。但是您认为它在自行崩溃，那就不对了。不，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革命过程。这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过程，这是斗争，这是与阶级冲突相联系的过程。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了，但是不能把它简单地跟一棵已经十分腐朽、自己一定会倒在地上的树相比。不，革命，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总是斗争，是痛苦的残酷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每当新世界的人们得到了政权，他们就应该保卫它，以防旧世界用暴力恢复旧制度，他们，新世界的人们总是应该保持戒备，准备回击旧世界对新制度的侵犯。

是的，您说旧社会制度在毁坏，这是对的，但是它不会自行崩溃。例如，就拿法西斯主义来说吧。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企图用暴力来维持旧世界的反动力量。您对法西斯分子将怎样办呢？劝告他们吗？说服他们吗？但要知道这对他们是不会有丝毫效力的。共产党人决不把暴力方法理想化。可是他们，共产党人，不愿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不能期待旧世界会自己离开舞台，他们看到旧制度是在用暴力保卫自己，因此共产党人向工人阶级说：准备以暴力回答暴力，尽力防止正在灭亡的旧制度击溃你们，别让旧制度给你们的双手戴上镣铐，你们是要用这双手去推翻这个旧制度的。您可以看得出来，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的过程，在共产党人看来，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和和平的过程，而是复杂的、长期的和暴力的过程。共产党人不能不估计到事实。

威尔斯：不过请您注意看一看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要知道这不简单地是制度的崩溃。这是那种蜕变为露骨暴徒行为的反动暴力的爆发。我觉得，在谈到跟这些反动的愚笨的暴徒冲突时，社会主义者应当诉诸法律，并且不要把警察看作敌人，而要支持警察跟反动分子作斗争。我觉得，不可简单地用旧的、呆板的、暴动的社会主义所使用的那些方法来行动。

斯大林：共产党人是从丰富的历史经验出发的，这个历史经验教导我们，已经衰亡的阶级不会自愿地退出历史舞台。请您回忆一下 17 世纪的英国历史。难道不是有很多人说过旧社会制度已经腐朽了吗？然而难道不需要克伦威尔用暴力去粉碎旧制度吗？

威尔斯：克伦威尔是依靠宪法和以立宪制度的名义行动的。

斯大林：为了宪法他采用了暴力，处决了国王，解散了议会，逮捕了一些人，杀了另一些人！

再从我国历史中举个例子吧。难道在一个长时期中人们不是知道沙皇制度在腐朽，在崩溃吗？然而为了推翻它，不知流了多少血啊！

而十月革命呢？难道知道只有我们布尔什维克才指出了唯一正确出路的人还少吗？难道人们不懂得俄国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了吗？但是您知道，为了保卫十月革命不受国内外一切敌人的侵害，我们进行了多么大的抵抗，我们流了多少血啊！

或者再看一看 18 世纪末的法国。在 1789 年以前很久，许多人就已经知道，王权和农奴制度腐朽到了什么地步。但是没有人民起义，没有阶级冲突，对它们就没有办法而且也不可能有办法。

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那些应当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总是直到最后才相信他们的作用已经完结。要他们确信这一点是不

可能的。他们以为，已经腐朽的旧制度建筑物上的裂口是可以填补的，正在毁灭的旧制度建筑物是可以修补和挽救的。因此，垂死的阶级拿起武器，开始用一切手段来保卫自己，使自己能够作为统治阶级生存下去。

威尔斯：但领导法国大革命的还有不少律师。

斯大林：难道您否认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吗？难道法国大革命是律师的革命，而不是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封建制度、保卫了第三等级的利益并取得了胜利的人民革命吗？难道法国大革命领袖中间的律师们，是按照旧制度的法律行动吗？难道他们没有建立新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法制吗？

丰富的历史经验教导我们，直到现在没有一个阶级曾经自愿让路给另一个阶级。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这种先例的。共产党人掌握了这个历史经验。共产党人是会欢迎资产阶级自愿地退出舞台的。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共产党人愿意作坏的准备，号召工人阶级警觉起来，作战斗的准备。谁需要那种麻痹自己军队的警觉性的统帅，那种不知道敌人决不会投降，不知道应当彻底消灭敌人的统帅呢？做这样的统帅，就是欺骗和出卖工人阶级。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认为，您觉得不合时宜的东西，事实上对工人阶级来说，正是一种革命的合适方法。

威尔斯：我绝不否认暴力的必要性，但是我认为斗争形式应当最大限度地接近于现存法律所给予的可能性，应当保卫这种可能性不受反动的侵犯。旧秩序之所以用不着加以瓦解，是因为它本身正在充分地瓦解着。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觉得反对秩序、反对法律的斗争，是一种陈旧的、不合时宜的东西。而我有意地要夸张一点，以便更清楚地显示真理。我可以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如下：第

一,我拥护秩序;第二,既然现存制度不保障秩序,我就要抨击它;第三,我认为宣传阶级斗争思想,会把社会主义同恰好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受过教育的人们隔离开来。

斯大林: 为了进行巨大的严重的社会事业,必须有一个主力,支柱,即革命阶级。其次,必须把辅佐力量对这个主力的援助组织起来,这个辅佐力量在目前情况下就是知识分子的优秀力量也可以加入的党。您刚才说到“受过教育的人们”。但您所指的是哪一种受过教育的人呢?不论在17世纪的英国,在18世纪末的法国,在十月革命时代的俄国,难道站在旧秩序方面的受过教育的人是很少的吗?有很多受过很高教育的人站在旧制度方面,替旧制度服务,他们维护旧制度,反对新制度。要知道教育是一种武器,其效果是取决于谁把它掌握在手中,用这个武器去打击谁。当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需要受过很高教育的人。很明显,蠢才是不能帮助无产阶级去争取社会主义、建立新社会的。我并不低估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反地,我却强调他们的作用。问题只在于,说的是哪一种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是有各种各样的。

威尔斯: 如果不根本改变国民教育制度,那就不可能有革命。只要举两个例子就够了:一个是德意志共和国的例子,它不曾触动旧的教育制度,因而它从未成为共和国;另一个是英国工党的例子,它坚持根本改变国民教育制度的决心不够。

斯大林: 这是正确的意见。

现在让我来回答您所提出的三点:

第一,对于革命来说,主要的就是要有社会支柱。这个革命支柱就是工人阶级。

第二,必须有辅佐的力量,共产党人把这种力量称作党。具有

知识的工人以及技术知识分子中间跟工人阶级有密切联系的分子,都可以加入这个党。知识分子只有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才能是强有力的。如果他们反对工人阶级,那么他们就变成毫不足道的人了。

第三,必须有政权作为改革的杠杆。新政权建立新法制、新秩序,这种秩序就是革命秩序。

我不是拥护任何的秩序。我只拥护与工人阶级利益一致的秩序。如果旧制度的某些法律可以被利用来为争取新秩序而斗争,那就应当也利用旧法制。您说既然现存制度不保障人民所必需的秩序,就应该加以抨击;对您的这个意见,我是没有丝毫异议的。

最后,如果您认为共产党人醉心于暴力,那就不对了。如果统治阶级同意让位给工人阶级,那么共产党人是会乐意放弃暴力方法的。但是历史经验是否定这个假设的。

威尔斯: 但是在英国历史上就有过一个阶级自愿把政权让给另一个阶级的例子。在1830年到1870年这个时期中,未经过任何残酷斗争便发生了贵族自愿把政权转交给资产阶级的过程,贵族的影响到18世纪末还是很大的,而资产阶级则是君主制的多情的支柱。政权的这一转移,后来便导向金融寡头统治的确立。

斯大林: 可是您不知不觉地从革命问题转到改良问题了。这不是同一个东西。您不认为宪章运动在19世纪英国的改良事业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吗?

威尔斯: 宪章派做的事情很少,而且已经销声匿迹了。

斯大林: 我不同意您的意见。宪章派和他们所组织的罢工运动曾起了巨大作用,曾经迫使统治阶级在选举制度方面、在消灭所

谓“衰败城镇”^①和实行“宪章”某几条方面作了许多让步。宪章派曾经起了不小的历史作用，并且促使一部分统治阶级为了避免重大的震动而作了一些让步，实行了一些改良。一般地应该说，在一切统治阶级中间，英国的统治阶级，无论是贵族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从他们的阶级利益看来，从维持他们的政权看来，都是最聪明、最圆滑的。我们就从现代历史上举一个例子吧。比如1926年英国总罢工。当时工联总理事会号召罢工，任何资产阶级遇到这种事件，首先就会逮捕工联领袖。英国资产阶级没有这样做，从他们的利益看来，他们是做得很聪明的。不论在美国、德国、法国，我都不能想象资产阶级方面会有这样圆滑的阶级战略。为了确立自己的统治，英国统治阶级从来不惜实行若干小的让步和改良。但是以为这些改良是革命，那就错了。

威尔斯：关于我国的统治阶级，您的评价比我的要高。但是一般讲来，小的革命和大的改良之间的区别是不是很大呢？改良不是小的革命吗？

斯大林：由于从下面来的压力、群众的压力，资产阶级有时候可以实行某些局部的改良，而依然保存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他们在这样行动时，认为这些让步是为保存自己的阶级统治所必需的。改良的实质就在这里。革命则表示政权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因此，任何改良都不能叫作革命。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能期望社会制度的更替可以通过改良，通过统治阶级的让

① “衰败城镇”是指英国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一些人口减少但仍沿袭旧制享有选举议员权利的小城镇和乡村。“衰败城镇”的议员大多数实际上是由支配着当地居民的大土地贵族指派的。“衰败城镇”的这种特权被1832年和1867年的选举改革所取消。——编者注

步,使一种制度悄悄地过渡到另一种制度来实现。

威尔斯: 我很感谢您这次谈话,因为它对我有很大的意义。您在给我解释时,大概回忆起了您在革命前的地下小组里阐明社会主义原理的情形。现在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每一句话是千百万人注意听的。这就是您和罗斯福。其他的人尽可以讲得天花乱坠,但不会有人登载,不会有人理会。我还不能评价贵国所进行的事情,因为我昨天才到这里。不过我已经看见了健康的人们的幸福面容,我知道你们正在进行一种非常重大的事业。跟 1920 年形成了惊人的对比。

斯大林: 如果我们布尔什维克更聪明些,那么我们做的事情也许还多些。

威尔斯: 不,如果人们全都更聪明些。不妨想出一个改造人类头脑的五年计划,因为人类头脑显然还缺少为完善的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很多东西。

斯大林: 您是不是打算出席苏联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呢?

威尔斯: 可惜得很,我杂务在身,只能在苏联逗留一星期。我这次来是为了会晤您,我对我们的谈话深为满意。但是我打算跟我能够会见的苏联作家谈谈他们能否参加笔会的问题。这是高尔斯华绥所创立的一个国际作家组织,在他逝世以后我就担任了主席。这个组织还是很薄弱的,可是它在很多国家里都有分会,而且(这是更重要的)该会会员的言论可以广泛地发表出来。这个组织坚持有自由发表一切意见的权利,连反对的意见也在内。我打算和马克西姆·高尔基谈一谈这个问题。但是我不知道这里是否允许有这样广泛的自由。

斯大林: 我们布尔什维克把这一点叫作“自我批评”。它在苏

联是广泛地运用的。

如果您有什么愿望的话,我是乐意帮助的。

威尔斯: 谢谢。

斯大林: 谢谢您和我的谈话。

康·乌曼斯基记录

译自《列宁主义问题》第10版
第599—613页

关于《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

瓦纳格小组^①没有完成任务，甚至对任务本身也不理解。这个小组编的是俄罗斯历史提纲，而不是苏联历史提纲，也就是说，编的是俄罗斯历史提纲，而没有包括加入苏联的各民族的历史（没有照顾到乌克兰、白俄罗斯、芬兰和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各民族、北高加索和外高加索各民族、中亚细亚和远东各民族以及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部各民族——鞑靼人、巴什基尔人、莫尔多瓦人、楚瓦什人等等的历史材料）。

提纲中没有着重指出俄国沙皇政府协同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一起实行兼并和殖民主义的作用（“沙皇政府是各民族的监狱”）。

提纲中没有着重指出俄国沙皇政府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起到 19 世纪 50 年代和以后在对外政策方面所起的反革命作用（“沙皇政府是国际宪兵”）。

提纲中把封建制度和封建制度前的时期（当时农民还没有成为农奴），把专制的国家制度和封建制度（当时俄罗斯还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半国家）混淆在一起。

^① 1934 年 5 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在《关于苏联学校中历史教学的决定》中批准了新历史教科书编写小组名单，其中《苏联历史》教科书编写小组成员是：尼·尼·瓦纳格教授（组长）、波·德·格列科夫教授、安·米·潘克拉托娃教授、谢·安·皮翁特科夫斯基教授。——编者注

提纲中把反动和反革命,把“一般”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概念混淆在一起。

提纲中没有指出被沙皇政府所征服的俄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条件和根源,因而把这些人民从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革命——十月革命的理由,没有得到说明,同样,建立苏联的理由也没有得到说明。

提纲中充满了各种陈腐的老一套的提法,如“尼古拉一世的警察恐怖”、“拉辛之乱”和“普加乔夫之乱”、“19世纪70年代地主反革命的进攻”、“产业革命的最初步骤”、“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同1905—1907年的革命作斗争的最初步骤”等等。提纲的编撰者盲目地照抄各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陈腐的和完全不科学的提法,忘记了他们应该教给我们的青年以马克思主义的、有科学根据的提法。

提纲没有反映出西欧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对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提纲的编撰者显然忘记了,俄国革命家认为自己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著名大师的学生和追随者。

提纲没有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的根源和作为西欧帝国主义列强的后备军的沙皇政府在这个战争中的作用,同样也没有指出俄国沙皇政府和俄国资本主义对西欧资本的依赖,因此,十月革命作为使俄国摆脱半殖民地地位的解放者的意义,没有得到说明。

提纲中没有讲到世界大战前夜整个欧洲存在着政治危机,这种危机也表现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和议会制的衰落,因此,从世界

史的角度来看，苏维埃作为无产阶级民主制的体现者和使工农摆脱资本主义的机关的意义，没有得到说明。

提纲中没有讲到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和对托洛茨基主义即小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表现的斗争。

诸如此类等等。

一般的应该说，提纲编撰得极其粗糙，并且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文理上也是不太通的。

至于提纲的体裁不够恰当，玩弄“字眼”，例如把伪德米特里叫作“被人称作的”德米特里，又如“18 世纪老封建主的胜利”（但是，不知道“新的”封建主在哪里，他们的表现怎样，如果在这个时期他们是存在的话）等等，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认为，必须根据上述几点的精神根本改编提纲，同时应该估计到，这里说的是编撰**教科书**，因而应该斟酌每一个字和每一个提法，而不是登在杂志上的不负责的文章，可以毫无责任感地随便乱讲一通。

我们需要的苏联历史教科书是，大俄罗斯的历史不脱离苏联其他各族人民的历史，这是第一，而苏联各族人民的历史又不脱离整个欧洲历史，并且一般的也不脱离世界历史，这是第二。

约·斯大林

安·日丹诺夫

谢·基洛夫

1934 年 8 月 8 日

译自 1936 年 2 月《布尔什维克》
第 3 期第 63—64 页

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

由于近代史的本身内容最丰富,事件太多,同时由于在资产阶级国家的近代史中(如果是指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的时期)最主要的是法国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在欧洲和美洲的确立,所以我们认为,如果近代史教科书从法国革命那章开始就比较好。为了要和以前的事件联系起来,可以在前面写一篇不长的引言,简要地叙述尼德兰革命和英国革命的主要事件,而把尼德兰革命和英国革命的详细叙述,放到中世纪史教科书的末尾去。

因此我们建议,把第一部分(共6章)即整个第一篇从提纲中删去,代之以简要的引言。

我们认为,提纲的主要缺点是,对法国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深刻差别和对立,强调得不够突出。而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对立这一思想,应该成为近代史教科书的主要中心。阐明法国的(以及一切其他的)资产阶级革命把人民从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的锁链下解放出来,但又给他们套上新的锁链——资本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锁链,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则粉碎了一切锁链,并且把人民从一切形式的剥削下解放出来,——这应该是贯穿近代史的一条红线。

所以,不容许把法国革命简单地称作“大”革命,而应该把它称

为和解释为**资产阶级**革命。

同样，也不能把我们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简单地称为十月革命，而应该把它称为和解释为**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革命**。

因此，应该改编近代史教科书的提纲，同时要选择相应的提法和术语。

我们认为，提纲中把近代史分为两部分是没有理由和没有根据的，是按照某种不可理解的标志划分的，我们认为把近代史分为三部分，是适当的，

第一部分——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以前，这是资本主义在先进国家里胜利和确立的时期。

第二部分——从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帝国主义大战的结束。这是资本主义开始衰落、巴黎公社给了资本主义第一次打击、旧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成帝国主义以及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的力量在苏联推翻了资本主义的时期。

第三部分——从1918年末（战争结束的一年）到1934年末。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后帝国主义时期，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时期，是法西斯主义和加紧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时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苏联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时期，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期，是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建设的时期，是资本主义最后残余根除的时期，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胜利和高涨、社会主义在农村中胜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胜利的时期。我们认为提纲的编撰者把历史中断在1923年是一个大错误。应该纠正这个错误，将历史写到1934年末。针对这点，必须将材料、篇章进行改编和重新分配。

最好是把提纲中那些陈腐的老一套的说法,如“旧制度”、“新制度”等删去。旧制度代之以“资本主义前的制度”比较好,或者代之以“封建专制制度”就更好,而“新制度”代之以“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作了这样的变更,所谓“新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同成为人类社会制度更高类型的苏联的苏维埃制度比较,就显得是旧制度了。

最好把提纲中过多的“时代”也删去。“执政府时代”、“拿破仑时代”、“督政府时代”——时代不是太多了吗?

我们认为,提纲中谈殖民地问题的篇幅太少,也是不对的。对乔治·桑、施本格勒、吉卜林这样一些人注意的相当多,而对殖民地问题和譬如说象中国这样的国家的状况,注意的却少了。

同样,最好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这种提法改为“德意志和意大利重新统一为独立国家”。否则,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不是指象德意志和意大利这样一些以前分裂的国家争取重新统一,而是指把这两个国家统一为一个国家。

总的说来,我们的意见是,近代史提纲比苏联历史提纲编得较有条理,但是在这个提纲中混乱的地方仍然相当多。

约·斯大林

谢·基洛夫

安·日丹诺夫

1934年8月9日

摘自1936年2月《布尔什维克》
第3期第65—66页

在接见冶金工作者代表团时的讲话

(1934 年 12 月 26 日)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曾经经历过技术人才缺少的时期。我们曾经面临过这样的抉择：或者是先在技术学校中训练人才，而在学校还没有培养出技术干部时，把生产和大量使用机器推迟 10 年；或者是立即开始制造机器，在国民经济中大量使用机器，以便在生产和使用机器的过程中训练技术人才，培养干部。我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由于缺少受过技术训练和善于使用机器的人才，因此在走这条道路时，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笔费用和额外开支，但是我们公开而自觉地走上了这条道路。诚然，在这段时期内，损坏了不少机器，但是我们却赢得了最宝贵的东西——时间，造就了经济工作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干部。在 3—4 年中，我们不但在各种机器（拖拉机、汽车、坦克、飞机等等）的制造方面，而且在大量使用机器方面，都培养了许多技术干部。在欧洲要花几十年才能办到的事，我们却在 3—4 年内就大致上和基本上完成了。这就绰绰有余地抵偿了这些费用和额外开支、机器的损坏和其他损失等。这就是我国迅速工业化的基础。但是，如果我国的钢铁工业办得没有成绩，没有发展起来，那我们就不会有这些成就。

斯大林同志继续说：我们可以有充分根据地说，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钢铁工业已获得了巨大成就。是的，我们已取得了胜利。但是决不能由于这些成就而骄傲起来。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忘记缺点，忘记今后的任务，这是最危险的事情。

斯大林同志指出冶金工作者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并向他们提出了希望。

斯大林同志说：在所有发达的国家中，钢产量都超过生铁产量。有些国家的钢产量超过生铁产量 25—30%。在我国却相反，钢产量低于生铁产量。这种情况要继续到什么时候呢？要知道现在已不能把我国看作是一个“木材的”国家，一个没有废铁的国家等等。现在我国已是一个金属的国家了。难道现在还不是消灭生铁和钢生产之间的不协调现象的时候吗？

斯大林同志要冶金工作者注意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各冶金工厂平炉车间和轧钢车间在熟悉和掌握技术方面存在的落后现象。

斯大林同志说：很多人错误地理解了党的“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①的口号。很多人机械地去理解这个口号，认为如果有更多的机器，似乎就做到了这个口号所要求的一切。这是不正确的。技术是不能脱离使用技术的人的。离开了人，技术就是死的东西。“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这一口号指的并不是单纯的技术，而是以掌握技术的人为主的技术。只有这样来理解这个口号才是正确的。既然我们已经学会了重视技术，那就应该公开说，目前最主要的是掌握技术的人才。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如果过去片面地强调技术，强调机器，那么现在就应该强调掌握技术的人

① 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275 页。——编者注

才。这是我们关于技术的口号所要求的。应该爱护每一个有才能的、懂得技术的工作人员，应该爱护他，培养他。应该象园丁培植心爱的果树那样，关切地和细心地培养人才。要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成长，让他们看到前途，及时地提拔他们，如果一个人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就应当及时地调换别的工作，而不要等到他最后失败时才调动。关切地培养人才，评定人才，在生产中正确地配备人力，组织人力，实行能巩固决定性的生产环节并推动人们去达到更高的熟练程度的工资制，这就是我们为培养人数众多的生产技术干部大军所应该注意的事情。

斯大林同志对各工厂厂长说：你们那里并不是一切都能令人满意的。在炼铁方面，你们已经多少培养和配备了一些有经验的技术人才，但是在冶金工业的其他环节上你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钢和钢材的生产才落后于生铁的生产。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最终消灭这个缺点。请注意，除了生铁以外，我们还需要更多的钢和钢材。

译自《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竞赛》
1941年版第192—194页

二^①

斯大林同志说：

① 以下摘自苏联科学院院士、冶金学家伊·巴·巴尔金所写的《远大的目光》一文。巴尔金在这篇文章里回忆说，接见中，当他发言强调指出钢铁战线的胜利只有在斯大林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时，斯大林接着讲了这一段话。——编者注

——巴尔金同志,您说得不对。您说的工作,光靠党是不能完成的。同党一起参加这个工作的,也有象您这样的非党人士和老专家。光靠党是不能在1917年10月完成革命的。当时参加革命的党员一共才13万人。

党的功绩是什么呢?这就是党能够组织群众,能够使大家都来工作,能够作出正确的工作指示。要是你们记得过去关于生铁生产的讨论,那你们大概会知道当时曾经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生铁决不可能超出1000万吨,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生铁必须达到1700万吨。

党能够权衡轻重,适当地引导工作,使之达到一定的、当时可能达到的水平:1000万吨。为了使工业达到这个水平,当时除了机器以外,还必须培养和得到能利用这些机器进行工作的相应的干部。

你们知道,过去我国的汽车和拖拉机制造业是怎样一个状况。从前我们没有拖拉机,也没有航空工业。现在我们两者都有了。当时必须选择:或者是首先训练出使用这些机器的人才,然后才大量生产机器;或者是马上就大量生产机器,让成千上万的人在运用机器的过程中学会使用机器。第一条道路太遥远了。第二条道路比较近一些,能使我们在培养干部方面赢得时间,虽然也要求付出一定的牺牲。我们走上了第二条道路。我们没有错,因为我们走了这条道路,就在短时期内造就了大批干部、拖拉机手和飞行员。这样,我们在培养大批的干部方面就赢得了最重要的东西——时间。

同志们,培养干部是件大事情。你们是怎样培养炼铁工人、炼钢工人和轧钢工人的,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因此,我希望同志们在下边的发言中谈谈钢铁工业中的干部情况,谈谈培养熟练

工人和专家的情况。

其次，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我不是一个冶金工作者，但是，我知道，在各个国家中，钢的生产比生铁的生产多25%。而我国则恰好相反。钢落后于生铁。我希望听到同志们谈谈每个工厂和整个钢铁工业究竟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才能消灭这种不协调的现象。我知道，这种不协调的现象可以通过建造新平炉的办法来消灭。平炉我们正在建造，今后还要继续建造。但是，这种不协调的现象，大概也可以通过扩大平炉生产能力的办法来消灭，这一点，从你们关于冶金工厂工作的资料中可以看出。有些工厂工作得好，有些工作得差。原因何在呢？为什么不能够使所有的工厂都工作得好呢？是什么东西在起阻碍作用呢？我想得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译自 1935 年 11 月 7 日《真理报》

致苏联电影总局舒米亚茨基同志

值此苏联电影业光荣的十五周年纪念日之际，我特向苏联电影工作者致以敬礼，并致最美好的祝愿。

苏维埃政权所掌握的电影是一种巨大的、不可估计的力量。

电影具有从精神上影响群众的特别巨大的可能性，它帮助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劳动者，组织群众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战斗力。

苏维埃政权期望你们获得新的成就，拍摄出新的影片，它们要象影片《恰巴耶夫》那样歌颂为苏联工农政权而斗争的伟大历史事件，动员人们去完成新的任务，使人们既想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又想到其中的困难。

苏维埃政权期望你们让你们的大师勇敢地深入到电影这一“最重要”（列宁语）和最具有群众性的艺术的新领域中去。

约·斯大林

译自 1935 年 1 月 11 日《真理报》

***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二次 代表大会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 草案审查委员会的讲话(摘录)^①**

(1935年2月)

如果你们想巩固劳动组合, 如果你们想有一个包括千百万农户, 而不是几户或几百户的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 如果你们想达到这一点, 那么, 你们在现时的条件下就应当在考虑集体农庄庄员的共同利益之外, 务必考虑他们的个人利益。……

你们说给集体农庄庄员的宅旁园地不得超过十分之一公顷, 这就是一点不考虑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你们有些人认为不能给他们奶牛, 另一些人认为不能给他们母猪。总之, 你们想卡集体农庄庄员。这样做是行不通的。这是不对的。

你们是先进人物。我理解你们是很关心集体农庄制度, 很关心集体农庄经济的。但是所有的集体农庄庄员都和你们一样吗? 你

① 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35年2月11—17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新的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大会于2月14日选出了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斯大林的这篇讲话全文未见发表, 这里摘录的是苏联《真理报》1935年3月13日的社论《巩固集体农庄的关键》引用的部分。——编者注

们在集体农庄中毕竟是少数。而多数人想的不大一样。应不应当考虑到这一点呢？我认为是应当考虑的。

如果你们的劳动组合还没有极丰富的产品，如果你们不能供给集体农庄所有庄员及其家庭所需要的一切，那么，集体农庄就不能承担起既满足公共需要又满足个人需要的担子。在这种情况下，倒不如直率地说，某一部分工作是公共的，而某一部分工作是个人的。倒不如直率地、公开地、老实地承认集体农庄的农户应有自己的个人的经济，它规模不大，但是是个人。倒不如立足于既要有满足公共需要所必需的公有的、大规模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劳动组合经济，也要有满足集体农庄庄员个人需要所必需的不大的个人的经济。既然有家庭、孩子、个人的需要和个人的爱好，那就不能不加以考虑。而你们也没有权利不考虑集体农庄庄员个人日常生活的利益。否则就不可能巩固集体农庄。

把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同集体农庄的公共利益结合起来，这就是巩固集体农庄的关键所在。

译自 1935 年 3 月 13 日《真理报》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招待 “五一”阅兵参加者时的讲话**

（报 道）

斯大林同志在招待会结束时向与会者们讲话。他通过他们向工农红军各兵种的战士们和指挥员们致敬。他说到他们是“党和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因为不是党员也可以成为布尔什维克。成千上万的非党同志——勇敢而有能力和才干的同志，在全心全意地为工人阶级服务。他们之所以没有入党，许多人是因为太年轻，其他人则是因为自认为修养不够，因为他们非常看重和珍惜党员这个称号。

斯大林同志举杯，祝为劳动人民事业服务的无畏的潜水艇员们、百发百中的炮兵们、勇敢的坦克兵们、坚毅的飞行员和轰炸机飞行员们、质朴的勇敢的骑兵们、英勇的使胜利得以巩固的步兵们健康。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的政府和党除了人民的利益和人民操心的事情以外，没有别的利益和别的操心的事情。

斯大林同志高呼，为了勇敢的、有能力和才干的、英勇的布尔什维克们，党和非党的布尔什维克们的健康，干杯！

译自 1935 年 5 月 4 日《真理报》

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高等院校 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1935年5月4日)

同志们！不可否认，我们近来无论在建设方面或在管理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于是在我们这里人们就过多地谈论起领导人的功绩，领袖们的功绩来了。人们把所有一切，几乎把我们所有的成绩都归功于他们。这当然是不对的，不正确的。问题不仅仅在于领袖。但是我今天想说的，不是这一点。我想就干部问题，就我们所有的干部，其中也包括我们红军的干部问题讲几句话。

大家知道，我们从旧时代所得到的遗产，是一个技术落后的、近于赤贫的和遭到破坏的国家。它遭到四年帝国主义战争的破坏，又遭到三年国内战争的破坏。在这个国家里，居民很少识字，技术水平很低，工业好象零星的孤岛淹没在无数极小农户的汪洋大海中，——我们从旧时代继承下来的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当时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国家从中世纪和愚昧无知的轨道转到现代化工业和机械化农业的轨道上去。可见，任务是严重而困难的。当时，问题这样摆着：**或者**我们在最短期间解决这个任务并在我国把社会主义巩固起来；**或者**是我们不能解决这个任务，那时我们这个技术薄弱和文化落后的国家就会丧失自己的独立，而变成帝国主义列强的玩物。

我国当时处在技术极其缺乏的时期。没有足够的机器供应工业。没有机器供应农业。没有机器供应运输业。没有国家工业改造所绝对必需的起码的技术基础，而只有一些创立这种基础的前提。当时必须创立头等的工业，必须使这个工业在技术上不仅能够改造工业，而且能够改造农业并改造我国的铁路运输业。为此必须作出牺牲，在各方面厉行节约，节约饮食，节约教育经费，节约布匹，以便积累建立工业所必需的资金。那时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克服十分缺乏技术的困难。列宁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而我们在这一事业中也正是踏着列宁的足迹前进的。

当然，在这样巨大而困难的事业中，决不能期望获得接连不断的和迅速的成功。在这种事业中，只有经过几年以后，才会看到成就。因此必须用坚强的精神、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和顽强的耐心把自己武装起来，以便克服最初的挫折，坚定不移地向着伟大的目标前进，不许在自己的队伍里有动摇和犹豫。

大家知道，我们正是这样进行这一事业的。可是，并不是我们所有的同志都具有足够的顽强精神、耐心和坚定性。当时在我们的同志中，有些人开头遇到一些困难，就叫人退却。常言道：“既往不咎。”这固然是对的。但是，人既然有记性，在总结我们的工作时就会在无意中想起过去的事情来。我们当时确实有一些同志是害怕困难并叫党退却的。他们说：“你们的工业化、集体化、机器、钢铁工业、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汽车，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倒不如多给一些布匹，多买一些生产日用品的原料，多给人们一些美化日常生活的零星物件更好些。要在我国落后的情形下建立工业，而且是头等的工业，这是危险的幻想。”

当然，我们当时也可以把我们厉行节约获得的、花在建立我国

工业上的 30 亿外汇卢布，拿去进口原料，增加日用品的生产。这也是一种“计划”。可是，如果我们采用了这种“计划”，我们就不会有冶金业，就不会有机器制造业，就不会有拖拉机和汽车、飞机和坦克了。我们在外来敌人面前就会成为手无寸铁的人。我们就会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基础。我们就会成为国内外资产阶级的俘虏。

显然，当时必须在两个计划中间选择一个：一个是退却的计划，是要使社会主义遭受失败，而且不能不使社会主义遭受失败的计划；另一个是进攻的计划，是要使社会主义在我国获得胜利，而且你们知道，是已经使社会主义在我国获得了胜利的计划。

我们选择了进攻的计划，循着列宁的道路前进，而撇开了那些同志，因为他们只看到自己鼻子底下的一点东西，却根本不愿看见我国最近的将来，不愿看见我国社会主义的将来。

可是，这些同志并不始终只限于批评和消极抵抗。他们还以在党内举行暴动反对中央委员会来威胁我们。他们甚至曾用子弹威胁过我们中间的某些人。看来，他们指望吓倒我们，迫使我们离开列宁的道路。这些人显然忘记了，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具有特殊气概的人。他们忘记了，布尔什维克不是用困难和威胁所能吓倒的。他们忘记了，把我们锻炼成钢的是在斗争中不知道和不承认恐惧为何物的伟大的列宁，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我们的父亲。他们忘记了，敌人愈是发疯，党内的反对者愈是歇斯底里地发狂，布尔什维克就愈加奋发地进行新的斗争，愈加急速地向前迈进。

当然，我们也根本没有打算过离开列宁的道路。而且，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站稳脚跟以后，扫除路上的种种障碍，更加急速地前进

了。固然，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前进时曾经不得不狠狠地打击了这些同志中间的某些人。可是这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应当承认，对于这件事我也是出了一臂之力的。

是的，同志们，我们是充满信心地、一往直前地沿着使我国工业化和集体化的道路前进的。现在这条道路可以认为是已经走过来了。

现在大家都承认，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大家都承认，我们已经拥有强大的头等的工业，强大的机械化的农业，日益发展的和蒸蒸日上的运输业，有组织的和装备精良的红军。

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度过了十分缺乏技术的时期。

可是，度过十分缺乏技术的时期以后，我们就进入了新的时期，进入了我认为十分缺乏人才、缺乏干部和缺乏能够驾驭技术并推进技术的工作者的时期。问题在于我们有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运输业、军队，我们有技术来装备所有这一切部门，但是缺乏具有足够的必要的经验来最大限度地利用技术的人才。从前我们说：“技术决定一切。”这个口号曾经帮助我们消灭了十分缺乏技术的现象，在一切工作部门里建立了极其广泛的技术基础，使我们能够用头等技术来武装我们的人才。这是很好的。但这还远远不够。为了把技术运用起来并得到充分利用，就需要有掌握技术的人才，就需要有能够精通并十分内行地运用这种技术的干部。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是死的东西。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创造出奇迹来。如果在我们的头等工厂里，在我们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里，在我们的运输部门里，在我们的红军里，有足够数量的能够驾驭这种技术的干部，那么我们国家所

得到的效果,就会比现有的要多两三倍。正因为如此,现在应当特别注意人才,特别注意干部,特别注意掌握技术的工作者。正因为如此,“技术决定一切”这个旧口号,反映了我们十分缺乏技术的过去的时期的口号,现在应当用新口号,用“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来代替了。这是现在的主要问题。

能说我们的人都已经充分了解到和认识到这个新口号的伟大意义了吗?我看不能这样说。否则,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就不会有人时常用一种岂有此理的态度去对待人才、对待干部、对待工作者了。“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要求我们的领导人对我们的工作者,对无论在哪个部门中工作的“大”“小”工作者,采取最关切的态度,用心地培养他们,当他们需要支持时帮助他们,当他们做出初步成绩时鼓励他们,推动他们前进等等。而实际上我们却往往看到人们对工作者竟采取一种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态度和简直是岂有此理的态度。正因为如此,所以往往不去考察人才,不是先考察后任用,而是往往象对待小卒子那样把他们摆来摆去。重视机器,报告我们工厂里有多少技术设备,这一点已经学会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见有人用同样的热情来报告说,我们在某个时期内培养了多少人才,我们怎样帮助这些人才在工作中成长起来和受到锻炼。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重视人才,重视工作者,重视干部。

我回想起了我在西伯利亚流放时碰见的一件事。这是在春季涨水时发生的。当时有 30 个人到河里去捞取被波涛汹涌的大水冲下来的木料。当傍晚他们回到村里时,却少了一个同伴。当我问第 30 个人在哪里时,他们冷淡地回答道:第 30 个人“留在那里了”。我问:“怎么会留在那里呢?”他们又同样冷淡地回答道:“那

还要问什么，当然是淹死了。”当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忙着要走，说是“要给母马饮水去”。我责备他们对人还不如对牲畜那样爱惜，他们中间便有一个人在其余的人的赞同下回答道：“干吗我们要爱惜人呢？人是我们随时都可以做出来的。而母马呢……你试一试去做出一匹母马来看。”你们看，这件事也许不大重要，但是很能说明问题。我觉得，我们有些领导人对人才、对干部采取的冷淡态度以及不会重视人才，就是上述这个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发生的事情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人对人的奇怪态度的残余。

所以，同志们，如果我们想要顺利地消灭十分缺乏人才的现象，使我国得到足够数量的能够推进技术和运用技术的干部，我们首先就应当学会重视人才，重视干部，重视每一个有益于我们共同事业的工作者。毕竟应该了解：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军队中拥有大量的优秀干部，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干部，那我们就会寸步难移。

在结束我的讲话时，让我举杯祝贺我们的红军高等院校毕业生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祝你们在组织和领导我国国防事业中获得成就！

同志们！你们已经在高等学校毕业了，你们在那里受到了初步的锻炼。但是，学校还只是一个预备阶段。干部的真正锻炼，是要在实际工作中，在学校以外，在同困难作斗争中，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得到的。同志们，要记住：只有那些不害怕困难，不躲避困难，反而前去迎接困难，以便克服和消灭困难的干部，才是好的干部。真正的干部，只有在同困难作斗争中才能锻炼出来。如果

我们的军队拥有足够数量的真正受过锻炼的干部，那它就将是无敌的。

同志们，祝你们身体健康！

译自《列宁主义问题》第 11 版
第 525—530 页

在卡冈诺维奇地下铁道 通车典礼上的讲话

(1935年5月14日)

在座的同志们(斯大林同志指了指大厅和主席台)使得我要作两点更正。事情是这样的：

由于莫斯科地下铁道的胜利建成，党和政府奖给一批人以列宁勋章，奖给另一批人以红星勋章，奖给第三批人以劳动红旗勋章，奖给第四批人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奖状。

但是这里就产生了问题：对其余的人该怎么办呢？对那些工作得并不亚于受奖的人，和受奖的人同样地贡献了自己的劳动、才能和力量的同志该怎么办呢？你们中间一些人似乎感到高兴，而另一些人却感到困惑。该怎么办呢？这就是问题。

因此，我们想在全体诚挚的人们面前纠正一下党和政府的这个过错。我不爱作长篇演说，因此，请允许我宣读一下更正内容。

第一个更正：由于建设莫斯科地下铁道的工作胜利完成，特代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宣布嘉奖地下铁道建设工程局的男女突击队员、全体工程师、技师和男女工人。

今天就应当实行这个更正，现在我们宣布嘉奖地下铁道建设工程局的全体工作人员。(鼓掌)你们不要向我鼓掌，这是全体同志的决定。

第二个更正,我就直接读吧:由于共青团莫斯科组织在动员光荣的男女共青团员成功地建设莫斯科地下铁道方面建树了特殊功绩,特奖以列宁勋章。

这一个更正也应当在今天就实行,并在明天公布出来。同志们,这也许还不够,但是更好的办法我们想不出来。如果还可以做些什么,就请你们提醒一下。

你们以为怎样——这两条更正够了吗?

译自《列宁斯大林论青年》
1938年版第320—323页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招待 铁路运输工作者时的讲话^①

(报 道)

斯大林同志在雷鸣般的掌声和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中开始讲话。

他讲到铁路运输对于象我们苏维埃国家这种领土广大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他说，我们国家的土地面积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其中包括英国连同其殖民地（自治领除外）；如果没有组织良好的铁路运输把我国各大区域联结成为一个国家整体，那么我们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就是不可思议的。他说，如果没有组织良好的铁路运输把工业基地和工业中心同供给它们原料和粮食的农业州区联结和粘合成为一个经济整体，那么这样一个大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就是不可能的。英国这个国家，如果没有头等的海洋运输把它的大量领土联结成为统一的整体，是不可思议的。同样，苏联这个国家，如果没有头等的铁路运输把它的许许多多州区联结成为统一的整体，也是不可思议的。斯大林同志说，苏联铁

① 1935年7月25—29日，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受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委托，召开了铁路运输工作者会议。会议结束的次日，1935年7月30日晚，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招待会，招待会议的参加者。——编者注

路运输对国家至关重要的伟大作用就在这里。

他讲到每一个从事运输工作的人的伟大荣誉，讲到那些理解运输的意义而把自己的劳动奉献给祖国的工作人员。为了实现铁路运输的决定的无所不包的作用，首先需要各部门互相协调，并且按照严格规定的程序进行工作。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运输纪律。

斯大林同志说，铁路工作人员的职位有大有小，可是在运输业中没有不需要的人，或不重要的人。从最大的领导人到“小小的”工作人员，一直到扳道工，到给油工，到清扫工，都是伟大的，重要的，因为运输业是一条传送带，每一个工作人员、每一颗螺丝钉的工作都是重要的。斯大林同志说，铁路工作人员同志们，当你们懂得了这一点，而在运输业总机器的各个部分和所有工作人员之间建立起协调的关系时，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纪律也就有了。

斯大林同志讲到运输业的成就和运输工作中需要借助勇敢而坚决的自我批评予以揭露的缺点。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这个真理是这样简单明了，犹如泉水般的洁净和透明。他讲到列宁一向教导我们的自我批评，这就是要象革命者应当做的那样，公开地、诚恳地、彻底地进行批评，揭露我们工作中的溃疡，不害怕批评，反而欢迎批评，不粉饰缺点，倾听所有工作人员的呼声，不仅要教育工作人员，而且要向工作人员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把钥匙，有了它，我们就能揭露和消除社会主义建设的缺点，就能前进。我们取得进步的秘密就在这里。

斯大林同志接着说，运输业的成就是明显的，我们不打算把它隐藏起来。我们不需要那种虚伪的谦逊。你们的成绩不小。你们已把日装车量从 56 000 车提高到 73 000 车，这从运输业进步的角度看是不少的。但是，同志们，从国家需要的角度看，这还是不够

的。应当争取使日装车量达到 75 000—80 000 车。

请允许我举杯祝贺你们的成就，你们的成就是明显的，因此你们理应受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和同志式的称赞。请允许我举杯祝你们得到你们尚未取得但定将取得的业绩，祝你们大家，从扳道工到人民委员，尽一切必要的努力来提高已在走上坡路、但还有些摇摆的运输业，祝运输业成为工作精确、运行完好、象优等钟表机械一样准确的传送带！同志们，为你们大家，为你们的人民委员，干杯！

译自 1935 年 8 月 2 日《真理报》

致巴黎《人道报》
加香、多列士、古久里

抄送：莫斯科《真理报》

昂利·巴比塞同志不幸逝世，谨同你们一起表示哀悼。昂利·巴比塞同志是我们的朋友，法国工人阶级的朋友，法国人民可尊敬的儿子，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朋友，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倡导者。

愿他的一生，他的斗争，他的愿望和憧憬成为全世界劳动人民青年一代在争取人类摆脱资本主义奴隶制的斗争中的榜样。

约·斯大林

译自 1935 年 9 月 3 日《真理报》

致著名科学家 康·爱·齐奥尔科夫斯基同志^①

您的来信充满着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信任，请接受我的感谢。

祝您身体健康，并继续为劳动者的利益进行富有成效的工作。
握您的手。

约·斯大林

译自 1935 年 9 月 17 日《真理报》

附 录

齐奥尔科夫斯基给斯大林的信

全体劳动者最英明的领袖和朋友，斯大林同志：

我毕生的愿望就是以自己的劳动推动人类进步，哪怕是稍微推动一些也好。但是在革命以前，我的愿望不可能实现。

只有十月革命才使一个自学者的劳动得到承认；只有苏维埃政权和列

① 康·爱·齐奥尔科夫斯基是苏联著名科学家，宇宙航行学的先驱，1935年9月19日病逝。他在弥留之际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本篇是斯大林收到信后给他的电报。——编者注

宁——斯大林的党才给了我实际的帮助。我感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护,这给了我这个病人以继续工作的力量。可是,现在疾病不允许我来完成我已经开始的工作。

现在我把自已有关航空、火箭航行以及星际交通方面的全部劳动成果交给人类文化进步的真正领导者——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我相信,它们一定会胜利地完成这些劳动成果。

全心全意忠实于您。

致以最后的真挚的敬礼。

永远属于您的

康·齐奥尔科夫斯基

1935年9月13日

译自1935年9月17日《真理报》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接见集体农庄 种植甜菜的女突击队员时的讲话

（1935年11月10日）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新生活中的一个片断，这个新生活我们叫作集体农庄的生活，社会主义的生活。我们听到了一些纯朴的劳动者的朴素的发言，她们讲述了她们为了在竞赛中获得成就是怎样进行斗争和克服困难的。我们听了一些不平常的妇女的讲话，我要说，这些妇女是劳动英雄，因为只有劳动英雄才能获得她们所取得的那种成就。过去我国没有这样的妇女。我已经56岁，阅历不少，也见过很多男女劳动者，但是这样的妇女我没有见过。这是一批完全新的人。只有自由的劳动，只有集体农庄的劳动，才能在农村中产生这样的女劳动英雄。

在旧时代里，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妇女。

不妨想一下，在从前，在旧时代里，妇女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当一个妇女还在做姑娘的时候，她就被看作劳动者中所谓最下等的人。她为父亲一刻不停地工作，但父亲骂她时还要说：“你是我养活的。”在她出嫁以后，又得为丈夫工作，丈夫要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而丈夫在骂她时也是这样说：“你是我养活的。”农村妇女曾经是劳动者中最下等的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在农妇中是不可能出现劳动英雄的。当时，对妇女来说，劳动是一件可诅咒的

事情,她们要千方百计地逃避它。

只有集体农庄的生活才能使劳动成为光荣的事情,只有这种生活才能在农村中产生出真正的女英雄。只有集体农庄的生活才能消灭不平等的现象,才能使妇女翻身。这一点你们自己都是很清楚的。集体农庄采用了劳动日制。劳动日制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在劳动日面前人人平等,男人也好,妇女也好。谁做的劳动日多,谁挣的也多。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父亲或是丈夫,都不能责骂妇女,说她是靠他养活的。现在,妇女只要参加劳动就有劳动日,她自己是主人。我记得,我在集体农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和几个妇女同志谈了一次话。有一个来自北方边疆区的妇女同志说:

“大约两年以前,任何一个求婚的人都不愿意瞧一瞧我的院子。我是一个没有嫁妆的姑娘。现在我有500个劳动日。现在怎样呢?求婚的人多得不得了,他们都说想和我结婚。而我呢,还得考虑考虑,我要自己挑选一个未婚夫。”

集体农庄的劳动日制使妇女获得了解放并使她们成为独立的人。现在,妇女在做姑娘时不是为父亲工作,出嫁以后也不是为丈夫工作,她首先是为自己工作。这就是农妇的解放,这就是集体农庄制度,这种制度使劳动妇女和所有劳动的男子一律平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出现这样一些出色的妇女。因此,我把今天的会见不简单地看成是先进人物和政府成员们的普通会见,而看作是一个检阅解放了的妇女劳动的成就和能力的节日。我认为政府应当表扬到这里来向政府报告她们的成就的女劳动英雄。

怎样庆祝今天呢?我和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

奥尔忠尼启则、加里宁、米高扬等同志在这里商议了一下，认为应当请求政府授予我们的女劳动英雄以列宁勋章，授予小组长以列宁勋章，而授予一般突击队员以劳动红旗勋章。当然，应该特别表扬玛丽亚·杰姆钦科同志。

伏罗希洛夫：她真行。

莫洛托夫：她是主要人物。

斯大林：我认为对这整个事情的倡导人玛丽亚·杰姆钦科，除了授予她以列宁勋章外，还应当由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嘉奖，并授予她的小组的女庄员们以劳动红旗勋章。

喊声：她们都在这里，只有一个没有来。她病了。

斯大林：生病的也要奖励。我们想这样来庆祝今天这个日子。

译自《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竞赛》
1941年版第201—203页

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 第一次会议^①上的讲话

(1935年11月17日)

1.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

同志们！关于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这里，在这次会议上，已经说得很多，而且说得很好，因此我实在没有多少话可说了。可是，既然你们把我叫到讲台上来了，我总得说几句话。

不能把斯达汉诺夫运动看作是一个普通的男女工人运动。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定会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册最光荣的篇章之一的男女工人运动。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何在呢？

首先就在于它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高涨，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的更高的阶段。为什么是新的阶段，为什么是更高的阶段呢？因为斯达汉诺夫运动这一社会主义竞赛形式，比社会主义竞赛的旧阶段优越。在过去，在三年以前，在社会主义竞赛第一个阶段的时期内，社会主义竞赛并不一定要和新技术相联系。而且

① 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于1935年11月14—17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参加会议的有3000名工业和运输业方面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
——编者注

在当时,我们本来也就几乎没有什么新技术。相反,社会主义竞赛的现阶段,即斯达汉诺夫运动,却一定要和新技术相联系。没有新的更高的技术,就不会有斯达汉诺夫运动。在座的这些人,象斯达汉诺夫、布瑟金、斯梅塔宁、克里沃诺斯、普罗宁、两位维诺格拉多娃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是新的人才,都是完全掌握了本行的技术、驾驭并推动着这种技术前进的男女工人。三年以前,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才,或者是几乎没有这样的人才。这都是新的特殊的人才。

其次,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以打破当前的技术定额,打破现有的设计能力,打破现行的生产计划和平衡表为目的的男女工人运动。所以要打破这些定额,是因为它们对现在来说,对我们的新人才来说,已经是陈旧的了。这个运动打破了旧的技术观点,打破了旧的技术定额、旧的设计能力和旧的生产计划,而要求规定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设计能力和生产计划。它负有在我国工业中进行一场革命的使命。正因为如此,所以斯达汉诺夫运动其实是一次深刻的革命运动。

这里有人已经说过,斯达汉诺夫运动是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的表现,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达到、而资本主义不能达到的那种高度劳动生产率的典范。这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资本主义打破和战胜了封建制度呢?因为它创造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它使社会有可能得到比在封建制度下多得多的产品。因为它使社会更加富足了。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应当而且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呢?因为它能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创造出更高的劳动典范,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为它能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给予社会更多的产品,使社会更加富足起来。

有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可以在贫苦生活的基础上用稍许拉平各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方法巩固起来。这是不对的。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念。其实,社会主义只有在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只有在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只有在产品和各种消费品丰裕的基础上,只有在社会全体成员都过着富裕而有文化的的生活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胜利。但是,为了使社会主义达到这个目的,并把我国苏联社会变成最富裕的社会,就必须使我国有超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否则,就绝对不会有丰裕的产品和各种消费品。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就在于:这一运动打破了不高的旧的技术定额,而且往往超过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我国在实际上有可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有可能把我国变成最富裕的国家。

但是,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还不止这一点。它的意义还在于它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

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人按他的能力进行工作,但不是按他的需要、而是按他为社会所做的工作取得消费品。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还不很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依然存在,劳动生产率还没有达到能保证消费品丰裕的高度,所以社会只得按社会各个成员的需要,而按他们为社会所做的工作来分配消费品。

共产主义是更高的发展阶段。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按他的能力进行工作,但不是按他所做的工作、而是按他作为一个有高度文化的人的需要取得消费品。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足以打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基础的高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而劳

动生产率达到了可以保证消费品十分丰裕的高度，所以社会就有可能按各个成员的需要来分配这些消费品了。

有些人以为，可以在工程师和技师即脑力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降低到中等熟练工人水平的基础上，用稍许拉平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文化技术水平的方法来做到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这是完全不对的。只有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才这样来想象共产主义。其实，只有在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工程技术人员水平的基础上，才能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如果以为没有提高到这种水平的可能，那就可笑了。这在苏维埃制度下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因为在这里，全国的生产力摆脱了资本主义的束缚，劳动摆脱了剥削制度的压迫，工人阶级掌握着政权，工人阶级的青年一代有受到完备的技术教育的一切机会。毫无疑问，只有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提到这样的高度，才能打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基础；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为了开始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所必需的高度劳动生产率和丰裕的消费品。

因而，从这方面看来，斯达汉诺夫运动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正是包含着我国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平提到这样的高度的萌芽，虽然还是幼弱的萌芽，但毕竟是萌芽。

真的，请你们仔细看看这些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同志吧。这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大都是年轻的或中年的男女工人，是有文化素养、有技术素养的人才，他们作出了工作严格认真的榜样，善于在工作中珍惜时间的因素，学会了不仅用分而且用秒来计算时间。在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学过所谓基本技术知识，而且还在继续充实自己的技术知识。他们没有某些工程师、技师和经济工作人员

的那种保守主义和思想僵化；他们勇敢地前进，打破旧的技术定额，创造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他们对我国工业领导者制定的设计能力和经济计划提出修改，他们往往补充和修正工程师和技师的意见，他们时常教导工程师和技师，并推动工程师和技师前进，因为他们是完全掌握了本行技术并善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技术的人才。今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还不很多，可是明天他们会增加10倍，——这一点有谁能怀疑呢？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是我国工业的革新家，斯达汉诺夫运动代表着我国工业的未来，它包含着工人阶级未来文化技术高涨的种子，它为我们开辟了达到很高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唯一途径，即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所必需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唯一途径，——这一切难道不是都很明白吗？

同志们，这就是斯达汉诺夫运动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意义。

当斯达汉诺夫和布瑟金着手打破旧的技术定额时，他们是不是想到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这种伟大意义呢？当然没有。他们当时所关心的，是力求使企业消除完不成计划的现象并超额完成经济计划。但他们在力求达到这一目的时，必须打破旧的技术定额，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程度。然而，如果以为这个情况会多多少少降低斯达汉诺夫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那就可笑了。

关于1905年第一次在我国组织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那些工人，也可以这样说。他们当然没有想到工人代表苏维埃会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他们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只是为了防御沙皇政府的进攻，防御资产阶级的进攻。但是，这个情况丝毫不与

下述这件毫无疑义的事实相矛盾，即列宁格勒工人和莫斯科工人在 1905 年开始的争取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运动，归根到底导致了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资本主义的毁灭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2.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根源

现在我们站在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摇篮边，站在这个运动的泉源旁。

应当指出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某些特点。

首先令人注意的事实，就是这个运动是自行开始的，几乎是自发地开始的，由下面开始的，并没有受到我们各企业行政方面的任何推动。不仅如此，这个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违反我们各企业行政的意志的情况下，甚至是在和他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和开展起来的。莫洛托夫同志已经向你们说过，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锯木工人穆辛斯基同志不知受了多少罪，他背着经济组织，背着检验员，暗中作出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斯达汉诺夫本人的遭遇也并不见得好些，因为在他前进时不仅须要防御某些行政人员，而且须要防御某些因他“标新立异”而讥笑和诽谤他的工人。至于布瑟金，那么大家知道，他由于自己的“标新立异”，几乎失去了工厂里的工作，幸亏车间主任索科林斯基同志出来干涉，这才把他留在厂里了。

由此可见，如果说我们各企业行政上对斯达汉诺夫运动起过什么作用，那么这种作用不是为了帮助它，而是为了阻碍它。所以，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从下面产生和开展起来的运动。正因为它是自行产生的，正因为它是来自下面的，所以它是现代最富有生命

力的和不可遏止的运动。

其次，还应当讲到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另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在于斯达汉诺夫运动不是逐渐地，而是象飓风那样空前迅速地传播到我们苏联全国各地的。事情是怎样开始的呢？斯达汉诺夫把采煤的技术定额提高了四五倍，甚至更多。布瑟金和斯梅塔宁也做到了这一点，——一个是在机器制造业方面，而另一个是在制鞋工业方面。报纸报道了这些事实。于是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火焰就立刻燃遍了全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传播得这样快呢？也许是因为斯达汉诺夫和布瑟金是两个大组织家，在苏联各州各区有很多关系，而且亲自组织了这件事情吧？不是，当然不是！也许是因为斯达汉诺夫和布瑟金居心要成为我国伟人，而亲自把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火星散布到全国各地去的吧？同样不是。你们在这里已经看见了斯达汉诺夫和布瑟金。他们在会上发了言。他们是谦虚朴实的人，没有任何想做全苏伟人的野心。我甚至觉得，他们看到这个运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地在我国发展成这样的规模，还有些困惑。虽然这样，斯达汉诺夫和布瑟金两人点燃的火星，也已经足以使这件事情发展成了熊熊火焰，那就是说，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一件完全成熟了的事情。只有完全成熟的、有一触即发之势的运动，才能这样快地传播，才会象雪球那样愈滚愈大。

为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完全成熟了的事情呢？这个运动传播得这样迅速的原因究竟何在呢？斯达汉诺夫运动有哪些根源呢？

原因至少有四个。

(1)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基础，首先就是工人物质生活状况的

根本改善。生活得更好了，同志们。生活得更愉快了。生活既然愉快，工作也就顺利了。于是就产生了高的生产定额。于是就产生了男女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根源首先就在这里。如果我国有危机，如果我国有使工人阶级遭受苦难的失业，如果我国人民生活得不好，不象样，不愉快，那么我国是决不会有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在世界上，只有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才不仅向人民显示了自己的政治成果，而且显示了自己的物质成果。在过去的一切工人革命中，我们知道，只有一次革命勉强取得过政权。这就是巴黎公社。但巴黎公社没有存在多久。固然，它也企图打破资本主义的枷锁，但是没有来得及打破，更没有来得及向人民显示革命的美好物质成果。只有我国革命才不仅打破了资本主义的枷锁，给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人民创造了富裕生活的物质条件。我国革命所以有力量而且不可战胜，原因就在这里。赶走资本家，赶走地主，赶走沙皇的爪牙，夺得政权，取得自由，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是很好的。但是，单靠一个自由，可惜还远远不够。如果粮食不够，油类不够，布匹不够，住宅不好，那么单靠一个自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同志们，单靠一个自由是很难生活的。为了能生活得好，生活得愉快，除了政治自由的福利以外，还必须要有物质福利。我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不仅给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了人民物质福利，给了人民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生活得愉快了，而斯达汉诺夫运动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

（2）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第二个根源，就是我国已经没有剥削现象了。在我国，人们不是替剥削者做工，人们做工不是为了让不劳而获者发财致富，而是为自己，为自己的阶级，为自己的由工人

阶级优秀分子掌握政权的苏联社会。正因为如此，劳动在我国是有社会意义的，它是光荣和荣耀的事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性质是私人的、个人的。你做得多些，你就多赚些钱，自顾自地生活吧。谁也不知道你，也不愿意知道你。你替资本家做工吗，你是替他们赚钱吗？又怎能不是这样呢？人家雇你就是要你去替剥削者赚钱。你不愿意这样干，那就请你滚到失业工人队伍里去，随你的便挨饿受冻去吧，而我们随时都能雇到别的更驯服的工人。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劳动是不受重视的。在这种条件下，当然不会产生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可是，在苏维埃制度的条件下，那就不同了。在这里，劳动者是受人尊敬的。在这里，他不是替剥削者做工，而是为自己做工，为自己的阶级做工，为社会做工。在这里，劳动者不会觉得自己是无人过问的孤苦伶仃的人。恰巧相反，在我们这里，劳动者觉得他是自己国家中的自由公民，是一种社会活动家。如果他好好做工，尽力为社会做出贡献，那他也就是一位劳动英雄，就会十分光荣。显然，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产生斯达汉诺夫运动。

(3)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第三个根源应当认为是在我国有了新技术。斯达汉诺夫运动与新技术有密切的联系。如果我国没有新技术，没有新工厂，没有新设备，我国就不会产生斯达汉诺夫运动。如果没有新技术，那么至多只能把技术定额提高一倍的样子。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把技术定额提高了四五倍，那是因为他们完全依靠了新技术。由此可见，我国的工业化，我国工厂的改造，我国有了新技术和新设备，是斯达汉诺夫运动产生的原因之一。

(4)但是，单靠新技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尽管有头等的技术，头等的工厂，如果没有能够驾驭这种技术的人才，那么这些技

术就不过是技术而已。为了使新技术能够产生效果，一定还要有能够操纵技术和推进技术的人才，有这样的男女工人干部。斯达汉诺夫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表明，在我国男女工人中已经产生了这样的干部。大约两年以前，党说过：我们虽然建成了新工厂，给了我们各企业新设备，但我们只做了一半事情。党在当时说过：除了有建设新工厂的热情以外，还要有学会运用这些新工厂的热情，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进行到底。显然，这两年来，学习了这种新技术，产生了新干部。现在很清楚，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干部。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干部，没有这样的新人才，那我们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所以，男女工人中那些学会了运用新技术的新人才，就是形成和推进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力量。

这些就是产生了和推进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条件。

3. 新的人才和新的技术定额

我已经说过，斯达汉诺夫运动不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是象大水决堤一样以突然爆发的方式发展起来的。显然，这个运动曾经必须克服某些障碍。有人妨碍过它，有人压制过它，然而，在它把力量积蓄起来以后，它就冲破这些障碍而传遍全国了。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究竟是谁妨碍过它呢？

妨碍它的，是旧技术定额以及站在这些定额背后的那些人。几年以前，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根据我国男女工人当时的技术落后状况规定了某种技术定额。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几年了。在这几年中，人才成长起来了，受到了技术训练。而技术定额却仍然没有改变。当然，这些定额现在对于我国的新人才来

说是已经陈旧的了。现在大家都在责骂这些现行的技术定额。但是，这些定额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且这里问题根本不在于当时把这些技术定额规定得太低，而首先在于现在，当这些技术定额已经陈旧的时候，有人企图把它们当作现代的定额保留下来。他们死抓住我国男女工人的技术落后不放，只考虑这种落后，一切都从落后出发，最后，竟到了欣赏落后的地步。但是，既然这种落后已经成为过去，那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应当崇拜我们的落后，把它奉为圣像，奉为偶像吗？既然男女工人成长起来了，受到了技术训练，那该怎么办呢？既然旧技术定额已经不再符合实际情况，而我国男女工人已在事实上超过它们5倍、10倍，那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发过誓说一定要忠于我们的落后吗？同志们，我们似乎没有这样做过吧？难道我们是以我国男女工人的永远落后为出发点吗？我们好象没有以此为出发点吧？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打破我们某些工程师和技师的保守主义，打破旧传统和旧定额，给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以广阔的活动场所吗？

有些人在谈论科学。他们说：科学上的规定，技术指南和技术规则的规定，是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对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的要求矛盾的。但是，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哪一种科学呢？科学上的规定向来都是由实践，由经验来检验的。如果科学和实践、和经验断绝了关系，那它还算是什麼科学呢？如果科学就是象我们某些保守主义同志所形容的那样，那它对于人类早就没有作用了。科学所以叫作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时的旧事物，很仔细地倾听经验和实践的呼声。否则，我们就根本不会有科学，譬如说，不会有天文学，而直到现在还会信奉陈腐不堪的托勒密体

系了；那我们就不会有生物学，而直到现在还会迷信上帝造人的神话了；那我们就不会有化学，而直到现在还会相信炼金术士的预言了。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如果我们那些远远落在斯达汉诺夫运动后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能够不再抱住旧的技术定额不放，认真地、用科学的精神、用新的斯达汉诺夫的精神来改造自己的工作，那就好了。

有人会对我们说：好吧，那么对整个技术定额怎么办呢？技术定额究竟是工业需要的呢，还是完全不要任何技术定额也可以过得去呢？

有些人说：我们再也不需要什么技术定额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而且是很愚蠢的。没有技术定额，就无法进行计划经济。除此以外，所以需要技术定额，是为了促使落后群众赶上先进分子。技术定额是一种巨大的调节力量，它能在生产中把广泛的工人群众组织在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周围。所以，我们需要有技术定额，但不是现行的定额，而是较高的定额。

另外有些人说：技术定额是需要的，可是现在就应该把它提高到斯达汉诺夫们、布瑟金们、维诺格拉多娃们以及其他人所达到的高度。这也是不对的。这种定额在目前这个时候是不现实的，因为那些比斯达汉诺夫和布瑟金等人的技术素养差些的男女工人，就会完不成这种定额。我们现在需要的技术定额，应当是一种介乎现行技术定额和斯达汉诺夫和布瑟金等人所达到的定额之间的定额。例如就拿玛丽亚·杰姆钦科来说吧。大家知道，她是著名的甜菜 500 公担丰产模范。她达到了每公顷 500 公担或 500 公担以上甜菜的产量。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成绩当作譬如说乌克兰全部

甜菜种植业的单位面积产量定额呢？不可以。现在还谈不到这一点。玛丽亚·杰姆钦科每公顷收获了 500 公担或 500 公担以上的甜菜，而今年每公顷甜菜的平均产量，例如在乌克兰，却只有 130—132 公担。可见，这里的差别是不小的。是不是可以把甜菜的单位面积产量定额规定为每公顷 400 公担或 300 公担呢？所有的内行人都说，暂时还不能这样。显然，1936 年全乌克兰的单位面积产量定额，必须规定为每公顷 200—250 公担。而这个定额也是不低的，因为完成这个定额，就能使我们获得比 1935 年多一倍的糖。工业也是如此。斯达汉诺夫大概已超过现行技术定额 10 倍，甚至 10 倍以上。如果把他所达到的这种成绩宣布为全体风镐采煤工人的新技术定额，那就不合理了。很明显，我们必须规定一个介于现行技术定额和斯达汉诺夫同志所达到的定额之间的定额。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就是现行技术定额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了，这些定额已经落后而变成阻碍我国工业的东西了，所以，为了不致阻碍我国工业，必须用新的较高的技术定额来代替它们。既然有了新的人才，到了新的时期，也就应当有新的技术定额。

4. 最近的任务

为了更好地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我们最近的任务是什么呢？

为了突出重点，我们把它归结为两个最近的任务。

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帮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继续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使它扩大和深入到苏联各州各区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要约束经济工作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中所有墨守成规、

不愿前进、一味阻碍斯达汉诺夫运动开展的分子。为了把斯达汉诺夫运动全力推广到我国各地,单靠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本身,当然是不够的。一定要我们的党组织也参与这件事,帮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把运动进行到底。顿涅茨克州党组织在这一方面显然表现了很大的主动性。莫斯科州党组织和列宁格勒州党组织在这一方面也做得很好。其他各州的情形怎样呢?其他各州大概还正在“动起来”。例如,关于乌拉尔就没有听到或者很少听到有什么动静,虽然大家都知道乌拉尔是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心。在西伯利亚西部和库兹巴斯也是如此,那里的人大概也还没来得及“动起来”呢。然而,不容置疑,我们的党组织一定会担负起这件工作,帮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克服各种困难。至于事情的另一方面,即约束经济工作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中间顽固的保守分子的问题,那就比较复杂一些了。首先必须进行说服,用同志的态度来耐心说服工业方面的这些保守分子,使他们相信斯达汉诺夫运动的进步性和用斯达汉诺夫精神改造工作的必要性。如果说服不了,那就只得采取更坚决的措施。例如拿交通人民委员部来说吧。不久以前,在这个人民委员部的中央机关里,有一些教授、工程师以及其他专家,其中也有共产党员,硬说每小时 13—14 公里的火车旅行速度已经到了极限,如果不想违反“运营科学”,就不能超过这个极限。这是颇有威信的一部分人,他们在口头上和刊物上鼓吹自己的观点,并向交通人民委员部有关机关发出种种指示,而且他们本来就是铁路运营人员中的“权威”。我们虽然不是内行,但是根据铁路事业方面许多实际工作人员的建议,也奉劝过这些有威信的教授说:13—14 公里的速度,决不能当作极限,在工作组织得当时,是可以超过这个限度的。但他们不仅没有倾听经验和实践的呼声,改变

态度,反而拚命反对铁路事业方面的先进分子,加紧宣传他们的保守主义观点。当然,我们只好把这些受人尊敬的人物轻轻打击一下,并客客气气地请他们离开交通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结果怎样呢?我们现在的火车旅行速度已经是每小时 18—19 公里了。同志们,我认为,在我们国民经济其他部门里,如有绝对必要,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当然只有在顽固的保守分子不停止妨碍和阻挠斯达汉诺夫运动的行为时才采取这种办法。

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帮助另外一种经济工作人员、工程师和技师改造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能领导斯达汉诺夫运动,这些人并不想阻碍斯达汉诺夫运动,他们是同情这个运动的,但他们还不会改造他们的工作,还不会领导这个运动。同志们,我应当说,这样的经济工作人员、工程师和技师在我国是不少的。而只要我们帮助这些同志,这些同志在我国是一定会更加多起来的。

我认为,如果我们切实执行这些任务,那么斯达汉诺夫运动就会非常猛烈地开展起来,就会普及到我国各州各区去,而向我们显示出新成就的奇迹来。

5. 简单的几句话

关于这次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意义,我还要说几句话。列宁教导说:只有不仅善于教导工农,而且善于向工农学习的领导者,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式的领导者。在布尔什维克中间有些人听不惯列宁的这些话。但是,历史表明,列宁在这方面也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的确,千百万劳动者,工人和农民,是在劳动,在生活,在斗争。他们并不是白白地生活,他们在生活和斗争时,积累了很丰

富的实践经验，——这一点有谁能怀疑呢？忽视这种经验的领导者，决不能算是真正的领导者，——这一点难道可以怀疑吗？所以，我们这些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不仅应当教导工人，而且应当向工人学习。我决不否认，你们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在这里，在会上，向我们政府领导人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我们政府领导人，也向你们，向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向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学到了许多东西。因此，同志们，谢谢你们的指教，非常感谢！

最后，关于应当如何纪念这次会议的问题，我还有两句话要说。我们主席团这里已经商量过了，决定必须给这次政府领导者和斯达汉诺夫运动领导者的会议留下某种纪念。最后我们决定，呈请授予你们中间 100—120 人以最高的奖赏。

喊声：对。

斯大林：同志们，既然你们赞成，那我们就这样办吧。

译自《列宁主义问题》第 11 版
第 531—544 页

在先进的男女联合收割机手 会议上的讲话

(1935 年 12 月 1 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首先祝贺你们在收割战线上取得的成绩。你们的成績是不小的。我们全国联合收割机的收割量在一年中平均增加了一倍，这个成绩不小。尤其是在我国有技术素养的人才还很少的条件下，这个成绩就更为重要了。我国历来就缺乏有技术素养的干部，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培养技术干部，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既然我们在较短的时期内就把昨天的农民子女培养成了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定额的优秀的男女联合收割机手，那就是说，我们培养技术干部的事业正在一日千里地前进。是的，同志们，你们的成績是有重大意义的，因而你们完全应该受到党和政府领导同志的祝贺。

现在让我来谈本题。

我们这里常有人说，我们已经解决了谷物问题。如果指的是我们现在这个时期，这当然是对的。今年我们收获了 55 亿普特以上的谷物。这些谷物足够充分供应居民食用和留足为应付一切意外情况所必需的储备。这在今天来说，当然并不算坏。但是我们不能只顾今天。我们还应当为明天，为最近的将来着想。如果从明天着眼，那么，已经得到的成就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最近的

将来,比方说,再过三四年,我们需要多少谷物呢?我们需要不少于70—80亿普特的谷物。同志们,情况就是这样。可见,我们现在就应该采取措施,使我们的粮食产量逐年增加,使我们在这个期限以内,做好充分的准备,去完成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过去,在革命以前,我国年产谷物约40—50亿普特。这些粮食够不够是另外一个问题。总之,大家都以为是够的,因为每年都有约4—5亿普特的谷物往国外输出。过去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在我们苏维埃的条件下情况就不同了。我已经说过,我们现在就应该做好准备,以便在最近的将来,在三四年以后,就把粮食的年产量提高到70—80亿普特。可见,这个差额是不小的。一个是40—50亿普特,一个是70—80亿普特。

这个差额从哪里来的呢?我国对粮食的需求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增长呢?

这是因为我国已经不是过去,革命前的那个国家了。

首先,因为最近几年来我们的工业和城市比过去至少扩大了一倍。现在我们的城市,城市居民,工业和在工业中做工的工人比过去至少多了一倍。这说明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从农村中抽出了数百万劳动者到城市去当工人和职员,现在他们和其他工人一道推进我国工业。这就是说,过去在农村中生产粮食的数百万劳动者,现在自己不仅不生产粮食,反而需要从农村给他们运来粮食。我国的城市还要发展,对粮食的需求也还要增加。

这就是对粮食的需求增长的第一个原因。

其次,过去我们的经济作物比现在少。现在我们生产的棉花就比过去多一倍。至于亚麻、甜菜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比过去要多得多。由此产生什么结果呢?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从事经济作物

生产的人不能充分地从事粮食生产。可见，必须为生产经济作物的人储存大量谷物，这样才可能使棉花、亚麻、甜菜、向日葵等经济作物的生产日益扩大。如果我们想推进我国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就必须日益扩大经济作物的生产。

这就是对粮食的需求增长的第二个原因。

其次，我已经说过，过去我国年产 40—50 亿普特谷物。当时沙皇的大臣常说：“自己吃不饱，但粮食还得要输出。”吃不饱的人是些什么人呢？当然不是沙皇的大臣。吃不饱的人是 2 000—3 000 万农村贫民，他们真正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这样，沙皇的大臣才有可能把粮食往国外输出。过去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完全不同了。苏联政府是不会让居民挨饿的。我们这里消灭贫穷、失业和饥饿，已有两三年了，我们已经稳步地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你们会问：2 000—3 000 万挨饿的贫苦农民到哪里去了呢？他们进集体农庄去了，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正在胜利地建设自己的富裕生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现在需要有比过去多得多的粮食来供应劳动农民食用，因为昨天的贫农，今天已是集体农庄里安居乐业的集体农庄庄员了，他们应该要有足够的粮食来建设自己的富裕生活。你们知道，他们现在已有足够的粮食，而将来还会更多。

我国对粮食的需求大大增长的第三个原因就是这样。

其次，在我国，现在大家都说：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大大改善了，生活得更好、更愉快了。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样一来，人口的增加就比过去快得多了。死亡率减低，出生率增大，因而净增数字就大得多。当然这是好现象，我们欢迎它。现在我们每年净增人口约 300 万。这就是说每年我们要增加整整一个芬兰。而这

样一来,要养活的人就愈来愈多了。

这就是对粮食的需求增长的另一个原因。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谈到了人和人对粮食的需求的增长。但是人的食品不仅限于粮食,他们还需要肉类、油脂。城市的发展,经济作物的增加,人口的普遍增加和富裕的生活,所有这一切都使对肉类和油脂的需求增长起来。因此必须有组织得很好的畜牧业,喂养大量的大小牲畜,这样才有可能满足居民对肉类食品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一切都很明白。但是,如果没有饲养牲畜的大量谷物储存,要发展畜牧业是不能想象的。只有不断增长和不断发展的谷物业才能为畜牧业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这就是我国对谷物的需求大大增长的又一个原因。

同志们,这些就是使我国面貌发生根本改变的原因,就是我们提出在最近的将来把谷物年产量提高到70—80亿普特的迫切任务的原因。

我们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呢?

是的,我们能够完成,这是无可怀疑的。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有些什么要求呢?

首先,要求我们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不是小经济而是大经济。为什么一定要大经济呢?因为只有大经济才能运用现代化技术,只有大经济才能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农业技术知识,只有大经济才能得当地使用肥料。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个体小经济是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大经济是通过一小群土地占有者发财致富和多数农民破产而形成的。在那里,破产农民的土地通常都转到富裕的土地占有者手里,而农民自己为了不致饿死,就去给这些土地占有者当奴仆。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道路,是造成破产

的道路。我们不能走这条道路。因此我们走上了在农业中建立大经济的另外一条道路。我们走上了把小农户联合成大规模的集体经济的道路，这样就可以用集体劳动来耕地并利用大经济的一切有利条件和可能性。这就是集体农庄的道路。现在我们这里大经济的集体农庄形式是不是我国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呢？是的。现在我们的集体农庄大约联合了全体农民的90%。可见，农业中的大经济，即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形式集体农庄经济，在我们这里已经形成了。

第二，要求集体农庄即我国的大经济要有足够的好地。我国的集体农庄有没有这样的土地呢？是有的。你们知道，沙皇、地主和富农的全部土地已经交给集体农庄了。你们知道，这些土地已经永远归集体农庄使用了。可见，集体农庄有足够的好地来大力发展谷物生产。

第三，集体农庄要有充分的技术装备，拖拉机、农业机器、联合收割机。你们自己都很清楚，单靠手工劳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可见，要有丰富的技术装备，集体农庄才能发展谷物生产。集体农庄有没有这样的技术装备呢？是有的。而且这种技术装备还会愈来愈多。

最后，集体农庄要有会应用技术、掌握技术和精通技术的人才、干部。集体农庄有没有这样的人才、这样的干部呢？是有的。当然，还不多，但是毕竟有了。参加这一次会议的，是优秀的男女联合收割机手，他们只是集体农庄所拥有的男女联合收割机手大军的一小部分，这就证明，这样的干部在集体农庄里已经产生了。当然，象他们这样的干部数目还不多，同志们，我们的主要问题就在这里。但是无可怀疑，我们这些干部数目的增长将不是以年月

计而是以日时计的。

由此可见,我们要在最近的将来使谷物年产量达到 70—80 亿普特所必需的一切条件都已具备了。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上面所谈的迫切任务是绝对可以完成的。

现在,主要的是要抓干部问题,要训练干部,帮助技术落后的人掌握技术,不断地培养能够掌握技术并推动技术向前发展的人才。同志们,目前主要的一点就在这里。

对于联合收割机和联合收割机手应当特别注意。你们知道,谷物业中最重要的工作是收割。收割工作是有季节性的,它不容许拖延。及时收割就是成功,收割晚了就是失败。联合收割机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帮助我们及时收割庄稼。同志们,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但是,联合收割机的作用还不限于这一点。它的作用还在于它能使我们避免巨大的损失。你们知道,用摇臂收割机收割会使谷物遭受巨大的损失。先割下来,再捆起来,再垛起来,然后才把庄稼运到脱粒机场地,——这一切过程都有损失。谁都承认,用这种方法收割,我们损失的庄稼约为 20—25%。联合收割机的巨大作用就在于它能把这些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内行的人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用摇臂收割机收割,比用联合收割机收割每公顷要少收 10 普特。拿 1 亿公顷谷物播种面积来说(大家知道,我们的实际播种面积要多得多),用摇臂收割机收割要损失 10 亿普特的谷物。如果我们在这 1 亿公顷的面积上用联合收割机收割,而联合收割机工作得不坏,那就会多收整整 10 亿普特谷物。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数目是不小的。

这就是联合收割机和在联合收割机上工作的人的重大作用。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农业方面采用联合收割机,培养大批男

女联合收割机手这种干部,是首要的任务。

正因为如此,我在结束讲话时想提出一个希望,希望我们的男女联合收割机手的人数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希望他们学习联合收割机的技术,并把它教给自己的同志,最后,希望他们成为我国农业方面的真正胜利者。

同志们!还有两句话。我们主席团经过商谈,认为应当呈请授予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以最高的奖赏——勋章,以表扬他们出色的工作。同志们,我们打算在最近几天内就办理这件事情。

译自《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竞赛》
1941年版第219—225页

在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先进的男女集体农庄庄员 会议上的讲话

(1935年12月4日)

同志们！这次会议的主席团委托我向你们宣布两件事情：

第一，主席团准备呈请授予这次会议的全体参加者以最高奖赏——勋章，表扬他们出色的工作。

第二，政府决定赠给每个有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集体农庄一辆载重汽车，并且赠给这次会议的每个参加者一台留声机、一些唱片和一只表：给男同志怀表，给女同志手表。

大家都对我说，我应当讲几句话。

还要说什么呢？什么都说过了。

显然，你们那里的棉花生产一定会顺利进行，这一点从我们这次会议的全部过程中就可以看出来了。你们那里，集体农庄正在日益发展，人们都有工作的愿望，机器我们会供给的，肥料你们也能得到，各种必要的帮助我们都会给的，这一点，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同志已经向你们说过了。因此，你们那里的棉花生产一定会顺利进行，生活一定会日益丰裕。

但是，同志们，有一件东西，却比棉花更加珍贵，这就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这次会议，你们的发言和你们的工作，都说明我们伟大的国家中各族人民的友谊正在日益巩固。同志们，这是十分

重要和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事情。在过去,沙皇、资本家和地主掌握我国政权。当时,政府的政策是使俄罗斯民族一个民族成为统治的民族,而所有其他民族成为被统治、被压迫的民族。这是野蛮的弱肉强食的政策。1917年10月,我们进行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沙皇、地主和资本家,当时我们的导师、我们的父亲和培育者伟大的列宁说,从今以后不应当再有统治的民族和被统治的民族,各民族都应当是平等和自由的。从而,他就埋葬了旧的沙皇和资产阶级的政策,宣布了新的、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我国各族人民友谊的政策,我国各族人民兄弟情谊的政策。

从那时起已经过去18年了。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政策的良好成果。这次会议就清楚地证明:过去苏联各族人民互不信任的情况早已不存在了,互不信任已经由互相完全信任来代替,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正在日益发展和巩固。同志们,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所给予我们的最珍贵的东西。

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成就。因为只要这种友谊存在,我国各族人民就会是自由的和不可战胜的。只要这种友谊存在并永远保持下去,那么,任何人,不论是国内的或国外的敌人,都吓不倒我们。同志们,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译自《在先进的男女联合收割机手会议上的讲话。在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先进的男女集体农庄庄员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版第13—15页

和美国斯克里浦斯—霍华德报系 总经理罗伊·霍华德先生的谈话

(1936年3月1日)

霍华德：您认为，日本最近所发生的事变^①，对远东局势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斯大林：现在还难说。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太少。情况不够清楚。

霍华德：如果日本决定真要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将采取什么态度？

斯大林：如果日本决定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侵犯它的独立，我们就要帮助蒙古人民共和国。李维诺夫的助手斯托莫尼亚科夫，不久以前已向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作了这种声明，指出了自1921年以来，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存在着忠实的友好关系。我们在1921年帮助过蒙古人民共和国，现在我们将给它同样的帮助。

霍华德：这样说来，日本占领乌兰巴托的企图，是不是会引起苏联的正面行动？

斯大林：是的，会引起的。

^① 指1936年2月26日日本一批“皇道派”法西斯军人发动的军事政变，通称二二六事件。——编者注

霍华德：最近几天，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界地区，日本人是否有某些会被苏联看作侵略的行动？

斯大林：日本人似乎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界附近继续集结军队，可是，暂时还看不出有某种引起边界冲突的新企图。

霍华德：苏联担心德国和波兰对苏联有侵略意图，并担心它们准备实行军事合作来促进这一意图的实现。但是同时，波兰声明它不愿意让任何外国军队利用它的领土作为反对第三国的军事行动的基地。苏联是怎样设想德国方面的进攻的呢？德军会从哪些阵地出发，沿什么方向行动呢？

斯大林：历史告诉我们，当任何国家要同其他甚至不接壤的国家作战的时候，它就着手寻找可以到达它所要进攻的那个国家边境的边界。侵略国通常总是找得到这种边界的。它或者借助武力来找到这些边界，如1914年德国侵入比利时以袭击法国那样；它或者采取“假道”的办法，如1918年德国对拉脱维亚所作的那样，当时它企图经过拉脱维亚进攻列宁格勒。我不知道德国究竟能用哪些边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我想，愿意给德国“假道”的人是可以找到的。

霍华德：全世界都在谈论战争。如果战争真是不可避免的话，斯大林先生，照您看，战争将在什么时候爆发？

斯大林：这是不能预言的。战争可能突然地发生。现在，战争是不经过宣战的，说打就打的。但在另一方面，我认为爱好和平的人们的阵地正在巩固起来。他们可以公开进行活动，他们依靠社会舆论的威力，他们掌握着象国际联盟这样一些工具。这是爱好和平的人们的长处。他们的力量，是在于他们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来进行他们的反战活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是

愿意战争的。至于说到敌视和平的人们，他们就不能不秘密地进行活动。这是他们的短处。但是，也可能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下决心从事战争冒险，作绝望的挣扎。

法苏互助条约已由法国众议院批准，这是爱好和平的人们的事业的最新胜利之一。这一条约对于敌视和平的人们是一种障碍。

霍华德：如果发生战争，那么，它会在世界上什么地方首先爆发呢？战争的乌云在哪里最浓厚呢？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呢？

斯大林：我以为有两个战争危险的策源地。第一个策源地在远东，在日本地区。我是根据日本军人屡次发出威胁其他国家的言论而这样说的。第二个策源地在德国地区。很难说哪一个策源地威胁最大，可是两个都存在着，都活动着。同这两个基本的战争危险策源地比较起来，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不过是枝节事件。现在表现得最积极的是远东的战争危险策源地。但这个危险中心，也可能移到欧洲来。不久以前，希特勒先生和法国一家报纸记者的谈话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在这次谈话中，希特勒似乎想讲些爱好和平的话，可是他在“爱好和平”的言论当中夹了这么多的威胁法国和苏联的话，结果所谓“爱好和平”就一点也没有了。您看，就是当希特勒先生想谈和平的时候，也离不开威胁。这就是征兆。

霍华德：在您看来，目前战争危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斯大林：是资本主义。

霍华德：究竟是资本主义的哪些现象呢？

斯大林：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掠夺现象。

您该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怎样发生的。它是由于要重新瓜分世界而发生的。现在也是这么回事。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认

为,他们在上次重分势力范围、领土、原料产地、市场等等时,分得少了,于是,他们为着自己的利益想再重分一下。资本主义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成了一种认为战争是解决国际矛盾的合法方法的制度了。即使不是在法律上这样说,实质上却是这样的。

霍华德: 您是否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有根据担心苏联会决定用暴力强迫其他民族接受苏联的政治理论呢?

斯大林: 这一类担心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如果您以为苏联人要亲自、甚至是用暴力去改变周围国家的面貌,那您就大错特错了。苏联人当然愿意周围国家的面貌能够改变,但这是周围国家自己的事情。如果周围国家真正很稳固,我看不出这些国家会觉得苏联人的思想是危险的东西。

霍华德: 您这种声明是否就是说,苏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放弃了它进行世界革命的计划和意图呢?

斯大林: 我们从来没有过这类计划和意图。

霍华德: 斯大林先生,我觉得,世界上却久已造成另外一种印象了。

斯大林: 这是出于误会。

霍华德: 悲剧的误会吗?

斯大林: 不,喜剧的。或者可以说是悲喜剧的误会。

不错,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在其他国家也要发生。但是只有当这些国家的革命者觉得可能或者需要的时候,革命才能发生。输出革命,这是胡说。每一个国家如果想要革命,它就会自己来进行自己的革命,如果不想革命,也就不会有革命。例如我们国家想要进行革命,于是就进行了革命,而现在我们在建设新的无阶级的社会。但硬说我们要在其他国家进行革命,要干预它们的

生活,那就是无中生有,就是杜撰我们从来没有宣传过的主张。

霍华德: 在苏联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时,罗斯福总统和李维诺夫先生曾经就宣传问题交换过同样的照会。李维诺夫先生给罗斯福总统的信的第4条说,苏联政府负有以下义务:“任何组织或集团,凡以颠覆或准备颠覆,或使用暴力变更整个美国或其任何一部分、任何领土或领地的政治或社会制度为目的者,均不许其在本国境内成立或居留,并采取措施防止这类组织或集团或其代表或负责人员在本国境内进行活动。”斯大林先生,我请您解释一下,如果履行这条义务和苏联的愿望不合,或不在苏联权力以内,李维诺夫先生为什么要在这封信上签名呢?

斯大林: 履行您所引证的这条义务,是我们权力以内的事,我们履行了并且今后将继续履行这条义务。

根据我们的宪法,政治侨民在我国境内有居留权。我们给他们避难权,正如美国给政治侨民避难权一样。很明显,李维诺夫在那封信上签名,是从双方都必须履行信中所载明的这项义务出发的。霍华德先生,如果在美国境内有俄国白卫分子流亡者在进行反对苏联而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宣传,而这些流亡者却得到美国公民物质上的帮助,有时并且成为恐怖团体,您是否认为这同罗斯福—李维诺夫协定相抵触呢?显然,这些流亡者享受着在美国也有的避难权。至于我们方面,我们是从来不容许在我国境内有任何恐怖分子存在的,不管他的罪恶行为是反对什么人。看来,对避难权的解释,在美国要比在我国广一些。好吧,我们不抱奢望。

或许您会不同意我,说我们对于这些来到我国境内的政治侨民表示同情。但是,难道没有美国公民同情宣传拥护资本主义、反对苏联的白卫分子流亡者吗?那么,这里的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

呢？问题就在于不应当帮助他们，不应当在经济上帮助他们的活动；问题就在于两国负责人员不应当干预别国的内部生活。我们的负责人员忠实地履行了这项义务。他们之中如果有谁犯了过错，就对我们说吧。

如果走得太远，要求从美国驱逐出所有白卫分子流亡者，那就是侵犯了美国和苏联都宣布了的避难权。这里应当承认，在提出要求和反要求时是有一定的合理界限的。李维诺夫并不是以私人资格，而是以国家代表的资格在他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上签字的；罗斯福总统的签字，同样也是如此。他们的协定，是两个国家的协定。不论是李维诺夫，还是罗斯福总统，他们作为两国代表在这个协定上签字时，都考虑到本国代理人的活动，这些代理人不应当而且将不去干涉对方的内政。这个协定不能触犯两国所宣布的避难权。应当在这个范围内解释罗斯福—李维诺夫协定，两个国家的代表的协定。

霍华德：但是，美国代表白劳德和达西不是在去年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号召用暴力推翻美国政府吗？

斯大林：老实说，我不记得白劳德和达西两位同志的发言，甚至不记得他们说了什么。也许他们说过这类话。但是，美国共产党并不是苏联人创立的，它是美国人创立的。它在美国是合法存在的，它在选举时有自己的候选人，包括在总统选举时有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如果白劳德和达西两位同志在莫斯科只作过一次演讲，那么，他们在美国本国，这类讲演已作过几百次，而且甚至讲得更激烈些。须知美国共产党是可以自由宣传他们的思想的。认为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应当由苏联政府负责，那是完全不正确的。

霍华德：是的，但是现在谈的是，美国共产党人在苏联境内活

动是违反罗斯福—李维诺夫协定第四条的。

斯大林：什么是共产党的活动，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共产党的活动通常就在于组织工人群众、组织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罢工等等。很明显，美国共产党人是不可能在美国境内进行这一切事情的。在美国没有美国工人。

霍华德：我是否可以把您的声明理解为对相互义务可以找到这样一种解释，在这种解释下，我们两国间良好关系得以保障并持续下去呢？

斯大林：是的，绝对可以的。

霍华德：您承认，共产主义社会在美国还没有建成。建成了国家社会主义^①。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②，都说它们也获得了类似这样的成绩。破坏个人自由，以及使人民忍受其他种种贫困以利于国家，是不是所有上述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呢？

斯大林：“国家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是不确切的。许多人把这个名词理解成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财富的一部分，有时是很大的一部分，转入国家手中或受国家监督，同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工厂及土地的所有权却留在私人手里。许多人就是这样来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有时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名词掩饰下，为了准备战争或进行战争，把一部分私人企业收归国家管理。我们所建立起来的社会，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为“国家社会主义”。我们苏联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工厂、土地、银行、运输工具的私有制已被取消，而代之以公有制。我们所创立起来的社会

① 原文系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编者注

② 原文系 национал-социализм，过去亦译为“国家社会主义”。——编者注

组织,可称为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组织,这种组织虽然还没有完全建成,可是根本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的基础就是公有制:国家的即全民的所有制以及合作社—集体农庄的所有制。无论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也好,无论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也好,和这种社会毫无共同之点。首先是因为工厂、土地、银行、运输业等等方面的私有制,在上述两个国家里都没有受到触动,所以,德国及意大利的资本主义依然完全存在。

是的,您说得对,我们还没有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建成这种社会是并不那么容易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区别,您大概是知道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某些财产上的不平等。可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已经没有失业,已经没有剥削,已经没有民族压迫。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有劳动的义务,虽然人们所得到的劳动报酬不是以他们的需要为标准,而是以他们所投入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为标准。因此还存在着工资,而且工资是不相等的,有差别的。只有将来创立了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由社会方面所得的劳动报酬,不是以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为标准,而是以他们的需要为标准,只有到那个时候,才可以说我们建成了共产主义社会。

您说,为了建立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牺牲过个人的自由,忍受过贫困。在您的问题里面透露出一种想法,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认个人自由的。这是不正确的。当然,要建立某种新东西,就必须自己节约一些,积蓄资金,暂时节省自己的消费,向别人借贷。如果您要建造一座新房屋,您就要积蓄金钱,暂时节省自己的消费,否则,房屋是建筑不起来的。说到建立人类的整个新社会,那就更要这样了。我们曾不得不暂时节省某些消费,积蓄相当

的资金和集中力量。我们正是这样办了的，所以我们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

可是我们建成这样一种社会，并不是为了束缚个人自由，而是使个人真正感觉到他是自由的。我们建成这种社会，是为了真正的个人自由，为了不带引号的自由。我很难设想，一个饿着肚子、找不到工作的失业的人，会有什么“个人自由”。只有在消灭了剥削的地方，在没有人压迫人的地方，在没有失业和贫穷的地方，在人们不担心第二天会失去工作、住宅和饭碗的地方，才能够有真正的自由。只有在这种社会里，才能够有真正的、而不是纸上的个人自由和其他任何自由。

霍华德：您是否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同苏维埃制度是可以并行不悖地发展的呢？

斯大林：美国的民主制同苏维埃制度可以和平地共处和竞赛。然而这一个不能发展成为另一个。苏维埃制度不会转变为美国的民主制，反之亦然。如果我们彼此不吹毛求疵，我们是可以和平地共处的。

霍华德：苏联正在起草新宪法，这个宪法要规定新的选举制度。既然将来在选举中仍旧同以前一样只有一个政党活动，那么这种新制度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情形呢？

斯大林：我们大概要在今年年底通过我们的新宪法。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在进行工作并且应当很快就完成自己的工作。我们已经宣布过，依照新宪法，我们将实行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无记名的选举。您感到不安的是，将来在选举中只有一个政党活动。您看不出，在这些条件之下会有怎样的竞选。很明显，将来在选举中提出候选人名单的，将不仅是共产党，而且是各种非党的社会团

体。这种团体我们有好几百个。我们没有彼此对立的政党，正象我们没有彼此对立的资本家阶级和被资本家剥削的工人阶级一样。我们的社会，仅仅由城乡自由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组成。这些阶层中的每一阶层会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而且经过现存的很多社会团体反映这种利益。可是既然没有阶级，既然阶级和阶级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阶层之间只留下了某些非根本性的差别，那就不会有形成互相斗争的政党的土壤。没有几个阶级的地方，就不会有几个政党，因为政党是阶级的一部分。

在民族“社会主义”下，也只存在着一个政党。但是这种法西斯的一党制是行不通的。问题在于德国依然存在着资本主义，依然有阶级，有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总是要爆发出来，其中也包括在代表对立阶级的政党的斗争方面爆发出来，正如它在西班牙已经爆发出来一样。意大利也只有一个法西斯党，但是也因为上述原因，在意大利也行不通。

为什么我们的选举是普遍的呢？因为全体公民，除了被法庭判决剥夺选举权的人以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为什么我们的选举是平等的呢？因为财产上的差别（这种差别还部分地存在），种族和民族的不同，都不会造成任何特权或带来什么损害。妇女将和男子平等地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们的选举将是真正平等的。

为什么要无记名呢？因为我们要使苏联公民完全自由地选出他们所要选的人，选出他们托付来保障他们利益的人。

为什么要直接选举呢？因为在当地直接选举一切代表机关，直至最高机关，能够更好地保障我们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的劳动

者的利益。

您认为不会有竞选。可是竞选一定会有，而且我预料会很热烈。我们有不少机关工作做得不好。有时某个地方政权机关，不善于满足城乡劳动者各方面的与日俱增的需求。你有没有建立好的学校呢？你有没有改善居住条件呢？你是不是一个官僚呢？你有没有帮助我们，使得我们的劳动功效更大，使得我们的生活更文明呢？这将是一种标准，千万选民将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候选人，抛开不适当的候选人，把他们从候选人名单中取消，提出最优秀的人来充当候选人。是的，竞选将是热烈的，它将围绕许多极其尖锐的问题，主要是实际的、对于人民有头等意义的问题来进行。我们新的选举制度，将对一切机关和团体起督促作用，促使它们改善自己的工作。苏联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的选举制度，将成为人民手中的鞭子，用来鞭策工作做得不好的政权机关。我认为，我们苏联新宪法，将是世界上一切宪法中最民主的宪法。

康·乌曼斯基记录

译自 1936 年 3 月 5 日《真理报》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苏联英雄 契卡洛夫、拜杜科夫、 别利亚科夫时的讲话^①

(报 道)

斯大林同志谈到了苏联英雄特有的品质，谈到了我们的飞行员，他们普通而平凡，但从他们中将会涌现出英雄。勇敢和无畏是苏联英雄不可缺少的品质。而飞行员正是意志坚定、性格刚强和甘冒生命危险这些特点的集中体现。

但是，斯大林同志说，勇敢和无畏只是英雄主义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要有本领。常言道，凭勇敢可以攻下城市。然而，只有把勇敢、无畏、甘冒危险的决定同优异的知识结合起来，这一点才能实现。斯大林同志指出：“安特—25”型飞机全体机组人员——契卡洛夫同志、拜杜科夫同志和别利亚科夫同志——把高度勇敢和无畏的精神同运用最新技术成就的知识和本领非常成功地结合起来了。

斯大林同志的讲话不时被全场热烈的欢呼声所打断，他在讲话结束时提议：

① 苏联飞行员瓦·巴·契卡洛夫、格·菲·拜杜科夫、亚·瓦·别利亚科夫于1936年7月20—22日完成了莫斯科—堪察加半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乌德岛（现名契卡洛夫岛）的不着陆飞行，7月24日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这次招待会是为了表彰他们的飞行成就于1936年8月13日举行的。——编者注

为苏联英雄契卡洛夫、拜杜科夫、别利亚科夫，为在座的苏联英雄格罗莫夫、沃多皮亚诺夫、斯列普尼奥夫，为那些普通飞行员和优秀飞行员——现在还不知谁是普通飞行员，谁是优秀飞行员，这将在实际中证明，为科基纳基——他这次意外地没当上苏联英雄，但是我向他预告，他会当上的——干杯！

译自 1936 年 8 月 14 日《真理报》

***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 何塞·迪亚斯的电报**

马德里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何塞·迪亚斯同志

苏联劳动人民给予西班牙革命群众以力所能及的援助只是履行自己的义务。他们知道，使西班牙从法西斯反动派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不是西班牙人的私事，而是全体先进和进步人类的共同事业。 顺致
兄弟般的敬礼！

约·斯大林

译自 1936 年 10 月 16 日《真理报》

关于苏联宪法草案

(1936 年 11 月 25 日在全苏苏维埃
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宪法委员会的成立及其任务

同志们!

大家知道,提出宪法草案来给这次代表大会审核的宪法委员会,是根据苏联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特别决议成立的。这个决议在 1935 年 2 月 6 日通过,决议说:

“1.按以下方针修改苏联宪法:

(一)使选举制更加民主化——用平等的选举来代替不完全平等的选举,用直接的选举来代替多级的选举,用无记名的选举来代替记名的选举;

(二)更准确地规定宪法的社会经济基础——使宪法适合苏联目前的阶级力量对比(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已经建立,富农已被粉碎,集体农庄制度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立而成为苏联社会的基础,等等)。

2.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宪法委员会,委托宪法委员会根据第一项规定的原则起草宪法的修改草案,然后提交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批准。

3.苏联苏维埃政权机关下届选举,应根据新选举制举行。”

这是 1935 年 2 月 6 日的事。在通过这个决议的第二天,即 1935 年 2 月 7 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并为

执行苏联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而成立了由 31 人组成的宪法委员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责成宪法委员会起草苏联宪法的修改草案。

这就是宪法委员会开展工作所必须遵循的正式依据和苏联最高机关的指示。

因此，宪法委员会修改 1924 年通过的现行宪法，应当估计到从 1924 年到现在苏联生活中取得的走向社会主义的一切进展。

二

1924—1936 年在苏联生活中发生的变化

在 1924—1936 年这一时期内，苏联生活中发生的哪些变化须要宪法委员会在宪法草案中反映出来呢？

这些变化的实质何在呢？

我们在 1924 年的情形怎样呢？

这是新经济政策第一个时期，当时，苏维埃政权在尽一切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活跃，打算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经济体系的竞赛过程中，造成社会主义体系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优势。当时的任务是要在这一竞赛过程中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消灭资本主义分子，完成作为国民经济基本体系的社会主义体系的胜利。

当时，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状况很不好。固然，它在慢慢恢复起来，可是生产量远未达到战前水平。它建立在落后的贫乏的旧技术的基础上。当然，它是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的。我国工业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约占 80%。可是，资本主义成分在

工业中占的比重，毕竟还不少于 20%。

当时，我国的农业更不成样子。固然，地主阶级已被消灭，可是，农业资本家阶级，即富农阶级，还有相当大的力量。整个说来，农业好象是无数用中世纪落后技术经营的个体小农户形成的汪洋大海，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就象是这个大海中的一些零星岛屿，老实说，它们当时在我们国民经济中还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力量薄弱，而富农却还有力量。我们当时还没有说消灭富农，而是说限制富农。

国内商品流转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商品流转方面，社会主义成分只占约 50—60%，而其余的地盘还被商人、投机者和其他私人占据着。

1924 年我国的经济状况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 1936 年的情形又是怎样呢？

如果说当时我们是处在新经济政策第一个时期，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时期，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活跃的时期，那么现在我们是处在新经济政策最后一个时期，新经济政策终结的时期，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所有部门中完全消灭的时期。

首先来看我国的工业。我国工业在这个时期已经发展成为巨大的力量。现在已经不能说它是力量薄弱和技术设备不好的工业了。恰巧相反，它现在建立在丰富的现代新技术的基础上，十分发达的重工业以及更发达的机器制造业的基础上。而最主要的，就是资本主义已经从我国工业范围中完全驱逐出去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现在是在我国工业中独占统治的体系。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工业按产量来说已超过战前工业 6 倍多这一事实，是不能看作一件小事的。

在农业方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处于无数技术落后的个体小农户形成的、富农到处横行的汪洋大海中，而是有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机械化的、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生产，即无所不包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体系。大家知道，在农业中，富农已被消灭，而用中世纪落后技术经营的个体小农经济成分只占很小的地位，它在农业中所占的比重，从播种面积来看，至多不过 2—3%。不能不指出一件事实，就是集体农庄现在已经有 316 000 台拖拉机，共 570 万马力，而同国营农场合起来计算，已有 40 多万台拖拉机，共 758 万马力。

至于国内商品流转，商人和投机者已经被我们从这方面完全驱逐出去了。现在全部商品流转都已掌握在国家、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手中。新的苏维埃的商业，没有投机者参加的商业，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业，已经产生而且发展了。

因此，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的完全胜利，现在已经是事实了。

而这说明什么呢？

这就是说，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铲除和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立而成为我们苏联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

由于苏联国民经济方面发生了这一切变化，我们现在有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这个经济不会有危机和失业，不会有贫困和破产，而公民们有一切可能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

1924—1936 年这一时期在我国经济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大体上就是如此。

由于苏联经济方面发生了这些变化，我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也

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大家知道，地主阶级已经因国内战争胜利结束而完全消灭了。其他剥削阶级也遭到了与地主阶级同样的命运。在工业方面已经没有资本家阶级了。在农业方面已经没有富农阶级了。在商品流转方面已经没有商人和投机者了。因而，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

剩下了工人阶级。

剩下了农民阶级。

剩下了知识分子。

可是，如果以为这些社会集团在这一时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如果以为他们还是象在譬如说资本主义时期一样，那就错了。

例如拿苏联工人阶级来说。人们往往照旧叫它无产阶级。但什么是无产阶级呢？无产阶级就是在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属于资本家、资本家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经济制度下被剥夺了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阶级。无产阶级就是被资本家剥削的阶级。而在我国，大家知道，资本家阶级已被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已从资本家手中夺来，交给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力量的国家。因而，已经没有能够剥削工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了。因而，我国工人阶级不仅没有被剥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反而是同全体人民一起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既然它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而资本家阶级已被消灭，那么任何剥削工人阶级的可能都完全铲除了。既然如此，难道还可以把我国工人阶级叫作无产阶级吗？当然不可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必须粉碎资本家阶级，从资本家手中夺取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把产生无产阶级的生产条件消灭。可以说苏联工人阶级已经实现了解放自己的这些条件

吗？绝对可以，而且应当这样说。这说明什么呢？这就是说，苏联无产阶级已经变成完全新的阶级，已经变成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确立了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引导着苏联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苏联工人阶级。

由此可见，苏联工人阶级是完全新的、摆脱了剥削的工人阶级，这样的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的。

现在我们来谈农民问题。人们通常都说，农民是小生产者阶级，它的成员好象一盘散沙，分布在全国的地面上，各人单独地在自己的小经济范围内用落后的技术埋头种地，他们是私有制的奴隶，是遭到地主、富农、商人、投机者、高利贷者等等肆意的剥削的。的确，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农民，就其基本群众来说，正是这样的阶级。能不能说我国现在的农民，苏联农民，就其大多数而言，是与这样的农民相象的呢？当然不可以这样说。这样的农民在我国已经没有了。我们苏联的农民是完全新的农民。在我国已没有能够剥削农民的地主、富农、商人和高利贷者了。所以，我国农民是摆脱了剥削的农民。其次，我们苏联的农民，绝大多数都是集体农庄农民，就是说，他们的工作和财产不是建立在个体劳动和落后技术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集体劳动和现代技术的基础上的。最后，我国农民的经济基础不是私有制，而是在集体劳动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集体所有制。

由此可见，苏联农民是完全新的农民，这样的农民是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的。

最后，我们来说知识分子问题，来说工程技术人员、文化工作者以及所有职员等等的问题。在过去这一时期中，我国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已经不是那种旧的顽固的知识分子，那

种企图使自己超脱各阶级，而实际上大多数都是为地主资本家服务的知识分子了。我们苏联的知识分子，是同工人阶级和农民血肉相连的完全新的知识分子。首先，知识分子的成分改变了。在我们苏联的知识分子中，贵族和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所占的百分数很小。苏联知识分子 80—90% 都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阶层出身的。而且，知识分子活动的性质也改变了。从前，他们势必为富人阶级服务，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出路。现在，他们势必为人民服务，因为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了。正因为如此，他们现在是苏联社会中享有平等权利的成员，在这里，他们同工农并肩前进，建设无阶级的社会主义新社会。

由此可见，这是完全新的劳动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地球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的。

这就是过去这一时期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方面发生的变化。

这些变化说明什么呢？

第一，这些变化说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以及这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线正在消除，而从前的阶级特殊性也在消失。这就是说，这些社会集团间的距离正在日益缩小。

第二，这些变化说明，这些社会集团间的经济矛盾在缩小，在消失。

最后，这些变化说明，这些社会集团间的政治矛盾也在缩小，也在消失。

这就是苏联**阶级结构**方面的变化。

关于苏联社会生活变化的情形，如果不说一说还有一方面的变化，那是不完全的。我指的是苏联**民族**相互关系的方面。大家知道，苏联约有 60 个民族和民族集团。苏维埃国家是多民族的国

家。因此很明显,苏联各族人民的相互关系问题,对我们不能不具有头等的意义。

大家知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1922年在苏联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它是根据苏联各族人民平等和自愿的原则组成的。1924年通过的现行宪法,是苏联第一个宪法。那时,各族人民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调整,对大俄罗斯人的不信任心理的残余还没有消失,离心力还继续发生作用。当时必须在这种条件下,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互助的基础上调整各族人民的兄弟合作关系,把他们联合成一个多民族的联盟国家。苏维埃政权不能不看到这项事业的困难。它看到了资产阶级国家建立多民族国家的失败经验。它看到了旧奥匈帝国瓦解的经验,但它毕竟进行了创立多民族国家的实验,因为它知道,在社会主义基础上产生的多民族国家,一定能够经得住所有一切考验。

从那时起,已经有14年了。为了审查这一实验,这样一个时期已经足够长了。结果怎样呢?过去这一时期,毫无疑问地证明: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建立多民族国家的实验,是完全成功了。这是列宁的民族政策取得的毫无疑问的胜利。

为什么会有这个胜利呢?

制造民族纠纷的主要势力即剥削阶级已不存在,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和燃起民族主义狂热的剥削制度已不存在,反对一切奴役而忠实地实现国际主义思想的工人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各族人民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一切方面已经切实实行互助,最后,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化,即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已经有了蓬勃的发展,——所有这些因素以及诸如此类的因素,导致苏联各族人民的面貌发生根本改变,他们中间互不信任的心理已经消

失,而相互友爱的感情已经发展,因而建立了各族人民在统一的联盟国家体系中真正兄弟合作的关系。

因此,我们现在有了完全形成的、经住了一切考验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的巩固,是世界上任何一洲的任何一个单民族国家都比不上的。

这就是过去这一时期苏联各民族相互关系方面发生的变化。

这就是 1924—1936 年这一时期在苏联经济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方面发生的各种变化的总结。

三

宪法草案的基本特点

苏联生活中发生的这一切变化,在新宪法草案中得到了什么反映呢?

换句话说,提交这次代表大会审核的宪法草案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

宪法委员会受委托修改 1924 年宪法的条文。宪法委员会工作的结果,产生了宪法的新条文,即苏联新宪法草案。宪法委员会起草新宪法草案时是从宪法不应该同纲领混淆这一点出发的。这就是说,纲领和宪法有重大的差别。纲领上说的是还没有的东西,是要在将来获得和争取到的东西,相反,宪法上应当说的是已经有的东西,是现在已经获得和已经争取到的东西。纲领主要是说将来,宪法却是说现在。

让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吧。

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

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大家知道，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基本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一公式。我们的宪法是不是应当反映社会主义已经争取到了这一事实呢？我们的宪法是不是应当以社会主义已经争取到了这一事实为基础呢？完全应当。其所以应当，是因为社会主义在苏联是已经获得和争取到了的东西。

可是，苏联社会还没有实现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公式作为通行的原则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虽然它把将来实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作为自己的目的。我们的宪法是不是能以现在还没有、还应当争取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为基础呢？当然不能，因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是苏联还没有实现而应当在将来实现的东西。如果不愿意使宪法变成纲领或关于将来的成就的宣言，那就不能这样做。

这就是我们的宪法在当前历史时期的范围。

这样，新宪法草案是已经走过的道路的总结，是已经取得的成就的总结。所以，它是把事实上已经获得和争取到的东西登记下来，用立法程序固定下来。

这就是苏联新宪法草案的第一个特点。

其次，各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通常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动摇这一信念为出发点的。这些宪法的主要基础是资本主义的原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准则，对土地、森林、工厂以及其他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人对人的剥削，以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存在；在社会的一个极端是多数劳动者受冻挨饿，而在另一个极端是少数不劳而获的人奢侈挥霍；以及其他等等。各资产阶级国家的

宪法,就是以资本主义的这种准则为依据的。它们反映这些准则,用立法程序把这些准则固定下来。

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不同,苏联新宪法草案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苏联已被消灭这一事实,是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已经胜利这一事实。苏联新宪法草案的主要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已经争取到和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对土地、森林、工厂以及其他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多数人贫困和少数人奢侈现象的消灭;失业的消灭;劳动是每个有工作能力的公民按“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公式履行的义务和光荣职责。劳动权,即每个公民有得到有保障的工作的权利;休息权;受教育权;以及其他等等。新宪法草案就是以社会主义的这些准则为依据的。它反映这些准则,用立法程序把这些准则固定下来。

这就是新宪法草案的第二个特点。

再其次,资产阶级宪法暗中从以下的前提出发:社会是由彼此对抗的阶级,即占有财富的阶级和没有财富的阶级组成的;无论哪一个党执政,对社会的国家领导权(专政)都应当属于资产阶级;宪法所以需要,是为了把合乎有产阶级愿望并有利于有产阶级的社会秩序固定下来。

和资产阶级宪法不同,苏联新宪法草案所依据的是:社会上已经不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社会是由工人和农民这两个互相友爱的阶级组成的;执政的正是这两个劳动阶级;对社会的国家领导权(专政)属于工人阶级这个社会的先进阶级;宪法所以需要,是为了把合乎劳动者愿望并有利于劳动者的社会秩序固定下来。

这就是新宪法草案的第三个特点。

再其次,资产阶级宪法暗中从以下的前提出发:各民族和种族彼此不能平等;有享受完备权利的民族,也有享受不完备权利的民族;此外,还有第三种民族或种族,例如殖民地的民族或种族,他们享受的权利要比享受不完备权利的民族还要少。这就是说,所有这些宪法基本上是民族主义的宪法,即统治民族的宪法。

和资产阶级宪法不同,苏联新宪法草案具有深刻的国际主义性质。它的出发点是,一切民族和种族权利平等。它的出发点是,各民族和种族在肤色或语言、在文化水平或国家发展水平方面的区别,以及其他任何区别,都不能成为替民族不平等现象辩护的根据。它的出发点是,一切民族和种族,不管它们过去和现在的状况如何,不管它们强或弱,都应当在社会一切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国家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享受同等的权利。

这就是新宪法草案的第四个特点。

新宪法草案的第五个特点,就是它的彻底的信守不移的民主主义。从民主主义的观点来看,资产阶级宪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宪法直接否认公民权利的平等和民主自由,或在事实上把它们化为乌有。另一类宪法很乐意地接受、甚至标榜民主原则,但同时加上许多附带条件和限制,而使民主权利和自由残缺不全。它们说一切公民都有平等选举权,但同时又用居住期限、教育程度以至财产资格来加以限制。它们说公民有平等权利,但同时又加上附带条件,说这不涉及妇女,或只涉及一部分妇女。如此等等。

苏联新宪法草案的特点,就在于它完全没有这类附带条件和限制。它根本不分什么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认为所有公民都是积极的。它不承认男性和女性、“定居者”和“暂居者”、有产者和无产者、受过教育者和未受过教育者有权利上的差别,认为所有公民

都有平等的权利。决定每个公民在社会上的地位的，不是财产状况，不是民族出身，不是性别，不是职位，而是个人的能力和个人的劳动。

最后，新宪法草案还有一个特点。资产阶级的宪法通常限于规定公民的形式权利，而不注意实现这些权利的条件，实现这些权利的可能，实现这些权利的手段。它们空谈公民平等，可是忘记了，既然资本家和地主在社会上有财富和政治势力，而工人和农民却没有财富和政治势力，既然资本家和地主是剥削者，而工人和农民是被剥削者，那么厂主同工人、地主同农民，就不能有真正的平等。又如，它们空谈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可是忘记了，既然工人阶级不可能拥有适当的集会场所、良好的印刷厂、充分的印刷纸张等等，那么这些自由对于工人阶级就会变成空话。

新宪法草案的特点，就在于它不限于规定公民的形式权利，而把重点放在保障这些权利的问题上，放在实现这些权利的手段的问题上。它不仅仅宣布公民权利平等，而且用立法程序把剥削制度已被消灭的事实固定下来，把公民已经摆脱任何剥削的事实固定下来，以保障公民权利平等。它不仅仅宣布劳动权，而且用立法程序把苏联社会没有危机的事实、把失业已被消灭的事实固定下来，以保证劳动权。它不仅仅宣布民主自由，而且按立法程序，用一定的物质手段来保证这些自由。因此，很明显，新宪法草案的民主主义，并不是“通常的”“公认的”一般民主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

这就是苏联新宪法草案的各个基本特点。

这就是 1924—1936 年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的各种进展和变化在新宪法草案上的反映。

四

资产阶级对宪法草案的批评

现在来说一说资产阶级对宪法草案的批评。

外国资产阶级报刊怎样对待宪法草案的问题，当然是很有意思的。由于外国报刊反映各资产阶级国家里各阶层居民的舆论，所以我们不能不来说一说这些报刊对宪法草案的批评。

从外国报刊对我国宪法草案的最初反应看，它们有一种不理睬这个草案的倾向。这里我指的是最反动的法西斯报刊。这种批评家认为最好是干脆不理睬宪法草案，似乎天地间根本没有过、根本就没有这个宪法草案。也许有人说，不理睬不是批评。但这是不对的。不理睬作为一种特别的藐视办法，也是一种批评方式，固然是愚蠢可笑的，但毕竟是一种批评方式。可是，他们采取隐瞒手段，并没有发生效果。最后，他们不得不打开闷葫芦，告诉世界说，真痛心，苏联宪法草案毕竟存在，不仅存在，而且已经开始发生蛊惑人心的影响。不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上总还有舆论，有读者，有活人，他们想知道事实的真相，要长期硬是欺骗这些人是绝不可能的。靠欺骗是走不多远的……

第二种批评家承认宪法草案确实存在于天地间，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宪法草案没有多大意思，因为它事实上不是宪法草案，而是一纸空文，是用来玩弄某种手腕和欺骗人们的空洞诺言。同时他们又说，而且苏联也不能拟出较好的草案，因为苏联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而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既然苏联不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宪法也就不能是真正的宪法。这种批评家的典型代表，说来奇

怪,就是德国半官方杂志《德意志外交政治通讯》。该杂志公然说:苏联宪法草案是空洞的诺言,是欺骗,是“波将金的村落”^①。它毫不犹豫地宣称:苏联不是一个国家,苏联“不过是一个确定的地理概念”,所以苏联宪法也就不能认为是真正的宪法。

对于这种所谓批评家可以说些什么呢?

俄国伟大作家谢德林在他的一篇寓言故事^②中,描写了一个刚愎自用,十分狭隘、迟钝,可是非常自信和尽职的官僚的典型。这个官僚在他“管辖的”地区杀了成千累万的居民,烧毁了几十座城市,建立了“秩序和安宁”以后,眺望四周,忽然在天边看见了一个美国,这个国家固然不很著名,但那里却有着诱惑人心的自由,用另一种方法管理国家。这个官僚一看见美国,就气愤地说:这是个什么国家,它是从哪里来的,它有什么理由存在呢?当然,它是在几世纪以前偶然被人打开的,可是难道不能又把它封起来,使它完全无声无臭吗?他说罢这一番话,就作了批示:“把美国重新封起来!”

我觉得,《德意志外交政治通讯》杂志的那些老爷,同谢德林的寓言中的官僚一模一样。苏联早已成了这些老爷的眼中钉。苏联象灯塔一样屹立着已经有 19 年了,它用解放的精神感染全世界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的敌人气得发狂。而它,这个苏联,却不仅存

① “波将金的村落”是指装饰门面借以骗人的东西。格·亚·波将金是沙皇俄国的将军、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1783 年策划把克里木并入俄罗斯,因此被授予塔夫利达公爵的封号。据传说,1787 年他陪同叶卡捷琳娜二世南巡时,为了向女皇显示新兼并的克里木的繁荣,在沿途搭起了许多假的居民点、粮仓、堡垒等建筑物。——编者注

② 指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一位励精图治的长官怎样因为热心害得上司发愁的故事》。——编者注

在,而且日益成长,不仅日益成长,而且日益繁荣,不仅日益繁荣,而且制定了新宪法草案,制定了使各被压迫阶级精神焕发、满怀新希望的草案。既然如此,德国半官方杂志的老爷们又怎能不气愤呢?他们大声叫喊:这是个什么国家,它有什么理由存在呢,如果它是1917年10月打开的,那为什么不可以又把它封起来,使它完全无声无臭呢?说罢这一番话,就作了批示:把苏联重新封起来,当众宣布苏联这个国家不存在,苏联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而已!

谢德林的寓言中的官僚虽然十分迟钝,可是他写下把美国重新封起来的批示时,总还表现出一点了解实情的能力,因为他立刻自言自语地说:“但也许这是不能由我作主的吧。”我可不知道,德国半官方杂志的老爷们是否有充分的智力猜想到,他们在纸上当然能够“封闭”这个或那个国家,可是如果认真来说,那么“这是不能由他们作主的”……

至于说苏联宪法好象是空洞的诺言,好象是“波将金的村落”等等,那我就援引一系列确定不移的、无须证明的事实。

在1917年,苏联各族人民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是事实,而不是诺言。

其次,苏维埃政权消灭了地主阶级,把从前属于地主、官府和寺院的15000万公顷土地交给了农民,而从前属于农民的土地不在内。这是事实,而不是诺言。

其次,苏维埃政权剥夺了资本家阶级,没收了他们的银行、工厂、铁路以及其他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宣布这些东西为社会主义财产,派工人阶级的优秀人物领导这些企业。这是事实,而不是诺言。

其次，苏维埃政权按社会主义的新原则、在新的技术基础上组织了工业和农业，取得了这样的成绩：现在苏联的农业产量比战前增加了 50%，工业产量比战前增加了 6 倍，而国民收入则比战前增加了 3 倍。所有这些都是事实，而不是诺言。

其次，苏维埃政权消灭了失业，实现了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保证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有良好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保证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能够实行。所有这些都是事实，而不是诺言。

最后，苏联制定了新宪法草案，这个草案不是诺言，而是把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事实登记下来，用立法程序固定下来，把已经取得和争取到的东西登记下来，用立法程序固定下来。

既然如此，德国半官方杂志的老爷们关于“波将金的村落”的废话，如果不是为了对人民隐瞒苏联真相，使人民陷入迷途，欺骗人民，试问又是为了什么呢。

事实就是如此。而事实正象俗话所说的那样，是改变不了的。德国半官方杂志的老爷们也许会说，那就该事实倒霉。可是，那时就可以用俄国一句著名的谚语来回答他们：“傻子是不讲道理的。”

第三种批评家不反对承认宪法草案有相当多的优点，他们认为这个草案是一种好现象，但看来很怀疑草案中许多条文能够实现，因为他们确信这些条文根本无法实现，只是纸上空文。如果说得客气一点，这就是怀疑论者。这种怀疑论者是各国都有的。

应当说，我们并不是第一次遇到他们。当 1917 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时候，怀疑论者就说过：布尔什维克也许不是坏人，但掌握政权这件事他们是办不好的，他们一定会失败。可是事实上

失败了的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怀疑论者。

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这种怀疑论者就说过：苏维埃政权当然是不坏的东西，但是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又加上外国人，大概会战胜这个政权的。可是事实上怀疑论者就在这一点上也失算了。

在苏维埃政权公布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怀疑论者又跑出来，说：五年计划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未必能实现，五年计划的事布尔什维克大概是搞不成的。但事实又证明怀疑论者倒霉：五年计划在四年内完成了。

关于新宪法草案以及怀疑论者对这一草案的批评也是这样。草案一公布，这种批评家就又跑出来发表他们那一套悲观的怀疑论，说宪法中有些条文未必能实现。毫无疑问，怀疑论者现在这一次，也会象他们过去屡次失败了那样遭到失败。

第四种批评家攻击新宪法草案，认为这个草案是“向右转”，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是“取消布尔什维克制度”。他们用各种腔调说：“布尔什维克向右转了，这是事实。”在这方面特别卖力气的，是某些波兰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纸。

对于这些所谓批评家可以说些什么呢？

如果扩大工人阶级专政的基础，使专政变成对社会实行国家领导的更灵活、因而也更强大的体系这一点，竟被他们解释成不是加强工人阶级专政，而是削弱这个专政，甚至放弃这个专政，那就可以问一问，这些老爷一般是不是知道什么是工人阶级专政呢？

如果用立法程序把社会主义的胜利固定下来，用立法程序把工业化、集体化和民主化的成就固定下来这一点，在他们看来竟是“向右转”，那就可以问一问，这些老爷究竟知道不知道，左和右的

区别是什么？

毫无疑问，这些老爷在批评宪法草案时头脑完全混乱了；既然他们头脑混乱了，就把左右都弄错了。

说到这里，不禁会想起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家里的“娃儿”彼拉格娅来。果戈理描写说，这个“娃儿”有一次替乞乞科夫的马车夫绥里方带路，但她因为不会分辨向左向右，脑筋乱了，结果弄得很窘。应当承认，波兰报纸的批评家虽然十分自负，但是他们的理解程度却与《死魂灵》中地主家里的“娃儿”彼拉格娅相差不远。你们记得，马车夫绥里方因为彼拉格娅分不清左右，认为必须斥责她，于是对她说：“啊唷，你这泥腿……连左右也分不清。”我觉得也应当这样斥责这些倒霉的批评家，对他们说：阿唷，你们这班蹩脚的批评家……连左右也分不清。

最后，还有一种批评家。如果上面那种批评家责备宪法草案是放弃工人阶级专政，那么恰巧相反，这一种批评家责备宪法草案丝毫没有改变苏联现状，没有触动工人阶级专政，没有容许政党自由，而保留了苏联共产党现在的领导地位。同时，这一种批评家认为在苏联没有政党自由，就是违反民主主义原则的标志。

我应当承认，新宪法草案确实保留了工人阶级专政制度，同样也毫无变动地保留了苏联共产党现在的领导地位。如果可敬的批评家认为这是宪法草案的缺点，那就只能对此感到遗憾。我们布尔什维克却认为这是宪法草案的优点。

至于说到各种政党存在的自由，那么在我们这里却持有略为不同的观点。党是阶级的一部分，是阶级的先进部分。几个党，也就是政党自由，只有在有利益敌对而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的社会里，譬如说，在有资本家和工人、有地主和农民、有富农和贫农等等

的社会里,才会存在。可是,在苏联已经没有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等阶级了。在苏联只有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不仅不彼此敌对,相反地,是互相友爱的。所以,在苏联也就没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这些政党自由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可以存在,这就是勇敢和彻底保护工农利益的共产党。它对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保护得不坏,这大概不能有任何怀疑吧。

人们谈论民主,但什么是民主呢?民主在有对抗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归根到底是给有势力的人享受的民主,是给有财产的少数人享受的民主。相反地,民主在苏联却是给劳动者享受的民主,也就是说给所有的人享受的民主。由此可见,违反民主主义原则的不是苏联新宪法草案,而是资产阶级的宪法。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苏联宪法是世界上唯一彻底民主的宪法。

资产阶级对苏联新宪法草案的批评就是如此。

五

对宪法草案的修改和补充意见

现在,我们来谈公民们在全民讨论宪法草案时提出的对宪法草案的修改和补充意见。

大家知道,在全民讨论宪法草案时提出了相当多修改和补充的意见。所有这些意见,都在苏联报刊上公布了。因为这些修改意见的内容很不相同,价值也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应当把它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修改意见的特点,就在于它们说的不是宪法问题,而是

将来立法机关的日常立法工作问题。关于保险事业的个别问题，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某些问题，关于工业建设的某些问题，关于财政的问题，——这就是第一类修改意见提到的问题。提出这些修改意见的人，大概没有弄懂宪法问题和日常立法问题的区别。正因为如此，他们竭力要把尽可能多的法律塞到宪法里去，简直要把宪法变成一部法律汇编。可是，宪法并不是法律汇编。宪法是根本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宪法并不排除将来立法机关的日常立法工作，而要求有这种工作。宪法给这种机关将来的立法工作以法律基础。这一类修改和补充的意见既然与宪法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认为应当把它们交到我国将来的立法机关去。

应当归入第二类的修改和补充意见，企图把历史资料的成分，或者关于苏维埃政权现在还没有取得而将来应当取得的成就的宣言成分，载入宪法。要在宪法内指出党、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劳动群众多年来在为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克服了哪些困难，要在宪法内说明苏维埃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建成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这一类修改意见用各种不同的说法提到的问题。我认为这一类修改和补充的意见和宪法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也应当不采纳。宪法是把已经取得、已有保障的成果登记下来，用立法程序固定下来。如果我们不愿意曲解宪法的这一基本性质，我们就不应当使宪法通篇都是关于以往历史的资料，或关于苏联劳动群众将来成就的宣言。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和其他文件去说。

最后，应当归入第三类的是和宪法草案有直接关系的修改和补充意见。

这一类修改意见中有一大部分是属于文字上修改性质的。因此，可以把它们交给本届代表大会审定委员会，——我想代表大会

一定会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委托它来最后审定新宪法全文的。

至于第三类修改意见中其余的一部分,因为它们有比较实质性的意义,所以我认为必须在这里说一说。

(1)首先谈一谈对宪法草案第1条的修改意见。共有四个修改意见。第一个意见主张用“劳动者国家”几字来代替“工农国家”。另一个意见主张把“工农国家”改为“工农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国家”。第三个意见主张用“苏联境内所有种族和民族的国家”来代替“工农国家”。第四个意见主张用“集体农庄庄员”或“社会主义农业劳动者”来代替“农”字。

是否应当采纳这些修改意见呢?我认为不应当。

宪法草案第1条说明的是什么呢?它说明苏联社会的阶级成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宪法内是不是可以不提到我国社会的阶级成分问题呢?不可以。大家知道,苏联社会是由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宪法草案第1条说的正是这一点。所以,宪法草案第1条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的阶级成分。也许有人会问:那么劳动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阶级,而且也不能是一个阶级,——它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由社会各阶级出身的人组成的一个阶层。从前,知识分子是出身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有一部分是农民出身,而工人出身的是极少数。而在我们苏维埃时代,知识分子主要是工农出身的。可是,不管它的出身如何,不管它的性质怎样,它还是一个阶层而不是阶级。

这种情形会不会损害劳动知识分子的权利呢?一点也不会!宪法草案第1条所说的并不是苏联社会各阶层的权利,而是这个社会的阶级成分。苏联社会各阶层的权利,其中包括劳动知识分子的权利,主要在宪法草案第十、第十一两章内说明了。从这两章内

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在全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各方面,都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所以,关于劳动知识分子的权利会受损害,是根本谈不到的。

关于苏联各民族和种族也是这样。在宪法草案第二章内已经写明,苏联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各民族的自由联盟。是不是需要在说明苏联社会阶级成分而不是说明苏联社会民族成分的宪法草案第1条里,重复这一公式呢?显然不需要。至于苏联各民族和种族的权利,在宪法草案第二、第十和第十一章内都已说明。从这几章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各民族和种族,在全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各方面都享有同等的权利。所以,根本谈不到民族权利会受损害。

用“集体农庄庄员”,或用“社会主义农业劳动者”来代替“农”字,同样是不正确的。第一,在农民中,除了集体农庄庄员,还有一百多万非集体农庄庄员的农户。怎样处理他们呢?提出这个修改意见的人,是不是想把他们去掉不算呢?如果这样,那就不合理了。第二,虽然大多数农民已经经营集体农庄经济,但这还不是说他们已经不是农民,他们已经没有个人经济,个人的园地等等了。第三,如果这样,那就也要用“社会主义工业劳动者”来代替“工”字了,但是,提出这个修改意见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提议这样做。最后,难道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已经消失了吗?如果他们还没有消失,那是不是应当把他们的固定名称从词典中删去呢?提出这个修改意见的人,大概不是指现在的社会,而是指将来的社会,指将来已经没有阶级,而工人和农民都变成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者的社会。所以,他们显然是跑到前面去了。可是,在制定宪法时,不应当从将来出发,而应从现在、从已有的事实出发。

极少而军队不大的一个小苏维埃共和国，能够指望维持独立国的生存，那就不正确了。毫无疑问，帝国主义强盗会立即把它抓到手的。

我认为，没有这三个客观标志，在目前的历史时期提出把某个自治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的问题，是不正确的。

(4)再其次，有人提议，把第22、23、24、25、26、27、28、29等条内关于各加盟共和国所属各边疆区和各州行政区域划分的详细记载删去。我认为这个提议也是不能采纳的。在苏联有些人非常喜欢不厌其烦地改变各边疆区和各州的界线，以致在工作中造成混乱和缺乏信心。宪法草案正是要给这些人一个限制。这是很好的，因为在这方面，也象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我们要有自信的气氛，要有稳定性、明确性。

(5)第五个修改意见是关于第33条的。提意见的人认为建立两院制是不适当的，提议取消民族院。我认为这个意见也是不正确的。如果苏联是一个单民族的国家，那么一院制会比两院制好。但是苏联不是单民族的国家。大家知道，苏联是多民族的国家。我们有一个不分民族而代表苏联一切劳动者共同利益的最高机关。这就是联盟院。可是，苏联各民族除了共同利益以外，还有与民族特点有关的各自特有的特别利益。可以忽视这些特别利益吗？不可以。是不是需要一个正是反映这些特别利益的专门最高机关呢？绝对需要。无疑，没有这样一个机关，就无法管理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样的机关就是第二院，即苏联民族院。

有人援引欧美各国议会史中的事实，说两院制在这些国家里只有坏处，第二院一般都成了反动的中心，成了前进的障碍。所有这一切都是对的。可是，这些现象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些国家里的

极少而军队不大的一个小苏维埃共和国，能够指望维持独立国的生存，那就不正确了。毫无疑问，帝国主义强盗会立即把它抓到手的。

我认为，没有这三个客观标志，在目前的历史时期提出把某个自治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的问题，是不正确的。

(4)再其次，有人提议，把第22、23、24、25、26、27、28、29等条内关于各加盟共和国所属各边疆区和各州行政区域划分的详细记载删去。我认为这个提议也是不能采纳的。在苏联有些人非常喜欢不厌其烦地改变各边疆区和各州的界线，以致在工作中造成混乱和缺乏信心。宪法草案正是要给这些人一个限制。这是很好的，因为在这方面，也象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我们要有自信的气氛，要有稳定性、明确性。

(5)第五个修改意见是关于第33条的。提意见的人认为建立两院制是不适当的，提议取消民族院。我认为这个意见也是不正确的。如果苏联是一个单民族的国家，那么一院制会比两院制好。但是苏联不是单民族的国家。大家知道，苏联是多民族的国家。我们有一个不分民族而代表苏联一切劳动者共同利益的最高机关。这就是联盟院。可是，苏联各民族除了共同利益以外，还有与民族特点有关的各自特有的特别利益。可以忽视这些特别利益吗？不可以。是不是需要一个正是反映这些特别利益的专门最高机关呢？绝对需要。无疑，没有这样一个机关，就无法管理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样的机关就是第二院，即苏联民族院。

有人援引欧美各国议会史中的事实，说两院制在这些国家里只有坏处，第二院一般都成了反动的中心，成了前进的障碍。所有这一切都是对的。可是，这些现象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些国家里的

极少而军队不大的一个小苏维埃共和国，能够指望维持独立国的生存，那就不正确了。毫无疑问，帝国主义强盗会立即把它抓到手的。

我认为，没有这三个客观标志，在目前的历史时期提出把某个自治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的问题，是不正确的。

(4)再其次，有人提议，把第22、23、24、25、26、27、28、29等条内关于各加盟共和国所属各边疆区和各州行政区域划分的详细记载删去。我认为这个提议也是不能采纳的。在苏联有些人非常喜欢不厌其烦地改变各边疆区和各州的界线，以致在工作中造成混乱和缺乏信心。宪法草案正是要给这些人一个限制。这是很好的，因为在这方面，也象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我们要有自信的气氛，要有稳定性、明确性。

(5)第五个修改意见是关于第33条的。提意见的人认为建立两院制是不适当的，提议取消民族院。我认为这个意见也是不正确的。如果苏联是一个单民族的国家，那么一院制会比两院制好。但是苏联不是单民族的国家。大家知道，苏联是多民族的国家。我们有一个不分民族而代表苏联一切劳动者共同利益的最高机关。这就是联盟院。可是，苏联各民族除了共同利益以外，还有与民族特点有关的各自特有的特别利益。可以忽视这些特别利益吗？不可以。是不是需要一个正是反映这些特别利益的专门最高机关呢？绝对需要。无疑，没有这样一个机关，就无法管理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样的机关就是第二院，即苏联民族院。

有人援引欧美各国议会史中的事实，说两院制在这些国家里只有坏处，第二院一般都成了反动的中心，成了前进的障碍。所有这一切都是对的。可是，这些现象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些国家里的

两院是不平等的。大家知道,第二院往往比第一院有更多的权利,而且第二院照例不是通过民主方式成立的,往往是用上面指定议员的方式成立的。毫无疑问,如果两院平等,第二院也象第一院那样用民主方式成立,就不会有这种坏处。

(6)其次,有人对宪法草案提出补充,要求两院代表名额相等。我认为这个提议是可以采纳的。据我看来,这个提议有明显的政治上的好处,因为它强调两院的平等。

(7)再其次,有人对宪法草案提出补充,说民族院代表也应当象联盟院代表一样由直接选举产生。我认为这个提议也是可以采纳的。固然,这会在选举方面造成某些技术上的不便。可是,这在政治上有很大的益处,因为它一定会提高民族院的威信。

(8)再其次,是对第40条的补充,说应当赋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以颁布临时立法文件的权利。我认为这个补充是不正确的,是代表大会不应当采纳的。终究必须铲除不由某一个机关而由许多机关立法的情形了。这种情形同法律稳定性的原则相抵触。而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法律的稳定性。立法权在苏联只应当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一个机关来行使。

(9)再其次,是对宪法草案第48条的补充,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不由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而由全国人民选举。我认为这个补充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不符合我国宪法的精神。根据我国的宪法制度,在苏联不应当有和最高苏维埃同等地由全国人民选举而能和最高苏维埃对立的个人总统。苏联的总统是集体的——这就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包括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在内,这个主席团不是由全国人民,而是由最高苏维埃选举,并应向最高苏维埃报告工作。历史经验表明,建立最高机关的这种办法,

是最民主的,能够保障国家免于各种意外事故。

(10)再其次,是对同一条,即第48条的修改意见。主张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增加到11人,使每个加盟共和国有一个副主席^①。我认为这个意见可以采纳,因为这会改善我们的事业,而且只会巩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威信。

(11)再其次,是对第77条的修改意见。要求成立一个新的全苏人民委员部——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我认为这个意见也应当采纳,因为把我国国防工业特别分出来,给它正式建立一个相当的人民委员部的时机已经成熟。我觉得这只会改善我国的国防事业。

(12)再其次,是对宪法草案第124条的修改意见。要求根据禁止举行宗教仪式的方针来修改这条宪法。我认为这个意见应当否定,因为它不符合我国宪法的精神。

(13)最后,还有一个比较实质性的修改意见。我说的是对宪法草案第135条的修改意见。这个意见主张剥夺神职人员、过去的白卫分子、所有从前的显赫人物和不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劳动的人的选举权,或者,无论如何应当限制这种人的选举权,只给他们选举权而不给他们被选举权。我认为这种意见也应当否定。苏维埃政权从前剥夺不劳动者和剥削者的选举权,不是永久的,而是暂时的,有一定期限的。有一个时候,这些人进行反对人民的公开战争,反抗苏维埃法律。关于剥夺他们选举权的苏维埃法律,是苏维埃政权对他们这种反抗的回答。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不少时间了。在过去这一时期中,我们已经把剥削阶级消灭,而苏维埃政权已经

^① 这里指的11个加盟共和国是: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土库曼、柯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编者注

变成不可战胜的力量了。修改这种法律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到了呢？我认为已经到了。有人说这有危险，因为那些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某些过去的白卫分子、富农、神父等等，会钻进国家最高机关里来。但这里究竟有什么可怕呢？你怕狼，那你就不要到树林里去。第一，并不是所有从前的富农、白卫分子或神父都敌视苏维埃政权。第二，如果在某些地方人民竟会选举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那就证明我们的鼓动工作做得太坏，我们就理应受到这种耻辱；如果我们的鼓动工作真是按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去进行的，那人民就决不会容许这些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混进自己的最高机关。这就是说，应当做工作，而不应当叫苦，应当做工作，而不应当等待用行政命令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列宁在 1919 年就说过，苏维埃政权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认为实行没有任何限制的普遍选举权是有益的。请你们注意：**没有任何限制**。他说这话的时候，外国武装干涉还没有消灭，我国工业和农业还处在极坏的状态。从那时起，已经过去 17 年了。同志们，难道还没有到实行列宁这一指示的时候吗？我认为已经到了。

请看列宁在 1919 年写的《俄共（布）党纲草案》中是怎样说的。让我来读一下：

“为了避免对暂时的历史必要性做不正确的概括，俄共应当向劳动群众说明，在苏维埃共和国内有一部分公民被剥夺选举权，但这决不是那类在大多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内终身被宣布为无权的公民，而只是剥削者，只是那些违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根本法、顽强地维护自己的剥削地位并保持资本主义关系的人。因此，在苏维埃共和国内，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一天天地巩固，随着那些客观上有可能继续做剥削者或保持资本主义关系的人的数目日益减少，被剥夺选举权的人所占的百分比自然也会减少。在俄国现时，这个比例未必超过百分之二、三。另一方面，在最近的将来，外国侵略的

停止和剥夺者的完全被剥夺，在一定的条件下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会选择另外的方式来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并实行**没有任何限制**①的普遍选举权。”(《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94页)②

看来是很清楚了。

对苏联宪法草案提出的修改和补充意见就是如此。

六

苏联新宪法的意义

从进行了差不多5个月的全民讨论的结果来看，可以预料宪法草案是一定会被这次代表大会批准的。

再过几天，苏联就会有以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新的社会主义的宪法了。

这将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用简单明了的语句，几乎是用记录的体裁，说明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的事实，说明苏联劳动者摆脱资本主义奴役的事实，和广泛的最彻底的民主在苏联胜利的事实。

这个文件证明，资本主义国家里千百万诚实的人过去和现在所渴望的东西，已经在苏联实现了。

这个文件证明，在苏联已经实现的东西，在其他国家里也完全可能实现。

由此可见，苏联新宪法的国际意义是怎样估计也不算过高的。

现在，法西斯主义浊流污辱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玷污

①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58页。——编者注

了文明世界优秀人物的民主要求，苏联新宪法将成为对法西斯主义的控诉书，说明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战胜的。苏联新宪法对于所有目前进行反法西斯暴行的斗争的人，将是一种道义上的支持和实际上的援助。

苏联新宪法对于苏联各族人民有更大的意义。苏联宪法对资本主义各国人民来说具有行动纲领的意义，而对于苏联各族人民，却是他们斗争的总结，是他们在为人类解放而斗争的战线上胜利的总结。走过了艰难和斗争的道路，现在得到了这一个说明我们胜利果实的宪法，我们是多么高兴啊。知道了我国人民究竟是为了什么而进行了斗争，他们是怎样取得了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我们是多么高兴啊。知道了我国人民的大量鲜血没有白流，而是产生了应有的结果，我们是多么高兴啊。这就会在精神上武装我国工人阶级，我国农民，我国劳动知识分子。这就会推动他们前进，激发他们的理所当然的自豪感。这就会加强他们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动员他们去进行新的斗争，争取共产主义的新胜利。

译自《列宁主义问题》第 11 版
第 545—573 页

*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 审定委员会的报告^①

(1936年12月5日)

同志们! 审定委员会的工作已经结束。由于审定委员会的工作, 宪法最终稿的草案已经产生。这个草案已经分发给代表大会所有成员。所以, 全体代表已经了解这个草案了。

从草案可以看出, 审定委员会一共作了 43 处修改。这些修改涉及宪法草案里的 32 条, 对它们作了这样那样的改动。草案里的其余 114 条没有改动。

可以认为, 43 处修改中, 有六七处是多少带有实质性的修改。这是些什么修改呢?

第一, 是对第 8 条的修改。宪法草案中这一条的条文是:

“集体农庄占用的土地固定给集体农庄无限期地使用, 即永远固定给集体农庄使用。”

本条新的条文改为:

“集体农庄占用的土地固定给集体农庄**无代价**和无限期地使用, 即永远固定给集体农庄使用。”

① 斯大林是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审定委员会主席。——编者注

我认为,这一处修改很清楚,用不着解释。

第二处修改涉及宪法草案第 10 条。这一条旧的条文是:

“公民对其劳动收入、储蓄、住宅、家庭副业、家庭用具和日常用品以及个人消费品和舒适品的个人所有,都受法律的保护。”

第 10 条新的条文是:

“公民对其劳动收入、储蓄、住宅、家庭副业、家庭用具和日常用品、个人消费品和舒适品的个人所有权以及公民个人财产的继承权,都受法律的保护。”

这一处修改很清楚,我觉得用不着作特别的解释。

第三处修改涉及第 35 条。本条旧的条文是:

“民族院由加盟共和国与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自治州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推举的代表组成: 每一个加盟共和国推举 10 名, 每一个自治共和国推举 5 名, 每一个自治州推举 2 名。”

本条新条文是:

“民族院由苏联公民按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专区依下列名额选举: 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选举代表 25 名, 每一个自治共和国选举代表 11 名, 每一个自治州选举代表 5 名, 每一个民族专区选举代表 1 名。”

这样, 在本条中, 两院无论从它们的代表名额, 还是从它们产生的民主性质来说, 都完全保持了平等。

第四处修改涉及第 40 条。本条旧的条文是: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法律经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秘书签字后公布。”

本条新的条文是: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法律经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和秘书签字后,用各加盟共和国的文字公布。”

这一处修改很好懂,我看也用不着解释。

这样,法律将用 11 种文字公布。

第五处修改涉及第 48 条,按照旧的条文,最高苏维埃副主席为 4 人,而按照新的条文,副主席依照加盟共和国的数目为 11 人。

第六处修改涉及第 77 条。这个修改是:除现有的各个全苏人民委员部外,再成立一个新的人民委员部,即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这个修改也用不着解释。

最后,第七处修改,涉及第 49 条第 11 款。旧的条文是:

“主席团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如果遇到苏联遭受武装侵犯的情况,宣布战争状态。”

新条文是:

“主席团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如果遇到苏联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义务的情况,宣布战争状态。”

至于其余的修改,它们都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只是纯粹文字上的修改,我认为用不着再作专门的分析。

总的结论,从苏联宪法的起草到最后润色,全民讨论无疑带来巨大的好处。

译自 1936 年 12 月 6 日《真理报》

*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信^①

卡瓦列罗同志：

我们的全权代表罗森贝格同志向我们转达了您的友好致意。他还告诉我们，您一直充满着胜利的信心。请允许我们对您的致意表示兄弟的感谢并向您表明，我们和您一样确信西班牙人民一定会胜利。

我们一贯认为，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西班牙政府是我们的义务，因为西班牙政府领导着全体劳动者、所有西班牙民主力量进行反对国际法西斯势力的走狗——法西斯军事匪帮的斗争。

西班牙革命正为自己开辟一条和俄国走过的道路在许多方面不相同的道路。这是由不同的社会、历史和地理方面的前提条件所决定的，是由不同于俄国革命所遇到的国际形势的要求所决定的。比起俄国来，议会道路在西班牙很可能成为革命发展的更加有效的手段。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我们的经验，特别是我国国内战争的经

① 弗·拉尔戈·卡瓦列罗，1918—1937年任西班牙工人总联合会总书记，1932—1935年任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主席，1936年9月—1937年5月任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的总理和陆军部长。据《西班牙的战争与革命（1936—1939）》一书说，该书引用的这封信系录自苏联国家档案。——编者注

验,如果适当地应用于西班牙革命斗争的特殊条件,对西班牙可能具有一定的意义。从这点出发,我们根据罗森贝格同志及时转达的您的一再请求,同意派一些军事工作人员由您使用。这些工作人员已得到我们的指示:他们应照您的通知去帮助西班牙的军事长官,向他们提供军事方面的建议。

他们已受到断然的告诫:在充分意识到现在西班牙人民和苏联各族人民充满着团结情谊的同时,切不可忘记,苏联工作人员在西班牙是外国人,只有在严格遵守顾问的工作范围,并且仅仅是顾问的工作范围的情况下,才能带来实际的好处。

我们认为,您会这样来使用我们的军人同志的。

我们请求您友好地通知我们,您交给我们的军人同志的任务,他们完成得如何,因为很自然,只有您方认为他们的工作是有用的,他们继续留在西班牙工作才是适宜的。

我们也请求您直率地告诉我们您对罗森贝格的意见:西班牙政府对他是否满意,要不要派别的代表去替换他。

我们提出四项友好的建议供您考虑:

(1)应该注意农民,他们在西班牙这样的农业国是举足轻重的,希望能颁布适应农民利益的土地和税收法令。还应该吸引农民参加军队,或在法西斯军队的后方组织农民游击队。颁布对农民有利的法令可以使这一问题容易得到解决。

(2)应该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到政府方面来,或者至少使他们能够采取有利于政府的中立立场,要保护他们免遭没收,并尽可能保证贸易自由。否则这些人就会追随法西斯分子。

(3)不应该把共和党的领导人推开,相反地,应该争取他们,

亲近他们，使他们和政府齐心协力。特别需要保证阿萨尼亚^①及其集团对政府的支持，尽可能帮助他们不再摇摆。之所以需要这样，是为了避免西班牙的敌人把共和国看作共产主义的共和国，从而防止他们进行对共和西班牙最危险的公开干涉。

(4)可以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在报刊上声明，西班牙政府不容许任何人侵犯在西班牙的外国人，即那些不支持叛乱分子的国家
的公民的财产和合法利益。 顺致

兄弟般的敬礼

斯大林

莫洛托夫

伏罗希洛夫

1936年12月21日

译自《西班牙的战争与革命(1936—1939)》1968年莫斯科版第1卷
第419—420页

① 曼·阿萨尼亚，1931—1933年先后任西班牙共和国陆军部长和总理，1934年4月领导左翼共和党，1936年2月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后任政府总理，1936年5月—1939年任共和国总统。——编者注

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 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

(1937年3月3—5日在联共(布)
中央全会^①上的报告和结束语)

同志们!

从全会上的一些报告和对这些报告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我们这里遇到的是下面三个基本事实。

第一,在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中,无论在经济组织或在行政组织和党的组织中,都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在其中托洛茨基分子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第二,外国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不仅打入了我们的基层组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

第三,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无论中央的或地方的,不仅不善看清这些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的真面目,而且表现得这样麻痹大意、温厚宽容和天真幼稚,以致往往自己就帮助外国代理人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

^① 这次联共(布)中央全会于1937年2月23日—3月5日举行,讨论了党组织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中的任务问题、经济建设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并决定把尼·伊·布哈林和阿·伊·李可夫开除出党。——编者注

这就是从全会上的一些报告和对这些报告的讨论中，自然而然得出的三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

政治上的麻痹大意

我们的领导同志，具有同各种反党反苏维埃的派别作斗争的丰富经验，但是在这种场合下却表现得如此幼稚和盲目，不善于看清人民的敌人的真面目，不善于识别披着羊皮的豺狼，不善于扯下敌人的假面具，这是什么原因呢？

能不能断言，在苏联境内活动的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对我们说来可能是什么意外的、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呢？不，不能这样断言。最近10年来，从沙赫特事件时期起，有正式文件记载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暗害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能不能断言，我们最近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代理人的暗害、间谍或恐怖活动，没有发出过什么预防信号和警告指示呢？不，不能这样断言。这样的信号是发出过的，布尔什维克没有权利忘记它。

基洛夫同志惨遭暗杀，就是第一个严重警告，说明人民的敌人将玩弄两面手法，他们在玩弄两面手法时将伪装成布尔什维克，伪装成党员，以便骗取信任和打入我们的组织。

“列宁格勒总部”审判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审判案也一样，对于从基洛夫同志惨遭暗杀的事实中所得出的教训，又提供了新的根据。

“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联盟”审判案，扩大了前几次审判案

的教训,非常清楚地表明,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把一切敌对的资产阶级分子纠集在自己的周围,他们变成了德国警察暗探局进行间谍、破坏和恐怖活动的代理人,两面手法和伪装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潜入我们组织的唯一手段,警惕性和政治洞察力则是防止这种潜入和消灭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匪帮的最可靠的手段。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1935年1月18日发出的关于基洛夫同志惨遭暗杀的秘密信中,曾坚决地警告过党组织要防止政治上的温厚宽容和庸俗的粗心大意。在这封秘密信中说:

“必须肃清机会主义的温厚宽容,这种态度是从这样的错误假定出发的: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敌人似乎会变得愈来愈驯服和不伤害人。这种假定是根本错误的。它是右倾的死灰复燃,这种右倾硬要大家相信,敌人将悄悄地爬进社会主义并且最后会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不应当高枕无忧和粗心大意。我们需要的不是温厚宽容,而是警惕性,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必须记住,敌人的处境愈是绝望,他们就愈要抓住‘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垂死挣扎的唯一手段。必须记住这一点,必须保持警惕。”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1936年7月29日发出的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间谍恐怖活动的秘密信中,再一次号召党组织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管敌人伪装得如何巧妙,都要善于识别人民的敌人。在这封秘密信中说:

“现在已经证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恶魔在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把我国劳动者的一切最凶恶的不共戴天的敌人——间谍、内奸、破坏分子、自卫分子、富农等等——都纠集在一起;这些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两者之间已没有任何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切党组织、全体党员都应当了解,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必须保持警惕性。在目前条件下,每一个布

尔什维克必须具备的品质就是，要善于识别党的敌人，不管他们伪装得如何巧妙。”

这就是说，信号和警告都曾经发出过。

这些信号和警告号召什么呢？

它们号召克服党的组织工作的弱点，把党变成任何一个两面派分子都钻不进去的坚固堡垒。

它们号召克服掉不重视党的政治工作的态度，坚决扭转过来，大力加强这一工作，加强政治警惕性。

结果怎样呢？事实表明，我们的同志对信号和警告接受得太迟钝了。

审查和换发党证运动中尽人皆知的全部事实，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些警告和信号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其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党的同志，尽管他们具有同反苏维埃分子作斗争的经验，尽管发出过一系列的预防信号和警告指示，可是对于人民的敌人的暗害、间谍和破坏活动仍然表现得政治上眼光短浅，其原因是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党的同志变得比以前坏了，变得觉悟性和纪律性都比以前差了呢？不，当然不是！

是不是他们开始蜕化了呢？也不是。这样的假定都是毫无根据的。

那么，问题在什么地方呢？这种粗心疏忽、麻痹大意、温厚宽容、盲目无知，是从哪里来的呢？

问题在于，我们党的同志，陶醉于经济运动和经济建设战线上的巨大成绩，简直忘记了布尔什维克没有权利忘记的一些很重要

的事实。他们忘记了苏联的国际环境方面的一个基本事实，看不见同以党证作掩护并伪装成布尔什维克的现在一些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直接有关的两个很重要的事实。

二

资本主义包围

我们党的同志忘记的或者简直看不见的事实是什么呢？

他们忘记了，苏维埃政权只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获得了胜利，而其余六分之五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地。他们忘记了，苏联是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中。我们这里有人常谈资本主义包围，但是不愿想一想资本主义包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资本主义包围，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一个很现实而又令人很不愉快的现象。资本主义包围，这就是说，有一个国家即苏联，在自己境内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此外还有许多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继续推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并包围苏联，等待时机来进攻它，粉碎它，或者至少破坏它的实力和削弱它。

我们的同志忘记了这一基本事实。要知道正是这个事实，决定着资本主义包围同苏联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

例如拿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幼稚的人可能认为，在资产阶级国家之间，在这些同一类型的国家之间，存在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但是只有幼稚的人才会这样认为。其实，它们之间的关系离睦邻关系远得很。事实就象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清楚地证明，资产阶级国家互相派遣自己的间谍、暗害分子、破坏分子，有时甚至派遣杀人凶手到彼此的后方，给他们的任务是混进这些国家的机关和企

业,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网,“必要时”破坏这些国家的后方,以便削弱这些国家和破坏它们的实力。现在的情况是如此。过去的情况也是如此。就以拿破仑第一时代的欧洲国家为例。法国当时布满了从俄国人、德意志人、奥地利人、英国人的阵营派来的间谍和破坏分子。反过来说,英国、德意志各邦、奥地利和俄国在各自的后方,也有为数不少的来自法国阵营的间谍和破坏分子。英国间谍曾两次谋刺拿破仑,几次策动法国旺代省的农民反对拿破仑政府。而拿破仑政府是怎样一个政府呢?是资产阶级政府,它扑灭了法国革命,而仅仅保存了那些有利于大资产阶级的革命果实。不用说,拿破仑政府对自己的邻邦是以牙还牙的,同样采用了派遣自己的破坏分子的办法。过去,在130年以前,情况是如此。现在,在拿破仑第一之后过了130年,情况也是如此。现在,法国和英国布满了德国的间谍和破坏分子,反过来说,德国也布满了英国和法国的间谍和破坏分子。美国布满了日本的间谍和破坏分子,而日本也布满了美国的间谍和破坏分子。

这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

试问,为什么资产阶级国家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应当比它们对自己同类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更温和,更友好呢?为什么这些国家向苏联后方派遣间谍、暗害分子、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比它们向自己同类的资产阶级国家后方派遣的人数应当少些呢?你们这个看法是从哪里来的呢?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资产阶级国家向苏联后方派遣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比它们向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后方派遣的人数应当多一两倍,这样设想不是更正确些吗?

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我们这里就会有外国代理人派遣

到我们后方的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我们党的同志把这一切都忘记了，由于忘记了，所以就遭到了突然的袭击。

正因为如此，日德警察暗探局的托洛茨基代理人的间谍和破坏活动，对于我们某些同志说来，就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了。

三

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

其次，我们党的同志在同托洛茨基代理人进行斗争时，看不见和没有注意到：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已经不象以前的，比如说，7—8年以前的托洛茨基主义了；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分子在这一时期有了重大的演变，这个演变根本改变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面貌；因此，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方法，也应当根本改变。我们党的同志看不见：托洛茨基主义不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了；托洛茨基主义在7—8年前曾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现在它已经从这样的政治派别，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谍报机关交给的任务进行活动的。

什么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呢？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就是这样的—一个集团或政党，它有一定自己的政治面貌、政纲和纲领，在工人阶级面前它不隐瞒，也不能隐瞒自己的观点，相反地，它在工人阶级面前公开而诚实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它不怕向工人阶级表明自己的政治面目，不怕在工人阶级面前宣布自己的真正目

的和任务，相反地，它正大光明地到工人阶级中间去，以便说服他们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过去，在7—8年以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治派别之一，固然，它是反列宁主义的，因此也是极端错误的政治派别，但是它总还算是一个政治派别。

能不能说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比如说，1936年的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的一个政治派别呢？不，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的托洛茨基分子，害怕向工人阶级表明自己的真正面目，害怕向工人阶级公开自己的真正目的和任务，在工人阶级面前力图隐瞒自己的政治面貌，担心工人阶级一旦知道他们的真正意图，就会骂他们是异己分子，把他们赶走。正是因此，现在托洛茨基分子活动的基本方法，不是公开而诚实地在工人阶级中间宣传自己的观点，而是掩饰自己的观点，卑躬屈节和阿谀逢迎地颂扬自己敌人的观点，假仁假义和口是心非地诋毁他们自己的观点。

如果回想一下，在1936年的审判案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曾经坚决否认他们有什么政纲。当时他们完全有可能在审判案中陈述自己的政纲。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声明他们没有任何政纲。毫无疑问，他们两人否认他们有政纲是扯谎。现在连瞎子都看出，他们是有自己的政纲的。但是，为什么他们要否认他们有任何政纲呢？因为他们害怕公开自己的真实的政治面目，他们害怕宣布自己的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真正政纲，担心这种政纲会受到工人阶级的唾弃。

在1937年的审判案中，皮达可夫、拉狄克和索柯里尼柯夫却走了另一条路。他们不否认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有政纲。他们承认他们有一定的政纲，他们在自己的供词中供认了并陈述了这个政纲。可是他们陈述这个政纲，不是为了号召工人阶

级,号召人民支持托洛茨基的政纲,而是为了咒骂它是反人民和反无产阶级的政纲。使资本主义复辟,消灭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恢复剥削制度,为加速反苏战争爆发而同德日法西斯势力结成联盟,为发动战争和反对和平政策而斗争,分割苏联的领土,把乌克兰割让给德国人而把滨海地区割让给日本人,准备使苏联在敌国侵犯时遭到军事失败,以及为了完成这些任务而采用的手段即进行暗害、破坏活动,对苏维埃政权领导者分别实行恐怖手段,替日德法西斯势力进行间谍活动,——这就是皮达可夫、拉狄克和索柯里尼柯夫所陈述的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纲。显然,托洛茨基分子不能不向人民、向工人阶级隐瞒这样的政纲。他们不仅向工人阶级,而且向托洛茨基派群众,不仅向托洛茨基派群众,甚至向总共只有 30—40 人组成的托洛茨基派上层领导隐瞒这个政纲。当拉狄克和皮达可夫要求托洛茨基允许他们召集 30—40 人组成的托洛茨基分子小型代表会议来传达这个政纲的性质时,托洛茨基禁止他们这样做,说即使把这个政纲的真正性质只告诉极少数托洛茨基分子也是不妥当的,因为这种“做法”可能引起分裂。

这些“政治活动家”,不仅向工人阶级,而且向托洛茨基派群众,不仅向托洛茨基派群众,而且向托洛茨基派上层领导隐瞒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政纲,——这就是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面貌。

但是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已经不能叫作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了。

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暗害分子、破坏分子、特务、间谍、杀人凶手组成的一伙无原则和无思想的匪帮,是受外国谍报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的死敌组成的一伙匪帮。

这就是最近 7—8 年来托洛茨基主义演变的无可争辩的结果。

这就是过去的托洛茨基主义和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区别。

我们党的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看不见过去的托洛茨基主义和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这个深刻的区别。他们看不见，托洛茨基分子早已不是有思想的人了，托洛茨基分子早已变成了拦路抢劫的强盗，只要能向苏维埃国家和苏维埃政权捣乱，他们可以采用任何卑鄙手段，干出一切下流勾当，直到搞间谍活动和直接背叛自己的祖国。我们党的同志看不见这一点，因此就不善于及时地改造自己的工作，以使用新的方法更加坚决地同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

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分子近几年来下的流勾当，对我们党的某些同志说来就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了。

还有，最后，我们党的同志看不见，法西斯主义的托洛茨基代理人在其中起着相当积极作用的现在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同沙赫特事件时期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之间，是有重大区别的。

第一，沙赫特分子和工业党人是公开的异己分子。他们大部分是过去的企业主、过去替旧主人服务的经理、过去的老股份公司的股东，或者单单是在政治上公开同我们为敌的旧资产阶级专家。我们的人，谁也不怀疑这些老爷们真正的政治面目。就是沙赫特分子自己，也并不隐瞒他们对苏维埃制度的仇视态度。对于现在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对于托洛茨基分子，就不能这样说了。现在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大部分都是党员，衣袋里装着党证，所以这些人表面上看来并不是异己分子。如果说旧的暗害分子公开反对我们，那么，相反地，新的暗害分子则是向我们

的人献媚,夸奖我们的人,拍他们的马屁,以便骗取信任。你们看,这就是重大的区别。

第二,沙赫特分子和工业党人的力量,在于他们多少掌握了必要的技术知识,当时我们的人还没有这样的知识,不得不向他们学习。这种情况给了沙赫特事件时期的暗害分子以极大的优越条件,使他们有可能为所欲为地、毫无阻碍地进行暗害活动,使他们有可能在技术上欺骗我们的人。现在的暗害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就不同了。现在的暗害分子,在技术上并不比我们的人有任何优越的地方。相反地,我们的人在技术上比现在的暗害分子,比托洛茨基分子受过较高的训练。从沙赫特事件到今天,我们这里成长了几万名真正受过技术锻炼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可以举出几千几万名在技术上成熟的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来。同他们比起来,所有这些皮达可夫们和利夫希茨们、舍斯托夫们和博古斯拉夫斯基们、穆拉洛夫们和德罗布尼斯们,都是一群夸夸其谈的人,从技术素养来看不过是一些初学之辈。既然如此,现代的暗害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的力量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他们的力量就在于党证,在于有党证。他们的力量就在于,党证给了他们政治上的信任,给他们打开了混进我们所有的机关和组织的门径。他们的优越条件就在于,他们有党证,伪装作苏维埃政权的朋友,在政治上欺骗我们的人,滥用信任,偷偷地进行暗害活动,把我们的国家的机密泄露给苏联的敌人。这种“优越条件”就其政治价值和道德价值来说是可疑的,但是总算是“优越条件”。这种“优越条件”的确说明了这样一个情况,即托洛茨基的暗害分子,由于是有党证的人,有混进我们机关和组织的一切岗位的门径,所以就成了外国谍报机关的至宝。

我们党的一些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看不见,不了解旧的暗

害分子和新的暗害分子之间、沙赫特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之间的全部区别，由于看不见这一点，也就不能及时地改造自己的工作，以使用新的方法同新的暗害分子作斗争。

四

经济胜利的阴暗面

这就是我们党的许多同志忘记了或看不见的我们国内外环境中的一些基本事实。

这就是我们的人对近几年来发生的暗害和破坏活动的事件感到意外的原因。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的人看不见这一切，为什么他们忘记了这一切呢？

所有这些健忘、盲目、麻痹大意、温厚宽容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是不是我们的人在工作中的先天缺陷呢？

不，这不是先天缺陷。这是暂时的现象，只要我们的人作一些努力，就能迅速加以克服。

那么，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问题在于，我们党的同志近几年来完全埋头于经济工作，他们十分陶醉于经济上的胜利，由于陶醉于这一切事情，就忘记了其他一切事情，把其余的都丢掉了。

问题在于，他们陶醉于经济上的胜利，就以为这个工作包括了一切，而对于象苏联的国际环境、资本主义包围、加强党的政治工作、同暗害活动斗争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根本不注意了，认为这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或者甚至是更次要的事情。

胜利和成绩，当然是伟大的事情。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胜利的确是巨大的。然而，胜利也象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有其阴暗面。大的胜利和大的成绩，往往使政治经验少的人产生麻痹大意、温厚宽容、自满、过分自信、自高自大和浮夸的毛病。你们不能否认，近几年来，浮夸分子在我们这里多得数不胜数。用不着奇怪，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获得了巨大而重要的胜利的情况下，会产生浮夸情绪、夸耀我们的成就的情绪，会产生低估我们敌人力量的情绪、高估自己力量的情绪，由于这一切，就出现了政治上的盲目。

在这里，对于因胜利而产生的危险，因成绩而产生的危险，我应当讲几句话。

因困难而产生的危险，我们凭经验是知道的。我们同这种危险已经进行了几年的斗争，应当说，不是没有成绩的。因困难而产生的危险，往往使不坚定的人产生灰心丧气、不相信自己力量的情绪、悲观主义的情绪。相反地，哪里克服了因困难而产生的危险，那里的人们就会在这个斗争中受到锻炼，从斗争中成长为真正坚强的布尔什维克。这就是因困难而产生的危险的性质。这就是克服困难的結果。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危险，因胜利而产生的危险，因成绩而产生的危险。是的，是的，同志们，是因胜利和成绩而产生的危险。这种危险在于，节节胜利，步步成功，一再超额完成计划的胜利环境，会使政治经验少和见识不很多的人产生麻痹大意和自满情绪，会造成一种使人不知分寸和政治嗅觉迟钝而一味庆祝胜利、互相祝贺的气氛，会使人们松劲，使他们高枕无忧。

在这种令人昏眩的自高自大和自满的气氛里，在这种大肆夸

耀和自吹自擂的气氛里，人们往往忘记了对我国命运具有头等意义的一些重大事实，人们开始看不见象资本主义包围、新形式的暗害活动、因我们的胜利而产生的危险等等这样一些不愉快的事实，这是毫不奇怪的。资本主义包围？这是胡说八道！既然我们完成和超额完成了我们的经济计划，所谓资本主义包围又能有什么意义呢？新形式的暗害活动，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这全是区区小事！既然我们完成和超额完成了我们的经济计划，这一切小事又能有什么意义呢？党章，党的机关的选举制，党的领导者向党员群众报告工作的制度？这一切是不是需要呢？既然我们的经济在发展，工人和农民的物质生活日益改善，这些小事是不是值得过问呢？这全是区区小事！计划我们正在超额完成，我们的党并不坏，党中央也不坏，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有些古怪的人坐在莫斯科那里，坐在党中央那里，凭空想出来一些什么问题，谈论什么暗害活动，自己不睡觉，也不让别人睡觉……

你们看，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我们某些没有经验的同志，由于昏头昏脑地陶醉于经济上的胜利，竟多么容易而“简单地”得了政治盲目病。

因胜利、因成绩而产生的危险就在于此。

我们党的同志因陶醉于经济胜利，忘记了对于苏联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内外的事实，看不见包围着我国的一系列危险，其原因就在于此。

我们的麻痹大意、健忘、温厚宽容和政治上的盲目，其根源就在于此。

我们经济工作和党的工作缺点的根源就在于此。

五 我们的任务

怎样消灭我们工作中的这些缺点呢？

为此需要做些什么呢？

必须实行以下办法：

(1)首先必须把纠缠于这个或那个机关中的“日常事务”的我们的同志的注意力，转到国际和国内的重大政治问题上去。

(2)必须把我们党的政治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把党的干部、苏维埃干部和经济工作干部的政治教育和布尔什维克锻炼作为首要任务。

(3)必须向我们党的同志说明，经济胜利的意义不容争辩地是极其伟大的，我们今后仍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取得这种胜利，但是，经济胜利毕竟不能包括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事业。

必须说明，因经济胜利而产生的、表现为自满、麻痹大意、政治嗅觉迟钝的阴暗面，只有把经济胜利同党的建设和我们党展开的政治工作的胜利结合起来，才能消灭掉。

必须说明，经济胜利本身，它的巩固和持久，完完全全取决于党的组织工作和党的政治工作的胜利，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经济胜利就会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东西。

(4)必须记住而且时刻不要忘记，资本主义包围是决定苏联国际环境的基本事实。

要记住而且时刻不要忘记，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外国谍报机关就会向苏联后方派遣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恐怖分子。

要记住这一点，并同那些低估资本主义包围这一事实的意义以及低估暗害活动的力量和意义的同志们作斗争。

要向我们党的同志说明，任何经济胜利，不管这些胜利是多么伟大，都不能取消资本主义包围这一事实以及从这一事实产生的结果。

要采取必要的办法，使我们的同志，党的和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有可能认识外国谍报机关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的目的和任务、实行方法和技术。

(5) 必须向我们党的同志说明，托洛茨基分子是替外国谍报机关进行破坏、暗害和间谍活动的积极分子，他们早已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他们早已不再为任何一种同工人阶级利益相容的思想服务，他们变成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受外国谍报机关雇用的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

必须说明，在反对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现在需要的不是旧方法，不是辩论的方法，而是新方法，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

(6) 必须向我们党的同志说明，现时的暗害分子同沙赫特事件时期的暗害分子是有区别的。沙赫特事件时期的暗害分子，利用我们的人的技术落后，靠技术欺骗了我们的人，而现时的暗害分子则持有党证，利用我们的人在政治上的麻痹大意，靠对他们这些党员在政治上的信任，来欺骗我们的人。

必须以进行干部政治教育、精通布尔什维主义和铲除在政治上轻信态度的新口号，以完全适合目前时期的新口号，来补充适合沙赫特事件时期的掌握技术的旧口号。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不能在十来年前，在沙赫特事件时期，一

一下子提出两个口号，第一个口号是掌握技术，第二个口号是进行干部政治教育吗？不，不能。在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内不这样办事。在革命运动的转折关头，总是要提出一个基本口号作为中心环节，以便抓住这个环节，通过它拖出整个链条。列宁曾经这样教导我们：要找到我们工作链条中的基本环节，紧紧抓住和拖出这个环节，以便通过它拖出整个链条，向前迈进。革命运动的历史表明，这个策略是唯一正确的策略。在沙赫特事件时期，我们的人的弱点就是技术落后。当时我们的弱点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技术问题。至于我们对当时的暗害分子的政治态度，那是完全鲜明的，即布尔什维克对政治异己分子的态度。我们提出了掌握技术的口号并且在前一个时期培养了几万个以至几十万个有技术修养的布尔什维克干部，从而消灭了我们这种技术上的弱点。而现在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已经有了在技术上有修养的布尔什维克干部，现在充当暗害分子的已经不是公开的异己分子，不是比我们的人有任何技术上的优越条件的人，而是持有党证并享受党员一切权利的人。现在我们的人的弱点，不是技术上的落后，而是政治上的麻痹大意，是对偶然取得党证的人的盲目信任，是缺少对人的审查——不是根据政治宣言而是根据工作结果来审查。现在对我们说来，关键问题不是克服我们干部在技术上的落后，因为这基本上已经克服了，而是克服政治上的麻痹大意和对偶然取得党证的暗害分子在政治上的轻信态度。

这就是沙赫特事件时期为干部而斗争的关键问题和目前时期的关键问题的根本区别。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而且也不应当在十来年前一下子就提出两个口号，既提出掌握技术的口号又提出进行干部政治教育的

口号。

正因为如此,现在必须以精通布尔什维主义、进行干部政治教育和消灭我们在政治上的麻痹大意的新口号,来补充掌握技术的旧口号。

(7)必须粉碎和抛弃这种腐朽的理论:随着我们的每一进展,我们这里的阶级斗争似乎就会日益停息了,随着我们的胜利,阶级敌人似乎就会日益驯服了。

这不仅是腐朽的理论,而且也是危险的理论,因为它麻痹我们的人,把他们引入陷阱,而让阶级敌人能够重整旗鼓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相反地,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

应该注意到,在苏联已被击溃了的阶级残余并不是孤立的。他们得到我们苏联国外的敌人的直接支持。以为阶级斗争的范围只局限于苏联境内,这是错误的。如果阶级斗争的一端在苏联境内有所行动,那么它的另一端却延伸到包围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境内去了。关于这一点,被击溃了的阶级残余不会不知道。正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今后将继续进行垂死挣扎。

历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列宁主义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必须记住这一切,并经常保持警戒。

(8)必须粉碎和抛弃另一种腐朽的理论,说什么凡是不经常进行暗害活动而且有时还在工作中表现出一些成绩的人,似乎不可能是暗害分子。

这种怪论暴露出制造这种理论的人是幼稚的。任何一个暗害

分子,如果不想在最短期内被揭发出来,就不会时刻都进行暗害活动。相反地,真正的暗害分子,一定要在工作中时而又表现出成绩来,因为这是保存他这个暗害分子、骗取信任并继续进行暗害活动的唯一方法。

我想,这个问题很清楚,用不着再解释了。

(9)必须粉碎和抛弃第三种腐朽的理论,说什么经常完成经济计划,似乎就能使暗害活动及其结果化为乌有。

这类理论只可能有一个目的,就是使我们工作人员的本位主义自尊心感到满足,使他们安心,并削弱他们对暗害活动的斗争。

“经常完成我们的经济计划”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证明了我们的一切经济计划都定得太低,因为这些计划没有估计到我国国民经济内部蕴藏的巨大的后备和潜力。

第二,各人民委员部总的来说完成了经济计划,并不等于某些很重要的部门也完成了计划。相反地,事实表明,许多人民委员部虽然完成了甚至超额完成了年度经济计划,可是并没有经常完成国民经济中某些很重要的部门的计划。

第三,毫无疑问,如果暗害分子没有被揭发出来和驱逐出去,那么经济计划的完成就会坏得多,这一点是眼光短浅的制造上述理论的人应该记住的。

第四,暗害分子通常不是在和平时期而是在战争前夜或战争时期进行自己主要的暗害活动的。姑且假定我们被“经常完成经济计划”这种腐朽的理论弄得昏昏欲睡而不去触动暗害分子。制造这一腐朽理论的人是否设想过,如果我们让暗害分子以“经常完成经济计划”这种腐朽理论作护身符而留在我们国民经济内部,那么一旦发生战争,他们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多么大的危害。

“经常完成经济计划”的理论是有利于暗害分子的理论，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10)必须粉碎和抛弃第四种腐朽的理论，说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似乎是消灭暗害活动的基本手段。

杜撰出这种理论，是为了在侈谈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和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情况下，使暗害分子免受打击。

莫洛托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说明托洛茨基暗害分子和非托洛茨基暗害分子，在库兹巴斯和顿巴斯滥用我们一些在政治上麻痹大意的同志的信任，经常欺骗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捣他们的鬼，人为地制造一系列影响他们顺利工作的障碍，最终使他们的工作垮了台。例如，在顿巴斯，既然暗害分子在基本建设方面进行破坏，使速度落后的采煤准备工作同所有其他工作脱了节，那么单是一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能干出什么来呢？斯达汉诺夫运动本身，需要我们给以实际帮助，去反对暗害分子各色各样的阴谋诡计，以便把事业推向前进，并完成自己伟大的使命，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同暗害活动作斗争，为消灭暗害活动而斗争，制止暗害活动，是使斯达汉诺夫运动能够广泛展开的必要条件，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我想，这个问题也很清楚，用不着再解释了。

(11)必须粉碎和抛弃第五种腐朽的理论，说什么托洛茨基暗害分子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后备力量，似乎他们用尽自己最后的一批干部了。

同志们，这是不正确的。只有幼稚的人才能杜撰出这种理论。托洛茨基暗害分子是有自己的后备力量的。这些后备力量首先就是在苏联已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的残余。这些后备力量就是国外

许多与苏联为敌的集团和组织。

以托洛茨基反革命的第四国际为例，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是间谍和破坏分子。这不是后备力量是什么呢？这个间谍国际将给托洛茨基分子的间谍和暗害活动派遣干部，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或者，再以挪威骗子舍夫洛集团为例，这个集团曾给间谍头子托洛茨基以栖身之所并帮助他向苏联捣乱。这个集团不是后备力量是什么呢？谁能否认这个反革命集团今后仍将为托洛茨基间谍和暗害分子效劳呢？

或者，再以和舍夫洛一样的法国骗子苏瓦林集团为例。这个集团不是后备力量是什么呢？难道能否认这个骗子集团同样将帮助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其反苏的间谍暗害活动吗？

所有这些德国老爷们，这些向法西斯分子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的形形色色的路特·费舍之流、马斯洛夫之流、乌尔班斯之流，不是托洛茨基的间谍暗害活动的后备力量是什么呢？

或者，再以著名的骗子伊斯门为首的一伙美国作家为例，所有这些耍笔杆的匪徒都是靠污蔑苏联工人阶级为生的，他们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后备力量是什么呢？

总之，说托洛茨基分子似乎用尽了最后的一批干部，这种腐朽的理论是应该抛弃的。

(12)最后，还必须粉碎和抛弃一种腐朽的理论，说什么因为我们布尔什维克人数很多，而暗害分子人数很少，因为拥护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有几千万人，而拥护托洛茨基暗害分子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或几十个人，所以我们布尔什维克可以不必注意这一小撮暗害分子。

同志们，这是不对的。杜撰出这种极端荒谬的理论，是为了安

慰我们某些由于不善于同暗害活动作斗争而在工作中失败的领导同志,是为了麻痹他们的警惕性,让他们安心睡觉。

说拥护托洛茨基暗害分子的人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而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人却有几千万,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暗害分子不能使我们的事业遭到极严重的损害。要进行捣乱和暗害,根本不需要大批人。要修建第聂伯河国家建筑工程,需要有几万工人。但是要炸毁这个工程,也许至多需要几十个人。要在战争期间打胜仗,可能需要几个军的红军战士。但是要在前线破坏这一胜利,只要在某个集团军的司令部、甚至只要在某个师的司令部有几个能偷出作战计划并交给敌军的间谍就够了。要建筑一座大的铁路桥梁,需要几千人。但是要炸毁这座桥梁,只需要几个人就够了。象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几十个以至几百个。

因此,不能以我们人数很多而托洛茨基暗害分子人数很少来安慰自己。

必须做到在我们的队伍中根本没有托洛茨基暗害分子。

关于如何消灭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消灭我们一切组织——无论是经济组织和苏维埃组织,还是行政组织和党组织——共同存在的缺点的问题,情况就是如此。

消灭这些缺点所必需的办法,就是这些。

至于专门党组织及其工作中的缺点,那么在交给你们审阅的决议草案中,已经相当详细地谈到消灭这些缺点的办法了。因此,我想,没有必要在这里详细叙述这一方面的情况。

我只想略微谈一谈我们党的干部的政治训练和提高问题。

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如果我们善于把我们党自下而上的全体干部,在思想上加以训练并且在政治上加以锻炼,从而使他们能够

在国内外环境中毫无困难地辨别方向，如果我们善于把他们造就成完全成熟的列宁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使他们能够解决国家领导问题而不犯严重错误，那么我们就解决了我们一切任务的十分之九。

我们党的领导成分的情况怎样呢？

我们党的成分，如果指党的领导人员，大约有 3 000—4 000 个高级领导者。可以说，这是我们党的将领一级。

其次，有 3—4 万个中级领导人员。这是我们党的军官一级。

再其次，有 10—15 万个党的下级领导人员。这是我们党的士官一级。

提高这些指挥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政治锻炼，以那些等待提拔的新生力量来充实这些干部，从而扩大领导干部的队伍，——这就是当前的任务。

要办到这一点，需要做些什么呢？

首先，必须建议我们党的领导者，从支部书记到州和共和国的党组织的书记，要在一定期间内为自己挑选两个人，两个党务工作人员，能够充当他们真正的副手。也许有人会说，到哪里去找呢，每个书记都要有两个副手，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没有适当的工作人员。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能干的人，有才能的人，我们这里成千上万。只需要去了解他们，及时提拔他们，使他们不致老呆在原有的工作岗位上而开始腐朽起来。要找就会找到。

其次，为了使支部书记得到党的训练和进修，必须在每个州的中心设立以 4 个月为一期的“党的训练班”。应当派所有基层党组织（支部）的书记前去受训，而在他们受训期满并回到原工作岗位后，再派他们的副手及基层党组织最能干的委员前去受训。

再其次，为了使区组织第一书记得到政治上的进修，必须在苏联各地，例如在 10 个最重要的中心城市，设立以 8 个月为一期的“**列宁主义训练班**”。应当派区和专区的党组织第一书记前去受训，而在他们受训期满回到原工作岗位后，再派他们的副手及区和专区的组织中最能干的委员前去受训。

再其次，为了使市组织书记得到思想上的进修和政治上的提高，必须在联共（布）中央之下设立以 6 个月为一期的“**党史和党的政策研究班**”。应当派市委第一书记或第二书记前去受训，而在他们训练期满回到原工作岗位后，再派市组织内最能干的委员前去受训。

最后，必须在联共（布）中央之下设立以 6 个月为一期的“**国内和国际政策问题讨论会**”。派去受训的必须是州组织、边疆区党组织和各民族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应当从这些同志中间造就出不仅一批而且好几批能够代替我们党中央委员会领导者的人才。这是必要的，而且是应当做到的。

同志们，我的话就要结束了。

这样，我们叙述了我们工作中的基本缺点，既有我们一切组织，即经济组织、行政组织、党组织共同的缺点，也有只是我们专门党组织所特有的缺点。这些缺点正被工人阶级的敌人利用来进行其破坏、暗害、间谍和暗杀的活动。

其次，我们指出了一些基本办法，它们是消灭这些缺点，使外国谍报机关的托洛茨基法西斯代理人的破坏、暗害、间谍和恐怖的袭击无能为害所必须采取的。

试问，我们能不能实现这一切办法呢？我们是不是有一切必要的可能性做到这一点呢？

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的。我们所以能够,是因为我们拥有为实现这些办法所必需的一切手段。

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呢?

缺少的只有一点,就是消灭自己的麻痹大意、自己的温厚宽容、自己的政治近视的决心。

关键就在这里。

我们推翻了资本主义,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并举起了世界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难道我们就不能搞掉这种可笑的和荒谬的毛病吗?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我们一定能搞掉这种毛病,当然,如果我们真想搞掉的话。我们不是简简单单地搞掉它,而是象布尔什维克那样真正地搞掉它。

当我们搞掉了这种荒谬的毛病时,我们便能完全有把握地说,我们不怕国内外的任何敌人,我们不怕他们的袭击,因为正象我们现在粉碎他们那样,正象我们过去粉碎了他们那样,我们将来也一定会粉碎他们。

结 束 语

同志们!

我在自己的报告中,讲到了所讨论的事情的基本问题。讨论情况表明,我们现在有了完全明确的认识,了解了任务,并且有决心消灭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但是讨论情况也表明,对于我们在组织和政治的实践中的某些具体问题,我们还没有充分明确的了解。我算了一下,这样的问题共有7个。

请让我对这些问题讲几句话。

(1)应当认为,现在大家都已懂得,都已认清,过分陶醉于经济工作和经济胜利而低估和忘记党的政治问题是行不通的。因此,必须使工作人员的注意力转到党的政治问题方面,以便使经济上的胜利与党的政治工作上的胜利结合起来,齐头并进。

怎样在实践中实现加强党的政治工作的任务呢?怎样实现使党组织从经济细节中解放出来的任务呢?从讨论中可以看到,有些同志喜欢从这里得出一个不正确的结论,以为现在似乎应当根本摆脱经济工作。至少有这样一种说法,好了,谢天谢地,我们现在要从经济事务中解放出来了,现在也可以从事党的政治工作了。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呢?不,不正确。当我们党的同志陶醉于经济胜利而离开了政治时,这是一个极端,使我们遭受了很大的牺牲。如果现在我们有些同志,由于要加强党的政治工作而想离开经济工作,那么这是另一个极端,它将使我们遭受的牺牲并不比前者小。不能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不能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我们不能离开经济,正如我们不能离开政治一样。为了便于研究起见,人们通常在方法上把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分开。但是,这只是为了便于研究,才仅仅在方法上人为地加以分开。相反地,在生活中,在实践中,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两者共同存在,共同起作用。谁想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把经济和政治分开,以削弱政治工作为代价来加强经济工作,或者相反,以削弱经济工作为代价来加强政治工作,那他一定要碰钉子。

决议草案中专门有一条,谈到使党组织从经济细节中解放出来,并加强党的政治工作。这一条文的意思并不是要摆脱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导,而仅仅是再不容许以我们党组织去实际代替经济

机关(其中特别是农业机关),并使它们陷于无专人负责的地。因此,必须掌握布尔什维克领导经济机关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经常帮助这些机关,经常巩固这些机关,不是撇开这些机关而是通过这些机关去领导经济。必须给经济机关、首先是给农业机关以优秀人才,必须给这些机关配备有能力完成所赋予的任务的新的优秀工作人员。只有做了这个工作以后,才能指望党组织完全从经济细节中解放出来。显然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有一定的时间。但是,只要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党组织就不得不在今后一定的短时期内,直接从事农业工作及其一切细节,如耕地、播种、收获等等。

(2)关于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等等,我要讲两句话。我想,现在大家都明白了,现时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不管他们用哪一种旗帜——托洛茨基旗帜或布哈林旗帜——来掩饰自己,早已不是工人运动中的政治派别了,他们已变成了一伙职业的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杀人凶手的无原则和无思想的匪帮。显然必须无情地粉碎和铲除这些老爷们,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敌人,是我们祖国的叛徒。这一点很清楚,用不着再解释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怎样在实际上实现粉碎和铲除托洛茨基主义的日德代理人的任务呢?这是不是说,要粉碎和铲除的不仅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而且连那些一度动摇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而后来早已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人也要粉碎和铲除呢?这是不是说,要粉碎和铲除的不仅是真正进行暗害活动的托洛茨基代理人,而且连那些偶尔在某一个托洛茨基分子曾经经过的一条街上走过路的人也要粉碎和铲除呢?这些说法至少在这次全会上是有人提出过的。能不能认为这样解释决议是正确的呢?不,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对这个问题,正如对其他一切问题一样,必须个别对

待，分别处理。不能用一个尺度衡量一切人。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处理，只能损害我们同真正的托洛茨基暗害分子和间谍作斗争的事业。

在我们负责同志中间，有一些从前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早已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他们进行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不仅不亚于而且还胜过我们一些可尊敬的、未曾动摇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的同志。现在要排斥这样的同志，那是愚蠢的。

在我们的同志中间，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思想上一向是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可是尽管如此，他们却和个别的托洛茨基分子保持过个人的联系，当他们一看清托洛茨基主义的实际面貌，就立刻断绝了这种联系。他们没有马上断绝同个别托洛茨基分子的个人朋友联系，而迟了一些，这当然是不好的。但是，要把这些同志列为托洛茨基分子一伙，那是愚蠢的。

（3）正确地挑选工作人员和正确地分配他们工作，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挑选工作人员，第一，要根据政治的标志，就是说，他们是不是值得政治上的信任；第二，要根据业务的标志，就是说，他们是不是适合做某一项具体工作。

这就是说，不要把看业务变成事务主义原则，即不要只注意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而不注意他们的政治面貌。

这就是说，不要把看政治变成独一无二的原则，即不要只注意工作人员的政治面貌，而不注意他们的业务能力。

能不能说我们党的同志实行了这个布尔什维克准则呢？可惜不能这样说。在这次全会上已经说到了这一点。但是没有说完全。问题在于，这个经过考验的准则在我们的实践中往往被破坏

了,而且是被非常粗暴地破坏了。挑选工作人员常常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志,而是根据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市侩的标志。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

显然可以看出,这不是由负责工作人员组成的领导集团,而是由亲近的人们结成的小家族,小团体,其成员都力求和平相处,互不得罪,家丑不外扬,互相吹捧,并且时常向中央送交空洞而令人作呕的胜利报告。

不难理解,在这种小家族环境里,既不能有批评工作缺点的余地,也不能有工作领导者自我批评的余地。

显然,这种小家族环境会为培养阿谀者创造良好的条件,这些阿谀者毫无自尊心,因而和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点。

就拿米尔左扬和瓦伊诺夫的例子来说。前者是哈萨克斯坦的边疆区党组织的书记,后者是雅罗斯拉夫尔州党组织的书记。这两个人在我们中间并不是名列最末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是怎样挑选工作人员呢?前者从他早先工作过的阿塞拜疆和乌拉尔带了30—40个“自己的”人到哈萨克斯坦,并把他们安置在哈萨克斯坦的负责岗位上。后者也从他早先工作过的顿巴斯带了10多个“自己的”人到雅罗斯拉夫尔,并把他们也安置在负责岗位上。可见,米尔左扬是有自己的小团体的。瓦伊诺夫也是有自己的小团体的。难道不能按照人所共知的布尔什维克挑选和配备人员的准则从当地人中间挑选工作人员吗?当然是能够的。为什么他们不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违背了布尔什维克挑选工作人员的准则,这种准则排除了庸俗的市侩态度的可能性,排除了根据小家族和小团体的标志挑选工作人员的可能性。此外,他们在挑选对个人忠实

的人们做工作人员时，显然是想给自己造成无论对当地人以及对党中央都带有某种独立性的环境。假定米尔左扬和瓦伊诺夫由于某种情况而从他们现在工作的地方调到其他什么地方。那么，他们应当如何处理他们的“尾巴”呢？难道他们又得把自己的“尾巴”带到新的工作地方去吗？

请看，违背布尔什维克正确挑选和分配工作人员的准则竟达到了多么荒谬的地步。

(4)审查工作人员，检查任务的执行情况，这是什么意思呢？

审查工作人员，这就是说，不是根据工作人员的保证和宣言，而是根据他们的工作结果来审查他们。

检查任务的执行情况，这就是说，不仅是在办公室，不仅是根据形式上的工作报告来检查，而首先是要在工作的地方，根据执行的实际结果来检查。

一般讲来，是否需要这样的审查和检查呢？毫无疑问是需要的。其所以需要，第一，是因为只有这样的审查才能了解工作人员，确定他们的真正品质。其所以需要，第二，是因为只有这样的检查才能确定执行机关的优点和缺点。其所以需要，第三，是因为只有这样的检查才能确定任务本身的优点和缺点。

有些同志认为，只能自上而下地审查工作人员，即领导者根据被领导者的工作结果来审查被领导者。这是不对的。自上而下的审查固然是需要的，这是审查工作人员及检查任务的执行情况的有效办法之一。但是，自上而下的审查，还远不能包括全部审查工作。还有另外一种审查，自下而上的审查，即由群众、由被领导者来审查领导者，指出领导者的错误，指出改正这些错误的办法。这种审查是审查工作人员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党员群众是在积极分子会议上、在代表会议上、在代表大会上审查自己的领导者，方法就是听取领导者的工作报告，批评缺点，以及选举或不选举某些领导同志参加领导机关。正如我们党章所要求的，在党内要切实执行民主集中制，党的机关要无条件地按选举手续产生，要保证提出和撤消候选人的权利，实行无记名投票，自由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所有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办法都必须实行，以便于党员群众审查和监督党的领导者。

非党群众是在非党积极分子会议上，在各种各样的群众会议上审查自己的经济领导者、工会领导者和其他领导者，方法就是在会上听取他们的工作报告，批评缺点，并指出改正缺点的办法。

最后，人民是在选举苏联政权机关时，用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无记名的投票，来审查自己的国家领导者。

任务就在于把自上而下的审查和自下而上的审查结合起来。

(5)通过干部自身的错误来训练干部，这是什么意思呢？

列宁曾经教导说，诚恳地揭发党的错误，研究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指出改正这些错误的必要的办法，是正确训练和教育党的干部、正确训练和教育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最可靠的方法之一。列宁说道：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①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13页。——编者注

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的义务不是掩盖自己的错误，不是逃避有关自己错误的问题，如象我们这里所常有的情形一样，而是诚恳和公开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诚恳和公开地订出改正这些错误的办法，诚恳和公开地改正自己的错误。

我不能说我们许多同志都乐意这样做。但是布尔什维克，如果真正愿意做布尔什维克，就应当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揭发错误的原因，订出改正错误的办法，从而帮助党给干部以正确的训练和正确的政治教育。因为只有在这条道路上，只有在公开和诚恳的自我批评环境中，才能培养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干部，才能培养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领袖。

有两个例子说明列宁的原理是正确的。

例如，拿我们在集体农庄建设方面的错误来说。你们大概记得 1930 年，当时我们的党员同志想在短短 3—4 个月内解决把农民转到集体农庄建设上来这个极复杂的问题，当时党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制止这些着了迷的同志。这是我们党的生活中最危险的时期之一。当时的错误在于，我们的党员同志忘记了集体农庄建设的自愿原则，忘记了不能凭借行政压力使农民转到集体农庄道路上来，忘记了集体农庄建设不是需要几个月而是需要几年细心的和深思熟虑的工作。他们忘记了这一点，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你们大概记得，中央关于胜利冲昏头脑和要求我们地方的同志不要忽视现实情况而跑得太远的指示曾遭到激烈的对抗。但是这并不能阻挡中央顶住逆流，把我们党员同志引上正确的道路。结果怎样呢？现在谁都明白了，党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把我们党员同志引上了正确的道路。现在我们有几万个从事集体农庄建设和集体农庄领导的农民出身的出色的干部。这些干部从 1930 年的错误中得

到了训练和教育。但是，如果党当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及时地改正这些错误，那么我们现在也就不会有这批干部。

另外一个例子是工业建设方面的例子。我指的是我们在沙赫特暗害事件时期的错误。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没有估计到我们工业干部技术落后的全部危险性，我们容忍这种落后现象，想依靠怀有敌对情绪的专家来展开广泛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因而必然使我们的经济干部充当了资产阶级专家的不好的政治委员。你们大概记得，当时我们的经济干部多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多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技术落后，多么勉强地接受“掌握技术”这个口号。结果怎样呢？事实表明，“掌握技术”这个口号起了作用，产生了良好的结果。现在我们已经有几万和几十万个掌握了技术和推动我们工业前进的出色的布尔什维克经济干部。但是，如果党当时在那些不愿意承认自己技术落后的经济工作人员的顽固态度面前屈服了，如果党当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及时改正这些错误，那么我们现在也就不会有这批干部。

有些同志说：公开说出自己的错误是不妥当的，因为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会被我们的敌人看作是我们软弱的表现，并且会被他们利用。同志们，这是无关紧要的，根本是无关紧要的。相反地，公开承认我们的错误和诚恳改正这些错误，只能加强我们的党，提高我们党在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威信，提高我们国家的力量和实力。而这是主要的。只要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和我们在一起，其余的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另一些同志说：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其结果并不能训练和巩固我们的干部，反而会削弱和瓦解他们；我们应当体谅和保护自己的干部，我们应当体谅他们的面子和心情。为此他们提议掩饰我们

同志的错误，减弱批评的力量，最好是别管这些错误。这样的方针不仅是根本错误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首先对于他们想“体谅”和“爱护”的干部是危险的。用掩饰干部错误的办法来体谅和爱护干部，就一定会毁掉这些干部本人。如果我们不把1930年的错误揭露出来，并通过这些错误来训练自己的集体农庄布尔什维克干部，那么我们就一定会毁掉这些干部。如果我们不把我们同志们在沙赫特暗害事件时期的错误揭露出来，并通过这些错误来训练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工业干部，那么我们就一定会毁掉自己的工业干部。谁想用掩饰错误的方法来体谅我们干部的面子，谁就会既毁掉干部也毁掉干部的面子，因为谁掩饰他们的错误，谁就会使他们容易再犯新的、也许更严重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应当认为会使这些干部完全垮台，损害他们的“面子”和“心情”。

（6）列宁曾教导我们，不仅要教育群众，而且要向群众学习。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我们领导者不应当骄傲，应当了解，我们虽然是中央委员或人民委员，但这还不是说，我们具备了正确领导所必需的一切知识。官衔本身并不提供知识和经验。称号就更不用说了。

这就是说，只靠我们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还不足以实行正确的领导，因此必须以群众的经验，党员群众的经验、工人阶级的经验、人民的经验来充实自己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

这就是说，一分钟也不能削弱我们同群众的联系，更不用说断绝我们同群众的联系了。

最后，这就是说，要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普通党员的呼声、所谓“小人物”的呼声、人民的呼声。

正确领导是什么意思呢？

这绝不是坐在办公室写指示。

正确领导,这就是说:

第一,正确地决定问题,而要正确地决定问题,就非考虑群众的经验不可,群众能亲身体验到我们领导的结果;

第二,组织对正确决定的执行,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非有群众方面的直接帮助不可;

第三,组织对这种决定的执行情况的检查,要做到这一点,还是非有群众的直接帮助不可。

我们领导者只是从一个方面,我是说,从上面来看事物、事件和人的,因此我们的眼界多少要受到一些限制。相反地,群众却是从另一个方面,我是说,从下面来看事物、事件和人的,因此他们的眼界也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为了对问题作出正确的决定,就必须把这两方面的经验结合起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领导才是正确的。

不仅要教育群众,而且要向群众学习,就是这个意思。

有两个例子说明列宁的这个原理是正确的。

这是几年以前的事。我们中央委员讨论了改善顿巴斯的问题。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提出的措施草案,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曾经三次把草案退回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曾经三次收到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各种不同的草案。可是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最后,我们决定从顿巴斯找几个工人、普通经济工作人员和工会工作人员。同这些同志谈了三天。我们所有中央委员都应当承认,只有他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这些“小人物”,才能启示我们作出正确的决定。你们大概记得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顿巴斯采煤办法的著名的决议。我们所有的同志都认为中央和人民委员

会的这个决议是正确的、甚至认为是卓越的，而这个决议正是由基层的普通人启示我们作出的。

另一个例子。我指的是尼古拉延科同志的例子。尼古拉延科是什么人呢？尼古拉延科是一个普通党员。她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在整整一年中，她一直发出警告，说基辅党组织的情况不好，她揭发了小家族习气，对工作人员的市侩庸俗态度，压制批评的现象，托洛茨基暗害分子的专横行为。她被赶走了，就象赶走讨厌的苍蝇一样。后来，有人为了摆脱她，竟把她抓起来并开除了党籍。无论是基辅的组织，无论是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都没有帮助她获得真理。只是由于党中央委员会的干涉，才帮助解开了这个难解的结扣。事情经过审查后，查清了什么呢？查清了尼古拉延科是正确的，基辅组织是不正确的。事实正是如此，分毫不差。而尼古拉延科究竟是什么人呢？她当然不是中央委员，不是人民委员，不是基辅州组织的书记，她甚至不是哪一个支部的书记，她只不过是一个平常的普通党员。

由此可见，平常的人有时竟比某些高级机关更接近真理。

象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几十个几百个。

由此可见，要领导我们的事业，只靠我们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是远远不够的。要正确地领导，就必须以党员群众的经验、工人阶级的经验、劳动群众的经验、所谓“小人物”的经验来充实领导者的经验。

什么时候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只有当领导者和群众保持极密切的联系，领导者和党员群众、和工人阶级、和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保持极密切的联系时，才能做到这一点。

同群众联系，巩固这种联系，下决心倾听群众的呼声，——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力量强大及其不可战胜的原因。

当布尔什维克保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时，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这可以认为是一个规律。相反地，布尔什维克只要一脱离群众和失去同群众的联系，只要一染上官僚主义的毛病，他们就会丧失任何力量，而变成空架子。

在古代希腊人的神话中，有一个著名的英雄名叫安泰，据神话说，他是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他对生育、抚养和教导他成人的母亲是非常依恋的。没有哪一个英雄能同这个安泰抗衡。大家公认他是无敌的英雄。他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呢？他的力量就在于，每当他同敌人决斗而遇到困难时，便往地上一靠，就是说，往生育和抚养他成人的母亲身上一靠，就取得了新的力量。可是他毕竟有一个弱点，就是怕别人用什么方法使他离开地面。敌人注意到他的这个弱点，于是时刻暗中窥伺他。后来有一个敌人利用了他的弱点，就战胜了他。这个敌人名叫海格力斯。可是，他是怎样战胜安泰的呢？原来这个敌人使安泰离开了地面，把他举到空中，使他无法再接触地面，这样就在空中把他扼死了。

我认为，布尔什维克很象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布尔什维克也同安泰一样，其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即同那生育、抚养和教导他们成人的群众保持联系。只要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同人民保持联系，他们就完全可能始终是不可战胜的。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不可战胜的关键。

(7)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指的是我们党的一些同志，对个别党员的命运、对开除党员党籍或恢复被开除党员党籍问题所采取的形式主义和冷漠的官僚主义态度。问题在于，我们党的一些

领导者犯了对人，对党员，对工作人员漠不关心的毛病。不但如此，他们不考察党员，不知道他们如何生活，如何成长，他们根本不了解工作人员。因此，他们不是分别对待党员、党的工作人员。正因为他们是在评定党员和党的工作人员时不是分别对待，所以他们通常是随便乱搞，或者是笼统而没有分寸地夸奖他们，或者是笼统而没有分寸地打击他们，成千成万地把他们开除出党。这样的领导者一般都是力求考虑几万人，不关心“个人”、个别党员，不关心他们的命运。开除几千几万个党员出党，他们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且自慰地说，我们党有 200 万党员，开除几万个一点也不会改变党的状况。然而，实际上，只有那些极端反党的人，才会这样对待党员。

由于对人，对党员、对党的工作人员采取这种冷漠的态度，所以在一部分党员中间便人为地造成了一些不满和怨恨，而托洛茨基两面派便灵巧地抓住了这些心怀怨恨的同志，巧妙地把他们拖入托洛茨基暗害活动的泥坑。

托洛茨基分子本身在我们党内从来就不是大的力量。请回想一下 1927 年我们党内最后的一次争论。这是一次真正的全党投票。当时我们党内共有 854 000 党员，参加表决的有 73 万党员。其中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赞成党中央委员会而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党员，共有 724 000 人，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有 4 000 人，即占 0.5% 左右，弃权的有 2 600 人。没有参加表决的党员有 123 000 人。他们所以没有参加表决，或者是因为在旅途中，或者是因为调动工作。如果把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 4 000 人，加上所有弃权的人，假定他们也同情托洛茨基分子，此外再加上没有参加表决的人的 5%，而不是援例加上 0.5%，就是说，大约有 6 000 党员，那么，这

样或那样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总共不过 12 000 党员。你们看，这就是托洛茨基分子老爷们的全部力量。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在这 12 000 人中间有很多人已经对托洛茨基主义失望并离开了它，那么你们就明白托洛茨基分子的力量是如何微不足道了。虽然如此，托洛茨基暗害分子在我们党的周围仍然有一些后备力量，这是因为我们一些同志在开除党籍和恢复党籍问题上采取了不正确的政策，我们一些同志对个别党员和个别工作人员的命运采取了冷漠的态度，从而人为地增加了一些心怀不满和怨恨的人，这就给托洛茨基分子造成这样一些后备力量。

大多数党员被开除党籍都是由于所谓消极。什么是消极呢？原来有人认为，如果党员不精通党纲，那就是消极，就应当开除。可是，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不能这样咬文嚼字地解释我们的党章。要精通党纲，就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考验而且有理论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不知道我们党员中间是否有很多人已经精通了我们的党纲，已经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成为有理论修养和经过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那么我们就只有把知识分子和一般有学问的人留在党内。谁需要这样的党呢？我们有经过检验的和经过一切考验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列宁的公式。按照这个公式，凡承认党纲，缴纳党费，并在党的一个组织内工作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请注意，在列宁的公式中并没有说精通党纲，而是说承认党纲。这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用不着证明，在这方面正确的是列宁，而不是我们党的那些妄谈什么精通党纲的同志。这本来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党所依据的出发点，是只有那些已经精通党纲、已经成为有理论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同志才可以作为党员，那么我们党就不会在党内设立

几千个党员学习小组，几百个党校，让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帮助他们精通我们的纲领。十分明显，我们党所以在党员中间成立这样的学校和学习小组，正因为我们党知道党员还没有精通党纲，还没有成为有理论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

因此，要端正我们关于党员资格和开除党籍问题的政策，就必须取消现在关于消极问题的愚蠢的解释。

但是，我们在这一方面还有另一种错误。问题在于，我们的同志不承认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中间的东西。一个工人、一个党员只要稍微犯了一点过错，开党的会议迟到了一两次，或者由于某种原因没有缴纳党费，就立刻被驱逐出党。

人们不注意他的过错的程度，不到会的原因，没有缴纳党费的原因。这些问题上的官僚主义简直是前所未有的。不难了解，正是由于这种冷漠的政策，许多杰出的骨干工人、优秀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被抛出了党外。在开除党员之前给以劝告，如果这无效，再给以警告或严重警告，如果这仍然无效，再给以改正错误的期限，或者万不得已时，再把他转为预备党员，而不要一下子就开除党籍，难道不能这样做吗？当然，是能这样做的。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关心人，关心党员，关心党员的命运。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某些同志所缺少的。

同志们，是消灭这种岂有此理的现象的时候了，早就是时候了。

译自《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1954年版

关于联共(布)历史教科书

给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编者们的信

我认为,我们的一些联共(布)历史教科书所以不能令人满意,有三个主要原因。或者是因为它们在叙述联共(布)历史时没有同国家的历史联系起来;或者是因为它们仅限于叙述和简单地描写各种派别的斗争的事件和事实,而没有作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明;或者是因为它们在结构方面,在事件分期方面,有不正确的地方。

要避免这些缺点,作者应当注意以下几点意见。

应当在教科书的每一章(或篇)之前,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作一简要的历史的说明。否则,联共(布)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而只不过是往事的一种肤浅的莫名其妙的叙述。

第二,不仅应当叙述那些能表明苏联在资本主义时期在党和工人阶级中曾经存在大量派别的事实,而且应当对这些事实作马克思主义的说明,指出:(一)在革命前的俄国,既存在一些新的、从资本主义观点看来是现代的阶级,也存在一些旧的、资本主义前的阶级;(二)国家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三)工人阶级的成分复杂,——这是党内和工人阶级内便于存在大量派别的条件。否则,大量派别的存在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了。

第三,不仅应当用简单叙述的口吻来说明各种派别激烈斗争

的事实,而且应当对这些事实作马克思主义的说明,指出:布尔什维克同反布尔什维克派别所进行的斗争是维护列宁主义的原则性斗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以及一般地说,在敌对阶级存在的条件下,党内矛盾和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在上述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克服这些矛盾才能得到发展和巩固;不同反列宁主义的派别进行原则性的斗争,不战胜它们,我们党就一定会蜕化变质,就象第二国际那些社会民主党没有进行这样的斗争而蜕化变质一样。在这方面倒可以使用1882年恩格斯给伯恩斯坦的那封有名的信^①和我对这封信的评论。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所作的关于联共(布)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第一章中,曾经引用了这封信^②。如果不作这样的说明,联共(布)历史上各种派别的斗争就会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无谓纠纷,而布尔什维克就会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药的好闹无谓纠纷和好打架的人。

最后,应当把联共(布)历史中的事件的分期工作做得有条理些。

我想,下列提纲或类似下列的提纲可以作为基础。

提 纲

为在俄国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而斗争。

(从1883年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社”建立起到1900—1901年最初几号《火星报》出现止。)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69—372页。——编者注

^② 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500页。——编者注

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和党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的出现。

(1901—1904 年)

三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日俄战争和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

(1904—1907 年)

四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独立的社会民主工党。

(1908—1912 年)

五

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前工人运动高涨年代。

(1912—1914 年)

六

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大战和俄国第二次革命(二月革命)时期。

(1914 年—1917 年 3 月)

七

布尔什维克党在准备和进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1917 年 4 月—1918 年)

八

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内战争时期。

(1918—1920 年)

九

布尔什维克党在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

(1921—1925 年)

十

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

(1926—1929 年)

十一

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

(1930—1934 年)

十二

布尔什维克党为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实施新宪法而斗争。

(1935—1937 年)

约·斯大林

译自1937年5月《布尔什维克》
第9期第8—10页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在 克里姆林宫招待冶金工业和 煤炭工业领导工作人员和 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时的讲话

(1937 年 10 月 29 日)

同志们，我举杯的意思多少有些与众不同。我们通常总是为领导者、首长、领袖和人民委员的健康举杯。这当然不坏。但是除了高级领导者，还有中级和下级领导者。他们，这些下级和中级领导者，在我国有几万人。他们都是谦逊的人，他们并不出头露面，几乎是默默无闻。但是，如果漠视他们，那就是盲目无知，因为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生产的命运都取决于这些人。就是说，我们的经济领导的命运也取决于他们。

为我们中级和下级经济工作领导者的健康干杯！

关于领导者，一般地应该说，可惜他们并不总是懂得，在苏维埃制度的条件下，历史把他们提到了怎样的高度。他们并不总是懂得，在我国条件下做一个经济工作领导者，就意味着受到极大的光荣和无上的尊敬，就意味着得到工人阶级和人民的莫大信任。从前，在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工作领导者，所有的厂长、经理、车间主任、工头，都是资本家老板的走狗。人民把他们当作敌人一样地痛

恨，因为人民认为，他们领导经济是为了老板的利益，为了资本家的利润。相反，在我们苏维埃制度下，经济工作者有一切理由受到人民的信任和爱戴，因为他们管理经济并不是为了一小撮资本家的利润，而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条件下经济工作者的称号是一个崇高的称号，在苏维埃条件下做一个领导者就意味着受到无上的光荣和得到人民的信任。同志们，人民对经济工作者的信任是一件大事情。领导者可以上台下台，而人民还是人民。只有人民是永存的。其他一切都是暂时的。所以，应该善于珍视人民的信任。

为那些懂得并意识到自己的崇高作用而不容许任何人玷污和侮辱苏维埃经济工作者这个崇高称号的我国经济工作者的健康干杯！

同志们！在座的有国民经济新事业的先驱者，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战士。为这些新事业的先驱者和战士的健康干杯！为斯达汉诺夫、久卡诺夫、伊左托夫、里亚博沙普卡及其他同志的健康干杯！

最后，为冶金工业中的高炉工作的新老战士的健康干杯，首先为高炉工人科罗博夫同志的健康，为老科罗博夫，为他的儿子，为高炉工人科罗博夫全家，为科罗博夫全家不落后于新的工作方法干杯。

译自《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竞赛》
1941年版第226—227页

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 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1937年12月11日于大剧院)

同志们，老实说，我没有打算讲话。但是，我们尊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可以说是硬把我拖到这个会场里来。他说，请你作一个好的演说吧。讲些什么呢，究竟讲些什么样的话呢？凡是在选举以前需要讲的一切，都已经在我们的领导同志加里宁、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以及其他许多负责同志的演说中讲过了，而且是一再地讲过了。对这些演说还能补充些什么呢？

据说，有人要求对选举运动的某些问题进行解释。解释什么呢，对哪些问题进行解释呢？所有一切需要解释的东西都已经在布尔什维克党、共青团、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协会^①、体育运动委员会的著名宣言中解释过了，而且是一再地解释过了。对这些解释还能补充些什么呢？

当然，可以发表一通什么都谈到而又什么都没有谈的那种随随便便的演说。这样的演说也许能使听众开一开心。据说，这样的演说家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有，而且在我们苏维埃国家里

^① 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协会是苏联的一个群众性的社会团体，存在于1927—1948年，其宗旨是促进苏联防御能力的增强、在居民中普及军事知识和培养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编者注

也有。但是，第一，我不是这样的演说家。第二，现在，当我们所有的人、布尔什维克，正如常言所说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是否值得来寻开心呢。我想是不值得的。

显然，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就作不出好的演说来。

可是，既然我已经走到讲台上来了，当然多少总得讲一点。

首先，我想感谢选民们，感谢选民们的信任。

我被提名为代表候选人，苏联首都的斯大林选区选举委员会把我登记为代表候选人。同志们，这是很大的信任。请允许我向你们表示深深的布尔什维克的谢意，感谢你们对我身为其中一个成员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信任，感谢你们对我本人，即对这个党的代表的信任。

我懂得这种信任意味着什么。这种信任自然会给我又增加一些新的义务，因而也就是又增加新的责任。好吧，我们布尔什维克是不会推卸责任的。我很高兴地来承担这个责任。

同志们，我想从自己方面向你们提出保证，你们可以大胆地信赖斯大林同志。你们可以指望斯大林同志一定能够完成自己对人民的职责，对工人阶级的职责，对农民的职责，对知识分子的职责。

其次，同志们，我想向你们祝贺即将到来的全民节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日。同志们，当前的选举不仅仅是选举而已。这是我们的工人、我们的农民、我们的知识分子的真正的全民节日。世界上从来还没有过这样真正自由和真正民主的选举，从来没有过！历史上没有其他这样的先例。问题不在于我们的选举将是普遍的、平等的、无记名的和直接的，虽然这一点本身就已经具有重大的意义。问题在于，同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选举相比，我们所进行的普遍选举将是最自由的选举，最民主的选举。

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即所谓民主国家里,也举行普遍选举。但是,那里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选举的呢?是在阶级冲突的情况下,在阶级敌对的情况下,在资本家、地主、银行家和其他资本主义豺狼压迫选民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的选举即使是普遍的、平等的、无记名的和直接的,也不能叫作完全自由和完全民主的选举。

相反,在我们这里,在我们国家里,选举却是在完全另外一种情况下进行的。在我们这里,没有资本家,没有地主,因而也不存在有产阶级对贫苦阶级的压迫。在我们这里,选举是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合作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在他们互相信任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可以说,是在互相友爱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在我们这里没有资本家,没有地主,没有剥削,根本没有什么人为了歪曲民意而去压制人民。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选举是全世界唯一真正自由和真正民主的选举。

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胜利的基础上,只有在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单单正在建设、而且已经深入生活、深入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这种自由的和真正民主的选举。十来年以前也许还可以争论我们这里能否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是现在,这已经不是争论的问题了。现在,这已经是事实问题,是现实生活的问题,是贯穿在人民全部生活中的习惯问题了。我们的工厂是在没有资本家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领导这种工作的是来自人民中间的人。这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实际的社会主义。在我们的田野上,庄稼人是在没有地主、没有富农的情况下工作的,领导这种工作的是来自人民中间的人。这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主义,这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的生活。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我们的新的、真正自由和真正民主的选举，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先例的选举。

既然如此，怎能不向你们祝贺这个全民胜利的节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日呢！

同志们，其次，我想给你们一个劝告，一个代表候选人对自己的选民的劝告。如果看一下资本主义国家，那么那里的代表和选民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可以说是相当奇怪的关系。在进行选举的时候，代表们向选民百般讨好，阿谀奉承，发誓赌咒要忠诚不渝，许下各种各样的诺言。看来，代表是完全从属于选民的。但是只要选举一结束，候选人一变成代表，这种关系就根本改变了。代表不再从属于选民，他们完全独立了。在四五年内，即在下次选举以前，代表觉得自己是完全自由的，并不从属于人民，并不从属于自己的选民。他可以从一个营垒转入另一个营垒， he 可以从正路转入邪路，他甚至可以卷入一些不那么体面的勾当，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玩弄花招，——他是独立的。

能认为这样的关系是正常的吗？同志们，绝对不能。我们的宪法估计到了这一点，它制定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规定，如果代表开始耍滑头，如果他们离开正路，如果他们忘记自己应当从属于人民，从属于选民，那么选民就有权在任期未满前撤回自己的代表。

同志们，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法律。代表应当知道，他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派到最高苏维埃的使者，他应该遵循人民给他的委托书所指出的那条路线。如果他离开了正路，选民就有权要求重新选举，就有权使离开正路的代表落选。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法律。我的劝告，代表候选人对自己的选民的劝告，就是要你们记住选民

的这个权利,即在任期未滿前撤回代表的权利,要你们监督和检查自己的代表,如果他们想离开正路,就把他们轰走,要求重新选举。政府一定要进行新的选举。我的劝告——就是要你们记住这项法律,并在必要时运用这项法律。

最后,代表候选人对自己的选民还有一个劝告。拿一切可以提出的要求中的最起码的要求来说,一般应当向自己的代表提出些什么要求呢?

选民,人民,应当要求自己的代表始终胜任自己的任务;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要求他们始终不愧为列宁式的政治活动家;要求他们成为象列宁那样的明朗和确定的活动家;要求他们象列宁那样在战斗中无所畏惧和对人民的敌人毫不留情;要求他们在事情开始复杂化、在地平线上出现某种危险的时候,毫不惊慌失措,毫无任何类似惊慌失措的迹象,要求他们也象列宁那样没有任何类似惊慌失措的迹象;要求他们在解决复杂问题、需要全面地确定方针、全面地考虑事情的正反方面的时候,也能够象列宁那样英明和从容;要求他们也象列宁那样诚实和正直;要求他们象列宁那样热爱自己的人民。

我们能否说,所有的代表候选人恰恰都是这样的活动家呢?我看不能这样说。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家。有一种人,说不出他是什么样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勇士还是懦夫,是彻底拥护人民的还是拥护人民的敌人的。是有这样的人的,是有这样的活动家的。在我们这里,在布尔什维克中间,也有这样的人。同志们,你们自己知道,丑儿家家有。俄国伟大的作家果戈理曾经一针见血地谈到这种不确定的人,这种与其说是政治活动家不如说是政治庸人的人,这种不确定的、不定型的

人。果戈理说：“这种不确定的、不三不四的人，使你弄不清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既不象人，又不象鬼。”^①关于这种不确定的人和活动家，在我们民间也有相当确切的说法：“这样的人实在是非驴非马”，“既不象供神的蜡烛，也不象喂鬼的馒头”。

我不能确有把握地说，在代表候选人（当然我对他们很抱歉）中间和我们的活动家中间，没有那种多半是政治庸人的人，没有那种在性格和面貌上很象民间所说的“既不象供神的蜡烛，也不象喂鬼的馒头”的人。

同志们，我希望你们经常地影响自己的代表，提醒他们，要他们以伟大的列宁为典范，要处处效法列宁。

选民的职能并不因选举的结束而结束。他们的职能在该届最高苏维埃存在的整个时期内，一直都有效。我已经谈过关于代表离开正路时选民有权在任期未满前撤回自己的代表的法律。因此，选民的义务和权利就在于，始终要监督自己的代表，提醒自己的代表无论如何不能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提醒自己的代表要做象伟大的列宁那样的人。

同志们，这就是我给你们第二个劝告，一个代表候选人给自己的选民的劝告。

译自《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
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1953年版第3—9页

① 斯大林这里引用的是尼·瓦·果戈理在小说《死魂灵》中形容地主马尼洛夫的话。——编者注

给伊万诺夫同志的复信

(1938年2月12日)

致伊万·菲力波维奇·伊万诺夫同志

伊万诺夫同志，你当然是对的，而你思想上的敌对者，即乌罗任科同志和卡捷尔科夫同志则是不对的。

理由如下：

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这里是指在我国——胜利的问题，无疑具有**两个不同的方面**。

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是我国内部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内部关系**的问题。我国工人阶级能不能克服同我国农民的矛盾，并同他们结成联盟和合作呢？我国工人阶级在同我国农民结成联盟的情况下能不能粉碎我国资产阶级，没收他们的土地、工厂、矿山等等，并用自己的力量建成没有阶级的新社会，即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呢？

这就是同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有关的一些问题。

列宁主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列宁教导说：“**我们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①因此，我们能够而且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2页。——编者注

应当用自己的力量战胜本国资产阶级，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后来成了法西斯主义的间谍和代理人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老爷们都否认这种可能性，认为在其他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没有预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下在我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这班老爷们用其他国家“革命胜利”的虚伪借口来掩饰他们的退却行为，实质上是想使我国开倒车，倒退到资产阶级发展的道路上去。我们党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同这班老爷们发生了争论。我国继续发展的进程表明，党是对的，而托洛茨基之流则是不对的。因为在这个时期内，虽然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其他国家内获得胜利，但是我们却已经消灭了本国资产阶级，同我国农民建立了兄弟般的合作，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

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方面的情形，就是如此。

伊万诺夫同志，我认为你同乌罗任科同志和卡捷尔科夫同志的争论所涉及到的并不是问题的这一方面。

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这个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我国同其他国家，即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国工人阶级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对外关系即国际关系**的问题。一个已经取得胜利而又处在许多资本主义强国包围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认为自己已有免除武装侵犯（武装干涉）的危险，因而免除在我国恢复资本主义的行动的完全保障呢？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大力援助，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农民能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象已经战胜本国资产阶级那样战胜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呢？换句话说，当社会主义只是在一国内获得胜利，而资本主义包围还继续存在的时候，能不能认为社会主义在我

国的胜利是最终的胜利，是已经免除了武装进攻和恢复资本主义的行动的胜利呢？

这就是同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这个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有关的一些问题。

列宁主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列宁主义教导说：“就免除资产阶级关系复辟的完全保障而言，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是可能的。”（见联共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著名决议）^① 这就是说，国际无产阶级的大力援助，是解决社会主义在一国内最终胜利这一任务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应当袖手坐待外来的援助。恰恰相反，应当把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同我们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结合起来，这就是加强我国国防，加强红军和红海军，动员全国力量反击武装进攻和粉碎资产阶级关系复辟的行动。

请看列宁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讲的：

“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只要愿意统治并继续统治下去，就应当也用自己的军事组织来证明这一点。”（《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122页）^②

其次又说：

①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分册第44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128—129页。——编者注

“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受任何入侵的危险。”（《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117页）①

列宁的话说得尖锐而有力，但中肯而真实，一点也不夸张。

根据这些前提，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中说道：

“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就是有免除武装干涉行动，因而就是有免除复辟行动的完全保障，因为稍微严重的复辟行动，只有在外来的重大的援助下，只有在国际资本的援助下，才有可能发生。因此，各国工人对我国革命的支援，尤其是这些工人的胜利，即使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是完全保障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行动的必要条件，是保证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必要条件。”（《列宁主义问题》1937年俄文版第143页）②

如果闭眼不看资本主义包围这一事实，而认为我们的外部敌人如法西斯分子并不企图一有机会就向苏联实行武装进攻，那才真是可笑而愚蠢的。只有妄自吹嘘的人或者是蓄意麻痹人民意志的暗藏敌人才能这样认为。如果否认武装干涉者在武装干涉稍微得逞时就会企图在他们的占领区内破坏苏维埃制度而恢复资产阶级制度，那同样也是可笑的。难道邓尼金或高尔察克没有在他们的占领区内恢复过资产阶级制度吗？法西斯分子在哪一方面会比邓尼金或高尔察克更好一些呢？只有糊涂虫或蓄意用吹嘘来掩盖其敌对行为和力图松懈人民意志的暗藏敌人，才能在存在着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否认有武装干涉和复辟行动的危险。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而没有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危险的完全保障的话，那么，能不能认为社会主义在这个国家内的胜

①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121页。——编者注

② 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37页。——编者注

利是最终的胜利呢？显然是不能的。

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就是如此。

可见，这个问题包含着两个不同的问题：（一）我国的**内部**关系问题，即战胜本国资产阶级和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二）我国的**外部**关系问题，即完全保障我国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危险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因为我国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建成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确切些说，是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假如我国是在一个孤岛上，假如在它的周围没有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胜利是最终的胜利。但是由于我们不是生活在孤岛上，而是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而且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国家都对社会主义国家抱着敌对态度，并在制造武装干涉和复辟的危险，所以我们开诚布公地说，我国的社会主义胜利还不是最终的胜利。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第二个问题暂时还没有解决，还必须在今后加以解决。而且，对于第二个问题还不能够用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办法来解决，即不能够只靠我国自己的努力来解决。只有把国际无产阶级的重大努力和我们全体苏联人民的更大努力结合起来才能解决第二个问题。应当加强和巩固苏联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各国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联系；应当在我国遭受武装进攻时，组织资产阶级各国的工人阶级给我国工人阶级以政治上的援助，正如组织我国工人阶级给资产阶级各国工人阶级以各种援助一样；应当全力加强和巩固我国的红军、红海军、红空军和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协会。应当使我国全体人民在武装侵犯的危险面前保持戒备状态，这样，任何“意外”和我国外部敌人的任何阴谋诡计都不会使我们措手不及……

从你的信中可以看出，乌罗任科同志持有另一种不完全是列宁主义的观点。原来他武断地说：“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并且有了免除武装干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完全保障。”毫无疑问，乌罗任科同志是根本错误的。乌罗任科同志所以有这种武断看法，只能是由于他不了解周围的实际情况和不懂得列宁主义的起码原理，或者由于这位妄自尊大的年轻官员的空洞吹嘘。如果我们确实“有了免除武装干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完全保障”，那么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强大的红军、红海军、红空军和强大的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协会，是不是还需要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联系呢？把用于加强红军的几十亿经费用到别的方面，而把红军减少到最小数目，甚至全部解散，岂不更好吗？象乌罗任科同志这样的人，即便主观上对我们的事业是忠诚的，但是客观上对我们的事业却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在有意或无意地（反正都是一样！）用吹嘘来麻痹我国人民，松懈工人和农民的意志，帮助敌人使我们在国际局势复杂化的情况下措手不及。

伊万诺夫同志，至于说你“被撤销了宣传员的工作并提出了能不能留在共青团内的问题”，那么对这一点你不必担心。如果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州委中真有人想模仿契诃夫笔下的普里希别叶夫中士^①，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一定要在这方面遭到失败。在我国，普里希别叶夫中士一类的人物是没有人喜欢的。

现在你可以判断一下，《列宁主义问题》一书在论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的某些地方是不是已经过时。我自己倒很愿意让这些地方过时，很愿意在世界上再也没有资本主义包围、

^① 指短篇小说《普里希别叶夫中士》中的主人公。他骄傲自大，愚昧无知，蛮不讲理，干涉他人自由，想压制和窒息一切有生气的东西。——编者注

武装侵犯的危险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等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东西。但是很遗憾,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东西仍然存在着。

约·斯大林

译自《列宁斯大林论青年》1938年版
第328—334页

附 录

伊万诺夫给斯大林的信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我恳求您给我解答一下下面这个问题:在我们地方上,以及在共青团州委会里,人们对社会主义在我国的最终胜利有两种理解,也就是说,把第一种矛盾和第二种矛盾混淆起来了。在您的著作中,谈到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时,说的是两种矛盾——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

关于第一种矛盾,显然我们已经解决了,因为社会主义在国内已经取得了胜利。

我想得到解答的是关于第二种矛盾,即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您指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意味着外部矛盾的解决,并且具有免除武装干涉、从而免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完全保障。而这种矛盾只有靠各国工人的努力才能解决。

是的,列宁同志也曾教导我们说:“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靠各国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最后胜利。”^①

我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州委会专职宣传员的课堂讨论会上根据您的著作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取得。但是州委会的工作人员乌罗任科(州委第一书记)和卡捷尔科夫(宣传工作指导员)认为我的发言是托洛茨基式的攻击。

^①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346页。——编者注

于是我就把从您的著作中引来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念给他们听,但是乌罗任科建议我把三卷本合起来,并且说,“这是斯大林同志在 1926 年说的话,而我们现在已经是 1938 年了,那时我们还没有取得最终胜利,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因此我们现在决不应当再想到武装干涉和复辟的问题”;他又说,“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并且有了免除武装干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完全保障”。于是,他们就把我当作托洛茨基主义的帮凶,撤销了我的宣传员的工作并提出了能不能留在共青团内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我请求您说明一下,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或者暂时还没有取得?也许,由于当前形势发生了变化,而我还没有找到当前有关这个问题的补充材料。

我同样认为乌罗任科的说法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他说斯大林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已经有点过时了。州委会的工作人员把我当作托洛茨基分子的做法是不是正确。这对我是很大的委屈和侮辱。

斯大林同志,请不要拒绝我的请求,请给我一个答复,我的地址是:库尔斯克州曼图罗沃区第一扎谢姆斯克村苏维埃伊万·菲力波维奇·伊万诺夫。

伊·伊万诺夫

1938 年 1 月 18 日

译自《列宁斯大林论青年》

1938 年版第 353—354 页

*给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央委员会儿童读物出版社的信^①

(1938年2月16日)

我坚决反对出版《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这本书。

在这本书里有大量不符合事实、歪曲、夸大和过分颂扬的地方。作者被童话爱好者、扯谎者(大概是“善意的”扯谎者)、阿谀奉承者弄迷糊了。作者是值得怜悯的,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

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在于这本书有一种倾向,即在苏联儿童(以及一般人)的意识中培植对个人,对领袖和绝对正确的英雄的崇拜。这是危险的,有害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而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社会革命党人说:英雄创造人民,把他们从群氓变为人民。布尔什维克回答社会革命党人说:人民创造英雄。**这本书是在为社会革命党人张目。一切这样的书都将为社会革命党人张目,**都将危害**我们整个布尔什维克的事业。

建议把这本书烧掉。

约·斯大林

译自1953年11月《历史问题》
第11期第21页

① 这封信摘自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53年第11期刊登的彼·尼·波斯别洛夫《苏联共产党的五十年》一文。——编者注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高等学校 工作人员时的讲话

(1938年5月17日)

同志们!

让我举杯祝贺科学, 祝贺科学繁荣, 祝贺科学工作者身体健康。

祝贺不与人民隔绝、不远离人民、而决心为人民服务、决心把一切成果都贡献给人民的那种科学日益繁荣, 这种科学为人民服务并不是迫不得已的, 而是心甘情愿、非常乐意的。

祝贺科学繁荣, 这种科学不让自己的负有盛名的老领导者满足于献身科学和作为科学垄断家而故步自封, 这种科学懂得老年科学工作者和青年科学工作者联合起来的意义、作用和无穷力量, 它心甘情愿地、非常乐意地给我国青年打开一切科学的大门, 使他们能够攀登科学高峰, 它承认未来是属于科学青年的。

祝贺科学繁荣, 从事这种科学的人虽然懂得科学中已有的传统的力量 and 意义, 并善于为科学而利用这些传统, 但他们仍然不愿做这些传统的奴隶; 当旧传统、旧标准和旧方针趋于陈腐而变成前进的障碍时, 这种科学有勇气、有决心打破这些旧传统、旧标准和旧方针而建立新传统、新标准和新方针。

在科学发展史上有不少勇敢的人, 不管有什么障碍, 他们都能

不顾一切而破旧立新。这样的科学勇士，象伽利略、达尔文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人所共知的。我想要说的一位科学大师，他同时又是当代的一位最伟大的人物。这就是我们的导师和我们的教养者列宁。请回想一下 1917 年的情况。当时列宁根据对俄国社会发展的科学分析，根据对国际环境的科学分析而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在俄国胜利是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这是当时科学界的许多人根本意想不到的结论。科学界的一位卓越人物普列汉诺夫，当时曾经轻蔑地谈论列宁，硬说列宁是在“说梦话”。科学界的其他一些同样有名的人物则硬说“列宁发疯了”，应当把他藏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当时科学界形形色色的人都咆哮起来反对列宁，说他是科学的破坏者。但是，列宁不怕逆流而进，不怕反对守旧习气。结果是列宁胜利了。

你们看，这就是一个科学勇士的典范，他大胆地进行斗争反对陈旧了的科学，并为新科学开拓道路。

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为科学和技术开拓新道路的，有时并不是科学界的著名人物，而是科学界毫不知名的人物，平凡的人物，实践家，工作革新者。在座的斯达汉诺夫同志和帕帕宁同志，就是科学界毫不知名的人物，他们没有学位，他们是本行业务的实践家。但是，谁不知道斯达汉诺夫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工业方面从事自己的实际工作时，曾把科学界和技术界著名人物所规定的现行定额当作陈腐定额加以推翻，而采用了适合于真正的科学和技术要求的新定额呢？谁不知道帕帕宁和帕帕宁探险家们在漂流的冰块上从事自己的实际工作时，没费特别工夫，就顺便把关于北极地带的旧观念作为陈腐观念加以推翻，而确立了适合于真正的科学要求的新观念呢？谁能否认斯达汉诺夫和帕帕宁是科学革新者，

是我们先进的科学界的人物呢？

你们看，在科学中竟有这样的“奇迹”。

我刚才讲的是科学。但是有各种各样的科学。我所说的科学叫作**先进的科学**。

祝我们先进的科学繁荣！

祝先进科学的工作者身体健康！

祝列宁永垂不朽，列宁主义万古长青！

祝斯达汉诺夫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们身体健康！

祝帕帕宁和帕帕宁探险家们身体健康！

译自《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竞赛》

1941年版第228—230页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38年9月)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自己的辩证方法的时候,通常援引黑格尔,认为他是表述了辩证法基本特征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样的。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采取的仅仅是它的“合理的内核”,而屏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且向前发展了辩证法,赋予辩证法以现代的、科学的形态。

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

版跋》)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的时候，通常援引费尔巴哈，认为他是恢复了唯物主义应有权威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样的。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中采取了它的“基本的内核”，把它进一步发展成为科学的哲学唯物主义理论，而屏弃了它那些唯心主义的和宗教伦理的杂质。大家知道，费尔巴哈虽然在基本上是唯物主义者，但是他竭力反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恩格斯屡次说过：费尔巴哈“虽然有唯物主义的基础，但是在这里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唯心主义束缚”，“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652—654页）②

辩证法来源于希腊文“*dialogo*”一词，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进行谈话，进行论战。在古代，所谓辩证法，指的是以揭露对方论断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艺术。古代有些哲学家认为，思维矛盾的揭露以及对立意见的冲突，是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后来推广到自然界现象中去，就变成了认识自然界的辩证方法，这种方法把自然界现象看作是永恒地运动着、变化着的现象，把自然界的发展看作是自然界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看作是自然界中对立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

辩证法从根本上说来，是同形而上学截然相反的。

（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是：

（1）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彼此隔离、彼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4卷第226—227页和第229页。——编者注

此孤立、彼此不依赖的各个对象或现象的偶然堆积,而是把它看作有联系的统一的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或现象互相有机地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

因此,辩证方法认为,自然界的任何一种现象,如果被孤立地、同周围现象没有联系地拿来看,那就无法理解,因为自然界的任何领域中的任何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同周围条件没有联系、与它们隔离的现象,那就会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反之,任何一种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同周围现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受周围现象所制约的现象,那就可以理解、可以论证了。

(2)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静止不动、停滞不变的状态,而是看作不断运动和变化、不断更新和发展的状态,其中始终有某种东西在产生、在发展,有某种东西在破坏、在衰颓。

因此,辩证方法要求我们观察现象时不仅要从各个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角度去观察,而且要从它们的运动、它们的变化、它们的发展的角度,从它们的产生和衰亡的角度去观察。

在辩证方法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哪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坚固,因为在辩证方法看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

恩格斯说:“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原始的活细胞。——约·斯大林注)①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同上,第484页)②

① 本文集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话和标点符号是斯大林加的。——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4页。——编者注

恩格斯说,因此,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3页)①。

(3)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发展过程看作简单的增长过程,量变不引起质变的过程,而是看作从不显著的、潜在的变化到显著的变化,到根本的变化,到质的变化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过程中,质变不是逐渐地发生,而是迅速地、突然地发生的,表现为从一种状态飞跃式地进到另一种状态,并且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规律地发生的,是由许多不明显的逐渐的量变积累而成的。

因此,辩证方法认为,不应该把发展过程了解为圆圈式的运动,了解为过去事物的简单重复,而应该把它了解为前进的运动,了解为上升的运动,了解为从旧质态到新质态的转化,了解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恩格斯说:“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同上,第23页)②

恩格斯在说明辩证的发展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时写道:

“在物理学中……每种变化都是量到质的转化,是物体所固有或所承受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9—420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420页。——编者注

的某一形式的运动的量在数量上发生变化的结果。例如,水的温度最初对它的液体状态是无足轻重的;但是由于液体水的温度的增加或减少,便会达到这样的一点,在这一点上这种聚集状态就会发生变化,水就会变为蒸汽或冰。……例如,必须有一定的最低强度的电流才能使电灯泡中的白金丝发光,每种金属都有自己的白热点和融解点,每种液体在一定的压力下都有其特定的冰点和沸点,——只要我们有办法造成相应的温度;最后,例如,每种气体都有其临界点,在这一点上相当的压力和冷却能使气体变成液体。……物理学的所谓常数(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点。——约·斯大林注),大部分不外是这样一些关节点的名称,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量的(变化)增加或减少会引起该物体的状态的质的变化,所以在这些关节点上,量转化为质。”(同上,第527—528页)①

接着,恩格斯讲到化学时又说:

“化学可以称为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黑格尔本人已经知道这一点……拿氧来说:如果结合在一个分子中的有三个原子,而不是象普通那样只有两个原子,那么我们就得到臭氧,一种在气味和作用上与普通氧很不相同的物体。更不待说,如果把氧同氮或硫按不同的比例化合起来,那么其中每一种化合都会产生出一种在质的方面和其他一切物体不同的物体!”(同上,第528页)②

最后,恩格斯在批评杜林,批评这位大骂黑格尔而暗中又剽窃黑格尔关于从无感觉世界王国进到感觉的王国,从无机界王国进到有机生命王国,是向新状态的飞跃这一著名原理的杜林时写道:

“这完全是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在这里纯粹量的增多或减少,在一定的关节点上就引起**质的飞跃**,例如在把水加热或冷却的时候,沸点和冰点就是这种关节点,在这种关节点上——在标准压力下——完成了进入新的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7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487—488页。——编者注

聚集状态的飞跃,因此,在这里量就转变为质。”(同上,第45—46页)①

(4)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的出发点是:自然界的对象或自然界的现象含有内在的矛盾,因为它们都有其反面和正面,都有其过去和将来,都有其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而这种对立面的斗争,旧东西和新东西之间、衰亡着的东西和产生着的东西之间、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之间的斗争,就是发展过程的内在内容,就是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内在内容。

因此,辩证方法认为,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是通过现象和谐的开展,而是通过对象、现象本身固有矛盾的揭露,通过在这些矛盾基础上活动的对立倾向的“斗争”进行的。

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哲学笔记》俄文版第263页)②

其次:

“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3卷第301页)③

简略说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这样。

不难了解,把辩证方法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把这些原理应用到社会历史上去,应用到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上去,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既然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现象,既然一切现象都是彼此联系、互相制约的,那就很明显,在估计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制度、每一个社会运动的时候,不应当象历史学家常做的那样,从“永恒正义”或其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4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页。——编者注

③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12页。——编者注

他某种成见出发,而应当从产生这种制度、这个社会运动的条件和同它们有联系的条件出发。

奴隶占有制度,从现代的条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现象,是反常的荒谬事情。然而在原始公社制度瓦解的条件下,奴隶占有制度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合乎规律的现象,因为它同原始公社制度相比是前进了一步。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在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条件下,譬如说在1905年的俄国,是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正确的和革命的要求,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当时意味着前进一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从我们苏联现在的条件看来,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和反革命的要求,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同苏维埃共和国相比是后退了一步。

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转移。

显然,没有这种观察社会现象的历史观点,历史科学就会无法存在和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能使历史科学不致变成偶然现象的糊涂账,不致变成一堆荒谬绝伦的错误。

其次,既然世界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发展中,既然旧东西衰亡和新东西生长是发展的规律,那就很明显,没有什么“不可动摇的”社会秩序,没有什么私有制和剥削的“永恒原则”,没有什么农民服从地主、工人服从资本家的“永恒观念”。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用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正如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代替了封建制度一样。

这就是说,不要指望已经不再发展的社会阶层,即使这些阶层在现时还是占优势的力量,而要指望正在发展的、有前途的阶层,即使这些阶层在现时还不是占优势的力量。

在 19 世纪 80 年代,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斗争的时期,俄国无产阶级同当时占人口大多数的个体农民比较起来,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但是无产阶级是一个发展着的阶级,农民则是一个日趋瓦解的阶级。正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发展着的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就指靠无产阶级。他们没有错,因为大家知道,无产阶级后来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力量发展成了历史上和政治上的头等力量。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

其次,既然从缓慢的量变进到迅速的、突然的质变是发展的规律,那就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进行的革命变革,是完全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现象。

这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压迫,不可能通过缓慢的变化,通过改良来实现,而只能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质变,通过革命来实现。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做革命者,而不要做改良主义者。

其次,既然发展是通过内在矛盾的揭露,通过基于这些矛盾的对立势力的冲突来克服这些矛盾而进行的,那就很明显,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完全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现象。

这就是说,不要掩饰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矛盾,而要暴露和揭开这些矛盾,不要熄灭阶级斗争,而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执行无产阶级的不调和的阶级政策,而不要执行使无产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相协调的改良主义政策,不要执行使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妥协主义的政策。

以上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观察社会生活，观察社会历史的情形。

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那从根本上说来，它是同哲学唯心主义截然相反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是：

(1)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是“绝对观念”、“宇宙精神”、“意识”的体现，而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世界按其本质说来是物质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同形态；辩证方法所判明的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发展规律；世界是按物质运动规律发展的，并不需要什么“宇宙精神”。

恩格斯说：“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651页)①

古代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持着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列宁在谈到这个唯物主义观点时说，“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的说明。”(列宁《哲学笔记》俄文版第318页)②

(2)唯心主义硬说，只有我们的意识才是真实存在的，物质世界、存在、自然界只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在我们的感觉、表象、概念中存在，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物质、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7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5页。——编者注

自然界、存在，是在意识以外、不依赖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物质是第一性的，因为它是感觉、表象、意识的来源；而意识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因为它是物质的反映，存在的反映；思维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的产物，即人脑的产物，而人脑是思维的器官；因此，如果不愿意大错特错，那就不能把思维和物质分开。

恩格斯说：“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329页）①

其次：

“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同上，第332页）②

马克思谈到物质和思维问题时说道：

“不可能把思维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同上，第302页）③

列宁在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时写道：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意识、感觉、经验…… 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3卷第266—267页）④

其次：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4卷第223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3卷第384页。——编者注

④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2页。——编者注

“物质是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感觉的东西；物质是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物质、自然界、存在、物理的东西是第一性的，而精神、意识、感觉、心理的东西是第二性的。”(同上，第119—120页)①

“世界图景就是物质运动和‘物质思维’的图景。”(同上，第288页)②

“脑是思想的器官。”(同上，第125页)③

(3)唯心主义否认认识世界及其规律的可能性，不相信我们知识的可靠性，不承认客观真理，并且认为世界上充满着科学永远不能认识的“自在之物”，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世界及其规律完全可以认识；我们关于自然界规律的知识，经过经验和实践检验过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东西，而只有还没有被认识、而将来科学和实践的力量会加以揭示和认识的东西。

恩格斯在批判康德和其他唯心主义者所谓世界不可认识和“自在之物”不可认识的论点，坚持唯物主义关于我们的知识是可靠知识这一著名原理时写道：

“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时，‘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田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百分之九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146页和第147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361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153页。——编者注

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①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330页）^②

列宁指责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尤什凯维奇以及马赫的其他信徒堕入信仰主义（一种排斥科学而崇尚信仰的反动理论），列宁坚持唯物主义的著名原理，说我们关于自然界规律的科学知识是可靠的，说科学的规律是客观真理。列宁写道：

“现代信仰主义决不否认科学；它只否认科学的‘过分的奢望’，即科学想达到客观真理的奢望。如果客观真理存在着（如唯物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只有那在人类‘经验’中反映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学才能给我们提供客观真理，那么一切信仰主义就无条件地被否定了。”（《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3卷第102页）^③

简略说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的特征就是这样。

显而易见，把哲学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把这些原理应用到社会历史上去，应用到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上去，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既然自然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那么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这就是说，社会生活、社会历史不再是一堆“偶然现象”，因为社会历史成了社会有规律的发展，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成了一种

① 指海王星。——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222页。——编者注

③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124页。——编者注

科学。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不应该以“卓越人物”的善良愿望为基础，不应该以“理性”、“普遍道德”等等的要求为基础，而应该以社会发展的规律为基础，以研究这些规律为基础。

其次，既然世界可以认识，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以认识，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成果。

这就是说，尽管社会生活现象错综复杂，但是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例如同生物学一样的精密的科学，能够拿社会发展规律来实际应用。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在它的实际活动中，不应该以任何偶然动机为指南，而应该以社会发展规律、以这些规律中得出的实际结论为指南。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从关于人类美好未来的空想变成了科学。

这就是说，科学和实际活动的联系、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它们的统一，应当成为无产阶级党的指路明星。

其次，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既然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们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意识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社会的物质生活是不依赖于人们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是存在的反映。

这就是说，形成社会的精神生活的源泉，产生社会思想、社会

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①的源泉,不应当到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本身中去寻求,而要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中去寻求,因为这些思想、理论和观点等等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这就是说,社会历史的不同时期所以有不同的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在奴隶占有制度下是一种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在封建制度下是另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又是一种,——那不能用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本身的“本性”和“属性”来解释,而要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的不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解释。

社会存在怎样,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怎样,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也就怎样。

因此马克思说: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269页)^②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要不陷入空想家的地位,无产阶级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就不应当从抽象的“人类理性原则”出发,而应当从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出发;不应当从“伟大人物”的善良愿望出发,而应当从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

包括民粹派、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在内的空想主义者所以垮台,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承认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首要作用,他们陷入唯心主义,不是把自己的实际活

^① 原文为 учреждение,系指和一定的理论观点相适应的制度、组织机构等。

……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编者注

动建筑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上，而是不顾这种需要并且违反这种需要，把自己的实际活动建筑在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理想计划”和“包罗万象的方案”上。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和生命力在于，它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正是以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为依据，任何时候也不脱离社会的现实生活。

但是，从马克思的话中不能引出这样的结论：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在社会生活中没有意义，它们不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影响社会生活物质条件的发展。我们在这里暂且只是说到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的起源，只是说到它们的产生，只是说到社会精神生活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至于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的意义，至于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不否认，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们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中的重大作用 and 意义。

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有旧的和理论，它们是衰颓的、为社会上衰颓势力的利益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社会前进。也有新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为社会上先进势力的利益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前进，而且它们愈是确切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它们的意义就愈大。

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向社会提出新的任务以后，才会产生。可是，它们一经产生，就会成为促进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促进社会前进的最重大的力量。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政治观点和新政治设施的那种极其伟大的组织作用、动员作用和改造作用。新的

社会思想和理论所以产生,正是因为它们是社会所必需的,因为没有它们那种组织工作、动员工作和改造工作,就不可能解决社会物质生活发展中的已经成熟的任务。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就为自己开拓道路,成为人民群众的财富,它们动员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去反对社会上衰颓的势力,从而有助于推翻社会上衰颓的、阻碍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势力。

可见,社会思想、理论和政治设施,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即社会存在的发展所提出的已经成熟的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便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影响社会物质生活,为彻底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已经成熟的任务,为社会物质生活能进一步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因此马克思说: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卷第406页)①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为着有可能去影响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加速这些条件的发展,加速这些条件的改善,就应当依据这样一种社会理论和社会思想,这种理论和思想正确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因而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能动员他们,把他们组织成一支决心粉碎社会反动势力、为社会先进势力开辟道路的无产阶级党的大军。

“经济派”和孟什维克所以垮台,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承认先进理论、先进思想有动员作用、组织作用和改造作用,他们陷入庸俗唯物主义,把先进理论和先进思想的作用看成几乎等于零,从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编者注

而要党消极起来,无所作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和生命力在于,它以正确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需要的先进理论为依据,把这种理论提到它应有的高度,并且把充分利用这种理论的动员力量、组织力量和改造力量,看作自己的职责。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这样来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社会物质生活发展条件和社会精神生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的。

(三)历史唯物主义。

现在还要说明一个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对于归根到底决定社会面貌、社会思想、观点和政治设施等等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应该作怎样的了解?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究竟是什么,它们的特征究竟怎样?

首先,“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无疑包括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因为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必要的和经常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怎样呢?地理环境是不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人们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从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

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是它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快得不可比拟。欧洲在三千年内已经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欧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可是,在同一时期内,欧洲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便是变化极小,连地理学也不会

提到它。这是很明显的。地理环境的稍微重大一些的变化都需要几百万年，而人们的社会制度的变化，甚至是极其重大的变化，只需要几百年或一两千年也就够了。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

其次，人口的增长，人口密度的大小，无疑也包括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中，因为人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必要因素，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物质生活。人口的增长是不是决定人们社会制度性质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也是否定的。

当然，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的发展有影响，它促进或者延缓社会的发展，但是它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可能是**决定的影响**，因为人口的增长本身并不能说明为什么某种社会制度恰恰被一定的新制度所代替，而不是被其他某种制度所代替；为什么原始公社制度恰恰被奴隶占有制度所代替，奴隶占有制度被封建制度所代替，封建制度被资产阶级制度所代替，而不是被其他某种制度所代替。

如果人口的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那么较高的人口密度就必定会产生出相应的较高类型的社会制度。可是，事实上没有这样的情形。中国的人口密度比美国高 3 倍，但是从社会发展来看，美国高于中国，因为在中国仍然是半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而美国早已达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比利时的人口密度比美国高 18 倍，比苏联高 25 倍，但是从社会发展来看，美国高于比利时，同苏联相比，比利时更是落后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因为在比

利时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苏联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在国内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人口的增长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面貌的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

(1)既然如此，那么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体系中，究竟什么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从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这种力量就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就是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食品、衣服、鞋子、住房、燃料和生产工具等等**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要生活，就要有食品、衣服、鞋子、住房和燃料等等，要有这些物质资料，就必须生产它们，要生产它们，就需要有人们用来生产食品、衣服、鞋子、住房和燃料等等的生产工具，就需要善于生产这些工具，善于使用这些工具。

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

但是生产力还只是生产的一个方面，生产方式的一个方面，它所表示的是人们同那些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自然物和自然力的关系。生产的另一个方面，生产方式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即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同自然界作斗争以及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质资料，并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绝、各人单独进行的，而是以一个人群为单位、以社会为单位共同进行的。因此，生产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在实现物质资料的**生产**的时候，在生产内部彼此建立这种或那种相互

关系，即这种或那种生产关系。这些关系可能是不受剥削的人们彼此间的合作和互助关系，可能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最后，也可能是从一种生产关系形式向另一种生产关系形式过渡的关系。可是，不管生产关系带有怎样的性质，它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制度下，都同社会的生产力一样，是生产的必要因素。

马克思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429页）^①

可见，生产、生产方式既包括社会生产力，也包括人们的生产关系，而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

（2）生产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永远也不会长久停留在一点上，而是始终处在变化和发展的状态中；同时，生产方式的变化又必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的变化，即引起全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人们有着不同的生产方式，或者说得粗浅一些，过着不同方式的生活。在原始公社制度下有一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下有另一种生产方式，在封建制度下又有一种生产方式，如此等等。与此相适应，人们的社会制度、他们的精神生活、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政治设施也是各不相同的。

社会的生产方式怎样，社会本身基本上也就怎样，社会的思想和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也就怎样。

或者说得粗浅一些，人们的生活方式怎样，人们的思想方式也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编者注

就怎样。

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是各种生产方式在许多世纪过程中依次更迭的历史,是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史。

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力量、生产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劳动群众的历史。

这就是说,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就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结为那些蹂躏他国的“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

这就是说,研究社会历史规律的关键,不应该到人们的头脑中,到社会的观点和思想中去寻求,而要到社会在每个特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中,即到社会的经济中去寻求。

这就是说,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是研究和揭示生产的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要想成为真正的党,首先应当掌握生产发展规律的知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知识。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无产阶级党在制定自己的党纲以及进行实际活动的时候,首先应当从生产发展的规律出发,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出发。

(3)生产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生产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所以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

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关系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不依赖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生产力，加速或者延缓它的发展。而且必须指出：生产关系不能过分长久地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并和这一增长相矛盾，因为只有当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状况，并且给生产力以发展余地的时候，生产力才能充分地发展。因此，无论生产关系怎样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们迟早必须适合——也确实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不然，生产体系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就会根本破坏，整个生产就会破裂，生产就会发生危机，生产力就会遭到破坏。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经济危机就是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是两者冲突的例子，在那里，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同生产力的性质极不适合。这种不适合的结果，就是破坏生产力的经济危机，而这种不适合的情况本身是以破坏现存生产关系、建立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新生产关系为使命的社会革命的经济基础。

反之，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①的例子，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全适合，因此在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

所以，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而且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

①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性质完全适合的问题，可参看斯大林后来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见本文集第 637 页和第 650 页）。——编者注

生产力怎样,生产关系就必须怎样。

生产力的状况所回答的问题是人们用怎样的生产工具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生产关系的状况所回答的则是另一个问题: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流、矿藏、原料、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交通工具、通信工具等等)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由谁支配——由全社会支配,还是由个人、集团和阶级支配并且被用来剥削其他个人、集团和阶级。

下面就是从古代到今天的生产力发展的一般情景。从粗笨的石器过渡到弓箭,与此相联系,从狩猎生活过渡到驯养动物和原始畜牧;从石器过渡到金属工具(铁斧、铁铧犁等等),与此相适应,过渡到种植植物和农业;用于加工材料的金属工具进一步改良,过渡到铁匠的风箱,过渡到陶器生产,与此相适应,手工业得到发展,手工业脱离农业,独立手工业生产以及后来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得到发展;从手工业生产工具过渡到机器,手工业—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变为机器工业;进而过渡到机器体系,出现现代化机械化大工业,——这就是人类史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大致的、远不完备的情景。这里很明显,生产工具的发展和改善是由参加生产的人来实现的,而不是与人无关的,所以,生产工具变化和发展了,生产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人也随着变化和发展,人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以及运用生产工具的本领也随着变化和发展。

随着社会生产力在历史上的变化和发展,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也相应地变化和发展。

历史上生产关系有五大类型: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

在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性质。石器以及后来出现的弓箭，使人无法单身去同自然力量和猛兽作斗争。为了在森林中采集果实，在水里捕鱼，建筑某种住所，人们不得不共同工作，否则就会饿死，就会成为猛兽或邻近公社的牺牲品。公共的劳动导致生产资料和产品公有制。这里还不知道什么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不过有些同时用作防御猛兽的工具的生产工具归个人所有。这里没有剥削，也没有阶级。

在奴隶占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 and 占有生产工作者，这些生产工作者就是奴隶主可以把他们当作牲畜来买卖和屠杀的奴隶。这样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这时人们拥有的已经不是石器，而是金属工具；这时，没有畜牧业、也没有农业的那种贫乏原始的狩猎经济，已经被畜牧业、农业、手工业以及这些生产部门之间的分工所代替；这时已经有可能在各个人之间和各公社之间交换产品，有可能把财富积累在少数人手中，而生产资料确实积累在少数人手中，这时已经有可能迫使大多数人服从少数人并且把大多数人变为奴隶。这里社会一切成员在生产过程中的那种共同的自由的劳动没有了，占主要地位的是受不劳动的奴隶主剥削的奴隶的强迫劳动。因此生产资料和产品公有制也没有了。代替它的是私有制。这里，奴隶主是第一个和基本的十足的私有者。

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享有完全权利的人和毫无权利的人，他们彼此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这就是奴隶占有制度的情景。

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 and 不完全地占有生产工作者，这些生产工作者就是封建主已经不能屠

杀但是可以买卖的农奴。除了封建所有制以外，还存在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本身劳动为基础的个体所有制，他们占有生产工具和自己的私有经济。这样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铁的冶炼和加工更进一步的改善，铁犁和织布机的推广，农业、园艺业、酿酒业和制油业的继续发展，除手工业作坊以外工场手工业企业的出现，——这就是当时生产力状况的特征。

新的生产力要求工作者在生产中能表现出某种主动性，愿意劳动，和劳动有某种利害关系。于是，封建主就抛弃奴隶，抛弃这种和劳动没有利害关系、完全没有主动性的工作者，宁愿利用农奴，因为农奴有自己的经济、自己的生产工具，农奴和劳动有某种利害关系，这是为耕种土地并从自己收成中拿出一部分实物交给封建主所必需的。

私有制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剥削几乎同奴隶制度下的剥削一样残酷，不过是稍许减轻一些罢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是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这里已经没有私自占有生产工作者的情形，这时的生产工作者，即雇佣工人，是资本家既不能屠杀，也不能出卖的，因为雇佣工人摆脱了人身依附，但是他们没有生产资料，所以为了不致饿死，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套上剥削的枷锁。除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外，还存在着摆脱了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且这种私有制在初期是很流行的。手工业作坊和工场手工业企业被用机器装备起来的大工厂所代替。用农民简陋的生产工具耕作的贵族庄园，被根据农艺学经营的、使用农业机器的资本主义大

农场所代替。

新的生产力要求生产工作者比闭塞无知的农奴有文化、伶俐，能够懂得机器和正确地使用机器。因此，资本家宁愿利用摆脱农奴制羁绊、有相当文化程度来正确使用机器的雇佣工人。

可是，资本主义把生产力发展到巨大的规模以后，便陷入它解决不了的矛盾中。资本主义生产出日益增多的商品并且减低商品的价格，这样就使竞争尖锐化，使大批中小私有者破产，把他们变成无产者，缩小他们的购买力，因而使生产出来的商品无法销售出去。资本主义扩大生产并把千百万工人集合在大工厂内，这样就使生产过程具有社会性，因而破坏资本主义本身的基础，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要求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却仍然是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不相容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

生产力性质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通过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暴露出来，在危机时期，资本家由于自己使居民群众遭受破产而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得不烧掉产品，销毁成品，停止生产，破坏生产力；千百万居民则被迫失业挨饿，而这并不是由于商品不够，却是因为商品生产太多。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不再适合社会生产力状况，它同社会生产力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孕育着革命，这个革命的使命就是要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来代替现存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这就是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目前还只有在苏联实现的这种制度下，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里已经没有剥削者，也没有被剥削者。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根据“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按劳动分配的。这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是不受剥削的工作者之间同志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的关系。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

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没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没有同危机相联系的荒谬现象。

因此，生产力在这里以加快的速度发展着，因为适合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有这样发展的充分广阔的天地。

这就是人类史上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情景。

这就是生产关系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依赖于生产工具的发展的情况，因为有这种依赖关系，所以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相应的变化和发展。

马克思说：“劳动资料^①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卡·马克思《资本论》1935年俄文版第1卷第121页）^②

其次：

“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

① 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资料”，主要是指生产工具。——约·斯大林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编者注

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364页）①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才是停滞不动的。”（同上，第364页）②

恩格斯在说明《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时说道：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恩格斯为《宣言》德文版所作的序言）③

（4）生产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新的生产力以及同它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不是离开旧制度而单独发生，不是在旧制度消灭以后，而是在旧制度内部发生的；不是人们有意的、自觉的活动的结果，而是自发地、不自觉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的。其所以是自发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因为每一辈新人开始生活时，他们就遇到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前辈人工作的结果，因此新的一辈在最初必须接受他们在生产方面所遇到的一切现成东西，必须适应这些东西，以便有可能生产物质资料。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109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232页。——编者注

第二个原因,就是人们在改进这种或那种生产工具、这种或那种生产力因素时,不会意识到,不会了解到,也不会想到,这些改进将会引起怎样的社会结果,而只是想到自己的日常利益,只是想要减轻自己的劳动,谋得某种直接的、可以感触到的益处。

原始公社社会的某些成员在逐渐地摸索着从石器过渡到铁器的时候,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种革新会引起怎样的社会结果;他们没有了解到,也没有意识到,向金属工具过渡意味着生产中的变革,结果一定会引起奴隶占有制度,——当时他们只是想要减轻自己的劳动和谋得眼前的感觉得到的益处,——他们当时的自觉活动只局限于这种日常个人利益的狭隘范围。

在封建制度时期,欧洲年轻的资产阶级在行会小作坊之外,开始建设大的工场手工业企业,从而推进了社会生产力,它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种革新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它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这种“细微的”革新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结果会发生革命,这个革命不但会打倒它所十分感恩的王权,而且会打倒它的优秀人物往往梦想厕身其间的贵族,——当时资产阶级只是想要减低商品生产的费用,把更多的商品投到亚洲市场和刚发现的美洲市场,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当时的自觉活动只局限于这种日常实践的狭隘范围。

俄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一起加紧在俄国培植现代化机械化大工业,丝毫也不触动沙皇制度,听凭地主们宰割农民,当时,他们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生产力的这种巨大增长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他们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社会生产力方面的这种巨大的飞跃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结果会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农民联合起来实现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当时他们只是

想要极度地扩大工业生产，掌握巨大的国内市场，变成垄断资本家，并且从国民经济中汲取更多的利润，——他们当时的自觉活动并没有超出他们的日常实践的狭隘利益。

因此马克思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即在人们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中。——约·斯大林注）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①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269页）^②

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从旧生产关系到新生产关系的过渡是一帆风顺、不经过冲突、不经过震荡的。相反地，这种过渡通常是通过用革命手段推翻旧生产关系、树立新生产关系的办法来实现的。在一定时期以前，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是自发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进行的。但这只是在一定时期以前，只是在已经产生和正在发展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成熟以前。而在新生产力成熟以后，现存的生产关系以及体现这种生产关系的统治阶级就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这只有通过新兴阶级的自觉活动，只有通过这些阶级的暴力行动，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扫除。在这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新社会思想、新政治设施和新政权的**巨大作用**，它们的使命就是用暴力消灭旧生产关系。在新生产力同旧生产关系冲突的基础上，在社会新的经济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社会思想，新思想组织和动员群众，群众团结成为新的政治大军，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权，并且运用这个政权，以使用暴力消灭生产关系方面的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于是，自发的发

①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编者注

过程让位给人们自觉的活动,和平的发展让位给暴力的变革,进化让位给革命。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共产党宣言》1938年俄文版第52页)①

其次: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同上,第50页)②

“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资本论》1935年俄文版第1卷第603页)③

以下就是马克思在1859年在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有历史意义的《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所作的天才的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1卷第272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2卷第256页。——编者注

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269—270页）^①

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情形。

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

译自《列宁主义问题》第11版
第574—602页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编者注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英雄的 “祖国号”飞机机组时的讲话^①”

(报 道)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妇女在生产、文化、科学工作的各个方面,以及在象航空事业这样的极其困难、妇女似乎无法进入的领域里,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良好环境中,苏联妇女在所有这些活动领域里已经和男子并驾齐驱,并且在许多场合还超过了男子。

斯大林同志接着提醒大家要十分珍重我们所有的东西中最宝贵的东西,即人的生命,特别是我们勇敢的,有时勇敢得过度的英雄飞行员们的生命。对我们来说,这些生命比任何记录更宝贵,不管这些记录如何伟大,如何轰动。因此,为保护我们的英雄们的生命,为保护他们的家庭的安宁和幸福,党和政府将极端严格地对待飞行员们要求准许他们作危险的创记录飞行的申请,只在很少的

① 苏联女飞行员瓦·捷·格里佐杜博娃、波·杰·奥西片科和玛·米·拉斯科娃于1938年9月24日驾驶“祖国号”飞机从莫斯科向远东飞行。她们连续飞行了26小时29分,飞行距离按航线为6450公里,按直线为5947公里。飞行23小时以后,飞机与地面失去联系。苏联政府和沿线军民采取了积极营救措施,最终于10月4日在共青城地区的大森林里发现了她们。她们返回莫斯科后,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于1938年10月27日在克里姆林宫为她们举行了招待会。——编者注

特殊场合才批准这种飞行。

在表彰北方征服者们的英勇业绩时，斯大林同志向伊·德·帕帕宁和极地飞行员的友好大家庭祝贺。

斯大林同志向成功地在大森林里找到了“祖国号”机组、并立即援救了她们的萨哈罗夫、布尔拉科夫、罗曼诺夫、杰尔昆斯基、吉洪诺夫等同志表示祝贺，建议为这些普通的苏联飞行员——我们光荣的苏维埃航空事业的支柱和希望干杯。

译自 1938 年 10 月 28 日《真理报》

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①上 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1939年3月10日)

苏联的国际形势

同志们！自从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五年了。你们看，这个时期是不短的。在这个时期内，世界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各个国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方面都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

在这个时期内国际环境究竟起了什么变化呢？我国国内外形势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这个时期无论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都是发生极严重震荡的时期。在经济方面，这些年是萧条的年份，而后来从1937年下半年起，则是新的经济危机的年份，是美国、英

① 这次代表大会于1939年3月10—21日在莫斯科举行，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第三个五年计划、修改党章、选举修改党纲的委员会和选举党中央机关。

——编者注

国、法国工业重新衰落的年份，因而也是产生新的经济困难的年份。在政治方面，这些年是发生严重的政治冲突和震荡的年份。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年头，这次战争是在从上海到直布罗陀的广大地区内进行的，它席卷了 5 亿多人口。欧洲、非洲、亚洲的地图正在被用强力改画着。战后的所谓和平制度的整个体系从根本上动摇了。

相反，对苏联来说，这些年却是它壮大和繁荣的年份，是它的经济和文化进一步高涨的年份，是它的政治和军事威力进一步增长的年份，是它为维护全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年份。

总的情况就是这样。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有关国际环境中的变化的具体材料。

1. 资本主义各国的新的经济危机。争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以及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

从 1929 年下半年开始的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危机一直延续到 1933 年底。此后，危机转为萧条，继而工业开始有些复苏，有些上升。可是，工业的这种复苏没有象通常复苏时期那样转为繁荣。相反，从 1937 年下半年起又开始了新的经济危机，首先卷入的是美国，随后是英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

这样，资本主义各国还没有来得及从不久以前的经济危机打击之下复原，就又面临了新的经济危机。

这种情况自然使失业现象更为严重起来。资本主义各国的失业人数，本来已经从 1933 年的 3 000 万人减少到 1937 年的 1 400 万人，现在由于新的危机又增加到 1 800 万人。

新危机的特点在于，它同上次危机大不相同，不是比上次更

好,而是比上次更坏。

首先,新危机并不象 1929 年发生的危机那样开始于工业繁荣之后,而是开始于萧条和少许复苏之后,但是这种少许复苏没有转为繁荣。这就表明,目前的危机将比上次危机更为沉重,更难于克服。

其次,目前的危机并不是在和平时期爆发的,而是在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已经打了起来的时期爆发的。这时,日本同中国作战已经进入第二年,它破坏着极为广大的中国市场,使其他各国商品几乎无法染指;这时,意大利和德国已经把自己的国民经济转上了战时经济的轨道,并为此消耗了自己的原料储备和外汇储备;这时,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强国都开始按战时方式进行改造。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所拥有的按通常方式摆脱目前危机的资源,将比上次危机时期少得多。

最后,和上次危机不同,目前的危机不是普遍的危机,它暂时主要只是席卷了还没有转上战时经济轨道的几个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至于象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这些已经按战时方式改造了本国经济的侵略国,由于它们加紧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还没有陷于生产过剩的危机,不过它们正在接近这种危机。这就是说,当经济实力雄厚的非侵略国开始摆脱危机阶段的时候,各侵略国就一定会由于在战争狂热中耗尽了自己的黄金储备和原料储备,而进入最剧烈的危机阶段。

只要列举资本主义各国现存的有形黄金储备的统计数字,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资本主义各国的有形黄金储备

(单位: 百万旧美金)

	1936 年底	1938 年 9 月
总 共	12 980	14 301
美 国	6 649	8 126
英 国	2 029	2 396
法 国	1 769	1 435
荷 兰	289	595
比利时	373	318
瑞 士	387	407
德 国	16	17
意大利	123	124
日 本	273	97

从上表可以看出, 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黄金储备加在一起, 还没有瑞士一国的储备多。

下列一些数字足以说明最近五年来资本主义各国工业危机的情况和苏联工业高涨的情况。

以 1929 年为标准的工业总产值百分比

(1929 年 = 100)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美 国	66.4	75.6	88.1	92.2	72.0
英 国	98.8	105.8	115.9	123.7	112.0
法 国	71.0	67.4	79.3	82.8	70.0
意 大 利	80.0	93.8	87.5	99.6	96.0
德 国	79.8	94.0	106.3	117.2	125.0
日 本	128.7	141.8	151.1	170.8	165.0
苏 联	238.3	293.4	382.3	424.0	477.0

从上表可以看出, 苏联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危机的国家, 它的工

业一直在上升。

其次,从上表可以看出,在美国、英国和法国,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并且正在发展。

再其次,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比德国更早地把自己的国民经济转上战时经济轨道的意大利和日本,工业下降时期在 1938 年已经开始了。

最后,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比意大利和日本较迟地按战时方式改造本国经济的德国,工业暂时还处在稍许向上发展的状态,固然发展得不多,但总算是向上发展,——这同日本和意大利不久以前的情况很相似。

毫无疑问,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德国工业一定也会走上日本和意大利已经走上的那条下坡路。因为,把国家经济转上战时经济轨道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使工业朝着片面的军事方向发展,极力扩大同居民需要无关的战争必需品的生产,极力缩减居民消费品的生产,特别是缩减其市场投放量,因而就是缩减居民的消费,使国家陷入经济危机。

这就是资本主义各国新的经济危机发展的具体情况。

显然,这种不顺利的经济情况不能不造成列强之间关系的尖锐化。上次危机已经搞乱了全局,使争夺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斗争尖锐化了。日本占领东北和华北,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这一切都反映出列强之间斗争的尖锐程度。新的经济危机一定会使,而且确实正在使帝国主义的斗争进一步尖锐化。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市场竞争,不是商业战争,不是倾销政策了。这些斗争手段早已被认为不够用了。现在的问题是要用军事行动来重新瓜分世界,划分势力范围和分割殖民地。

日本开始为它的侵略行为辩护,说什么在缔结九国公约时,它少分了东西,没有让它靠损害中国来扩大自己的领土,而英国和法国却占有庞大的殖民地。意大利回想起,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后的分赃中,它少分了东西,它应当靠缩小英国和法国的势力范围得到补偿。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凡尔赛和约而受到严重损失的德国附和了日本和意大利,要求扩大自己在欧洲的领土,索还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中被战胜国夺去的殖民地。

这样就开始形成了三个侵略国的同盟。

通过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2. 国际政治形势的尖锐化, 战后和约体系的崩溃, 新的帝国主义大战的开始

现在我列举一下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的一些激起了新的帝国主义大战的最重要事件。1935年,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并且占领了它。1936年夏,德国和意大利对西班牙进行了武装干涉,而且德国占领了西班牙北部和西属摩洛哥,意大利则占领了西班牙南部和巴利阿里群岛。日本侵占东北以后,又于1937年侵入华北和华中,侵占了北京、天津、上海,并开始把外国竞争者从占领区排挤出去。1938年初,德国侵占了奥地利,而在1938年秋,又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1938年底,日本侵占了广州,而在1939年初又侵占了海南岛。

这样,悄悄地降临到各国人民头上的战争就席卷了5亿多人口,战事蔓延在广阔的土地上,从天津、上海和广州,经过阿比西尼亚,一直到直布罗陀。

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以后,战胜国,主要是英国、法国和美

国建立了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制度，即战后和平制度。这个制度的主要基础在远东是九国公约，在欧洲是凡尔赛条约以及一系列其他条约。国际联盟的使命是，在这个制度范围内，以各国统一战线为基础，以集体保护各国安全为基础来调整各国之间的关系。但是，三个侵略国以及它们所发动的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彻底推翻了这个战后的和平制度的体系。日本撕毁了九国公约，德国和意大利撕毁了凡尔赛条约。为了便于自由行动，这三个国家都退出了国际联盟。

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已经成为事实了。

在我们的时代，要想不顾各种条约，不顾社会舆论，一下子就挣脱锁链而直接奔向战争，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对这一点相当清楚。法西斯头子也了解这一点。所以，法西斯头子在奔向战争以前，决定用某种手法来炮制舆论，就是要迷惑舆论，欺骗舆论。

是德国和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来反对英国和法国在欧洲的利益吗？得了吧，这算什么同盟！“我们”没有任何军事同盟。“我们”只不过有一个毫无害处的“柏林—罗马轴心”，即某种关于轴的几何学公式而已。

是德、意、日结成军事同盟来反对美、英、法在远东的利益吗？没有的事！我们没有任何军事同盟。“我们”只不过有一个毫无害处的“柏林—罗马—东京三角”，即对几何学的一点小小的爱好罢了。

是反对英国、法国、美国利益的战争么？胡扯！“我们”进行的是反对共产国际的战争，而不是反对这些国家的战争。如果不信，就请读一读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缔结的“反共产国际协定”。

侵略者老爷们就是想这样来炮制舆论的，虽然显而易见这是一套无法掩饰真相的笨拙把戏，因为要想在蒙古的沙漠上，在阿比西尼亚的群山间，在西属摩洛哥的丛林里寻找共产国际的“策源地”，是可笑的。

但是，战争是铁的事实，任何东西都掩盖不了。因为用任何“轴心”、“三角”和“反共产国际协定”都掩盖不了如下的事实：就是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占了中国的广大领土，意大利侵占了阿比西尼亚，德国侵占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德国和意大利共同占领了西班牙，——这一切都是违反非侵略国的利益的。战争始终是战争，侵略者的军事同盟始终是军事同盟，而侵略者始终是侵略者。

新的帝国主义大战的特点在于，它还没有成为普遍的世界大战。侵略国进行着战争，百般损害非侵略国的利益，首先是英国、法国、美国的利益，而英国、法国、美国却一再后退，接连向侵略者让步。

于是，我们看到，侵略国正在靠损害非侵略国的利益公开地重新瓜分世界和划分势力范围，而非侵略国不但没有一点反抗的企图，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加以纵容。

这是不可思议的，但这是事实。

应当怎样解释新的帝国主义大战的这种片面的奇怪的性质呢？

拥有巨大能力的非侵略国怎么会这样轻易地、不加抵抗地放弃自己的阵地和义务而去讨好侵略者呢？

是不是由于非侵略国力量薄弱呢？当然不是！非侵略的民主国家加在一起，无论在经济方面和军事方面无疑都比法西斯国家强大。

既然如此,究竟为什么这些国家一再地向侵略者让步呢?

比如说,这种情况也许可以用害怕革命的心理来解释,因为非侵略国一旦加入战争,战争又会成为世界性的,那时就有可能爆发革命。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当然知道,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使革命在最大的国家之一取得了胜利。他们害怕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也会使革命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里取得胜利。

但是现在,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在于,大多数非侵略国、首先是英国和法国放弃了集体安全政策,放弃了集体抵抗侵略者的政策,而转上了不干涉的立场,“中立”的立场。

从表面上也许可以这样来说明不干涉政策:“让每个国家按自己的意愿和能力去防御侵略者吧,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既要同侵略者做生意,也要同他们的牺牲者做生意。”但是事实上,不干涉政策就是纵容侵略,就是策动战争,因而就是把它变成世界大战。在不干涉政策中贯串着一种倾向,一种愿望,这就是不妨碍侵略者去干它们的黑暗勾当,比如不妨碍日本纠缠于对华战争,更好是对苏战争,比如不妨碍德国陷入欧洲事务和纠缠于对苏战争,让所有交战国都深陷到战争的漩涡中去,暗中鼓励它们这样干,让它们相互削弱,相互消耗,然后,当它们疲惫不堪时,自己就以充沛的力量出台活动,当然是“为了和平”而出台活动,并迫使那些筋疲力尽的交战国接受自己的条件。

真是价廉物美啊!

就拿日本为例。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开始侵入华北以前,法国和英国的一切有权威的报纸都大声叫嚷说,中国力量薄弱,无力抵抗,日本及其军队在两三个月内就能征服中国。然后,欧美的政

治家就开始等待和观望。后来,当日本展开军事行动时,他们就向日本让出了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心脏上海,让出了华南的英国垄断势力的基地广州,让出了海南岛,让日本包围香港。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很象在鼓励侵略者说:你继续往战争里陷吧,将来我们再看着办。

或者,拿德国为例。他们不顾维护奥地利独立的义务,而把奥地利让给了德国;他们违背所有一切义务而让出了苏台德区,使捷克斯洛伐克处于听天由命的地步,然后就在报刊上大肆造谣说,“俄国军队软弱无力”,“俄国空军瓦解了”,苏联内部发生了“骚动”,从而推动德国人继续东进,约许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战利品,并且说:你们只要同布尔什维克开战,以后的一切都会很顺当的。必须承认,这也很象是在推动侵略者,鼓励侵略者。

英法和北美的报刊就苏维埃乌克兰问题发出的叫嚣很值得注意。这些报界人士声嘶力竭地叫喊道:德国人正在向苏维埃乌克兰进军,德国人现在已经控制了约有70万人口的所谓喀尔巴阡乌克兰,德国人至迟在本年春季就会把拥有3000多万人口的苏维埃乌克兰并入所谓喀尔巴阡乌克兰。看起来,这种可疑的叫嚣的目的,是要激起苏联对德国的愤怒,毒化气氛,挑拨我们同德国发生无缘无故的冲突。

当然在德国完全可能有一些疯子梦想把苏维埃乌克兰这头大象合并到所谓喀尔巴阡乌克兰这只小甲虫那里去。如果在德国确实有这样的狂妄分子,那么可以肯定地讲,在我国就一定能够为这些疯子找到必要数量的拘束衣。但是,如果撇开疯子而转向正常的人,那么一本正经地谈论把苏维埃乌克兰合并到所谓喀尔巴阡乌克兰去,岂不显然是可笑和愚蠢的么?只要设想一下,一只小甲

虫跑到一头大象跟前,两只手往腰里一插,对它说道:“唉,你呀,你呀,我的小兄弟,我是多么可怜你呀……你生活在这里,没有地主,没有资本家,没有民族压迫,没有法西斯头子,——这算什么生活呀……我看到你时不能不对你说,除非合并到我这里来,否则你是没有救的……好吧,就这样办吧,我允许你把你那块小小的领土合并到我这块广阔无垠的领土上来……”

更值得注意的是,欧美有些政治家和报界人士对“进军苏维埃乌克兰”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于是开始亲自揭露不干涉政策的真实内幕。他们公开地讲,并且白纸黑字地写道,德国人太使他们“失望了”,因为看吧,德国人非但没有继续东进去反对苏联,却转过头来向西方索取殖民地。可以设想,他们把捷克斯洛伐克各区奉送给德国人,作为德国人负责对苏开战的价钱,而现在德国人拒绝兑现,并且叫他们滚远一些。

我绝不想从道德上来讲不干涉政策,讲变节、背叛等等。向不承认人类道德的人讲道德,是幼稚的。正如那些老奸巨猾的资产阶级外交家所说的,政治终究是政治。但是必须指出,主张不干涉政策的人们所开始的巨大而危险的政治游戏,最终会使他们遭到严重的失败。

这就是现时盛行的不干涉政策的真面目。

这就是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形势。

3. 苏联和各资本主义国家

战争在各国关系中造成了新的局面。它给这些关系带来了惊慌和怀疑的气氛。战争破坏了战后和平制度的基础,推翻了国际法的起码概念,从而使国际条约和国际义务的价值发生问题。和

平主义和裁军方案已经被埋葬了。代替它们的是武装的狂热。所有的大小国家,其中首先包括实行不干涉政策的国家,都开始武装起来了。所谓慕尼黑会议对侵略者所作的让步和慕尼黑协定似乎开辟了“绥靖”新纪元的甜言蜜语,现在谁也不再相信了。连参加慕尼黑协定的英国和法国本身也不相信这些甜言蜜语了,它们加强自己的武装并不亚于其他国家。

显然,苏联不能无视这些严重的事变。侵略者发动的任何一个战争,甚至是在世界上某个遥远的角落的一个很小的战争,无疑都是对爱好和平的国家的一种危险。至于已经席卷了亚洲、非洲、欧洲 5 亿多人口的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则是更严重的危险。因此,我国一方面始终不渝地执行维护和平的政策,同时又极力加强了我们的红军和红海军的战斗准备。

同时,苏联为了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还决定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1934 年底,我国加入了国际联盟,因为国际联盟虽然软弱,但它总还可以作为揭露侵略者的场所,作为一种虽然软弱但可以阻碍发动战争的和平工具。苏联认为,在这样不安的时刻,甚至象国际联盟这样一个软弱的国际组织,也不应加以忽略。1935 年 5 月,法国和苏联缔结了互助条约来对付侵略者可能的进攻。与此同时,又和捷克斯洛伐克缔结了类似的条约。1936 年 3 月,苏联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缔结了互助条约。1937 年 8 月,苏联同中华民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

苏联在这些困难的国际条件下执行了自己的对外政策,坚持维护和平的事业。

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很明确的:

1. 我们拥护和平,拥护加强同所有国家的事务联系,我们现在

和将来都始终坚持这个立场，只要这些国家也对苏联保持这样的关系，只要它们不试图破坏我们国家的利益。

2. 我们主张同所有与苏联交界的邻国都保持和平和亲近的睦邻关系，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始终坚持这个立场，只要这些国家也对苏联保持这样的关系，只要它们不试图直接或间接地破坏苏维埃国家边界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

3. 我们支援遭受侵略和为祖国的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

4. 我们不怕侵略者的威胁，我们准备用双倍的打击去回答企图破坏苏联边界的不可侵犯性的战争挑拨者的打击。

这就是苏联的对外政策。

苏联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中所依靠的是：

1. 自己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
2. 我们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
3. 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
4. 自己的红军和红海军；
5. 自己的和平政策；
6. 迫切需要维护和平的各国劳动者在道义上的支援；
7. 由于某种原因而不愿破坏和平的那些国家的明智态度。

* * *

党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任务是：

1. 今后还要执行维护和平和加强同所有国家的事务联系的政策；
2. 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国卷入冲突中去；
3. 大力加强我们的红军和红海军的战斗力量；

4. 加强同那些关心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友谊的各国劳动者的国际友谊联系。

二

苏联的国内形势

现在来谈谈我国的国内形势。

从苏联的国内形势来看, 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呈现出一幅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高涨、文化进一步发展、国家政治力量进一步巩固的图景。

应当认为, 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 国民经济发展方面的最重要成果是在现代新技术的基础上完成了工农业的改造。我国已经不再有, 或者几乎不再有使用落后技术装备的旧工厂和使用古老农具的旧农户了。目前, 我们工农业的基础是现代的新技术装备。可以毫不夸大地说, 从生产的技术装备来看, 从工农业的新技术装备程度来看, 我国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先进的国家, 因为在其他国家里, 旧设备成了生产的累赘, 阻碍着新技术装备的采用。

应当认为, 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 我国社会政治发展方面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彻底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残余, 把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成一条共同的劳动战线, 加强了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 加强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所有这一切的结果, 就是我国政治生活的充分民主化, 就是新宪法的制定。谁也不敢否认, 我们的宪法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 苏联最高苏维埃以及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选举结果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由于进行了这一切工作, 我国国内形势十分稳定, 国家政权异

常巩固,使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感到羡慕。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有关我国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具体材料。

1. 工业和农业的进一步高涨

(一)工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我们工业的进展呈现出一幅不断高涨的图景。这种高涨不仅反映出一般产值的增长,而且首先反映出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工业的繁荣,另一方面是私营工业的灭亡。

请看下列统计表:^①

从下表可以看出,我国的工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增长了一倍以上,而且全部都是社会主义工业产值的增长。

其次,从下表可以看出,社会主义体系是苏联工业的唯一体系。

最后,从下表可以看出,私营工业的最终灭亡,现在是连瞎子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了。

不能认为私营工业的灭亡是偶然的。它所以灭亡,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的制度。它所以灭亡,其次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使我们有可能在几年之内就以现代新技术装备为基础重新装备我们的整个社会主义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会而且也不可能提供这样的可能性。从生产的技术装备来看,从工业生产采用新技术装备的规模来看,我国的工业在世界上居于首位,这是事实。

如果按照同战前水平相比的百分数,把我国工业的增长速度

^① 统计表见第249页。——编者注

1934—1938年间苏联工业的增长情况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与上年相校的百分比					1938年对 1933年的 百分比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单位:百万卢布(按 1926—1927 年度价格计算)												
总产值	42 030	50 477	62 137	80 929	90 166	100 375	120.1	123.1	130.2	111.4	111.3	238.8
其中:												
1. 社会主义工业	42 002	50 443	62 114	80 898	90 138	100 349	120.1	123.1	130.2	111.4	111.3	238.9
2. 私营工业	28	34	23	31	28	26	121.4	67.6	134.8	90.3	92.9	92.9
百 分 比												
总产值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其中:												
1. 社会主义工业	99.93	99.93	99.96	99.96	99.97	99.97						
2. 私营工业	0.07	0.07	0.04	0.04	0.03	0.03						

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相比较，那么就会看到如下情况：

**1913—1938 年苏联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
工业增长情况**

	1913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苏 联	100.0	380.5	457.0	562.6	732.7	816.4	908.8
美 国	100.0	108.7	112.9	128.6	149.8	156.9	120.0
英 国	100.0	87.0	97.1	104.0	114.2	121.9	113.3
德 国	100.0	75.4	90.4	105.9	118.1	129.3	131.6
法 国	100.0	107.0	99.0	94.0	98.0	101.0	93.2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的工业同战前水平相比，增长了 8 倍多，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却仍然围绕战前水平踏步不前，只超过这一水平 20—30%。

这就是说，在增长速度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在世界上居于首位。

由此可见，我国的工业在生产的技术装备和增长速度方面，已经赶上并超过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那么我们究竟在哪一方面落后呢？我们在经济方面，即在我国工业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水平方面仍然是落后的。我们在 1938 年生产了约 1 500 万吨生铁，而英国生产了 700 万吨。看来我们的情况似乎比英国好些。但是，如果把这些生铁的吨数按人口数目来分摊一下，结果就是，英国在 1938 年每人可以分得 145 公斤生铁，而苏联每人只能分得 87 公斤。又如，英国在 1938 年生产了 1 080 万吨钢和约 290 亿度电（电力生产），而苏联生产了 1 800 万吨钢和 390 多亿度电。看来我们的情况似乎比英国好些。但

是，如果把所有这些吨数和度数按人口数目来分摊一下，结果就是：英国在 1938 年每人可以分得 226 公斤钢和 620 度电，而苏联每人只能分得 107 公斤钢和 233 度电。

问题究竟在哪里呢？问题在于我国的人口比英国多几倍，因而需要量也比英国多：苏联有 17 000 万人口，而英国还不到 4 600 万。一国工业的经济实力并不表现在不计人口多少的工业总产量上，而是表现在直接按人口平均消费量计算的工业产量上。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工业产量越多，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就越雄厚，相反，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越少，这个国家及其工业的经济实力就越薄弱。可见，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国家对消费品的需要量也越多，因而这个国家的工业产量也应当越多。

就拿生铁的产量为例。英国在 1938 年的生铁产量是 700 万吨，要在经济上超过英国的生铁产量，我们就必须把每年的生铁产量提高到 2 500 万吨。德国在 1938 年总共生产了 1 800 万吨生铁，要在经济上超过德国，我们就必须把每年的生铁产量提高到 4 000—4 500 万吨。要在经济上超过美国（这里指的不是 1938 年这个危机年度的水平，这一年美国只生产了 1 880 万吨生铁，而是指 1929 年美国工业高涨时期的水平，这一年美国生产了约 4 300 万吨生铁），我们就必须把每年的生铁产量提高到 5 000—6 000 万吨。

关于钢和钢材的生产，关于机器制造业等等，也必须这样说，因为，所有这些工业部门也和其他部门一样，归根到底都决定于生铁的生产。

我们在工业的生产技术装备和发展速度方面已经超过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这很好。但是这还不够。应当在经济上也超过它们。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应当做到这一点。只有在经

济上也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才可以期望我国将有充裕的消费品，丰富的产品，我们才可能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

要想在经济上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有些什么呢？为此首先要有强烈的不可遏止的进取心，要有不惜牺牲的决心，要有用大量的基本建设投资来全力扩大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决心。我们有这些条件吗？当然有！其次，为此还需要有高度的工业生产技术和高度的工业发展速度。我们有这些条件吗？当然有！最后，为此还需要时间。是的，同志们，需要时间。要建设新的工厂。要培养新的工业干部。但是，为此需要时间，而且需要不少的时间。在两三年内是不可能在经济上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为此需要较长的时间。还是拿生铁及其产量为例吧。在生铁的产量方面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在经济上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呢？原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某些工作人员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建议把第二个五年计划终结时的生铁产量规定为6 000万吨。这就是说，他们认为生铁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额可以达到1 000万吨。这当然是一种幻想，甚至比幻想更坏。而且，这些同志不仅仅在生铁产量方面沉溺于幻想。例如，他们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苏联人口每年的增长额应当是300—400万，甚至更多。这也是一种幻想，甚至比幻想更坏。可是，如果撇开幻想家而从现实出发，那就可以根据生铁生产技术的现状，把生铁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额规定为200—250万吨，这是完全可能达到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史以及我国的工业史都表明，这样的年增长额是紧张的，然而完全能够达到的。

所以，要在经济上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就需要时间，而

且需要不少的时间。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越高,生产技术越完善,我们也就能更快地实现这一极重要的经济任务,也就能使完成这一任务的期限更为缩短。

(二)农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农业和工业一样沿着高涨的路线发展。这种高涨不仅表现在农产品的增长上,而且首先表现在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农业的增长和巩固,另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灭亡上。集体农庄的谷物播种面积从1933年的7500万公顷增长到1938年的9200万公顷;而个体农户的谷物播种面积在这个期间则从1570万公顷缩减到60万公顷,即缩减到全部谷物播种面积的0.6%。至于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我就不去谈了,在这方面,个体经济的作用已经缩小到零。此外,大家知道,现在已经加入集体农庄的有1880万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3.5%,而从事渔业和其他经营的集体经济组织还没有计算在内。

这就是说,集体农庄已经最终地巩固和确立起来了,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现在是我国农业的唯一形式。

如果把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所有作物播种面积的变动同革命前播种面积的规模比较一下,就会看到如下的情况:

苏联所有作物的播种面积

	单 位: 百 万 公 顷						1938年 对1913 年的百 分比
	191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全部播种面积……	105.0	131.5	132.8	133.8	135.3	136.9	130.4
其中:							
(1)谷物……	94.4	104.7	103.4	102.4	104.4	102.4	108.5
(2)经济作物…	4.5	10.7	10.6	10.8	11.2	11.0	244.4
(3)瓜菜……	3.8	8.8	9.9	9.8	9.0	9.4	247.4
(4)饲料……	2.1	7.1	8.6	10.6	10.6	14.1	671.4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们所有作物的播种面积都增加了,首先是饲料、经济作物和瓜菜作物的播种面积增加了。

这就是说,我国农业日益成为技术程度和产品率更高的农业,而正确的轮作制的采用就具有了现实的基础。

至于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我国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他机器的装备究竟增长了多少,这可以从下面几个统计表中得到答复:

(1)苏联农业中的拖拉机总数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8年 对1933 年的百 分比
(一)拖拉机的数量(单位:千台)							
全部拖拉机·····	210.9	276.4	360.3	422.7	454.5	483.5	229.3
其中:							
(一)机器拖拉机站 中的拖拉机·····	123.2	177.3	254.7	328.5	365.8	394.0	319.8
(二)国营农场和辅 助农业企业中的 拖拉机·····	83.2	95.5	102.1	88.5	84.5	85.0	102.2
(二)牵引力(单位:千马力)							
全部拖拉机·····	3 209.2	4 462.8	6 184.0	7 672.4	8 385.0	9 256.2	288.4
其中:							
(一)机器拖拉机站 中的拖拉机·····	1 758.1	2 753.9	4 281.6	5 856.0	6 679.2	7 437.0	423.0
(二)国营农场和辅 助农业企业中的 拖拉机·····	1 401.7	1 669.5	1 861.4	1 730.7	1 647.5	1 751.8	125.0

(2) 苏联农业中的联合收割机和其他机器的总数

(单位:千部。按年底数字计算)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8年 对1933 年的百 分比
联合收割机·····	25.4	32.3	50.3	87.8	128.8	153.5	604.3
内燃机和锅驼机·····	48.0	60.9	69.1	72.4	77.9	83.8	174.6
复式和半复式脱粒机·····	120.3	121.9	120.1	123.7	126.1	130.8	108.7
载重汽车·····	26.6	40.3	63.7	96.2	144.5	195.8	736.1
轻便汽车(单位:辆)·····	3 991	5 533	7 555	7 630	8 156	9 594	240.4

除了这些数字外,如果再注意到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我国机器拖拉机站的数目从1934年的2 900个增加到1938年的6 350个的事实,那么根据所有这些统计数字就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我国农业在现代新技术装备基础上进行的改造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因此,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相比,我国的农业不仅是规模最大和机械化程度最高、因而商品率也最高的农业,而且是现代技术装备最充足的农业。

如果把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的谷物和经济作物产量的增长情况同革命前的情况比较一下,那就会看到如下的情况:

苏联谷物和经济作物的总产量

	单 位: 百 万 公 担						1938年 对1913 年的百 分比
	191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谷物·····	801.0	894.0	901.0	827.3	1 202.9	949.9	118.6
棉花(籽棉)·····	7.4	11.8	17.2	23.9	25.8	26.9	363.5
亚麻(纤维)·····	3.3	5.3	5.5	5.8	5.7	5.46	165.5
甜菜·····	109.0	113.6	162.1	168.3	218.6	166.8	153.0
油料作物·····	21.5	36.9	42.7	42.3	51.1	46.6	216.7

从上表可以看出，尽管1936年和1938年在东部和东南部各区发生了旱灾，尽管1913年是空前的丰收年，但是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我们的谷物和经济作物的总产量与1913年的水平相比，却一直不断在增长。

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谷物生产的商品率问题，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据著名的统计学家涅姆钦诺夫同志计算，在战前，从50亿普特的谷物总产量中拿到市场上出售的商品粮只有13亿普特左右，就是说当时谷物生产的商品率为26%。涅姆钦诺夫同志又算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种大规模生产的商品率，例如在1926—1927年，约占总产量的47%，而个体农民经济的商品率只有12%左右。如果更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把1938年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的商品率算作总产量的40%，结果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谷物业在这一年中能够提供而且确实提供了将近23亿普特的商品谷物，即比战前的谷物生产多提供了10亿普特的商品谷物。

可见，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生产的高度商品率，是它们的最重要的特点，这对国家的供应具有莫大的意义。

我国所以能够这样容易而迅速地解决了谷物问题，解决了以足够的商品谷物供应这个庞大的国家的问题，其秘密就在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具有这样的特点。

应当指出，最近三年来，我们每年收购的谷物都不下16亿普特，有时候，例如在1937年，还增加到18亿普特。如果再加上每年采购的约2亿普特谷物以及通过集体农庄贸易得到的几亿普特谷物，那我们就可以得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所提供的上述商品粮的总数。

其次，值得指出的是，最近三年来，商品谷物的基地已经从过

去被认为是我国谷仓的乌克兰移到了我国北部和东部，即移到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家知道，最近两三年来，乌克兰收购的谷物每年只有4亿普特左右，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这几年中每年收购的商品谷物则有11—12亿普特。

这就是谷物生产方面的情况。

至于畜牧业，那么在这个最落后的农业部门中，近几年来也有重大的进展。固然，在马匹总数和养羊业方面，我们还落后于革命前的水平，但是在牛和养猪业方面，我们却已经超过了革命前的水平。

下面就是这方面的材料：

苏联的牲畜总数(单位：百万头)

	按每年7月的数字计算							1938年对 1916年 (据调查) 的百分比	1938年 对1933 年的百 分比
	1916年 (据调查 数字)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马.....	35.8	16.6	15.7	15.9	16.6	16.7	17.5	48.9	105.4
牛.....	60.6	38.4	42.4	49.2	56.7	57.0	63.2	104.3	164.6
绵羊和山羊	121.2	50.2	51.9	61.1	73.7	81.3	102.5	84.6	204.2
猪.....	20.9	12.1	17.4	22.5	30.5	22.8	30.6	146.4	252.9

毫无疑问，养马业和养羊业方面的落后状况在最短期间就会消除。

(三)商品流转和运输。随着工农业的高涨，我国的商品流转额也增长了。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零售网扩大了25%。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零售额增长了178%。集体农庄集市贸易额增长了112%。

下列就是有关的统计表：

商 品 流 转 额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8年对 1933年的 百分比
1.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零售额(商店和货摊)——按年底数字计算.....	285 355	286 236	268 713	289 473	327 361	356 930	125.1
2.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零售额(包括公共饮食业)——单位, 百万卢布.....	49 789.2	61 814.7	81 712.1	106 760.9	125 943.2	138 574.3	278.3
3. 集体农庄集市贸易额——单位, 百万卢布.....	11 500.0	14 000.0	14 500.0	15 607.2	17 799.7	24 399.2	212.2
4. 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轻工业人民委员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地方工业人民委员部在各州设立的商品批发站——按年底数字计算.....	718	836	1 141	1 798	1 912	1 994	277.7

显然,如果运输业的转运额没有一定的增长,国家的商品流转就不会得到这样的发展。的确,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所有各类运输的转运额,特别是铁路运输和航空运输的转运额都增长了。水路运输的转运额也增长了,但是很不稳定,而1938年的水路运输的转运额可惜竟比上一年还有所降低。

下列就是有关的统计表:

货 运 额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8年 对1933 年的百 分比
铁路(单位,10亿吨公里).....	169.5	205.7	258.1	323.4	354.8	369.1	217.7
河运和海运(单位,10亿吨公里).....	50.2	56.5	68.3	72.3	70.1	66.0	131.5
民用航空运输(单位,百万吨公里).....	3.1	6.4	9.8	21.9	24.9	31.7	1 022.6

毫无疑问,1938年水路运输方面的某些落后状况,将在1939年消除。

2. 人民物质状况和文化状况的进一步提高

工农业的继续不断高涨不能不引起,而且也确实引起了人民物质状况和文化状况的进一步提高。

剥削现象的消灭,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巩固,失业以及与之有关的城乡贫困的消失,工业的大规模扩展和工人人数的不断增长,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土地的永远固定给集体农庄使用,对集体农庄供应大量头等拖拉机和农业机器,——所有这一切都为进一步提高工人和农民的物质状况创造了实际条件。而工人和农民物质状况的改善,自然又使构成我国重大力量并为工人和农民利益服务的知识分子的物质状况得到了改善。

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为那些离开农村而在饥饿的恐怖之下过活的、无工可做和无家可归的农民想点办法,把他们安插到工业部门和发点慈悲为他们找点工作了。这样的农民在我国早已没有了。这当然很好,因为这证明我们的农村是富裕的。现在的问题只能是请集体农庄答应我们的要求,每年为我们日益增长的工业输送哪怕是 150 万左右的青年集体农庄庄员。已经富裕起来的集体农庄应当注意到,如果没有它们的这种支援,我国的工业就很难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如果工业得不到扩展,我们就不能满足农民对日用消费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集体农庄完全能够满足我们这个要求,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大量技术装备能够解放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一投入到工业中去,就能够给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好处。

总起来说,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我们在改善工人和农民的

物质状况方面有如下一些标志：

1. 国民收入从 1933 年的 485 亿卢布增长到 1938 年的 1 050 亿卢布；

2. 工人和职员人数从 1933 年的 2 200 多万人增加到 1938 年的 2 800 万人；

3. 工人和职员的全年工资总额已经从 3 495 300 万卢布增加到 9 642 500 万卢布；

4. 工业工人的年平均工资从 1933 年的 1 513 卢布提高到 1938 年的 3 447 卢布；

5. 集体农庄的货币收入从 1933 年的 566 190 万卢布增长到 1937 年的 1 418 010 万卢布；

6. 谷物区内发给集体农庄每个农户的谷物平均数，从 1933 年的 61 普特提高到 1937 年的 144 普特，而且种子、种子储备、公共牲畜的饲料储备、交售的谷物、付给机器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等都没有计算在内；

7. 国家对社会文化设施的预算拨款，从 1933 年的 583 990 万卢布增长到 1938 年的 3 520 250 万卢布。

至于人民的文化状况，它也跟着人民的物质状况的提高而提高了。

从人民文化发展方面来看，报告所涉及的时期真正是文化革命的时期。用苏联各民族语言进行的初等普遍义务教育的实现，各级学校和学生数目的增加，高等学校毕业的专家数目的增加，新的苏维埃知识界的形成和巩固，——这就是人民文化高涨的一般情况。

下面就是这方面的数字：

(1) 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

标 志	计算单位	1933 - 1934 年 度	1938 1939 年 度	1938 -1939 年度对1933 —1934年度 的 百 分 比
各级学校的学生总数……	千人	23 814	33 965.4	142.6
其中:				
初等教育……	千人	17 873.5	21 288.4	119.1
中等教育(包括普通教育 和专业教育)……	千人	5 482.2	12 076.0	220.3
高等教育……	千人	458.3	601.0	131.1
在苏联参加学习的人 数 (包括各种学习方式)……	千人	—	47 442.1	—
群众图书馆数目……	千所	40.3	70.0	173.7
群众图书馆的藏书量……	百万册	86.0	126.6	147.2
俱乐部数目……	千所	61.1	95.6	156.5
剧院数目……	座	587	790	134.6
电影放映站数目(窄片放映 站除外)……	个	27 467	30 461	110.9
其中有声电影放映站……	个	498	15 202	增加30倍
农村中的电影放映站数目 (窄片放映站除外)……	个	17 470	18 991	108.7
其中有声电影放映站……	个	24	6 670	增加 277 倍
报纸的年发行量……	百万份	4 984.6	7 092.4	142.3

(2) 1933—1938 年间苏联新建学校数

年 份	学 校 数		
	在城市和市镇	在 农 村	总 计
1933.....	326	3 261	3 587
1934.....	577	3 488	4 065
1935.....	533	2 829	3 362
1936.....	1 505	4 206	5 711
1937.....	730	1 323	2 053
1938.....	583	1 246	1 829
1933—1938年的总数	4 254	16 353	20 607

(3) 1933—1938 年间从高等学校毕业的青年专家人数

(单位:千人)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全苏联总数(不包括军事专家)	34.6	49.2	83.7	97.6	104.8	106.7
1. 工业和建筑工程师.....	6.1	14.9	29.6	29.2	27.6	25.2
2. 运输和邮电工程师.....	1.8	4.0	7.6	6.6	7.0	6.1
3. 农业机械化工程师、农艺师、兽医和畜牧学家.....	4.8	6.3	8.8	10.4	11.3	10.6
4. 经济学家和法学家.....	2.5	2.5	5.0	6.4	5.0	5.7
5. 中学、工农速成中学、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员以及其他教育工作者,其中包括艺术工作者.....	10.5	7.9	12.5	21.6	31.7	35.7
6. 医生、药剂师和体育工作者.....	4.6	2.5	7.5	9.2	12.3	13.6
7. 其他专业.....	4.3	11.1	12.7	14.2	9.9	9.8

由于进行了这一切巨大的文化工作，在我国便产生和形成了人数众多的新的苏维埃知识分子，他们出身于工人阶级、农民和苏联职员，他们同我国人民血肉相连，没有身受剥削的桎梏，仇恨剥削者并决心忠诚地为苏联各族人民服务。

我认为，这个新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知识界的产生，是我国文化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3. 苏维埃制度的进一步巩固

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国内形势的进一步稳定，苏维埃制度的进一步巩固。

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的确立，工业和农业的高涨，劳动者物质状况的改善，人民群众文化程度的提高，他们的政治积极性的增长，——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实现的这一切不能不使苏维埃制度进一步巩固起来。

与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现在的苏联社会的特点就在于，在苏联社会中再也没有对抗的敌对阶级了，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而构成苏联社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在友爱合作的基础上生活和工作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被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分裂着，这就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状况动荡不定，而摆脱了剥削羁绊的苏联社会却没有这样的矛盾，没有阶级冲突，呈现出一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友爱合作的图景。在这种共同性的基础上，象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以及苏维埃爱国主义这样一些动力也得到了发展。在这一基础上又产生了1936年11月通过的苏联宪法以及国家最高机关选举的充分民主化。

至于谈到国家最高机关的选举,那就要指出,它光辉地体现了构成我国国内形势特点的苏联社会的一致和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大家知道,在1937年12月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时,投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联盟的票的几乎有9 000万选民,即占有所有参加投票人数的98.6%,而在1938年6月选举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时,投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联盟的票的有9 200万选民,即占有所有参加投票人数的99.4%。

这就是苏维埃制度所以巩固的基础,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具有的取之不尽的力量的源泉。

这还说明,一旦发生战争时,我们军队的后方和前方由于彼此一致和内部统一,将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巩固,这一点是国外那些爱搞军事冲突的人应当记住的。

国外有些报界人士胡说什么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亚基尔、图哈切夫斯基、罗森霍尔茨、布哈林和其他恶棍之类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从苏维埃组织清洗出去,似乎就“动摇了”苏维埃制度,引起了“瓦解”。这种胡说八道只值得加以耻笑。把暗害分子和敌对分子从苏维埃组织中清洗出去,怎么会动摇和瓦解苏维埃制度呢?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这一小撮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对外国奴颜婢膝,在每一个外国官老爷面前奴气十足,匍伏跪拜,甘愿为他充当间谍,这一小撮人不懂得摆脱了资本锁链的最普通的苏联公民都比任何一个带着资本主义奴隶制枷锁的身居高位的外国官老爷高明得多,——谁需要这帮可鄙的卖身投靠的奴才呢?他们对人民能有什么价值呢?他们能“瓦解”谁呢?1937年判决枪毙了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和其他一些恶棍。在这以后进行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所有参加投

票的人 98.6% 是投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1938 年初, 判决枪毙了罗森霍尔茨、李可夫、布哈林和其他一些恶棍。在这以后进行了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所有参加投票的人 99.4% 是投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试问, 这哪里有什么“瓦解”的迹象呢, 为什么这种“瓦解”没有在选举的结果中反映出来呢?

如果听信这些胡言乱语的外国人, 那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要是让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逍遥法外, 不去打扰他们的暗害、凶杀和间谍活动, 苏维埃组织就会巩固得多和稳定得多了。这些老爷们如此厚颜无耻地为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辩护, 岂不是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秘密吗?

把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从苏维埃组织中清洗出去, 就一定会使而且确实已经使这些组织进一步巩固了, 这样讲岂不是更正确吗?

例如, 哈桑湖事件不是恰好说明了把间谍和暗害分子从苏维埃组织中清洗出去是巩固这些组织的最可靠的手段吗?

* * *

党在对内政策方面的任务是:

1. 继续发展我们的工业, 提高劳动生产率, 改进生产技术, 以便在工业的生产技术装备和发展速度方面已经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后, 能在最近 10—15 年之内在经济上也超过它们。

2. 继续发展我们的农业和畜牧业, 以便在最近的 3—4 年内使谷物的年产量达到 80 亿普特, 使每公顷的平均产量达到 12—13 公担, 使经济作物的产量平均增加 30—35%, 使羊和猪的头数增加一倍, 牛的头数增加 40%, 马的头数增加 35%。

3. 继续改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物质状况和文化状况。

4. 始终不渝地贯彻我们的社会主义宪法，彻底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巩固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巩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友爱合作，极力巩固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发展和培养苏维埃爱国主义。

5. 不要忘记资本主义包围，必须记住外国谍报机关将把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派到我国来，必须记住这一点并加强我们社会主义的侦察机关，不断地帮助它粉碎和铲除人民的敌人。

三

联共(布)的进一步巩固

从政治路线和日常实际工作方面看来，报告所涉及的时期是我们党的总路线完全胜利的时期。

社会主义体系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确立，在新技术基础上对工农业改造的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的提前完成，谷物的年产量达到 70 亿普特的水平，贫困和失业的消灭，人民物质状况和文化状况的提高，——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成绩。这些成绩表明我们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确的。

在这些宏伟的成绩面前，反对我们党的总路线的人，各种各样的“左”派和“右”派，各种各样的蜕化变质分子，如托洛茨基—皮达可夫分子、布哈林—李可夫分子都不得不缩成一团，藏起他们那陈旧的“政纲”，而转入地下。他们没有顺从人民意志的勇气，宁愿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法西斯分子同流合污，为外国谍报机关效劳，充当间谍，答应帮助苏联的敌人来瓜分我们国家，在我国恢复资本主义奴隶制。

这就是反对我们党的路线、后来成了人民公敌的人的可耻下场。

党粉碎了人民公敌并肃清了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中的蜕化变质分子以后,在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上更加一致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周围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表明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党内生活的发展、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具体材料。

1. 改善党的成分的办法。划小组织单位。

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工作

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巩固党及其领导机关的工作,首先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调整党的成分,排除不可靠分子,选拔优秀分子;另一方面是,划小组织单位,缩小组织规模,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的、实际的、具体的工作。

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共代表 1 874 488 个党员。如果把这个数目同前一次即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所代表的党员数目比较一下,那就可以看出,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到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党内增加了 60 万个新党员。党不能不感到,在 1930—1933 年的条件下,这样大批的人涌入党内,是不健康地和不恰当地扩大了党员数量。党知道,加入它的队伍的不仅有忠诚老实的人,而且还有不合格的分子,还有企图利用党的旗帜达到个人目的的野心家。党不能不知道,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党员的数量,而且首先在于党员的质量。于是就提出了调整党的成分的问题。当时决定把 1933 年就开始的清洗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工作继续下去,这个工作确实一直继续到 1935 年 5 月。其次,当时决定停止接收新党

员,在1936年9月以前,确实一直没有接收新党员,直到1936年11月1日,才恢复了接收新党员的工作。其次,基洛夫同志惨遭凶杀的事件证明党内有不少可疑分子,于是当时决定审查和换发党证,这两项工作直到1936年8月底才结束。只是在此以后,党才开始接收新党员和预备党员。由于采取了这一切措施,党才肃清了自己队伍中的不合格的、消极的、有野心的和公开敌对的分子,而选拔了最坚定最忠实的人。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遗憾的是,所犯的错误竟比原来预料的还多。毫无疑问,我们今后已不再需要采用大批清洗的方法了。但是,1933—1936年的清洗终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次清洗基本上产生了良好的结果。这一次即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共代表将近160万个党员,就是说,比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少了27万个党员。但这一点坏处也没有。相反,这是在好转,因为党是靠清除本身的坏东西而巩固的。现在我们的党在党员数量上虽然少了一些,但是在质量上却更好了。

这是很大的成绩。

至于改善党的日常领导工作,使它接近基层工作和进一步具体化,那么党认为划小组织单位,缩小组织规模,是使党的机关易于领导这些组织,并使领导工作本身变得具体、生动和实际的最好办法。划小组织单位的办法,不仅在人民委员部方面实行了,而且在行政区域的组织方面,即在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州和区等等方面也实行了。由于采取了各种措施,我们现在已经不是7个加盟共和国,而是11个加盟共和国,不是14个苏联人民委员部,而是34个苏联人民委员部,不是70个边疆区和州,而是110个边疆区和州,不是2559个市区和乡区,而是3815个市区和乡区。与此相适应的是,现在在党的领导机关系统中总共有以联共(布)中央为

首的 11 个中央委员会, 6 个边疆区委员会, 104 个州委员会, 30 个专区委员会, 212 个市委员会, 336 个市区委员会, 3 479 个乡区委员会, 113 060 个基层党组织。

决不能说, 划小组织单位的工作已经结束了。这一工作很可能还要继续下去。但是, 不管怎样, 它无论在改善日常领导工作方面, 或者在使领导本身接近基层的具体工作方面都产生了良好的结果。我还不说, 划小组织单位的办法使我们能够提拔成千上万的新的人才来担任领导工作。

这也是很大的成绩。

2. 挑选干部, 提拔干部, 配备干部

调整党的成分, 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的具体工作, 这并不是而且也不能是进一步巩固党及其领导的唯一办法。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所实行的另一种巩固党的办法, 就是根本改善干部工作, 改善挑选干部、提拔干部、配备干部以及在工作过程中审查干部的工作。

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 而由于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 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在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 党的干部就成为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决定力量。有正确的政治路线, 这当然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事情。但是这毕竟还不够。我们所以需要正确的政治路线并不是为了装饰门面, 而是为了贯彻实行。但是要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 就要有干部, 就要有懂得党的政治路线、把党的政治路线当作自己的路线来接受、决心实现它、善于在实践中实现它、能够对它负责、能够捍卫它、能够为它而奋斗的人。否则, 正确的政治路线就有成为一纸

空文的危险。

正是在这里才产生了正确地挑选干部、培养干部、提拔新人才、正确配备干部以及按照所做的工作来审查干部的问题。

正确地挑选干部是什么意思呢？

正确地挑选干部，这还不是说要为自己找几个副手和助理，成立一个办公室，从那里发出各种指令来。这也不是说要滥用自己的职权，毫无道理地把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调来调去，进行无休止的“改组”。

正确地挑选干部，这就是说：

第一，要重视干部，把他们看作是党和国家最宝贵的财富，爱护他们，尊重他们。

第二，要了解干部，细心考察每个干部的优点和缺点，了解每一个干部究竟在什么岗位上才最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第三，要用心培养干部，帮助每个成长着的工作人员不断提高，不惜花费时间耐心地“照料”这样的工作人员，加速他们的进步。

第四，要及时而大胆地提拔年轻的新干部，不让他们老在一个地方停滞不前，不让他们消沉下去。

第五，在安排工作人员的岗位时要做到使每个工作人员都各得其所，使每个工作人员都能为我们的共同事业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才能，使干部配备工作的总方向完全适应于政治路线的要求，因为进行这种配备是为了实现这一政治路线。

在这方面大胆而及时地提拔年轻的新干部的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我认为，我们的人对这个问题还不十分清楚。一些人认为在挑选干部时主要应当注重老干部。相反地，另一些人则认为主

要应当注重年轻干部。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老干部当然是党和国家的巨大财富。他们有年轻干部所没有的东西：丰富的领导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锻炼，业务知识，明辨方向的能力等。但是第一，老干部总是少数，不能满足需要，而且由于自然界的天然规律，他们已经部分地开始丧失工作能力。第二，一部分老干部有时候喜欢一味地朝后看，迷恋过去、迷恋旧事物而不能自拔，看不见实际生活中的新事物。这就叫丧失对新事物的感觉。这是很严重很危险的缺点。至于年轻干部，他们当然没有老干部所具备的那种经验、锻炼、业务知识和明辨方向的能力等。但是第一，年轻干部占大多数；第二，他们年轻，暂时还没有丧失工作能力的危险；第三，他们对新事物有足够的敏感，而这是每个布尔什维克工作者的宝贵品质；第四，他们成长得快，提高得快，上进心强，所以不久就会赶上老年人，同他们并肩前进，成为无愧于他们的接班人。可见，问题不在于要注重老干部还是注重新干部，而在于贯彻执行在担负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整个班子中老干部和年轻干部相配合、相结合的方针。

正因为如此，所以必须及时而大胆地把年轻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党在巩固党的领导方面所获得的重大成绩之一，就是它在挑选干部时，正是自下而上地、卓有成效地实行了这个把年老工作者和年轻工作者配合起来的方针。

在党中央委员会里有些材料可以说明，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提拔了 50 多万个年轻的党员布尔什维克和靠近党的布尔什维克担任国家系统和党的系统的领导职务，其中有 20% 以上是妇女。

现在的任务是什么呢？

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自下而上地挑选干部的工作完全集中起来，并把它提到应有的、科学的、布尔什维主义的高度。

为此就要取消把考察、提拔和挑选干部的工作分散于各部各科的作法，而要把它集中在一个部门。

联共(布)中央干部局，以及每一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中的相应的干部部，就应当是这样的部门。

3. 党的宣传工作。对党员和党的 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借以巩固党及其领导机关的另一件很要紧很重大的工作，就是党的口头上和刊物上的宣传鼓动工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的工作，提高党及其工作人员的政治和理论水平的工作。

关于党的宣传工作的极重要意义，关于对我们工作人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极重要意义，大概已没有必要再来大谈特谈了。我所指的，不仅是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而且还包括共青团、工会、商业和合作社组织、经济组织、苏维埃组织、教育组织、军事组织及其他组织中的工作人员。调整党的成分和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工作的事情，尽可以做得很满意；提拔干部、挑选干部和配备干部的工作，尽可以做得很满意；这一切尽可以都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却因某种缘故而搞得不好了，如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我们干部的工作松懈了，如果我们对提高这些干部的政治和理论水平的工作削弱了，而干部本身又因此而不再关心我们的发展前途，不再了解我们事业的正确性，而变成一些前

途茫茫、盲目地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的事务主义者,那么我们国家和党的整个工作就一定会削弱。在国家和党的任何一个工作部门中,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的效率也愈高,工作也就愈有成效;反过来说,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就愈可能在工作中遭受挫折和失败,就愈可能使工作人员本身庸俗化和堕落成为鼠目寸光的事务主义者,就愈可能使他们蜕化变质,——这要算是一个定理。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我们能够从思想上来培养我们所有工作部门中的干部,从政治上来锻炼他们,使他们能够在国内和国际的局势中毫无困难地辨别方向,如果我们能够使他们成为有能力解决国家领导问题而不犯严重错误的十分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么我们就有一切根据认为,我们所有的问题十分之九已经解决了。而这个任务,我们无疑是能够解决的,因为我们有解决这个任务所必需的一切手段和可能。

我们年轻干部的培养和形成,通常都是按各个科学技术部门,按各个专业进行的。这是必要的,适当的。没有必要使一个医学专家同时又是一个物理学专家或植物学专家,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但是有一门科学知识却是一切科学部门中的布尔什维克都必须具备的,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以及共产主义胜利的科学。因为,那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譬如说局限于数学、植物学或化学,而对自己专业以外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尽管他们自称为列宁主义者,但是决不能认为他们就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列宁主义者不能仅仅是他自己所喜爱的那门科学的专家,他同时还应当是个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应当密切关心本国命运,懂得社会发展规

律，善于运用这些规律，并力求积极参加对国家的政治领导。当然，这对于布尔什维克专家来说是一种附加的负担。但是，这是一种大有好处的负担。

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对于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帮助我们所有工作部门中的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

关于改进宣传工作和改进对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工作的办法问题，联共(布)中央曾经多次讨论过，参加讨论的还有各州党组织中的宣传员。当时注意到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1938年9月出版的事实。当时认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为我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基础。联共(布)中央这些工作的结果曾经公布在《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党的宣传工作的安排》^①这一著名的决议中。

联共(布)中央根据这个决议，并注意到1937年联共(布)中央三月全会《论党的工作缺点》的著名决议，规定了如下一些主要办法来消除党的宣传工作方面的缺点，并改善对党员和党的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工作：

1. 把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集中在一个部门，把各个宣传鼓动部和报刊部合并为统一的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局，同时在每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中成立相应的宣传鼓动部；

2. 认为迷恋于在小组中进行宣传的办法是不正确的，而由党员个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方法则是比较适当的，所以必须使党集中注意报刊宣传和组织讲演宣传；

^①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分册第501—521页。——编者注

3. 在每一个州中心为我们的基层干部设立一年制的进修班;

4. 在我国许多中心城市为我们的中级干部设立两年制的列宁主义学校;

5. 在联共(布)中央下面设立三年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高等学校,以培养党的具有高度理论水平的干部;

6. 在我国许多中心城市设立一年制的宣传员和报纸工作人员进修班;

7.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高等学校下面为各高等学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员设立半年制的进修班。

毫无疑问,这些已经在实行但还没有充分实行的办法,一经贯彻就会立即产生良好的结果。

4. 几个理论问题

必须指出,在我们的宣传和思想工作中还有一个缺点,这就是我们有些同志对几个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理论问题缺乏十分明确的认识,有一种糊涂观念。我所指的是关于国家、而特别是关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以及关于我们苏维埃知识分子的问题。

人们有时问道:“我们这里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了,国内已不再有敌对阶级了,没有什么人可以镇压了,这就是说,国家已不再需要了,国家应当消亡才是,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消亡呢?为什么我们不努力取消国家呢?难道现在还不是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的时候吗?”

或者还有人这样问:“我们这里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正向共产主义前进,而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认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不应当有任何国家,那么为

什么我们不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消亡呢？难道现在还不是把国家送进古物陈列馆的时候吗？”

这些问题证明，发问的人是非常认真地熟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学说的个别原理。但是这些问题同时又说明，发问的同志并没有了解这一学说的实质，并没有弄清这一学说的个别原理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尤其是不了解当前的国际环境，他们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包围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危险的事实。从这些问题中，不仅可以看出他们低估了资本主义包围的事实，而且还可以看出他们低估了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机关派遣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到我们国家里来、并力图寻找时机对我国实行武装侵犯的作用和意义；从这些问题中，同样可以看出他们也低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军事机关、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是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免受外来侵犯所必需的那种作用和意义。必须承认，犯这种低估过失的不仅是上面所讲的那些同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全体布尔什维克毫无例外地都犯了这种过失。我们直到最近，即在1937—1938年间，才知道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的上层分子所干的间谍活动和阴谋勾当，而从材料上却可以看出，早在十月革命的初期，这些老爷就充当了外国谍报机关的间谍，并进行了阴谋活动，——这难道不奇怪吗？我们怎么会忽视这样严重的事情呢？这个过失应该如何解释呢？人们通常总是这样来回答：我们没有料到这些人竟会堕落到这样卑鄙的地步。可是，这不能算是解释，尤其不能当作辩护的理由，因为我们犯了过失的事实始终是事实。那么这一过失应该如何解释呢？这一过失应当这样来解释：人们低估了我们周围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资产阶级国家的谍报机关的力量和意义，它们竭力利用人们

的弱点,利用人们的虚荣心,利用人们的无气节而把他们网罗到自己的间谍网中,用他们来包围我们苏维埃国家机关。这一过失应当这样来解释:人们低估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和我们国家的侦察机关的作用和意义,低估了这个侦察机关,却胡说什么苏维埃国家的侦察机关是不值一提和无关紧要的东西,胡说什么苏维埃侦察机关也和苏维埃国家本身一样,很快就要被送进古物陈列馆去。

我们的这种低估态度,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呢?

这种态度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某些一般原理还有不完善和不充实的地方而产生的。它所以能够流行起来,是因为我们对国家理论中的一些问题抱着一种不能容许的疏忽态度,虽然我们二十年来的国家活动的实际经验给我们提供了进行理论总结的丰富材料,虽然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顺利地弥补这个理论上的缺陷。我们忘记了列宁的一个极重要的指示,他认为我们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①有义务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于这点,列宁说道:

“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卷第492页)^①

例如,我们看一看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论的经典性的公式:

“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3页。——编者注

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弗·恩格斯《反杜林论》1933年党的出版社版第202页)①

恩格斯的这个原理是否正确呢?

是的,是正确的,但是只有在具有下面两个条件中的一个条件时才是正确的:(一)如果仅仅从一国内部的发展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而预先撇开国际因素,并且为了便于研究起见,把它看作是一个离开国际环境而孤立存在的国家;或者是(二)如果假定社会主义已经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社会主义的包围已经代替了资本主义的包围,外来侵犯的威胁已不再存在,军队和国家已没有必要加强。

可是,假如社会主义仅仅是在单独一个国家里获得了胜利,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撇开国际条件不顾,那又应当怎样呢?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的公式没有给予回答。恩格斯本来就没有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因此他也就不会回答这个问题。恩格斯是从社会主义已经大致同时地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这个假定出发的。所以,恩格斯在这里研究的并不是某一国的某个具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假定社会主义已在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的条件下的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其公式是:“假定社会主义已在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试问:在这种情形下,无产阶级的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321页。——编者注

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发生怎样的变化?”只是因为问题带有这样一般的抽象的性质,所以恩格斯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问题时,完全撇开了象国际条件、国际环境这样的因素。

但是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不能把恩格斯关于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的一般公式,推广运用到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中获得胜利的这种个别的具体的情况,这个国家还受着资本主义的包围,还受着外来武装侵犯的威胁,因此不能撇开国际环境不顾,它应当拥有训练得很好的军队,组织得很好的惩罚机关和坚强的侦察机关,因而应当拥有自己的十分强有力的国家,以便保护社会主义的成果免受外来的侵犯。

不能要求距今 45—55 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到每一个别国家在遥远的将来所发生的所有一切历史曲折。如果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每一个别国家在 50—100 年以后可能发生的一切理论问题都给我们作出现成答案,使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后代可以安然地躺在暖炕上来咀嚼这些现成的答案,那就太可笑了。但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要求现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局限于背熟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一般原理,而要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学会经常考虑到社会主义国家在我国存在二十年的经验,最后,并学会根据这个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一般原理具体化,使其更加确切和完善。列宁在 1917 年 8 月,即在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国家成立以前的几个月,写了他那部名著《国家与革命》。列宁认为他这部著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捍卫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的学说,使它不被机会主义者歪曲和庸俗化。列宁本来还打算写《国家与革命》一书的第二部分,以便把 1905 年和 1917 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

结。毫无疑问，列宁想在他这本书的第二部分里根据苏维埃政权在我国存在的经验，来进一步探讨和发展关于国家的理论。可是，他的逝世使他未能完成这一任务。但是列宁所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事业，应该由他的学生们来完成。

国家是在社会分裂为敌对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国家的产生是为了少数剥削者的利益来控制多数被剥削者。国家政权的工具，主要集中于军队、惩罚机关、侦察机关和监狱。国家的活动表现为两种基本的职能：内部的（主要的）职能是控制多数被剥削者；外部的（非主要的）职能是靠侵略别国领土来扩大本国统治阶级的领土，或者是保护本国的领土不受别国的侵犯。从前的奴隶占有制度和封建制度下的情形是这样。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形也是这样。

要推翻资本主义，不仅必须把资产阶级赶下台，不仅必须剥夺资本家，而且还必须完全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打碎它的旧军队、它的官僚机构、它的警察机关，而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新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正是这样做的。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新的无产阶级国家不能够保存某些根据无产阶级国家需要而改变过的旧国家的职能。尤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式应当始终不变，我们国家的一切原有职能在将来也应当完全保存下去。事实上，由于我国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们国家的形式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将来还会发生变化。

列宁说得完全对：

“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

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1卷第393页)①

自十月革命以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发展中,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十月革命起到各剥削阶级被消灭为止这一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任务就是镇压被推翻了的阶级的反抗,组织国防以抵御武装干涉者的侵犯,恢复工业和农业,准备条件消灭资本主义分子。因此我们的国家在这个时期中实现了两个基本的职能。第一个职能是镇压国内被推翻了的阶级。这一点使我们的国家在外表上和从前的国家很相似,因为从前那些国家的职能也是要镇压不顺从的人,但是这里有一个原则上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为了多数劳动者的利益来镇压少数剥削者,而从前的国家却是为了少数剥削者的利益来镇压多数被剥削者。第二个职能是保卫国家以防外来的侵犯。这一点也使我们的国家在外表上和从前的国家很相似,因为从前的国家也用武装保护自己,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原则上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国家反对外来的侵犯是为了保护大多数劳动者的成果,而从前的国家反对外来的侵犯,却是为了保护少数剥削者的财富和特权。这里还有第三个职能,这就是我们国家机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其目的是要发展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人。不过,这个新的职能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得到重大的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从消灭城乡资本主义分子起到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完全胜利和通过新宪法为止这一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任务就是在全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消灭资本主义分子的最后残余,组织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00页。——编者注

文化革命，组织完全现代化的军队来保卫国家。于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也因此而改变了。在国内实行武力镇压的职能已经消失了，消亡了，因为剥削制度已被消灭，剥削者已不存在，再没有什么人需要镇压了。代替镇压职能的，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财产免受盗贼和人民财富盗窃者损害的职能。武装保护国家以防外来侵犯的职能则完全保存着，因此红军、海军以及为缉捕和惩罚外国间谍机关派到我国来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所必需的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也都保存着。国家机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职能仍然保存着，而且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现在，我们的国家在国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和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至于我们的军队、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那么它们的矛头已经不是针对国内，而是针对国外去对付外部敌人了。

由此可见，我国现在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家，并且按其形式和职能来说是和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不相同的。

但是，发展过程不能就此停止。我们还要前进，向共产主义前进。那么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在共产主义时期也要保存下来呢？

是的，要保存下来，假如那时资本主义的包围尚未消灭，假如那时外来的武装侵犯危险尚未消除的话。同时很明显的是，我们国家的形式，又会随着国内外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不，不被保存下来而要消亡下去，假如那时资本主义的包围已经消灭，假如那时社会主义的包围已经代替资本主义的包围的话。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的情形，就是这样。

第二个问题，就是苏维埃知识分子问题。

对这个问题，象对国家问题一样，在我们党内也存在一些模糊

见解和糊涂观念。

虽然党对苏维埃知识分子问题的立场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在我们党内却依然流行着一种敌视苏维埃知识分子而与党的立场不能相容的观点。大家知道，持有这种不正确观点的人以藐视和鄙弃态度对待苏维埃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和农民是一种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力量。的确，知识分子在苏维埃发展时期，无论其成分或状况，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不仅接近人民，而且和人民真诚合作，这是他们与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原则区别。可是，这些同志看来是根本没有考虑这一点的。他们依然弹着老调，错误地用旧的观点和态度来对待苏维埃知识分子，持这样的观点和态度在从前是有理由的，因为那时知识分子是为地主和资本家服务的。

在从前，在革命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知识界首先是由有产阶级，即贵族、工业家、商人和富农等出身的人组成的。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也有小市民、小官吏、甚至农民和工人出身的人，可是他们没有而且也不能在其中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当时整个知识界都是由有产阶级供养并为它们服务的。因此，当时我国的革命分子，首先是工人，对知识分子怀着一种不信任的心理，甚至往往变成一种仇视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固然，旧知识分子中也产生了几十个甚至几十个勇敢而革命的人物，他们接受了工人阶级的观点，并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同工人阶级的命运联结起来。但是这样的人在当时知识分子中毕竟为数太少了，所以他们并不能改变整个知识界的面貌。

但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在外国武装干涉被粉碎以后，特别是在工业化和集体化事业胜利以后，当剥削制度的消灭和社会主义

经济体系的确立已创造了实际条件，使国家能够制定和实施新宪法的时候，知识分子的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旧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最有技能的一部分人，还在十月革命的初期就脱离了其余的知识分子群众而反对苏维埃政权，并实行怠工。这一部分人因此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被苏维埃政权机关粉碎和驱散了。后来，其中保全下来的大多数人都被我国的敌人招募去做暗害分子和间谍，从而自绝于知识分子的队伍。旧知识分子中技能较差而人数较多的另一部分人，在很长时间内还在原地踏步不前，等候“好日子”的到来，但是后来他们看来是不抱什么希望了，这才决定去供职，决定和苏维埃政权和睦相处。现在旧知识分子中的这一类人，大部分都已经年老了，已开始丧失其工作能力。旧知识分子中的第三部分人，主要是比前一部分人的技能更差的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靠拢人民，拥护苏维埃政权。他们须要补习，而他们也确实在我们的高等学校里进行了补习。但是，与旧知识分子这种分化瓦解的痛苦过程同时进行的，还有新知识分子力量形成、动员和积聚的蓬蓬勃勃的过程。几十万从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出身的年轻人，进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他们毕业后就补充了知识分子的人数减少了的队伍。他们为知识界注入了新的血液，并用新的方式，用苏维埃的方式使知识界复活起来。他们按照自己的模样彻底改变了知识界的整个面貌。旧知识分子的残余已溶解在新的、苏维埃的、人民的知识分子中了。这样就形成了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他们和人民有密切联系，其中大多数人都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结果，我国现在就有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新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知识界，它无论在成分方面或社会政治面貌方面，都和旧的资

产阶级知识界根本不同。

对于旧的、革命前的、为地主资本家服务的知识分子，完全适用关于知识分子的旧理论，这种理论指出必须不信任他们并与他们进行斗争。现在，这个理论已经过时了，已经不适用于我们的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了。对于新的知识分子必须采用新的理论，这种理论指出必须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对他们采取友好态度，关怀他们，尊重他们，同他们合作。

这看来是很明白的。

尤其使人感到惊讶和奇怪的是，虽然知识分子的状况发生了这一切根本的变化，可是在我们党内竟然还有人企图把那种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旧理论，用来对待我们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对待这个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知识界。原来，这些人武断地认为，那些不久前还是按斯达汉诺夫方式在工厂和集体农庄中工作的工人和农民，后来一被送到高等学校里去受教育，就不再是真正的人，而变成第二等人了。这样说来，受教育竟是一项有害而危险的事情。我们想把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变成有文化有知识的人，而且我们将来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可是，照这些奇怪的同志看来，我们的这种计划竟包含着莫大的危险，因为在工人和农民一变成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以后，他们就有被列入第二等人的危险。也许这些奇怪的同志将来会落到颂扬落后、无知、愚昧的地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理论上的错误从来没有使人得到好处，而且也不会使人得到好处。

关于我们新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形就是这样。

* * *

在进一步巩固党的方面，我们的任务是：

1. 不断地改善党的成分,提高党员的觉悟程度,通过个别挑选的方式,只将那些经过考验的、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接收入党;
2. 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工作,从而使它们的领导工作日益实际和具体,日益减少忙于开会和文牍主义的情况;
3. 把挑选干部的工作集中起来,关心对干部的培养,细心地考察工作人员的优点和缺点,更大胆地提拔年轻的工作人员,使挑选干部和配备干部的工作适应于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
4. 把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集中起来,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宣传,提高我们干部的理论水平,加强我们干部的政治锻炼。

* * *

同志们!我要结束我的总结报告了。

我把我们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所经历的道路作了一番概括的叙述。党和党中央在这个时期内的工作结果,是大家知道的。我们有过缺点和错误。党和党中央并没有隐瞒这些缺点和错误,而是努力加以纠正。我们也有重大的成功和巨大的成绩,但是这些成功和成绩决不应该冲昏我们的头脑。

主要的总结就是我国工人阶级已经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向全世界证明了自己事业的正确性。这就是主要的总结,因为它加强了确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和确信工人阶级必然获得最终胜利的信心。

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硬说,人民没有地主和资本家,没有商人和富农是活不下去的。我国工人阶级却用事实证明,人民没有剥削者是能够很好地活下去的。

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硬说,工人阶级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旧制度以后,没有能力建立起新的东西来代替旧的。我国工人阶级却

用事实证明,它不仅完全有能力破坏旧的制度,还完全有能力建立起新的、美好的、社会主义的制度,而且是既没有危机又没有失业的制度。

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硬说,农民不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我国集体农庄农民却用事实证明,农民是能够顺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改良主义的走狗们所特别力求达到的,主要是想打消工人阶级对本身力量的信心,打消它对自己能够而且必然获得胜利的信心,从而使资本主义奴隶制永远存在下去。因为资产阶级知道,资本主义还没有被推翻、还继续存在着,这并不是由于它本身有什么优点,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对自己获得胜利的可能性还没有充分的信心。不能说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毫无成效的。必须承认,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阶级中的走狗,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毒化了工人阶级的心灵,使他们犹疑不决和缺乏信心。假如我国工人阶级的成就、它的斗争和胜利,能够提高资本主义各国工人阶级的斗志,坚定它对本身力量的信心、获得胜利的信心,那么我们的党就可以说,它的工作没有白做。可以用不着怀疑,情形一定会是这样。

我们战无不胜的工人阶级万岁!

我们战无不胜的集体农庄农民万岁!

我们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万岁!

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岁!

全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万岁!

译自《列宁主义问题》1952年第11版
第603—651页

广 播 演 说

（1941 年 7 月 3 日）

同志们！公民们！

兄弟姊妹们！

我们的陆海军战士们！

我的朋友们，我现在向你们讲话！

希特勒德国从 6 月 22 日起向我们祖国发动的背信弃义的军事进攻，正在继续着。虽然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虽然敌人的精锐师和精锐空军部队已被击溃，被埋葬在战场上，但是敌人又向前线投入了新的兵力，继续向前进犯。希特勒军队侵占了立陶宛全境、拉脱维亚的大部地区、白俄罗斯西部地区、乌克兰西部一部分地区。法西斯空军正在扩大其轰炸区域，对摩尔曼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斯摩棱斯克、基辅、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等城市大肆轰炸。我们的祖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我们光荣的红军怎么会让法西斯军队占领了我们的一些城市和地区呢？难道德国法西斯军队真的象法西斯的吹牛宣传家所不断吹嘘的那样，是无敌的军队吗？

当然不是！历史表明，无敌的军队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过。拿破仑的军队曾被认为是无敌的，可是这支军队却先后被俄国的、英国的和德国的军队击溃了。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威廉

的德国军队也曾被认为是无敌的军队，可是这支军队曾经数次败在俄国军队和英法军队的手中，终于被英法军队击溃了。对于现在希特勒的德国法西斯军队也应当这样说。这支军队在欧洲大陆上还没有遇到过重大的抵抗。只是在我国领土上，它才遇到了重大的抵抗。既然由于这种抵抗，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精锐师已被我们红军击溃，这就是说，正象拿破仑和威廉的军队曾经被击溃一样，希特勒法西斯军队也是能够被击溃的，而且一定会被击溃。

至于说我们的一部分领土毕竟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了，这主要是由于法西斯德国的反苏战争是在有利于德国军队而不利于苏联军队的情况下发动的。问题就在于，德国军队是进行着战争的国家的军队，它已经全部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德国用来进攻苏联并且集结到苏联边境的 170 个师已经完全处于战备状态，只等进攻的信号了；而当时苏联的军队还需要进行充分动员，还需要向边境集结。这里还有一个情况起了不小的作用，就是法西斯德国不顾它会被全世界认为是进攻一方，而突然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它同苏联在 1939 年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显然，爱好和平的我国是不愿意首先破坏条约的，因此也就不能走上背信弃义的道路。

也许有人要问：苏联政府怎么会同象希特勒和里宾特洛普这样一些背信弃义的人和恶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呢？苏联政府在这方面是不是犯了错误？当然没有犯错误！互不侵犯条约是两国之间的和平条约。1939 年德国向我们提出的正是这样的条约。苏联政府能不能拒绝这样的建议呢？我想，任何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都不能拒绝同邻国缔结和平协定，即使这个国家是由象希特勒和里宾特洛普这样一些吃人魔鬼领导的。当然，这是在一个必要的条件下缔结的，即和平协定既不能直接，也不能间接触犯爱好和平

国家的领土完整、独立和荣誉。大家知道,德国同苏联订立的互不侵犯条约正是这样的条约。

我们同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得到了些什么呢?我们保证我国获得了一年半的和平,使我国有可能准备好自己的力量,在法西斯德国胆敢冒险违反条约进攻我国的情况下予以反击。这肯定是我们有所得,而法西斯德国有所失。

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地撕毁条约,进攻苏联,得到了些什么,又失掉了些什么呢?这使它的军队在短期内取得了某种有利的地位,可是它在政治上却输了,它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自己是血腥的侵略者。毫无疑问,德国在军事上暂时有所得,只是偶然因素,而苏联在政治上大有所得,却是重大的长久的因素,在这个基础上,红军在反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胜利必将日益扩大。

正因为如此,我们全体英勇的陆军,我们全体英勇的海军,我们全体的飞行员——我们的雄鹰,我国各族人民,欧洲、美洲、亚洲所有的优秀人士,以及德国所有的优秀人士,都谴责德国法西斯分子的背信弃义行为而同情苏联政府,赞同苏联政府的行为,并且认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一定会被击溃,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由于强加于我们的战争,我国已经同最凶恶而阴险的敌人——德国法西斯主义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我国军队正在同以坦克和飞机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英勇作战。红军和红海军正在克服重重困难,为保卫每一寸苏联国土而奋不顾身地战斗。拥有数千辆坦克和数千架飞机的红军主力正在投入战斗。红军战士的勇敢精神是举世无双的。我们对敌人的抗击日益加强。全体苏联人民都

同红军一道奋起保卫祖国。

为了消除我们祖国面临的危险，需要做些什么呢？为了粉碎敌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

首先必须使我们苏联人了解到威胁我国的危险的严重程度，坚决克服泰然自若、漠不关心的心理，克服和平建设的情绪，这种情绪在战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当战争使形势根本改变了的时候，就是十分有害的了。敌人是残酷无情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侵占我们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出来的土地，掠夺我们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粮食和石油。他们的目的是要恢复地主政权，恢复沙皇制度，摧残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乌兹别克人、鞑靼人、摩尔达维亚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以及苏联其他各自由民族的民族文化和国家制度，把他们德意志化，把他们变成德国王公贵族的奴隶。因此，这是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苏联各族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苏联各族人民享受自由还是沦为奴隶的问题。必须使苏联人了解这一点，不要再漠不关心，必须使他们动员起来，按照新的战时的方式改造自己的全部工作，拿出对敌人毫不留情的气概。

其次，必须使怨天尤人的人和怕死鬼、惊惶失措分子和逃兵在我们的队伍中毫无容身之地，使我们的人在斗争中无所畏惧，并且奋不顾身地投入我们反法西斯奴役者的卫国解放战争。我们国家的缔造者伟大的列宁曾经说过，苏联人的基本品质应当是在斗争中勇敢、大胆、不知畏惧、决心同人民一起为反对我们祖国的敌人而战斗。必须使布尔什维克的这种优良品质成为红军、红海军以及苏联各族人民中千百万人所具有的美德。

我们应当立即按照战时的方式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使一切

都服从于前线的利益，都服从于组织粉碎敌人的任务。苏联各族人民现在都看到，德国法西斯主义对保证全体劳动者享有自由劳动和美好生活的我们的祖国，是咬牙切齿、极为仇视的。苏联各族人民应当奋起反对敌人，保卫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国土。

红军、红海军和苏联全体公民都应当捍卫每一寸苏联国土，应当为保卫我国的城市和乡村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应当表现出我国人民所固有的勇敢、主动和机智。

我们应当组织对红军的全面支援，保证大力补充红军队伍，保证供应红军一切必需品，组织军队和军用物资的迅速运输，以及广泛救护伤员。

我们应当巩固红军的后方，使全部工作都服从于这个事业的利益，做到一切企业都能加紧工作，生产更多的步枪、机枪、火炮、子弹、炮弹、飞机，组织对工厂、电站、电话和电报通信设施的警卫工作，整顿地方防空事宜。

我们应当对一切扰乱后方分子、逃兵、惊惶失措分子和造谣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消灭间谍、破坏分子和敌人的伞兵，在这些方面及时地协助我们的锄奸营。必须注意到，敌人是阴险狡猾的，善于欺骗和造谣。必须估计到这一切，不要受敌人的挑拨。凡是因惊惶失措和贪生怕死而有害防务的人，不论是谁，都应当立即交付军事法庭审判。

当红军部队不得不撤退时，必须运走全部铁路机车车辆，不给敌人留下一部机车、一节车厢，不给敌人留下一公斤粮食、一公升燃料。集体农庄庄员应当把所有的牲畜赶走，把粮食交给国家机关保管，以便运到后方。凡是不能运走的一切贵重物资，其中包括有色金属、粮食和燃料等，都应当绝对销毁。

在敌占区，必须建立骑兵和步兵游击队，建立破坏小组，以便同敌军部队斗争，以便遍地燃起游击战争的烽火，以便炸毁桥梁、道路，破坏电话和电报通信设施，焚毁森林、仓库和辎重。在沦陷区，要造成使敌人及其所有走狗无法安身的条件，步步追击他们，消灭他们，破坏他们的一切活动。

同法西斯德国的战争，绝不能看成普通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是两国军队之间的战争。它同时是全体苏联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伟大战争。这场反法西斯压迫者的全民卫国战争的目的，不仅是要消除我国面临的危险，而且还要帮助那些呻吟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枷锁下的欧洲各国人民。在这场解放战争中，我们不是孤立的。在这场伟大战争中，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其中包括受希特勒头目们奴役的德国人民，将是我们可靠的同盟者。我们为了保卫我们祖国的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将同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为争取他们的独立、民主自由的斗争汇合在一起。这将是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反对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奴役和奴役威胁而结成的统一战线。因此，英国首相邱吉尔先生关于支援苏联的历史性的演说和美国政府关于准备援助我国的宣言，就是十分明显的例证，苏联各族人民对此只能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志们！我们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趾高气扬的敌人很快就一定会相信这一点。同红军一道对进犯我国的敌人奋起作战的，有成千上万的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我国千百万人民群众都将奋起作战。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劳动者已经开始成立有成千上万人的民兵队伍来支援红军。在我们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卫国战争中，在每一个遭到敌人侵犯危险的城市里，我们都应当成立这样的民兵队伍，发动全体劳动者起来斗争，挺身捍卫自己的

自由、自己的荣誉、自己的祖国。

为了迅速动员苏联各族人民的一切力量，抗击背信弃义地进犯我们祖国的敌人，国防委员会已经成立了，它现在把国家的全部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国防委员会已经开始工作，它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在列宁—斯大林党的周围，团结在苏联政府的周围，以忘我的精神支援红军和红海军，粉碎敌人，争取胜利。

用我们的一切力量来支援我们英勇的红军和我们光荣的红海军！

用人民的一切力量来粉碎敌人！

为争取我们的胜利，前进！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9—17页

关于第一〇〇、一二七、一五三、 一六一步兵师分别命名为第一、 二、三、四近卫师的命令^①(摘录)

我们的这些步兵师为什么能成功地打击敌人，并迫使嚣张一时的德军节节败退呢？其原因是：

第一，它们在进攻中不是盲目地莽撞地向前推进，而是在每次推进前都周密地侦察，认真地准备，摸清敌人的薄弱点，加强两翼侧的警戒。

第二，它们在突破敌人的正面后不是只照直前进，而是向敌人的浅近后方和突破口的左右两侧突击，努力扩大突破口。

第三，它们在夺取敌人占领的地区后，立即巩固既得地区，在新的地点构筑工事，同时加强夜间警戒，并向前方派出有力的侦察队，再次摸清退却之敌的情况。

第四，它们在防御时不是实行消极防御，而是实行同反冲击相结合的积极防御。它们不是坐等敌人来突击和进逼，而是主动转入反冲击，以摸清敌人的薄弱点，改善自己的阵地，同时也使所属各团在反冲击的过程中受到锻炼，做好进攻的准备。

译自《斯大林画传》1949年俄文版

① 本篇摘自《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第308号，1941年9月18日》。——编者注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二十四周年

(1941 年 11 月 6 日在莫斯科市劳动者
代表苏维埃、党组织和社会团体
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

自从我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及在我国建立苏维埃制度以来,已经过去二十四年了。现在我们即将跨入苏维埃制度存在的下一年,第二十五年。

在十月革命的周年庆祝大会上,通常都要总结一下我们在过去一年的和平建设方面的成就。我们的确有可能作这样的总结,因为我们在和平建设方面的成就,不仅逐年增长,而且逐月增长。这些成就是什么,这些成就有多么大,——这是所有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知道的。

但是,过去的一年不仅是和平建设的一年,而且是同背信弃义地进攻爱好和平的我国的德国侵略者进行战争的一年。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只是在前 6 个月继续进行了我国的和平建设工作,下半年有 4 个多月是在同德帝国主义者进行的残酷战争的环境中度过的。所以,战争成了过去一年我国发展中的转折点。战争使我们的和平建设工作大大缩小了,而在某些部门则根本停止了。战

争迫使我们按战时方式来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战争把我国变成一个为前线服务、为我们的红军和海军服务的、统一的、无所不包的后方。

和平建设时期结束了。反对德国侵略者的解放战争时期开始了。

因此,提出关于过去这一年的下半年的,其实是下半年四个多月的战争总结以及我们在这次解放战争中的任务的问题,是完全恰当的。

四个月战争的经过

我在战争爆发时的一次演说中已经说过,战争给我国造成了危险的威胁,我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必须了解到和意识到这种危险,并按战时方式来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现在,我在作四个月战争的总结时,应当着重指出,这种危险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越发加重了。敌人占领了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占领了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其他一些地区,侵入了顿巴斯,象乌云一样笼罩了列宁格勒,并且威胁着我们光荣的首都莫斯科。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正在掠夺我国,破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用劳动建设起来的城市和乡村。希特勒匪帮正在屠杀和蹂躏我国的和平居民,连妇女、儿童和老人都不怜惜。在我国境内的德军占领区里,我们的弟兄正在德国压迫者的枷锁下呻吟着。

我们的陆海军战士捍卫着祖国的荣誉和自由,奋勇击退野兽般的敌人的进攻,树立了英勇无畏的榜样,使敌人血流成河。但是敌人不顾一切损失,丝毫不爱惜自己士兵的鲜血,仍旧向前线调遣

一批又一批的部队来接替被打垮的部队，并倾其全力要在冬季到来之前占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因为敌人知道，冬季对他们是没有好处的。

在四个月的战争中，我们的损失是，阵亡35万人，失踪378 000人，负伤102万人。在同一时期，敌人的损失是，被打死打伤和俘虏450万人以上。

毫无疑问，由于四个月的战争，德国比苏联大为削弱了，因为德国的人员后备快要枯竭，而苏联的后备力量现在才充分显露出来。

“闪击战”的破产

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开始进攻我国的时候，认为他们一定能够在一个月到两个月内“消灭”苏联，并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挺进到乌拉尔。应该说，德国人并没有隐瞒这个“闪击”制胜的计划。相反，他们倒是百般地宣扬这个计划。但是，事实表明“闪击”计划是十分轻率和毫无根据的。现在应该认为，这个疯狂的计划是彻底破产了。

“闪击战”在西欧成功了，而在东方遭到了失败和破产，其原因何在呢？

德国法西斯战略家断言他们能够在两个月内消灭苏联，并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挺进到乌拉尔，他们指望什么呢？

首先，他们指望的是，如他们曾渴望的那样建立一个反苏大同盟，他们以为预先用革命的怪影来恐吓英国和美国的统治集团，就能吸引这些国家参加这个同盟，这样就把我国同其他国家完全隔

离开来。德国人知道，他们利用各个国家内的阶级矛盾以及这些国家同苏联之间的矛盾的这个政策，在法国已经见效了，法国的执政者由于害怕革命的怪影而放弃了抵抗，惊慌失措地把自己的祖国葬送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德国法西斯战略家以为，英国和美国也会如此。其实，德国法西斯分子把有点小名气的赫斯派到英国，就是为了说服英国的政治家参加反苏大进军。但是德国人大大地失算了。不论赫斯如何努力，英国和美国不仅没有参加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反苏进军，反而同苏联站在一个阵营里来反对希特勒德国。苏联不仅没有被孤立，反而有了新的盟国，如英国、美国以及其他被德国人占领的国家。德国利用矛盾和以革命怪影吓人的政策失效了，已经不适用于新的环境。这个政策不仅不适用，反而对德国侵略者孕育着很大的危险，因为这个政策在战争的新的条件下，正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

第二，德国人指望苏维埃制度不巩固，苏联后方不巩固，他们以为，只要红军一遭到严重打击和失利，工人和农民之间就会发生冲突，苏联各民族之间就会发生纠纷，暴动就会发生，国家就会四分五裂，这就一定会便于德国侵略者长驱直入乌拉尔。但是德国人在这方面也大大地失算了。红军的失利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了工农联盟和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不仅如此，红军的失利还把苏联各族人民的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以忘我精神支援自己的红军和红海军的统一的牢不可破的营垒。苏联后方从来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巩固。可以肯定，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象我国现在这样丧失这么多的领土，一定经受不住考验而陷于崩溃。既然苏维埃制度这样容易地经受住了考验并且更加巩固了自己的后方，这就是说，苏维埃制度是现在最巩固的制度。

最后,德国侵略者指望红军和红海军软弱,他们以为德国的陆海军可以一举击溃和驱散我们的陆海军,从而打开一条长驱直入我国腹地的道路。但是德国人在这方面又大大地失算了,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我们的陆海军。当然,我们的陆海军还缺少锻炼,它们总共才打了四个月的仗,还没有能成为一支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军队,而它们面对的敌人却是已经打过两年仗的经验丰富的德国陆海军。但是,第一,我军的士气比德军的士气高,因为我军是在保卫祖国,抵御外国侵略者,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而德军则是在进行侵略战争,掠夺别的国家,他们甚至一分钟也不能相信自己的卑鄙勾当是正义的。毫无疑问,保卫祖国的思想,我国人民为之而战的思想,必定会使我军产生而且实际上已经产生能使红军紧密团结的英雄;而侵略和掠夺别国的思想,德国人专门为之而打仗的思想,也必定会使德军产生而且实际上已经产生丧尽道德和腐蚀德军的职业强盗。第二,德军深入我国腹地,远离德国后方,不得不在敌对的环境中作战,不得不在别国境内建立新的后方,而且这个后方又遭到我国游击队的破坏,这就从根本上瓦解着德军的供给,使他们害怕自己的后方,打破了他们以为自己的地位巩固的信念;而我军却是在本土作战,不断得到自己后方的支援,得到人员、弹药和粮食供应的保障,并且完全信任自己的后方。正因为如此,我军比德国人所想象的要强大,而德军却比根据德国侵略者的夸大宣传所能想象的要软弱。不久以前,我军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保卫战中歼灭了德军大约 30 个精锐师,这表明,在卫国战争的烈火中正在锻炼而且已经锻炼出一批新的苏联战士和指挥员、飞行员、炮兵、迫击炮手、坦克兵、步兵和水兵,他们明天就会成为使德军胆寒的力量。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情况加在一起，就注定了“闪击战”在东方必然破产。

我军暂时失利的原因

这一切当然都是对的。但是，除了这些有利的条件以外，还有一些对红军不利的条件，因此，我军遭受暂时失利，不得不退却，不得不把我国的一些地区让给敌人，这也是实际情况。

这些不利的条件是什么呢？红军在军事上暂时失利的原因在哪里呢？

红军失利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欧洲没有反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第二战场。问题在于，现在欧洲大陆上没有任何一支同德国法西斯军队作战的英国或美国的军队，因此德国人不必分散自己的力量，不必在东西两个战场上作战。而这种情况就使德国人以为他们在西方的后方是有保障的，能够把自己的全部军队及其欧洲盟国的军队都调来进攻我国。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我国是在没有任何军事外援的情况下，单独地进行解放战争，抗击德国人、芬兰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的联合力量。德国人由于暂时的胜利而神气起来，为自己的军队大肆吹嘘，硬说他们的军队在一对一的作战中总能够把红军打败。可是德国人的这种断语是空洞的吹牛，因为既然这样，人们就不明白，为什么德国人还要求芬兰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帮助他们进攻没有军事外援而全靠自己的力量作战的红军。毫无疑问，欧洲没有反对德国人的第二战场是大大有利于德军的处境的。但是同样毫无疑问，在欧洲大陆上一旦出现第二战场时——而第二战场必然会在最近

出现，——我军的处境就会大为有利，而德军则极为不利。

我军暂时失利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坦克不足，航空兵力量也有些不足。在现代战争中，没有坦克，没有足够的航空兵在空中掩护，步兵是很难作战的。我们的航空兵在质量上超过了德国的航空兵，我们光荣的飞行员获得了无畏战士的荣誉。但是我们的飞机目前还比德国人的少。我们的坦克在质量上超过了德国的坦克，我们光荣的坦克兵和炮兵曾多次把拥有大量坦克的嚣张一时的德军打得狼狈逃窜。但是我们的坦克毕竟只有德国人的几分之一。这就是德军所以暂时得胜的秘密。不能说我们的坦克工业搞得不好，给我们前线送去的坦克很少。不是的，坦克工业搞得很好，生产出不少的优质坦克。但是德国人生产的坦克要多得多，因为他们现在不只是支配着本国的坦克工业，而且还支配着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荷兰、法国的工业。不然，红军早就把德军击溃了。德军没有坦克就不去作战，如果他们在坦克方面不占优势，就经受不住我们部队的打击。

为了使德军在坦克方面的优势化为乌有，从而根本改善我军的处境，只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不仅把我国的坦克生产扩大几倍，而且还要大量增产反坦克飞机、反坦克枪、反坦克炮、反坦克手榴弹和反坦克迫击炮，更多地修筑防坦克壕以及其他各种防坦克障碍物。

这就是当前的任务。

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

“民族社会党人”^①是些什么人？

我们通常把德国侵略者即希特勒分子叫作法西斯分子。而希特勒分子竟然认为这不对，并坚持继续自称为“民族社会党人”。可见，德国人想要我们相信，希特勒分子的党，掠夺欧洲并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罪恶进攻的德国侵略者的党，是社会主义的政党。能这样吗？社会主义同掠夺和压迫欧洲人民的野兽般的希特勒侵略者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点吗？

能不能认为希特勒分子是民族主义者呢？不，不能。实际上希特勒分子现在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帝国主义者。当希特勒分子从事收拾德国领土、重新合并莱茵区和奥地利等地时，还有相当的根据可以认为他们是民族主义者。但是，在他们侵占了别国领土和奴役了欧洲各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兰西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罗的海沿岸人等等，并开始争夺世界霸权以后，希特勒的党就不再是民族主义的党了，因为它从这个时候起就成了帝国主义者、掠夺者和压迫者的党了。

希特勒分子的党是帝国主义者的党，同时又是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者中最富有掠夺性和强盗性的帝国主义者的党。

能不能认为希特勒分子是社会主义者呢？不，不能。实际上希特勒分子是社会主义的死敌，是剥夺欧洲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起码的民主自由的最凶恶的反动派和黑帮。为了掩盖其反动的黑

① 原文“национал-социалисты”过去译为“国家社会党人”。——编者注

帮本质，希特勒分子咒骂英国和美国的内部制度是财阀制度。但是，在英国和美国却有起码的民主自由，有工人和职员工会，有工人的政党，有议会；而在德国，在希特勒制度下，所有这些组织都被消灭了。只要把这两类事实对照一下，就可以了解希特勒制度的反动本质和识破德国法西斯分子所谓英美财阀制度的一套鬼话。其实，希特勒制度是俄国在沙皇统治下曾有过的反动制度的翻版。大家知道，希特勒分子很乐意象沙皇制度那样践踏工人的权利、知识分子的权利和各族人民的权利，他们也很乐意象沙皇制度那样制造中世纪式的虐杀犹太人的大暴行。

希特勒的党是民主自由的敌人的党，是中世纪式的反动势力和制造黑帮大暴行的党。

而如果这些寡廉鲜耻的帝国主义者和穷凶极恶的反动派继续披着“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外衣，那么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欺骗人民和愚弄头脑简单的人，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来掩盖自己的强盗帝国主义的本质。

乌鸦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可是，无论乌鸦怎样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乌鸦毕竟是乌鸦。^①

希特勒说：“德国人要用一切手段征服全世界。如果我们想建立我们的大德意志帝国，我们就应当首先撵走和消灭斯拉夫各族——俄罗斯人、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保加利亚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没有任何理由不这样做。”

希特勒说：“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只能用暴力管理他们。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对待他们。如果政治上需要，就应当撒谎、出卖以至

^① 这句话出典于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乌鸦》。——编者注

屠杀。”

戈林说：“谁反对我们，就杀谁，杀吧，杀吧，对此负责的不是你们，而是我，因此，你们杀吧！”

希特勒说：“我要把人从所谓良心这个屈辱人的怪物下解放出来。良心也象教育一样，是摧残人的。我的优点就是，我不受任何理论的或道德的考虑的约束。”

在一名被打死的德国士官身上搜出一份德军统帅部 9 月 25 日给步兵第 489 团的命令，命令中说：

“我命令向每一个出现在 600 米距离内的俄国人开枪。俄国人应当知道，他们面对一个坚决的敌人，他们不能期待这个敌人给予任何宽恕。”

在一名被打死的中尉古斯达夫·齐格尔（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人）身上搜出一份德军统帅部告士兵书，里面说：

“你没有心和神经，在战争中不需要这些。消灭你自己的怜悯心和怜悯心吧，杀死每一个俄国人，每一个苏联人，即使在你面前的是老人或妇女，是女孩或男孩，也不要停手。杀吧，这样你才能拯救自己免于死亡，保证你一家的前途，使你流芳百世。”

你们看，这就是希特勒党首领们和希特勒统帅部的纲领和指示，这就是一群丧失人性和堕落到禽兽地步的人的纲领和指示。

这一群丧尽天良、毫无人格、充满兽性的人竟恬不知耻地号召消灭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消灭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高尔基和契诃夫、谢切诺夫和巴甫洛夫、列宾和苏里科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民族！……

德国侵略者想对苏联各族人民进行歼灭战。好吧，既然德国

人想进行歼灭战,他们就一定会得到歼灭战。

今后我们的任务,苏联各族人民的任务,我们陆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任务,就是把侵入我们祖国领土的所有德国占领军一个不剩地歼灭干净。

对德国占领军决不留情!

消灭德国占领军!

德帝国主义者及其军队必然灭亡

德国侵略者道德退化,早已丧失人性,堕落到禽兽般的地步,——单是这一点就说明他们必然自取灭亡。

但是,决定希特勒侵略者及其军队必然灭亡的,不仅仅是道德因素。

另外还有三个正在日益发挥作用的基本因素,这些因素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希特勒强盗帝国主义必然灭亡。

第一,这就是帝国主义德国的欧洲后方不巩固,欧洲的“新秩序”不巩固。德国侵略者奴役了从法国到苏联的波罗的海沿岸,从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苏维埃白俄罗斯到巴尔干和苏维埃乌克兰这片欧洲大陆的人民,剥夺了他们起码的民主自由,剥夺了他们支配自己命运的权利,夺去了他们的粮食、肉类、原料,把他们变成了自己的奴隶,残杀了波兰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而且认定自己在夺得了欧洲的霸权之后,现在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德国的世界霸权。他们把这叫作“欧洲的新秩序”。但是,这是什么“基础”,这是什么“新秩序”呢?只有妄自尊大的希特勒蠢才们才看不见,欧洲的“新秩序”及其臭名昭彰的“基础”是一座随时都会爆发并把

德帝国主义的纸牌搭的小房子埋葬的火山。有人引证拿破仑，硬说希特勒的行动象拿破仑，他的一切都象拿破仑。但是，第一，在这方面不应当忘记拿破仑的命运。第二，希特勒象拿破仑不过是小猫象狮子一样，因为拿破仑是依靠进步力量来反对反动力量，而希特勒则相反，是依靠反动力量来反对进步力量。只有柏林的希特勒蠢才们才不能了解，被奴役的欧洲人民将起来斗争和举行起义来反对希特勒暴政。在欧洲人民反对希特勒暴政的解放斗争中，苏联、英国和美国一定会给他们充分的支持，对于这一点有谁会怀疑呢？

第二，这就是希特勒侵略者的德国后方不巩固。当希特勒分子在收拾被凡尔赛条约弄得山河破碎的德国时，他们还能得到为复兴德国的理想所鼓舞的德国人民的支持。但是，在这个任务一经解决，希特勒分子开始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走上侵占别国领土和征服别的民族的道路，把欧洲各族人民和苏联各族人民都变为目前德国的仇敌之后，在德国人民中间就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他们反对继续战争，主张消除战争。已持续两年多但还看不到尽头的流血战争，几百万人的牺牲，饥饿，贫困，瘟疫，到处敌视德国人的气氛，希特勒的把苏联人民变成目前德国的仇敌的愚蠢政策，——所有这一切，不能不使德国人民转过来反对这个不必要的毁灭性的战争。只有希特勒蠢才们才不能了解，不仅德军的欧洲后方，就连德军的德国后方也是一座即将爆发并把希特勒冒险家埋葬的火山。

最后，这就是苏联、英国和美国的反对德国法西斯帝国主义者同盟。英国、美国和苏联结成了一个旨在粉碎希特勒帝国主义者及其侵略军的统一阵营，这是事实。现代战争是摩托战争。

谁在摩托产量方面占绝对优势,谁就能赢得战争。如果把美国、英国和苏联的摩托产量加在一起,那么,我们在摩托方面的优势至少是德国的三倍。这就是希特勒强盗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基础之一。

不久以前,有英国代表比弗布鲁克先生和美国代表哈里曼先生参加的三国莫斯科会议^①,决定不断地支援我国坦克和飞机。大家都知道,根据这个决定我们已经开始得到坦克和飞机。更早以前,英国就供应我国象铝、铅、锡、镍、橡胶这类紧缺物资。如果再加上美国最近决定给苏联十亿美元贷款这一事实,可以肯定地说,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同盟已经成为现实,它正在为我们共同的解放事业的利益发展着并将继续发展下去。

这些就是决定德国法西斯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因素。

我们的任务

列宁把战争分为两类: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和解放的、正义的战争。

德国人现在进行的是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目的是掠夺别国领土和征服别的民族。因此,一切正直的人都应当起来反对德国侵略者这个敌人。

与希特勒德国不同,苏联及其盟国进行的是解放的、正义的战争,目的是把欧洲和苏联被奴役的人民从希特勒的残暴统治下解放出来。因此,一切正直的人都应当象支援解放者的军队那样支

^① 这次会议于1941年9月29日—10月1日举行。——编者注

援苏联、英国和其他盟国的军队。

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侵占别国领土和征服别的民族这样的战争目的；无论是对欧洲各国的人民和领土，或者是对亚洲各国包括伊朗在内的人民和领土，都是一样。我们首要的目的是，从德国法西斯的压迫下解放我国的领土和我国的人民。

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把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制度强加于期待我们帮助的斯拉夫民族和欧洲其他被奴役的民族这样的战争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帮助这些民族进行反对希特勒暴政的解放斗争，然后让他们完全自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安排。绝对不干涉别国人民的内政！

但是，要实现这些目的，就必须粉碎德国侵略者的军事实力，必须一个不剩地消灭为奴役我们祖国而侵入我国的所有德国占领军。

为此，必须使我们的陆海军得到我们举国一致的积极有效的支援；使我国的男女工人和职员在企业中孜孜不息地工作，以供给前线越来越多的坦克、反坦克枪、反坦克炮、飞机、火炮、迫击炮、机枪、步枪和弹药；使我们的男女集体农庄庄员在自己的田地上孜孜不息地工作，以供给前线和国家越来越多的粮食、肉类、工业原料；使我们整个国家和苏联各族人民组成一个统一的战斗营垒，同我们的陆海军一起为我们祖国的荣誉和自由，为消灭德国军队而进行伟大的解放战争。

这就是当前的任务。

我们能够而且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

只有完成了这个任务并消灭了德国侵略者，我们才能得到持久的正义的和平。

彻底消灭德国侵略者!

解放在希特勒暴政压迫下呻吟的一切被压迫民族!

苏联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我们的红军和我们的红海军万岁!

我们光荣的祖国万岁!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18—36页

检阅红军时的演说

(1941 年 11 月 7 日于莫斯科红场)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工人、集体农庄庄员、智力劳动者同志们，在敌后暂时处在德国强盗铁蹄下的兄弟姊妹们，破坏德国侵略者后方的我们光荣的男女游击队员们！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

同志们！今天是在严重的情况下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四周年的。德国强盗背信弃义的进攻和强加于我们的战争，造成了对我国的威胁。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些地区，敌人窜到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门口。敌人估计，我们的军队将一触即溃，我们的国家将屈膝投降。可是，敌人大大地失算了。我们的陆海军虽然暂时失利，但是在整个战线上正在英勇地抗击敌人的进攻，给敌人以重创，而我们的国家，我们举国上下，却已经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战斗营垒，同我们陆海军一起，共同粉碎德国侵略者。

我们的国家曾经经历过比现在的处境更加严重的日子。请回想一下 1918 年我们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时的情形。当时我国四分之三的领土都在外国武装干涉者手中。我们暂时失去了乌克兰、高加索、中亚细亚、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当时我们没有同盟国，我们没有红军（那时我们才刚开始建立红军），我们缺乏粮

食,缺乏武器,缺乏服装。当时有 14 个国家围攻我国。可是,我们并没有灰心,并没有丧气。当时我们在战争的烈火中组织了红军,并把我国变成了一座军营。当时,伟大的列宁的精神鼓舞我们为反对武装干涉者而战。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粉碎了武装干涉者,收复了全部失地,取得了胜利。

现在,我国的状况要比 23 年前好得多。现在,我国无论工业、粮食和原料,都比 23 年前丰富许多倍。我们现在有同盟国,他们同我们一起结成反对德国侵略者的统一战线。我们现在得到陷于希特勒暴政压迫下的欧洲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现在拥有精锐的陆军和精锐的海军,他们正在坚决保卫着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我们无论对于粮食、武器或服装都不感到严重的缺乏。我们全国,我国的各族人民都一致支援我们的陆海军,帮助他们粉碎德国法西斯侵略匪帮。我们有源源不断的人员后备。现在伟大的列宁的精神和他的胜利旗帜,就象 23 年前一样,鼓舞着我们去进行卫国战争。

我们能够而且一定会战胜德国侵略者,这难道可以怀疑吗?

敌人并不象某些惊慌失措的知识分子所形容的那样强大。魔鬼也并不象人们所描绘的那样可怕。谁能否认,我们红军曾屡次把嚣张一时的德军打得仓皇而逃呢?如果不是根据德国宣传家大肆吹嘘的声明来判断问题,而是根据德国的实际情况来判断问题,那就不难了解,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正面临崩溃。现在饥饿和贫困笼罩着德国,在四个月的战争中,德国已损失士兵 450 万人,德国血流殆尽,人员后备枯竭,不仅陷于德国侵略者压迫下的欧洲各国人民,而且连看不到战争尽头的德国本国人民都充满了愤怒的情绪。德国侵略者正在作垂死挣扎。毫无疑问,德国是不能够长久

挣扎下去的。再过几个月，再过半年，也许一年，希特勒德国一定会由于其罪行累累而崩溃。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是能够消灭德国侵略者匪军的力量。处在德国侵略者压迫下的被奴役的欧洲各国人民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是他们的解放者。伟大的解放使命已经落在你们的肩上。你们不要辜负这个使命！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战争。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

彻底粉碎德国侵略者！

消灭德国占领军！

我们光荣的祖国、我们祖国的自由、我们祖国的独立万岁！

在列宁的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37—40页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指示信^①

(1942 年 1 月 10 日)

红军在极大地消耗了德国法西斯军队之后,转入了反攻,迫使德国侵略者西退。

德军为迟滞我军前进而转入了防御,开始构筑设有掩体、障碍物和野战工事的防御地区。德军指望在春季来临之前以此迟滞我军进攻,以便调集兵力在春季重新转入对红军的进攻。可见,德军是想赢得时间,得到喘息。

我军的任务是不给德军这种喘息的机会,不停顿地逼其西退,迫使它在春季到来之前就消耗掉预备队,那时我军将有大量新的预备队,而德军却不再拥有预备队,从而保证在 1942 年彻底粉碎希特勒的军队。

但是,要实现这个任务,必须使我军学会突入敌人的防线,学会组织对敌人防御全纵深的突破,并以此为我军步兵、坦克和骑兵打开前进的道路。现在德军不是只有一道防线,它正在构筑并且不久将要有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如果我军不学会迅速而彻底地

① 1974 年 1 月苏联《军事历史》杂志第 1 期《文献和资料》栏刊载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 1942 年 1 月 10 日指示信》一文,摘引和评论了斯大林和亚·米·华西列夫斯基联名颁发的这封指示信。本篇是辑录这篇文章中的引文而成的。——编者注

突入和突破敌人的防线,我军就无法前进。

是否可以说我军已经学会了突入和突破敌人的防线呢?

可惜还没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这样说。至少还远远不是我们所有的集团军都学会了突破敌人的防线。

要保证突破敌人防线的全纵深,需要什么呢?

起码要有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在我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实践中用集中于一个方向的突击集团的行动来代替成一线配置的各个师的行动;第二,必须以炮兵进攻代替所谓的炮火准备。

(1) 突击集团的行动。遗憾的是,我军进攻时大多数集团军还没有学会突入和突破敌人的防线。我军通常以沿正面配置成一线的几个师或旅实施进攻。显然,这样组织进攻不会奏效,因为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段都无法形成兵力优势。这样的进攻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有当我们在战线的一个地段上建立了对敌军的巨大兵力优势时,进攻才会取得应有的效果。为此,每一个担负突破敌人防御任务的集团军都必须建立突击集团,即在战线的一定地段上集中三四个师实施突击。集团军首长的首要任务即在于此,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一定的地段上造成决定性的兵力优势和成功地突破敌人的防御。

方面军首长在组织突破和进攻时的任务,同样如此。当然,方面军突击集团的编成不应是几个师,而应是几个集团军,因为方面军范围的突破是一个更为有力更为广泛的行动,要求具有比集团军范围的进攻大得多的兵力。

(2) 炮兵进攻的组织。在突破敌人防御和组织对敌人的进攻中,炮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没有集中在某一地段的炮兵有力的、长时间的支援,要突破敌人防御和实施进攻是不可能的。

我们往往在没有炮兵、没有任何炮兵支援的情况下把步兵投入对敌人防线的进攻，然后却抱怨步兵不去对付防御工事里的敌人。显然，这种“进攻”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不是进攻，而是犯罪，是对祖国犯罪，对被迫作出无谓牺牲的军队犯罪。

那么，炮兵应当怎样支援步兵进攻呢？

我们通常把炮兵对步兵的支援理解为进攻前的“炮火准备”。炮兵通常在步兵进攻前半小时、一小时，有时是两小时或更长的时间内进行射击，然后炮兵就停止行动，让步兵进攻，而不顾敌人防御全纵深还没有被破坏，敌人的火炮和机枪发射点还没有被压制。这就叫作“炮火准备”。不难看出，这样的炮兵支援是不充分的，而在这种不充分的支援下所实施的进攻是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因此，我军对敌人防御所实施的进攻，尽管经过了“炮火准备”，往往还是力量渐衰，而且为使进攻奏效，还不得不反复进行所谓的“炮火准备”。

由此可见，所谓的“炮火准备”，作为炮兵支援步兵进攻的一种手段，已经不符合战争的要求，已经过时，应当摒弃。

为了使炮兵支援有效，从而使步兵进攻奏效，必须抛弃炮火准备的做法，改用炮兵进攻的做法。

这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这意味着炮兵不能局限于进攻前一两个小时的一次行动，而应当同步兵一起进攻，应当在整个进攻期间实施射击，避免长时间的间断，直到敌人防线的全纵深被突破为止。

第二，这意味着步兵不应当象在所谓的“炮火准备”时那样在炮兵停止炮击后发起进攻，而应当在炮兵进攻的同时，在炮火隆隆声中，在炮兵音乐的伴奏下实施进攻。

第三，这意味着炮兵不应当分散行动，而应当集中行动，并且不应当集中在战线的随便什么地方，而应当集中在集团军和方面军的突击集团行动的地域内，并且只能集中在这个地域内，因为没有这个条件炮兵进攻就不可能实施。

我们的任何一个集团军，不论它的炮兵多么少，只要把集团军属炮兵团使用上，再从每师的师属炮兵中各抽调（譬如说）两个连和20—30门120毫米迫击炮，就可以在自己的突击集团行动地域内集中60—80门火炮。这样编成的炮兵群完全足以摧毁敌人的防御，从而给集团军突击集团以非常宝贵的炮兵支援。如果我们的集团军不这样做，那是因为它们低估了炮兵密集火力对步兵进攻的重大意义。

我们的任何一个方面军，不论它的炮兵多么少，只要把方面军炮兵预备队使用上，再抽调一些集团军属炮兵团以及哪怕三分之一的师属炮兵，就同样可以在方面军突击集团行动地域内集中150—200门火炮。这样编成的炮兵群完全足以摧毁方面军地域内敌人的防御。如果我们的方面军不这样做，那是因为它们低估了炮兵密集火力对步兵进攻的重大意义。

结论：

（1）敌人为了迟滞红军前进已转入防御，正在构筑筑垒防线。

（2）红军不能给敌人以喘息机会，它应当进攻，迫使敌人西退。

（3）为了顺利进攻，我们应当突入和突破敌人的防御。

（4）为了突入和突破敌人的防御，我们必须学会在集团军地域内，在方面军地域内实施突击集团行动。

（5）为了使突击集团取得成功，就应当让它们在突破敌人防

御全纵深时始终得到有力的炮兵支援。

(6)为了保证步兵得到这样的炮兵支援,就需要抛弃“炮火准备”的做法,改用炮兵进攻的做法。

(7)为了使炮兵进攻奏效,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司令员应当把炮兵的主要部分集中到突击集团行动的地域内。

(8)只有步兵突击集团和大量炮兵的联合行动才能保证进攻取得胜利。

约·斯大林

亚·华西列夫斯基

译自 1974 年 1 月《军事历史》杂志
第 1 期第 70—71、72—73、74 页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 55 号。1942 年 2 月 23 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

我国各族人民是在反对卑鄙无耻地侵犯我们祖国的生存和自由权利的法西斯德国的卫国战争的严酷日子里, 庆祝红军建军二十四周年的。在从北冰洋到黑海的辽阔战线上,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以便把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从我国驱逐出去, 捍卫我们祖国的荣誉和独立。

红军抗击敌人侵略, 保卫祖国,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二十四年前建立红军, 就是为了同当时力图瓜分我国、使我国丧失独立的外国武装干涉者的侵略军队作斗争。年轻的红军在初次作战时, 在 1918 年 2 月 23 日, 就在普斯科夫和纳尔瓦附近彻底粉碎了德国侵略者。所以 1918 年 2 月 23 日就成为红军的誕生日。从此以后, 红军就在同外国武装干涉者作斗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它在 1918 年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战斗中, 捍卫了我们的祖国, 把德国侵略者驱逐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它在 1919—1921 年同协约国军队作战中, 捍卫了我们的祖国, 把他们驱逐出我国境。

由于在国内战争中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者, 所以苏联各族人民得到了长期的和平和进行和平建设的条件。在这二十年的和平

建设时期,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和集体农庄农业,繁荣了科学和文化,巩固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但是苏联人民从来没有忘记敌人有可能再来侵犯我们祖国。所以随着工农业和科学文化的高涨,苏联的军事实力也加强了。这个实力是某些喜欢侵占别国领土的人已经亲身领略过的。嚣张一时的德国法西斯军队现在正在领略这个实力。

8个月以前,法西斯德国蛮横无耻地破坏了互不侵犯条约,背信弃义地进犯我国。敌人估计,红军将一触即溃,并丧失抵抗力。可是敌人大大地失算了。他们没有估计到红军的力量,没有估计到苏联后方的巩固,没有估计到我国各族人民争取胜利的意志,没有估计到法西斯德国的欧洲后方不可靠,最后,也没有估计到法西斯德国及其军队内在的虚弱。

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由于德国法西斯突然进犯,红军曾被迫退却,放弃一部分苏联领土。但是在退却时,红军消耗了敌人的兵力,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无论是红军战士还是我国各族人民都没有怀疑过,这种退却只是暂时的,敌人一定会被阻止,然后被击溃。

在战争过程中,红军不断汲取了新的活力,补充了人员和技术装备,得到了新的预备队师的加强。于是红军在辽阔战线的重要地段上转入进攻的时机来到了。在短时间内,红军就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和在季赫温附近,在克里木和在莫斯科附近,给了德国法西斯军队一个又一个的打击。在莫斯科附近的激战中,红军击溃了德国法西斯军队,解除了苏联首都被围的威胁。红军击退了莫斯科附近的敌人,并迫使敌人继续向西退却。莫斯科州和图拉州的全部以及暂时被敌人占领的其他州的几十个城市和几百个乡村,

都已经从德国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了。

现在德国军队已经没有战争最初几个月里那种由于背信弃义突然进攻所造成的军事优势了。作为德国法西斯军队一种潜力的突然性因素，已经完全消失。于是德国法西斯分子突然进攻所造成的战争条件的不均等状态也就消除了。现在战争的命运不会由突然性这种偶然因素来决定，而要由那些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后方的巩固性，军队的士气，师的数量和质量，军队的装备，军队指挥人员的组织能力来决定。这里必须指出一点：当突然性这个因素从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武库中刚一消失，这个军队就濒于覆灭了。

德国法西斯分子认为他们的军队是无敌的，断言在同红军单独作战时，一定能击溃红军。现在红军是单独对德国法西斯军队作战。不但如此，德国法西斯军队还有意大利、罗马尼亚和芬兰的军队在前线上的直接支援。红军则暂时还没有这样的支援。然而结果是：嚣张一时的德国军队正在遭受失败，红军却正在取得重大的胜利。德军在红军的强大打击下，正在向西逃窜，人员和技术装备受到巨大损失。他们节节顽抗，力图拖延他们覆灭的日子。但是敌人是徒劳的。现在主动权已经掌握在我军手里，希特勒的这部松散生锈的机器，无论怎样拚命挣扎，也挡不住红军的攻击。不久以后，红军就会以强大的打击，赶走列宁格勒附近的野兽般的敌人，肃清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卡累利阿的城市和乡村中的敌人，解放苏维埃的克里木，那时红旗将重新在整个苏联领土上胜利地飘扬。

但是，如果满足于既得的胜利，以为德军已经不足为患，那就是不可饶恕的目光短浅的表现，那就是苏联人所不应有的虚夸和骄傲。不要忘记，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敌人虽然遭受着失

败,但是还没有被粉碎,更没有被彻底消灭。敌人还是强有力的。它将鼓起最后的力量去争取胜利。并且它愈是失败,就愈加凶残。所以我国一分钟也不能放松组织后备力量支援前线的工作。必须使源源不断的新部队开赴前线,打击野兽般的敌人,争取胜利。必须使我们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加倍努力地生产。必须使前线获得日益增多的坦克、飞机、火炮、迫击炮、机枪、步枪、自动枪和弹药。

这就是红军的力量和威力的主要源泉之一。

但是红军的力量不仅仅在于这一点。

红军的力量首先在于,它进行的不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的战争,而是解放的、正义的卫国战争。红军的任务是解放被德国侵略者占领的苏联领土;解放遭受德国侵略者压迫的我国城乡的居民,这些居民在战前是自由的,过着人的生活,而现在则遭到压迫和掠夺,忍受着饥寒交迫的痛苦;红军还要解放遭受德国法西斯恶魔侮辱和欺凌的我国妇女。试问还有什么能比这种任务更高尚更光荣呢?没有一个德国兵能够说他是进行着正义的战争,因为他不能不看到,他是被迫去为掠夺和压迫其他民族而作战的。德国士兵没有能鼓舞他、能使他引为自豪的高尚光荣的战争目的。相反地,任何一个红军战士都能自豪地说,他是进行着正义的解放战争,进行着捍卫祖国的自由和独立的战争。红军有鼓舞他们建立功勋的高尚光荣的战争目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在卫国战争中,涌现出成千成万为祖国的自由誓死奋战的英雄。

红军的力量就在于此。

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虚弱也就在于此。

有时外国报刊胡说什么红军的目的是要消灭德意志民族和消

灭德意志国家。这当然是一种笨拙的谎言和对红军的愚蠢的诬蔑。红军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愚蠢的目的。红军的目的是，就是要将德寇驱逐出我国和解放被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占领的苏联领土。解放苏联领土的战争，很可能导致希特勒匪帮的垮台或者覆灭。这种结局我们是欢迎的。可是，如果把希特勒匪帮同德意志民族混为一谈，同德意志国家混为一谈，那就很可笑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希特勒之流可以上台下台，而德意志民族、德意志国家依然存在。

最后，红军的力量在于，它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对于其他民族的种族仇恨，对于德意志民族也是一样；红军是按照各民族、各种族一律平等的精神，按照尊重其他民族权利的精神教育出来的。德国人的种族理论和种族仇恨的实践，使得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都成为法西斯德国的敌人。苏联的种族平等理论和尊重其他民族权利的实践，则使得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都成为苏联的朋友。

红军的力量就在于此。

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虚弱也就在于此。

有时外国报刊胡说什么苏联人所以仇恨德国人，就因为他们都是德国人；红军所以消灭德国士兵，就因为他们都是德国人，就因为仇恨德国的一切；因此红军抓住德国兵就杀掉。这当然是同样的笨拙的谎言和对红军的愚蠢的诬蔑。红军没有种族仇恨心理。它没有这种卑劣情绪，因为它是按照种族平等和尊重其他民族权利的精神教育出来的。此外，还不要忘记，在我国，表现种族仇恨的行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但是既然德国法西斯侵略军想奴役我们祖国，当他们已经被我军合围而又不肯缴械投降时，红军当然只好消灭他们。红军消灭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德国人，而是因为他们想奴役我们祖国。

红军同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一样，有权利而且有义务来消灭奴役自己祖国的匪徒，而不问他们属于哪一个民族。不久以前，在加里宁、克林、苏希尼奇、安德列阿波尔和托罗佩茨等城市，当德军守备部队已经被我军合围时，我军曾建议他们投降并且答应在他们投降后保全他们的生命。可是德军守备部队竟拒绝缴械投降。自然，只好用武力把他们赶走，于是就有不少的德国兵被打死了。战争总是战争。如果德军官兵愿意投降，那么红军就接收他们为俘虏，并保全他们的生命。如果德军官兵拒绝投降，而且还手持武器企图奴役我们祖国，那时红军自然就要消灭他们。请想一想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话吧：“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他。”①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我向你们祝贺红军建军二十四周年！希望你们彻底战胜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红军和红海军万岁！

男女游击队员万岁！

我们光荣的祖国，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万岁！

引导我们走向胜利的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伟大的列宁的旗帜万岁！

在列宁的旗帜下前进，消灭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国防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41—48页

① 马·高尔基的这句名言，是他发表在1930年11月15日《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的标题。——编者注

给苏联科学院院长 弗·列·科马罗夫的两个电报

(1942 年春)

一

我相信,虽然是在战时的困难条件下,科学院的科学活动仍将随着国家日益增长的需要而发展,科学院主席团在您的领导下,定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实现科学院所面临的任务。

二

政府满意地接受您提出的关于全面开展科学院各科学机构、院士和通讯院士的活动,来加强苏联军事实力的建议。

我希望苏联科学院领导科学和生产方面的革新者运动,并且在对我国人民和其他一切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德国法西斯主义展开的斗争中,成为先进的苏联科学的中心。

苏联政府相信,在苏联人民反对德国占领者的伟大卫国战争的严峻日子里,以您为首的苏联科学院将光荣地履行自己对祖国的崇高的爱国主义义务。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约·斯大林

1942 年 4 月 12 日

译自《苏联科学院历史简要大纲》1945年版
第84—85页和《苏联科学院献给约瑟夫·
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1949年版第536页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 130 号。1942 年 5 月 1 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男女工人、男女农民、智力劳动者同志们，在战线那一边，在德国法西斯军队后方暂时处在德国压迫者铁蹄下的兄弟姐妹们！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五一”节！

同志们！今年我国各族人民是在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卫国战争环境中庆祝国际“五一”节的。战争在我们生活的各方面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它同样也给今天的“五一”节打上了烙印。我国劳动人民考虑到战争环境，放弃了节日休息，要在为保卫我们祖国而进行紧张的劳动中度过今天。他们同我们前线战士生死与共，把“五一”节变为劳动日和斗争日，以便给前线最大的支援，给前线更多的步枪、机枪、火炮、迫击炮、坦克、飞机、弹药、粮食、肉类、鱼类和蔬菜。

这就是说，我们的前线和后方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战斗营垒，它决心克服在战胜敌人的道路上的任何困难。

同志们！自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把欧洲推入了战争深渊，征服了欧洲大陆各爱好自由的国家——法国、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希腊，榨取它们的脂膏而使德

国银行家大发横财，已经有两年多了。自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卑鄙无耻、背信弃义地进攻我国，掠夺和毁灭我们的乡村和城市，蹂躏和屠杀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达维亚的和平居民，已经有 10 个多月了。我国各族人民进行反对野兽般的敌人的卫国战争，捍卫自己祖国的荣誉和自由，已经有 10 个多月了。在这一时期内，我们已有可能来充分看清德国法西斯分子，了解他们的真正意图，认识他们的真面目，并且不是根据口头声明，而是根据战争经验，根据众所周知的事实来认识的。

他们，我们的敌人，德国法西斯分子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究竟是哪一种人呢？关于这点，战争经验教导我们的是些什么呢？

有人说，德国法西斯分子是保护德国的完整和独立、使它不受其他国家侵犯的民族主义者。这当然是谎话。只有骗子才会硬说，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希腊、苏联以及其他爱好自由的国家侵犯了德国的完整和独立。其实，德国法西斯分子并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侵略别的国家，榨取它们的脂膏而使德国的银行家和财阀大发横财的帝国主义者。大家知道，德国法西斯分子的头子戈林本人就是经营几十家工厂的头等银行家和财阀之一。希特勒、戈培尔、里宾特洛普、希姆莱以及现在德国其他当权者，都是德国银行家的看家狗，把德国银行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德国军队就是这些老爷们手中的盲目工具，它的使命并不是为德国的利益，而是为德国的银行家和财阀大发横财，去洒自己的和别人的鲜血，去残害自己和别人。

战争的经验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有人说，德国法西斯分子是反对财阀而努力保护工农利益的社会主义者。这当然是谎话。只有骗子才会硬说，在德国和被征

服的国家的工厂中实行奴隶劳动、在乡村中恢复农奴制度的德国法西斯分子，是工农的保护者。只有厚颜无耻的骗子才会否认，德国法西斯分子所建立的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有利于德国的财阀和银行家而不利于工农。其实，德国法西斯分子是反动的农奴主，而德国军队是农奴主的军队，是为德国贵族大发横财和恢复地主政权而卖命的军队。

战争的经验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有人说，德国法西斯分子是欧洲文化的代表者，他们进行战争是为了把这种文化传播到其他国家去。这当然是谎话。只有职业骗子才会硬说，在欧洲遍设绞架、掠夺和蹂躏和平居民、焚烧和炸毁城市乡村、破坏欧洲各国人民的文化珍品的德国法西斯分子，会是欧洲文化的代表者。其实，德国法西斯分子是欧洲文化的敌人，而德国军队则是中世纪黑暗势力的军队，它的使命是为了培植德国银行家和贵族的奴隶制“文化”而破坏欧洲文化。

战争的经验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这就是战争经验所揭露并使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我们敌人的面目。

但是，战争的经验所得出的结论不限于这些。除此以外，战争的经验还表明，在战争时期，无论是法西斯德国及其军队的状况，无论是我国和红军的状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是什么呢？

首先，毫无疑问，在这一时期内，法西斯德国及其军队比 10 个月以前削弱了。战争给德国人民带来的是巨大的失望、几百万人的牺牲、饥饿和贫困。战争终结无期，而人员后备消耗殆尽，石油消耗殆尽，原料消耗殆尽。在德国人民中，德国必然失败的意识日

益增长。德国人民日益明白，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是把德国从希特勒—戈林冒险匪帮的手中解放出来。

希特勒帝国主义占领了欧洲的广大领土，但是它摧毁不了欧洲各国人民的抵抗意志。被奴役的各国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强盗制度的斗争，已开始具有普遍的性质。在一切被占领的国家内，军事工厂里进行怠工、炸毁德国人的仓库、颠覆德国人的军用列车、杀死德国官兵等事，已成为通常的现象。整个南斯拉夫以及苏联的被德国人占领的地区，都燃起了游击战争的烽火。

所有这些情况都使德国后方削弱，因而也就使整个法西斯德国削弱。

至于说到德国军队，那么不管它怎样顽抗，毕竟比10个月以前削弱得多了。它的一些有经验的老将领，象赖谢瑙、布劳希奇、托特以及其他，不是被红军击毙了，就是被德国法西斯上层撤职了。它的基干军官，一部分为红军歼灭了，一部分由于抢劫和蹂躏老百姓而腐化了。它的兵员在作战过程中大大削弱，得到的补充日益减少。

其次，毫无疑问，在这一战争时期内，我国比战争初期更强大。不仅朋友，就连敌人都不得不承认，我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联合和团结在自己政府的周围，我国的前线和后方已团结成为万众一心的统一的战斗营垒，后方的苏联人向我们的前线输送愈来愈多的步枪和机枪、迫击炮和火炮、坦克和飞机、粮食和弹药。

至于说到我们祖国的国际联系，那么它近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加强，更加发展了。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都已联合起来反对德帝国主义。他们注视着苏联。我国各族人民为自由、荣誉和独立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博得了全体进步人类的赞扬。一切爱好自由

的国家的人民都认定苏联是能够把世界从希特勒瘟疫中拯救出来的力量。在这些爱好自由的国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英国和美国，友谊和同盟的纽带已把我们同它们联结起来，它们向我国提供愈来愈多的军事援助来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所有这些情况说明，我国已经强大得多了。

最后，毫无疑问，在这一时期内，红军比战争初期更加有组织，更加强大了。红军在因德帝国主义者背信弃义的进攻而暂时退却以后，夺得了战争进程中的转折，由积极防御转入向敌军实施胜利的进攻，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由于红军的胜利，卫国战争无疑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从希特勒妖孽手中解放苏联国土的时期。虽然红军是在严寒积雪的冬季的困难条件下着手执行这个历史任务的，但它仍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夺得了作战的主动权，使德国法西斯军队遭到一系列惨重的失败，迫使他们退出很大一片苏联领土。侵略者想利用冬季来喘息一下和巩固其防线的打算已经破产了。红军在进攻过程中，消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缴获了敌人不少的技术装备，迫使敌人过早地消耗来自深远后方的原定用于春夏战役的预备队。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红军已经更加有组织、更加强大了，它的军官在战斗中受到了锻炼，它的将军更有经验、更有洞察力了。

红军的士兵也发生了转变。

在卫国战争头几个月战士中有过的那种对敌人宽容和麻痹大意的现象已经消失了。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施于和平居民和苏联战俘的种种残暴、抢劫和蹂躏行为，医好了我们战士的这种毛病。战士们变得更凶猛、更无情了。他们学会了真正仇恨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他们懂得了，如果不知道刻骨地仇恨敌人，就不能战胜敌人。

战争初期有过的并隐藏着害怕德国人的心理的所谓德军无敌的空谈,再也没有了。在罗斯托夫和刻赤附近、在莫斯科和加里宁附近、在季赫温 and 列宁格勒附近的有名战斗中,红军把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打得狼狈逃窜,这使我们的战士相信了,所谓德军无敌的空谈,是法西斯宣传家编造出来的神话。战争的经验使我们的战士相信了,所谓德国军官的勇敢是一种非常相对的东西,德国军官在对付手无寸铁的战俘和和平的居民时是勇敢的,但是当他们遇到红军有组织的力量时,就不勇敢了。你们该记得民间有一句谚语:“遇着绵羊是好汉,遇着好汉是绵羊。”

这就是从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战争经验中得出的结论。

这些结论说明什么呢?

这些结论说明,我们今后也能够而且应当击溃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直到把他们完全歼灭,直到从希特勒恶棍手中完全解放苏联国土。

同志们! 我们进行的是解放的正义的卫国战争。我们没有侵占别的国家、征服别的民族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明确而崇高的。我们要从德国法西斯恶棍手中解放我们苏联国土。我们要从德国法西斯恶棍的侮辱下解放我们的弟兄——乌克兰人、摩尔达维亚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卡累利阿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应当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如果德国占领者不投降,那就彻底消灭他们,一个不留。没有别的办法。

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而且是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做到的。

红军拥有实现这一崇高目的的一切必要条件。所缺少的只有一点,这就是充分利用我们祖国所供给的头等技术装备来打击敌人的本领。所以红军的任务,它的战士、它的机枪手、它的炮兵、它

的迫击炮手、它的坦克兵、它的飞行员和骑兵的任务是，学习军事，顽强地学习，熟练地掌握自己的武器，成为本行的能手，从而学会准确地打击敌人。只有这样，才能学会战胜敌人的艺术。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

在向你们致敬并祝贺“五一”节时，我命令：

1. 战士们熟练地掌握步枪，成为掌握自己武器的能手，要象我们那些歼灭德国占领者的光荣的特等射手那样，百发百中地消灭敌人！

2. 机枪手、炮兵、迫击炮手、坦克兵、飞行员们熟练地掌握自己的武器，成为本行的能手，痛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直到把他们彻底歼灭！

3. 合成军队的指挥员们熟练地掌握诸兵种的协同动作，成为统率军队的能手，向全世界表明，红军能够完成自己的伟大的解放使命！

4. 全体红军争取使 1942 年成为彻底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从希特勒恶棍手中解放苏联国土的一年！

5. 男女游击队员们加强德国侵略者后方的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通信和运输工具，消灭敌人的司令部和技術装备，对我们祖国的压迫者不要吝惜子弹！

在伟大列宁的战无不胜的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国防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49—58 页

答美联社记者问

卡西迪^① 先生：

因为很忙，不能同您面谈，对您提出的问题，只能作一简短的书面回答。

1. “关于第二战场的可能性问题，在苏联对目前时局的估计中占什么地位？”

答：占很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占头等地位。

2. “盟国对苏联的帮助究竟有多大的效果，要扩大和改进这种帮助能做些什么？”

答：盟国对苏联的帮助同苏联吸引住德国法西斯军队主力所给盟国的帮助比较起来，其效果暂时还是小的。要扩大和改进这种帮助，只须做一件事，就是盟国完全地、按时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3. “苏联的抵抗力还有多大？”

答：我想，按本身实力来说，苏联抵抗德国强盗的能力，比法西斯德国或其他任何侵略国保证自己统治世界的能力，一点也不低，甚至还要高一些。 顺致

敬意

约·斯大林

1942年10月3日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59—60页

^① 亨·卡西迪当时是美联社驻莫斯科记者。——编者注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 307 号。1942 年 10 月 9 日于莫斯科市)

关于在红军中建立完全的一长制 和取消政治委员制

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1942 年 10 月 9 日《关于在红军中建立完全的一长制和取消政治委员制》的指令,我命令:

1. 解除各部队、兵团、司令部、军事学校、国防人民委员部所属各总部和红军其他机关的政治委员以及各分队的政治指导员所担任的职务,任命他们为相应的政治副指挥员(副首长)。

2. 各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限期一个月在其受权范围内授予政治工作人员以指挥员军衔。

各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在 1942 年 11 月 15 日以前把授予正营级政治干部以上的政治工作人员以指挥员军衔的鉴定材料,通过红军总政治部呈报国防人民委员部。

3. 兵团司令员、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更坚决地把有军事素养的政治工作人员提拔到指挥岗位上来,特别是在连长、营长这一环节。

4. 各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在本年 10 月 20 日以前组织方面军的为期两个月、有学员 150—250 人的指挥员训练班,以便把最有

担任指挥工作才能的政治工作人员培养成连长。训练班学员的挑选工作,与红军总政治部配合进行。

5. 红军总干部部从今年 11 月 1 日起在“射击”训练班中举办为期两个月的训练班,训练最通晓军事的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以便从他们当中培养 200 名团长和 600 名营长。训练班学员的挑选工作,由红军总政治部协同总干部部进行。

6. 本命令任命的政治副指挥员(副首长)保持原薪。

国防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译自 1942 年 10 月 10 日《真理报》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二十五周年

(1942 年 11 月 6 日在莫斯科市劳动者
代表苏维埃、党组织和社会团体
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

今天我们庆祝我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二十五周年。自从我国建立苏维埃制度以来,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我们即将跨入苏维埃制度存在的下一年,第二十六年。

在十月苏维埃革命的周年庆祝大会上,通常都要把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过去一年的工作作一个总结。现在,我受委托向你们作过去一年,即从去年 11 月起到今年 11 月止的工作总结报告。

过去的一段时期,我们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的活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进行和平建设和为我国前线组织巩固的后方,另一方面是领导红军进行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

1. 后方的组织工作

在这一时期内,我们领导机关的和平建设工作是,把我们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基地转移到我国东部地区,撤退工人和企业

设备,并在新的地区安置起来,扩大播种面积,增加东部地区的秋播地,最后,根本改善我们为前线生产的企业的工作,加强后方的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劳动纪律。应当说,这是我们的管理经济和行政的各人民委员部(其中包括我们的铁路运输)的一项规模巨大、极其困难、极其复杂的组织工作。但是,困难被克服了。而现在,尽管有战时的一切困难,我们的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工作,无疑做得是令人满意的。我们的军事工厂和同它们协作的企业都忠实地、按时地供给红军以火炮、迫击炮、飞机、坦克、机枪、步枪和弹药。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也忠实地、按时地供给居民和红军以粮食,供给我国工业以原料。应当承认,我国从来还没有过这样巩固的和有组织的后方。

这一切复杂的组织工作和建设工作,不仅改变了我们国家的面目,并且也改变了后方人们自己的面貌。人们更加振作,不那么松懈,更加遵守纪律,学会了按战时方式工作,认识到自己对祖国、对前线的祖国捍卫者——红军所负的职责。在后方,没有公民责任感的懒散松懈的人日益少了。充满公民责任感的有组织纪律性的人日益多了。

但是,我已说过,过去的一年不仅是和平建设的一年,而且是进行卫国战争反对卑鄙无耻、背信弃义地进攻爱好和平的我国的德国侵略者的一年。

2. 苏德战场上的军事行动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领导机关的军事活动表现在保障红军对德国法西斯军队实施进攻战役和防御战役。在过去的一年里,

苏德战场上的军事行动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是冬季时期，红军在打退德军向莫斯科的冲击后，取得了主动权，转入了进攻，驱逐德军，4个月内，有些地方前进了400多公里。第二个时期——夏季时期，德国法西斯军队利用欧洲没有第二战场的机会，调集了他们的一切没有动用的预备队，突破了西南方向的战线，取得了主动权，5个月内，有些地方前进了约500公里。

第一个时期的军事行动，特别是红军在罗斯托夫、图拉、卡卢加地区，在莫斯科附近，在季赫温和列宁格勒附近的胜利的行动，揭示了两个极有意义的事实。第一，这些军事行动表明了，红军及其战斗干部已经成长为一支强大的力量，不仅能够抵御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攻势，而且能够在野战中粉碎他们，迫使他们后退。第二，这些军事行动表明了，德国法西斯军队尽管非常顽强，但是有着严重的本质上的弱点，这些弱点在对红军有利的某些条件下，会促使德军失败。德军以凯旋式的步伐踏遍了整个欧洲，一举击败了被认为精锐之师的法国军队，只是在我国才遇到了真正的军事抵抗，不仅遇到抵抗，而且在红军打击之下，不得不放弃已经占领的阵地，后退400多公里，在退却途中丢弃了大量的火炮、汽车和弹药，这个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单用冬季的作战条件，决不能解释这个事实。

苏德战场军事行动的第二个时期显出有利于德国人的转变，主动权转到了德国人手里，德国军队在西南方向突破我军战线，进抵沃罗涅日、斯大林格勒、新罗西斯克、皮亚季戈尔斯克、莫兹多克地区。德国人和他们的盟国利用欧洲没有第二战场的机会，把自己的一切没有动用的预备队都投入战场，并且把它集中于一个方向，即西南方向，在这里造成了巨大的兵力优势，获得了重大的战

术胜利。

看来,德国人已经不那么强有力了,不能象去年夏季进攻的头几个月那样,朝南、北、中三个方向同时展开进攻了,但是他们还有足够的力量在某一个方向组织重大的进攻。

德国法西斯战略家在我国战场上发动夏季攻势,主要目的是什么呢?照外国报纸包括德国报纸的反应来看,可能认为,进攻的主要目的是占领格罗兹尼和巴库的石油区。但是事实完全推翻了这种假设。事实告诉我们,德国人向苏联的石油区方面挺进,并不是主要目的,而是次要目的。

既然如此,那么德国人进攻的主要目的究竟何在呢?主要目的是,从东面迂回莫斯科,切断莫斯科同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后方的联系,然后攻击莫斯科。德国人向南方、向石油区方面挺进的次要目的,不仅是占领石油区,而且与其说是占领石油区,不如说是把我们的主要预备队吸引到南方,削弱莫斯科战线,以便在攻击莫斯科时易于取胜。德军的主要集团现在不在南方,而在奥廖尔和斯大林格勒一带,就是由于这个缘故。

不久以前,德国总参谋部的一个军官落到了我们手里。在这个军官身上搜到了一幅地图,上面标明了德军进攻的时间表。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德国人打算在今年7月10日占领博里索格列布斯克,7月25日占领斯大林格勒,8月10日占领萨拉托夫,8月15日占领古比雪夫,9月10日占领阿尔扎马斯,9月25日占领巴库。

这个文件完全证实了我们的情报:德国人发动夏季攻势的主要目的是从东面迂回莫斯科和攻击莫斯科;而向南挺进的目的,除了其他的一切以外,就是把我们的预备队远远地引离莫斯科,削弱

莫斯科战线,以便易于攻击莫斯科。

简单说来,德国人发动夏季攻势的主要目的,就是包围莫斯科,在今年结束战争。

去年11月,德国人打算以正面突击拿下莫斯科,迫使红军投降,从而结束东方的战争。他们曾经向自己的士兵灌输过这种幻想。但是,大家知道,德国人的这种打算落空了。德国人去年在对莫斯科的正面突击中碰了钉子以后,想在今年通过迂回运动拿下莫斯科,以此结束东方的战争。他们现在正在向自己的被愚弄的士兵灌输这种幻想。大家知道,德国人的这种打算也落空了。德国法西斯战略家原想一箭双雕,既夺得石油,又包围莫斯科,结果却使自己陷于困境。

因此,德国人夏季攻势的战术胜利,由于他们的战略计划显然不现实,而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3. 关于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

德国人在今年仍然能够把军事行动的主动权抓在自己手中,并且在我国战场上获得了重大的战术胜利,其原因何在呢?

这是因为德国人及其盟国调集了自己的一切没有动用的预备队,把它投入东方战场,并在其中一个方向上造成巨大的兵力优势。毫无疑问,没有这些措施,德国人不可能在我国战场上获得胜利。

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调集自己的一切预备队,并把它投入东方战场呢?因为欧洲没有第二战场,所以他们有可能不冒任何风险地采取这种行动。

这就是说，德国人今年在我国战场上获得战术胜利的主要原因是，欧洲没有第二战场，使他们有可能把一切没有动用的预备队投入我国战场，并且在西南方向上造成巨大的兵力优势。

假定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欧洲有第二战场，而且第二战场牵制住譬如说 60 个德国师和 20 个德国盟国师，那德军在我国战场上的处境会怎样呢？不难猜想，他们的处境会是悲惨的。不仅如此，那会是德国法西斯军队末日的开始，因为在那种情形下，红军就不会在现在所在的地方，而会在普斯科夫、明斯克、日托米尔、敖德萨附近一带。这就是说，德国法西斯军队在今年夏天就已经面临崩溃了。而所以没有这样，是因为欧洲没有第二战场这一点挽救了德国人。

让我们从历史上来考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曾不得不在两个战场上作战，在西方战场上主要对英国和法国，在东方战场上对俄军。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存在反对德国的第二战场。在当时德国拥有的 220 个师中，摆在俄国战场上的不超过 85 个德国师。如果加上用在俄国战场上的德国盟国的军队，即 37 个奥匈师、2 个保加利亚师和 3 个土耳其师，那么对付俄军的军队总共为 127 个师。德国及其盟国的其余的师，主要是用在对付英法军队的战场上，其中一部分担任欧洲被占领区的守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形就是如此。

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例如今年 9 月的情形怎样呢？

根据确实可靠的情报，在德国现在拥有的 256 个师中，摆在我国战场上的不下 179 个德国师。如果加上 22 个罗马尼亚师、14 个芬兰师、10 个意大利师、13 个匈牙利师、1 个斯洛伐克师和 1 个

西班牙师，那么现在用在我国战场上的军队总共为 240 个师。德国人及其盟国的其余的师担任被占领国（法国、比利时、挪威、荷兰、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守备，它们中的一部分在利比亚同英国进行争夺埃及的战争，而利比亚战场总共只牵制了 4 个德国师和 11 个意大利师。

因而，现在对付我国战场的师不下于 240 个，而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 127 个，现在对红军作战的德国师是 179 个，而不是 85 个。

这就是德国法西斯军队今年夏季在我国战场上获得战术胜利的主要原因和基础。

时常有人拿德国人对我国的侵犯同拿破仑对俄国的侵犯相比。但是这种比较是经不起分析的。在远征俄国的 60 万军队中，拿破仑带到博罗季诺的不过 13—14 万。这就是他在莫斯科附近时所能运用的全部军队。而现在我们红军面对的却是 300 多万用现代战争的一切手段武装起来的军队。这怎能相比呢？

有时也有人拿德国人对我国的侵犯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对俄国的进攻相比。但是，这种比较也是经不起分析的。第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有欧洲第二战场，使德国人的处境非常困难，而在这次战争中却没有欧洲第二战场。第二，在这次战争中，对付我国战场的军队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多一倍。很明显，这种比较是不恰当的。

现在你们可以想象得到，摆在红军面前的困难该是多么严重，多么罕见，而红军在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解放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又是多么伟大。

我想，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都不可能经受住德

国法西斯强盗及其盟国这伙野兽般的匪帮的这种猛烈攻势。只有我们苏维埃国家，只有我们红军才能经受住这种猛烈攻势。不仅经受住，而且粉碎它。

常有人问，欧洲第二战场究竟是否会开辟。是的，会开辟，早一些或者迟一些，但是会开辟。所以会开辟，不仅因为我们需要它，而且首先因为我们的盟国对它的需要并不亚于我们。我们的盟国不可能不了解，在法国失败以后，没有反对法西斯德国的第二战场，会使一切爱好自由的国家，包括各盟国自己在内，都遭到不好的结局。

4. 苏联、英国和美国反对希特勒德国 及其欧洲盟国的战斗联盟

现在已经可以认为不容争辩的是，在希特勒德国强加于各国人民的战争的过程中，发生了力量的根本划分，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意德同盟和英苏美同盟。

同样不容争辩的是，这两个对立的同盟遵循着两个不同的对立的行动纲领。

意德同盟的行动纲领，可以由下列几点来说明：种族仇恨；“优等”民族的统治；征服其他民族并侵占它们的领土；经济上奴役被征服民族并掠夺它们的国民财富；消灭民主自由；普遍建立希特勒制度。

英苏美同盟的行动纲领是：消灭种族的特权；各民族平等和它们的领土不可侵犯；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和恢复其自主权；每一民族有权按自己意志来处理事务；经济上援助遭难的民族，协助它们真

正达到物质上的优裕；恢复民主自由；消灭希特勒制度。

意德同盟的行动纲领使得欧洲的一切被占领国——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希腊以及苏联的被占领区——燃起了仇恨意德暴政的怒火，极力使德国人及其同盟者遭受损失，并且等待适当的机会为它们现在所受的侮辱和蹂躏向奴役它们的人报仇雪耻。

因此，目前的一个特点是，意德同盟日益孤立，它在欧洲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后备力量日益枯竭，它本身日益削弱和瓦解。

英苏美同盟的行动纲领使得欧洲的一切被占领国完全同情这个同盟的成员国，并决心尽力给它们以各种援助。

因此，目前的另一个特点是，这个同盟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后备力量在欧洲，而且不仅在欧洲，日益增长，并且在这个同盟的周围有着愈来愈多的千百万同情者，决心同它一起反对希特勒暴政。

如果从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观点来考察这两个同盟的力量对比问题，那么不能不得出结论说，在这方面我们英苏美同盟无疑占着优势。

但是有一个问题：单靠这种优势是否足以获得胜利呢？常有这样的情形，资源很多，但是使用得极不得当，使优势等于零。很明显，除了资源以外，还必须善于动员这些资源的能力和正确运用这些资源的本领。是否有根据怀疑英苏美同盟中人们具有这样的本领和这样的能力呢？有人怀疑这一点。但是他们根据什么怀疑呢？这个同盟中的人，在动员本国资源和正确地把它用于经济和文化政治建设方面，曾经显示了本领和能力。试问有什么根据怀疑这些在动员和分配资源用于经济和文化政治建设方面曾显

示了能力和本领的人，现在就没有能力为实现军事目的而进行同样的工作呢？我想这是没有根据的。

有人说，英苏美同盟有一切可能获得胜利，而且肯定会胜利，要是它没有那个能够削弱和腐蚀它的本质上的弱点的话。按照这些人的意见，这个弱点表现在这个同盟是由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不同的成分所组成，这种情况使他们不可能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否认参加英苏美同盟的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和社会制度上的差别，那是可笑的。但是，这是否就排斥这个同盟的成员国为了反对使它们受奴役威胁的共同敌人而采取共同行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呢？绝对不排斥。况且，已经造成的威胁，无条件地要求同盟的各成员国必须采取共同行动，以拯救人类免于倒退到野蛮时代和残暴的中世纪时代。难道英苏美同盟的行动纲领，还不足以在这个基础上来组织共同斗争反对希特勒暴政，并取得对它的胜利吗？我认为是完全够的。

这些人的假设所以不正确，还因为它已被过去一年的事件完全推翻。事实上，如果这些人的意见是正确的话，那我们就会看到英苏美同盟的成员彼此日益疏远的事实。然而我们不仅没有看到这样的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却看到说明英苏美同盟的成员日益接近和结成为统一的战斗联盟的事实和事件。过去一年的事件直接证明了这一点。在1941年7月，德国进攻苏联几星期后，英国同我国订立了《关于共同对德作战》的协定。那时我们同美国还没有就这一点订立任何协定。过了10个月以后，1942年5月26日，莫洛托夫同志访问英国时，英国同我们订立了《关于在反希特

勒德国及其欧洲帮凶的战争中结成联盟和战后实行合作互助条约》。这个条约的有效期为 20 年。它标志着我国和英国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在 1942 年 6 月,莫洛托夫同志访问美国时,美国同我们签订了《关于在反侵略战争中实行互助原则的协定》,这个协定使苏美关系有了一个重大的进步。最后应当指出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英国首相邱吉尔先生访问莫斯科,确立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完全的互相谅解。毫无疑问,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苏联、英国和美国日益接近,并结成为反对意德同盟的战斗联盟。

由此可见,事物的逻辑比任何别的逻辑都更加有力。

结论只有一个:英苏美同盟有战胜意德同盟的一切可能,并且毫无疑问一定会取得胜利。

5. 我们的任务

战争撕破了一切帷幕,暴露出了一切关系。情况如此明显,以致在这次战争中要确定我们的任务是再容易不过了。

吃人的希特勒在同土耳其埃尔基勒特将军的谈话(这次谈话发表在土耳其《共和国报》上)中说道:“我们要消灭俄国,使它永远不能再站起来。”看来,很明确,虽然有点蠢笨。我们没有这种消灭德国的任务,因为不可能消灭德国,就象不可能消灭俄国一样。但是,消灭希特勒的国家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应当的。

我们第一个任务,正是要消灭希特勒国家及其鼓舞者。

吃人的希特勒在同这位将军的同一次谈话中继续说道:“我们要把战争一直进行到俄国不存在有组织的军事力量为止。”看来,很明确,虽然无知。我们没有这种消灭德国一切有组织的军事力

量的任务，因为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都懂得，这不仅对德国来说，也和对俄国来说一样，是不可能的，而且从胜利者的观点看来也是不适宜的。但是消灭希特勒的军队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应当的。

我们的第二个任务，正是要消灭希特勒的军队及其领导者。

希特勒恶棍把残酷地折磨苏联战俘、成百地屠杀苏联战俘、成千地饿死苏联战俘当作常规。他们蹂躏和屠杀我国被占领地区的老百姓：男女老幼，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抱定目的，要奴役或消灭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摩尔达维亚、克里木和高加索的居民。只有那些丧尽天良、行同禽兽的下流败类，才会对手无寸铁的无辜的人犯下如此的暴行。但是这还不是全部。他们在欧洲遍设绞架和集中营。他们实行了卑鄙的“人质制度”。他们常因有人妨碍某个德国畜生强奸妇女或抢劫百姓，而把抓来“做人质”的无辜百姓滥肆枪杀和绞死。他们把欧洲变成了各国人民的监狱。而他们竟把这称为“欧洲新秩序”。我们知道这些暴行的凶犯，“欧洲新秩序”的建设者，所有这些新上任的总督、省长、警备司令和副司令是些什么人。成千上万的受害者都知道他们的名字。让这些刽子手知道，他们逃不脱对自己罪行所应负的责任，逃不出受害的各国人民的惩罚的手心。

我们的第三个任务，是要消灭这种可恨的“欧洲新秩序”，并严惩其建设者。

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些。

同志们！我们正在进行伟大的解放战争。我们不是孤军作战，而是同我们的盟国共同进行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正在使我们获得对人类的卑鄙的敌人——德国法西斯帝国主义者的胜利。在这场战争的旗帜上写着：

英苏美战斗联盟的胜利万岁!

欧洲各国人民从希特勒暴政下获得解放万岁!

我们光荣的苏维埃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万岁!

消灭万恶的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军队和他们的“欧洲新秩序”!

光荣属于我们的红军!

光荣属于我们的海军!

光荣属于我们的男女游击队员!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61—71页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 345 号。1942 年 11 月 7 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苏联劳动者们！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二十五周年。

25 年前，工人和农民在布尔什维克党和伟大列宁的领导下，在我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此期间，苏联各族人民走过了光荣的道路。在这 25 年中，我们祖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具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和集体农业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各族人民争得了自由和独立，团结在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大家庭里。苏联人摆脱了各种压迫，并以顽强的劳动保证自己过上了富裕和文明的生活。

今天，我国各族人民，在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及其欧洲帮凶进行最激烈的残酷斗争的情况下，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五周年。

在今年年初的冬季，红军曾给德国法西斯军队严重的打击。红军在打退德国人向莫斯科的冲击后争得了主动权，转入了进攻，迫使德军西退，从德国人的奴役下解放了我国的许多州。于是，红军表明了，在某些有利条件下，它是能够战胜德国法西斯军队的。

但是到夏季，前线的情况恶化了。德国人及其盟国利用欧洲

没有第二战场的机会,调集了自己的全部预备队,把它投到我们乌克兰战线上来,并突破了这条战线。在南方,德国法西斯军队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向前推进了,使斯大林格勒、黑海沿岸、格罗兹尼和外高加索接近地受到了威胁。

诚然,红军的不屈不挠和勇敢精神,打破了德国人从东面迂回莫斯科、从后方对我国首都实施突击的计划。敌人被阻止在斯大林格勒附近。但是,敌人虽然被阻止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并在那里葬送了几万官兵,他们仍然在作最后挣扎,把许多新的师投入战斗。苏德战场上的斗争日益紧张起来。苏维埃国家的命运,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都取决于这场斗争的结局。

我们苏联人民光荣地经受住了对他们的考验,对胜利充满了毫不动摇的信心。战争是对苏维埃制度的力量和稳固性的严酷检验。德帝国主义者指望苏维埃国家崩溃的打算完全破产了。社会主义工业、集体农庄制度、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和苏维埃国家,显示了自己的稳固和牢不可破。我国的工人、农民和全体知识分子,我国整个后方,都在为满足我们前线的需要而忠诚地忘我地工作。

红军担负着抗击希特勒德国及其帮凶的战争的全部重担。它以奋不顾身地抗击法西斯军队的斗争业绩赢得了世界上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的爱戴和敬仰。从前没有足够作战经验的红军战士和指挥员,学会了准确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粉碎敌人的阴谋,不屈不挠地保卫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不受外国奴役者侵犯。莫斯科和图拉、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英勇保卫者,在无比勇敢、遵守铁的纪律、不屈不挠和善于战胜敌人方面,作出了榜样。我们全体红军都在向这些英

雄看齐。敌人已经亲身领略了红军的抵抗能力。他还将领略到红军的毁灭性的打击力量。

毫无疑问,德国侵略者还会进行新的冒险。但是,敌人的兵力已经消耗到了极点。战争开始以来,红军已歼灭了敌人官兵 800 多万。现在掺杂有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和芬兰人的希特勒军队,已比 1941 年夏秋间弱得多了。

红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

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肃清苏联国土上的希特勒侵略者,要靠你们的顽强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要靠你们作战的本领和履行自己对祖国职责的决心!

我们能够并且应当肃清苏联国土上的希特勒妖孽。

为此必须:

(1)坚决顽强地守住我们的战线,不让敌人再前进一步,用一切力量消耗敌人,歼灭其有生力量,消灭其技术装备;

(2)全力巩固我军的铁的纪律、最严格的秩序和一长制,提高军队的战斗素养,准备并坚定不移地准备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

(3)在敌后燃起全民游击运动的烽火,破坏敌人的后勤机关,歼灭德国法西斯恶棍。

同志们!

敌人已经在罗斯托夫附近,莫斯科附近和季赫温附近领略过红军的打击力量。敌人领略红军新的打击力量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们胜利的节日就要到来了!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五周年万岁!

我们的红军万岁!

我们的海军万岁!

我们光荣的男女游击队员万岁！
消灭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国防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78—81页

*给朱可夫的电报

康斯坦丁诺夫^①同志：

如果叶廖缅科和瓦图京那里的战役航空兵准备不能令人满意，那么战役就会以失败告终。对德作战的经验表明，只有掌握制空权，才可能取得对德军的战役胜利。因此，我航空兵应完成三项任务：

第一，集中我航空兵的行动于我突击部队进攻的地域之内，压制德军航空兵并可靠地掩护我方部队。

第二，不断轰炸进攻部队当面的德军，为我进攻部队开辟道路。

第三，以不断轰炸和强击的方法，追击退却的敌军，彻底打乱敌军并使其不能在最近的防御地区巩固下来。

如果诺维科夫认为我航空兵目前还不能完成这些任务，那就最好将战役推迟一些时间，以积蓄更多的航空兵力量。

请与诺维科夫和沃罗热伊金谈谈，向他们说明此事，并把你的意见概括地告我。

瓦西里耶夫^②

1942年11月12日4时

译自格·康·朱可夫《回忆与思考》
1974年增订第2版第109—110页

① 康斯坦丁诺夫是格·康·朱可夫的化名。——编者注

② 瓦西里耶夫是斯大林的化名。——编者注

答美联社记者问

卡西迪先生：

对您 11 月 12 日寄来的问题，回答如下：

1. “苏联方面怎样评价盟国在非洲的军事行动？”

答：苏联方面认为这次军事行动是有重大意义的卓越事实，它表明盟国武装力量的实力正在增长，并展示了意德同盟不久将崩溃的前景。

非洲的军事行动又一次地驳斥了那些断言英美领导者没有能力组织重大的军事行动的怀疑论者。毫无疑问，只有第一流的组织家才能完成这样重大的战役：经过大洋在北非顺利登陆，迅速占领卡萨布兰卡到布日伊一带港口和广阔地区，巧妙地粉碎西部沙漠上的意德军队。

2. “这次军事行动在减轻对苏联的压力方面有多大的效果以及苏联期待什么样的进一步的援助？”

答：现在来谈这次军事行动在减轻对苏联的直接压力方面有多大效果，为时还早。但可以有把握地说，效果将是不小的，并且对苏联的压力在最近时期会有一定的减轻。

但是，问题不仅仅在这里，问题首先在于，由于非洲的战局意味着主动权转到我们盟国手中，欧洲的军事政治状况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有利于英苏美同盟。它破坏轴心国体系中的领导力量希特

勒德国的威信，从精神上瓦解希特勒在欧洲的盟国。它使法国摆脱麻木状况振奋起来，动员法国的反希特勒力量，并为组织法国反希特勒军队提供根据地。它为打垮意大利和孤立希特勒德国创造条件。最后，它为在更靠近德国的要害地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创造前提，而这对战胜希特勒暴政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3. “为了加速取得最终的胜利，东方苏联的进攻力量同西方盟国相配合的可能性怎样？”

答：可以不用怀疑，红军会象它在整个战争进程中执行了自己的任务那样，光荣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顺致
敬意

约·斯大林

1942年11月13日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82—84页

*给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指示^①

(1942 年秋)

在实施进攻战役时，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员有时把为他们规定的分界线看作是一道不能越过的篱笆或隔墙，哪怕战事的利益和战役过程中不断变化的情况要求越过时也这样。

结果是，我们的集团军在进攻时在自己的分界线范围内径直朝前走，不顾友邻部队，不作情况要求作的机动，不相互帮助，这样就方便了敌人的机动，使他们有可能逐个地打击我们。

大本营兹说明，分界线确定的只是指挥员对他们执行战斗任务的一定地段或地带负有责任，但不能把它们视为一成不变的、各集团军不可跨越的隔墙。在战役过程中，情况常常发生变化。司令员必须迅速而正确地对这种变化作出反应，必须使自己的兵团或集团军进行机动，而不要顾虑为他规定的分界线。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在说明这一点的同时，准许并授权各方面军司令员在战役过程中酌情改变方面军所属的各集团军之间的分

① 这个指示摘自亚·米·华西列夫斯基的回忆录《毕生的事业》。该书说，指示是在准备斯大林格勒反攻时发给各方面军司令员的。因此发出日期应在1942年11月19日斯大林格勒反攻开始之前。原件见苏联国防部档案馆全宗第206号目录第294号卷宗第1号第200张。——编者注

界线,改变个别集团军的突击方向,并随后报告大本营。

各方面军司令员应立即向所有集团军司令员说明这些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

约·斯大林

亚·华西列夫斯基

译自亚·米·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
1978年第3版第545页

**致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乌克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人民委员会**

值此乌克兰苏维埃政权建立二十五周年之际,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谨向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致以兄弟的敬礼。

25年前,乌克兰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乌克兰人民的压迫者的政权,建立了真正人民的政权。乌克兰人民捍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1918年在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的兄弟般的帮助下,粉碎了德国占领者,把他们赶出了乌克兰国土。

在苏维埃政权年代,乌克兰人民过上了有文化的和富裕的生活。在乌克兰,建立了数以百计的新的工厂,数百个机器拖拉机站,数以千计的学校和医院、俱乐部和剧院。在苏维埃政权年代,乌克兰变成了拥有先进的丰产的农业的国家。乌克兰的民族文化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乌克兰的国土在历史上第一次合并为统一的乌克兰国家。

乌克兰人民的和平的建设性劳动由于德国法西斯匪帮的入侵而遭到了破坏。希特勒分子破坏了苏维埃乌克兰几十个城市和数

百个乡村,玷污和毁灭了乌克兰人民无数的民族文物,屠杀和摧残了几十万乌克兰的男人、妇女和儿童。

吃人的希特勒妄想把乌克兰变成德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奴役爱好自由的乌克兰人民和使他们德意志化。这是办不到的!乌克兰人民的忠实儿女在红军中英勇作战,在苏联后方忘我地劳动,在游击队里英勇地战斗,准备着从占领者手里完全解放祖国的土地。

乌克兰过去是、将来还是苏维埃乌克兰!西南方面军的部队已经进入他们所解放的第一批乌克兰农村。愿人民解放斗争在乌克兰、在德国强盗的后方更加巩固和扩大。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坚信,乌克兰苏维埃爱国者定将同苏联其他各族人民一道,履行自己对祖国的义务。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

歼灭德国占领者!

受苏联人民委员会、苏联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委托

约·斯大林

维·莫洛托夫

译自1942年12月25日《真理报》

*关于剧本《前线》的一个电报^①

(1942 年)

您对这个剧本的评价是不正确的。这个剧本对红军和红军的指挥人员将会起巨大的教育作用。剧本正确地指出了红军的缺点，对这些缺点闭眼不看是不正确的。应当有勇气承认缺点并采取措施消除缺点。这是改善和提高红军的唯一途径。

译自谢·马·什捷缅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1981年版第1部第123页

① 这个电报摘自谢·马·什捷缅科的回忆录《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该书说，1942年8月，当亚·叶·考涅楚克的剧本《前线》在《真理报》上连载时，有些人打电报给最高统帅部，认为这一剧本是对苏联红军的恶意攻击，要求停载和禁演。这是斯大林对其中的一封电报的答复。——编者注

最高统帅给西南、南方、顿河、 北高加索、沃罗涅日、加里宁、 沃尔霍夫、列宁格勒 各方面军部队的命令

经过两个月的进攻战斗，红军在广阔的战线上突破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防御，粉碎了敌人 102 个师，俘虏了 20 多万人，缴获了 13 000 门火炮以及许多其他技术装备，前进了约 400 公里。我军获得了重大的胜利。我军的攻势在继续。

我祝贺西南、南方、顿河、北高加索、沃罗涅日、加里宁、沃尔霍夫、列宁格勒各方面军的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祝贺你们取得了在斯大林格勒附近、顿河流域、北高加索、沃罗涅日附近、大卢基地区、拉多加湖以南打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及其盟友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的胜利。

我向在斯大林格勒接近地歼灭了希特勒军队，打破了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和从德国占领者手中解放了坎捷米罗夫卡、别洛沃茨克、莫罗佐夫斯基、米列罗沃、旧别利斯克、科捷利尼科沃、济莫夫尼基、埃利斯塔、萨利斯克、莫兹多克、纳尔奇克、矿水城、皮亚季戈尔斯克、斯塔夫罗波尔、阿尔马维尔、瓦卢伊基、罗索什、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大卢基、施吕瑟尔堡、沃罗涅日以及其他许多

城市和几千个居民点的统帅部和英勇的部队,宣布嘉奖。

前进,歼灭德国占领者,把他们从我们的祖国赶出去!

最高统帅

约·斯大林

1943年1月25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85—86页

最高统帅给 顿河方面军部队的命令

顿河方面军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沃罗诺夫**炮兵元帅同志，
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上将同志：

祝贺你们和顿河方面军部队顺利地歼灭了斯大林格勒附近被
围的敌军。

向顿河方面军全体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宣布嘉奖，嘉
奖你们出色的战斗行动。

最高统帅

约·斯大林

1943年2月2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87页

最高统帅命令

(第 95 号。1943 年 2 月 23 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今天我们庆祝红军建军二十五周年。

红军建立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了。建立红军就是为了同当时力图奴役我国的外国侵略者作斗争。1918 年 2 月 23 日，红军部队在普斯科夫和纳尔瓦附近彻底粉碎了德国侵略者的军队，于是这一天就成为红军的誕生日。

红军在 1918—1921 年反对外国侵略者的顽强斗争中，捍卫了我们苏维埃祖国的荣誉、自由和独立，捍卫了我国各族人民遵照伟大列宁的教导来建立自己生活的权利。

在 20 年的时间里，红军保卫了苏联人民和平建设的劳动。我国各族人民任何时候也没有忘记过外国侵略者侵犯我国国土的阴谋，他们不倦地关心加强红军的实力，用头等的技术兵器来武装它，并精心地培养了苏联军人干部。

红军是保卫和平和各国人民友谊的军队。建立红军不是为了征服别国，而是为了保卫苏联的国界。红军向来尊重各国人民的权利和独立。

但是在 1941 年 6 月希特勒德国蛮横无耻地破坏互不侵犯条约，背信弃义地进犯我国。于是红军不得不奋起作战，捍卫自己的

祖国，反对德国侵略者，并把他们驱逐出我们国境。从那时起，红军就变成了同希特勒军队作殊死斗争的军队，变成了为我们祖国沦陷区遭受德国法西斯恶棍蹂躏和侮辱的兄弟姊妹报仇雪耻的军队。

红军是在抗击希特勒德国及其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仆从的卫国战争的决定性关头，庆祝建军二十五周年的。

红军抗击德国法西斯匪军进犯的史无前例的英勇斗争，已经有 20 个月了。由于欧洲没有第二战场，红军正单独担负着战争的全部重担。但是，红军不仅顶住了德国法西斯匪军的猛烈进攻，而且在战争进程中变成了使法西斯军队畏惧的力量。

红军在 1942 年夏秋两季的艰苦战斗中，堵截了法西斯野兽的进路。我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的英勇保卫战，不会忘记莫斯科附近和高加索山麓、勒热夫地区和列宁格勒附近的顽强战斗，不会忘记斯大林格勒城下所进行的战争史上最伟大的战役。在这些伟大的战役中，我们英勇的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红军的战旗上增添了永不磨灭的光荣，为战胜德国法西斯军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三个月以前，红军部队在斯大林格勒接近地开始了进攻。从此以后，军事行动的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而且红军进攻的速度和突击力量一直没有减弱。目前，红军在艰苦的冬季条件下，在 1500 公里宽的战线上展开进攻，而且几乎到处都获得了胜利。红军在北方，在列宁格勒附近，在中部战线，在哈尔科夫的接近地上，在顿巴斯，在罗斯托夫附近，在亚速海和黑海沿岸，正接连不断地打击希特勒军队。三个月以来，红军从敌人手中解放了沃罗涅日州和斯大林格勒州，解放了切奇尼亚-印古什、北奥塞梯、卡巴尔达-

巴尔卡尔和卡尔梅克等自治共和国，解放了斯塔夫罗波尔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解放了切尔克斯克、卡拉恰耶夫和阿迪格等自治州，几乎全部解放了罗斯托夫州、哈尔科夫州和库尔斯克州。

敌人已开始被大批地驱逐出苏联国境。

这三个月以来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德国人的这些严重失利从何产生的呢？这些失利的原因何在呢？

苏德战场上的力量对比改变了。法西斯德国日益耗尽自己的力量而变得更加虚弱，苏联却日益发挥出自己的潜力而变得更加强大了。时间对法西斯德国是不利的。

迫使欧洲军事工业为自己生产的希特勒德国，在技术装备方面，首先在坦克和飞机方面，就在不久以前还是胜过苏联的。这就是它曾有过的优势。可是经过 20 个月的战争，情况已经改变了。由于苏联军事工业中男女工人、工程师和技术员的忘我劳动，在战争期间，坦克、飞机、火炮的生产增长了。就在这个期间，敌人在苏德战场上，在技术兵器方面，特别是在坦克、飞机和火炮方面，遭受了巨大损失。仅仅在 1942—1943 年冬季红军进攻的三个月中，德国人就损失了 7 000 多辆坦克、4 000 多架飞机、17 000 多门火炮以及其他许多武器。

当然，德国人在极力设法弥补这些损失，但这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的，因为敌人要弥补技术装备上的这些巨大损失，就需要不少的时间。而时间是不等人的。

希特勒德国在发动侵苏战争的时候，拥有在数量上超过红军并且已经作好动员和战斗准备的军队。这就是它曾有过的优势。但是经过 20 个月，这方面的情况也改变了。在战争期间，红军在防御和进攻战斗中歼灭了将近 900 万德国法西斯的官兵，其中战

场上被击毙的不下 400 万。被希特勒投到苏德战场上来的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军队全部被粉碎了。仅仅在最近 3 个月内，红军就消灭了敌军 112 个师，其中被击毙的有 70 多万人，被俘的有 30 多万人。

当然，德军统帅部要采取一切办法来弥补这种巨大的损失。但是，第一，德军的弱点就是人员后备不足，因此不知道他们将依靠哪个来源来弥补这种损失。第二，即使德国人用尽一切办法拼凑了必需数量的人员，但是要把他们集中起来加以训练，还需要不少的时间，而时间是不等人的。

希特勒军队在发动侵苏战争的时候，已拥有使用最新武器在欧洲大规模作战将近两年的经验。红军在战争的第一个时期，自然，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作战经验。这就是德国法西斯军队曾有过的优势。但是，经过 20 个月，这方面的情况也改变了。红军在战争进程中已变成了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军队。它已学会了按照现代军事科学的要求，估计敌人的强弱方面，准确地打击敌人。几十万几百万的红军战士已成了熟悉手中武器的能手，即成了熟悉步枪、马刀、机枪、火炮、迫击炮、坦克、工兵作业和飞机的能手。数以万计的红军指挥员已成了统率军队的能手。他们已学会了将个人勇敢无畏的精神同善于在战场上领导军队的才能结合起来，抛弃了愚蠢的和有害的线式战术，牢牢地掌握了机动战术。

红军统帅部不只是从敌人手中解放苏联国土，而且通过实施堪称军事学术典范的围歼敌军的重大战役而不让敌人活着逃出我们的国土。这种事实，不能认为是偶然的。毫无疑问，这是我们的指挥员成熟的标志。

毋庸置疑，只有红军统帅部的正确战略和我们的指挥员—执

行者的灵活战术，才能够创造出如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围歼德国 33 万庞大精锐军队这样卓绝的业绩。

德国人在这方面却远不是万事大吉的。他们的战略是有缺陷的，因为它照例是把敌人的力量和潜力估计过低，而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他们的战术是呆板的，因为它极力想让战场上的情况去适应条令的条文。当情况允许实行条令的要求时，德国人的行动是整齐而准确的。这是他们的长处。当情况复杂起来并开始“不符合”条令的条文，而需要在条令没有规定的情况下独立地定下决心时，德国人就束手无策了。这就是他们的根本弱点。

最近三个月以来，决定德军失败和红军胜利的原因，就是如此。

但是，不应该由此就得出结论说，希特勒军队已经不足为患，红军只要把它追击到我国西部边界就完事了。这样想就是沉溺于愚蠢而有害的自欺自慰。这样想就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而陷入冒险主义。敌人遭受失败，可是还没有被彻底打败。德国法西斯军队由于受到红军的打击正处在危机中，然而，这并不是说，它就不能恢复元气了。同德国侵略者的斗争还没有完结。这个斗争才刚刚扩展和炽烈起来。如果以为不经过战斗德国人就会哪怕是退出我们的国土一公里，那也是愚蠢的。

红军面临着反对阴险残暴而且暂时还强大的敌人的严酷斗争。这场斗争要求时间，要求牺牲，要求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和动员我们的一切能力。我们已开始从德国人压迫下解放苏维埃乌克兰，可是，还有成百万的乌克兰人在德国奴役者的压迫下受苦受难。在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摩尔达维亚、克里木、卡累利阿，德国占领者及其奴仆暂时还在那里横行无忌。敌人

的军队已受到了强大的打击,可是敌人还没有被彻底打败。德国侵略者正在疯狂抵抗,进行反扑,企图守住防线,并可能进行新的冒险。因此在我们队伍中,不应该有泰然自若、疏忽大意、骄傲自大的情绪。

全苏联人民都为红军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但是红军的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必须牢牢记住我们导师列宁的遗训:“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

为了从万恶的敌人手中解放我们的祖国,为了最终战胜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我命令:

1. 在全体红军和海军中不断提高战斗技能,加强纪律、秩序和组织性。

2. 加强对敌军的打击,不停地勇猛地追击敌人,不让敌人在防御地区进行巩固,白天黑夜都不给敌人休息,切断敌交通线,合围敌军,如果他们不缴械投降就歼灭他们。

3. 更广泛地燃起敌后游击战争的烽火,破坏敌交通线,炸毁铁路桥梁,破坏敌军队调动,破坏敌武器和弹药的运送,炸毁和焚烧敌军用仓库,袭击敌守备部队,不让溃退之敌烧毁我们的乡村和城市,用全部人力和物力帮助进攻的红军。

这就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红军建军二十五周年。

我们伟大的祖国万岁!

我们光荣的红军、我们英勇的海军、我们勇敢的男女游击队员
万岁!

红军胜利的鼓舞者和组织者——布尔什维克党万岁!

消灭德国侵略者!

最高统帅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88—96页

最高统帅命令

（第 195 号。1943 年 5 月 1 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男女工人、男女农民、智力劳动者同志们！暂时处在德国压迫者铁蹄下的兄弟姐妹们！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五一”节！

我国人民是在卫国战争的严酷日子里庆祝“五一”节的。他们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红军，他们的期望并没有错。苏联军人挺身而出，保卫祖国，捍卫苏联人民的荣誉和独立，已近两年了。

在 1942—1943 年的冬季战局中，红军使希特勒军队遭受了惨重的失败，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围歼了敌人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两个集团军，俘虏了敌人官兵 30 多万，从德国人的枷锁下解放了苏联几百个城市和几千个村庄。

冬季战局表明，红军的进攻力量增强了。我军不仅把德国人从他们在 1942 年夏季占领的领土上赶了出去，而且还收复了许多已被敌人占领约一年半之久的城市和地区。德国人已经没有力量阻止红军的进攻了。

希特勒统帅部甚至为了在哈尔科夫地域一个狭窄的地段上反攻，都不得不从西欧调来 30 多个新的师。德国人打算在哈尔科夫

地域合围苏军,并给我军布置一个“德国人的斯大林格勒”。但是,希特勒统帅部想为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进行报复的企图破产了。

同时,我们盟国战无不胜的军队在利比亚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域击溃了意德军队,肃清了这些地域的敌人,现在又在突尼斯地域继续打击敌人,而英勇的英美空军正在对德意军事工业中心进行毁灭性的打击,这是开辟反对意德法西斯分子的欧洲第二战场的预告。

这样,自战争以来,红军从东方对敌人的打击与我们盟军从西方对敌人的打击,第一次汇合成为一个总的统一的打击。

所有这一切就从根本上震撼了希特勒的军事机器,改变了世界大战的进程,并创造了战胜希特勒德国的必要前提。

结果,敌人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处境严重恶化,开始叫喊军事危机。诚然,敌人竭力用“总”动员的喧嚣来掩盖自己的危局。可是,任何喧嚣也不能抹煞法西斯阵营确实遭受严重危机的事实。

法西斯阵营的危机首先表现在敌人不得不公开放弃自己原来的闪击战方针。现在,在敌人阵营中谈论闪击战已经不时髦了,喧嚣一时的闪击战的侈谈已为持久战不可避免这种沮丧号泣所代替。德国法西斯统帅部以前大吹特吹其闪击战术,现在却抛弃了这个战术,德国法西斯分子现在所吹嘘的已经不是他们进行了或准备进行闪击,而是他们如何巧妙地逃出了英军在北非的围击,或苏军在杰米扬斯克地域的合围。法西斯报刊现在登满了夸张的消息,报道德军怎样从前线逃走,怎样避免在东方战场或突尼斯战场某一地段陷入新的斯大林格勒。看来,希特勒的战略家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拿来夸口了。

其次,法西斯阵营的危机表现在法西斯分子开始越来越经常

地谈论和平。如果按照外国报刊的消息来判断,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德国人想在英美背弃苏联的条件下同英美媾和,或者相反,他们想在苏联背弃英美的条件下同苏联媾和。德帝国主义者本来就是彻头彻尾的背信弃义之徒,他们厚颜无耻地以己之心度盟国之腹,以为盟国中总有某一个会陷入圈套的。显然,德国人空谈和平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处境很好。法西斯分子阵营空谈和平,只能说明他们正在遭受严重的危机。可是,同这批血洗欧洲并使欧洲布满绞架的德国法西斯阵营中的帝国主义强盗能谈得上什么和平呢?只有希特勒军队被彻底歼灭和希特勒德国无条件投降,才能使欧洲获得和平,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德国法西斯分子空谈和平,岂不是因为他们感到覆灭在即了吗?

德意法西斯阵营正遭受严重的危机,濒临覆灭。

当然,这还不是说,希特勒德国的覆灭已经到来了。不是的,不能这样说。希特勒德国及其军队已被震撼了,正在遭受危机,可是他们还未被粉碎。如果认为覆灭会自行到来,那就太天真了。要使希特勒德国的覆灭成为事实,就必须使希特勒军队再遭受两三次象它在最近五六个月中从西方和东方所遭到的这样强大的打击。

因此,苏联人民及其红军,和我们的盟国及其军队一样,还面临着彻底战胜希特勒恶魔的严重和艰苦的斗争。这场斗争需要他们付出巨大的牺牲,发挥高度的坚忍精神,具有钢铁般的坚定性。他们应当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和可能来粉碎敌人,以此来开辟走向和平的道路。

同志们!苏联人民对于自己的红军表现出极大的关怀。他们决心贡献全部力量,来继续加强苏维埃国家的军事实力。苏联人民在

不到四个月当中,就为红军捐献了70多亿卢布。这再一次证明,反对德国的战争,是苏联各族人民的真正的全民战争。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勇敢顽强地忍受战争所引起的困苦,在企业 and 机关中、在运输业中、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努力地工作。可是,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战争要求红军得到更多的火炮、坦克、飞机、机枪、自动枪、迫击炮、弹药、装备和粮食。这就是说,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全体苏联知识分子都必须为前线加倍努力工作。

我们后方的全体人民和一切机关,都必须象精确的钟表一样,协调而准确地工作。我们要记住伟大列宁的遗训:**“既然战争已经不可避免,那就应该一切都为了战争,稍有松懈和干劲不足,就应该按照战时法令惩办。”**^①

红军为了报答本国人民的信任和关怀,应该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毫不留情地歼灭德国侵略者,毫不停歇地把他们赶出苏联国土。战争以来,红军已获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几十万战士已熟练地掌握了手中武器。许多指挥员已学会了在战场上巧妙地指挥军队的本领。但满足于这一点是不恰当的。战士们必须学会出色地掌握手中武器,指挥员必须成为指挥战斗的能手。但是这还不够。在军事上,特别在这种现代化战争中,不能停步不前。在军事上停步不前,就等于落伍。大家知道,落伍的人是会挨打的。因此,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要求**全体红军**不断提高自己的战斗技能,要求红军**全体**指挥员和战士研究战争经验,学会怎样打胜仗。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

①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152页。黑体是斯大林用的。——编者注

志们！

在向你们致敬和祝贺“五一”节时，

我命令：

1. 全体战士——步兵、迫击炮手、炮兵、坦克兵、飞行员、工兵、通信兵、骑兵——继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战斗技能，准确执行指挥员的命令，准确执行条令和教令的要求，严守纪律，维护组织性和秩序。

2. 各兵种的指挥员和合成军队的指挥员成为统率军队的能手，善于组织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和指挥它们作战。要研究敌情，改善军队的耳目——侦察工作，要记住，不这样做就不能准确地打击敌人。要提高军队司令部的工作素养，使红军部队和兵团的司令部成为指挥军队的模范机关。要把军队后勤机关的工作提高到现代化战争所要求的水准，要牢记，战斗行动的结局，取决于军队弹药、装备和粮食的供给是否充分和及时。

3. 全体红军巩固并发展冬季战斗的胜利，我们的土地一寸也不能让给敌人，准备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决战。在防御中，要发扬我军战士所固有的顽强坚定的精神。在进攻中，要坚决果敢，正确协同，大胆实施战场机动来围歼敌人。

4. 男女游击队员给敌人的后勤机关、交通线、军用仓库、司令部和各种企业以强有力的打击，破坏敌人的通信线路。要吸收敌占区内广大苏联人民积极参加解放斗争，从而使苏联公民免被赶到德国去当奴隶，免受希特勒野兽的屠杀。要为我们的妻儿、父母、兄弟姐妹所流的鲜血和眼泪，无情地向德国侵略者报仇。要用一切力量支援红军同卑鄙的希特勒奴役者作斗争。

同志们！

敌人已经尝到了我军歼灭性打击的力量。红军和我们盟军共同打断法西斯野兽脊骨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们光荣的祖国万岁！

我们英勇的红军万岁！

我们英勇的海军万岁！

我们勇敢的男女游击队员万岁！

消灭德国侵略者！

最高统帅 约·斯大林
苏联元帅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 97—104 页

答美国《纽约时报》和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问

帕克^①先生：

您寄来的关于波苏关系的两个问题已于5月3日收到。

现将我的答复寄上。

**1. 问：“苏联政府是否希望波兰在希特勒德国失败后成为一个
强盛独立的国家？”**

答：当然希望。

**2. 问：“在您看来，战后波兰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什
么基础上？”**

答：建立在牢固的睦邻关系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或者，如果波兰人民愿意的话，建立在共同反对苏波两国的主要敌人德国人的互助同盟的基础上。 顺致

敬意

约·斯大林

1943年5月4日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105页

^① 帕克当时是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编者注

为英美军队在北非的胜利 致邱吉尔和罗斯福的贺电

(1943年5月8日)

伦敦 邱吉尔首相

向您和英勇的英美军队祝贺比塞大和突尼斯从希特勒暴政下
获得解放的辉煌胜利。祝您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约·斯大林

华盛顿 罗斯福总统

向您和英勇的美英军队祝贺比塞大和突尼斯从希特勒暴政下
获得解放的辉煌胜利。祝您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106页

答英国路透社首席记者问

金^①先生：

您要我对有关解散共产国际的问题作一答复的请求已收到。现将我的答复寄上。

问：“英国对关于取消共产国际的决议甚有好评。苏联对这一问题及其对国际关系的未来的影响，看法如何？”

答：解散共产国际是正确的和适时的，因为这便于一切爱好自由的国家组织共同进攻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希特勒主义。

解散共产国际所以正确是因为：

（一）这揭穿了希特勒分子的谎话，说什么“莫斯科”企图干涉别国的生活，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从此以后，这种谎话就彻底破产了。

（二）这揭穿了工人运动中的共产主义敌人的诬蔑，说什么各国共产党似乎不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而是遵照外来的命令行事。从此以后，这种诬蔑也彻底破产了。

（三）这便于爱好自由国家的爱国者，把本国的一切进步势力，不分党派和宗教信仰，联合成统一的民族解放的阵营，以展开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① 金当时是英国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编者注

(四)这便于各国爱国者把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联合成统一的国际阵营,去同希特勒主义统治世界的威胁作斗争,从而为各民族将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扫清道路。

我想,所有这一切情况,将使盟国及其他联合国家的统一战线,在争取战胜希特勒暴政的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我认为,解散共产国际完全适时是因为,正是现在,当法西斯野兽作最后挣扎的时候,必须组织爱好自由国家的共同进攻,以便打死这只野兽,使各国人民摆脱法西斯的压迫。 顺致

敬意

约·斯大林

1943年5月28日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107—108页

最高统帅给罗科索夫斯基大将同志、 瓦图京大将同志、 波波夫上将同志的命令

昨天，7月23日，我军的胜利行动彻底粉碎了德军7月从奥廖尔以南地域和别尔哥罗德以北地域向库尔斯克方面的进攻。

从7月5日清晨起，德国法西斯军队以大量的坦克和步兵，在大批飞机的支援下，在奥廖尔、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两个方向上转入了进攻。

德军把集中在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两个地域的主力都投入了向我军的进攻。

现已查明，德军统帅部投入战斗的兵力，在奥廖尔、库尔斯克方向上为7个坦克师、2个摩托化师和11个步兵师，在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方向上为10个坦克师、1个摩托化师和7个步兵师。

因此，敌方参加这次进攻的总共有德军17个坦克师、3个摩托化师和18个步兵师。

德军统帅部将这些兵力集中在战线的两个狭窄的地段上，企图从北面和南面同时向库尔斯克实施向心突击，突破我军防御，围歼我配置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弧形地带上的军队。

德军这次新的进攻并没有使我军措手不及。我军不仅作好了击退德军进攻的准备，而且作好了对敌人实施强大的反突击的

准备。

敌人以有生力量和技术兵器的巨大损失为代价，才得以在奥廖尔、库尔斯克方向上楔入我军防御 9 公里，在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方向上楔入 15—35 公里。在激烈的战斗中，我军消耗和疲惫了德军的精锐师，并随即进行了坚决的反突击，不仅击退了敌人，完全恢复了 7 月 5 日以前我军的态势，而且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向奥廖尔方面前进了 15—25 公里。

这次粉碎德军进攻的战斗，显示了我军高度的战斗技能，显示了各兵种战士、指挥员（包括炮兵和迫击炮手、坦克兵和飞行员）最典范的顽强、坚韧和英勇精神。

这样，德军夏季进攻计划应该说是完全破产了。

从而所谓德军夏季进攻总是胜利，而苏军似乎不得不退却的神话也就被揭穿了。

在这次粉碎德军进攻的战斗中，战功卓著的部队有：**普霍夫**中将、**加拉宁**中将、**罗金**坦克兵中将、**罗曼年科**中将、**科尔帕克奇**中将、**契斯佳科夫**中将、**卡图科夫**坦克兵中将、**罗特米斯特罗夫**坦克兵中将、**扎多夫**中将、**舒米洛夫**中将、**克留琼金**中将所指挥的部队，以及**戈洛瓦诺夫**空军上将、**克拉索夫斯基**空军中将、**鲁登科**空军中将、**璠緬科**空军中将所指挥的航空兵团飞行员。

在 7 月 5 日至 23 日的战斗期间，敌人的损失如下：被击毙官兵 7 万多人，被毁伤坦克 2 900 辆、自行火炮 195 门、野战炮 844 门，被击毁飞机 1 392 架、汽车 5 000 多辆。

我祝贺你们和你们所指挥的部队胜利地完成了粉碎德军夏季进攻的任务。

我嘉奖你们所指挥的部队的全体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

员的出色的战斗行动。

在为我们祖国的自由和荣誉而斗争的战场上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最高统帅
苏联元帅 约·斯大林**

1943 年 7 月 24 日

译自 1943 年 7 月 25 日《真理报》

最高统帅给 波波夫上将、索科洛夫斯基上将、 罗科索夫斯基大将、瓦图京大将、 科涅夫上将的命令

今天，8月5日，布良斯克方面军部队在西方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部队两翼协助下，经过激烈战斗之后，占领了奥廖尔市。

同在今天，草原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部队打垮了敌军的抵抗，占领了别尔哥罗德市。

一个月以前，7月5日，德国人从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两地域发动了夏季进攻，企图围歼库尔斯克突出部的我军部队，占领库尔斯克。

我军在击退敌人从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方面闯入库尔斯克的一切尝试后，自己转入了进攻，并于8月5日，正好是德国人发动七月进攻的一个月以后，占领了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

从而德国人所谓的苏军似乎不能在夏季进行有效进攻的神话就被揭穿了。

为纪念这次胜利，特授予最先攻入和解放奥廖尔市的第5、129、380步兵师以“奥廖尔”师的称号，今后称它们为：第5奥廖尔步兵师、第129奥廖尔步兵师、第380奥廖尔步兵师。

特授予最先攻入和解放别尔哥罗德市的第 89 近卫师和第 305 步兵师以“别尔哥罗德”师的称号,今后称它们为:第 89 别尔哥罗德近卫步兵师、第 305 别尔哥罗德步兵师。

今天,8 月 5 日 24 时,我们祖国的首都莫斯科将以 120 门火炮齐鸣礼炮 12 响,向解放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的我军英勇部队致敬。

为表彰出色的进攻行动,向你们指挥的参加解放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战役的整个部队宣布嘉奖。

在争取我们祖国的自由的斗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消灭德国占领者!

最高统帅 约·斯大林
苏联元帅

1943 年 8 月 5 日

译自 1943 年 8 月 6 日《真理报》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 269 号。1943 年 9 月 8 日于莫斯科市)

1943 年 2 月 23 日, 第 56 近卫步兵师第 254 近卫步兵团近卫军列兵亚历山大·马特维耶维奇·**马特洛索夫**, 在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争夺切尔努什基村战斗的决定性时刻, 冲向敌人的土木发射点, 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枪眼, 牺牲自己, 从而保证了进攻分队的胜利。

1943 年 6 月 19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 追授近卫军列兵**马特洛索夫**同志以苏联英雄的称号。

马特洛索夫同志的伟大功勋应该成为全体红军军人发扬军人勇敢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榜样。

为了永远纪念苏联英雄近卫军列兵亚历山大·马特维耶维奇·**马特洛索夫**,

我命令:

1. 授予第 56 近卫步兵师第 254 近卫步兵团以“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第 254 近卫步兵团”的称号。

2. 把苏联英雄、近卫军列兵亚历山大·马特维耶维奇·**马特洛索夫**的名字永远载入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第 254 近卫团第 1 连的名册。

国防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苏 联 元 帅

译自 1943 年 9 月 11 日《真理报》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二十六周年

(1943年11月6日在莫斯科市劳动者
代表苏维埃、党组织和社会团体
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

今天苏联各族人民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六周年。

我国在卫国战争环境中庆祝自己人民革命的纪念日是第三次了。

1941年10月,我们祖国曾处在艰难的日子里。敌人逼近了首都,从陆地上包围了列宁格勒。我们的军队迫不得已曾实行退却。那时要求我军作出巨大的努力,要求人民竭尽全力,以便阻挡敌人,并在莫斯科附近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

到1942年10月的时候,我们祖国面前的危险更加增大了。当时,敌人离莫斯科不过120公里,已经突入了斯大林格勒,进到了高加索山麓。但是,就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我国军民也没有垂头丧气,而是坚韧不拔地经受了一切考验。他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力量来阻挡敌人和回击敌人。他们忠于伟大的列宁的遗训,不惜力量和生命来捍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大家知道,军队和人民所作

的努力并不是白费的。

在去年十月革命节以后不久,我军就转入了进攻,给了德军以新的强大的打击,起初是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在高加索、在顿河中游一带,后来,1943年初,是在大卢基附近、列宁格勒附近、勒热夫和维亚济马地域。从此以后,红军再没有丧失过主动权。在今年整个夏季中,红军对敌人的打击日益猛烈,它的作战艺术每个月都在提高。从那时候起,我军不断获得巨大的胜利,德军则接连遭受失败。不管敌人怎样费尽心机,它在苏德战场上仍然没有取得任何稍许重大的胜利。

1. 战争进程中根本转折的一年

过去的一年——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至二十六周年——是卫国战争转折的一年。

这一年所以是转折的一年,首先因为这一年红军从战争以来第一次对德军实现了夏季大进攻,并且德国法西斯军队在我军打击下,不得不慌忙放弃其占领的地区,时常靠逃跑来避免合围,把大量的技术装备、成堆的武器和弹药以及大批受伤官兵遗弃在战场上。

因此,这一年下半年我们夏季战局的胜利,是这一年年初我们冬季战局胜利的继续和完成。

现在,当红军发展冬季战局的胜利,在夏季给了德军以强大打击的时候,那种所谓红军不能在夏季实施胜利进攻的神话,可以说是被最终埋葬了。过去这一年表明了,红军在夏季也能够象在冬季一样很好地进攻。

由于进行了这些进攻战役，我军在过去这一年中，且战且进，在中部战线前进了 500 公里，在南部前进了 1 300 公里，解放了将近 10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即差不多等于被敌人暂时侵占的苏联国土的三分之二，而且把敌军从弗拉基高加索击退到了赫尔松，从埃利斯塔击退到了克里沃罗格，从斯大林格勒击退到了基辅，从沃罗涅日击退到了戈梅利，从维亚济马和勒热夫击退到了奥尔沙和维捷布斯克的接近地。

德军因为不相信自己过去在苏德战场上的胜利稳固可靠，所以长期以来预先构筑了强大的防御地带，特别是在大的江河一带。可是在今年的战斗中，无论是江河，还是强大的工事，都挽救不了德军。我军摧毁了德军的防御，而且仅仅在 1943 年夏季三个月中，就巧妙地强渡了四条很大的江河障碍，即北顿涅茨河、杰斯纳河、索日河和第聂伯河。至于德军在罗斯托夫以西米乌斯河一带和在梅利托波尔附近莫洛奇纳亚河一带的防御这一类障碍，那就更不用说了。现在红军正在第聂伯河以西胜利地打击敌军。

这一年所以是转折的一年，还因为红军在比较短的时期内打死和消灭了德国法西斯军队中许多最有经验的老干部，同时在这一年胜利的进攻战斗中锻炼和增加了自己的干部。过去一年来，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苏德战场上的战斗中，损失了 400 多万官兵，其中被打死的至少有 180 万人。此外，德军在这一年中，损失了 14 000 多架飞机、25 000 多辆坦克和不下 4 万门火炮。

现在，德国法西斯军队已经不是战争开始时那样的军队了。在战争开始时，它有足够数量的有经验的干部，而现在，德军中掺杂了许多初出茅庐的尚无经验的年轻军官。德国人急急忙忙把他们派往前线，是因为既没有必需的后备军官，又没有时间训练他们。

红军现在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形。它的干部成长起来了，并在过去这一年的胜利的进攻战斗中锻炼出来了。它的战斗干部的数量，正在增长，而且会继续增长，因为它有必需的后备军官，使它有时间和可能来训练年轻的军官干部，并把他们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来。

很值得注意的是，去年我军当面之敌 240 个师中有 179 个是德国师，而今年红军当面之敌 257 个师中有 207 个是德国师。德国人大概是打算用增加自己师的数量来补偿其质量的降低。但是，德国人在过去这一年来的失败表明，师的质量变坏，是不能用增加其数量来补偿的。

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斯大林格勒会战和库尔斯克会战这两个极重要的事变已预先决定了今年年底以前德军在我国战场上的失败。

斯大林格勒会战的结果，合围和消灭了 30 万德军，俘虏了将近三分之一的被围敌军。要想了解斯大林格勒战场上这次空前大激战的规模，就必须知道，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竟收殓和埋葬了 147 200 名战死的德军官兵和 46 700 名阵亡的苏军官兵。斯大林格勒是德国法西斯军队覆灭的起点。大家知道，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大激战以后已经不能恢复元气了。

至于说到库尔斯克会战，其结果是德国法西斯军队两个主要进攻集团被击溃，我军转入反攻，后来又发展成为红军强大的夏季进攻。库尔斯克会战是从德军南北两面进攻库尔斯克开始的。这是德军想实现其夏季大进攻并在进攻奏效时挽回自己损失的最后一次尝试。大家知道，这次进攻的结果是完全失败了。红军不只是击退了德军的进攻，而且还使自己转入了进攻，同时在夏季实施

了一系列连续的突击，把德国法西斯军队赶过了第聂伯河。

如果说斯大林格勒会战预告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覆灭，那么，库尔斯克会战就把它推到了覆灭的边缘。

最后，这一年所以是转折的一年，因为红军的胜利进攻使得法西斯德国的经济和军事政治状况根本恶化，使它面临极深刻的危机。

德国人曾打算实现今年夏季在苏德战场上的有效进攻，来捞回自己的损失和提高自己在欧洲已经动摇的威信。但是红军推翻了德国人的这种算盘，打退了他们的进攻，自己转入了进攻，迫使德军西退，从而使德军威信扫地。

德国人曾打算采取持久战的方针，开始构筑防线和“壁垒”，同时大肆宣传，说他们的新阵地是牢不可破的。但是，在这里红军也推翻了德国人的算盘，突破了他们的防线和“壁垒”，继续顺利进攻，不让他们有时间来拖延战争。

德国人曾打算用“总”动员来扭转前线状况。但是事变在这里也推翻了德国人的算盘。夏季战局已经消耗了“总”动员的三分之二的兵力，但并没有看到，这使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状况有什么改善。也许，还要宣布一次“总”动员。可是没有根据设想，重复这类办法就会使某个国家不走向“总”崩溃。

德国人曾打算紧紧抓住乌克兰，想用乌克兰的农产品来供给自己的军队和居民，用顿巴斯的煤来供给为德军服务的工厂和铁路运输。但是，在这里他们也失算了。由于红军的顺利进攻，德国人不只是失掉了顿巴斯的煤矿，而且还失掉了乌克兰产粮最多的州，并且没有根据设想，他们在最近时期不会失掉乌克兰的其余部分。

很明显,这一切失算,不能不使法西斯德国的经济和军事政治状况恶化,而且的确根本恶化了。

法西斯德国正遭受深刻的危机。它已经处在覆灭的边缘。

2. 全民支援前线

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援,没有苏联人在工厂、矿山、运输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忘我劳动,红军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苏联人民在困难的战争条件下,保证自己的军队获得了一切最基本的必需品,不断改进了他们的技术兵器。在整个战争期间,敌人在武器的质量方面从来没有能够超过我军。同时,我国工业给前线生产的技术兵器的数量也愈来愈多。

过去的一年,不仅在军事行动上,而且在我们的后方工作上,也是转折的一年。在我们面前,已经没有把企业撤退到东部和使工业转入军火生产的那种任务了。现在苏联的战时经济已经安排就绪并且迅速发展着。因此人民可以集中全部力量来增产和进一步改进武器装备,尤其是坦克、飞机、火炮和自行火炮。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红军依靠全民的支援,源源不断地得到了武器装备,向敌人倾泻了千百万颗炸弹和炮弹,把成千上万的坦克和飞机投入了战斗。完全有理由说,苏联人在后方的忘我的劳动,将同红军的英勇斗争一样,作为人民在保卫祖国中的史无前例的功勋载入史册。

苏联工人在和平建设时期建立了高度发达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而在卫国战争时期又展开了紧张的、热火朝天的工作支援前线,在劳动中表现了真正的英雄气概。

大家知道,希特勒分子在反苏战争中,不仅拥有本国的非常发达的工业,而且拥有各附庸国和被占领国的相当强大的工业。然而希特勒分子还是不能保持他们在反苏战争开始时的那种技术兵器数量方面的优势。如果说敌人在坦克、飞机、迫击炮和自动枪数量方面原有的优势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说我军现在对于武器、弹药、装具等不感到严重的不足,那么,这首先应当看作是**我国工人阶级**的功劳。

苏联农民在和平建设时期,在集体农庄制度的基础上把落后的农业变成了先进的农业,而在卫国战争时期,他们对于人民的共同利益表现了农村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高度觉悟。他们以忘我的劳动支援前线,这就证明,苏联农民认为目前反对德国人的战争是自己切身的事业,是保卫自己的生命和自由的战争。

大家知道,由于大批法西斯军队的突然进犯,我国曾暂时失掉乌克兰、顿河和库班等重要农业区。然而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对于军队和国家的粮食供应,还是没有严重地中断过。当然,如果没有集体农庄制度,没有男女集体农庄庄员的忘我劳动,我们是不能解决这个极端困难的任务的。如果说在战争的第三年里,我们的军队没有感到粮食不足,如果说居民有粮食的供应,而工业有原料的供应,那么,这就是集体农庄制度的力量和生命力的表现,是**集体农民**的爱国主义的表现。

我国的运输部门,首先是铁路运输部门,以及内河运输、海上运输和汽车运输部门,在支援前线的事业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家知道,运输是前线后方之间最重要的联系手段。我们可以生产出大批武器和弹药,但是如果没有运输部门及时地送到前线,那么它们就可能成为对于前线毫无用处的东西。应当说,在把武器、弹

药、粮食、军服等等及时送上前线的工作中，运输部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尽管存在着战争时期的困难而且缺乏燃料，我们还是把一切必需品供给了前线，那么，必须承认这首先是我国**运输部门的职工**的功劳。

我国知识界在支援前线的事业中也不落后于工人阶级和农民。苏联知识分子忠诚地为我国国防事业工作，不断地改进红军的武器装备以及生产的技术和组织。他们帮助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发展工业和农业，在战争条件下把苏联科学和文化推向前进。

这是**我国知识分子**的光荣。

苏联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地奋起保卫祖国，正确地认为目前的卫国战争是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信仰的一切劳动者的共同事业。现在连希特勒的政治家们都看到，他们指望苏联各民族分裂和冲突是多么的愚蠢。**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经受了战争的一切困难和考验，在全体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巩固了。

苏联力量的源泉就在于此。

无论是在和平建设年代，或是在战争时期，苏联人民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都是列宁的党——布尔什维克党。无论过去和现在，没有哪一个党象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这样的威信。这是很自然的。我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争得了自由，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在卫国战争时期，党又是我们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全民斗争的鼓舞者和组织者。党的组织工作把苏联人的一切努力联合在一起，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使我们的一切人力和物力都服从于粉碎敌人的事业。在战争时期，党同人民更加亲密了，党同广大劳动群众的联系更加紧

密了。

我国力量的源泉就在于此。

目前的战争完全证实了列宁的著名指示：战争是对每个民族的全部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全面考验。战争历史教导说，只有那些在经济的发展和组织方面，在本国军队的经验、技能和士气方面，在整个战争期间人民的坚定和团结一致方面都胜过敌人的国家，才能经受得住这种考验。我们的国家正是这样的国家。

苏维埃国家从来还没有象现在，在卫国战争第三年，这样巩固和坚定。战争的教训证明，苏维埃制度不仅是和平建设年代组织国家经济文化高涨的最好形式，而且也是战争时期动员人民的全部力量回击敌人的最好形式。26年前创立的苏维埃政权，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就把我们国家变成了不可摧毁的堡垒。在世界各国的军队中，红军拥有最巩固的和最可靠的后方。

苏联力量的源泉就在于此。

毫无疑问，苏维埃国家在战争结束后将是一个强大的和更加巩固的国家。德国侵略者破坏和蹂躏我国国土，力图摧毁我们国家的实力。红军的进攻，比以前更大规模地揭露了希特勒军队野蛮的强盗本性。德国人在占领区内屠杀了我国数十万和平居民。德寇象中世纪的蛮族或阿提拉^①匈奴军一样践踏田野，焚毁城市和乡村，破坏工业企业和文化机关。德国人的暴行说明法西斯侵略者的虚弱，因为只有横行一时但却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会胜利的人，才能干出这种勾当。因此希特勒分子的处境愈是无望，他们的

① 阿提拉是公元4—5世纪侵入欧洲的匈奴人所建立的匈奴帝国的国王。在位时，占有里海至波罗的海和莱茵河间广大地区，东、西罗马帝国均被迫纳贡，曾率军转战欧洲各地，大肆焚掠杀戮。——编者注

掠夺暴行也就愈加猖狂。我国人民决不会饶恕德国恶魔的这些罪行。我们要迫使德国罪犯对于他们的全部暴行负责！

在法西斯匪徒暂时统治过的地区，我们要恢复被破坏的城市和乡村，工业、运输业、农业和文化机关，为从法西斯奴役中拯救出来的苏联人创立正常的生活条件。现在已经在全力恢复我们解放的地区内的经济和文化。但是这仅仅是开始。我们必须在从德国占领下解放的地区内彻底消除德国人蹂躏所造成的恶果。这是全体人民的重大任务。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短期内解决这个困难的任务。

3. 反希特勒同盟的加强。

法西斯同盟的瓦解

过去的一年，不仅是苏联卫国战争转折的一年，而且是整个世界大战转折的一年。

一年来在军事形势和外交形势上所发生的变化，都有利于苏联和苏联的友好盟国，而不利于德国及其在欧洲的劫掠帮凶。

红军胜利的结果和影响，远远超出了苏德战场的范围，改变了世界大战的整个进程，并且获得了巨大的国际意义。盟国战胜共同敌人的时刻临近了，而盟国间的关系及其军队的战斗合作，却与敌人的期望相反，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加强和巩固了。不久以前在报纸上发表的苏英美代表莫斯科会议的历史性决定，也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联合国家充满了决心来共同打击敌人，这将导致最终战胜敌人。

在这一年中，红军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打击，曾得到了我们的

盟国在北非、地中海区域和意大利南部的战斗行动的支援。同时盟国对德国的重要工业中心进行了并继续在继续进行大轰炸，从而大大地削弱了敌人的军事实力。如果加上盟国经常供给我们各种武器和原料这一事实，那就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一切都大大促进了我军夏季战局的胜利。当然，目前盟军在南欧的行动，还不能看作是第二战场。但是这毕竟有些类似第二战场的地方。显然，不久就会在欧洲开辟的真正的第二战场，将大大加速战胜希特勒德国和更加巩固盟国的战斗合作。

因此，过去这一年来的事变表明，反希特勒同盟是各国人民的牢固的联合体，是建立在牢固基础上的。

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挑起了这场战争的希特勒匪帮，把德国及其附庸国引到了绝境。法西斯军队在苏德战场上的失败和我们盟军给予意德军队的打击，动摇了法西斯同盟的整个大厦，它现在正在我们眼前倒塌。

意大利永远脱离了希特勒的同盟。墨索里尼丝毫也改变不了这种情势，因为在实质上他是德国人的俘虏。现在轮到同盟的其他参加者了。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希特勒的其他附庸国看见德国的军事失败也都灰心丧气，现在已经彻底丧失了战争结局会有利于它们的信心，一心想怎样逃出被希特勒拖下去的泥坑。协同希特勒德国抢劫的帮凶，不久以前还俯首听命于自己的主子，现在，到了要对抢劫负责的时候，就寻找方便的时机，偷偷离开匪帮，溜之大吉。

希特勒同盟参加者加入战争，是预计很快就会获得胜利的。他们早就安排好了：谁吃甜头，谁吃苦头。当然，他们是要叫敌人吃苦头，而自己来吃甜头的。但是现在已经十分明显，德国及其奴

仆不但吃不到甜头,而且不得不分吃苦头了。

希特勒的帮凶见势不妙,目前都在绞尽脑汁地想怎样退出战争,以便少吃点苦头。

意大利的例子向希特勒的各附庸国表明,它们同德国人的必不可免的破裂越是拖延下去,让德国人在它们国内横行得越久,它们的国家遭到的蹂躏就越大,它们的人民受苦就越多。意大利的例子还表明,希特勒德国并不想保护自己的附庸国,它只图延缓自己毁灭的时刻,而故意把它们变成毁灭性战争的疆场。

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事业已经输定了,它所建立的血腥的“新秩序”正在破产。在欧洲各被占领国中,全民反对法西斯奴役者的义愤的爆发日益增长。德国在其同盟国和中立国中原有的威望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中立国家的联系已经破裂了。

希特勒匪帮叫嚣德国人要统治全世界的那个时代早已过去。现在,大家都知道,德国人已顾不上统治全世界了,——不求发胖,只图保命。

由此可见,战争的进程证明了,法西斯国家的联盟是始终没有牢固的基础的。希特勒同盟是建立在其参加者进行侵略、抢劫这种意向的基础上的。当希特勒分子在军事上得胜的时候,法西斯同盟还似乎是一个坚固的联合体。可是法西斯军队一遭到失败,就使这个强盗同盟实际上陷于瓦解了。

希特勒德国及其附庸国正处在覆灭的前夜。

随着盟国对希特勒德国的胜利,组织和恢复欧洲各国人民的国家、经济和文化生活的重要问题将提上日程。我国政府对于这些问题的政策仍然不变。我们应当同我们的盟国共同实行:

(1)从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欧洲各国人民,并协助他们重建被法西斯奴役者所肢解的自己的民族国家,——法国、比利时、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希腊及其他处在德国枷锁下的各国人民,都应当重新成为自由和独立的人民;

(2)给欧洲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以完全的权利和自由,来自行决定他们的国家制度问题;

(3)采取措施使所有的法西斯罪犯,即挑起这场战争并使各国人民遭受灾难的罪犯,不管他们隐藏在哪一国,都要为他们的一切暴行受到严厉的惩罚和制裁;

(4)在欧洲建立一种使德国完全没有可能重新进行侵略的秩序;

(5)在互信互助的基础上建立欧洲各国人民长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合作,来恢复被德国人所破坏的经济和文化。

* * *

在过去的一年里,红军和苏联人民在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已取得了在战争中有利于我国的根本转折,而战争现在正走向最后的结局。但是苏联人不应当停留在已经取得的成就上,不应当为自己的胜利所陶醉。如果在我们队伍中出现了安然自得的情绪,胜利是可能被放走的。没有斗争和努力,就不能获得胜利。胜利要从战斗中取得。现在,胜利很近了。但是,要争得胜利,就必须更加鼓起劲头,必须使整个后方都忘我地进行工作,使前线的红军善于作战和坚决作战。如果我们不利用一切可能来加速消灭敌人,那就是对祖国、对暂时处在法西斯压制下的苏联人、对在德国人压迫下受苦受难的欧洲各国人民犯罪。决不能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因此我们应该竭尽全力来最终消灭

敌人。

苏联人民和红军对当前斗争的困难看得很清楚。但是现在已经很明显，我们胜利的时刻快到了。战争已进到了把占领者从苏联国土上完全驱逐出去和消灭法西斯“欧洲新秩序”的阶段。我们完全肃清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州的敌人，把克里木、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摩尔达维亚和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的人民，从德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同志们！

为英苏美战斗联盟的胜利而战！

为把欧洲各国人民从法西斯枷锁下解放出来而战！

为从我们国土上完全驱逐德国恶魔而战！

我们的红军万岁！

我们的海军万岁！

我们勇敢的男女游击队员万岁！

我们伟大的祖国万岁！

消灭德国侵略者！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109—127页

最高统帅命令

（第 309 号。1943 年 11 月 7 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
苏联劳动者们！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六周年。

我们是在红军对我们祖国的敌人获得光荣胜利的时候庆祝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六周年的。

我国人民进行反对德国法西斯奴役者的解放战争，已经有两年多了。一年前，我们祖国曾处在艰难的日子里。当时敌人侵占了我们大片领土。千百万苏联人遭受了德国人奴役的痛苦。敌寇企图从东面迂回莫斯科，扑向了伏尔加河，包围了通向外高加索的接近地。但是红军奋不顾身地堵截了敌人的进路。我军挡住了外国匪帮，后来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击溃了他们，迅猛地驱赶他们西退。从那时起，红军就牢牢地掌握了作战主动权。

1942—1943 年冬季，我们英勇的军队击溃了德意罗匈的精锐军队，歼灭和俘虏了敌军官兵 100 多万，解放了将近 50 万平方公里的广大领土。

1943 年夏季，红军给了敌人以新的毁灭性打击。我军在几天内就粉碎了德军的夏季进攻，从而埋葬了希特勒准备消灭红军主

力，从奥廖尔、库尔斯克方面迂回莫斯科的计划。不但如此，红军还转入了坚决的进攻，突破了敌人强大的防御地带，在三个月当中，在有些地方把敌人向西击退了 400—450 公里。在夏季战局中，我军把敌人赶出了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地区，赶出了顿巴斯、塔曼、奥廖尔州和斯摩棱斯克地区，进入了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收复了苏维埃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进入了白俄罗斯，占领了通向克里木的接近地，解放了 160 多座城市和 38 000 多个居民点。

在过去的一年里，红军从德军手中夺回了以前被他们占领的我国国土的将近三分之二，从德军的铁蹄下解放了数千万苏联人。

在过去的一年里，德军在苏德战场上损失了官兵 400 多万，其中被击毙的不下 180 万。

德国法西斯军队精锐的基干师，在苏德战场上遭到了可耻的下场。希特勒征服世界和奴役各国人民的计划，也与这些师一起永远被埋葬了。

诚然，德军现在还固守每道阵地进行顽抗。但是，德国人自从其军队在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击溃以来所遭受的失败，已挫伤了德军的士气。现在德军非常害怕被围，当他们一遇到有被我军迂回的危险时，就仓皇逃窜，把技术装备和伤兵都遗弃在战场上。

我军在过去一年的进攻战斗中，取得了进行现代化战争的丰富经验。我们的军官和将军熟练地指挥军队，有成效地掌握统率军队的艺术。红军已成了最强大和最有锻炼的现代化军队。

红军的胜利更加巩固了苏联的国际地位。我军的进攻得到盟军在北非、意大利所属的岛屿以及意大利南部的战斗行动的支援。我们盟国的空军对德国工业中心进行了大轰炸。毫无疑问，红军从东方对德军所进行的打击，在盟军主力从西方打击的支援下，一

定会摧毁希特勒德国的军事实力，使反希特勒同盟取得完全的胜利。

如果没有全体人民对前线的支援，红军就不能够获得今年的伟大胜利。苏联人民献出一切力量，支援自己的军队。武器、弹药、粮食和装备，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乌拉尔和库兹巴斯，莫斯科和伏尔加河流域，列宁格勒和巴库，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我们所有的共和国和州都成了红军的大军需库。苏联人民正在有成效地恢复从敌人手中夺回的工业区和农业区，使工厂、矿井投入生产，铁路通车，重建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把已解放的地区的资源用来为前线服务。

我们的胜利的确伟大。但是，如果满足于既得的胜利那就幼稚了。现在，当红军在第聂伯河以西打击敌人，并冲向我国西部边界的时候，如果泰然自若，安然自得，不充分估计到当前斗争的严重困难，那是特别危险的。现在，敌人将特别疯狂地为其所侵占的每寸土地而战，因为我军每前进一步，对德军在我国土地上的暴行进行惩罚的时刻就越接近。

最终战胜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要求我国军民作出更大的努力和建立新的功勋。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

你们在同万恶的敌人进行伟大搏斗中获得了巨大胜利，为红军和海军的战斗旗帜增添了不朽的光荣。红军和海军现在有一切可能在最近期间完全肃清苏联国土上的德国侵略者。

为了我们祖国战胜德国法西斯恶魔，我命令：

1. 全体战士和军士不断提高自己的战斗技能，最严格地执行条令、教令的要求以及指挥员和首长的命令，时时处处遵守模范的

秩序、严格的纪律和高度的组织性。

2. 各兵种的军官和将军改进军队的战场指挥和诸兵种的协同动作，牢牢地巩固进攻的胜利，迅猛追击敌军，使后勤机关更迅速地跟上，更大胆地运用预备队去进行新的突击。

3. 全体红军勇敢坚决地突破敌人的防御，日夜不停地追击敌人，不让他们在中间地区巩固下来，用大胆灵活的机动去切断敌人交通线，合围并割裂敌军，消灭并俘获敌人的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

4. 男女游击队员发动苏联人投身于反对德军的武装斗争，全力支援进攻的红军，摧毁敌人的后勤机关和司令部，救出苏联人，不让他们遭受屠杀和被赶到德国去做苦工，无情地消灭德国法西斯恶棍！

红军军人、男女游击队员们！为彻底粉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前进！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六周年万岁！

我们的战无不胜的红军万岁！

我们的战无不胜的海军万岁！

我们的勇敢的男女游击队员万岁！

我们伟大的祖国万岁！

向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报仇，消灭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最高统帅 约·斯大林
苏联元帅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128—133页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 313 号。1943 年 12 月 7 日于莫斯科市)

12月8日是两次荣获勋章的伏龙芝红军军事学院建院二十五周年纪念日。

在国内战争第一年建立的学院，二十五年来向红军输送了大批训练有素、具有现代军事学术水平、忠于布尔什维克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指挥干部。

学院的大批毕业生——卫国战争各个战场的军官和将军们，正在熟练地组织并有效地进行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

在表彰军事学院为红军、为祖国建立的功勋的同时，我坚信学院的领导和全体教授、教员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的工作，继续努力地向红军输送朝气蓬勃的、精通军事的军官。

战胜敌人的事业，要求经常地、深入地研究卫国战争的经验并迅速地在军队中推广这种经验。在完成这项重大的任务中，伏龙芝军事学院应一如既往，不负红军军事科学思想最大中心的崇高使命。

谨向两次荣获勋章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领导、全体教授、教员和学员祝贺建院二十五周年，希望学院在创造性的工作中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国防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苏联元帅

译自 1943 年 12 月 9 日《真理报》

最高统帅命令

(第 16 号。1944 年 2 月 23 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

我国各族人民是在苏联军队对德国法西斯军队取得历史性胜利的情况下庆祝红军建军二十六周年的。

红军为粉碎希特勒侵略军并将其赶出苏联国土而实施胜利的进攻，已经有一年多了。在这一期间，红军顺利地进行了 1942—1943 年间的冬季战局，取得了 1943 年夏季各次会战的胜利，并且展开了 1943—1944 年间冬季的胜利进攻。在这些战争史上没有先例的战局中，红军一面战斗，一面向西推进，有些地方前进了 1700 公里，在约四分之三的被占领的苏联领土上肃清了敌人。

在目前的冬季战局过程中，红军粉碎了德军从日洛宾到赫尔松的第聂伯河沿岸全部坚固的防御，从而使德军企图在苏德战场上顺利地进行持久防御战的打算落空了。

在冬季战局的三个月中，我们英勇的军队在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取得了极其巨大的胜利，完全解放了基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热州，解放了整个日托米尔州，几乎全部解放了罗夫诺州和基洛夫格勒州，并且解放了文尼察州、尼古拉耶夫州、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州和沃伦州的许多区。红军的坚决行动粉碎了德军在日托米尔、克里沃罗格和乌曼地区进行反攻的企图。苏军在第聂伯河右岸地区为德军安排了一个新的斯大林格

勒，在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地域围歼了德军 10 个师和 1 个旅。

苏军在列宁格勒附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军突破了敌人纵深梯次配置的强大的永备工事配系，粉碎了德军的强大集群，彻底解除了敌人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和野蛮的炮击。苏联军人正在肃清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州的法西斯恶魔，并且进入了苏维埃爱沙尼亚境内。

把占领军从苏维埃白俄罗斯驱逐出去的大规模行动已经展开了。几乎全部解放了戈梅利州和波列斯克州，解放了莫吉廖夫州和维捷布斯克州的许多区。

我军在今年冬季的不利条件下，突破了敌人强大的防御地带，在冬季战局的三个月中肃清了约 20 万平方公里苏联国土上的侵略者。红军从敌人手里夺回了 13 000 多个居民点，其中包括 82 座城市和 320 个火车站。又有几百万苏联公民摆脱了法西斯奴役。重要的农业区和有极丰富的铁锰矿藏的工业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德国人失去了他们曾拚命死守的这些经济上重要的地区。

现在大概人人都清楚地看到，希特勒德国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崩溃。固然，这次战争的作战条件，比上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更有利，当时它自始至终在两个战场上作战。但是，对德国一个很不利的事实是，这次战争中的苏联，比上次战争中的旧沙皇俄国强大得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两个战场上对德国联盟作战的有六个大国——法国、俄国、英国、美国、日本和意大利。在这次战争中，意大利和日本转到德国方面去了，芬兰加入了法西斯联盟，在上次战争中对德国作战的罗马尼亚也投到了德国方面，同时德国的主力直到目前为止都是在苏德一个战场上作战。大家从历史上知

道,德国如果在一个战场上作战,总是获得胜利,相反,当它被迫在两个战场上作战时,就遭到失败。在这次战争中,德国虽然把主力用在一个战场上,用在对苏联作战上,然而它不仅不能取得胜利,而且在苏联武装力量的强大打击下濒于覆灭。既然苏联在单独作战中,不仅经受住了德国军事机器的进攻,而且还使德国法西斯军队遭到决定性的失败,那么,当我们盟国的主力加入战斗,当所有的盟国的军队都对希特勒德国展开强大的和日益猛烈的进攻时,它的处境就更加无望了。

德国法西斯强盗现在慌忙寻找逃避覆灭的出路。他们又抓住了在后方实行“总”动员的办法,虽然德国的人员后备已经枯竭。法西斯头子们还拚命想在反希特勒同盟中制造纠纷,从而拖延战争。希特勒的外交官们奔走于中立国之间,力图同亲希特勒分子相勾结,暗示有可能或者同我国,或者同我们的盟国单独媾和。希特勒分子的这一切诡计注定要破产,因为反希特勒同盟是以决心粉碎希特勒德国及其在欧洲的帮凶的各盟国的切身利益为基础的。正是这种根本利益的共同性,使得苏联、英国和美国的战斗联盟在战争过程中巩固起来。

最终清算希特勒分子在苏联国土上和欧洲被占领国内所干下的一切暴行的时刻不远了。

红军的胜利进攻之所以可能实现,是因为苏联人在我国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中建立了新的劳动功勋。苏联的劳动者用他们在后方生产上取得的新的胜利,促进了前线红军的夏季胜利。

我们工业部门的工人正在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规定的计划,使新的工厂、高炉和电站投入生产,在空前短暂的时期内恢复已解放的地区内被占领军破坏的工业。工人阶级的英勇努力,进

进一步加强了红军作战的物质基础，从而使我们最后胜利的时刻提前到来。

苏联农民向国家提供军队和城市所需的粮食及工业所需的原料，以忘我的精神支援红军。

苏联知识分子在发展生产和满足红军的需要方面，给予工人和农民直接的指导性的帮助。

已解放的地区的劳动者对自己的解放者——红军的支援日益扩大，把恢复中的工厂和农业的产品汇集到运往前线的物资洪流中去。

毫无疑问，苏联人民今后也一定会以自己的英勇劳动和全部干劲，来保证国家生产力不断增长，以便最迅速地彻底粉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苏联各族人民在卫国战争中结成的战斗友谊和我国的全部历史，为在各加盟共和国组建新部队做了准备，新部队的建立将进一步加强红军，并把新的战斗力量注入红军的队伍。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同志们！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

你们在为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的伟大解放战争中，表现了英雄主义的奇迹。红军使战争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决定性转折，现在正满怀信心地走向最后胜利。敌人虽然节节败退，但是他们还没有被粉碎。希特勒强盗们看到他们死期已近，看到他们在我国国土上所干下的一切骇人听闻的暴行必然要受到惩罚，正在作垂死挣扎。他们把最后的兵力和预备队投入战斗，抓住每一寸苏联国土和每一个有利的地区进行顽抗。

正因为这样，所以不管我们的胜利有多么大，我们仍然应该清

醒地估计敌人的力量,提高警惕,决不容许在自己的队伍中有骄傲自大、安然自得和疏忽大意的情绪。战争史上还没有过敌人自己跳进深渊的事。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把敌人赶向深渊,并且把它推入深渊。只有用愈来愈猛烈的歼灭性打击才能粉碎敌人的抵抗,使我们取得最后胜利。为此,必须继续提高我军战士的战斗本领和指挥员的作战艺术。红军的天职就是要时时刻刻提高自己的军事学术,不断地仔细地研究敌人的战术,善于及时地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用我们的更完善的战术去对付敌人的战术。必须使红军的先进部队和兵团的战斗经验和成就,为我们所有的部队所掌握。必须使整个红军,红军的全体战士和军官,学会完全按照现代军事科学的要求打击敌人。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在向你们致敬和祝贺红军建军二十六周年的时候,

我命令:

1. 全体战士和军士——步兵、迫击炮手、炮兵、飞行员、坦克兵、工兵、通信兵和骑兵——继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战斗技能,充分利用我国优良的技术兵器,象我们光荣的近卫军战士那样打击敌人,准确地执行指挥员的命令,加强纪律和秩序,提高组织性。

2. 各兵种的军官和将军提高统率军队的艺术,完善机动战术和诸兵种在战斗过程中的协同动作,把先进的近卫军部队和兵团的经验更大胆更广泛地运用到实际战斗中去,把司令部和军队后勤机关的工作素养提到更高的水平,千方百计地改进和发展我们的侦察工作。

3. 全军把火力和机动巧妙结合起来,突破敌人防御的全纵深,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及时粉碎敌人以反冲击来阻止我军进攻的

企图，巧妙地组织对敌人的追击，不让敌人撤走技术装备，以大胆的机动包围敌军的翼侧，插入他们的后方，合围敌军，分割他们，如果他们不放下武器，就消灭他们。

4. 男女游击队员加紧支援红军，袭击敌人的司令部和守备部队，捣毁它的后勤机关，破坏它的交通线和通信联络，使它无法前调预备队。

5. 为表彰苏联武装力量在过去一年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今天，2月23日，红军建军二十六周年纪念日，18时，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戈梅利和罗斯托夫齐鸣礼炮20响，向英勇的红军表示祝贺。

光荣属于我们的战无不胜的红军！

光荣属于苏联武装力量！

光荣属于我们勇敢的男女游击队员！

我们伟大的苏维埃祖国万岁！

我们红军伟大胜利的鼓舞者和组织者苏联共产党万岁！

消灭德国侵略者！

最高统帅
苏联元帅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134—141页

最高统帅命令

(第 70 号。1944 年 5 月 1 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
苏联劳动者们！暂时处在德国压迫者铁蹄下的和被掳到德国去服
法西斯苦役的兄弟姐妹们！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
贺“五一”节！

我国各族人民是在红军获得卓越胜利的时候庆祝“五一”
节的。

自从在斯大林格勒附近消灭德军许多师以来，红军几乎不间断地在进攻。在这期间，红军从伏尔加河打到了锡雷特河，从高加索山麓打到了喀尔巴阡山，消灭敌魔，将其从苏联国土上驱逐出去。

在 1943—1944 年间的冬季战局进程中，红军在争夺第聂伯河和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的历史性会战中获得了胜利，摧毁了德军在列宁格勒附近和克里木的坚固的防御工事，并以巧妙而迅猛的行动，突破了德军在南布格河、德涅斯特河、普鲁特河、锡雷特河的防御。几乎整个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克里木、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州以及白俄罗斯很大一部分领土上的德国侵略者都被肃清了。南方的冶金工业基地，克里沃罗日耶、刻赤和尼科波尔的矿

区，第聂伯河和普鲁特河之间的肥沃地带，又都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几千万苏联人摆脱了法西斯的奴役。

红军执行着从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祖国国土的伟大任务，已进到了我国同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接壤的国境线，目前正在罗马尼亚境内继续歼灭敌军。

红军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由于苏联统帅部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和战术，是由于我军战士和指挥员具有高昂士气和进攻精神，是由于我军大量装备了第一流的苏联技术兵器，是由于我军炮兵、迫击炮手、坦克兵、飞行员、通信兵、工兵、步兵、骑兵以及侦察兵不断地提高了作战艺术和技能。

我们伟大的盟国——美国和英国，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这些胜利，它们在意大利坚守对抗德国人的战线，牵制着相当一部分德军，供给我们极宝贵的战略原料和武器，经常轰炸德国军事目标，从而破坏德国的军事实力。

但是，如果没有我们全体苏联人民、我们全国从后方对红军的支援，那么红军的胜利就会是不巩固的，并且一遇到敌人的严重反击，就会化为乌有。红军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表现了无比的英勇。苏联人民也报答了红军。苏联人民在战争的困难条件下，在大批生产武器、弹药、军服、粮食和及时将其运到红军前线的事业中，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成功。苏联工业的力量在过去一年内大大增长了。几百个新工厂和新矿井投入了生产，几十个电站已经发电，几十条铁路已经通车，几十座桥梁已经建成。又有几百万苏联人初次上机床工作，掌握了极复杂的业务，成了本行的能手。我国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光荣地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苏联农民在战时的困难条件下，努力不懈地在田野里工作，供给我国军民粮食，供

给我国工业原料。至于我们的知识分子，则以新的卓越的成就和发明，丰富了苏联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苏联妇女在保卫祖国的事业中具有不可估量的功劳，她们忘我地为前线工作，以刚毅精神忍受战时的一切困难，鼓舞我们祖国的解放者红军军人去建立战斗功勋。

卫国战争证明了，苏联人民有能力创造奇迹，经受最严重的考验而取得胜利。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苏联知识分子，全体苏联人民都充满决心去加快消灭敌人，完全恢复被法西斯分子破坏的经济，使我国成为一个更加富强的国家。

法西斯国家的同盟在红军的打击下正在破裂和瓦解。现在，在希特勒的罗马尼亚、匈牙利、芬兰和保加利亚“同盟者”中间，充满惊慌恐惧的心理。现在，这些希特勒的帮凶（他们的国家已被和正被德国人占领）不能不看到，德国在这次战争中是输定了。罗马尼亚、匈牙利、芬兰和保加利亚现在只有一种避免覆灭的可能，这就是同德国人决裂而退出战争。可是很难指望这些国家现在的政府能够同德国人决裂。看来，这些国家的人民必须自己担负起摆脱德国枷锁的任务。这些国家的人民，愈是迅速地了解到希特勒分子把他们引入了怎样的绝路，愈是迅速地停止对德国奴役者及其帮凶——本国的吉斯林分子的一切援助，这些国家受到战争带来的牺牲和破坏就愈少，就愈能指望得到民主国家的谅解。

由于胜利的进攻，红军已在 400 多公里宽的正面上进到我国的国境线，从德国法西斯铁蹄下解放了我国四分之三以上的沦陷地区。现在的问题是要肃清我国全部国土上的法西斯侵略者，恢复苏联由黑海到巴伦支海的全部国界。

但是，我们的任务不能只限于把敌军驱逐出我们祖国的国境。现在德军正如一只受了伤的野兽一样，不得不爬往自己的洞穴——德国的边境去医治创伤。但是，这只回到自己洞穴去的受伤的野兽，仍然是一只很危险的野兽。为了使我国和我们的盟国免遭奴役的危险，必须跟踪追击这只受了伤的德国野兽，把它打死在它的洞穴里。我们在追击敌人的过程中，同时就要把我们的波兰兄弟和捷克斯洛伐克兄弟以及其他和我们联盟的处于希特勒德国铁蹄下的西欧各国人民，从德国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当然，这个任务要比把德军驱逐出苏联国境的任务困难一些。这个任务，只有在苏英美共同努力的基础上，由我国军队从东方和我们的盟军从西方协同进攻，才能完成。毫无疑问，只有这种联合的打击，才能完全粉碎希特勒德国。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苏联劳动者们！暂时处在德国压迫者铁蹄下的和被掳到德国去服法西斯苦役的兄弟姊妹们！我向你们致敬并祝贺“五一”节！

我命令：

今天，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20时，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戈梅利、基辅、哈尔科夫、罗斯托夫、第比利斯、辛菲罗波尔、敖德萨齐鸣礼炮20响，庆祝红军在前线获得的历史性的胜利以及苏联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在后方取得的伟大成就。

我们的苏维埃祖国万岁！

我们的红军和海军万岁！

伟大的苏联人民万岁！

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万岁！

苏联男女游击队员万岁！

在争取我们祖国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消灭德国侵略者!

**最高统帅
苏联元帅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142—147页

答《真理报》记者问

《真理报》记者询问斯大林同志对盟国登陆兵在法国北部登陆一事作何估计，斯大林同志对于这个问题作了如下的回答：

将盟国解放大军攻入法国北部的七天战斗情形作一总结，可以毫不犹豫地讲，盟国登陆部队在广阔范围内强渡拉芒什海峡和在法国北部大举登陆是完全成功的。这无疑是我们盟国的光辉胜利。

不能不承认，这次行动按其计划的周密，规模的宏大和实施的巧妙来说，在战争史上还没有类似的先例。

大家知道，号称“无敌”的拿破仑，当年企图强渡拉芒什海峡和夺取不列颠群岛的计划遭到了可耻的破产。狂人希特勒吹嘘了两年，说他定要强渡拉芒什海峡，结果连实现这种威吓的尝试都没有敢作。只有英美军队才光荣地实现了强渡拉芒什海峡和大举登陆的宏大计划。

这件事将作为一项杰出成就载入史册。

1944年6月13日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148—149页

最高统帅命令

(第 152 号。1944 年 8 月 20 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歼击航空兵、强击航空兵、轰炸航空兵和侦察航空兵部队的飞行员、领航员、空中射击员、无线电员、工程师、技术员、机械兵、军官和将军同志们！

在全苏空军节的日子，我向你们致敬并祝贺你们在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取得的成就！

苏联空军和全体红军一起，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着残酷无情的斗争，给敌人的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给他们的后方和交通线以毁灭性的打击。

男女工人的忘我劳动，苏联航空设计师和工程师的高度技术，使我们克服了德国空军过去在数量上的优势，并用成千上万架质量优良的战斗机武装了红军和海军中的空军部队。

在同敌人进行的空战中，我们的飞行员表现了无比的英勇果敢的精神，而我们的指挥员和首长也表现了指挥空战的无比的本领和作战艺术。

结果，我国的战斗空军现在压倒了敌人的空军，拥有完全的制空权。

成千上万的卓越的飞行员、领航员和空中射击员，正越来越多地增添我国武装力量的胜利，歼灭陆上和空中的敌人。

为了表彰我国战斗空军取得的胜利,我命令:

在今天空军节,8月20日,17时,在我们祖国首都莫斯科,以祖国的名义,用224门火炮,齐鸣礼炮20响,向我国英勇的空军军人致敬。

最高统帅 约·斯大林
苏联元帅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150—151页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二十七周年

(1944 年 11 月 6 日在莫斯科市劳动者
代表苏维埃、党组织和社会团体
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

今天苏联人民庆祝我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二十七周年。

我国在进行反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卫国战争的条件下庆祝苏维埃革命的纪念日,已经是第四次了。

这当然不是说,战争的第四年的总结同战争的前三年没有差别。恰好相反,它们有根本的区别。战争的头两年是德军进攻并向我国腹地推进的两年,红军当时被迫进行防御战;战争的第三年是我国战场上发生根本转折的一年,在这一年红军展开了强大的进攻战,在一系列决定性的战斗中击溃了德军,肃清了苏联三分之二的国土上的德军,迫使他们转入防御,并且红军仍然是在没有得到盟国重大支援的情况下单独与德军作战的,而战争的第四年则是苏军和我们盟国的军队取得对德军的决定性胜利的一年,在这一年,这次被迫在两个战场上作战的德军已被击退到德国边界上去了。

过去一年的结果,是德军被驱逐出苏联、法国、比利时和意大

利中部,军事行动转到了德国境内。

1. 德国处在两个战场的夹攻中

红军在今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和德军被驱逐出苏联国境,这是由我军还在今年1月就已开始,后来在整个报告年度内展开的对德军的一系列毁灭性打击所早已决定了的。

第一次打击是今年1月我军在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附近进行的,当时红军摧毁了德军的永备工事防御,把他们击退到波罗的海沿岸去了。这次打击的结果,是解放了列宁格勒州。

第二次打击是今年2—3月在布格河一带进行的,当时红军击溃了德军,并把他们击退到德涅斯特河对岸。由于这次打击,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

第三次打击是今年4—5月在克里木地域进行的,当时德军被打到黑海里去了。由于这次打击,克里木和敖德萨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

第四次打击是今年6月在卡累利阿地域进行的,当时红军击溃了芬兰军队,解放了维堡和彼得罗扎沃茨克,把芬兰军队打退到芬兰内地。这次打击的结果,是解放了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共和国大部分领土。

第五次对德军的打击是今年6—7月进行的,当时红军在维捷布斯克、博布鲁伊斯克、莫吉廖夫等城市附近彻底击溃了德军,并以在明斯克附近合围德军30个师完成了这次打击。由于这次打击,我军:(一)完全解放了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二)前出到了维斯瓦河,并解放了同我们联盟的波兰的很大一部分领土;(三)前

出到了涅曼河,并解放了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四)强渡涅曼河,逼近德国边界。

第六次打击是今年7—8月在乌克兰西部地区进行的,当时红军在利沃夫附近击溃了德军,并把他们击退到桑河和维斯瓦河对岸去了。由于这次打击:(一)解放了乌克兰西部;(二)我军强渡了维斯瓦河,并在维斯瓦河对岸桑多梅日以西建立了大登陆场。

第七次打击是今年8月在基什尼奥夫、雅西地域进行的,当时我军彻底击溃了德国和罗马尼亚的军队,在基什尼奥夫附近合围了德军22个师,罗马尼亚师尚未计算在内,以此合围完成了这次打击。由于这次打击:(一)解放了摩尔达维亚苏维埃共和国;(二)打垮了德国的盟国罗马尼亚,它已对德国和匈牙利宣战了;(三)打垮了德国的盟国保加利亚,它也对德国宣战了;(四)为我军打通了进入德国在欧洲的最后一个盟国匈牙利的道路;(五)使我军能伸出手来援助同我们联盟的南斯拉夫反对德国侵略者。

第八次打击是今年9—10月在波罗的海沿岸进行的,当时红军在塔林和里加附近击溃了德军,并把他们驱逐出波罗的海沿岸。由于这次打击:(一)解放了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二)解放了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三)打垮了德国的盟国芬兰,它已对德国宣战;(四)德军30多个师被切断了同普鲁士的联系,在图库姆斯、利巴瓦地域内陷入夹攻,现正被我军歼灭中。

今年10月,我军在匈牙利境内蒂萨河与多瑙河之间开始了第九次打击,目的是要迫使匈牙利退出战争,并掉过头来反对德国。这次打击还没有结束,但已有如下的结果:(一)我军直接援助同我们联盟的南斯拉夫驱逐德军和解放贝尔格莱德;(二)我军得以越过喀尔巴阡山脉,伸出手来援助同我们联盟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

国，它的一部分领土已从德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

最后，今年 10 月底，在芬兰北部对德军进行了打击，把德军从佩琴加地域赶走了，我军追击德军，已进入同我们联盟的挪威境内。

我现在不来列举这些战役中敌人被击毙和被俘的数字，以及我军缴获的火炮、坦克、飞机、炮弹、机枪等等的数字。这些数字想必你们已从苏联新闻局的公报中知道了。

这就是红军过去一年进行的主要战役，经过这些战役，德军已被驱逐出我国国境。

这些战役的结果，德国及其盟国的军队被击溃和打垮的达 120 个师。去年同我军对阵作战的是 257 个师，其中德军 207 个师，而现在，在敌人进行了一切“总”动员和“额外总”动员之后，同我军对阵作战的，总共才有 204 个德国师和匈牙利师，其中德军不超过 180 个师。

必须承认，这次战争中的希特勒德国及其法西斯军队，同过去各次战争中的德国及其军队比较起来，是一个更强大、更阴险、更有经验的敌人。而且还必须补充一句，德国人在这次战争中利用了差不多全欧洲的生产力和各附庸国数量相当大的军队。然而，德国尽管有了这些有利的作战条件，仍然落到了必然灭亡的边缘，这只能说是因为德国的主要敌人——苏联在力量上超过了希特勒德国。

过去一年反希特勒德国战争中的一个新情况，就是红军在今年已不象前几年那样是单独地同德军作战，而是同我们盟国的军队一起共同对德军作战了。德黑兰会议并没有白开。德黑兰会议关于从西东南三个方向共同打击德国的决议已在极其准确地实

现。在红军进行苏德战场上夏季各战役的同时，盟军开始攻入法国，并组织了强大的进攻战役，迫使希特勒德国在两个战场上作战。我们盟国的陆海军在法国沿海实施了就其组织程度和范围来说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规模登陆战役，并巧妙地克服了德军的工事。

于是，德国就陷入两个战场的夹攻之中了。

果然不出所料，敌人经不住红军和盟军的共同打击。敌人的抵抗被粉碎了，它的军队在短期内就被驱逐出意大利中部、法国、比利时和苏联国境。敌人被击退到了德国边境。

无可怀疑，如果没有在欧洲组织第二战场牵制住德军达 75 个师的话，我军是不能在那样短的期限内粉碎德军的抵抗并把它驱逐出苏联国境的。但同样无可怀疑的是，如果没有红军今年夏季的强大进攻战役牵制住德军达 200 个师的话，我们的盟军是不能如此迅速地打退德军并把它驱逐出意大利中部、法国和比利时国境的。

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继续使德国处于两个战场的夹攻之中。

这就是胜利的关键。

2. 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的 伟大功勋

红军之所以能顺利完成自己对祖国的职责，把德军驱逐出苏联国土，这是因为我们全国，我国各族人民从后方忘我地支援红军。过去一年中，所有苏联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忘我的工作，以及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的领导工作，都是在“一切为了前线”的旗帜下进行的。

在过去一年中,工业、农业、运输业获得了新的成就,我国战时经济有了新的高涨。

在战争第四年,我国工厂制造的坦克、飞机、火炮、迫击炮和弹药比战争初期要多几倍。在恢复农业方面,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在我国收复顿河与库班河一带肥沃田地以后,在解放乌克兰以后,遭到严重损失的我国农业正在迅速恢复。苏联铁路运输部门担负起了其他国家的运输部门未必能够担负得起的重担。这一切都说明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基础较之敌国的经济,有无比的生命力。

十月革命所产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给了我国人民和我国军队以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尽管苏维埃国家担负着战争的重担,尽管德军暂时占领了我国经济上极重要的广大地区,然而苏维埃国家在战争进程中,对前线的武器和弹药的供应并没有减少,而且是一年比一年增加。现在红军所拥有的坦克、火炮、飞机,不是比德军的少,而是比德军的多。至于说到我们的技术兵器的质量,那要比敌人的优良得多。正象红军在单独进行的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中,在军事上战胜了法西斯军队一样,苏联后方的劳动者,在同希特勒德国及其帮凶进行的单独战斗中,也在经济上战胜了敌人。苏联人放弃了许多必需的东西,自觉地忍受物质上的严重困难,以便给前线更多的东西。这次战争中空前未有的困难不但没有摧毁,反而更好地锤炼了苏联人民的钢铁意志和英勇精神。我国人民理应赢得英雄人民的荣誉。

我国工人阶级为了争取胜利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他们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业企业的生产能力,建立新的工厂。苏联工人阶级在这次战争中建立了伟大的劳动功勋。

我国知识分子在技术和文化革新的道路上勇敢前进,有成效

地向前发展现代科学，创造性地运用现代科学的成就来为红军生产武器。苏联知识分子以其创造性的劳动，对打败敌人作出了极宝贵的贡献。

军队没有现代化的武器，是不能作战和胜利的。可是，没有面包，没有粮食，军队也是不能作战和胜利的。红军在战争的第四年里，由于集体农民的关怀，没有感到缺乏粮食。男女集体农庄庄员供给工人和知识分子以粮食，供给工业以原料，保证为前线制造武器和装备的工厂正常开工。我国集体农民充分认识自己对祖国应尽的义务，积极协助红军取得对敌人的胜利。

苏联妇女和我国光荣的青年在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肩负着劳动的主要重担，他们所建立的史无前例的劳动功勋将永远载入史册。为了祖国的荣誉和独立，苏联妇女和男女青年在劳动战线上表现了英勇精神。他们真正无愧于他们的那些正在保卫祖国，打击德国法西斯恶魔的父亲和儿子、丈夫和兄弟。

苏联人在后方的劳动功勋，同我国军人在前线的不朽战功一样，是来自强烈的、生气勃勃的苏维埃爱国主义。

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力量，就在于这种爱国主义的基础不是种族偏见或民族主义偏见，而是人民对自己的苏维埃祖国的耿耿忠诚和忠实，以及我国各民族劳动者的兄弟友爱。在苏维埃爱国主义中，各族人民的民族传统是同苏联所有劳动者的共同切身利益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苏维埃爱国主义不是分裂我国各民族，恰好相反，是把它们团结成统一的兄弟家庭。应当认为，这就是苏联各族人民的牢不可破的、日益巩固的友谊的基础。同时，苏联各族人民尊重外国人民的权利和独立，一向表示愿意同邻国和平友好相处。应当认为，这就是我国同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的联系日益

发展和巩固的基础。

苏联人之所以痛恨德国侵略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异族人，而是因为他们使我国人民和所有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遭受了数不清的灾难和痛苦。我国民间历来有句俗话：“并不是因为狼是灰的才打狼，而是因为狼吃了羊。”

德国法西斯分子把仇视人类的种族论选作自己的思想武器，本来是以为，鼓吹兽性的民族主义就可以给德国侵略者统治被奴役的民族造成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前提。可是希特勒分子所实行的种族仇视政策，实际上却成了德国法西斯国家国内虚弱和国际上孤立的根源。种族仇视的思想和政策，是希特勒强盗联盟瓦解的因素之一。起来反对德帝国主义者的，不仅有被奴役的法国、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比利时、丹麦、挪威、荷兰等国人民，而且还有从前希特勒的附庸国——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芬兰人、保加利亚人，这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希特勒匪帮实行吃人的政策，使得世界各国人民都起来反对德国，而所谓的“优等德意志种族”却遭到了举世的憎恨。

在战争进程中，希特勒分子不仅遭到了军事上的失败，而且遭到了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失败。已在我国树立起来的一切种族和民族平等的思想，各族人民友爱的思想，完全战胜了希特勒分子的兽性民族主义和种族仇视的思想。

现在，在卫国战争快要胜利结束的时候，苏联人民的历史作用的全部伟大意义显现出来了。现在大家都承认，苏联人民以自我牺牲的斗争，从法西斯暴徒的铁蹄下拯救了欧洲的文明。这就是苏联人民对人类历史的伟大功勋。

3. 反德同盟战线的巩固和扩大。 和平与安全问题

过去的一年是反德同盟共同事业胜利的一年，苏英美三国人民正是为了这个共同事业而团结成了战斗联盟。这一年是反对希特勒德国的三个主要国家意见一致和行动协调加强的一年。

德黑兰会议关于对德共同行动的决议以及这个决议的光辉实现，是反希特勒同盟战线巩固的鲜明标志之一。历史上关于对共同敌人采取共同行动的大战役计划，很少有象德黑兰会议所拟定的共同打击德国的计划那样，实现得这样完满，这样准确。无可怀疑，如果没有三大国的意见一致和行动协调，德黑兰会议的决议便不能实现得这样完满和准确。而另一方面，德黑兰决议的顺利实现，不会不促进联合国家战线的巩固，这也是不容置疑的。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关于组织战后安全问题的决议，应当认为是联合国家战线巩固的同样鲜明的标志。有人说，三国在某些关于安全的问题上有分歧。分歧当然是有的，而且在一系列其他的问题上也还会发生分歧。甚至就是在同一政党的人中间也常发生分歧。而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政党的代表中，就更会发生分歧了。值得惊讶的倒不是有分歧，而是分歧如此之少，而且几乎每次都照例是本着三大国意见一致和行动协调的精神解决的。问题不在于有分歧，而在于这些分歧没有越出三大国一致的利益所容许的范围，以及归根到底都是根据这种一致的利益来解决的。大家知道，我们在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上，有过比较重大的分歧。但是，大家同样知道，这些分歧终于本着完全一致的精神解决了。敦巴顿橡树

园会议上的分歧也是这样。这次会议的特点，并不是那里暴露了某些分歧，而是关于安全的问题，有十分之九都在这次会议上本着完全一致的精神解决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决议应当看作是反德同盟战线巩固的鲜明标志之一。

最近在莫斯科同英国政府首脑邱吉尔先生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先生在友好的气氛和完全一致的精神下进行的谈判，应该认为是联合国家战线巩固的更鲜明的标志。

在整个战争期间，希特勒分子拚命企图离间联合国家，使它们彼此对立，使它们相互猜疑和仇恨，并且使它们互不信任，而如果可以做到的话，使它们互相斗争，以削弱它们在军事方面的努力。希特勒的政治家们有这种企图是十分自然的。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危险莫过于联合国家在反对希特勒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一致，最大的军事政治胜利莫过于盟国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的分裂。可是，大家知道，法西斯政治家们想破坏大国联盟的挣扎是如何地枉费心机。这就表明，苏英美联盟的基础不是一些偶然的和暂时的动机，而是非常重大的和长远的利益。

可以不必怀疑，既然民主国家的战斗联盟经受住了三年多的战争的考验，既然这个联盟已经为奋起保卫本国自由和荣誉的各国人民的鲜血所凝结起来，那么，这个联盟更会经受住战争的最后阶段的考验。

但是，过去的一年不仅是盟国反德战线巩固的一年，而且是一战线扩大的一年。继意大利之后，德国的其他盟国——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也被迫退出了战争，这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必须指出，这些国家不仅退出了战争，而且已同德国决裂，并对德国宣战，从而加入了联合国家战线。这无疑是联合国家反希特勒德

国战线的扩大。无可怀疑，德国在欧洲的最后一个盟国匈牙利，不久也会被打垮。这将意味着希特勒德国在欧洲完全孤立和必然崩溃。

联合国家即将胜利地结束反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了。

联合国家将赢得对德战争的胜利，对于这一点，现在已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了。

赢得对德战争的胜利就是实现了伟大的历史事业。可是，赢得战争的胜利，还不是说保证了各国人民将来的持久和平和可靠的安全。任务不仅是要在战争中赢得胜利，而且是要使新的侵略和新的战争不可能发生，如果不是永久不发生，至少也要在一个长时期内不发生。

德国失败以后，它当然要在经济方面和军事政治方面被解除武装。但是，如果以为它不会企图恢复自己的实力和进行新的侵略，那就太天真了。谁都知道，德国的头目们现在就已在准备新战争。历史表明，只要有一个二三十年的短时期，德国就可以从失败中复原，恢复自己的实力。有什么办法来防止德国的新侵略，如果战争终于发生了，又有什么办法在战争一开始时就加以扑灭，而不让它扩展成为大战呢？

这个问题之所以提得特别恰当，是因为历史表明，侵略国是进攻国，它们对于进行新战争通常都比爱好和平的国家有准备，爱好和平的国家不愿意进行新战争，通常都是很晚才去备战。在这次战争中，侵略国还在战争开始以前，就已有准备好了的入侵军队，而爱好和平的国家甚至连十分象样的保证动员的掩护军队都没有，这是事实。象珍珠港“事件”、菲律宾和太平洋其他岛屿的失守、香港和新加坡的失守这样一些不幸的事实，不能认为是偶然

的，当时日本这个侵略国比奉行爱好和平政策的英国和美国对战争更有准备。同样地，我们在战争的第一年就丧失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这种不幸的事实也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当时德国这个侵略国比爱好和平的苏联对战争更有准备。如果说这些事实的发生，是由于日本人和德国人的什么个人品质，由于他们优于英国人、美国人、俄国人，由于他们有什么远见等等，那就太天真了。问题不在于个人品质，而在于那些希望进行新战争的侵略国，是长期备战并为此不断积聚力量的国家，它们通常都比而且必然比不愿意进行新战争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对战争更有准备。这是很自然的，可以理解的。这也可以说是历史规律性，不估计到这个规律性是危险的。

因此，不能否认，爱好和平的国家将来可能又会被侵略弄得措手不及，当然，如果它们不在现在就制定能够防止侵略的特别办法的话。

总之，有什么办法来防止德国的新侵略，如果战争终于发生了，又有什么办法在战争一开始时就加以扑灭，而不让它扩展成为大战呢？

为此，除了完全解除各侵略国的武装以外，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建立一个由爱好和平国家的代表组成的捍卫和平、保障安全的特别组织，并使这个组织的领导机关握有为防止侵略所必需的最低限度数量的武装力量，责成这个组织在必要时毫不延迟地使用这些武装力量去防止或消灭侵略，并惩办侵略祸首。

这不应当是既没有权力又没有手段来防止侵略的那个可悲的国际联盟的重演。这将是握有捍卫和平和防止新侵略所必需的一切东西的新的特别全权国际组织。

能不能指望这个国际组织的行动是充分有效的呢？如果担负反希特勒德国战争主要重担的各大国今后也会本着一致和协调的精神行事，这种行动就将有效。如果违背了这个必要条件，这种行动就不会有效。

* * *

同志们！

苏联人民和红军正在顺利地实现卫国战争进程中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红军光荣地完成了它的爱国天职，从敌人手中解放了我们祖国。我们的国土从此永远摆脱了希特勒妖孽。现在红军还有最后一个使命：就是同我们盟国的军队一起完成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事业，把法西斯野兽打死在它自己的洞穴里，在柏林上空升起胜利的旗帜。有根据指望红军在不久的将来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战无不胜的红军万岁！

我们光荣的海军万岁！

强大的苏联人民万岁！

我们伟大的祖国万岁！

消灭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152—169页

最高统帅命令

(第 220 号。1944 年 11 月 7 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同志们！苏联劳动者们！被掳到德国去服法西斯苦役的兄弟姐妹们！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七周年。

我们是在红军取得对我们祖国敌人的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庆祝十月革命二十七周年的。由于红军和苏联人民的英勇努力，我国国土上的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已被肃清。

苏军今年连续不断地痛击敌人，一次比一次更厉害。1944 年年初的冬天，红军在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获得了卓越的胜利，并在列宁格勒附近击溃了德军。这一年春天，红军肃清了在克里木的德军。1944 年夏天，我军使希特勒军队遭到了几次极大的失败，根本改变了反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战场的局势。红军粉碎了敌人在卡累利阿地峡以及在拉多加湖和奥涅加湖之间的坚固防御，并迫使芬兰退出了希特勒强盗联盟。红军在白俄罗斯土地上进行的历史性战役中，彻底粉碎了由三个集团军组成的德军中央集团，歼灭和俘虏了 54 万德军官兵。红军在南方会战中，合围并全歼了由两个集团军组成的德军集团。当时，苏军歼灭和俘虏了 25 万以上的德军官兵。红军在罗马尼亚击溃了德军，把德军驱逐出了保

加利亚，现在正在匈牙利境内打击德军。我军粉碎了希特勒军队的波罗的海沿岸集团。在1944年夏季战局中，红军从基什尼奥夫打到贝尔格莱德，前进了900多公里；从日洛宾打到华沙，前进了600多公里；从维捷布斯克打到蒂尔西特，前进了550公里。战争现在已转移到了法西斯德国境内。

红军在战斗进程中，把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从苏维埃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从卡累利阿-芬兰、摩尔达维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领土上驱逐出去了。在被德国人暂时侵占的我们兄弟苏维埃共和国国土上存在过三年的法西斯压迫被推翻了。红军使几千万苏联人重新获得了自由。被希特勒匪帮在1941年6月22日背信弃义地侵犯了的苏联国界，从黑海直到巴伦支海，都完全恢复了。

所以，过去的一年，是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占领下把苏联国土完全解放出来的一年。

红军从希特勒妖孽的占领下解放了祖国国土以后，现在正在帮助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人民斩断法西斯奴役的锁链和恢复他们的自由和独立。

红军在过去这一年的冬季和夏季战斗中，表现了更高的军事技能。红军军人巧妙地突破了敌人的筑垒地带，迅猛地追击、合围和歼灭敌人。在进攻战中，苏军各兵种表现了准确的协同动作和高度的机动艺术。苏联军人在战斗中受到了锻炼，学会了击破并战胜敌人。红军发展成了强大可畏的力量，在作战技能和技术兵器方面都超过了敌人。

苏联后方协调一致的工作使红军的力量增强了许多倍。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光荣地履行自己对祖国的职责，英勇

地克服战时的困难,源源不断地供给红军以武器、弹药和粮食。苏联经济不断地增强自己的力量,给前线愈来愈多的支援。

红军和苏联人民决心给敌人以新的致命打击。希特勒血腥制度的末日已经不远了。法西斯联盟在红军的打击下已彻底崩溃,希特勒德国丧失了自己的大多数盟国。我们的盟军在西欧巧妙进行的巨大战役,击溃了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德军,把这些国家从法西斯占领下解放出来。盟军已越过德国西部边界。红军和英美军队共同对希特勒德国进行的打击,使战争胜利结束的时刻接近了。现在正在完成对希特勒德国的合围。法西斯野兽的洞穴已被四面八方团团围住,敌人无论使用什么狡猾伎俩,也不能挽救其必然覆灭的命运。

红军和我们盟国的军队已经进入向德国要害地区实施决定性进攻的出发阵地。现在的任务就是联合国家军队要以迅猛的进攻,在最短时期内粉碎希特勒德国。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同志们!苏联劳动者们!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我们击退了侵略者,捍卫住了自己的祖国,彻底消除了法西斯恶魔奴役苏联各族人民的危险,现在我们正处在完全胜利的前夕。

为了表彰红军在前线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以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后方取得的伟大成就,为了庆祝苏联国土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占领下解放出来,

我命令:

今天,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七周年纪念日,20时,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彼得罗扎沃茨克、塔林、里加、维

尔纽斯、基什尼奥夫、第比利斯、塞瓦斯托波尔、利沃夫齐鸣礼炮
24 响。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七周年万岁！

我们的自由的苏维埃祖国万岁！

我们的红军和海军万岁！

伟大的苏联人民万岁！

在争取我们祖国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
不朽！

消灭德国侵略者！

最高统帅 约·斯大林
苏联元帅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170—174 页

最高统帅命令

(第 225 号。1944 年 11 月 19 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苏联炮兵部队的炮兵和迫击炮手、工程师和技术员、军官和将军同志们!

今天苏联人民庆祝红军炮兵节。

今天全国都在赞扬炮兵作为红军主要打击力量的伟大作用。

大家知道，炮兵是曾经协助红军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接近地阻止敌人前进的力量。

炮兵是保证了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和沃罗涅日附近，在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附近，在哈尔科夫和基辅附近，在维捷布斯克和博布鲁伊斯克附近，在列宁格勒和明斯克附近，在雅西和基什尼奥夫附近粉碎德军的力量。

在卫国战争历次大会战中，炮兵都以其毁灭性的火力为步兵和坦克成功地扫清了道路，其结果是敌人已被赶出我们祖国的疆界。

现在，在为战胜德国而进行的最后决战中，苏联炮兵正同全体红军一起，给敌人的有生力量、技术装备和工事以毁灭性的打击。

大家知道，苏联炮兵在战场上已经取得了压倒敌人炮兵的绝对优势，苏联炮兵和迫击炮手在同敌人进行的多次战斗中，获得了特别英勇的不朽的光荣，指挥员和首长们表现了指挥火力的高度

艺术。

这是我国理应引以自豪的胜利。

苏联炮兵部队的炮兵和迫击炮手,工程师和技术员,军官和将军同志们!我向你们祝贺炮兵节!

为了庆祝红军炮兵在卫国战争中取得的决定性胜利,

我命令:

在今天炮兵节,11月19日,19时,在我们祖国首都莫斯科、在各加盟共和国首都以及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哈巴罗夫斯克^①、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高尔基、莫洛托夫和图拉等城市,以祖国的名义,齐鸣礼炮20响,向我们光荣的炮兵致敬。

祝苏联炮兵永远强大,使我们祖国的敌人闻风丧胆!

**最高统帅
苏联元帅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175—176页

^① 即伯力。——编者注

最高统帅命令

（第5号。1945年2月23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同志们！今天我们庆祝红军建军二十七周年。

伟大的列宁为了保卫我们祖国免遭外国侵略者的进攻而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所抚育成长的红军，经历了光荣的发展道路。红军光荣地执行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真正不愧是苏联人民热爱的子弟兵。在国内战争年代，红军击败了许多许多的敌人，捍卫了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在反对德国侵犯的卫国战争的伟大战斗中，红军拯救了苏联各族人民，使他们免受德国法西斯的奴役，捍卫了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并帮助欧洲各国人民摆脱了德国的桎梏。

我们现在是在取得对敌人的历史性新胜利的情况下庆祝红军二十七周年的。红军不仅从希特勒妖孽手里解放了祖国土地，并且还把德军打回到它向我国发动强盗式进攻的界线以外几百公里的地方，把战争转移到德国境内，现在正在同我们的盟军一起胜利地完成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事业。

今年1月，红军在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脉的整个战线上，向敌人进行了空前强大的打击。红军在宽达1200公里的正面上摧毁了德国人多年来构筑的坚固防御。在进攻中，红军以迅速巧

妙的行动把敌人往西击退到很远的地方。苏军通过顽强的战斗，从东普鲁士边界打到维斯瓦河下游，前进了 270 公里；从华沙以南的维斯瓦河登陆场打到奥得河下游，前进了 570 公里；从桑多梅日登陆场打到德属西里西亚腹地，前进了 480 公里。

我军冬季进攻胜利的结果，首先就是破坏了德军在西方以夺取比利时和阿尔萨斯为目标的冬季进攻，并使我们盟国的军队也能向德军转入进攻，从而把盟军在西方的进攻同红军在东方的进攻结合起来。

在 1945 年 1—2 月四十天的进攻中，我军从德军手中解放了 300 个城市，夺取了上百个制造坦克、飞机、武器、弹药的军事工厂，占领了 2400 多个火车站，夺得了总长 15 000 多公里的铁路网。在这个短时期内，德军官兵被俘的在 35 万以上，被击毙的不下 80 万。在同一时期内，红军击毁和缴获了德国飞机约 3 000 架，坦克和自行火炮 4 500 多辆，火炮不下 12 000 门。

结果，红军解放了波兰全境和捷克斯洛伐克很大一部分领土，占领了布达佩斯，并迫使德国在欧洲的最后一个盟国匈牙利退出战争，占领了东普鲁士的和德属西里西亚的大部分土地，并给自己打开了通向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柏林接近地的道路。

希特勒分子曾经自夸说，一百多年以来，没有一个敌国的士兵曾经到过德国境内，德军过去和将来都只在他国土地上作战。现在德国人的这种牛皮已经吹破了。

我军冬季进攻表明，红军能不断增长力量来解决日益复杂和困难的任务。光荣的红军军人现在已学会完全按照现代军事科学的要求来粉碎和消灭敌人。我们的战士由于认识到自己的伟大的解放使命而受到鼓舞，创造出英勇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奇迹，巧

妙地把战斗中的英勇果敢同充分发挥自己武器的力量和威力结合起来。红军的将军和军官们娴熟地把强大的技术兵器的密集突击同巧妙迅速的机动结合起来。红军在战争的第四年，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它的技术兵器已更加完善，它的战斗技能提高了许多倍。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同志们！

彻底战胜德军的时刻已经临近了。但胜利任何时候也不会自行到来，它要在艰苦的战斗和顽强的劳动中争得。注定要灭亡的敌人正在把他们最后的力量投入战斗，拚命抵抗，以图逃脱严厉的惩罚。敌人正在使用而且将来还会使用最极端最卑鄙的斗争手段。因此，应当记住，我们的胜利愈是临近，我们的警惕性就应当愈高，我们对敌人的打击就应当愈有力。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红军建军二十七周年！

**为了庆祝苏维埃国家武装力量在过去一年取得的伟大胜利，
我命令：**

今天，2月23日，红军建军二十七周年纪念日，20时，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彼得罗扎沃茨克、塔林、里加、维尔纽斯、基什尼奥夫、第比利斯、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利沃夫，齐鸣礼炮20响。

我们的战无不胜的红军万岁！

我们的战无不胜的海军万岁！

我们强大的苏维埃祖国万岁！

在争取我们祖国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消灭德国侵略者!

**最高统帅
苏联元帅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177—181页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8号。1945年3月5日于莫斯科市)

关于《军事思想》杂志和《军事通报》杂志

《军事思想》杂志，从内容来看，不符合交给它的任务，即研究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问题，增进红军军官和将军的军事知识。

《军事思想》杂志对于战争、战略学和战役学、俄国名将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遗产等问题研究得不够，就是说，它正好忽略了它应该研究的基本问题。

该杂志国外栏或者是完全没有，或者是向读者介绍国外作者的文章而对其中不正确的甚至有害的观点也不加批判。

该杂志没有辟书评和图书介绍栏。

《军事思想》杂志编辑委员会不胜任交给它的任务，特别是因为它的许多成员都在前线，实际上没有参加编辑部的工作。

该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没有给杂志以应有的领导，也没有组织起能给红军创办一本有权威的指导性杂志的作者队伍。

《军事通报》杂志没有根据伟大卫国战争的经验对现代战斗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给予充分的注意。《军事通报》杂志很少介绍外国军队的战术和武器装备问题。

为了改进《军事思想》和《军事通报》两杂志的内容，提高它们

在研究军事理论、增进红军军官军事知识和教育红军军官方面的作用,——

我命令:

1.《军事思想》杂志作为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刊物,每月出版一期,篇幅是6个印张,发行15 000份。

该杂志的总的领导,由总参谋长担任。

《军事思想》杂志的基本任务规定如下:

研究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问题;

研究战争、武装力量建设、战略学和战役学等基本问题;

研究诸兵种的协同动作和合成军队指挥员的训练问题;

研究俄国名将和卓越军事家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遗产;

介绍和批判外国军事权威的观点;

研究外国军队及其战斗经验。

该杂志辟下列固定的专栏:军事历史栏,外国军事消息栏,书评和图书介绍栏。

该杂志的阅读对象为师级和师级以上的领导干部。

2.《军事通报》杂志作为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全军杂志,每月出版两期,篇幅是3个印张,发行5万份。

该杂志的总的领导,由红军步兵总监担任。

《军事通报》杂志的基本任务规定如下:

根据伟大卫国战争的经验来阐明现代战斗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诸兵种协同动作、战术训练和射击训练以及军人教育等问题;

介绍外国军队的编制、战术、武器装备和战斗经验。

该杂志辟下列固定的专栏:书评和图书介绍栏,军官文化生

活栏, 问题解答栏。

该杂志的阅读对象为团长以下的军官(包括团长在内)。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苏 联 元 帅 约·斯大林

译自《布尔什维克报刊资料汇编》
1945 年 第 2 版 第 2 册 第 361—
362 页

在签订苏联和波兰共和国 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时的讲话

(1945 年 4 月 21 日)

总统先生, 总理先生, 各位先生!

我认为我们刚才签订的苏波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有巨大的历史意义。

这个条约的意义, 首先在于它标志着苏波两国关系向着同盟和友好方面发展的根本转变, 这种转变是在这次抗德解放斗争进程中形成的, 而现在在这个条约中正式地固定下来了。

大家知道, 近 500 年来, 我们两国关系中充满了相互疏远、不友好和时常发生公开军事冲突的因素。这种关系削弱了我们两国而加强了德帝国主义。

这个条约的意义, 就在于它结束和埋葬了我们两国之间的这些旧关系, 奠定了用苏波同盟和友好的关系来代替不友好的旧关系的现实基础。

在最近 25—30 年内, 即在最近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德国人做到了利用波兰领土作为侵略东方的走廊和进攻苏联的跳板。这种情况所以能发生, 就是因为当时我们两国之间没有友好、同盟的关系。波兰旧日的统治者不愿同苏联建立同盟关系。他们宁肯奉行一种在德苏之间投机取巧的政策。结果当然是弄得……波兰被占

领了，波兰的独立被取消了，并且由于这一极其有害的政策，德军得以出现在莫斯科门前。

这个条约的意义，就在于它结束了这种在德苏之间投机取巧的极有害的旧政策，而代之以波兰同它的东邻同盟友好的政策。

这就是我们刚才签订的波苏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的历史意义。

因此，我们两国人民焦急地期待签订这个条约，这是毫不奇怪的。他们觉得，这个条约是新的民主的波兰独立的保证，是波兰强盛繁荣的保证。

不仅如此。这个条约还有巨大的国际意义。当我们两国未缔结同盟时，德国就有可能利用我们之间没有建立统一战线这一点，能够使波兰同苏联对立或者使苏联同波兰对立，从而把苏波两国各个击破。在我们两国建立同盟之后，情况就根本改变了。现在已经不能使我们两国相互对立了。现在我们两国已经有了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脉的这条反对共同敌人、反对德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现在可以坚信不移地说，德国的侵略势力已在东方受阻。无疑地，如果除这个东方的屏障以外再有一个西方的屏障，即我们两国同我们西方盟国的同盟，那就可以大胆地说，德国的侵略势力将受到约束，不容易再猖獗起来了。

因此，爱好自由的民族，首先是斯拉夫民族，都在焦急地期待签订这个条约，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们看得见，这个条约意味着加强联合国家反对在欧洲的共同敌人的统一战线。

因此，我相信，我们的西方盟国将会欢迎这个条约。

自由、独立、民主的波兰万岁！

**波兰的东邻——我们苏联万岁！
我们两国的同盟和友谊万岁！**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182—184页

最高统帅给作战部队的命令

（第 346 号。1945 年 4 月 27 日）

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部队和我们的**英美盟军部队**从东西两方夹击，截断了德军战线，于 4 月 25 日 13 时 30 分在德国中部**托尔高**市地域会师。这样一来，德国北部的德军和德国南部的德军就被分割开来了。

为了庆祝获得的胜利和纪念这一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今天，4 月 27 日，19 时，我们祖国首都**莫斯科**以我们祖国的名义，用 324 门火炮鸣放礼炮 24 响，向英勇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部队**和我们的**英美盟军部队**致敬。

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对德胜利万岁！

最高统帅 **约·斯大林**
苏联元帅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185 页

告红军和盟军书

(1945 年 4 月 27 日)

我代表苏联政府向你们，红军和我们盟国军队的指挥员和战士们讲话。

在欧洲进行解放战争的各盟国的战无不胜的军队击溃了德军，在德国境内会师了。

我们的任务和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彻底打垮敌人，迫使他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红军一定会彻底完成这一任务，彻底履行它对我国人民和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所担负的这个职责。

我谨向目前与苏军在德国境内并肩作战、并充满决心彻底履行自己职责的我们盟国的英勇部队致敬。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186 页

最高统帅命令

(第 20 号。1945 年 5 月 1 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将军同志们!

苏联劳动者们!

今天我国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今年，我们祖国各族人民是在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结束的情况下庆祝“五一”节的。

红军在莫斯科附近和列宁格勒附近、在格罗兹尼附近和斯大林格勒附近抗击敌军的艰苦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们的战无不胜的军队正在德国中部，在越过柏林很远的地方，在易北河一带歼灭敌人的武装力量。

在一个短时期内，波兰和匈牙利两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领土、奥地利很大一部分领土以及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都已解放了。

同时，红军占领了德帝国主义的巢穴东普鲁士，占领了波美拉尼亚，占领了勃兰登堡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德国首都柏林的主要区域，在柏林上空升起了胜利的旗帜。

由于红军进行这些进攻战斗，德军在 3—4 个月内，就有 80 多万官兵被俘，约 100 万官兵被打死。在这期间，红军部队缴获和击毁了敌人的飞机达 6 000 架，坦克和自行火炮达 12 000 辆，野战

炮 23 000 余门,以及大量其他种类的武器和装备。

应当指出,在这些战斗中,和红军并肩向共同敌人进行有效进攻的,有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师。

由于红军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德国统帅部不得不抽调几十个师到苏德战场上来,从而使其他战场的整个整个的地段完全空虚。这种情况有助于我们盟国的军队在西方展开有效的进攻。于是我们盟国的军队和红军就得以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打击德军,把德军分割成了两个相互隔绝的部分,使我军和盟军连接成了一条战线。

无可怀疑,这种情况标志着希特勒德国的灭亡。

希特勒德国的末日快到了。它的大部分领土已被红军和我们盟国的军队占领。德国已丧失了最重要的地区。留在希特勒分子手中的工业已不能供给德军以充分的武器、弹药和燃料。德军的人员后备已经耗尽。如果不算它的盟国日本,德国已经完全孤立,已经孤独无援了。

希特勒冒险家们为了找寻摆脱绝境的出路,用尽各种诡计,直到向盟国献媚,力图在盟国阵营中制造不和。希特勒分子的这些新的狡诈诡计,一定会完全破产。这些诡计只能加速德军的崩溃。

骗人的法西斯宣传使用种种胡言乱语来恐吓德国人民,说什么联合国军队要灭绝德国人民。联合国家的任务并不是消灭德国人民。联合国是要消灭法西斯主义和德国军国主义,严惩战争罪犯,并迫使德国人赔偿他们使其他国家遭到的损失。但是,只要德国和平居民忠诚执行盟国军事当局的要求,联合国并不触犯而且也不会触犯他们。

苏军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辉煌胜利，表明红军有强大的威力和高超的作战艺术。在战争进程中，我们祖国锻炼出了一支能够保卫我国人民的伟大社会主义成果和保障苏联国家利益的头等基干军队。

虽然苏联进行耗费极大的规模空前的战争已将近4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却在巩固和发展，各解放区遭到德国侵略者掠夺和破坏的经济正在顺利而迅速地恢复。这是我国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苏联知识分子、妇女和青年在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鼓舞和指引下英勇努力的结果。

德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世界大战快要结束了。希特勒德国的崩溃已指日可待。自命为世界统治者的希特勒头目们的一切幻想都已落空。身受致命重伤的法西斯野兽已经奄奄一息。现在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要彻底打死法西斯野兽。

红军和海军军人们！

现在正在向希特勒巢穴作最后一次冲击。你们要在结束战争的最后战斗中，树立作战技巧和勇敢的新榜样。你们要更猛烈地打击敌人，巧妙地突破敌人防御，追击并合围德国侵略者，不让他们喘息，直到他们停止抵抗为止。

你们是在祖国国土以外作战，要特别警惕！

你们要同从前一样高度地保持苏联军人的荣誉和尊严！

苏联劳动者们！

你们要用顽强的和孜孜不息的劳动来加强对前线的全面支援。要迅速医治我国在战争中受到的创伤，要更加加强我们苏维埃国家的实力！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将军同志们！

苏联劳动者们!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五一”节!

为了庆祝红军在前线获得的历史性胜利，以及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在后方取得的伟大成绩，为了庆祝国际劳动节，

我命令：

今天，5月1日，在各加盟共和国首都：莫斯科、基辅、明斯克、巴库、第比利斯、埃里温、阿什哈巴德、塔什干、斯大林纳巴德、阿拉木图、伏龙芝、彼得罗扎沃茨克、基什尼奥夫、维尔纽斯、里加、塔林，以及在英雄城市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齐鸣礼炮20响。

我们强大的苏维埃祖国万岁!

伟大的苏联人民，赢得胜利的人民万岁!

战无不胜的红军和海军万岁!

在争取我们祖国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为彻底粉碎希特勒德国，前进!

**最高统帅
苏联元帅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187—191页

告 人 民 书

(1945 年 5 月 9 日)

同志们,男女同胞们!

战胜德国这一伟大的日子来到了。法西斯德国被迫向红军和我们盟国的军队屈膝,承认自己已经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5 月 7 日,在兰斯签订了投降的初步议定书。5 月 8 日,德军统帅部的代表在柏林,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和苏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面前,签署了最终投降书,投降书自 5 月 8 日 24 时开始执行。

我们深知德国头目们的豺狼癖性,他们素来把条约和协定看成一纸空文,所以没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话。但是,今天从早晨起,德军为了履行投降书,已开始大批向我军缴械投降。这已经不是纸上空文。这是德国武装力量的真正投降了。的确,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一批德军仍然不肯投降。但我相信,红军会使他们觉醒过来的。

现在我们可以有充分根据地声明,彻底击败德国的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我国人民取得对德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的日子来到了。

我们为了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遭到的巨大牺牲,我国人民在战争进程中所经受的无数苦难,为了祖国而在后方和前线进

行的紧张劳动,这一切都没有白白过去,而是获得了完全战胜敌人的结果。各斯拉夫民族长期以来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终于以战胜德国侵略者和德国暴政而告终了。

从此,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伟大旗帜,将飘扬在欧洲上空。

三年前,希特勒公开宣称,支解苏联,把高加索、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以及其他地区从苏联割裂出去是他的任务。他直截了当地声明:“我们要消灭俄国,使它永远不能再站起来。”这是三年以前的事情。但是,希特勒的妄想本来就不能实现,战争的进程更把它打得粉碎。实际结果与希特勒分子的梦话正好相反。德国被彻底打败了。德军正在投降。苏联获得了胜利,虽然它既不打算支解德国,也不打算消灭德国。

同志们!伟大卫国战争的结果是我们完全胜利了。欧洲的战斗时期结束了。和平发展时期开始了。

我亲爱的男女同胞们!我向你们祝贺胜利!

光荣属于保卫了我们祖国的独立和赢得对敌胜利的我们的英勇的红军!

光荣属于我们伟大的人民,赢得胜利的人民!

在同敌人作战中牺牲了的、为了我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献出了生命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192—194页

最高统帅给红军和海军 部队的命令

(第 369 号。1945 年 5 月 9 日)

1945 年 5 月 8 日,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在柏林签署了德国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书。

苏联人民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的大卫国战争胜利地结束了,德国完全被击败了。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将军和元帅同志们!我向你们祝贺大卫国战争的胜利结束。

为了庆祝对德国的彻底胜利,在今天,5 月 9 日,胜利日,22 时,我们祖国首都莫斯科以祖国的名义,用 1 000 门火炮齐鸣礼炮 30 响,向获得这次辉煌胜利的英勇的红军部队和海军舰艇和部队致敬。

在保卫我们祖国的自由独立的战斗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战无不胜的红军和海军万岁!

最高统帅 约·斯大林
苏联元帅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195 页

致《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

值此苏联青年的战斗机关报《共青团真理报》创刊二十周年之际,谨向它致以敬礼。

在和平建设年代和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共青团真理报》都为我们祖国忘我服务的精神教育了苏联青年。

我相信,《共青团真理报》今后仍将卓有成效地用忠于列宁的党的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帮助青年掌握科学和文化成就,动员青年爱国力量为我们伟大祖国的进一步繁荣而奋斗!

约·斯大林

译自 1945 年 5 月 24 日《真理报》

在克里姆林宫 招待红军将领时的讲话

(1945 年 5 月 24 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最后再一次举杯。

我想举杯祝我们苏联人民,首先是俄罗斯人民健康。

我喝这杯酒,首先祝俄罗斯人民健康,因为他们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

我举杯祝俄罗斯人民健康,因为他们在这次战争中被公认为我们苏联各族人民的领导力量。

我举杯祝俄罗斯人民健康,不仅因为他们是起领导作用的人民,而且因为他们有清晰的头脑和坚忍不拔的性格和耐性。

我国政府犯过不少错误,我们在 1941—1942 年曾经历过危急万分的关头,那时我军实行退却,离开了我们亲爱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列宁格勒州、波罗的海沿岸、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的乡村和城市,那时离开这些地方,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是旁的人民,他们也许会对政府说:你们辜负了我们的期望,请走开吧,我们要另立一个能同德国媾和并保障我们的安宁的政府。但是俄罗斯人民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政府的政策正确,而甘愿承受牺牲,以保证把德国击溃。俄罗斯人民对苏联政府的这种信任,成了我们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而取得历史性的胜

利的决定性力量。

感谢俄罗斯人民的这种信任！

祝俄罗斯人民健康！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196—197页

致《少先队真理报》

在《少先队真理报》创刊二十周年的日子，谨向编辑部、少年通讯员们和报纸的读者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少先队真理报》帮助苏联儿童掌握知识，用我们伟大导师列宁遗训的精神教育少年先锋队员和小学生们。

祝《少先队真理报》在用忠于我们祖国的精神培养少年列宁主义者方面取得新的成就。

约·斯大林

译自 1945 年 6 月 10 日《真理报》

最高统帅命令

(第 370 号。1945 年 6 月 22 日)

为了庆祝伟大卫国战争中对德国的胜利,定于 1945 年 6 月 24 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作战部队、海军部队、莫斯科卫戍部队阅兵式——**胜利阅兵式**。

参加阅兵式的队伍,是各方面军混合团、国防人民委员部混合团、海军混合团、各军事院校和莫斯科卫戍部队。

胜利阅兵式由我的副手苏联元帅**朱可夫**检阅。

胜利阅兵式由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指挥。

阅兵式的总的组织领导,由莫斯科军区司令员兼**莫斯科市卫戍部队司令员阿尔捷米耶夫**上将担任。

最高统帅 **约·斯大林**
苏联元帅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198 页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胜利阅兵式 参加者时的讲话**

(1945年6月25日)

你们别以为我要讲一些什么不平凡的话。我的祝词是最普通的，最平常的。我想为那些头衔小、名位不足称道的人的健康干杯。为那些被认为是伟大国家机器的“螺丝钉”的人干杯，因为没有他们，我们大家，元帅们和方面军、集团军的司令员们，说得粗俗一点，就一文不值。只要有一个“螺丝钉”坏了，就都完了。我举杯祝贺那些普通的、平凡的、质朴的人们，祝贺那些使我们的伟大国家机器在科学、经济和军事各个部门都能积极活动起来的“螺丝钉”。他们的人数非常多，他们的名字数不胜数，因为这是几千万人。这是些质朴的人。关于他们谁也没有写过什么，他们没有名位，头衔很小，但是，他们就象基础支持着顶端那样支持着我们。我为这些人，我们的可敬的同志们的健康干杯！

译自 1945 年 6 月 27 日《真理报》

最高统帅给苏联红军和 海军部队的命令

（第 371 号。1945 年 7 月 22 日）

在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德国的伟大卫国战争中，我国海军是红军的忠实助手。

法西斯德国在反苏战争中，利用突然的进攻和拥有强大的军队，力图在短时期内击败我国陆军和海军。同时，德国人还想利用陆军力量，在自己的空军和海军协同动作下，取得制海权。

大家知道，无论在陆上或海上，德国战略家的计划都彻底失败了。红军和盟国一起彻底粉碎了希特勒军队，并迫使它投降了。

在红军防御和进攻时期，我国海军可靠地掩护了靠海的红军翼侧，严重打击了敌人的商船和航运，保证了我方交通线畅行无阻。苏联海军军人在战斗中表现了忘我的坚定和勇敢、高度的战斗积极性和军事技能。潜水艇和水面舰艇上的海军军人、海军飞行员、海军炮兵和海军陆战步兵，都继承并发扬了俄国海军历来的一切宝贵传统。

在波罗的海、黑海和巴伦支海，在伏尔加河、多瑙河和第聂伯河，苏联海军军人在这四年战争期间，在俄国海军光荣史册上写下了新的篇章。海军彻底履行了自己对苏维埃祖国的职责。

红海军战士、军士和军官同志们！

苏联人民希望自己的海军更加强大。我国人民将为海军建造新的战舰和新的基地。海军的任务就是要不倦地培养和提高海军干部,充分领会卫国战争中的战斗经验,进一步提高海上素养和加强自己队伍的纪律性和组织性。

我向你们祝贺苏联海军节!

苏维埃强国的海军和它的英勇海军军人万岁!

最高统帅 **约·斯大林**
苏联大元帅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199—200页

最高统帅命令

(第 51 号。1945 年 8 月 19 日于莫斯科市)

在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德国的伟大卫国战争中，我国空军光荣地履行了自己对祖国的职责。

我们祖国光荣的雄鹰们在激烈的空战中，击溃了嚣张一时的德国空军，从而保证了红军的行动自由，并使我国居民免遭敌机的轰炸。

他们同全体红军一起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给了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我们英勇的空军的巧妙行动经常协助地面部队取得胜利，帮助达到了彻底击溃敌人的目的。

在捍卫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的战斗中，苏联飞行员提供了不少忘我的坚定、勇敢和真正英雄主义的范例。他们给伟大卫国战争史写下了许多光辉的篇章。

苏联人民，赢得胜利的人民，理应为自己的飞行员的战斗荣誉而自豪。

在战争进程中，男女工人、工程师和职员们的劳动热情以及苏联航空设计师们的发明和天才，使我们能用成千上万架优良的作战飞机来武装我国空军，这些飞机歼灭了敌人，使我们伟大的苏联人民获得了不朽的光荣。

飞行员、领航员和空中射击员、无线电员、机械兵和军械人员、

机械员、技术员和工程师、军官和将军同志们！航空工业中的工人、工程师、职员和设计师们！

我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空军节！

为了纪念空军节和向我国光荣的空军军人祝贺，**我命令：**

今天，8月19日，20时，在我们祖国首都莫斯科，以祖国的名义，用224门火炮齐鸣礼炮20响，向我们英勇的空军军人致敬。

最高统帅 约·斯大林
苏联大元帅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201—202页

告 人 民 书

(1945 年 9 月 2 日)

同志们!

男女同胞们!

今天, 9 月 2 日, 日本的政府代表和军事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日本在海陆两方面已被彻底击败, 四面八方被联合国家的武装力量所包围, 它承认自己已被战败而放下了武器。

在这次世界大战前夜, 形成了世界法西斯主义和世界侵略势力的两个策源地: 西方的德国和东方的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是它们。使人类和人类文明濒于毁灭的是它们。西方的世界侵略势力策源地在四个月前已被消灭, 结果是德国被迫投降。过了四个月, 东方的世界侵略势力策源地也被消灭, 结果是德国的主要盟国日本也被迫在投降书上签字了。

这就是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

现在我们可以说, 为奠定全世界和平所必需的条件已经赢得了。

应当指出, 日本侵略者不仅使我们的盟国——中国、美国和英国受到了损失。他们也使我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因此, 我们自己还单独有一笔账要同日本算清。

日本早在 1904 年日俄战争时, 就开始侵略我国。大家知道,

在1904年2月,当日俄双方还在继续谈判的时候,日本就利用沙皇政府的虚弱,突然地、背信弃义地、不宣而战地进犯我国,攻击旅顺口地域的俄国舰队,想击毁几艘俄国军舰,从而为自己的舰队造成有利的形势。它果然击毁了俄国三艘头等军舰。值得注意的是,37年以后,日本又对美国丝毫不差地重复使用了这种背信弃义的手段,它在1941年袭击了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击毁了这个国家好几艘战列舰。大家知道,当时俄国在对日战争中是战败了。于是日本就利用沙皇俄国战败的机会,从俄国夺去了萨哈林岛南部,盘踞千岛群岛,并从而封锁了我国在东方通向大洋的一切出口——因而也封锁了通向苏联堪察加半岛和苏联楚科奇半岛各港口的一切出口。显然,日本是想把俄国的整个远东夺去。

可是,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行动并不止于此。1918年,当我国已建立苏维埃制度之后,日本又利用当时英、法、美对苏维埃国家的敌对态度,依靠它们来侵犯我国,占领了远东,蹂躏我国人民,掠夺苏联远东达4年之久。

不仅如此。1938年日本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①附近的哈桑湖地域侵犯我国,目的是要包围符拉迪沃斯托克,第二年日本又在另一地域,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哈勒欣河^②一带进犯,企图冲进苏联领土,截断我国西伯利亚铁道干线,并把远东从俄国割裂出去。

诚然,日本在哈桑湖与哈勒欣河地域的进攻被苏军粉碎了,使日本人受到很大的耻辱。1918—1922年日本的武装干涉也被顺利地粉碎,日本占领者从我国远东地区被驱逐出去了。但是,1904

① 即海参崴。——编者注

② 即哈拉哈河。——编者注

年日俄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并且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 40 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

这就是说，萨哈林南部和千岛群岛将归苏联所有，从此以后，这些地方不再是使苏联同大洋隔绝的工具，不再是日本侵犯我国远东的基地，而是苏联同大洋直接联系的工具，是我国防御日本侵略的基地。

为了胜利，我们苏联人民没有吝惜过力量和劳动。我们经受了艰苦的岁月。可是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我们胜利了。从此，我们可以认为我们祖国已经摆脱了西方德国入侵和东方日本入侵的威胁。盼望已久的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到来了。

亲爱的男女同胞们，我向你们祝贺伟大的胜利，祝贺战争的胜利结束，祝贺全世界和平的到来！

光荣属于取得对日胜利的苏、美、中、英武装力量！

光荣属于保卫了我们祖国的荣誉和尊严的我国远东部队和太平洋舰队！

光荣属于我国伟大的人民，赢得胜利的人民！

在争取我们祖国的荣誉和胜利的战斗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愿我们祖国繁荣昌盛！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203—206 页

最高统帅给红军和海军 部队的命令

(第 373 号。1945 年 9 月 3 日)

1945 年 9 月 2 日, 日本代表在东京在日本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

苏联人民同我们盟国一起对最后一个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战争胜利结束了。日本已被击败而投降了。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将军和元帅同志们! 我向你们祝贺对日战争的胜利结束。

为了庆祝战胜日本, 在今天, 9 月 3 日, 对日**胜利节**, 21 时, 我们祖国首都**莫斯科**, 以祖国的名义, 用 324 门火炮齐鸣礼炮 24 响, 向赢得这一胜利的英勇红军部队和海军舰艇与部队致敬。

在争取我们祖国的荣誉和胜利的战斗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祝我们红军和海军永远强大!

最高统帅 **约·斯大林**
苏联大元帅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207 页

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 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1946年2月9日)

同志们!

从上届最高苏维埃选举到现在,已经8年了。这是一个富有极重大事件的时期。前4年是苏联人民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紧张工作的年份。后4年包括了同德国侵略者和日本侵略者进行战争的事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变。战争无疑是过去这一时期的主要事情。

如果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偶然发生的,或者是由于某些国务活动家犯了错误而发生的,那就不正确了,虽然错误确实是有过的。其实,这次战争是世界各种经济和政治势力在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者不止一次地说过,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含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并不是平稳地均衡地向前发展,而是经历着危机和战祸的。问题在于,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通常经过相当时期就要剧烈破坏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均势,那些认为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就要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状况,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以求有利于自己。因而,资本主义世界就分裂为两个敌对的营垒而进行战争。

如果这些国家能根据它们的经济实力用和平协商的办法来定期重分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那也许能避免战祸。但是这在现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

所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第一次危机的结果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第二次危机的结果就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当然不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恰恰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按其性质来说，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不同的。要知道，主要的法西斯国家，即德日意三国，在侵犯同盟国之前，就把自己国内最后一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残余消灭净尽，在自己国内建立了残酷的恐怖制度，蹂躏了各小国的主权和自由发展原则，宣布侵占他国领土是自己的国策，并公开声明他们要取得世界霸权，要在全世界推行法西斯制度，而且轴心国又以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中部地区的事实，表明他们决心把奴役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这种口头威胁变成现实。因此，反轴心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它一开始就带有反法西斯战争、解放战争的性质，它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恢复民主自由。苏联参加反轴心国的战争，只能加强——并且确实加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的和解放的性质。

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苏美英以及其他爱好自由国家的反法西斯同盟，而这个同盟后来在粉碎轴心国武装力量方面起了决定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和性质，就是这样。

现在，大概谁都承认：这次战争确实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各国人民生活中的一种偶然现象；它实际上成了各国人民为保护自身生存而进行的战争，因此它也就不可能是一场速决的闪击战。

对于我国说来，这次战争是我们祖国历史上最残酷最艰苦的战争。

但是这次战争并不只是一件可诅咒的事情。它同时又是考验和检查人民一切力量的伟大学校。这次战争暴露了后方和前线的一切真情实况，无情地揭掉了遮住各个国家、各国政府以及各个政党真面目的种种掩盖物，使它们不戴面具、毫无粉饰地登上舞台，显露出它们的所有短处和长处。这次战争可以说是对我们苏维埃制度，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政府以及对我们共产党举行了一次考试，对他们的工作做了一个总结，好象是对我们说：看吧，这就是你们的人和组织，这就是他们的活动和经历，——请仔细查看查看他们，并按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以报偿吧。

这就是这次战争的好处之一。

这个情况，对我们选民说来，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迅速和客观地评价党及其人物的活动，并作出正确的结论。要是在别的时期，就必须研究和分析党的代表人物的演说和报告，把他们的言论和行为两相对照，作出总结等等。这就需要进行一番复杂而困难的工作，并且还不能担保这中间不犯什么错误。现在却是另一种情形了，因为战争已经结束，而战争本身已经检查了我们各个组织和领导人的工作并且作出了总结。现在我们要把事情弄清楚并做出正确的结论，就容易得多了。

那么，战争的总结究竟怎样呢？

这里有一个主要的总结，所有其他的总结，都是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作出来的。这个总结就是，战争的结局是敌人失败，而我国和我们的盟国得胜。我们以彻底打败敌人结束了战争，——这就是这次战争的主要总结。但是这个总结太一般了，所以我们决不

能以此为限。当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史无前例的战争中打败敌人，这就意味着争得了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这完全是正确的。但是这毕竟还是一个一般的总结，我们也就不能满足于这一点。为了认识我们这次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就要更具体地来考察这个问题。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认识我们这次所取得的对敌人的胜利，从我国内部力量的状况和发展来看，这次胜利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我们的胜利说明：获得胜利的是我们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苏维埃社会制度在战火中胜利地经住了考验，并证明它具有充分的生命力。

大家知道，在外国报刊上有人不止一次地断言，说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注定要失败的“冒险试验”，说苏维埃制度在实际生活中没有根基，是肃反委员会机关强加于人民的一座“纸牌搭的小房子”，说只要有人从外面稍微推一下，这座“纸牌搭的小房子”就会完全倒塌。

现在我们可以说，这次战争驳倒了外国报刊上这一切毫无根据的断语。战争表明，苏维埃社会制度是从人民中间生长起来并受到人民极力拥护的真正的人民的制度，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有充分生命力的和稳固的社会组织形式。

不仅如此。现在所讲的已经不是苏维埃社会制度有没有生命力的问题，因为经过这次战争的明显的教训以后，任何一个抱怀疑态度的人都不敢再怀疑苏维埃社会制度的生命力了。现在所讲的是，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

第二，我们的胜利说明：获得胜利的是我们的苏维埃国家制度，我们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经住了战争的一切考验，证明它是富有生命力的。

大家知道，外国报界的著名人士不止一次地声称，说苏维埃多民族国家是一个“人工造成而不合实际的建筑物”，说一旦发生某种麻烦，苏维埃联盟的崩溃就是不可避免的，说苏维埃联盟一定会遭到奥匈帝国那样的命运。

现在我们可以说，这次战争驳倒了外国报刊上这些毫无根据的议论。战争表明，苏维埃多民族国家制度胜利地经住了考验，它在战争时期更加巩固了，证明它是具有充分生命力的国家制度。这些先生不懂得，拿我们的国家和奥匈帝国相提并论，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我们的多民族国家并不是在挑起民族间的猜忌和敌视的那种资产阶级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在苏维埃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苏维埃制度和资产阶级制度相反，它培植着我国各族人民相互友爱和兄弟般合作的感情。

不过，经过这次战争的教训以后，这些先生再也不敢否认苏维埃国家制度的生命力了。现在所讲的已经不是苏维埃国家制度有没有生命力的问题，因为它的生命力是不容置疑的。现在所讲的是，苏维埃国家制度是多民族国家的模范，苏维埃国家制度是把民族问题和各民族合作的问题解决得比其他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好的国家组织体系。

第三，我们的胜利说明：获得胜利的是苏维埃的武装力量，是我们的红军，它以英雄的气概经受了战争的一切艰难困苦，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军队，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现在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一致承认红军胜任自己所担负

的伟大使命。但是在五六年以前，也就是在战争前夜，却不是这种情形。大家知道，当时外国报界的许多著名人士和外国许多公认的军事权威都不止一次声言，说红军的状况是非常令人怀疑的；说红军装备差，而且没有真正的指挥人员；说红军士气低得不成样子；说红军也许适于防御，但是决不适于进攻；说红军一遭到德军打击，就会象“泥足巨人”一样坍塌。这种议论不仅在德国有，而且在法国、英国和美国也有。

现在我们可以说，战争驳倒了这些毫无根据的可笑的议论。战争表明，红军并不是“泥足巨人”，而是拥有完全现代化的装备、非常老练的指挥人员以及优良的精神素质和战斗素质的现代头等军队。不要忘记，正是红军彻底粉碎了不久前还使欧洲各国军队胆战心惊的德国军队。

应当指出，这些评论红军的“批评家”愈来愈少了。不但如此，目前外国报刊上出现了愈来愈多的评论，赞扬红军的优良素质，赞扬红军的战士和指挥员的技能，赞扬红军战略、战术十分完善等等。这是很自然的。既然红军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附近，在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附近，在基辅和基洛夫格勒附近，在明斯克和博布鲁伊斯克附近，在列宁格勒和塔林附近，在雅西和利沃夫附近，在维斯瓦河和涅曼河畔，在多瑙河和奥得河畔，在维也纳和柏林附近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当然也就不能不承认红军是很值得人们学习的头等军队了。

我们就是这样来具体地认识我国这次取得的对敌人的胜利的。

这次战争的总结，基本上就是这样。

假如以为不必预先使全国作好积极防御的准备，就能够获得

这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那就错了。假如以为在一个很短的期间,在3—4年以内就能够作好这种准备,那同样是错误的。假如以为我们获得胜利只是由于我国军队勇敢,那就更加错误了。没有勇敢精神,固然不能获得胜利。但是单靠勇敢精神,也还打败不了军队众多、装备优良、军官训练有素和供应良好的敌人。要能经住这样一种敌人的打击,并且给以回击,最后彻底打败敌人,那么除了我国军队那种无比的勇敢精神以外,还必须有完全现代化的并且是数量充足的装备,以及组织得很好的并且也是数量充足的供应。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备,而且是在数量上充分具备这样一些基本的东西:制造武器、装具和企业设备用的**金属**,维持企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用的**燃料**,制作军服用的**棉花**以及供给军队的**粮食**。

是不是可以肯定地说,我国在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已经拥有为基本上满足这些需要所绝对必需的物质条件呢?我认为是可以这样肯定地说的。为了准备这一宏伟的事业,必须实现发展国民经济的三个五年计划。正是这三个五年计划帮助我们创造了这些物质条件。无论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在1940年,我国在这方面的情形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比1913年要好几倍。

我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拥有怎样的物质条件呢?

为了帮助你们弄清这点,我现在把共产党在使我国做好积极防御方面所做的准备工作,简略地报告一下。

如果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1940年的材料来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1913年的材料比较一下,我们便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

在1913年,我国生产了422万吨生铁,423万吨钢,2900万吨**煤**,900万吨**石油**,2160万吨**商品谷物**,74万吨**籽棉**。

这就是我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拥有的物质条件。

这就是旧俄可以用来进行战争的经济基础。

至于说到 1940 年,那么,我国在这一年里生产了 1 500 万吨**生铁**,即几乎等于 1913 年的 4 倍;1 830 万吨**钢**,即等于 1913 年的 4.5 倍;16 600 万吨**煤**,即等于 1913 年的 5.5 倍;3 100 万吨**石油**,即等于 1913 年的 3.5 倍;3 830 万吨**商品谷物**,即比 1913 年多 1 700 万吨;270 万吨**籽棉**,即等于 1913 年的 3.5 倍。

这就是我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拥有的物质条件。

这就是苏联可以用来进行战争的经济基础。

可见,差别是极大的。

生产上这样一种空前的增长,决不能认为是国家由落后达到进步的一种简单平常的发展。这是使我们祖国由落后国变成先进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一个飞跃。

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是从 1928 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开始,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的。在这个时期以前,我们必须恢复被破坏的工业,医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所造成的创伤。如果同时还注意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四年完成的,而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工作在第四年度就被战争打断了的情形,那么,我们国家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一共只花了十三年左右的时间。

不能不承认,实现这样宏伟的事业,十三年的时间是一个非常短的期限。

其实,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当时这些数字一公布,就引起外国报刊纷纷议论。朋友们认为是出现了“奇迹”,而不怀好意的人却说五年计划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和“肃反委员会的把戏”。但是,既然世界上根本没有奇迹,而肃反委员会又不是那样神通广大,竟能把社会发展的规律取消,于是,国外的“舆论”也就只好承认事

实了。

共产党是依靠什么政策来保证我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创造这些物质条件的呢？

首先，就是依靠了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政策。

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方法，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方法根本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由于轻工业同重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也较容易，所以在那里，轻工业成了工业化的头一个对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轻工业积累了利润并把这些利润集中于银行，这才轮到重工业，积累才开始逐渐流入重工业，造成重工业发展的条件。但这是一个需要数十年之久的长期过程，在这一时期内只得等待轻工业发展并在没有重工业的情形下勉强凑合着。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道路。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党记住了列宁的话：没有重工业，便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没有重工业，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因此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这件事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是可以克服的。在这方面，工业国有化和银行国有化大大帮助了我们，使我们能够迅速地聚集资金，并使它流入重工业。

毫无疑问，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在这样短的期间把我国变成工业国。

其次，就是依靠了农业集体化政策。

为了消灭我国农业方面的落后状况，并向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粮、更多的棉花等等，必须由小农经济过渡到大经济，因为只有

大经济才能采用新技术,利用农艺上的一切成就,并提供更多的商品产品。但是,大经济有两种,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是集体的。共产党决不能走上资本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这不仅是出于原则上的考虑,而且因为这条道路需要有一个过长的发展过程,而且先要使农民破产,使他们变成雇农。因此,共产党走上了农业集体化的道路,走上了把农户联合为集体农庄,以扩大农业规模的道路。结果表明,集体化的方法是最进步的方法,这不仅是因为它并不要让农民破产,而特别是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在几年以内就使全国各地布满了能够采用新技术、利用农艺上的一切成就和向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产品的巨大集体农庄。

毫无疑问,如果不实行集体化政策,我们就不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消灭我国农业历来落后的状况。

不能说,党的政策没有遇到过抵制。不但那些始终厌弃一切新事物的落后的人,而且党内有许多著名的党员,也一贯把党拉向后退,千方百计想把它拉到“通常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去。托洛茨基派和右派所干的一切反党阴谋诡计,他们在暗中破坏我国政府的措施这方面所做的全部“工作”,都是在追求一个目的,即破坏党的政策并阻碍工业化和集体化的事业。但是党既没有在一些人的威胁面前屈服,也没有在另一些人的号叫面前屈服,而是坚定不移地、不顾一切地前进。党的功绩就在于它并没有迁就落后分子,不害怕逆流而进,始终保持着领导力量的地位。毫无疑问,共产党如果没有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那就不能坚持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

共产党是不是正确利用了这样造成的物质条件,来发展军工生产并供给红军必需的装备呢?

我认为它是做到了这点,并且做得极有成效。

如果不算战争的第一年,当时工业由于往东撤退而阻碍了军工生产的发展,那么,党在战争其余三年中所取得的成绩,使它不仅能供给前线足够数量的火炮、机枪、步枪、飞机、坦克和弹药,而且还有了储备。同时,大家知道,我们的装备在质量上,不仅不亚于德国,而且一般说来,甚至超过了它。

大家知道,我国的坦克工业在战争的后三年,每年平均生产了3万多辆坦克、自行火炮和装甲车。

其次,大家知道,我国的航空工业在同一时期,每年生产了将近4万架飞机。

大家还知道,我们的枪炮工业在同一时期,每年生产了将近12万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将近45万挺轻重机枪,300多万枝步枪,以及约200万枝自动枪。

最后,大家知道,我们的迫击炮工业在1942—1944年期间,每年平均生产了将近10万门迫击炮。

自然,我们同时生产了相应数量的炮弹、各种迫击炮弹、航空炸弹,以及步枪和机枪子弹。

大家知道,例如,单是在1944年内就生产了24000多万颗炮弹、炸弹和迫击炮弹,74亿发子弹。

红军的武器和弹药的供给情形大体上就是如此。

可见,这种情况同我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供给情况是不相同的,当时前线经常缺乏火炮和炮弹,军队作战没有坦克和飞机,三个士兵用一枝步枪。

至于说到红军的粮食和军服的供给,谁都知道,前线在这方面不仅一点也不缺乏,甚至还有必要的储备。

我国共产党在战前和战时的工作情况就是如此。

现在我来稍微谈谈共产党在最近将来的工作计划。大家知道，这一计划已在最近期间就要批准的新的五年计划中载明。新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我国遭受战祸的区域恢复起来，使工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然后较大地超过这个水平。至于最近期间就将废除配给制就更不用说了，将来要特别注意扩大日用品生产，用不断降低所有商品价格的办法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广泛建设各种科研机构，使科学能够发挥它的力量。

我不怀疑，如果我们对我国的科学家们给以应有的帮助，他们在最近期间就不仅会赶上，而且会超过国外科学的成就。

至于较长时期的计划，党打算造成国民经济的蓬勃的新高涨，使我们能够把我国工业水平提高到，譬如说，战前水平的3倍。我们必须使我国工业每年能生产生铁达5000万吨，钢达6000万吨，煤达5亿吨，石油达6000万吨。只有这样才可以认为，我们祖国有了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这大概还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也许还要长些。但这是可能做到的，而且也是我们应当做到的。

这就是我关于我国共产党不久以前的活动以及它将来的工作计划的一个简短报告。

你们的任务就是来裁判一下：共产党过去和现在的工作正确到什么程度，它能不能做得更好些。

据说，对胜利者是不能裁判的^①，对他们不应批评，不应检查。

^① “对胜利者是不能裁判的”这句话出自一则俄国故事。据说俄军名将亚·瓦·苏沃洛夫1773年在俄土战争中违反彼·亚·鲁勉采夫元帅的命令进攻图尔图凯获胜，因此被交付军事法庭裁判。叶卡捷琳娜二世得知后说了这样一句话。——编者注

这话不对。对胜利者可以而且应当加以裁判，可以而且应当加以批评和检查。这不仅对事业有补益，而且对胜利者本人也有补益，这样就会少骄傲一点，多谦逊一点。我认为选举运动就是选民对作为执政党的我国共产党进行裁判的法庭。选举结果便是选民的判决。如果我国共产党害怕批评和检查，那它就没有多大价值了。共产党愿意接受选民的判决。

在竞选时，共产党并不是单独活动。它是和非党人士结成联盟进行选举的。从前，共产党员对非党人士和无党无派是有点不信任的。这是因为当时各种资产阶级团体在选民面前假若不戴上假面具，便很不利，所以它们往往用无党无派的旗子来掩饰。从前就是如此。现在我们的时代不同了。现在有一个叫作苏维埃社会制度的壁垒把非党人士和资产阶级隔开了。这个壁垒同时又把非党人士和共产党员联合成为一个由苏维埃人所组成的共同的集体。他们生活在共同集体里，一起为加强我国实力而斗争，一起为我们祖国的自由和尊严而流血战斗，一起锻造并锻造出了我国对敌人的胜利。他们之间的区别，不过是一些人入了党，而另一些人没有入党罢了。但这是形式上的区别。重要的是两者都在创造一个共同的事业。因此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的联盟是一件自然而至为重要的事情。

最后，请允许我对你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提出我作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你们可以不必怀疑，我一定竭力不辜负你们的信任。

译自《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
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1954年版第10—24页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8号。1946年2月23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同志们！今天，我们庆祝红军建军二十八周年。

红军是在其力量全盛的时候，是在战胜了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而誉满天下的时候，迎来二十八周年的。红军在经过长期严酷的战争之后，已经成了一支具有优良的精神素质和战斗素质，拥有完全现代化的装备和经验丰富、久经锻炼的指挥人员的头等军队。

在对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的战争中，红军胜任自己所担负的伟大使命，证明自己是苏维埃国家利益的忠实可靠的保卫者。我们的战士、军官和将军没有辜负人民的信任，光荣地完成了祖国所赋予的职责。苏联人从亲身的体验中确信，红军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我国各族人民理所当然地为自己的军队，为自己军队的胜利而自豪，并将永远铭记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烈士。

红军所以取得如此卓越的胜利，首先因为它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它保卫人民的利益。苏联人热爱自己的军队，并经常关心加强这支军队的实力。这种关心在伟大卫国战争的艰难岁月里表现得格外明显。为了前线，为了胜利，我国全体人民夜以继日地辛勤劳动。如果没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忘我劳动，如果没有他们

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援,红军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

其次,红军所以取得胜利还因为有共产党对它的关怀和教育。

苏联人民遵照伟大列宁的遗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我们祖国由落后国变成先进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从而为红军战胜敌人创造了一切必要的物质条件。

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年代里,共产党把我们国家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把人民和军队的全部力量引向一个总的目标——歼灭敌人。共产党向苏联军人阐明战争的意义和目的,教育他们热爱祖国,提高他们的士气,培养他们的大无畏精神和纪律观念。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战争胜利结束后,苏联人民进入了一个新的和平的经济发展阶段。现在,苏联人民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在巩固已经夺得的阵地之后,继续前进,争取新的经济高涨。我们不能仅仅巩固这些阵地,因为这会使我们停滞不前。我们要继续前进,为国民经济新的高涨创造条件。我们要在最短期限内医治好敌人给我国所造成的创伤,把国民经济恢复到战前的发展水平,以便在最近期间大大超过这一水平,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并进一步加强苏维埃国家的军事经济实力。

在新的条件下,红军要警惕地保卫苏联人民的和平建设劳动,可靠地保障苏联的国家利益,确保我们祖国的边界不受敌人侵犯。

在战争时期,红军战士、军官和将军的主要任务是夺取胜利,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力量和知识去彻底粉碎敌人。在和平时期,全体战士、军官和将军的首要任务则是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政治知识。全体红军战士和军士要刻苦学习军事,熟练手中武器,圆满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军官善于训

练和教育部属。在战争年代，红军的军官和将军出色地掌握了在战场上统率军队的本领；现在，所有的军官和将军应当娴熟地掌握在和平环境里训练和教育军队的本领。

伟大卫国战争使军事学有了许多新的发展。战场上取得的战斗经验，对于军队的训练和教育来说，是一座丰富的宝库。因此，整个军队训练应当以善于汲取以往这场战争的经验为基础。这一经验同样必须全面地应用于军官的理论教育以及进一步发展苏联军事科学。应当记住，军事在不断地、迅速地发展着。红军应当不仅跟上军事的发展，而且推动它前进。

红军拥有头等的武器装备，这是它的战斗实力的基础。任务就在于要精通这些武器装备，熟练地掌握它，并象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护它。

没有严格的纪律和军人秩序，军队的训练和教育就不可能取得成绩，因此，维护纪律和秩序是军队全体人员首要的职责。维护纪律和秩序的骨干，首先应当是我军各级指挥干部，包括军士长和军士——红军战士最直接的首长和教育者。

红军的战士、军官和将军为人民、为祖国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但是不能因此而骄傲自满或贪图安逸。不居功骄傲，在各自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把全部力量 and 知识贡献给红军的建设，这就是对每个苏联军人的要求。

红军和红海军的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同志们！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的共产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红军建军二十八周年。

为了庆祝红军节，**我命令：**

今天，2月23日，在我们祖国首都莫斯科，在各加盟共和国首

都，以及在英雄城市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齐鸣礼炮 20 响。

我们战无不胜的红军万岁！

我们战无不胜的海军万岁！

我们光荣的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苏联人民万岁！

我们强大的祖国万岁！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苏联大元帅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6年)》
1952年版第 43—46 页

给拉辛同志的复信

尊敬的拉辛同志：

您1月30日关于克劳塞维茨的信和您的论战争和军事学术的简短提纲收到了。

(1)您问：列宁评价克劳塞维茨的原理是否已经过时了？

据我看，问题提得不对。

这样提出问题，可能使人以为，列宁分析过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学说和军事著作，对它们作出了军事上的评价，并遗留给我们一系列我们应当遵循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指导原理。这样提问题是不正确的，因为列宁关于克劳塞维茨军事学说及其著作的这样一些“原理”，事实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列宁和恩格斯不同，他并不认为自己精通军事。不仅在过去，在十月革命以前，而且后来在十月革命以后，一直到国内战争结束时，他都不认为自己精通军事。在国内战争时期，列宁曾责成我们这些当时还是中央委员会内的年轻同志“周密地研究军事”。至于说到他自己，他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他研究军事已经晚了。实际上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列宁在自己对克劳塞维茨的评论和对克劳塞维茨的著作的评论中没有涉及纯粹的军事问题，诸如：军事战略和战术及其相互关系问题，进攻和退却之间、防御和反攻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等等。

既然如此，那么，是什么东西使列宁对克劳塞维茨感到兴趣，列宁又为什么要赞扬他呢？

列宁赞扬克劳塞维茨，首先是因为当时已享有军事问题权威声誉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克劳塞维茨，在自己的著作里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原理：战争同政治有直接的联系，政治产生战争，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列宁在这里所以要引证克劳塞维茨，是为了再一次揭穿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和其他人的社会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①

其次，列宁赞扬克劳塞维茨，是因为克劳塞维茨在自己的著作里证实了一个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是正确的原理：在某些不利的条件下，退却是和进攻同样合理的斗争形式。列宁在这里所以要引证克劳塞维茨，是为了再一次揭穿那些不承认退却是合理的斗争形式的“左派”共产主义者。^②

可见，列宁不是作为一个军人，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来对待克劳塞维茨的著作的，列宁感兴趣的是克劳塞维茨著作中的那些说明战争同政治的联系的问题。

所以，在批判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学说这件事情上，列宁没有任何指示束缚住我们这些列宁的继承者，限制我们的批评自由。

由此可见，您把美舍利亚科夫同志批评克劳塞维茨军事学说的论文（见1945年《军事思想》第6—7期）估计为“反列宁主义的攻击”，估计为对列宁所作评价的“修正”，都是文不对题的。

（2）我们是不是应当根据事情的实质来批判克劳塞维茨的军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5、284页和第24卷第368—369页以及其他各页。——编者注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27卷第306—307页。——编者注

事学说呢？是的，应当。我们必须从我们事业的利益和现代军事科学的观点出发，不仅批判克劳塞维茨，而且批判毛奇、施利芬、鲁登道夫、凯特尔和德国军事思想的其他代表人物。近 30 年来，德国曾两次把流血最多的战争强加于世界，而两次它都被打败了。这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这是不是说明，不仅整个德国，而且连它的军事思想也是经不起考验的？无疑是这样的。任何人都知道，全世界的军人，包括我们俄国军人在内，曾如何尊重德国的军事权威。是否必须消除这种不应有的尊重呢？必须消除。为此就需要批判，特别需要我们方面，即德国的战胜者方面的批判。

至于说到克劳塞维茨个人，他当然是过时了的军事权威。实际上，克劳塞维茨是战争的**工场手工业**时代的代表，然而现在是处在战争的**机器**时代。毫无疑问，机器时代需要新的军事思想家。现在还到克劳塞维茨那里去求教，那就可笑了。

不对那些著名权威人士的过时了的原理和见解进行批判的分析，就不能进步，就不能推进科学。不仅对于军事权威人士是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也是如此。恩格斯有一次说过，在 1812 年时期的俄国统帅中，巴克莱-德-托利将军是唯一值得注意的一个统帅。^①当然，恩格斯是错了，因为库图佐夫作为统帅来说，无可争辩地要比巴克莱-德-托利高明得多。但就在我们这时代，也可能有人口沫飞溅地坚持恩格斯这一错误的见解。

我们在进行批判时，不应该遵循经典作家的个别原理和见解，而应遵循列宁当年所作的著名指示：

“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4 卷第 92—93 页。——编者注

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卷第492页）^①

我们对待军事权威人士，更必须采取这样的态度。

（3）至于说到您的论战争和军事学术的简短提纲，因为它是概略性的，所以我只能提出一般的意见。提纲里哲学和抽象原理太多。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语法和逻辑的术语听起来刺耳。关于军事科学的党性问题提得太粗浅。那些对斯大林的过分的歌颂也非常刺耳——简直使人读不下去。提纲里缺少**论反攻**（不要同反冲击混为一谈）的部分。我所说的反攻是指在敌人进行了顺利的、但没有产生决定性结果的进攻以后进行的反攻，在敌人进攻期间，防御方面聚集力量，转入反攻，并使敌人遭受决定性的失败。我认为，组织得好的反攻是一种很有意义的进攻类型。您是个历史学家，似应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古代的安息国人就已经懂得这样的反攻了，当时安息国人曾引诱罗马的统帅克拉苏及其军队深入本国腹地，然后转入反攻，并消灭了他们。我们的天才统帅库图佐夫也很懂得这一点，他用准备周密的反攻，打垮了拿破仑和他的军队。

约·斯大林

1946年2月23日

译自1947年2月《布尔什维克》
第3期第6—8页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3页。——编者注

附 录

拉辛给斯大林的信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如果可能，恳请您给我解释下列问题：

1. 列宁评价克劳塞维茨的原理是否已经过时了？
2. 应该怎样对待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遗产？

当我读了我军指导性军事理论杂志《军事思想》1945年6—7期上登载的美舍利亚科夫中校的《克劳塞维茨和德国军事思想》一文之后，我对上述问题就搞不清楚了。

1944年我在伏罗希洛夫高等军事学院曾不得不反对该院政治副院长巴兹上校的言论，他竟说什么应当修正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我觉得，《军事思想》上的这篇文章事实上是把巴兹上校的论点付诸实行。编辑部刊登这样的文章，是否做得对呢？

该杂志的这篇论文对克劳塞维茨著作的原则性评价，可以归结为下列几个论点：

- “在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中，反动观点占优势”（第93页）；
- “不懂得战争的本性和实质”（第110页）；
- “落后于当时的军事理论思想”（第110页）。

大家知道，列宁称克劳塞维茨是熟谙军事问题的著作家之一，是伟大的军事著作家之一，是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之一，认为他的基本思想现在已经成了一切肯思考的人的思想。（《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

第18卷第197、249页,第22卷第511页,第30卷第333页)①

可见,列宁对克劳塞维茨的评价同《军事思想》杂志上这篇论文对他所作的评价是恰恰相反的。

在对克劳塞维茨的评价方面,如果对的是美舍利亚科夫,而不是列宁,那么,要对这种问题表示意见,该文作者的威望未免太低了。当然他并没有公开地反对列宁。而正因为是这样,这篇论文会使我们的军官和将军们是非莫辨,从而给红军带来危害。

如果美舍利亚科夫对这个问题的论断是不对的,那么就不能不认为他的这篇论文是反列宁主义的攻击,而这是必须给以反击的。

我认为,这篇论文在政治上的害处就在这里。

可见这不是“纯粹军事理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因此我才决定写信给联共(布)中央,写信给您,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您在一个命令中指出了军事理论杂志《军事思想》的严重缺点,给它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具体任务。而关于上述问题的详尽指示,对于执行这一命令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对于最先进的苏联军事科学,特别是我们的军事历史科学来说,对待过去的理论遗产的态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那里看到这方面的清楚而明确的方针——充分领会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批判地重新探讨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387页)②“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同上)③这一段话也完全适用于军事文化。

例如,法西斯分子曾利用资产阶级文化的成果来达到其最野蛮残暴的目的,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我们并不因此就抛弃资产阶级文化的成果。我们要利用资产阶级文化的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同时,我们也并不机械地吸收资产阶级科学的全部知识,我们批判地重新探讨这一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73、626页,第3卷第537、71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4卷第347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348页。——编者注

切,并在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基础上,把科学推向前进。

人所共知,有两种基本的批判形式:

低级形式——找出断章取义之处、唯心主义、机械论、反动观点等等,然后整个地加以抛弃;

高级形式——批判地重新探讨,在不正确的形式里面寻找出有积极内容的内核,保存它并进一步发展它。

发现一般的缺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机械论)是要容易得多,它对于批判的初级阶段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批判地重新探讨就困难得多了,需要寻找合理的内核,保存并发展它。“采金者翻挖了许多土地,而只能找到一点点金子。”(赫拉克利特语)

我们的军事理论思想正应当处在这个批判的高级阶段上,而美舍利亚科夫的论文却把我们拉向后退。我认为,这篇论文在理论上的害处就在这里。

我认为,该文的作者不了解克劳塞维茨,因此他才劝我们抛弃这种军事理论遗产,这是否正确?可是恩格斯说得对:“一个人评论每一个哲学家,不是根据他活动中永恒的、进步的东西,而是根据必然是暂时的、反动的东西,根据他的**体系**,——这种人还是少说为佳。”(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1年7月1日)》)①

把克劳塞维茨军事理论著作中全部积极的东西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等等一起抛弃,是否正确呢?

美舍利亚科夫是不是重复了已被联共(布)中央斥责过的波克罗夫斯基的错误呢?

或者,也许是由于有了伟大卫国战争的经验,对克劳塞维茨的全部军事理论著作,都得给以和列宁全然不同的另一种评价呢?

正确地了解所有这些问题,对于研究军事学术史的人来说是重要的。我花费了将近15年的时间准备出版八卷本的著作,其中前面5卷大致已经弄好了。战前出版的两卷主要是根据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的指示作了根本的修改。

从附送的第1卷的提纲和全书的序言,可以看清我的著作是从什么出发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23页。——编者注

的。很明显，如果作为这部作品出发点的材料是错误的，那就会使全部著作变得毫无价值。已有人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这部书红军是很需要的。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恳请您给我解释这些问题。

教授、上校 叶·拉辛

1946年1月30日

译自 1947年2月《布尔什维克》
第3期第4—6页

在这里，完全是粗暴的和侮辱性的诽谤。现在的民主波兰是由一些杰出的人物领导的。他们事实上证明了他们能够保卫自己祖国的利益和尊严，而这是他们前任所做不到的。邱吉尔先生有什么根据，说现在的波兰领导者可以容许任何外国代表在自己国家内实行“统治”呢？邱吉尔先生在这里所以诽谤“俄国人”，难道不是企图在波兰和苏联关系方面散播纠纷的种子吗？……

邱吉尔先生不满意波兰使自己的政策转变到与苏联友好和建立同盟关系方面去。曾经有一个时期，在波兰和苏联的相互关系中，主要的成分是冲突和矛盾。这种情况使邱吉尔先生之类的国务活动家有可能玩弄这些矛盾，在保护波兰不受俄国人侵犯的借口下，把波兰抓到自己手里，用俄国和波兰发生战争的怪影来吓唬俄国，而保持自己仲裁者的地位。但是，这样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因为波兰与俄国的相互敌视关系，已被两国的友好关系所代替，波兰，现在的民主波兰再也不愿成为外国人手里的玩物。我觉得正是这一情况使得邱吉尔先生大发脾气，使得他粗鲁地、毫无分寸地攻击波兰。不让他再坐收渔利了，这可不是开玩笑……

至于说到邱吉尔先生因为波兰收回过去被德国人占领的领土而扩大了波兰西部边界，所以攻击苏联，那么，在这里我觉得他显然是颠倒是非。大家知道，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决定，是在三大国柏林会议上根据波兰的要求通过的。苏联曾屡次声明，它认为波兰的要求是正当的和正义的。很有可能，邱吉尔先生不满意这一决定。可是，当邱吉尔先生不惜用毒箭反对俄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时，他为什么向自己的读者掩盖这一决定是柏林会议一致通过的，以及投票赞成这一决定的不仅有俄国人，而且还有英国人和美国人这一事实呢？邱吉尔先生为什么要混淆人们的视听呢？

在这里，完全是粗暴的和侮辱性的诽谤。现在的民主波兰是由一些杰出的人物领导的。他们事实上证明了他们能够保卫自己祖国的利益和尊严，而这是他们前任所做不到的。邱吉尔先生有什么根据，说现在的波兰领导者可以容许任何外国代表在自己国家内实行“统治”呢？邱吉尔先生在这里所以诽谤“俄国人”，难道不是企图在波兰和苏联关系方面散播纠纷的种子吗？……

邱吉尔先生不满意波兰使自己的政策转变到与苏联友好和建立同盟关系方面去。曾经有一个时期，在波兰和苏联的相互关系中，主要的成分是冲突和矛盾。这种情况使邱吉尔先生之类的国务活动家有可能玩弄这些矛盾，在保护波兰不受俄国人侵犯的借口下，把波兰抓到自己手里，用俄国和波兰发生战争的怪影来吓唬俄国，而保持自己仲裁者的地位。但是，这样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因为波兰与俄国的相互敌视关系，已被两国的友好关系所代替，波兰，现在的民主波兰再也不愿成为外国人手里的玩物。我觉得正是这一情况使得邱吉尔先生大发脾气，使得他粗鲁地、毫无分寸地攻击波兰。不让他再坐收渔利了，这可不是开玩笑……

至于说到邱吉尔先生因为波兰收回过去被德国人占领的领土而扩大了波兰西部边界，所以攻击苏联，那么，在这里我觉得他显然是颠倒是非。大家知道，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决定，是在三大国柏林会议上根据波兰的要求通过的。苏联曾屡次声明，它认为波兰的要求是正当的和正义的。很有可能，邱吉尔先生不满意这一决定。可是，当邱吉尔先生不惜用毒箭反对俄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时，他为什么向自己的读者掩盖这一决定是柏林会议一致通过的，以及投票赞成这一决定的不仅有俄国人，而且还有英国人和美国人这一事实呢？邱吉尔先生为什么要混淆人们的视听呢？

在这里，完全是粗暴的和侮辱性的诽谤。现在的民主波兰是由一些杰出的人物领导的。他们事实上证明了他们能够保卫自己祖国的利益和尊严，而这是他们前任所做不到的。邱吉尔先生有什么根据，说现在的波兰领导者可以容许任何外国代表在自己国家内实行“统治”呢？邱吉尔先生在这里所以诽谤“俄国人”，难道不是企图在波兰和苏联关系方面散播纠纷的种子吗？……

邱吉尔先生不满意波兰使自己的政策转变到与苏联友好和建立同盟关系方面去。曾经有一个时期，在波兰和苏联的相互关系中，主要的成分是冲突和矛盾。这种情况使邱吉尔先生之类的国务活动家有可能玩弄这些矛盾，在保护波兰不受俄国人侵犯的借口下，把波兰抓到自己手里，用俄国和波兰发生战争的怪影来吓唬俄国，而保持自己仲裁者的地位。但是，这样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因为波兰与俄国的相互敌视关系，已被两国的友好关系所代替，波兰，现在的民主波兰再也不愿成为外国人手里的玩物。我觉得正是这一情况使得邱吉尔先生大发脾气，使得他粗鲁地、毫无分寸地攻击波兰。不让他再坐收渔利了，这可不是开玩笑……

至于说到邱吉尔先生因为波兰收回过去被德国人占领的领土而扩大了波兰西部边界，所以攻击苏联，那么，在这里我觉得他显然是颠倒是非。大家知道，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决定，是在三大国柏林会议上根据波兰的要求通过的。苏联曾屡次声明，它认为波兰的要求是正当的和正义的。很有可能，邱吉尔先生不满意这一决定。可是，当邱吉尔先生不惜用毒箭反对俄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时，他为什么向自己的读者掩盖这一决定是柏林会议一致通过的，以及投票赞成这一决定的不仅有俄国人，而且还有英国人和美国人这一事实呢？邱吉尔先生为什么要混淆人们的视听呢？

在这里，完全是粗暴的和侮辱性的诽谤。现在的民主波兰是由一些杰出的人物领导的。他们事实上证明了他们能够保卫自己祖国的利益和尊严，而这是他们前任所做不到的。邱吉尔先生有什么根据，说现在的波兰领导者可以容许任何外国代表在自己国家内实行“统治”呢？邱吉尔先生在这里所以诽谤“俄国人”，难道不是企图在波兰和苏联关系方面散播纠纷的种子吗？……

邱吉尔先生不满意波兰使自己的政策转变到与苏联友好和建立同盟关系方面去。曾经有一个时期，在波兰和苏联的相互关系中，主要的成分是冲突和矛盾。这种情况使邱吉尔先生之类的国务活动家有可能玩弄这些矛盾，在保护波兰不受俄国人侵犯的借口下，把波兰抓到自己手里，用俄国和波兰发生战争的怪影来吓唬俄国，而保持自己仲裁者的地位。但是，这样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因为波兰与俄国的相互敌视关系，已被两国的友好关系所代替，波兰，现在的民主波兰再也不愿成为外国人手里的玩物。我觉得正是这一情况使得邱吉尔先生大发脾气，使得他粗鲁地、毫无分寸地攻击波兰。不让他再坐收渔利了，这可不是开玩笑……

至于说到邱吉尔先生因为波兰收回过去被德国人占领的领土而扩大了波兰西部边界，所以攻击苏联，那么，在这里我觉得他显然是颠倒是非。大家知道，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决定，是在三大国柏林会议上根据波兰的要求通过的。苏联曾屡次声明，它认为波兰的要求是正当的和正义的。很有可能，邱吉尔先生不满意这一决定。可是，当邱吉尔先生不惜用毒箭反对俄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时，他为什么向自己的读者掩盖这一决定是柏林会议一致通过的，以及投票赞成这一决定的不仅有俄国人，而且还有英国人和美国人这一事实呢？邱吉尔先生为什么要混淆人们的视听呢？

再其次，邱吉尔先生硬说：“原来在所有这些东欧国家中无足轻重的共产党，已获得了大大超过其党员人数的非凡势力，力图到处建立极权控制，几乎在所有这些国家内，警察政府都占上风，直到现在，除捷克斯洛伐克以外，在这些国家里没有任何真正的民主。”

大家知道，现今在英国管理国家的是一个政党——工党，而且在野党都没有参加英国政府的权利。这就是邱吉尔先生所谓的真正的民主主义。在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匈牙利，都是由几个政党——四个到六个政党组成的联盟来管理国家，而且，如果反对派是比较诚实的，就保证有参加政府的权利。这就是邱吉尔先生所谓的极权主义、暴政和警察制度。为什么？有什么根据？不要期待邱吉尔先生能够回答。邱吉尔先生不懂得，他关于极权主义、暴政和警察制度的叫嚣，使他陷于多么可笑的境地。

邱吉尔先生希望波兰由索森科夫斯基和安德斯管理，南斯拉夫由米哈伊洛维奇和巴维利奇管理，罗马尼亚由什蒂尔贝伊公爵和拉德斯库管理，匈牙利和奥地利由哈布斯堡王朝的某一个国王来管理，如此等等。邱吉尔先生想使我们相信，这些替法西斯看家的老爷们能保证“真正的民主主义”。邱吉尔先生的“民主主义”就是这样的。

当邱吉尔先生谈到共产党影响在东欧日益增长时，他是在接近真理。可是还须指出，他说的不完全确实。共产党的影响不仅在东欧增长起来，而且几乎在欧洲一切以前被法西斯主义统治的国家（意大利、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芬兰），或者被德国、意大利、匈牙利侵占过的国家（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希腊、苏联等），都增长起来了。

不能认为共产党人的影响的增长是偶然的，这完全是一种合

乎规律的现象。共产党人的影响之所以增长，是因为在法西斯主义统治欧洲的艰难年代里，共产党人是反对法西斯制度，争取各国人民自由的可靠的、勇敢的、奋不顾身的战士。邱吉尔先生在他的演说中有时候也提到“出身并不高贵的普通人”，并且老爷式地拍拍他们的肩膀，假装是他们的朋友。可是，这些人并不象初看上去那样普普通通。他们这些“普通人”有他们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政策，他们也知道如何保卫自己。正是他们，千百万这样的“普通人”，把票投给工党，而使邱吉尔先生和他的党在英国落选了。正是他们，千百万这样的“普通人”，孤立了欧洲反动派，孤立了主张同法西斯主义合作的人，而支持左派的民主政党。正是他们，千百万这样的“普通人”，在斗争和反抗法西斯的烈火中考验了共产党人，认定共产党人是完全值得人民信任的。共产党人在欧洲的影响，就是这样增长起来的。历史发展规律就是这样。

当然邱吉尔先生不喜欢事变这样发展，他正在敲起警钟，诉诸于武力。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也不喜欢在俄国出现苏维埃制度。他当时也曾敲过警钟，组织过“14国”讨伐俄国的进军，目的是想使历史车轮往后倒退。但是，结果是历史比邱吉尔的干涉更强大有力，邱吉尔先生的唐·吉珂德式的行为，使他当时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我不知道，邱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否能够组织新的进军来讨伐“东欧”。但是，如果他们能够组织起来——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千百万“普通人”都在保卫和平事业——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将象26年前一样被击败。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6年)》
1952年版第47—53页

答美联社记者埃迪·吉尔摩问

问：您认为作为维持国际和平的工具的联合国有怎样的意义？

答：我认为联合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是维持和平和国际安全的重要工具。这一国际组织的力量在于，它是建立在各个国家平等的原则上，而不是建立在某些国家统治另一些国家的原则上。如果联合国在将来仍能继续保持这种平等原则，那么，毫无疑问，它将在保证普遍和平和安全方面起巨大的良好的作用。

问：许多国家中的许多人现在担心发生战争，据您看来，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答：我深信，任何民族，任何民族的军队都不希望有新的战争发生，他们要和平，他们力图保障和平。这就是说，“现在担心发生战争”不是由这方面所引起的。我认为“现在担心发生战争”，是由于某些政治集团从事宣传新战争，从而散播纠纷和不信任种子的行动所引起的。

问：爱好自由的各国政府，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宁，目前应该做些什么？

答：必须由各国社会人士和统治集团组织广泛的反宣传来反对新战争的宣传者和保障和平，必须使新战争宣传者的任何言论都受到社会人士和报界的应有的驳斥，从而必须及时地揭露战争

挑拨者,不让他们滥用言论自由来反对和平的利益。

1946 年 3 月 22 日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6年)》

1952 年版第 54—55 页

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命令

(第7号。1946年5月1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同志们！ 军官和将军同志们！
苏联劳动者们！

今天，我们是自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结束以来，第一次在以对敌艰苦斗争中的重大牺牲和损失为代价赢得的和平生活的条件下，过“五一”国际劳动节的。

一年以前，红军在柏林上空升起了胜利的旗帜，彻底击败了法西斯德国。在对德战争胜利结束以后4个月，帝国主义日本也放下了武器。由国际反动势力准备并由主要法西斯国家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的彻底胜利而告终了。

法西斯主义及世界侵略势力的主要策源地被粉碎和消灭，使世界各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各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得到了广泛发展。人民群众受到战争教训以后，懂得了不能把国家的命运托付给那些追求自私的狭隘阶层的反人民目的的反动统治者。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各国人民不愿意再按照旧的方式生活下去，正在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到自己手中，建立民主秩序，积极地进行反对反动势力、反对新战争挑拨者的斗争。

世界各国人民不愿战争的灾难重演，他们坚持不懈地为巩固和平和安全而斗争。

苏联过去在粉碎法西斯主义的事业中起了卓越的作用，并完

成了伟大的解放使命,它现在站在为和平和安全而斗争的前列。

由苏联从法西斯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各国人民,已有可能在民主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国家生活,实现自己的历史愿望。在这一道路上,他们得到苏联方面的兄弟般的援助。

全世界已有可能不仅确信苏维埃国家的威力,而且确信以承认一切民族平等和尊重它们的自由和独立为基础的苏联政策的正义性。毫无疑问,苏联今后也将忠于自己的政策——和平和安全的政策,各民族平等和友好的政策。

战争结束以后,苏联就着手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人在热情奋发地从事为战争所中断了的和平建设劳动。

苏联最高苏维埃所通过的1946—1950年苏联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的法令,为我们祖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为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为我国物质福利和文化的提高展开了新的前景。

我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把新五年计划当作是符合自己切身利益的战斗纲领。可以期望,苏联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将不遗余力地不仅完成而且超额完成新的五年计划。

在开展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忘记国际反动派的阴谋诡计。他们在策划新战争。必须记住伟大的列宁的指示:转向和平劳动之后,我们还应经常保持警惕,并且象爱护眼珠一样爱护我国的武装力量和国防力量。

苏联的武装力量——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履行了他们对祖国的职责。

现在,我们的武装力量面临着同样重要的任务——警惕地保卫已赢得的和平和苏联人民的建设性劳动,做苏联利益的可靠的支柱。

这一光荣的任务,只有在我国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战士和指挥员的军事素养和作战艺术进一步提高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胜利完成。

苏联武装力量必须在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在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发展的基础上,日益提高自己的军事学术水平。

毫无疑问,我们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将光荣地完成赋予他们的任务。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同志们! 军官、将军同志们!

男女工人同志们! 男女农民同志们! 智力劳动者们!

红军复员军人们!

我代表政府和共产党向你们致敬并祝贺“五一”节!

为了纪念劳动人民的国际节日,

我命令:

今天,5月1日,在我们祖国首都莫斯科,在各加盟共和国首都以及在利沃夫、柯尼斯堡,在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在旅顺口,在英雄城市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齐鸣礼炮20响。

我们英勇的武装力量万岁!

我们光荣的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苏联人民万岁!

我们强大的苏维埃祖国万岁!

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 约·斯大林
苏联大元帅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6年)》
1952年版第60—63页

答《星期日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 亚历山大·沃斯先生问

(1946年9月17日书面提出的问题)

问：现在全世界都在不负责任地纷纷谈论“新战争”的危险，您是否相信有这种实际危险呢？如果有这样的危险存在，应当采取什么步骤来防止战争呢？

答：我不相信“新战争”的实际危险。

现在发出“新战争”叫嚣的，主要是军界和政界的情报人员和他们在文官中的为数不多的拥护者。他们所以需要这种叫嚣，至少是为了：（一）用战争的怪影来恐吓他们的缔约伙伴中的某些天真的政治家，以便帮助自己的政府从缔约伙伴那里获取更多的让步；（二）使本国在一个时期内难以缩减军事预算；（三）阻止军队复员，并以此来预防本国失业人数的迅速增加。

必须把现时所进行的“新战争”叫嚣，同目前并不存在的“新战争”实际危险严格区别开来。

问：您是否认为英国和美国在有意地对苏联造成“资本主义包围”？

答：我不认为英国和美国的统治集团能够“对苏联”造成“资本主义包围”，即使他们想这样做的话，但是这一点我不能够断言。

问：用华莱士先生最近演说中的话来说，英国、西欧和美国是

否可以相信苏联的对德国的政策不会变成俄国人图谋反对西欧的工具？

答：我认为苏联利用德国反对西欧和美国是不会有 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不会有 的事情，不仅因为苏联同英法之间有反对德国侵略的互助条约，同美国之间有三大国波茨坦会议决议，而且因为这种利用德国反对西欧和美国的政策违背苏联根本的民族利益。

简单地说，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在于使德国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我想，德国的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是确立巩固的持久和平的最重要保证之一。

问：有人说西欧共产党的政策是“由莫斯科指使的”，您对这种指责有什么意见？

答：我认为这种指责是荒谬的，是从破产了的希特勒—戈培尔武库中借来的。

问：尽管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您是否相信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有长期友好合作的可能性，是否相信华莱士演说中说到的两种制度间的“友好竞赛”？

答：我无条件地相信。

问：据我了解，当工党代表团在这里时，您曾表示相信苏联和英国之间有可能建立友好关系。什么东西能够帮助建立英国广大人民群众所热烈盼望的这种友好关系呢？

答：我确实相信苏联和英国之间能够建立友好关系。加强两国之间政治、贸易和文化的联系，将大大促进这种关系的建立。

问：您是否认为全部美军最迅速地从中国撤退，是未来的和平所迫切需要的？

答：是的，我认为是这样的。

问：您是否认为美国在事实上垄断原子弹是对和平的主要威胁之一？

答：我不认为原子弹象某些政治活动家爱那么说的那样厉害。原子弹是用来吓唬神经衰弱的人的，但它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因为对决定战争的命运来说，原子弹是完全不够的。当然，垄断原子弹秘密会造成威胁，但是对付这点至少有两种办法：（一）对原子弹的垄断不会继续很久；（二）原子弹的使用将被禁止。

问：就苏联而言，您是否认为，当苏联继续向共产主义迈进时，它同外部世界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会减少？“一个国家内的共产主义”是否可能？

答：我不怀疑，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仅不会减少，甚至能够增加。

“一个国家内的共产主义”，特别是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内，是完全可能的。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6年)》
1952年版第68—70页

答美国合众社社长休·贝利先生问

(1946年10月23日接到的问题)

1. 问：国务卿贝尔纳斯上星期五在广播演说中说苏美关系已日益紧张，您是否同意这种意见？

答：不同意。

2. 问：如果存在这种日益紧张的关系，您是否可以指出产生这种紧张的一种或几种原因，以及用哪些主要方法来消除它？

答：由于已答复上一问题，这一问题就不成立了。

3. 问：您是否认为目前的谈判将导致和约的签订，从而使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是盟国的各国人民之间建立起诚挚的关系并消除前轴心国家发动战争的危险？

答：我对此寄予希望。

4. 问：不然的话，在曾经是这场伟大战争中的盟国的各国人民之间建立这种诚挚的相互关系，有哪些主要障碍？

答：由于答复了上一问题，这一问题就不成立了。

5. 问：俄国对于南斯拉夫不签署对意和约的决定的态度如何？

答：南斯拉夫不满意是有根据的。

6. 问：您认为目前对全世界和平的最严重的威胁是什么？

答：是新战争挑拨者，首先是邱吉尔及其在英国和美国的同

谋者。

7. 问：如果这一威胁一旦发生，那么为了避免新战争，世界各国人民应当采取哪些步骤？

答：应当揭露和制止新战争挑拨者。

8. 问：联合国是不是各小国保持完整的保障？

答：现在还难说。

9. 问：您是否认为在最近的将来，德国的四个占领区应当实行统一的经济管理，以便使德国恢复为和平经济的单位，从而减轻四大国占领的负担？

答：需要恢复的不仅是德国的经济统一，而且还有政治统一。

10. 问：您是否认为目前有可能成立一个由德国人自己管理的中央行政机关，由盟国监督，使外长会议有可能制定出对德和约？

答：是的，我认为有可能。

11. 问：根据今年夏季和秋季在德国各占领区进行的选举来判断，您是否确信德国在政治上正沿着民主道路发展，因而它将来有成为和平国家的希望？

答：我暂时还不相信这一点。

12. 问：您是否认为，正象某些人士所提议的那样，应当把准许德国保留的工业的水平提高到达成协议的水平之上，以便使德国的生活较有保障？

答：是的，我认为应当。

13. 问：为了防止德国重新成为对世界的军事威胁，除了现有的四大国计划之外，还应当做些什么？

答：应该在实际上根除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残余，并使它彻底民主化。

14. 问：是否应该允许德国人民恢复自己的工业和商业，使她们有可能自给？

答：是的，这是应该的。

15. 问：据您的意见，波茨坦会议决议是否已在执行？如果没有执行，需要做些什么才可以使波茨坦宣言变成有效的工具？

答：没有一贯执行，特别是在德国民主化方面。

16. 问：您是否认为在四国外长谈判时和联合国理事会会晤时滥用了否决权？

答：不，我不这样认为。

17. 问：依照克里姆林宫的意见，盟国捉拿德国次要战犯归案的工作应做到什么程度？是否认为纽伦堡的决定已为这种行动提供了十分可靠的基础？

答：做得愈彻底愈好。

18. 问：俄国是否认为波兰西部边界是永久的？

答：是的，是这样认为。

19. 问：苏联对英国军队驻在希腊的看法怎样？它是否认为英国应当供给目前希腊政府以更多的武器？

答：这是不必要的。

20. 问：在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奥地利驻有多少俄国军队，据您的意见，为了保障和平这些军队应当驻扎到什么时候？

答：在西方，即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波兰，苏联现在共驻有 60 个师（步兵师和装甲坦克师都在内）。这些师大部分没有满员。在南斯拉夫没有苏联军队。再经过两个月，即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今年 10 月 22 日关于最后一批复员的

命令实行后,将在上述国家留下苏军 40 个师。

21. 问: 苏联政府对于美国军舰驻在地中海的态度怎样?

答: 无所谓。

22. 问: 目前俄国和挪威的贸易协定的前途怎样?

答: 现在还难说。

23. 问: 芬兰在支付赔款后,能否仍为自给的国家,是否存在某种意见,主张重新审查赔款计划,以便加速芬兰的复兴?

答: 问题提得不对。芬兰在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完全自给的国家。

24. 问: 苏联和瑞典以及其他国家的贸易协定,对于苏联的恢复工作有什么意义? 为完成这一伟大任务,您愿意得到何种外援?

答: 苏联和瑞典签订的协定,是对各国经济合作的一种贡献。

25. 问: 俄国是否还愿意取得美国的借款?

答: 愿意。

26. 问: 俄国是否已有自己的原子弹或任何类似的武器?

答: 没有。

27. 问: 您对于作为战争工具的原子弹或类似的武器有什么看法?

答: 我在大家都知道的对沃斯先生所提的问题的答复中,已对原子弹作了自己的估计。

28. 问: 按照您的意见,怎样才能最好地管制原子能? 这种管制是否应当建立在国际的基础上? 为了建立有效的管制,各大国应当在何种程度上牺牲自己的主权?

答: 需要严格的国际管制。

29. 问: 恢复俄国西部被严重破坏的区域需要多少时间?

答：6—7年或更多的时间。

30. 问：俄国是否准许在苏联领空开辟商业性航线？俄国是否打算在互惠的基础上将自己的航线扩展到其他大陆？

答：在某种情况下这是可能的。

31. 问：您的政府对占领日本的想法怎样？您是否认为在现有的基础上占领日本是有成绩的？

答：成绩是有的，但是可以达到更好的成绩。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6年)》
1952年版第71—75页

和埃利奥特·罗斯福的谈话^①

1. 问：您是否认为，象美国这样的民主制有可能同象苏联现存的那样的共产主义的国家管理形式在这个世界上和平地并肩相处，而且任何一方也不会企图干涉另一方的内部政治事务？

答：当然可能。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完全可以实现的。在战时最紧张的时候，政体的不同并没有妨碍我们两国联合起来并战胜我们的敌人。在和平时期，维持这种关系就更加可能了。

2. 问：您是否认为，联合国能不能成功，取决于苏、英、美之间在根本的政策问题和目的上能否达成协议？

答：是的，我认为是这样。在许多方面，联合国这个组织的命运取决于三大国能否达到协调。

3. 问：大元帅是否认为，我们两国达成关于互相交换工业品和原料的广泛经济协定会是走向普遍和平的重要步骤？

答：是的，我认为这会是走向建立普遍和平的重要步骤。我当然同意这点。国际贸易的扩大，会在许多方面有助于我们两国

^① 埃利奥特·罗斯福是美国总统富·德·罗斯福的儿子。他于 1946 年 12 月 21 日访问了斯大林，并于 1947 年 1 月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展望》双周刊上发表了一篇记述这次访问的文章。本篇是塔斯社根据这篇文章摘发的斯大林对他提出的 12 个问题的回答。——编者注

之间的良好关系的发展。

4. 问：苏联是否赞成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刻建立有所有联合国国家的武装力量参加的、可以立刻开到任何一个和平受着军事行动威胁的地方去的国际警察部队呢？

答：当然赞成。

5. 问：如果您认为原子弹应该由联合国加以管制，那么，联合国要这样做，是否应当对一切研究机关和制造各种武器的工业企业，对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发展进行检查，建立管制呢？（此处埃利奥特·罗斯福在括号里指出：“斯大林立刻问我：‘是所有的国家吗？’我说：‘是的，但具体地说，俄国在原则上是否同意这种计划？’”）^①

答：当然同意。根据平等的原则，对俄国不应当有任何例外。俄国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应该服从同样的检查和管制的规则。（此处罗斯福在括号里指出：“他的回答没有丝毫的犹豫。甚至也没有提到保留否决权的问题。”）

6. 问：您是否认为，召集另一次三大国会议来讨论目前威胁着普遍和平的一切国际问题是有益的？

答：我认为应当召开的不是一次会议，而是几次会议。如果召开几次会议，那它们将有助于达到非常有益的目的。（此处罗斯福在括号里指出：“这时，我的妻子问道，他是否认为这种会议会促进在各有关政府较下级的代表之间建立较紧密的关系。她还问，是否由于战时的历次会议而达到了这样的状况。斯大林向她笑了笑回答说：‘这没有丝毫疑问。战时的会议和所达到的结果，大大地

^① 括号里的话是塔斯社加的。下同。——编者注

帮助了建立较下级人员之间的合作。’”)

7. 问：先生，我知道您在研究其他国家存在的许多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我想问您，您是否认为美国 11 月举行的选举表明人民已不相信罗斯福的政策，转而相信他的政敌的孤立主义政策？

答：我不那么熟悉美国人民的国内生活，但是，我觉得，选举已表明现在的政府是在糟蹋已故总统所建立的道义上的和政治上的资本，这样它就便利了共和党人获得胜利。（此处罗斯福在括号里指出：“大元帅是用非常着重的语气回答我的下一个问题。”）

8. 问：您认为在罗斯福逝世以后，我们两国之间友好联系和相互了解减弱的原因是什么呢？

答：我认为，如果这一问题所指的是美国人民和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了解，那就一点也没有恶化，相反地，关系是改善了。至于两国政府的关系，是发生了误会。先是有点恶化，然后就有人大肆喧嚷，叫喊什么今后关系将更加恶化，但是在这里，我看不出任何可怕的东西，足以破坏和平或引起军事冲突。任何一个大国，即使它的政府力图这样做，在目前也不可能派出大量军队去反对另一个盟国，另一个大国，因为在目前，没有本国的人民，谁也不能打仗，而人民是不愿意打仗的。人民已经疲于战争。此外，也没有任何合理的目的，可以用来为新战争辩解。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应该去打仗，所以，美国政府的某些代表谈论我们两国的关系恶化，我看不出会有什么可怕。根据这些理由，我认为新战争的威胁不是实际存在的。

9. 问：您是否赞成在我们两国之间广泛地交换文化和科学性质的情报，您是否也赞成彼此交换大学生、艺术家、科学家和教授？

答：当然赞成。

10. 问：美国和苏联是否应当制定一个共同的长期援助远东各国人民的政策？

答：我认为如果可能的话，这是有益的。无论如何，我国政府在远东问题上愿意和美国实行共同的政策。

11. 问：如果美苏之间达成一项借贷办法的协定，这种协定会给美国经济带来长期的利益吗？

答：这种信贷办法无疑会对美苏双方都有利。（此处罗斯福在括号里指出：“然后我提了一个使欧洲许多国家显然感到不安的问题。”）

12. 问：德国的美、英占领区没有实行肃清纳粹主义的计划，这个事实是不是造成苏联政府不安的重大原因？

答：不，这不是造成严重不安的原因，但我们的共同计划的这一部分没有实行，苏联当然感到不快。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6年）》
1952年版第76—80页

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命令

(第 10 号。1947 年 2 月 23 日于莫斯科市)

陆海军士兵和军士同志们！陆海军军官和将军同志们！

今天我国庆祝苏军建军二十九周年。

伟大的列宁缔造的苏联军队走过了光荣的道路。苏联军队的全部历史是发扬英雄气概、忘我地为祖国服务和英勇地履行自己的军人职责的生动范例。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苏联军队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获得的卓越胜利上面。祖国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军队的英雄业绩。

苏联军队是在我国全体人民为了完成消除战争后果、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而紧张劳动的条件下，庆祝自己的二十九周年纪念日的。

我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胜利地完成了新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计划，现在正在为进一步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建设和生产发展的速度，为工农业的新高涨，为增加日用品的产量，为苏联科学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而忘我地奋斗。

这次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选举的结果是，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的联盟完全胜利了。这说明苏联社会的一致是牢不可破的，这说明全体苏联人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政府和共产党的周围，并决心使自己的祖国进一步繁荣。

在平时的条件下,苏联军队在完成规定的战斗训练任务时,也必须不断前进,在战斗训练和政治教育方面力争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巩固和平的事业、保证我们祖国安全的事业,要求我们这样做。

战争中需要什么,军队就训练什么,这在过去和现在始终是苏联武装力量进行战斗训练的指导原则。经验证明,现代战争要求军队具有高度的战斗素质和精神素质,具有良好的军事和政治素养,能熟练掌握技术兵器,能密切协同动作以及具有很大的耐力。

我陆军、空军和海军全体人员的任务在于,每天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作战艺术,继续深入研究战争经验,并且要善于运用这种经验。

陆海军的将军和军官必须不断丰富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的理论知识,以及掌握在平时训练中十分需要的部队训练法。

陆海军军士应该努力提高指挥能力,以便在维护军纪、训练和教育陆海军士兵方面,真正成为军官的最亲密的助手。

陆海军士兵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射击、战术、队列、专业、政治等方面的素养,锻炼身体,成为善于克服行军和战斗中的任何困难的熟练的军人。

所有指挥员和首长在训练和教育部属的同时,必须关心他们的生活、伙食、住处、服装,使军人及时地得到他们应得的全部供给品。

我国武装力量战斗力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就是首先建立在军人的高度觉悟和对军人的政治教育基础上的严格的军纪。所以,所有指挥员和首长要毫不松懈地加强军纪,严格要求,同时,必须经常教育部属忠于祖国,自觉地履行军人职责和加强对保卫祖

国这一事业的个人责任感。

陆海军士兵和军士同志们!

陆海军军官和将军同志们!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共产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苏军建军二十九周年。

为了庆祝苏军建军二十九周年，**我命令：**

今天，2月23日，在我们祖国首都莫斯科，在各加盟共和国首都，以及在加里宁格勒、利沃夫，在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在旅顺口和在英雄城市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齐鸣礼炮20响。

苏联陆军和海军万岁!

我们苏联政府万岁!

我们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苏联人民万岁!

我们强大的祖国万岁!

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 约·斯大林
苏 联 大 元 帅

译自1947年2月23日《真理报》

和美国共和党人士 哈罗德·史塔生的谈话的记录

（1947年4月9日）

史塔生说，他感谢斯大林的接见。他史塔生请求接见，是为了向作为国家元首的斯大林表示敬意。他史塔生已完成其周游欧洲各国的有趣旅行，旅行时他对各国战后经济状况特别关心。照他史塔生的意见，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各国人民的繁荣有重大意义。苏美之间的关系，在战时曾经有过重大意义，今后也将有重大的意义。他史塔生了解到苏美两国经济制度是不同的。苏联的经济建筑在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它的发展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美国存在的是私人资本的自由经济。他史塔生很想知道斯大林是否认为这两种经济制度能在战后在同一世界内共同生活和彼此合作。

斯大林回答说，这两种制度当然能够彼此合作。既然是谈它们的合作，它们彼此的差别也就没有重大的意义。德国和美国的经济制度是相同的，然而它们之间却发生了战争。美国和苏联的经济制度是不同的，但它们彼此并未作战，而且在战时还相互合作。两种不同的制度既然在战时能够合作，在和平时期又为什么不能合作呢？这里当然是指，如果有合作的愿望，那么，尽管经济制度不同，合作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如果没有合作的愿望，那么，

即使是经济制度相同，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也会打起来的。

史塔生说，合作的愿望当然有很大的意义，但过去在战前，两国都有人在各种不同的讲话中说不能合作。在战前，斯大林本人也谈过这一点。但是，他史塔生想知道，斯大林是否认为由于战争事件，由于德日法西斯轴心的失败，形势已经改变，现在如果有合作愿望，则苏美之间即可望合作。

斯大林回答说，他决不可能说过两种不同的制度不能合作。关于两种制度合作的思想，是列宁首先提出的。斯大林说，列宁是我们的导师，我们苏联人则是列宁的学生。我们从来没有违背过而且将来也不会违背列宁的指示。可能他斯大林曾经说过：一种制度，例如资本主义制度不愿合作，但这是指愿望这方面而言，而不是指合作的可能性方面。至于合作的可能性，他斯大林所持的是列宁的观点：两种经济制度的合作，是可能的和合乎愿望的。同样，讲到苏联的人民和共产党的合作愿望，那他们是有这种愿望的。这种合作无疑只会对两国有益处。

史塔生回答说，这是很显然的。他所提到的那些话，是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和1937年全会上说的。在这些话中所谈的是“资本主义包围”以及“垄断的和帝国主义的发展”。从今天斯大林的话中，他史塔生得出了一个结论：在现在日本和德国失败以后，形势已经改变了。

斯大林说，在共产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上或任何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他斯大林都没有说过，而且也不可能说过两种制度不可能合作。他斯大林说过存在着资本主义包围和进攻苏联的危险。如果一方不愿合作，这就是说，存在着进攻的威胁。的确，德国不愿意同苏联合作，就进攻了苏联。苏联能不能同德国合作呢？

苏联能够同德国合作，但德国人不愿意合作。否则，苏联就会象同其他任何国家合作一样，同德国合作了。可见，这是指愿望方面而言，而不是指合作的可能性方面而言。

应当把合作的可能性同合作的愿望区别开来。合作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着的，但合作的愿望却不是始终都有的。如果一方不愿意合作，那结果就会发生冲突、战争。

史塔生说，愿望应该是相互的。

斯大林回答说，他应当证明一个事实，就是俄国人是有合作愿望的。

史塔生说，他很高兴听到这一点，并且说他想谈谈斯大林关于美国同德国经济制度相同的说法。他应当说，当德国发动战争时，美国同德国的经济制度是彼此不同的。

斯大林不同意这一点，并说，美国与德国在政治制度上是不同的，但是在经济制度上却没有差别。政治制度是暂时的政治的因素。

史塔生说，曾有很多文章大谈其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垄断、帝国主义以及压迫工人等祸害。照他史塔生的意见，在美国，防止了资本主义的垄断倾向和帝国主义倾向的发展，而且美国的工人享受到的投票权，比马克思或恩格斯所能想到的还要多得多。美国的经济制度同当时希特勒德国所存在的经济制度的差别就在这里。

斯大林说，不应醉心于批评彼此的制度。每一国的人民都维持着它所愿意维持和可能维持的制度。哪一种制度更好，——历史会证明的。应该尊重人民所选择和赞同的制度。美国的制度究竟是好还是坏，——这是美国人民的事。合作并不需要各国人民具有同样的制度。应该尊重人民所赞同的制度。只有在这种条件下，

才能合作。

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他们不能预见到他们逝世 40 年以后会发生的事情。

有人把苏维埃制度称为极权的或独裁的制度,而苏联人则称美国的制度为垄断资本主义。如果双方开始彼此谩骂为垄断者或极权主义者,那就不能得到合作。应该从存在着人民所赞同的两种制度的历史事实出发。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合作。

至于醉心于批评垄断和极权主义,那是进行宣传,而他斯大林并不是一个宣传家,而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斯大林说,我们不应该成为宗派主义者。当人民希望改变制度时,他们就会把它改变的。当他斯大林同罗斯福会晤并讨论军事问题的时候,他和罗斯福都没有彼此谩骂为垄断者或极权主义者。这就大大有助于他和罗斯福建立相互的合作,并赢得了对敌的胜利。

史塔生说,双方自战争结束以来的这类批评,是造成误解的原因之一。他史塔生想知道,如果苏联同美国建立了合作,斯大林是否希望将来更广泛地交换思想、学生、教师、艺术家和旅行者。

斯大林回答说,如果建立了合作,那必然会如此的。商品的交换会引起人的交换。

史塔生说,过去苏联同美国产生误解,是因为苏联方面不愿意交换思想,这表现在对外国记者从莫斯科发出的报道实行检查上面。例如,拒绝准许《纽约先驱论坛报》派记者驻莫斯科,便是苏美两国人民缺乏相互了解的原因之一。

斯大林回答说,拒绝给《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办理签证的事情确实发生过。但这种误会是偶然的現象,同苏联政府的政策无关。他斯大林知道《纽约先驱论坛报》是一家大报。但一部分美国

记者对苏联的态度恶劣，这一事实也是重要的。

史塔生回答说，确实有这样的记者。《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已得到允许驻在莫斯科，但只是在外长会议开会期间。现在该报提出派记者常驻莫斯科的问题。《纽约先驱论坛报》是共和党的主要机关报，而现在，在共和党已在国会占多数之后，它就有更重大的意义了。

斯大林说：“这反正都是一样，因为我们看不出共和党同民主党之间有什么重大的差别。”至于记者问题，他斯大林想起了一件事情。三大国在德黑兰举行会议时，在会上，他们在友好的气氛中做了很好的工作。一个美国记者，这人的姓名，他斯大林现在记不起了，发出一个报道，说铁木辛科元帅出席了德黑兰会议，虽然实际上他并没有在那里，并且说他斯大林在宴会上打了铁木辛科元帅。这是无礼的和诽谤性的捏造。怎么样呢？这样的记者应该称赞吗？在德黑兰会议的参加者庆祝邱吉尔 69 岁寿辰的宴会上，出席的有邱吉尔、布鲁克、李海等近 30 人，他们都可以作证，绝对没有这类事情发生。可是这位记者将他臆造的报道发给了报社，而美国报纸便发表了它。这样的记者，能够信任吗？斯大林说，我们并不认为这件事应归罪于美国或它的政策。然而这类事件经常发生。这使苏联人产生了一种恶感。

史塔生说，当然，记者发出错误报道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的例子是有的。但是，另外一些记者纠正了前者的错误，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就知道哪些记者可以信赖，哪些记者不可以信赖，结果我们看到，人们会认识清楚，并为进行巨大的军事努力而团结起来。

斯大林回答说，这是正确的。

史塔生说，每当一个记者显然有意地作出完全不正确的报道时，他的报馆便会把他撤回去，这样，我们的报纸便会为自己造就出能干的诚实的记者干部了。

斯大林说，先是这些记者写了一些耸人听闻的报道，报馆发表了，赚了钱，然后便把这些记者辞退。

史塔生说，两种制度应该在出版、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范围內，找到搞好相互关系的手段。

斯大林说，这是正确的。

史塔生表示他认为，如果对记者的报道不规定检查制度，那对我们两国人民的合作和相互谅解来说，就是比什么基础都要好的基础。

斯大林说，苏联很难不实行检查制度。莫洛托夫曾几次试图这样做，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每当苏联政府废除检查制度，它都得后悔，结果只得重新实行。前年秋天，苏联废除了检查制度。他斯大林当时正在休假，于是记者们开始报道莫洛托夫强迫斯大林去休假，以后他们开始报道他斯大林要回来赶走莫洛托夫。这些记者就这样把苏联政府描绘得象一个动物园似的。当然，苏联人感到愤怒，于是只好重新实行检查制度。

史塔生说，照他现在的了解，斯大林认为如果有合作的要求和愿望，合作是可能的。

斯大林回答说，完全正确。

史塔生说，机械化和电气化对提高生活水平有重大的意义，而把原子能用于工业，对各国人民，包括苏美两国人民在内，都是有重大意义的。他史塔生认为建立原子能检查、管制制度，并宣布把原子能用于军事目的为非法，这对于世界各国人民都有重大意义。

斯大林是否认为将来有制订出关于管制和调整原子能的生产以及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的前景？

斯大林回答说，他对此抱有希望。关于这个问题，苏联同美国有很大的分歧，但是正如他斯大林所希望的，双方终归会相互了解的。照他斯大林看来，国际管制和检查将会建立起来，这将有重大的意义。利用原子能于和平目的，将使生产过程发生重大变革。至于利用原子能于军事目的，这大概会被禁止。这是各国人民的愿望和良心所要求的。

史塔生说，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如果解决了的话，原子能将成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最大的福利，而如果不解决的话，它将成为最大的祸害。

斯大林说，他认为是能够建立国际检查和管制的。事情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史塔生为这次谈话向斯大林表示感谢。

斯大林回答说，请史塔生不必客气，俄国人是尊重他们的客人的。

史塔生说，在旧金山会议时，他曾同莫洛托夫进行过一次非正式的谈话。这次谈话的结果是邀请他访问俄国。

斯大林说，他认为欧洲的情况现在很坏。史塔生先生以为如何？

史塔生回答说，一般来说这是对的，但是有一些国家未遭到战争灾难，它们的情况并不那么坏。例如，瑞士和捷克斯洛伐克。

斯大林说，瑞士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是小国。

史塔生说，大国的情况很坏。它们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就是财政、原料和粮食问题。

斯大林说,欧洲是世界上这样一块地方,那里工厂很多,但是缺乏原料和粮食。悲剧就在这里。

史塔生说,由于鲁尔的煤矿采掘水平低,所以欧洲缺煤。

斯大林说,英国也缺煤,这是十分奇怪的。

史塔生说,幸亏美国的煤炭采掘水平高。美国每一昼夜采掘200万吨肥煤。因此美国能够把大量煤炭运往欧洲。

斯大林说,美国的情况不坏。美国有两个大洋保护。北与弱国加拿大为邻,南与弱国墨西哥为邻。美国用不着怕它们。美国在独立战争以后,有60年一直享受和平而没有打仗。这一切都有助于美国的迅速发展。此外,美国居民是由那些早已从国王和土地贵族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组成的。这种情况也有利于美国的蓬勃发展。

史塔生说,他的曾祖父是为摆脱帝国主义从捷克斯洛伐克逃出来的。当然,美国的地理位置对美国有很大的帮助。**史塔生**说,我们很走运。在离我们海岸很远的地方就把敌人打败了。美国能够将战时生产恢复为平时生产,并在战争结束后大规模地恢复生产。现在的任务是避免萧条和经济危机。

斯大林问,美国是不是将要发生经济危机?

史塔生回答说,他认为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他**史塔生**相信可以调节美国的资本主义,把就业率稳定在高水平上,避免任何严重的危机。可是主要的任务是避免美国经济制度中的危机。但如果政府实行英明的政策,并考虑到1929—1930年的教训,那么在美国占优势的将是调节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垄断的资本主义,这就能避免危机。

斯大林说,要这样做,就必须有一个抱有很大决心的很强有力

的政府。

史塔生说，这是正确的，除此以外，人民应该了解旨在稳定和支持经济制度的那些措施。这是一个新任务，因为在世界经济制度中还不曾有过与此相类似的先例。

斯大林说，现在美国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即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两个竞争者——日本和德国——已被排除。因此，对美国商品的需求将增长，这将为美国的发展造成有利的条件。象欧洲、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市场对美国是开放着的。这将帮助美国。这种条件以前从未有过。

史塔生说，从另一方面说，这些市场没有用以支付的资金，因此是美国的一种负担，而不是有利的生意。但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帝国主义危险的体现者的排除，从和平的角度来说，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自然是件大好事。当然世界贸易在过去并不是对美国有重大意义的因素。美国的市场曾经只限于美国境内或西半球范围内。

斯大林说，在战前，美国的生产品大约有 10% 输出到其他国家。至于购买力，他斯大林认为商人们会找到资金来购买美国的商品并把它们转卖给本国的农民。中国、日本、欧洲和南美的商人已经积累了金钱。现在美国的出口将可能增加到 20%。是这样吗？

史塔生说，他并不以为如此。

斯大林问：“真的么？”

史塔生肯定地回答并且说，如果美国的出口增加到 15%，他将认为美国很走运了。大多数商人积累的是地方通货，这种通货多半只限于在当地使用，而不能用来汇拨。因此，照他史塔生的估

计,美国的出口不会超过 15%。

斯大林说,然而,如果注意一下美国的生产额,15%将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史塔生同意这点。

斯大林说,据说美国工业现在有许多订货。这是真的吗?据说美国的工厂做不完这些订货,所有工厂都是百分之百的开足了工。这是真的吗?

史塔生回答说,是真的,但这些订货都是国内的。

斯大林说,这一点非常重要。

史塔生说,对粮食、妇女衣服和鞋子的要求现在能够满足,但是车床、汽车和火车头的生产是落后的。

斯大林说,美国报刊上有这样的报道,说经济危机很快就要到来。

史塔生说,报刊上曾报道说,美国失业人数去年 11 月份必定达到 800 万人。可是结果证明这些报道是错误的。任务在于平衡高的生产水平并获得稳定,以避免经济危机。

斯大林指出,史塔生大概是指调节生产。

史塔生回答说是的,并说美国有人断言将发生萧条,但他史塔生较为乐观,断定美国人能够避免萧条,因为他史塔生可以断言,人们对调节的了解比以前更深刻了。

斯大林问:“工商界人士怎样呢?他们是否愿意被调节和受限制呢?”

史塔生回答说,工商界人士通常是反对这样做的。

斯大林指出,他们当然要反对。

史塔生说,然而他们了解 1929 年的萧条不应重演,并且他们

现在比较懂得调节的必要性了。政府的高度调节，大量的决定和接着采取的合理行动，当然是必要的。

斯大林说，这是对的。

史塔生说，这在任何制度和任何形式的政府下都是必要的。在任何形式的政府下，犯错误对于人民都是不好的。

斯大林同意这点。

史塔生说，日本和德国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说，这些国家的经济是由对经济一窍不通的军人管理的。例如在日本，经济是由只知道如何打仗的东条领导的。

史塔生说，这是正确的。他史塔生对斯大林给予他谈话的机会和时间表示感谢。

斯大林问，史塔生打算在苏联逗留多久。

史塔生说，他想明天到基辅去，以后他想去向斯大林格勒的英勇保卫者表示敬意，然后打算经列宁格勒离开苏联。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他史塔生正在太平洋美国舰队，他在那里紧张地注视着斯大林格勒的史诗。

斯大林说，尼米兹海军上将看来是位很出色的海军领导者。

斯大林问史塔生是否到过列宁格勒。

史塔生说，他还没有到过列宁格勒，他打算经由列宁格勒离开苏联。

斯大林说，他同史塔生谈话得益非浅。

史塔生说，他同斯大林谈话，对他研究经济问题方面的工作也得益不少。

斯大林说，在战前他也用过很多时间来研究经济问题，他之成为军人是由于必要。

史塔生问,他是否可以得到巴甫洛夫所记的谈话记录,以及是否允许他史塔生见到记者时同他们谈论这次谈话。

斯大林说,史塔生可以得到谈话记录,史塔生当然可以同记者谈论这次谈话,因为这里没有什么要隐瞒的。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7年)》
1952年版第1册第15—27页

贺 词

值此莫斯科八百周年的纪念日，谨向我们祖国的首都莫斯科致敬。

今天全国都在庆祝这一意义重大的日子。由于莫斯科对祖国的伟大功绩，全国不是形式主义地，而是满怀热爱和尊敬来庆祝这个日子的。

莫斯科的功绩不仅在于，它在我们祖国历史上曾三次从外国的压迫下——从蒙古的枷锁下，从波兰—立陶宛的侵略下，从法国的入侵下解放了祖国。莫斯科的功绩首先在于，它成了把分散的罗斯联合为一个有统一政府、统一领导的统一国家的基础。如果不摆脱封建割据和诸侯纷争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莫斯科的历史功绩在于，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罗斯建立集中国家的基础和倡导者。

可是，莫斯科对于祖国的功绩还不仅在于此。自从莫斯科按伟大列宁的意愿，重新定为我们祖国的首都以后，它已成为新的苏维埃时代的旗手。

现在莫斯科不仅是建设新的苏维埃社会经济制度的鼓舞者，这种社会经济制度用劳动的统治代替了资本的统治，并且不容许

人对人的剥削。莫斯科同时还是劳动人类争取摆脱资本主义奴隶制的解放运动的倡导者。

现在莫斯科不仅是建设新的苏维埃民主制的鼓舞者，这种民主制不容许在公民、性别、种族和民族之间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不平等而保障劳动权和同工同酬权。莫斯科同时还是全世界一切劳动人民、一切被压迫种族和民族争取从财阀和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的旗帜。毫无疑问，没有这种政策，莫斯科就不可能成为在我们的多民族国家内建立各族人民友好和兄弟般合作的中心。

现在莫斯科不仅是建设首都劳动者的新的生活方式的倡导者，在这种生活方式下，不再有几百万贫民和失业者处于穷苦和苟延残喘的状态中。莫斯科同时还是世界各国首都在这方面的范例。欧洲、亚洲、美洲各国庞大首都的最严重的毒疮之一，就是存在贫民窟，几百万贫穷的劳动者在那里苟延残喘，缓慢地、痛苦地死去。莫斯科的功绩在于，它完全消灭了这种贫民窟，使劳动者能够从地窖和茅屋中搬进资产阶级的住宅和房屋，搬进苏维埃政权新建的设备完善的住宅。

最后，莫斯科的功绩在于，它是争取各国人民之间的持久和平和友好的斗争的倡导者，是反对新战争挑拨者的斗争的倡导者。对于帝国主义者说来，战争是一件最有利可图的事情。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正在竭力用各种方法挑起新战争，这是不足为奇的。莫斯科的功绩在于，它不断地揭露新战争的挑拨者，并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在和平旗帜的周围。大家知道，爱好和平的人民满怀希望地注视着莫斯科这个爱好和平的伟大强国的首都，这个和平的强大堡垒。

就是因为这些功绩，今天我们祖国怀着对自己首都这样的热爱和尊敬来庆祝莫斯科八百周年的纪念日。

我们强大的、亲爱的、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莫斯科万岁！

约·斯大林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7年)》
1952年版第1册第27—29页

在招待芬兰政府代表团的 午宴上的讲话

(1948年4月7日)

我想就昨天签订的苏芬友好互助条约的意义讲几句话。

这个条约标志着我们两国关系的转变。大家知道,150年来,俄国同芬兰的关系是互不信任的。芬兰人不信任俄国人,而俄国人也不信任芬兰人。苏联方面过去曾经试图消除俄国人同芬兰人之间的不信任。这是1917年列宁宣布芬兰独立时的事情。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卓越的行动。但遗憾的是,不信任未能因此而消除,——不信任依然是不信任。结果,我们之间发生了两次战争。

我希望,我们能从我们曾彼此交战两次、长久的互不信任的时期转入我们关系上的新时期——互相信任的时期。必须使我们所缔结的条约消除这种不信任,并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创立新的基础,必须使这个条约成为我们两国关系走向信任和友好的重大转折点。

我们希望,这一点不仅在座的各位能很好的理解,而且这个大厅以外的芬苏两国人民也能很好的理解。

不能认为两国人民之间的不信任一下子就可以消除。这一点是不能很快就做到的。不信任的残余和尾巴还会在长时期内存在,

要消除它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进行很多斗争，来建立苏芬两国相互友好的传统，并使这种传统得到巩固。

条约有平等的，也有不平等的。苏芬条约是平等的条约，因为它是在双方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缔结的。

许多人不相信大民族和小民族之间的关系能够是平等的。但是我们苏联人认为，这样的关系是能够有的，而且是应当有的。苏联人认为，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都有其本质上的特点，即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这些特点就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共同宝库作出的、使这个宝库更加充实、更加丰富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每个民族都是和其他任何民族同样重要的。

因此，苏联人认为，芬兰虽然是个小国，但在这个条约中是作为与苏联平等的一方。

在大国的政治家中，把小民族看成同大民族平等的人是不多见的。他们大多数都是藐视小民族的。他们并不反对有时对小民族作单方面的保证。但是一般说来，这些政治家是不愿意同小民族缔结平等条约的，因为他们不认为小民族是自己的对手。

为了苏芬条约，为了这一条约所标志的我们两国关系上的好转，干杯。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8年)》

1950年版第1册第23—24页

对华莱士先生的公开信的答复

我认为,在最近许多以巩固和平、建立国际合作和保证民主为目的的政治文件中,美国第三党总统候选人华莱士先生的公开信,是一个最重要的文件。

华莱士先生的公开信,不能认为单纯是一个希望改善国际局势、希望和平解决苏美分歧、希望为这种解决寻找途径的声明。美国政府5月4日的声明和苏联政府5月9日的答复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它们除了声明希望解决苏美分歧以外,没有更进一步。

这封公开信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限于声明,而是进了一步,认真向前跨了一步,给和平解决苏美分歧提出了具体的方案。

不能说华莱士先生的公开信已把一切分歧问题包罗无遗。也不能说公开信中某些说法和解释已无须改进。但目前主要的事情不在这里。主要的事情是华莱士先生在他的信中作出了公开和诚实的尝试,对苏美一切主要分歧问题提出了和平解决的具体方案、具体建议。

这些建议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就是:普遍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缔结对德和对日和约,从这两个国家撤军;从中国和朝鲜撤军;尊重各个国家的主权和不干涉其内政;不许在联合国的会员国内建立军事基地;大力发展国际贸易,消除一切歧视;在联合国的范围内援助和在经济上恢复那些遭受战争灾难的国家;在世界各

国保卫民主,保障公民权利等等。

人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华莱士先生的方案。但有一点毕竟是无疑的:任何一个关心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合作的国务活动家,都不能无视这个方案,因为它反映了各国人民对巩固和平的希望和意愿,并且无疑会得到千百万“普通人”的拥护。

我不知道美国政府是否赞同把华莱士先生的方案作为苏美协议的基础。至于苏联政府,它认为华莱士先生的方案,是可以作为达成这种协议和发展国际合作的一个良好而有成效的基础的,因为苏联政府认为,尽管经济制度和思想体系不同,但这些制度的共处,以及苏美分歧的和平解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为了普遍和平的利益也是绝对必要的。

1948年5月17日于莫斯科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8年)》
1950年版第1册第27—28页

答《真理报》记者问

问：对于安全理事会讨论柏林局势问题的结果和英、美、法代表在这件事情上的行为，您的看法如何？

答：我认为这是英、美、法统治集团的政策的表现的侵略性的表现。

问：今年8月，四大国关于柏林问题曾一度达成协议，这事是否确实？

答：是的，是确实的。大家知道，今年8月30日，苏、美、英、法四国代表曾在莫斯科达成一项协议，规定同时实行如下措施：一方面撤销运输限制，另一方面在柏林采用苏占区的德国马克为唯一通货。这一协议并不损害任何一方的威信，它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并保证进一步合作的可能。但是，美国和英国政府宣布不同意它们在莫斯科的代表行为，宣告这一协议无效，也就是说，破坏了这个协议，而决定将问题提交英国人和美国人拥有有保证的多数的安全理事会。

问：最近在巴黎，当安全理事会讨论这个问题时，还在安全理事会投票表决以前，就在非正式谈判中又就柏林局势问题达成了协议，这事是否确实？

答：是的，是确实的。阿根廷的代表，即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布拉穆利亚先生，代表其他有关国家同维辛斯基同志作了非正

式谈判，他手里确实有过一份协商好了的解决柏林局势问题的方案。但是，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又宣告这个协议无效。

问：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能否解释一下？

答：问题在于，美英侵略政策的鼓舞者并不认为自己需要同苏联达成协议和合作。他们需要的不是协议和合作，而是谈论协议和合作，以便破坏协议，委罪于苏联，并以此“证明”不可能同苏联合作。力图发动新战争的战争挑拨者，最怕同苏联达成协议和合作。因为同苏联达成协议的政策会削弱战争挑拨者的地位，使这些先生的侵略政策成为无的放矢。正因为如此，他们就撕毁业已达成的协议，宣布不同意和苏联一道拟定这种协议的自己的行为，并违反联合国宪章，把问题转交给安全理事会，因为他们在那里拥有有保证的多数，他们在那里可以“证明”他们所乐意的一切。这一切都是为了“表明”不可能同苏联合作，“表明”新战争的必要，从而为发动战争准备条件。

美国和英国现在的领导人的政策，就是侵略的政策，发动新战争的政策。

问：对于中国、加拿大、比利时、阿根廷、哥伦比亚、叙利亚等六国的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上的行为，应作如何看法？

答：显而易见，这些先生是在支持侵略的政策，支持发动新战争的政策。

问：这一切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呢？

答：结果只能是新战争挑拨者可耻地破产。邱吉尔这个新战争的主要挑拨者所已得到的，就是丧失了他本国和全世界民主力量对他的信任。同样的命运也在等待着所有其他的战争挑拨者。各国人民对不久前的战争惨祸记忆犹新，拥护和平的社会力量非

常强大,所以主张侵略的邱吉尔的徒子徒孙们是不可能战胜他们,使他们转到新战争方面去的。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8年)》
1950年版第1册第32—34页

答美国国际新闻社欧洲分社社长 金斯伯里·史密斯先生问

（1月27日接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苏联政府是否愿意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即同美国政府发表一项共同宣言，证实两国政府都无意诉诸针对对方的战争？

答：苏联政府愿意研究发表这种宣言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苏联政府是否愿意和美国政府共同实行一些旨在实现这种和平公约的措施，如逐步裁军那样的措施？

答：在实行旨在实现和平公约和导致逐步裁军的措施方面，苏联政府自然能够同美国政府合作。

第三个问题：如果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政府同意把建立单独的西德国家推迟到研究整个德国问题的外长会议召开的时候，苏联是否愿意取消苏联当局对柏林同德国西部各区之间的交通所实行的限制？

答：如果美国、英国和法国遵守第三个问题中所说明的条件，苏联政府不认为取消运输限制有什么障碍，但是，同时要取消三国所实施的运输和贸易的限制。

第四个问题：阁下是否愿意同杜鲁门总统在一个双方都能同

意的地点会晤,以讨论缔结这种和平公约的可能性?

答: 我从前就声明过,不反对会晤。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9年)》

1953年版第21—22页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①

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

有一部分青年同志要求我在报刊上就语言学问题，特别是就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发表我的意见。我不是语言学家，当然不能完全满足这些同志。至于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也和其他社会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同我是有直接关系的。因此我同意回答这些同志所提出的几个问题。

问：说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是否正确？

答：不，不正确。

基础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

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层建筑。封建制度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自己的政治、法律等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设施；资本主义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

① 1950年5月9日—7月4日，苏联《真理报》组织了语言学问题的讨论，每周定期出版两整版的讨论专刊。该报编者说：组织这次讨论的目的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语言学发展中的停滞现象，确定这门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针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斯大林在这一年的6—7月写了几篇著作，在《真理报》发表，随后于8月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为书名由真理报出版社出了单行本。——编者注

基础也有自己的上层建筑。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么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如果产生新的基础，那就会随着产生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拿俄国社会和俄语作例子来说吧。最近 30 年来，在俄国消灭了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与此相适应，消灭了资本主义基础的上层建筑，创立了同社会主义基础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这就是说，旧的政治、法律等设施已经被新的社会主义设施代替了。但是尽管如此，俄语在基本上还是同十月革命以前一样。

在这个时期中，俄语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俄语的词汇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这就是说，由于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生产，由于出现了一种新的国家、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新的社会观点、新的道德以及由于技术和科学的发展，增加了一大批新的词语；许多词语获得了新的含义而改变了意思；若干陈旧的词从词汇中消失了。至于构成语言基础的俄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那么它们在资本主义基础消灭后，不仅没有被消灭和被新的基本词汇和新的语法构造所代替，相反地，却完全保留了下来，没有任何重大的变化，而且正是作为现代俄语的基础保留了下来。

其次，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

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只要上层建筑拒绝起这种服务作用，只要上层建筑从积极保卫自己基础的立场转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场，转到对各个阶级同等看待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不再成为上层建筑了。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语言不是某一个社会内部这种或那种基础，旧的或新的基础所产生的，而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和各种基础历史的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创造出来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各阶级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创造出来的语言是全民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全体成员是共同的。因此，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語言的服务作用，不是为一个阶级服务，损害另一些阶级，而是一视同仁地为整个社会、为社会各阶级服务。这也就说明，语言可以一视同仁地既为旧的衰亡的制度服务，也为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务；既为旧基础服务，也为新基础服务；既为剥削者服务，也为被剥削者服务。

谁都知道这样的事实：俄语在十月革命以前为俄国资本主义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文化服务得很好，就同现在为俄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得很好一样。

关于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摩尔达维亚语、鞑靼语、阿塞拜疆语、巴什基尔语、土库曼语以及苏联其他民族的语言，都应该说也是这样的，它们为这些民族的旧的资产阶级制度服务得很好，就同为这些民族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得很好一样。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语言的存在和语言的创造就是要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为整个社会服务,就是要它对社会成员是共同的,对社会是统一的,同样地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而不管他们的阶级地位如何。语言一离开这个全民立场,一站到偏爱和支持某一社会集团而损害其他社会集团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就会不再是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就会变成某一社会集团的习惯语而退化下去,使自己必然消失。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有原则上的不同,但和生产工具,比如说,和机器却没有区别,生产工具和语言一样,对各阶级也是一视同仁的,既可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也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再其次,上层建筑是某个经济基础存在和活动的那一个时代的产物。因此上层建筑的生命是不长久的,它是随着这个基础的消灭而消灭,随着这个基础的消失而消失的。

而语言则相反,它是若干时代的产物,在这些时代中,它形成起来、丰富起来、发展起来、精炼起来。所以语言比任何基础、任何上层建筑都生存得长久得多。这正说明,不仅是一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而且好几个基础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也不致会在历史上消灭一种语言,消灭一种语言的结构,产生具有新的词汇和新的语法构造的新的语言。

从普希金逝世以来,已经有100多年了。在这个时期内,俄国曾消灭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并产生了第三个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说,已经消灭了两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并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基础及其新的上层建筑。但是,如果以俄语为例,那么它在这个长时期内,并没有遭到什么破坏,并且现代俄语按照

它的结构来说,是同普希金的语言很少有差别的。

在这个时期内,俄语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在这个时期内,俄语大大地增加了词汇;有很大一批陈旧的词从词汇中消失了;有很大一批词的含义改变了;语言的语法构造改进了。至于普希金语言的结构及其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主要的都保存下来了,成了现代俄语的基础。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在每次革命之后,把现有的语言结构及其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都象对待上层建筑一样消灭掉,并以新的来代替,的确又有什么必要呢?譬如,把“水”、“地”、“山”、“森林”、“鱼”、“人”、“走路”、“做”、“生产”、“做买卖”等等不叫作水、地、山等等,而叫作旁的名称,又有什么必要呢?使语言中的词的变化和句中词的组合,不按照现存语法而按照完全另一种语法来进行,又有什么必要呢?这样的语言变革对于革命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特别必要的时候,历史是决不会采取什么重大行动的。试问,如果证明现有的语言及其结构基本上完全适用于满足新制度的需要,那么这样的语言变革有什么必要呢?消灭旧的上层建筑并且用新的上层建筑来代替它,可以而且需要在几年中完成,以便使社会生产力有发展的天地,但是要在几年中消灭现有的语言,并创立新的语言来代替它,那不是会在社会生活中造成无政府状态并使社会受到崩溃的威胁吗?除了象唐·吉珂德之类的人以外,谁会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呢?

最后,上层建筑和语言还有一个根本区别。上层建筑同生产、同人的生产活动没有直接联系。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仅有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是立刻、直接反映的,而是在基础变化以后,

通过生产变化在基础变化中的折光来反映的。这就是说，上层建筑活动的范围是狭窄的和有限的。

而语言则相反，它是同人的生产活动直接联系的，不仅同生产活动，而且同人的工作的一切领域（从生产到基础、从基础到上层建筑）中的任何其他活动都有直接联系，因此语言反映生产的变化，是立刻、直接反映的，并不等待基础的改变，所以语言的活动范围包括人的活动的各个领域，它比上层建筑的活动范围要广泛得多、方面也多得多，不仅如此，它的活动范围几乎是无限的。

这就首先说明，语言，实际上是它的词汇，是处在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工业和农业的不断发展，商业和运输业的不断发展，技术和科学的不断发展，要求语言用进行这些工作所必需的新词语来充实它的词汇。语言就直接反映这种需要，用新的词充实自己的词汇，并改进自己的语法构造。

总结说来：

（一）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认为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

（二）把语言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问：有人说，语言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阶级的语言；对社会是共同的统一的语言，非阶级的语言，全民的语言是不存在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

答：不，不正确。

不难了解，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根本谈不到阶级的语言。原始公社氏族制度是没有阶级的，因此那时当然不可能有阶级的语言，那时语言对人们的整个集体是共同的、统一的。有人反驳说，所谓阶级，应当是指任何人类集体，包括原始公社集体在内。这种说法算不得什么反驳，而是玩弄词句，是不值得一驳的。

至于后来语言的发展,从民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言到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语言,从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语言到民族(нация)语言^①,那么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工具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共同的,它同样地为社会一切成员服务,而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

这里我指的并不是奴隶时代和中世纪时代的帝国,例如,居鲁士和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和查理大帝等所建立的帝国,这些帝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这些帝国不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对整个帝国是统一的、为帝国一切成员都懂得的语言。这些帝国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集合体。因此,我指的不是这些帝国和类似的帝国,而是组成这些帝国的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这些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是各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各有自己早已形成的语言的。历史表明:这些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语言不是阶级的,而是全民的,是每个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共同的,是大家都懂得的。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方言^②、土语,但是部落或者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统一的和共同的语言却占着统治地位,并使这些方言、土

① 俄文 народность 和 нация 一般都译为“民族”。斯大林在本文中把 народность 一词用来专指产生于部落之后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人们共同体,把 нация 一词用来专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和这个时期以后的人们共同体。本文中 народность 译成“民族”,并附注原文;нация译成“民族”,一般不附注原文,只是在同一句子中与 народность 并用时,才附注原文,以示区别。——编者注

② 原文是 диалект,指地域方言,在本文中也用以指某一社会集团的习惯语,现统一译为“方言”。——编者注

语从属于自己。

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封建割据的消灭和民族市场的形成,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就发展成为民族(нация),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语言也就发展成为民族(нация)的语言。历史表明:民族语言不是阶级的,而是全民的,对每个民族的成员是共同的、对整个民族是统一的。

上面已经说过:语言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同样地为社会一切阶级服务,在这一方面表现出语言对各个阶级是一视同仁的。但是人们,即各社会集团、各阶级对于语言远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极力利用语言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把自己的特殊词汇即特殊用词和特殊用语强加到语言中去。在这一方面,那些脱离人民并且仇视人民的有产阶级上层,如贵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创造了“阶级的”方言,习惯语,沙龙“语言”^①。在书刊中常常把这些方言和习惯语错误地说成是语言,如“贵族语言”、“资产阶级语言”,与此相对立的则有“无产阶级语言”、“农民语言”。很奇怪的是,我们有些同志竟根据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什么民族语言是虚构的,只有阶级语言才是实际存在的。

我想再没有比这种结论更错误的了。能不能把这些方言和习惯语看作语言呢?绝对不能。其所以不能,第一,因为这些方言和习惯语没有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而要从民族语言中去借用。其所以不能,第二,因为这些方言和习惯语只是在某一阶级上层分子的狭窄范围中通用,完全不适用于作为整个社会中人们交际的工具。在这些方言和习惯语中到底有些什么呢?其中有的只

^① 即客厅语言,是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中流行的一种所谓“雅语”。沙龙是法语salon一词的音译,意即客厅。——编者注

是一些反映贵族或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特殊趣味的特别的词，一些不包含民族语言中“粗鲁”用语和短语的特别风雅客气的用语和短语，以及若干外来语。然而基本的即绝大多数的词和语法构造还是从全民的民族语言中拿来的。因此这些方言和习惯语只是全民的民族语言的支派，没有任何语言的独立性，而且是注定不能发展的。如果以为这些方言和习惯语能够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能够排挤民族语言并代替民族语言，这就是看不到历史的前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有人援引马克思，引证他的《圣麦克斯》一文的一个地方，那里说到资产者有“自己的语言”，这个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①，这种语言浸透了重商主义和生意经的精神。有些同志想用这个引文来证明，好象马克思是主张语言有“阶级性”的，好象马克思否定了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存在。如果这些同志能客观论事的话，他们就应当从同一篇《圣麦克斯》中引证另一段话，在那里马克思谈到统一的民族语言形成道路的问题时说：“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②

可见马克思承认必须有**统一的民族语言**作为高级形式，而作为低级形式的方言则从属于高级形式。

那么，马克思所说资产者的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是否认为这种语言和具有自己特殊结构的民族语言是同样的语言呢？马克思能不能把它看成这样的语言呢？当然不能。马克思只是想说：资产者拿自己的生意人的那套词汇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5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500页。——编者注

玷污了统一的民族语言，这就是说，资产者有他们生意人的习惯语。

可见，这些同志曲解了马克思的立场。他们曲解了它，是因为他们不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去引证马克思，而是以不深入问题实质的书呆子的习气去引证马克思。

有人援引恩格斯，引证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的话：“……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变成一种和英国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人”，“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方言，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①有些同志根据这一句话就得出结论说，恩格斯否认全民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也就是说，他主张语言有“阶级性”。其实恩格斯在这里不是说语言而是说方言，他完全懂得，方言是民族语言的支派，是不能代替民族语言的。可是，这些同志看来是不很同意语言同方言是有区别的……

显然，这段话是引用得不恰当的，因为恩格斯在这里不是说“阶级语言”，而主要是说阶级的思想、观念、习俗、道德原则、宗教和政治。资产者和无产者的思想、观念、习俗、道德原则、宗教和政治是绝对对立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同民族语言或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难道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的存在，就能作为主张语言有“阶级性”的论据吗？或者作为反对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的论据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同时清楚地知道，在民族内部存在着阶级矛盾。这些同志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论点呢？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10页。——编者注

有人援引拉法格的话，说拉法格在《语言和革命》^①这本小册子中承认语言的“阶级性”，似乎他否认全民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这是不对的。拉法格的确谈论过“贵族语言”和社会各个阶层的“习惯语”。但是这些同志忘记了拉法格关心的不是语言和习惯语的区别问题，他把这些方言有时叫作“人造语”，有时叫作“习惯语”。在这本小册子中，他肯定地说：“使贵族显得与众不同的人造语……是从资产者、手艺人、城市和乡村都讲的那个全民语言中分出来的。”

可见，拉法格是承认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它的必要性的，他完全懂得“贵族语言”及其他方言和习惯语是从属性的，是依附于全民语言的。

因此，引证拉法格的话没有达到目的。

有人说，有一个时期英国封建主“在几百年中”说法语，而那时英国人民却说英语，这一情况似乎可以作为主张语言有“阶级性”和反对全民语言的必要性的论据。但是，这不是什么论据，而象是一种笑话。第一，那时说法语的，并不是所有封建主，而是在国王宫廷和伯爵领地中为数不多的一部分英国封建主上层分子。第二，他们并不是说什么“阶级语言”，而是说普通的全民的法语。第三，大家知道，这种好讲法语的风尚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让位给全民的英语。这些同志是否认为英国封建主同英国人民“在几百年中”相互交谈时是经过翻译的呢？是否认为英国封建主完全不说英语而全民的英语在那时是不存在的呢？是否认为那时法语在英国比只在英国贵族上层的狭小圈子里通行的沙龙语言更广泛一

^① 即保尔·拉法格的《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关于现代资产阶级根源的研究）》。——编者注。

些呢？怎么可以根据这种笑话式的“论据”来否认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呢？

俄国贵族有一个时候在宫廷和沙龙里也有好讲法语的风尚，他们以讲俄语时夹杂些法语、以会讲总是带着法国口音的俄语而自鸣得意。这是不是说那时在俄国就没有全民的俄语，那时全民的语言就是虚构的，而“阶级语言”才是实在的呢？

这些同志在这里至少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在于，他们把语言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他们以为既然上层建筑有阶级性，那么语言也应当不是全民的而是阶级的。但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语言和上层建筑是两种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容许把它们混为一谈。

第二个错误在于，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之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当成社会的完全分裂，当成两个敌对阶级间斩断了一切联系。他们认为既然社会分裂了，再没有统一的社会，而有的只是阶级，那么就不需要有对社会是统一的语言，不需要民族的语言了。既然社会分裂了，并且没有全民的、民族的语言，那么留下的是什么呢？留下的是阶级和“阶级语言”。显然，每个“阶级语言”都会有自己的“阶级的”语法——“无产阶级的”语法、“资产阶级的”语法。其实这样的语法在天地间是不存在的。可是这件事并没有使这些同志感到为难，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语法总会出现的。

有个时候，我国有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断言十月革命后在我国保留下来的铁路是资产阶级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这样的铁路是不体面的事，需要把它挖掉，建筑新的“无产阶级的”铁路。他们因此获得了一个外号，叫作“穴居野人”……

显然,这种对社会、阶级、语言的鄙陋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是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但是这种观点的确在我们某些弄糊涂了的同志的头脑中存在着,而且继续存在着。

以为有了残酷的阶级斗争,社会似乎就分裂成了在一个社会中相互间再也没有任何经济联系的各个阶级,这当然是不正确的。相反地,只要有资本主义存在,资产者和无产者相互之间便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他们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两个部分。资产者如果没有受他们支配的雇佣工人就不能生活和发财,无产者如果不受雇于资本家,也不能继续生存。中断他们之间的一切经济联系,就是中断一切生产,而中断一切生产就会使社会灭亡,阶级本身灭亡。显然,没有一个阶级情愿使自己灭亡。因此,阶级斗争不管怎样尖锐,是不会引起社会分裂的。只有对马克思主义问题无知,对语言的本质一窍不通,才会使我们某些同志说出社会分裂、“阶级的”语言、“阶级的”语法之类的荒唐话。

其次,有人引证列宁的话,说列宁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族文化口号是民族主义的口号。这一切都是对的,在这一点上,列宁绝对正确。但是这同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这些同志引证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两种文化的话,显然是想使读者相信:在社会上既然存在着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那么语言也应当有两种,因为语言是同文化相联系的,——由此可见,列宁否定了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由此可见,列宁主张“阶级的”语言。这些同志在这里的错误,是他们把语言和文化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其实,文化和语言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文化可以有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而语言却是交际的工

具，永远是全民的，它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俄语、乌克兰语、乌兹别克语现在为这些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得并不坏，正象在十月革命以前为这些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服务得并不坏一样，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可见，这些同志断言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存在，就会形成两种不同的语言，就会导致否定统一语言的必要性，——这是大错特错了。

列宁说到两种文化的时候，所持的出发点正是：两种文化的存在，并不会导致否定统一的语言和形成两种语言，语言应当是统一的。崩得分子曾指责列宁，说他否认了民族语言的必要性，而把文化解释为“无民族性的”。大家知道，列宁严厉地反驳了这种说法。列宁说：他反对的是资产阶级文化，而不是民族语言，他认为民族语言的必要性是无可争论的。^①奇怪的是，我们有些同志竟步了崩得分子的后尘。

至于说列宁似乎否定了统一的语言的必要性，那么就应当听一听列宁说的下面的话：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②

可见，这些尊敬的同志歪曲了列宁的观点。

最后，有人援引斯大林，他们引用斯大林的话说：“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的政党在这个时期始终是这种民族的主要领导力量。”^③这都是正确的。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的政党的确领导着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0卷第5—7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08页。——编者注

③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90页。——编者注

资产阶级文化，正如无产阶级及其国际主义的政党领导着无产阶级文化一样。可是这同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难道这些同志不知道，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民族语言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吗？难道这些同志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有名的公式：现在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等的文化，按其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按其形式即按其语言是民族的？这些同志是否同意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呢？

我们这些同志在这方面的错误在于，他们看不到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别，并且不懂得文化按其内容说是随着社会发展的每个新时期改变的，语言则在几个时期中基本上是不变的，同样地既服务于旧文化，也服务于新文化。

总括说来：

（一）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的一切成员是共同的；

（二）方言和习惯语的存在并不否定，而是肯定全民语言的存在，因为方言和习惯语是全民语言的支派，并且从属于全民语言；

（三）语言有“阶级性”的公式是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

问：语言的特征是什么？

答：语言属于在社会存在的时间内始终起作用的社会现象之列。它随着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社会以外是没有语言的。因此要了解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就必须把语言同社会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

语言是手段、工具，人们利用它来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语言是同思维直接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

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和句中词的组合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了。

思想交流是经常极端必要的,因为没有思想交流,就不可能调整人们在同自然力的斗争中,在生产必需的物质资料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就不可能在社会生产活动中获得成就,因而就不可能有社会生产本身的存在。可见没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语言,没有对社会一切成员是共同的语言,社会就会停止生产,就会崩溃,就会无法作为社会而存在下去。就这个意义来说,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又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

大家知道,语言中所有的词共同构成所谓语言的词汇。语言的词汇中的主要东西就是基本词汇,其中就包括成为它的核心的全部根词^①。基本词汇比语言的词汇少得多,可是它的生命却长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长时期中生存着,并且为构成新词提供基础。词汇反映语言的状况;词汇越丰富、越纷繁,语言也就越丰富、越发达。

但是词汇本身还不是语言,词汇好比是语言的建筑材料。建筑业中的建筑材料并不就是房屋,虽然没有建筑材料就不可能建成房屋。同样,语言的词汇也并不就是语言,虽然没有词汇,任何语言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当语言的词汇受着语言语法的支配的时候,就会获得极大的意义。语法规定词的变化规则、词组合成句的规则,这样就赋予语言一种有条理、有含义的性质。语法(词法、句法)是词的变化规则和句中词的组合的规则汇集。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有了语法,语言才有可能赋予人的思想以物质的语言的外壳。

^① 指仅由一个词根构成的单纯词。——编者注

语法的特点在于,它得出词的变化规则,而这不是指具体的词,而是指没有任何具体性的一般的词;它得出造句的规则,而这不是指某些具体的句子,例如具体的主语、具体的谓语等等,而是指任何的句子,不管某个句子的具体形式如何。因此语法从词和句的个别和具体的东西中抽象出来,研究作为词的变化和句中词的组合的基础的一般的東西,并且以此构成语法规则、语法规律。语法是人类思维长期的、抽象化的工作的成果,是思维的巨大成就的标志。

就这一方面来说,语法很象几何学,几何学得出自己的定理,也是从具体对象中抽象出来,把各种对象看成没有具体性的物体,不是规定某些具体对象之间的具体关系,而是规定没有任何具体性的一般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语言和上层建筑不同,上层建筑同生产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经济这个中介。语言则同人的生产活动直接联系着,正象它同人的工作的一切范围(毫无例外)中的其他一切活动直接联系着一样。因此语言的词汇对于变化是最敏感的,它处在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此外语言还有一点和上层建筑不同,它无须等待基础的消灭,它在基础消灭以前,且不管基础的状态怎样,就使自己的词汇发生变化。

但是语言的词汇的变化不是象上层建筑一样的,不是以废除旧的、建设新的那种方法来实现,而是以新词去充实现有词汇的方法来实现,这些新词是由于社会制度改变,由于生产、文化、科学等等发展而产生的。同时,虽然通常从语言的词汇中消失一些已经陈旧的词,可是增添的新词的数量却要得多得多。至于基本词汇,基本上是完全保留下来的,并且被当作语言的词汇基础来使用。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既然基本词汇能在许多历史时期中被有效地利用,那就没有任何必要去消灭它,况且把千百年积累起来的基本词汇消灭掉了,又不可能在很短期间内创造出新的基本词汇,那就会使语言瘫痪,就会把人们相互交际的事情完全弄糟。

语言的语法构造比语言的基本词汇变化得还要慢。语法构造是许多时代以来形成的,它在语言中根深蒂固,所以它的变化比基本词汇还要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当然也发生变化,它逐渐改进着,改善自己的规则并使之更精确,用新的规则充实起来。但是语法构造的基础在很长的时期中都保留着,因为历史证明,这些基础能够在许多时代中有效地为社会服务。

由此可见,语言的语法构造及其基本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特点的本质。

历史表明,语言有巨大的稳固性和对强迫同化的极大的抵抗力。有些历史学家不去解释这种现象,而只是表示惊奇。可是这里并没有值得惊奇的任何根据。语言的稳固性是由它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的稳固性造成的。土耳其的同化主义者,曾经在几百年中竭力摧残、破坏和消灭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语言。在这个时期中,巴尔干各族人民语言的词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接受了不少土耳其的词语,发生过“聚合”和“分离”,可是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语言还是坚持下来和生存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语言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在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了。

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不能把语言及其结构看作是某一个时代的产物。语言结构,即语言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是许多时代的产物。

可以推想,现代语言的要素还在奴隶制时代以前的远古时期

就已奠下基础了。那时语言是不复杂的,词汇是很贫乏的,但是有它的语法构造,虽然这种构造是很原始的,但总算是语法构造。

生产的继续发展,阶级的出现,文字的出现,国家的产生,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商业的发展,商业更需要有条理的书信来往,印刷机的出现,出版物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给语言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中许多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分解了和离散了,混合了和融合了,而往后,就出现了民族语言和国家,发生了革命,旧的社会制度被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所有这一切,给语言及其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变化。

但是,如果以为语言的发展也象上层建筑一样,是用消灭现存的和建设新的那种方法来发展的,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语言的发展不是用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的方法,而是用扩大和改进现存语言基本要素的方法来实现的。并且语言从一种质过渡到另一种质,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一下子破旧立新,而是经过语言的新质和新结构的要素逐渐的长期的积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死亡来实现的。

有人说,语言发展的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为语言发展的阶段论认为突然的爆发是必要的,是语言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的条件。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这个理论中,很难找到任何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如果阶段论真的认为在语言发展历史中有突然的爆发,那就更糟了。马克思主义不承认在语言发展中有突然的爆发,有现存语言的突然死亡和新语言的突然创造。拉法格说在法国“1789年到1794年间发生了突然的语言革命”(见拉法格的《语言和革命》这本小册子),是不正确的。那时在法国没有任何语言革命,更谈不上什么突然的语言革命。当然,在这个时期中法语的

词汇增加了许多新词语,消失了一些陈旧的词,有些词的含义改变了,仅此而已。但是这样的改变,丝毫也不决定语言的命运。语言中主要的东西是它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语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保存下来,没有重大的改变,不仅保存下来了,而且直到现在,在现代的法语中还继续生存着。更不用说,要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立新的民族语言(“突然的语言革命”!),五六年的时间是少得可笑,这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从旧质过渡到新质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而是经过新质的要素的逐渐积累,也就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死亡来实现的。

总之,应当告诉那些醉心于爆发的同志,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经过爆发的规律,不仅不适用于语言发展的历史,而且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于诸如基础或上层建筑之类的其他社会现象。对于分成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就决不是必需的了。我们曾在8—10年的时间中实现了我国农业从资产阶级的个体农民的制度到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制度的过渡。这是一个在乡村中消灭旧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可是这个变革的实现,不是经过爆发,就是说,不是经过推翻现政权和建立新政权来实现的,而是经过从乡村中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到新的制度的逐渐过渡来实现的。这件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这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这种变革是根据现政权的倡导、在基本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实现的。

有人说,历史上有过各种语言融合的许多事实,由此可以推想,在融合的时候,新语言的形成是经过爆发,经过从旧质到新质

的突然过渡而发生的。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对的。

语言的融合不能看作是在几年中就能得出结果的一次决定性的突击行动，语言的融合是延续几百年的漫长的过程。因此这里谈不上任何的爆发。

其次，如果以为两种语言融合的结果，会得出一种新的第三种语言，它不象这两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并且同其中任何一种都有质的区别，这种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在融合的时候，通常是其中某一种语言成为胜利者，保留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并且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继续发展，另一种语言则逐渐失去自己的本质而逐渐死亡。

可见融合并不产生什么新的第三种语言，而是保留其中的一种语言，保留它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使它能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继续发展。

诚然，在这种情况下，胜利的语言会从失败的语言中吸取一些词来丰富自己的词汇，但是这并不是削弱它，相反地，是加强它。

例如，俄语就是这样，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同好几个民族的语言融合，并且总是成为胜利者。

当然，俄语的词汇由于从其他语言中取得了许多词而充实起来了，但是这不仅没有使俄语削弱，相反地，使它丰富和加强起来。

至于俄语的民族特质，并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害，因为它保留了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而继续前进，继续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趋于完善。

无疑地，语言融合论并不能给予苏联语言学任何重要的东西。语言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如果这是对的，那就应当承认，语言融合论不仅不能解决这个任务，甚至没有提出

这个任务，——它简直是没有注意到这个任务，或者是不懂得这个任务。

问：《真理报》开展语言学问题的自由讨论，是否做得对？

答：做得对。

语言学问题将朝着什么方向解决，这到讨论结束时就会清楚的。但是现在已经可以说，这次讨论有了很大的益处。

首先，这次讨论发现了在中央和各共和国的语言学机关中，有一种为科学和科学工作者所不应有的制度统治着。稍微批评一下苏联语言学状况，甚至连十分胆怯地试图批评语言学中的所谓“新学说”，都会遭到语言学界领导集团的压迫和制止。语言学方面的一些优秀的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由于对尼·雅·马尔的遗著采取了批判态度，由于对尼·雅·马尔的学说稍微表示不赞同，就被撤职或降级。有一些语言学工作者提升到负责职位，并不是由于他能干，而是由于他无条件地尊奉尼·雅·马尔的学说。

谁都承认，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批评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不可能有成就。可是这个公认的规则，竟被忽视和极粗暴地践踏了。一些自认为完全正确的领导者组成了一个排他的小集团，保证自己不受任何的批评，恣意横行，为所欲为。

举一个例子，所谓《巴库教材》(尼·雅·马尔在巴库所讲授的讲义)本来已经由著者本人废弃并禁止翻印，但是这帮领导者(梅夏宁诺夫同志称他们为尼·雅·马尔的“学生”)竟下令重印，并且把它作为参考书，毫无保留地推荐给学生。把本来已经废弃了的《教材》当作完美无缺的参考书，这就是欺骗了学生。如果我不是相信梅夏宁诺夫同志和其他的语言学工作者的诚实，那我就要说，这样的行为就等于暗害行为。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这是因为在语言学界形成的阿拉克切耶夫制度^①，养成不负责任的习气，助长这种专横行为。

讨论所以非常有益，首先是因为它揭露了这种阿拉克切耶夫制度，并且把它打得粉碎。

但是讨论的益处还不限于此。讨论不仅粉碎了语言学界的旧制度，而且还暴露了对于语言学中一些最重要问题的一种不可思议的糊涂观念，这种糊涂观念竟在这门科学的领导集团中占着统治地位。在开始讨论以前，尼·雅·马尔的“学生们”默不作声，隐瞒了语言学中的恶劣情况。讨论开始以后，到了无法再沉默的时候，他们才迫不得已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结果怎样呢？原来在尼·雅·马尔学说中有许多破绽、错误、不明确的问题和没有经过探讨的论点。试问，尼·雅·马尔的“学生们”为什么直到现在展开讨论以后才说出这些东西来呢？为什么他们以前没有关心这些东西呢？为什么他们当时没有以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公开老实地说出这些东西呢？

尼·雅·马尔的“学生们”承认了尼·雅·马尔的“某些”错误以后，看来还以为只有在“订正了的”尼·雅·马尔理论的基础上，苏联语言学才能进一步发展。他们认为尼·雅·马尔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不，让我们摆脱尼·雅·马尔的“马克思主义”吧！尼·雅·马尔的确曾经想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曾经为此努力过，可是他没有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同“无产阶级文化派”或“拉普派”一样，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了。

尼·雅·马尔把语言是上层建筑这样一个不正确的非马克思

^① 指 19 世纪头 25 年在俄国施行的警察暴虐、军阀专横、用暴力镇压人民的制度，因其推行者陆军大臣阿·安·阿拉克切耶夫伯爵而得名。——编者注

主义的公式塞进语言学,他弄糊涂了自己,也弄糊涂了语言学。苏联语言学在这种不正确的公式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发展的。

尼·雅·马尔把语言有“阶级性”这另一个同样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塞进语言学,他弄糊涂了自己,也弄糊涂了语言学。苏联语言学在这种同各民族历史和各语言历史全部进程相矛盾的不正确的公式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发展的。

尼·雅·马尔给语言学带来一种为马克思主义所不应有的不谦虚的、骄横的、妄自尊大的腔调,以至于轻率地空口否定尼·雅·马尔以前语言学中的一切。

尼·雅·马尔大肆叫嚣,污蔑历史比较法^①是“唯心主义的”。其实应当说,历史比较法虽然有严重缺点,但是毕竟比尼·雅·马尔的真正唯心主义的四要素分析法^②要好,因为前者还推动语言研究工作,后者却只是要人躺在炕上,围绕着标榜一时的四要素去胡思乱想。

尼·雅·马尔妄自尊大地贬斥研究语言类别(系族)的任何企图,认为这是“原始语”^③理论的表现。其实,不可否认,语言的亲属关系,例如各斯拉夫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无疑是存在的;研究这些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会在研究语言发展规律方面给语言学

① 19世纪初开始采用的一种研究语言史前史的方法。它通过亲属语言或方言的比较,揭示其语音对应规律,构拟原始语的系统,以说明亲属语言和方言的形成和演变。——编者注

② 即尼·雅·马尔的所谓四要素古生物学分析法。马尔认为:人类最初的语言发音成分不外四个要素,每一要素由两个辅音组成,按原来图腾部落的观念和名称分别称作 сал, бер, йон, рош;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是由这四个要素发展而来的。——编者注

③ 亦称基础语,母语或祖型语。按历史比较语言学家的一般理解,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都是由同一原始语分化发展而成的。——编者注

带来很大的益处。更不用说,“原始语”理论同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听了尼·雅·马尔的说法、特别是他的“学生们”的说法,会使人以为在尼·雅·马尔以前不曾有过任何语言学,语言学是从尼·雅·马尔的“新学说”出现以后才开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要谦虚得多,他们认为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以前时期包括哲学在内的各种科学发展的产物。

因此,这次讨论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的事业,这就是它暴露了苏联语言学中的思想错误。

我想,我们的语言学愈快地摆脱尼·雅·马尔的错误,就能愈快地摆脱它现在所遭受的危机。

取消语言学界的阿拉克切耶夫制度,抛弃尼·雅·马尔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语言学中去,——我看,这就是苏联语言学健全发展的道路。

载于1950年6月20日《真理报》

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

答叶·克拉舍宁尼科娃同志

克拉舍宁尼科娃同志:

对您的问题回答如下。

1. 问: 您的文章令人信服地指出,语言既不是基础,也不是上层建筑。那么,认为语言既是基础所具有的,又是上层建筑所具有

的一种现象是否恰当?还是认为语言是一种中间的现象更正确些?

答:当然,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具有一切社会现象(包括基础和上层建筑)所固有的那种共同特点的,这就是说,它为社会服务,正如其他一切社会现象(包括基础和上层建筑)为社会服务一样。但是,一切社会现象所固有的共同东西,其实也仅限于此。再进一步,便开始了各个社会现象之间的严重差别。

问题在于,社会现象,除了这个共同点之外,还有自己专门的特点,这些专门的特点使社会现象互相区别,而这些专门特点对于科学最为重要。基础的专门特点就是:基础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上层建筑的专门特点就是:上层建筑以政治、法律、美学等思想为社会服务,并且为社会创造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和其他的设施。语言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的专门特点是什么呢?这就是:语言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作为社会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为社会服务的,这个工具使人们能够相互了解并调整他们在人类活动的一切范围(包括生产的领域,也包括经济关系的领域,包括政治的领域,也包括文化的领域,包括社会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共同工作。这些特点仅仅是语言所特有的,正因为它们仅仅是语言所特有的,语言才是独立的科学——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没有语言的这些特点,语言学就会丧失独立存在的权利。

简短些说,语言既不能列入基础一类,也不能列入上层建筑一类。

语言也不能列入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中间”现象一类,因为这种“中间”现象是不存在的。

但是语言也许可以列入社会生产力一类,譬如说,列入生产工具一类吧?的确,语言和生产工具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之点,

生产工具，象语言一样，对于各个阶级表现出一种一视同仁的态度，并能同样地服务于社会各个不同的阶级——不管是旧的阶级，或是新的阶级。根据这个情况是否可以把语言列入生产工具一类呢？不，不可以。

有一个时候，尼·雅·马尔看到他的“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公式遭到了反对，就决定“改造”一下，宣称“语言是生产工具”。尼·雅·马尔把语言列入生产工具一类，是否对呢？不，他完全不对。

问题在于，语言和生产工具之间的类似之处，只限于我刚才所说的那一点。但是语言和生产工具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生产工具生产物质资料，而语言则什么也不生产，或者只是“生产”词而已。确切些说，有生产工具的人能够生产物质资料，但是同样这些人如果只有语言而没有生产工具，那就不能够生产物质资料。不难了解，假如语言能够生产物质资料，那么夸夸其谈的人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富的人了。

2. 问：马克思和恩格斯给语言下了一个定义，说它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①，是“实践的……现实的意识”^②。马克思说：“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③ 依据您的意见，语言学应当在哪种程度上来研究语言的含义方面，研究语义学和历史语义学以及修辞学呢？或者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只应当是形式吗？

答：语义学是语言学的重要部分之一。词语的含义方面在研究语言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应当保证语义学在语言学中应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5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9页。——编者注

有的地位。

然而，在研究语义学问题和使用它的材料时，千万不可过高估计它的意义，尤其不可滥用它。我指的是某些语言学者，他们过分沉醉于语义学，无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同思维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他们把思维同语言分割开来，硬说语言在消亡着，没有语言也行。

请注意尼·雅·马尔所说的下面的话：

“语言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它以声音表露出来；思维的活动没有表露也可以进行。……语言(有声的)现在已开始把自己的职能让给那些绝对战胜空间的最新发明了，而思维则借其未加利月的过去的积累和新的成就而上升，并且将排挤和完全代替语言。未来的语言就是在不依赖于自然物质的技术中成长起来的思维。在它面前，任何语言，甚至有声的、仍然同自然规范相联系的语言也会站不住脚。”(见尼·雅·马尔的《选集》)

如果把这种施展“魔力”的玄妙莫测的话译成普通人讲的话，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尼·雅·马尔把思维同语言分割开来；

(二)尼·雅·马尔认为，人们的交际，不用语言，而借助不依赖于语言的“自然物质”、不依赖于“自然规范”的思维本身就可以办到；

(三)尼·雅·马尔把思维同语言分割开来，又使思维“不依赖于”语言的“自然物质”，他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

有些人说，思想是在用言语表达出来之前就在人的头脑中产生的，是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外壳、可以说是以赤裸裸的形态产生的。但是这种说法完全不对。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

上、在语言的词和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思想的实在性表现在语言之中。只有唯心主义者才能谈到同语言的“自然物质”不相联系的思维,才能谈到没有语言的思维。

简短些说,过高估计语义学和滥用语义学,使尼·雅·马尔走向唯心主义。

因此,如果保护语义学,防止象尼·雅·马尔和他的“学生们”那样加以夸大和滥用,那么语义学对语言学就能有很大的益处。

3.问: 您十分正确地指出,资产者和无产者的思想、观念、习俗和道德原则是绝对对立的。这些现象的阶级性质必然反映在语义方面(有时也反映在语言的形式上即词汇上,如您的文章中所正确指出的)。在分析具体的语言材料时,首先在分析语言的含义方面时,可不可以说,语言表现了概念的阶级实质?特别是在讲到语言不仅表现人的思想,而且也表现人对现实的态度时(这时人的阶级属性表现得特别明显),可不可以说,语言表现了这些概念的阶级实质?

答: 简单说来,您想知道,阶级是否影响到语言?阶级是否把自己专门的词语塞进语言中去?人们依据阶级属性而赋予同一词语以不同的含义的情形有没有呢?

是的,阶级影响到语言,并且把自己专门的词语塞进语言中去,有时也对同一个词语有不同理解。这是不用怀疑的。

然而,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专门的词语以及语义上的差别,对于统一的全民语言的发展会有重大的意义,它们会削弱全民语言的意义或改变它的性质。

第一,这种专门的词语,以及语义上的差别,在语言中是极少的,未必能占全部语言材料的百分之一。因此,占绝大多数的其他所有的词语以及它们的语义对于社会各阶级是**共同的**。

第二,在言语中应用带有阶级色彩的专门的词语时,并不是按照某种“阶级”语法的规则(这种语法在天地间是不存在的),而是按照现有的全民语言的语法规则。

因此,专门的词语的存在以及语义上的差别的事实,并不推翻统一的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相反地,是证实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

4.问:您在文章中完全正确地评价了马尔,说他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这是不是说:语言学家们,包括我们这些青年在内,应该抛弃马尔的**全部**语言学遗产呢?可是马尔仍然作过一些有价值的语言研究(契科巴瓦、桑热耶夫及其他一些同志在讨论中都曾写到这些)。我们在批判地研究马尔的同时,是否还可以吸取他的有用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呢?

答:当然,尼·雅·马尔的著作并不完全是错误的。尼·雅·马尔之所以犯了极重大的错误,是由于他把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成分塞进语言学中去,他企图创造一种独立的语言理论。但是尼·雅·马尔有个别优秀的、写得很精彩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忘掉了自己在理论上的野心,诚实地而且可以说是很有办法地研究了某些语言。在这样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不少有价值的和值得学习的东西。显然,这种有价值的和值得学习的东西,应当从尼·雅·马尔那里吸取过来加以利用。

5.问:许多语言学家认为**形式主义**是苏联语言学停滞的基本原因之一。语言学中的形式主义究竟表现在哪里以及如何克服

它？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很想知道您的意见。

答：尼·雅·马尔及其“学生们”责难一切不赞成尼·雅·马尔“新学说”的语言学者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当然是不严肃的和不明智的。

尼·雅·马尔认为语法是一种空洞的“形式”，认为那些把语法构造当作语言基础的人是形式主义者。这就是极端愚蠢了。

我认为“形式主义”是“新学说”的创造者们为了便于同自己在语言学界的对手作斗争而捏造出来的。

苏联语言学停滞的原因，并不是尼·雅·马尔及其“学生们”所发明的“形式主义”，而是语言学界的阿拉克切耶夫制度和理论上的缺陷。阿拉克切耶夫制度是尼·雅·马尔的“学生们”建立的。尼·雅·马尔及其最亲近的战友们给语言学带来了理论上的混乱。为了不再有停滞现象，就应该把两者一起铲除。铲除这些溃瘍，才会使苏联语言学健康起来，才会使它走上康庄大道，才会使苏联语言学能够在世界语言学中占第一位。

1950年6月29日

载于1950年7月4日《真理报》

答 同 志 们

答桑热耶夫同志

尊敬的桑热耶夫同志：

答复您的来信太迟了，因为您的信昨天才从中央机关转给我。

您无疑是正确地解释了我在方言问题上的观点。

“阶级”方言，正确些说，应当叫作习惯语，并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而是为少数社会上层分子服务的。此外，它们没有自己本身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因此，它们无论如何不能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

相反地，地方（“地域”）方言，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并且有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因此，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нация）形成过程中可以成为民族语言的基础并发展成为独立的民族语言。例如，成为俄罗斯民族语言基础的俄语中的库尔斯克-奥廖尔方言（库尔斯克-奥廖尔“话”），情形就是这样。成为乌克兰民族语言基础的乌克兰语中的波尔塔瓦-基辅方言，也应该说是这样的。至于这些语言中的其他方言，则丧失自己的独特性，溶入这些语言，并在这些语言中消失。

也有相反的发展过程，一个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发展条件而还未成为民族（нация），它的统一的语言由于该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国家的崩溃而瓦解；在统一语言中还没有消失的地方方言，却活跃起来并成为形成单独独立语言的基础。例如，统一的蒙古语可能就是这样。

1950年7月11日

载于1950年8月2日《真理报》

答德·别尔金和斯·富列尔两同志

你们的信收到了。

你们的错误是把两种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并用另外的题目偷换了我给克拉舍宁尼科娃同志的答复中所研究的题目。

1. 我在那封复信中批判了尼·雅·马尔，因为他在谈到语言（有声语言）和思维时，把语言同思维分割开来，因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由此可见，我在复信中所说的是会讲话的正常的人。我并且断定说：这种人的思想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在会讲话的人那里，是不存在同语言材料没有联系的赤裸裸的思想的。

你们没有接受或驳斥这个论点，却举出了不正常的不会讲话的人、聋哑人来，这些人不会讲话，当然他们的思想不能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产生。由此可见，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我没有讲到也不能讲到，因为语言学研究的是会讲话的正常的人，而不是不会讲话的不正常的聋哑人。

你们用没有讨论过的另外一个题目来偷换正在讨论的题目。

2. 从别尔金同志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把“词的语言”（有声语言）和“手势语言”（照尼·雅·马尔的说法叫“手”语）同等看待。看来他认为：手势语言和词的语言是同等的东西；人类社会有一个时期是没有词的语言的，当时“手”语起到了后来出现的词的语言的作用。

但是，如果别尔金同志当真是这样想的，那么他就犯了严重的错误。有声语言或词的语言始终是人类社会唯一的能作人们完善的交际工具的语言。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哪怕是最落后的社会，会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民族学不知道有任何一个落后的民族（народы），哪怕是象 19 世纪的澳洲人或火地

人^①那样原始的或比他们更原始的民族(народы),会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有声语言在人类历史上是帮助人们脱离动物界、结成社会、发展自己的思维、组织社会生产、同自然力量作胜利的斗争并取得我们今天的进步的力量之一。

由于所谓的手势语言极端贫乏和有限,它在这一方面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其实这不是语言,甚至也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代替有声语言的语言代用品,而是人们有时用来强调自己言语中的某些地方的辅助手段,这个辅助手段在表现方法上是极其有限的。不能把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等量齐观,正如不能把原始の木锄和带有五铧犁和条播机的现代的履带拖拉机等量齐观一样。

3.由此可见,你们所注意的首先是聋哑人,然后才是语言学问题。显然地,正是这种情况使你们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好吧,如果你们要坚持,我不妨满足你们的要求吧。那么聋哑人的情形到底怎样呢?他们的思维是否在活动,思想是否在产生呢?是的,他们的思维是在活动,思想是在产生。很明显,既然聋哑人不能讲话,他们的思想就不能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产生。这是不是说,聋哑人的思想是赤裸裸的、同“自然规范”(尼·雅·马尔的用语)没有联系的呢?不,不是的。聋哑人的思想的产生和能够存在,只能根据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视觉、触觉、味觉、嗅觉而形成的对于外界对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形象、知觉和观念。在这些形象、知觉、

① 澳洲人指澳洲土著人。他们在19世纪时还保存着原始氏族公社制度,崇拜图腾,各部落有自己的语言。据调查,澳洲土著人的语言不下百余种。

火地人指南美洲南端火地岛的印第安人。他们是16世纪被欧洲殖民者从南美洲大陆驱逐到这个苦寒地区的,以数十人的亲属集团为单位营渔猎生活,19世纪时仍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编者注

观念之外，思想就是空洞的，没有任何内容的，就是说，它是不存在的。

1950 年 7 月 22 日

载于 1950 年 8 月 2 日《真理报》

答阿·霍洛波夫同志

您的信收到了。

由于工作很忙，答复稍迟了些。

您的信是从两个没有说出来的假定出发的：第一个假定认为，引证某一作者的著作时可以脱离引文中所讲到的历史时期，第二个假定认为，从研究一个历史发展时期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和公式，对于一切发展时期都是正确的，因而应当是一成不变的。

应当说，这两个假定都大错特错了。

举几个例子来说。

1. 在 19 世纪 40 年代，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多少平稳地在向上发展，向还未被它占领的新的地域扩张，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还不能充分有力地发生作用，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某一个国家内不可能胜利，它只有在所有的或大多数的文明国家里进行共同的攻击才能胜利。这个结论后来便成了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指导原理。

可是在 20 世纪初，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谁都明白，

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显然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上升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战争揭露了世界帝国主义阵线的无法克服的弱点，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预先就决定了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成熟的时间不同，这时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出结论：在新的发展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完全可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内同时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些国家内革命的成熟是不平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了。

由此可见，关于社会主义胜利问题，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结论，它们不仅是互相矛盾的，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某些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不深入问题的本质，脱离历史条件而作形式上的引证，他们会说：这两个结论中有一个是绝对不正确的，应当抛弃，而另一个结论是绝对正确的，应当推广到一切发展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这两个结论都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每一个结论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论对于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而列宁的结论则对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

2.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国家应当消亡。^①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内的一些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便以此为根据，开始要求党采取措施使我们的国家尽快地消亡，把国家机关解散，把常备军取消。

但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对当代世界形势的研究，得出了结论：在资本主义包围存在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只在一个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页。——编者注

国家内取得胜利,而所有其他国家被资本主义所统治的时候,革命胜利了的国家,要想不被资本主义的包围击溃,就不应当削弱而应当大力加强自己的国家,加强自己的国家机关、侦察机关和军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得出结论:恩格斯的公式是指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内获得胜利而言的,当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他一切国家仍被资本主义所统治的时候,这个公式就不适用了。

由此可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命运问题,这里有两个不同的互相排斥的公式。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会说:这种情形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状况,必须抛弃其中一个绝对错误的公式,而把另外一个绝对正确的公式推广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一切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是错误的,因为这两个公式都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每一个公式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公式对于社会主义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是正确的,而恩格斯的公式则对于下一时期是正确的,即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陆续的胜利将导致社会主义在大多数国家内的胜利,从而造成实行恩格斯公式的必要条件。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更多。

对于霍洛波夫同志信中引证斯大林的不同著作中关于语言问题的两个不同的公式,也应该这样说。

霍洛波夫同志引证斯大林《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著作,其中作了一个结论:两种语言融合的结果,通常是某一种语言成为胜利者,而另一种则会死亡;可见融合并不产生什么新的第三种语言,而是保留其中的一种语言。其次,他又引证斯大林在联共

(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的另一个结论,那里说: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期,当社会主义已经巩固并且深入日常生活的时候,各民族语言必然会融合为一种共同的语言,这种语言当然不会是大俄罗斯语,也不会是德意志语,而将是某种新的语言^①。霍洛波夫同志把这两个公式对照了一下,发现它们不仅彼此不一致,而且互相排斥,于是失望了。他在信中写道:“从您的文章里我理解了语言的融合**永远**不会产生某种新的语言,可是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前,根据您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讲话,我曾确信:在**共产主义**时期,各种语言会融合成一个共同的语言。”

显然,霍洛波夫同志发现了这两个公式间的矛盾,并且深信矛盾应当消灭,于是认为必须丢掉公式中的不正确的一个,而抓住对于一切时代和国家都正确的另一个,但是究竟抓住哪一个呢,——他不知道。好象是走投无路了。霍洛波夫同志根本没有想到:两个公式可能都是正确的,——每一个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常常就是这样,他们不深入问题的本质,不管引文中所讲的历史条件而只作形式上的引证,就必然会走投无路。

然而,如果分析一下问题的本质,就没有任何根据感到走投无路了。问题在于:斯大林的《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小册子和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所指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因此所得出的公式也不相同。

斯大林在他的小册子中论及语言融合问题的那个公式,是指**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前的时代**,这时剥削阶级是世界上的统治力量,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仍然很厉害,国家的区别使

^①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6页。——编者注

民族隔离和各民族的互不信任根深蒂固,民族平等还不存在,语言的融合是通过争取其中一种语言的统治地位的斗争进行着,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的和平与友谊的合作条件还没有具备,摆在日程上的不是各种语言的合作和互相丰富,而是一些语言的被同化和另一些语言的胜利。很明显,在这种条件下,只能有胜利的语言和失败的语言。斯大林的公式说:譬如两种语言的融合,结果不是形成新的语言,而是其中一种语言胜利,另一种语言失败,这一公式正是指上述这些条件。

至于说到斯大林的另一个公式,即他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论及各种语言溶合为一种共同语言的这一公式,那么这里所指的是另外一个时代,也就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后的时代,那时世界帝国主义将不复存在,剥削阶级将被推翻,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将被消灭,民族隔离和各民族的互不信任将被各民族的互相信任和接近所代替,民族平等将会实现,压制和同化语言的政策将会取消,各民族间的合作将会建立,而各民族的语言将有可能在合作的方式下不受约束地互相丰富起来。很明显,在这些条件下,根本谈不到一些语言的被压制和失败与另一些语言的胜利。在这里我们遇到的将不是两种语言,其中一种遭受失败而另一种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而是好几百种民族语言,由于各个民族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长期合作,从这些语言中将首先产生出一些最丰富的统一的区域语言,然后这些区域语言再融合为一种共同的国际语言,这种语言当然既不是德语,也不是俄语或英语,而是吸取了各民族语言和各区域语言的精华的新语言。

因此,两个不同的公式适应于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时代,而且正因为它们是与之适应的,所以这两个公式都是正确的,——每一

个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

要求这两个公式不彼此矛盾,要求它们不互相排斥,这是何等的荒谬,这就象要求资本主义统治时代同社会主义统治时代不彼此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不互相排斥一样。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公式看作教条的汇集,这些教条是不顾社会发展条件的变化,而“永远”不变的。他们以为,如果他们把这些结论和公式都背熟了,并把它们胡乱地引证一番,那么他们就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他们指望背熟了的结论和公式对于一切时代和国家、对于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场合都是适用的。但是有这样想法的只能是那些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字母而没有看到它的实质、背熟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公式而没有懂得它们的内容的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是不能停滞不前的,——它是在发展着和完备着。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丰富起来,——因此,它的个别公式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不被适应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新公式和新结论所代替。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

1950年7月28日

载于1950年8月2日《真理报》

译自《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1953年版

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问：英国首相艾德礼最近在下院说，苏联在战争结束后没有裁军，即没有把军队复员，说从那时起，苏联愈来愈多地扩充自己的武装力量。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我认为艾德礼首相这样说是苏联的诽谤。

全世界都知道：苏联在战后已经把军队复员了。大家都知道，复员是分三批进行的：第一和第二两批是在1945年，第三批是自1946年5月至9月。此外，在1946年和1947年，又把苏军中年龄较大的人员复员，而在1948年初，所有剩下的年龄较大的人员都已经复员了。

这些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如果艾德礼首相擅长财政学或经济学，他就不难了解：没有哪一个国家，包括苏维埃国家在内，能够在尽力发展民用工业的时候，在开工修建需要数百亿预算支出的类似伏尔加河、第聂伯河、阿姆河上的水电站那样的伟大建设工程的时候，在继续实行同样需要数百亿预算支出的不断降低日用品价格的政策的时候，在投资数千亿以恢复被德国占领者破坏的国民经济的时候，还同时增加自己的武装力量，扩大军事工业。不难了解，这种轻率的政策必将招致国家的破产。艾德礼首相应该从他自己以及美国的经验中懂得，增加国家的武装力量和进行军备竞赛，就会使军事工业扩

大,民用工业缩减,就会使巨大的民用建设工程停顿,赋税增加,日用品价格上涨。显然,如果苏联不是缩减而是扩大民用工业,不是收缩而是扩大新的规模很大的水电站和灌溉系统的建设,不是停止而是继续实行降低物价的政策,那么,它要是不冒破产的危险,就不能同时又扩大军事工业和增加自己的武装力量。

如果艾德礼首相不顾所有这些事实和科学见解,仍然认为可以公开诽谤苏联和它的和平政策,那么,这只能说,他是想用诽谤苏联的办法来为工党政府现在正在英国进行的军备竞赛作辩解。

艾德礼首相所以需要诬蔑苏联,他所以需要把苏联的和平政策说成是侵略政策,而把英国政府的侵略政策说成是和平政策,是为了迷惑英国人民,硬要他们相信对苏联的诬蔑,从而用欺骗手段把他们拉进美国统治集团正在策划的新的世界大战。

艾德礼首相把自己说成是和平的拥护者。但是,如果他真的主张和平,为什么他拒绝苏联在联合国提出的关于苏联、英国、美国、中国、法国立即缔结和平公约的建议呢?

如果他真的主张和平,为什么他拒绝苏联关于立即开始裁减军备、立即禁止原子武器的建议呢?

如果他真的主张和平,为什么他迫害拥护保卫和平的人,为什么他禁止保卫和平大会在英国召开呢?难道保卫和平的运动威胁英国的安全吗?

显然,艾德礼首相所主张的不是维护和平,而是发动新的侵略性的世界大战。

问:关于对朝鲜的武装干涉,您的看法怎样?它的结局会怎样?

答：如果英国和美国最终拒绝了中国人民政府的和平建议，朝鲜的战争便只能以武装干涉者的失败而告终。

问：为什么？难道美国和英国的将军和军官比中国和朝鲜的差吗？

答：不，并不差。美国和英国的将军和军官一点也不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将军和军官差。至于美国和英国的士兵，大家都知道，在反对希特勒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战争中，他们表现得非常之好。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在于士兵们认为对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是非正义的，而对希特勒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战争是完全正义的。问题在于这场战争在美英的士兵中是极其不得人心的。

的确，很难使士兵们相信：既不威胁英国又不威胁美国而其台湾被美国人侵占了的中国是侵略者，而侵占了台湾并将军队推向中国边境的美国倒是自卫的一方。很难使士兵们相信：美国有权在朝鲜领土上和中国边境附近保卫美国的安全，而中国和朝鲜却没有权利在它们自己的领土上或在本国边境附近保卫自身的安全。因此，这场战争在英美士兵中是不得人心的。

显然，如果士兵们认为强迫他们进行的战争是极端非正义的，如果士兵们因此而在前线敷衍塞责，不相信他们的使命合乎正义，情绪低落，那么，就是最有经验的将军和军官也要吃败仗的。

问：您对于联合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决议看法怎样？

答：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耻的决议。

的确，只有丧尽了天良，才会硬说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岛并侵入朝鲜直逼我国边境的美国是自卫的一方，而保卫自己的边境并力求收复被美国人侵占的台湾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倒是侵

略者。

原来作为维护和平的堡垒而建立的联合国，现在正在变为战争的工具，变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工具。组成联合国中侵略核心的是 10 个参加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约的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挪威、冰岛）和 20 个拉丁美洲国家（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现在在联合国中决定着战争与和平的命运的就是这些国家的代表。就是他们在联合国中通过了可耻的诬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的决议。

现在联合国中事态的特点是：例如，美洲的一个小小的多米尼加共和国，人口未必有 200 万，现在却在联合国中和印度占有同样的比重，而比起在联合国中被剥夺了发言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那比重就更大得多了。

这样，联合国正在变成侵略战争的工具，同时它也就不再是权利平等的国家的世界性组织了。实际上，现在联合国与其说是世界性组织，还不如说是满足美国侵略者需要的美洲人的组织。不仅美国和加拿大力图发动新的战争，而且还有 20 个拉丁美洲国家，也走上了这一条道路，这些国家的地主和商人，渴望在欧洲或亚洲的某个地方爆发新的战争，以便以特别高的价格，向交战国出售货物，在这种血腥的生意中大发横财。20 个拉丁美洲国家的 20 个代表，现在是美国在联合国中的抱得最紧、最顺从的队伍，这一点对谁也不是秘密。

联合国就是这样走上了国际联盟的不光彩的道路。因而它正

在埋葬自己的道义上的威信,并注定要瓦解。

问: 您是否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答: 不。至少在目前,不能够认为是不可避免的。

自然,在美国、英国以及法国,都存在渴望新战争的侵略势力。他们需要战争,是为了获得超额利润,为了掠夺其他国家。这就是那些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他们把战争看作是能产生巨额利润的收入源泉。

他们,这些侵略势力,掌握着并且指挥着反动的政府。但他们同时又害怕本国人民,因为人民不要新的战争,主张维护和平。所以,他们力图通过反动政府,用谎言蒙蔽和欺骗本国人民,把新战争说成是防御战争,把爱好和平国家的和平政策说成是侵略政策。他们竭力欺骗本国人民,以便强使人民接受自己的侵略计划,并把人民拖入新的战争。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害怕保卫和平的运动,怕这个运动会揭穿反动政府的侵略意图。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否决了苏联关于缔结和平公约、裁减军备、禁止原子武器的建议,他们害怕通过这些建议便会破坏反动政府的侵略措施,并使军备竞赛成为不必要。

侵略势力和和平力量之间的这一斗争,会怎样结束呢?

如果各国人民将维护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并且把这一事业坚持到底,和平就能够保持和巩固。如果战争挑拨者蒙蔽了人民群众,欺骗了他们,把他们拖入新的世界大战,那战争就会成为不可避免。

因此,广泛的维护和平的运动,作为揭露战争挑拨者罪恶阴谋的工具,现在具有头等的意义。

至于苏联，它在今后也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奉行防止战争和维护和平的政策。

译自《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1952年版

关于原子武器问题 答《真理报》记者

问：对于苏联试验原子弹，近来外国报刊在吵吵嚷嚷，您对此种吵嚷的看法怎样？

答：的确，我国在不久以前试验了一种原子弹。今后还要按照我国防御英美侵略集团进攻的计划，进行各种规格的原子弹的试验。

问：由于原子弹的试验，美国各式各样的人士在发出警报，叫嚷美国的安全受到威胁。这种警报是否有任何根据？

答：这种警报是毫无根据的。

美国人士不会不知道，苏联不仅反对使用原子武器，而且还主张禁止原子武器，停止原子武器的生产。大家知道，苏联曾几次要求禁止原子武器，但是每一次都被大西洋集团的国家拒绝了。这就是说，一旦美国进攻我国，美国统治集团就将使用原子弹。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苏联才不得不备有原子武器，以便有充分准备来对付侵略者。

当然，侵略者希望在他们进攻苏联的时候，苏联没有武装。但是苏联不同意这样，认为应当有充分的准备来对付侵略者。

因此，如果美国不想进攻苏联，那么美国人士的警报就应该认为是无的放矢的，是虚构的，因为苏联并不想在什么时候进攻美国

或任何其他国家。

美国人士之所以不满，是因为原子武器的秘密已不仅仅为美国所有，而且已为其他国家，首先是苏联所有。他们想使美国成为原子弹生产的垄断者，想使美国拥有无限的可能性来恫吓和讹诈其他国家。可是他们到底有什么根据，有什么权利这样想呢？难道维护和平的利益需要这种垄断吗？事情恰好相反，正是维护和平的利益需要首先消除这种垄断，然后无条件地禁止原子武器，这样说岂不是更正确些吗？我想，只有鼓吹原子弹的人看到他们已不再是垄断者的时候，他们才会同意禁止原子武器。

问：对于原子武器方面的国际管制，您的看法怎样？

答：苏联主张禁止原子武器和停止原子武器的生产。苏联主张建立国际管制，使禁止原子武器、停止原子武器的生产并把已经制成的原子弹完全用于民用目的的决定，得到十分严格的和认真的执行。苏联所主张的正是这种国际管制。

美国人士也谈“管制”，但是他们的“管制”的出发点不是停止原子武器的生产，而是继续这种生产，而且其数量要同各国所拥有的原料的数量相适应。所以，美国的“管制”的出发点不是禁止原子武器，而是要使这种武器公开化和合法化。从而使战争挑拨者用原子武器来消灭几万几十万和平居民的那种权利，也成为合法的。不难了解，这不是管制，而是对管制的嘲笑，是对各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愿望的欺骗。很明显，这种“管制”是不能使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满意的，他们所要求的是禁止原子武器和停止原子武器的生产。

译自 1951 年 10 月 6 日《真理报》

致共同社编辑局长岩本清先生

东京

尊敬的岩本清先生：

您要我向日本人民致新年贺词的来信已经收到了。

苏联人士没有那种由外国总理向另一国人民表示祝愿的惯例。但是苏联人民对于因被外国占领而遭到不幸的日本人民的深切同情，使我不能不破例答应您的要求。

请转告日本人民，我祝他们自由和幸福，祝他们在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中获得完全胜利。

过去苏联人民亲身经受过被外国占领的灾祸，这种占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曾参加过的。因此苏联人民完全理解日本人民的苦难，深切同情他们，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同当时的苏联人民一样，获得自己祖国的复兴和独立。

祝日本工人能够摆脱失业和低工资的痛苦，消灭日用品价格高昂的现象，并祝他们在维护和平的斗争中获得胜利。

祝日本农民能够摆脱无地和少地的痛苦，取消重税，并祝他们在维护和平的斗争中获得胜利。

祝全体日本人民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取得日本民主力量的完全胜利，全国经济生活的活跃和高涨，民族文化、科学和艺术的繁荣，

并祝他们在维护和平的斗争中获得胜利。 顺致
敬意

约·斯大林

1951 年 12 月 31 日

译自 1952 年 1 月 1 日《真理报》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①

给经济问题讨论会的参加者

对于和 1951 年十一月讨论会 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

我已经收到为评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而举行的经济问题讨论会的一切文件，其中包括：《关于改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建议》，《关于消除未定稿中的错误和不确切处的建议》，《关于争论问题的说明材料》。

对于这一切材料，以及对于教科书未定稿，我认为必须提出如下的意见。

1.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 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

某些同志否认科学规律的客观性质，特别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客观性质。他们否认政治经济学规律反映

① 联共(布)中央为评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于 1951 年 11 月召开了经济问题讨论会。《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斯大林在 1952 年 2—9 月就这次讨论会的有关问题而写的著作，最早发表于 1952 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 18 期。
——编者注

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的规律性。他们认为，由于历史赋予了苏维埃国家以特殊作用，苏维埃国家、它的领导人能废除现存的政治经济学规律，能“制定”新的规律，“创造”新的规律。

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显然，他们把两种东西混为一谈了，一种是科学规律，它反映自然界或社会中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另一种是政府颁布的法律，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的，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但这两种东西是决不能混为一谈的。

马克思主义把科学规律——无论指自然科学规律或政治经济学规律都是一样——了解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在自己的行动中考虑到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创造新的科学规律。

这是不是说，例如，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即自然力发生作用的结果是根本无法避免的，自然力的破坏作用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以不受人们影响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而出现的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在天文、地质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认识了它们的发展规律，也确实无力影响它们。把这些过程除外，在其他许多场合，人们决不是无能为力的，就是说，人们是能够影响自然界过程的。在一切这样的场合，人们如果认识了自然规律，考虑到它们，依靠它们，善于应用和利用它们，便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引导到另一方向，使自然界的破坏力转而有利于社会。

我们且从许许多多的例子中举出一个来看。在上古时代，江河泛滥、洪水横流以及由此引起的房屋和庄稼的毁灭，曾经被认为

是无法防止的灾害,是人们无力抗拒的。可是后来,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当人们学会了修筑堤坝和水电站的时候,就能使社会防止在从前看来是无法防止的水灾。不但如此,人们还学会了控制自然界的破坏力,可以说是学会了驾驭它们,使水力转而有利于社会,利用水来灌溉田地,取得动力。

这是不是说,人们因而就废除了自然规律、科学规律,创造了新的自然规律、新的科学规律呢?不,不是这个意思。问题在于防止水的破坏力量发生作用并利用它以利于社会的这一整个工作程序,是丝毫没有违反、改变或消灭科学规律,没有创造新的科学规律的。恰恰相反,这一整个工作程序是确切地根据自然规律、科学规律而实现的,因为对自然规律的任何违反,即使是极小的违反,都只会引起事情的混乱,引起工作程序的破坏。

对于经济发展规律,对于政治经济学规律——无论指资本主义时期或社会主义时期都是一样——也必须这样说。在这里,也如在自然科学中一样,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依靠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把某些规律的破坏作用引导到另一方向,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给予其他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以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但是人们不能消灭这些规律或创造新的经济规律。

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规律与自然科学的规律不同,不是长久存在的;政治经济学规律,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发生作用的,以后,它们就让位给新的规律。但是原来的这些规律,并不是被消灭,而是由于出现了新的经济条件而失去效力,退出舞台,让位给新的规律,这些新的规律并不是

由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而是在新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

有人引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引证他的这样一个公式: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人们将获得支配自己生产资料的权力;他们将摆脱社会经济关系的压迫而获得自由,成为自己社会生活的“主人”。恩格斯把这种自由叫作“对必然的认识”^①。究竟“对必然的认识”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人们认识了客观的规律(“必然”)之后,就会完全自觉地运用这些规律以利于社会。正因为如此,所以恩格斯在同一著作中说道:

“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②

可见,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对那些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消灭现存经济规律和创造新经济规律的人们,决不是有利的。恰恰相反,这个公式所要求的不是消灭经济规律,而是认识它们和善于运用它们。

有人说,经济规律具有自发性质,这些规律所发生的作用是不可防止的,社会在它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不对的。这是把规律偶像化,是让自己去做规律的奴隶。已经证明,社会在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社会认识了经济规律以后,依靠它们,就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并“驾驭”它们,正如在自然力及其规律方面的情形一样,正如上面所举的江河泛滥的例子一样。

有人援引苏维埃政权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特殊作用,仿佛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323页。——编者注

这种作用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去消灭现存的经济发​​展规律,并“制定”新的经济发​​展规律。这也是不对的。

苏维埃政权的特殊作用;是由下列两种情况造成的:第一,苏维埃政权不能象以往的革命那样,以另一种剥削形式去代替一种剥削形式,而必须消灭任何剥削;第二,由于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

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然而苏维埃政权光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是,它之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并不是因为它消灭了什么现存的经济规律,“制定了”什么新的经济规律,而仅仅是因为它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当时我国的生产力,特别是工业中的生产力,是具有社会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却是私人的,资本主义的。苏维埃政权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使它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因而消灭了剥削制度,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如果没有这个规律,不依靠这个规律,苏维埃政权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经济规律,早已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它之所以还没有为自己开辟出道路来,还没有获得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是因为它遇到了社会上衰朽力量的极强烈的反抗。在这里,我们碰到了经济规律的另一个特点。在自然科学中,发现和应用新的规律或多或少是顺利的;与此不同,在经济学领域中,发现和应用那些触犯社会衰朽力量的利益的新规律,却要遇到这些力量的极强烈的反抗。因此,就需要有能够克服这种反抗的力量,社会力量。当时我国有了这种力量,这就

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而在其他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没有这种力量。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够粉碎旧的社会力量，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之所以在我国获得了充分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秘密就在于此。

有人说，我国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必然性，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来消灭现存的经济规律和创造新的经济规律。这是完全不对的。不能把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混为一谈。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当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失去效力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之所以发生作用，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只有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这就是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规律，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规律的要求的计划。不能说，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完全反映了这个经济规律的要求。

有人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作用的若干经济规律，包括价值规律在内，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造过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过的”规律。这也是不对的。规律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如果能改造规律，那也就能消灭规律，而代之以另外的规律。“改造”规律的论点，就是“消灭”和“制定”规律这种不正确公式的残余。虽然关于改造经济规律的公式早已在我们这里流行起来，可是为了准确起见，必须把这个公式抛弃。可以限制这

些或那些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可以防止它们的破坏作用(当然,如果有的话),但是不能“改造”或“消灭”规律。

因此,当人们讲到“征服”自然力量或经济力量,讲到“支配”它们等等的时候,他们决不是想说:人们能够“消灭”科学规律或“制定”科学规律。恰恰相反,他们只是想说,人们能够发现规律,认识它们,掌握它们,学会熟练地运用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从而征服它们,求得支配它们。

总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是客观规律,它们反映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生活过程的规律性。否认这个原理的人,实质上就是否认科学,而否认科学,也就是否认任何预见的可能性,因而就是否认领导经济生活的可能性。

也许有人会说,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和众所周知的,可是里面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因而不值得花费时间来重复众所周知的真理。当然,这里的确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如果以为不值得花费时间来重复我们所知道的某些真理,那就不对了。问题在于,每年有成千的年轻的 new 干部靠近我们领导核心,他们抱着热烈的愿望要帮助我们,抱着热烈的愿望要显一显身手,但是他们没有受到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不知道我们所熟悉的许多真理,而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苏维埃政权的巨大成就使他们惊愕万分,苏维埃制度异乎寻常的成功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于是他们就以为,苏维埃政权是“无所不能”的,对它来说“什么都是轻而易举”的,它能消灭科学规律,能制定新的规律。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些同志呢?应该怎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去教育他们呢?我认为,有系统地重复所谓“众所周知”的真理,耐心地解释这些真理,是对这些同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最好的办法之一。

2.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某些同志断定说，党在我国取得了政权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还保存商品生产，是做得不对的。他们认为，党在当时就应当消除商品生产。而且，他们还引证了恩格斯的如下的话：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见《反杜林论》）^①

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吧。恩格斯的这个公式不能认为是十分明确的，因为其中没有指出，究竟是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即**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还是仅仅**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这就是说，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

在《反杜林论》的另一个地方，恩格斯讲到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讲到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这就是说，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

由此可见，恩格斯所指的是这样的国家，在那里，不仅在工业中，而且也在农业中，资本主义和生产集中都充分发达，以致可以剥夺全国的一切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因而，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编者注

在 19 世纪末，在《反杜林论》出版的时候，这样的国家只有一个，这就是英国，在那里，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都已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把国内的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并且消除商品生产。

在这里，我撇开了对外贸易对于英国的意义这个问题，而对外贸易在英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极为巨大的。我认为，只有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才能最终解决英国的商品生产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的命运问题。

附带说一句，不仅在 19 世纪末，而且在现时，也还没有一个国家在农业方面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已经达到了英国那样的程度。至于其余的国家，虽然那里的农村中也发展了资本主义，可是仍然有一个人数相当多的中小私有生产者阶级，这些人的命运是应该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予以确定的。

于是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如果在某个国家内，譬如在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推翻资本主义的有利条件已经具备，资本主义在工业中已经使生产资料集中到可以剥夺并转归社会所有的程度，可是那里的农业，虽然有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却分散在人数众多的中小私有生产者之间，没有可能提出剥夺这些生产者的问题，那么，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该怎么办呢？

恩格斯的公式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且也不应当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公式是在另一个问题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另一个问题就是，在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以后，商品生产的命运应当怎样。

于是就要问，如果可以公有化的不是一切生产资料，而仅仅是一部分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又已经具备，那

该怎么办呢，——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夺取政权，在夺取政权以后是否必须立即消灭商品生产呢？

当然，不能把某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该拒绝夺取政权，应该等着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生产者破产，把他们变为雇农，并使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集中起来，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问题。显然，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选择这样的“出路”的，如果他们不愿意使自己丢尽脸皮的话。

也不能把另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也许应该夺取政权，并且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走这条荒谬和犯罪的道路，因为这样的道路会断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任何可能性，会把农民长久地抛到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阵营里去。

对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关于“粮食税”的几篇著作以及有名的“合作社计划”中，给了回答。

列宁的回答可以概括如下：

(一)不要放过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不要等到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个体生产者居民破产的时候；

(二)剥夺工业中的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

(三)至于中小个体生产者，那就应该逐步地把他们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中，集体农庄中；

(四)用一切办法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规模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并且不要剥夺集体农庄，相反地，要加紧供给它们头等的拖拉机和其 他机器；

(五)为了保证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

时期内保存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全力发展苏维埃商业,即国营商业和合作社-集体农庄商业,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转中排挤出去。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列宁所规划的这条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不容置疑,对于一切具有人数相当多的中小生产者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条发展道路是使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

有人说,商品生产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如此!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只有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有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于市场而资本家能够购买并在生产过程中加以剥削,就是说,只有国内存在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制度,商品生产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是在这样的场合开始的,即生产资料是集中在私人手中,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否则,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

但是,如果这些使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已不存在,如果生产资料已经不是私有财产而是社会主义财产,如果雇佣劳动制度已经不存在,而劳动力已经不再是商品,如果剥削制度早已消灭,那又怎么样呢?可不可以认为商品生产总还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呢?不,不可以这样认为。要知道,我国社会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度、雇佣劳动制度、剥削制度早已不存在了的社会。

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它在奴隶占有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占有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它在封建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如果注意到，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这样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而受到严格的限制，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

有人说，在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而雇佣劳动制度和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以后，商品生产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就应该消除商品生产。

这也是不对的。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在国家企业中，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全民的财产。在集体农庄这种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各个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以及种子是它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事实上是由集体农庄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尽管它们不能出卖、购买、出租或抵押这些土地。

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把它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

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目前我国,也象大约 30 来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转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

当然,将来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即国营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由一个包罗一切而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生产成分来代替的时候,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趋于消失。但是,只要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其有用的因素而仍然保存着。怎样来建立这种单一的统一的成分呢?是让国营成分干脆吞没集体农庄成分(这是很难设想的,因为这会被理解为对集体农庄的剥夺),还是组织统一的**全民的**(有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代表参加的)经济机构,即起初有权计算全国一切消费品,而经过一个时期也有权例如以产品交换方式来分配产品的经济机构呢?这是一个需要专门讨论的特殊问题。

可见,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所生产的商品。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显然,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

所以,有一些同志的意见是完全不对的,他们宣称,既然社会主义社会不消灭商品生产形式,那么在我国似乎就应当恢复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一切经济范畴: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剩余价值、资本、资本利润、平均利润率等等。这些同志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

产混为一谈,认为既然有商品生产,就应该有资本主义生产。他们不了解,我国的商品生产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根本不同的。

此外,我认为,也必须抛弃从马克思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的《资本论》中取来而硬套在我国社会主义关系上的其他若干概念。我所指的概念包括“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必要”时间和“剩余”时间这样一些概念。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是为了说明工人阶级受剥削的泉源,即剩余价值,并且给予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以推翻资本主义的精神武器。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使用的概念(范畴)是和资本主义关系完全适合的。但是现在,当工人阶级不仅没有被剥夺政权和生产资料,反而掌握着政权和占有生产资料的时候,还使用这些概念,这就非常奇怪了。现在,在我国制度下,说劳动力是商品,说工人“被雇用”,这真是十分荒谬的:仿佛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自己被自己雇用,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自己。现在来讲“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也是令人非常奇怪的:仿佛在我国条件下,交给社会去扩大生产、发展教育和保健事业以及组织国防等等的工人劳动,对于现在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来说,并不是象用来满足工人及其家庭的个人需要的劳动那样必要的。

应该指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在他的这本已经不是研究资本主义而是用了一部分篇幅研究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著作中承认交给社会用于扩大生产,用于教育、保健事业、管理费用、后备基金等等的劳动,是与用来满足工人阶级消费需要的劳动同样必要的。

我认为,我们的经济学家应当消除旧概念和我们社会主义国

家新情况之间这种不相适合的现象，而用适合新情况的新概念来代替旧概念。

我们能容忍这种不适合的现象到一定的时候，但是现在已经是我们应当最后肃清这种不适合的现象的时候了。

3.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问题

有时人们问，在我国，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是不是存在，是不是发生作用呢？

是的，是存在的，是发生作用的。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

在我国，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首先是包括商品流通，包括通过买卖的商品交换，包括主要是个人消费的商品的交换。在这里，在这个领域中，价值规律保持着调节者的作用，当然，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着调节者的作用。

但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不限于商品流通范围内。它的作用也扩展到生产方面。诚然，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并没有调节的意义，可是它总还影响生产，这在领导生产时是不能不考虑到的。问题在于，抵偿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耗费所需要的消费品，在我国是作为商品来生产和销售的，而商品是受价值规律作用的。也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价值规律对生产的影响。因此，在我们的企业中，这样一些问题，如经济核算和赢利问题、成本问题、价格问题等等，就具有现实的意义。所以，我们的企业是不能不，而且不应该不考虑到价值规律的。

这好不好呢？这并不坏。在我国现今条件下，这的确不坏，因为这种情况教育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来合理地进行生产，并使他

们遵守纪律。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导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计算各种生产数值，精确地计算这些数值，并且同样精确地估量生产中的实有的东西，而不去侈谈凭空想出来的“大概数字”。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导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寻求、发现和利用生产内部潜在的后备力量，而不去糟蹋它们。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导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不断地改进生产方法，降低生产成本，实行经济核算，并使企业能够赢利。这是很好的实践的学校，它促使我们的经济工作干部迅速成长，迅速变成现今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生产的真正领导者。

糟糕的并不是价值规律影响我国的生产。糟糕的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除了少数的例外，对于价值规律的作用知道得很差，不研究这种作用，不善于在自己的核算中考虑这种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国在价格政策问题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紊乱现象。这里是许许多多例子中的一个：不久以前，为了植棉业的利益，曾经决定调整棉花和谷物的比价，调整出售给棉农的谷物的价格，并提高交纳给国家的棉花的价格。于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就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不能不使中央委员们感到惊异，因为按照这个建议，一吨谷物的价格差不多和一吨棉花的价格一样，而一吨谷物的价格和一吨面包的价格相等。中央委员们指出：由于磨粉和烘烤的额外费用，一吨面包的价格应当高于一吨谷物的价格；棉花总应当比谷物值钱得多，棉花和谷物的世界市场价格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建议人对于中央委员们的这些意见，没有能够说出任何合乎情理的话来。因此，中央只得亲自来处理这件事情，降低谷价，提高棉价。假如这些同志的建议获得了法律上的效力，结果会怎样呢？那我们就会使棉农破产，就会

没有棉花。

然而，这一切是不是说价值规律在我国也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有发生作用的广阔的场所，价值规律在我国是生产的调节者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是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前面已经说过，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商品生产的活动是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关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必须这样说。无疑地，在城市和农村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不存在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不能不限制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及其对生产的影响程度。

在这方面起作用的，还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代替了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

在这方面起作用的，还有我国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以及我国整个的经济政策，它们都是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这一规律的要求制定的。

这一切就使得价值规律在我国发生作用的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使得价值规律在我国的制度下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

因此也就有了这个“令人惊异”的事实：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和蓬勃地发展，价值规律在我国却没有引导到生产过剩的危机，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发生作用的广阔范围的同一个价值规律，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发展速度很低，却引导到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

有人说：价值规律是一切历史发展时期都一定适用的永恒的规律；如果说价值规律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阶段时期会丧失其交换关系调节者的效力，那么它在这个发展阶段中仍将保持其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相互关系的调节者、各个不同生产部门劳动分配的

调节者的效力。

这是完全不对的。正如价值规律一样，价值是与商品生产的存在相关联的一种历史范畴。商品生产一消失，价值连同它的各种形式以及价值规律，也都要随之消失。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二阶段上，用于生产产品的劳动量，将不是以曲折迂回的方法，不是凭借价值及其各种形式来计算，如象在商品生产制度下那样，而是直接以耗费在生产产品上的时间数量即钟点来计算的。至于说到劳动分配，那么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劳动分配，将不依靠那时已失去效力的价值规律来调节，而是依靠社会对产品的需要量的增长来调节的。这将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生产将由社会的需要来调节，而计算社会的需要，对于计划机关将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还有一种说法也是完全不正确的，这种说法就是：在我们现今的经济制度下，即在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上，价值规律仿佛调节着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没有用全力优先发展最能赢利的轻工业，而去发展往往赢利较少、有时简直不能赢利的重工业。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不关闭那些暂时还不能赢利、而且工人的劳动在其中不能产生“应有效果”的重工业企业，也不开设确实能赢利、而且工人的劳动在其中能产生“巨大效果”的轻工业的新企业。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不依据仿佛调节着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的价值规律，把工人从那些对国民经济很需要但赢利很少的企业，调到更能赢利的企业

中去。

显而易见,如果循着这些同志的脚步走去,那我们就不得不把生产资料生产的首要地位让给消费资料的生产。然而,放弃生产资料生产的首要地位,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消灭我国国民经济不断增长的可能性,因为不把生产资料的生产放在首要地位,就不能使国民经济不断增长。

这些同志忘记了,价值规律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在存在着竞争、生产无政府状态、生产过剩危机的情况下,才能是生产的调节者。他们忘记了,在我国,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是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被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这一规律的作用限制着的,因而,也是被大致反映了这个规律的要求的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限制着的。

某些同志由此作出结论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和国民经济的计划化,消灭着生产赢利的原则。这是完全不对的。情形正好相反。如果不从个别企业或个别生产部门的角度,不从一年的时间来考察赢利,而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从比方10—15年的时间来考察赢利(这是唯一正确的处理问题的方法),那么,个别企业或个别生产部门暂时的不牢固的赢利,就决不能与牢固的经久的高级赢利形式相比拟,这种高级赢利形式是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这一规律的作用及国民经济的计划化所提供给我们的,因为它们使我们避免那种破坏国民经济并给社会带来巨大物质损害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保证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度地不断地增长。

简略地说:不容置疑,在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价值规律不能是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方面的“比例的调节者”。

4. 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问题以及关于消灭它们之间的差别的问题

这个标题涉及一些本质上互不相同的问题，但是我把它们都合并在一章中，这并不是要把它们混为一谈，而只是为了节省篇幅。

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对立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提出的大家知道的问题。产生这种对立的经济基础，是城市对乡村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商业、信用系统的整个发展进程所造成的对农民的剥夺和大多数农村居民的破产。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应该看作是利益上的对立。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农村对城市、对一般“城里人”的敌对态度。

无疑地，在我国，随着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利益上的对立也必定消失。结果也正是这样。社会主义城市、我国工人阶级在消灭地主和富农方面所给予我国农民的巨大帮助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的基础，而不断地供给农民及其集体农庄以头等的拖拉机和机器，更使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当然，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仍然是两个在地位上彼此不同的阶级。但是这个差别丝毫不削弱他们的友谊关系。恰恰相反，他们的利益是在一条共同线上，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共同线上。因此，过去乡村对城市的不信任，尤其是对城市的憎恨，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这是毫不奇怪的。

这一切都表明,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对立的基
础,已经被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

当然,这不是说,城市和乡村之间对立的消灭应当引导到“大
城市的毁灭”(见恩格斯《反杜林论》)①。不仅大城市不会毁灭,并
且还要出现新的大城市,它们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它们不仅是大
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业部门强大发展的
中心。这种情况将促进全国文化的繁荣,将使城市和乡村有同等
的生活条件。

关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问题,也有类似
的情况。这个问题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提出的大家知道的问题。
产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经济基础,是脑力劳
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中
体力劳动者与领导人员之间是存在着分裂的。大家知道,工人对
待厂长、工长、工程师及其他技术人员就好象对待自己的敌人一
样,这种敌对态度就是在这个分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显然,随
着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利益上
的对立也必定消失。它在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确实也消
失了。现在体力劳动者与领导人员并不是敌人,而是同志和朋友,
都是一个统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员,都极为关心生产的进步和改善,
他们之间过去的仇视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

至于城市(工业)和乡村(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
间的差别消失的问题,却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没
有被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提出过。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6页。——编者注

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

这个问题是不是臆造出来的呢？它对于我们有没有什么实践的或理论的意义呢？决不能把这个问题看作是臆造出来的。恰恰相反，它对于我们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例如，如果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差别来说，那么在我国，这种差别不仅归结为农业的劳动条件与工业的劳动条件不同，而首先和主要是归结为在工业中我们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全民所有制，而在农业中我们却有着不是全民的，而是集团的、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前面已经说过，这种情况使得商品流通保存下来，只有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这个差别消失时，商品生产及其一切后果才会随之消失。因此，不能否认，农业和工业之间的这个本质差别的消失，对于我们应当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关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本质差别的问题，也必须这样说。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也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在开始展开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竞赛以前，我国工业的发展是进行得并不妥当的，许多同志甚至提出了放慢工业发展速度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太低，远远落后于技术人员的水平。然而当社会主义竞赛在我国已具有群众性的时候，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正是在这以后，工业就以加快的速度向前迈进了。为什么社会主义竞赛具有了群众性呢？因为在工人中间成批的同志不仅掌握了基本的技术知识，而且更前进了，与技术人员站在同一水平上，开始修正技师和工程师的意见，打破已经陈旧的现行定额，实行新的更现代的定额等等。假如不是少数几批工人，而是大多数工人都把自己的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了工程技术人员水平，结果会怎么样呢？我国的工业就会提高到其他国家的工业所不能达到的高

度。因此,不能否认,用提高工人文化技术水平到技术人员水平的办法,来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对于我们是不能不有头等重要意义的。

某些同志断定说,将来,不仅工业和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会消失,而且它们之间的任何差别也会消失。这是不对的。工业和农业之间本质差别的消灭,不能引导到它们之间任何差别的消灭。由于工业和农业中的工作条件有差别,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某种差别无疑是会存在的,虽然是非本质的。甚至在工业中,如果就它的各种不同的部门来说,那么工作条件也不是到处一样,例如,煤矿工人的工作条件不同于机械鞋厂工人的工作条件,采矿工人的工作条件不同于机器制造业工人的工作条件。如果这是对的,那么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某些差别,就更加会保存下来了。

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必须这样说。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即文化技术水平的悬殊,无疑是会消失的。但是某种差别,虽然是非本质的差别,还会保存下来,这至少是因为企业领导人员的工作条件与工人的工作条件不一样。

持有相反论断的同志们所依据的,大概是我的某些言论中大家知道的一个说法,在那里说到了工业和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消灭,而没有附带说明,那是指本质差别的消灭,而不是一切差别的消灭。同志们正是这样理解我的说法,以为它的意思是说一切差别的消灭。但这就表明,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不能令人满意的。必须把它抛掉,代之以另一个说法。工业和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将会消灭,非本质差别将会保存下来。

5. 关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瓦解与世界 资本主义体系危机加深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

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由这种危机产生的。在战争时期打得不可开交的两个资本主义同盟，其中每一个都指望粉碎敌方，而获得世界霸权，它们都想从这里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美国指望击溃自己最危险的竞争者德国和日本，夺取国外市场、世界的原料资源，并取得世界霸权。

然而战争使这些指望落空了。诚然，作为美、英、法三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竞争者的德国和日本是被击溃了。但同时，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却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

应该指出，美国、英国及法国自己促成了这个新的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巩固，当然这不是出于它们的本意。它们对于没有加入“马歇尔计划”体系的苏联、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经济封锁，想以此室杀它们。事实上并没有室杀得了，反而巩固了这个新的市场。

当然，在这方面主要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封锁，而是在于战后时期中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结合起来了，并且建立了经济上的合作和

互助。这个合作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象苏联那样给予各人民民主国家以真正的和技术精湛的帮助。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帮助是极度便宜的，技术上是头等的。问题首先在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结果，在这些国家中便有了高速度的工业发展。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之下，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

但是，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世界市场的瓦解所造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加深就表现在这里。

这是资本家自己也感觉到的，因为失去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市场是很难不感觉到的。他们竭力想用“马歇尔计划”、侵朝战争、军备竞赛、工业军事化来解脱这些困难情况。但是这很象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一根草一样。

由于这种情况，在经济学家面前便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可不可以断言，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固定的论点^①，仍旧有效呢？

（二）可不可以断言，列宁在 1916 年春天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

①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第 235 页。——编者注

要快得多”^①的论点，仍旧有效呢？

我认为，不可以这样断言。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新条件，这两个论点都应该认为是已经失效了。

6.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问题

某些同志断定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国际条件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美国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控制到了这种程度，能够不让它们互相作战和彼此削弱；资本主义的先进分子对于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严重损害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已经汲取到这种程度，不会让自己再把资本主义国家卷入相互间的战争，——由于这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便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些同志错了。他们只看见显露在表面上的外部现象，而没有看见那些暂时还没有明显地发生作用、但终究会决定事变进程的潜在力量。

从外表上看来，一切都好象是“平安无事”：美国已使西欧、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仰其配给；德国（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都陷入了美国的铁爪中，顺从地执行着美国的意旨。但是如果以为，这种“平安无事”会“永世地”保存下去，以为这些国家将无止境地忍受美国的统治和压迫，以为它们不会设法挣脱美国的镣铐，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那就错了。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42页。——编者注

我们首先看一看英国和法国吧。无疑地，这两个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无疑地，廉价的原料和有保证的销售市场，对于它们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可不可以设想，当美国人在按照“马歇尔计划”进行“援助”的掩盖下，打入英国和法国的经济，竭力把它变成美国经济的附属品的时候，当美国资本在英、法殖民地夺取原料和销售市场，从而为英、法资本家的高额利润制造奇灾大祸的时候，英法两国竟会无止境地忍受现在的这种情况呢？如果这样说：资本主义的英国，接着还有资本主义的法国，归根到底将不得不从美国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同美国发生冲突，以便保证自己的独立地位，当然也保证自己的高额利润，——这岂不是更正确吗？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主要的战败国德国（西德）和日本吧。这两个国家现在在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过着可怜的生活。它们的工业和农业，它们的商业，它们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它们的整个生活，都被美国的占领“制度”加上了镣铐。要知道，这些国家昨天还是震撼了英国、美国、法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统治基础的帝国主义大国。如果认为这些国家不会设法重新站起来，打破美国的“制度”，奔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就等于相信神怪。

有人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从理论上讲来，这当然是对的。这不仅在现时、在目前是对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也是对的。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们也多少懂得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究不是从对苏联作战开始，而是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开始的。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对于资本主义说来，对苏联作战，即对社会主义国家作战，是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更加危险，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所提出的问题，只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对其

他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优势的问题，而对苏联作战所一定要提出的问题，却是资本主义本身存亡的问题。第二，因为资本家虽然为了“宣传”的目的叫嚷什么苏联的侵略，可是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苏联会侵略，因为他们估计到苏联的和平政策，并且知道苏联自己是不会进攻资本主义国家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也曾经有人认为德国是彻底垮了，正如现在某些同志认为日本和德国是彻底垮了一样。当时也有人谈论和在报刊上叫嚷美国已使欧洲仰其配给，说德国再也不能站起来，说从此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再也不会发生了。虽然如此，但是，德国却在被打败后，经过这么 15—20 年的工夫，又从奴役下挣脱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作为一个强国站立起来并站住了脚。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帮助德国在经济上站立起来并提高它的军事经济潜力的不是别人，而正是英国和美国。当然，美国和英国帮助德国在经济上站立起来，意在指使德国站立起来之后反对苏联，即利用它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德国却首先用自己的力量去反对英、法、美集团。而当希特勒德国向苏联宣战的时候，英、法、美集团不仅没有与希特勒德国联合起来，反而不得不同苏联结成联盟来反对希特勒德国。

可见，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

试问，有什么保证能使德国和日本不重新站立起来，不设法从美国的奴役下挣脱出来，从而过自己的独立生活呢？我认为这样的保证是没有的。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是仍然存

在的。

有人说,既然现今已经有强大的人民力量成长起来,它们正在保卫和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所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战争的论点,应该认为是已经过了时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现今的和平运动,其目的是唤起人民群众去为维护和平、防止新的世界大战而斗争。因而,它所抱的目的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它只限于为维护和平而斗争的民主目的。在这一点上,现今维护和平的运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运动是不同的,因为后一运动曾经走得远些,它抱有社会主义的目的。

可能,在各种情况的一定凑合下,争取和平的斗争会在某个地方发展成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但这将不再是现今的和平运动,而是推翻资本主义的运动了。

最可能的是,现今的和平运动即维护和平的运动,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会使上述这个战争得以防止,使它暂时推迟,使当前的和平暂时维持,使好战政府辞职而代之以别的愿意暂时维持和平的政府。这当然是好的。甚至是很好的。但是,这仍然不足以根本消除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其所以不足,是因为纵然有保卫和平运动的这一切胜利,但帝国主义仍然保持,仍然存在,因而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也仍然是存在的。

要消除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

7. 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基本经济规律问题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问题曾经几

次在讨论会上提出过。在这方面发表过各种不同的意见，直到最荒谬的意见。诚然，大多数参加讨论的人，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强烈的反应，而且在这方面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可是，参加讨论的人谁也没有否认这些规律的存在。

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不是存在呢？是的，是存在的。这规律是什么呢？它的特点何在呢？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这样一种规律，它不是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某一个别方面或某些个别过程，而是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一切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的。

价值规律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呢？不是的。价值规律首先是商品生产的规律。它象商品生产一样，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存在过，而且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后，例如在我国，也继续存在着，诚然，它发生作用的范围是被限制了。当然，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广阔的作用范围，它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方面发生很大的作用，但是它既不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资本主义利润的基础，甚至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所以，价值规律不能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依据同一理由，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或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都不能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有人说，平均利润率的规律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是不对的。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不能满足于平均利润，何况这种平均利润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有下降的趋势。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不是平均利润，而是比较正常地实现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最大限度的利润。

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个概念的，是剩余价值规律，即资本主义利润的产生和增殖的规律。这个规律确实预先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点。然而，剩余价值的规律是过于一般的规律，它没有涉及最高利润率的问题，而保证这种利润率却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要弥补这个缺陷，就必须把剩余价值规律具体化并加以发展，使之适应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同时考虑到，垄断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不是随便什么利润，而正是最大限度的利润。这才会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

有人说，对于资本主义在现今条件下的发展来说，平均利润总还可以认为是足够的。这是不对的。平均利润是最低限度的赢利，再低下去，资本主义生产就会成为不可能了。但是，如果认为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头子夺取殖民地、奴役各国人民、策动战争只是想给自己保证平均利润，那就可笑了。不，不是平均利润，也不是那照例比平均利润稍为高些的超额利润，而正是最大限度的利润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动力量。正是由于必须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垄断资本主义才采取这样冒险的步骤，例如奴役和不断掠夺殖民地和其他落后国家，把许多独立国变为附属国，组织新战争（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头子们看来，战争是取得最大限度利润的最好的“生意”），以及夺取世界的经济霸权。

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意义之一也就在于：这个规律既

然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方面一切最重要的现象，既然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高涨和危机，它的胜利和失败，它的长处和短处，——它的矛盾发展的全部过程，——于是就使我们能够了解和说明这一切现象。

请看许许多多“令人惊异”的例子中的一个例子。

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和实践中，有过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蓬勃发展的事实，那时资本家表现为先进技术的旗手、生产技术发展方面的革命家。但是大家同样知道，也有过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停止发展的另一种事实，那时资本家表现为新技术发展方面的反动者，并常常转而使用手工劳动。

怎样来说明这种惊人的矛盾呢？只有用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用取得最大限度利润的必要性才能加以说明。当新技术向资本主义预示着最大利润的时候，资本主义就拥护新技术。当新技术不再预示着最大利润的时候，资本主义就反对新技术，主张转而采用手工劳动。

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情形，就是如此。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不是存在呢？是的，是存在的。这个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何在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因而，不是保证最大限度的利润，而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不是带有从高涨到危机以及从危机到高涨的间歇状态的生产发展，而是生产的不断增长；不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来的技术发展中的周期性的间歇状态，而是生产

0292336

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不断完善。

有人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这是不对的。如果不知道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是为着什么任务而进行,或者任务不明确,那么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以及或多或少真实地反映这一规律的国民经济计划化,是不能自行产生任何效果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只是在具有国民经济的计划发展所要实现的任务时,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本身并不能提供这个任务。国民经济计划化尤其不能提供这个任务。这个任务是包含在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中,即表现于这一规律的上述要求内。因此,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只是在它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依据时,才能充分发挥起来。

至于说到国民经济的计划化,那么,它只有遵守下列两个条件,才能得到良好的结果,这两个条件是:(一)它正确地反映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的要求;(二)它在各方面适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

8. 其他问题

(1) 关于封建制度下的经济外的强制问题。

当然,经济外的强制在巩固地主-农奴主的经济权力方面起过作用,但封建制度的基础并不是经济外的强制,而是封建土地所有制。

(2) 关于集体农庄农户的个人财产问题。

如果教科书未定稿中说“集体农庄每一个农户有乳牛、小牲畜和家禽供个人使用”,那就不正确了。大家知道,事实上,乳牛、小

牲畜、家禽等等不是供集体农庄农户个人使用,而是农户的个人财产。“供个人使用”这个说法,大概是从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中搬来的。但在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中是有错误的。在更加缜密制定的苏联宪法中,则是另外一种说法,即是:

“集体农庄每一个农户……拥有宅旁园地上的副业、住宅、产品牲畜、家禽和小农具,作为个人财产。”

这当然是正确的。

此外,应该更详细地说,每个集体农庄庄员按当地的条件,有一头到多少头乳牛,多少只绵羊、山羊、猪(也是按当地的条件由多少到多少)以及不限数量的家禽(鸭、鹅、鸡、火鸡)作为他个人的财产。

这种详细叙述对于我们的外国同志是有巨大意义的,因为他们想确切知道,在我国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以后,集体农庄农户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为其个人财产。

(3)关于农民交给地主的地租数额问题,以及关于购买土地的费用数额问题。

在教科书未定稿中说,由于土地收归国有,“农民免除了交给地主的地租,其总额每年约为5亿卢布”(应当说,“金卢布”)。应该把这个数字弄准确,因为在我看来,这个数字所包括的并不是整个俄国的地租,而只是俄国大多数省份的地租。在这里必须注意到,在俄国的一些边区,地租是以实物缴纳的,看起来教科书未定稿的作者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此外,必须注意到,农民不仅免除了地租,而且也免除了每年购买土地的费用。教科书未定稿中是否考虑到了这一点呢?在我看来,并没有考虑到,然而这是应该考虑到的。

(4) 关于垄断组织与国家机关的结合问题。

“结合”这个名词是不适当的。这个名词只是很肤浅和叙述式地表明垄断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接近，可是没有揭示这种接近的经济意义。问题在于，这种接近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不单是结合，而是国家机关服从于垄断组织。因此，应该去掉“结合”这个名词，而代之以“国家机关服从于垄断组织”这个说法。

(5) 关于在苏联使用机器的问题。

在教科书未定稿中说：“在苏联，在机器能给社会节省劳动的一切场合下，都是使用机器的。”这完全不是应有的说法。第一，机器在苏联总是给社会节省劳动的，因此在苏联的条件下机器不给社会节省劳动的情形是根本没有的。第二，机器不仅节省劳动，而且同时还减轻工作人员的劳动，因此，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情况不同，在我国的情况下，工人是极乐意在劳动过程中利用机器的。

所以应该说，没有任何地方象在苏联这样乐意使用机器，因为机器给社会节省劳动，并且减轻工人的劳动；由于在苏联没有失业的现象，所以工人极乐意在国民经济中利用机器。

(6)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问题。

当人们谈到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时，通常总是指在业工人，而没有估计到所谓失业工人后备军的物质状况。这样看待工人阶级物质状况的问题，是不是正确呢？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既然有失业工人后备军，而它的成员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无法生存，那么失业工人是不能不列入工人阶级之中的，但是，既然他们列入工人阶级之中，那么他们的赤贫状况，就不能不影响在业工人的物质状况。因此我认为，在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时，也应该估计到失业工人后备军的状况。

(7)关于国民收入问题。

我认为，一定要在教科书未定稿内添进关于国民收入的新的一章。

(8)关于教科书中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者列宁和斯大林的专门一章的问题。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之创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章，应该从教科书里删去。这一章在教科书中是完全不需要的，因为它并未提供什么新东西，而只是乏味地重复那些在前几章中已经比较详细讲过的东西。

在其余的问题上，我对于奥斯特罗维佳诺夫、列昂节夫、谢皮洛夫、加托夫斯基和其他同志的《建议》，没有什么意见。

9.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的国际意义

我认为，同志们没有估计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全部意义。这本教科书不仅对于我们苏联的青年是需要的；它对于各国共产党人以及同情共产党人的人们是特别需要的。我们的外国同志们都想知道，我们是怎样挣脱了资本主义的镣铐的，我们是怎样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了全国经济的，我们是怎样达到了和农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我们是怎样使得我们这个不久以前还是贫弱的国家变成了富强的国家的，什么是集体农庄，为什么我们虽然生产资料已经公有化了，但还没有消灭商品生产、货币、商业等等。他们想知道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东西，并不单纯出于好奇，而是要向我们学习，并为了自己的国家来利用我们的经验。因此，一本好

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出版，不仅具有国内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

因此，需要一本能成为不仅是国内革命青年而且是国外革命青年的必读的教科书。它的篇幅不应太大，因为篇幅太大的教科书不能作为必读书，而且很难领会、掌握。但是它应当包含有关我国经济以及资本主义和殖民地体系的经济的一切基本东西。

某些同志在讨论时提议给教科书添进许多新的章节，历史学家就历史方面、政治家就政治方面、哲学家就哲学方面、经济学家就经济方面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这会使得教科书的篇幅无限扩大。这当然是不能容许的。这本教科书是用历史方法来阐明政治经济学问题，但这还不是说，我们应当把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变成经济关系史。

我们需要一本 500 页至多不超过 600 页的教科书。这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读书，是给予世界各国年轻共产党人的好礼物。

可是，由于外国大多数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水平不够，这样的教科书也会给予这些国家的非年轻的共产党员干部以很大的好处。

10. 改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办法

某些同志在讨论时过于热心地“斥责”教科书未定稿，责骂作者们的错误和疏忽，肯定说未定稿失败了。这是不公正的。当然，教科书中是有错误和疏忽的，错误和疏忽在大事情中差不多总是有的。但是不管怎样，绝大多数参加讨论会的人终究承认，教科书未定稿可以作为将来教科书的基础，只要作若干修正和补充就可

以了。的确，只要把教科书未定稿和现在通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比较一下，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教科书未定稿比现有的一切教科书都高明得多。教科书未定稿的作者们的巨大功绩就在这里。

我认为，要改善教科书未定稿，应该指派一个人数不多的委员会，其中不仅有教科书的作者们，不仅有赞成讨论会上大多数人的意见的人，而且有反对讨论会上大多数人的意见和猛烈批评教科书未定稿的人。

最好是委员会中也包括一位有经验的统计学家来检查数字并给未定稿添加新的统计材料，而且也包括一位有经验的法学家来检查措词的确切性。

应该暂时解除委员会委员的其他任何工作，在物质方面给予他们充分的保证，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力于教科书的编纂工作。

此外，应该委派一个比方说由三个人组成的校审委员会来最后校审教科书，这对于求得文体的统一也是必要的，可惜在教科书未定稿中没有做到这一点。

把最后定稿的教科书送交中央的期限为一年。

约·斯大林

1952年2月1日

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

诺特京同志：

我没有急于回信，因为您所提出的问题，我认为不是紧急的。加上另外有些问题带有紧急性，自然就把您的来信搁下了。

现在我来逐点回答。

关于第一点。

在我的《意见》中有一个大家知道的论点：社会在科学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就能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您断定这个论点不适用于其他社会形态，说它只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下才有效，说经济过程的自发性质，比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社会没有可能利用经济规律以利于社会。

这是不对的。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例如，在法国，资产阶级就曾经利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大家知道的规律来反对封建制度，推翻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并且使这种生产关系适合封建制度内部生长起来的生产力的性质。资产阶级做到了这一点，并不是它有特殊本领，而是因为它的切身利益要求它这样做。封建主反抗这一点，并不是由于他们愚钝，而是由于他们的切身利益要求他们阻挠这一规律的实现。

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应该这样说。工人阶级利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且使这种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工人阶级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是由于它有特殊本领，而是因为它的切身利益要求它这样做。已从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的先进力量变成了反革命力量的资产阶级，竭力反抗这一规律的实现，——它之所以反抗，并不是由于它没有组织性，也不是因为经济过程的自发性质推动它去反抗，而主要是由于它的切身利益要求它反对这一规律的实现。

由此可见，

1. 不仅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下，而且在其他社会形态下，都能在这种或那种程度内利用经济过程、经济规律以利于社会；

2. 在阶级社会里，利用经济规律无论何时何地都有阶级背景，而且为社会的利益来利用经济规律的旗手，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先进阶级，而衰朽的阶级则加以反抗。

在这方面，无产阶级和其他曾经在历史上完成过生产关系变革的阶级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和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融合在一起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不是消灭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剥削，而是消灭任何剥削；而其他阶级的革命，却只是消灭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剥削，局限在它们和社会绝大多数人利益相矛盾的狭隘阶级利益的范围以内。

在《意见》中说到为社会的利益来利用经济规律的阶级背景。那里说：“在自然科学中，发现和应用新的规律或多或少是顺利的；与此不同，在经济学领域中，发现和应用那些触犯社会衰朽力量的利益的新规律，却要遇到这些力量的极强烈的反抗。”但是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关于第二点。

您断定说，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达到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性质的完全适合，而在其他社会形态下，只能实现不完全的适合。

这是不对的。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时代，当资产阶级破坏了封建的生产关系，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的时候，无疑有过一个时期，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否则，资本主义就不会有象它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有过的那样迅速

的发展了。

其次，“完全适合”这种说法是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理解的。不能把这种说法理解为仿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没有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的现象。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无可争辩地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生产关系只是经过一些时候，才会被改造得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

既然这样，那么“完全适合”这种说法该怎样来理解呢？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那些能够组织反抗的腐朽的阶级。当然，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它们不了解生产关系有改变的必要，但是这种力量，当然不难克服，不致把事情弄到冲突的地步。

关于第三点。

从您的议论中可以看出，您把我们国有化企业所生产的生产资料，首先是生产工具，看作是商品。

可不可以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资料看作是商品呢？据我看来，无论如何是不可以的。

商品是这样的一种产品，它可以出售给任何买主，商品所有者在出售商品之后，便失去对商品的所有权，而买主则变成商品的所有者，他可以把商品转售、抵押或让它腐烂。生产资料是否适合于这个定义呢？显然，是不适合的。第一，生产资料并不“出售”给任何买主，甚至不“出售”给集体农庄，而只是由国家分配给自己的企业。第二，生产资料所有者——国家，把生产资料交给某一个企

业,丝毫不失去对它们的所有权,相反地,是完全保持着所有权的。第三,企业的经理从国家手中取得了生产资料,不但不会成为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相反地,是被确认为受苏维埃国家的委托,依照国家所交下的计划,来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的。

由此可见,无论如何不能把我国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列入商品的范畴。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又讲生产资料的价值,讲它们的成本,讲它们的价格等等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这是为了计价、为了核算、为了计算企业的盈亏、为了检查和监督企业所必需的。但这只是事情的形式方面。

第二,这是为了在对外贸易中便于把生产资料出售给外国所必需的。这里,在对外贸易领域内,并且仅仅是在这个领域内,我们的生产资料才确实是商品,才确实被出售(不是带引号的出售)。

这样看来,在对外贸易流通领域内,我国企业所生产的生产资料,无论在实质上或形式上都保持着商品的属性,可是在国内经济流通领域内,生产资料却失去商品的属性,不再是商品,并且脱出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计价等等)。

为什么会有这种独特现象呢?

原来,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并不是以变革的方式,而是以逐渐变化的方式进行的,旧的东西并不是干脆被废除干净,而是把自己的本性改变得与新的东西相适应,仅仅保持着自己的形式;至于新的东西,也不是干脆消灭旧的东西,而是渗透到旧的东西里面去,改变旧东西的本性和职能,并不破坏它的形式,而是利用它的形式来发展新的东西。不仅商品是这样,而且我国经

济流通中的货币也是这样，连银行也是这样，它们失去自己旧的职能并取得了新的职能，同时保持着旧的形式而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利用。

如果从形式上，从现象表面的过程来看问题，就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仿佛资本主义的范畴在我国经济中也保持着效力。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来看问题，即把经济过程的内容和它的形式、把深处的发展过程和表面现象严格区别开来，那就可以得出一个唯一正确的结论，即资本主义的旧范畴在我国保留下来的主要是形式，是外表，实质上这些范畴在我国已经适应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根本改变了。

关于第四点。

您断定说，价值规律对于农业中所生产的、依照收购价格交售给国家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发生着调节的影响。您在这里所指的是原料——例如棉花——这样的“生产资料”。在这里您还可以再加上亚麻、羊毛及其他农业原料。

应该首先指出，在这种情形下，农业所生产的并不是“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之一的原料。不能玩弄“生产资料”这个术语。马克思主义者说到生产资料的生产时，首先是指生产工具的生产，——马克思把这叫作“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它构成“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①把一部分生产资料（原料）和包括生产工具在内的生产资料等量齐观，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和其他一切生产资料来比，生产工具是具有决定作用的。谁都知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编者注

道,原料本身不能生产生产工具,虽然某几种原料也是生产生产工具所必需的材料,可是,没有生产工具是不能生产任何原料的。

其次,价值规律对农产原料的价格的影响,是否象您诺特京同志所断言的那样是调节的影响呢?如果我国存在着农业原料价格的“自由”涨跌,如果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在我国发生作用,如果我国没有计划经济,如果原料的生产不是由计划来调节的,那么,价值规律的影响就会是调节的影响了。但是,因为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并没有这些“如果”,所以价值规律对于农业原料价格的影响无论如何不会是调节的影响。第一,我国农业原料的价格是固定的,由计划规定的,而不是“自由”的。第二,农业原料的生产规模并不是由自发的力量,并不是由什么偶然的因素来决定,而是由计划来决定的。第三,为生产农业原料所必需的生产工具,不是集中在个别人或个别集团手中,而是集中在国家手中。既然这样,还有什么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呢?其实,价值规律本身也是由社会主义生产所特有的上述事实来调节的。

因此,不能否认,价值规律是影响农业原料价格的形成的,它是这方面的因素之一。但是尤其不能否认,这种影响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调节的影响。

关于第五点。

说到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赢利,我在《意见》中曾经反驳了某些同志,这些同志肯定说,既然我国计划性的国民经济并不偏重于赢利的企业,既然容许不赢利的企业也和这些企业并存,那它仿佛抹煞了经营的赢利原则本身。在《意见》中说,从个别企业和个别生产部门着眼的赢利,决不能和社会主义生产所提供给我们的那种高级赢利相比,因为社会主义生产使我们避免生产过剩的危机,

并保证我们的生产不断地增长。

但是,如果从此得出结论说,个别企业和个别生产部门的赢利没有特别价值,不值得重视,那就不对了。这当然是不对的。个别企业和个别生产部门的赢利,从发展我国生产的观点来看,是有巨大意义的。无论在计划建设或计划生产时,这都是应该注意到的。这是我国现今发展阶段上经济活动方面的起码知识。

关于第六点。

您在谈到资本主义时所说的“大大改变了形态的扩大的生产”,不知道该怎样理解。应该说,这样的生产、而且还是扩大的生产,是世界上所没有的。

显然,在世界市场已经分裂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已经开始缩小的时候,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生产的增长和减缩——一定还会存在。不过,这些国家生产的增长将在缩小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将要减缩下去。

关于第七点。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在苏联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开始的。这是总危机的第一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在欧洲和亚洲的各人民民主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展开了总危机的第二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一次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二次危机,应该看作不是两次单独的、彼此隔离的危机,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发展的两个阶段。

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是否仅仅是政治危机或仅仅是经济危机呢?二者都不是。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

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同时也就很清楚，这种危机的基础，一方面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瓦解日益加剧，另一方面是脱离资本主义的国家——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

约·斯大林

1952年4月21日

关于尔·德·雅罗申科同志的错误

今年3月20日，雅罗申科同志写了一封信分送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信中谈到在大家知道的十一月讨论会上所讨论过的一些经济问题。他在这封信中抱怨说，在讨论会的一些总结性的主要文件中以及在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中，雅罗申科同志的“观点没有得到任何反映”。此外，雅罗申科同志在信中还建议：请准许他在一年或一年半内编写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给他两个助手来做这一工作。

我认为，必须从实质上来分析一下雅罗申科同志的抱怨和他的建议。

我们先从他的抱怨谈起。

在上述文件中没有得到任何反映的雅罗申科同志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呢？

—

雅罗申科同志的主要错误

如果用一两句话来评定雅罗申科同志的观点，那就应该说，他

的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因而是极端错误的。

雅罗申科同志的主要错误就是,他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过分夸大了生产力的作用,同时还过分缩小了生产关系的作用,竟至宣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一部分。

雅罗申科同志同意承认生产关系在“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条件下有某种作用,因为在这里,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但是他把这种作用只看作是消极的作用,是一种阻碍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的作用。生产关系的其他职能,任何积极的职能,雅罗申科同志是看不到的。

至于说到已经没有“对抗性的阶级矛盾”、生产关系“再也不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社会主义制度时,雅罗申科同志便认为,在这里,生产关系的任何独立的作用都在消失,生产关系不再是发展的重大因素,而且被生产力所吞没,犹如部分被整体吞没一样。雅罗申科同志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生产力的组织中,作为这种组织的一个手段、一个成分”(见雅罗申科同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

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又是什么呢?雅罗申科同志回答说:“所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产关系,而在于探讨和发展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组织的科学理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化的理论。”(见雅罗申科同志在全体讨论会上的发言)

正因为如此,雅罗申科同志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这些经济问题,如我国经济中各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的存在、商品流通、价值规律等等,也就不感到兴趣,认为这些都是只能引起烦琐争论的次

要问题。他公然宣称,在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不是争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范畴如价值、商品、货币、信贷等等的作用,这种争论在我们这里常常带有烦琐的性质,而是健康地讨论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合理组织以及对这种组织的科学论证”(见雅罗申科同志在分组讨论会上的发言)。

这样就成了没有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了。

雅罗申科同志以为,只要安排好“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就可以没有特别困难地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了。他认为,只要这样做,就完全足以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公然宣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斗争,就是在社会生产中正确组织生产力和合理使用生产力的斗争。”(见在全体讨论会上的发言)雅罗申科同志郑重宣称:“共产主义就是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最高科学组织。”

这样,“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就把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质包括无遗了。

雅罗申科同志从这一切便作出结论说,不可能有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学,而应该有两种政治经济学,一种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以前各种社会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其对象是研究人们的生产关系;另一种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其对象应当不是研究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而是研究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

雅罗申科同志的观点就是这样。

对于这种观点可以讲些什么呢?

第一,说生产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只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这是不对的。当马克思主义者讲到生产关系的阻碍

作用时,他们所指的并不是任何生产关系,而只是已经不能适合生产力发展、因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但是,大家知道,除了旧生产关系以外,还有代替旧生产关系的新生产关系。可不可以说,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归结为阻碍生产力的作用呢?不,不可以。恰恰相反,新生产关系是这样一种**主要的**和有决定性的力量,正是它决定生产力进一步的而且是强大的发展,没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就注定要萎缩下去,如象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情形一样。

谁也不能否认,我们苏联工业的生产力在几个五年计划中有巨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在1917年10月用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来代替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那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如果我国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中没有发生这种变革,我国的生产力就会萎缩下去,如象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力萎缩的情形一样。

谁也不能否认,我国农业的生产力在最近20—25年中有巨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在30年代在农村中没有用新的集体化的生产关系来代替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那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没有这种生产的变革,我国农业的生产力就会萎缩下去,如象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农业的生产力萎缩的情形一样。

当然,新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永远是新的,而且也不永远是新的,它开始变旧,并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发生矛盾,它开始失去其为生产力的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变成生产力的阻碍者。那时候,就出现新生产关系来代替这种已经变旧了的生产关系,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就是充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推进者。

生产关系从生产力阻碍者的作用发展到生产力主要推进者的

作用，以及从生产力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发展到生产力阻碍者的作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特性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要素之一。这是现在一切初学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知道的。看来雅罗申科同志却不知道这一点。

第二，说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独立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在消失，说生产关系是在被生产力吞没，说社会生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归结为生产力的组织，这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是把社会生产看作一个整体，它具有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社会生产力（社会对自然力的关系，社会在与自然力作斗争中来取得必要的物质资料）和生产关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是社会生产的两个不同的方面，虽然它们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的。正因为它们是社会生产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它们能够互相影响。硬说这两个方面中有一个可以被另一个吞没而变成它的组成部分，就是极严重地违反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说：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429页）^①

可见，社会生产是由两个方面组成，这两个方面虽然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但却反映两种不同的关系，即人们对自然界的（生产力）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只有具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编者注

备生产的这两个方面,才能有社会生产,——不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或其他社会形态下都是一样。

雅罗申科同志显然是不完全同意马克思的。他认为马克思的这个原理是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归结为合理组织生产力的问题,而抛开了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并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脱节。

这样,在雅罗申科同志那里,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波格丹诺夫的《普遍组织科学》^①之类的东西了。

这样,雅罗申科同志在把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这个正确思想拿过来以后,却把这个思想弄到了荒谬的地步,竟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作用;而且,本来是有血有肉的社会生产,在他那里却成了片面的和干瘪的生产工艺学,即布哈林的“社会组织技术”^②之类的东西了。

马克思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即在人们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中。——约·斯大林注〉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③

① 亚·亚·波格丹诺夫的这部著作于1913—1917年出版。该书认为,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建立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均衡”;是“组织”生产力,而生产力是和生产关系无关的单纯的工艺学。——编者注

② 参看弗·伊·列宁《尼·伊·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批注》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9页。——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编者注

这就是说,每个社会形态,连社会主义社会也在内,都有自己的由人们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于是发生一个问题:在雅罗申科同志那里,究竟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怎样的呢?大家知道,雅罗申科同志已经取消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这个多少带独立性的领域,而把生产关系剩下的一点点残余归并到生产力组织之内。试问,社会主义制度有没有它自己的经济基础呢?看起来,既然生产关系这一多少独立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消失,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只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了。

这样就成了没有自己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了。这是相当可笑的事情……

一般讲来,没有自己经济基础的社会制度是不是可能的呢?雅罗申科同志显然认为是可能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却认为,这样的社会制度在世界上是没有的。

最后,说共产主义是生产力的合理组织,说生产力的合理组织把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质包括无遗了,说只要合理地组织生产力,就可以没有特别困难地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不对的。在我们的文献中,对于共产主义有另一个定义,另一个公式,即列宁的公式——“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①。雅罗申科同志显然不喜欢列宁的公式,而代之以他自己杜撰的公式——“共产主义就是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最高科学组织”。

第一,谁也不明白,雅罗申科同志所吹嘘的这个生产力的“最高科学”组织或“合理”组织究竟是什么,它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

^①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80页。——编者注

雅罗申科同志在全体讨论会和分组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在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几十次重复这个神话般的公式，然而他无论在哪一个地方，都没有试图用片言只字来说明，究竟应该怎样了解这个仿佛把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质包括无遗的生产力的“合理组织”。

第二，如果对这两个公式加以选择的话，那么应该抛弃的，就不是唯一正确的列宁的公式，而是雅罗申科同志的所谓公式，他的这个公式显然是臆造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是从波格丹诺夫的武器库——《普遍组织科学》中拿来的东西。

雅罗申科同志以为，只要做到合理地组织生产力，就能获得极丰富的产品并过渡到共产主义，就能从“按劳分配”的公式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公式。这是大错特错的，这暴露了他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一窍不通。雅罗申科同志过于简单地、象小孩那样简单地想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雅罗申科同志不了解，如果让集体农庄集团所有制、商品流通等等经济事实仍然存在，那就既不能获得能满足社会一切需要的极丰富的产品，也不能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公式。雅罗申科同志不了解，在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公式以前，社会必须经过一系列的经济改造和文化改造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劳动将在社会成员的心目中从仅仅是维持生活的手段变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公有制则成为社会存在的不可动摇和不可侵犯的基础。

为了准备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过渡到共产主义，至少必须实现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

1. 必须切实保证的，不是生产力的神话般的“合理组织”，而是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

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之所以必须占优先地位，不仅是因为这种生产应当保证自己的企业以及国民经济其他一切部门的企业所需要的装备，而且是因为没有这种生产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

2. 必须用有利于集体农庄因而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逐渐过渡的办法，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别的什么社会经济中心能够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以利于社会。

雅罗申科同志断定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没有任何矛盾。这是错误的。当然，我国现今的生产关系是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它完全适合于生产力的增长，推动生产力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但是，如果以此自满，以为在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那就不正确了。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只要领导机关执行正确的政策，这些矛盾就不会变成对立，而这样也就不会弄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如果我们执行类似雅罗申科同志所推荐的不正确的政策，那就会是另一种情形了。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的生产关系就可能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极严重的阻碍者。

因此，领导机关的任务在于及时地看出日益增长的矛盾，并及时地采取措施，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增长，来克服这种矛盾。这里所涉及的首先是集团的即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商品流通这样一些经济现象。当然，在目前，这些现象还被我们有成效地用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且它们对于我国社会肯定是有利的。毫无疑问，它们在最近的将来也还会是有利的。但同时这些现象已在开

始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强大发展,因为它们造成一种障碍,妨碍把全部国民经济、特别是把农业完全纳入国家计划,如果看不出这点,那就是不可原谅的盲目了。不容置疑,愈向前去,这些现象就会愈加阻碍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所以,任务就在于,通过把集体农庄所有制逐渐地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办法,通过以产品交换——也是逐渐地——代替商品流通的办法,来消除这些矛盾。

3. 必须把社会的文化发展到足以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都能获得足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活动分子的教育,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不致由于现存的分工而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

为了做到这点,究竟需要什么呢?

如果认为不用大大改变现今的劳动状况,就可以使社会成员的文化达到这样巨大的发展,那就不正确了。为了做到这点,首先需要把每天的劳动时间至少缩短到6小时,然后再缩短到5小时。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充分的空闲时间来获得全面教育所必需的。其次,为了做到这点,需要实行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可能自由选择职业,而不致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所必需的。再其次,为了做到这点,需要根本改善居住条件,把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至少提高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办法是不仅直接提高货币工资,而且特别重要的,是继续不断地降低日用品价格。

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就是这样。

只有把这一切先决条件全部实现之后,才可以希望,劳动将在社会成员心目中从累赘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①,“劳动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编者注

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恩格斯)^①,公有制将被社会全体成员看作是社会存在的不可动摇和不可侵犯的基础。

只有把这一切先决条件全部实现之后,才可以从社会主义的公式“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公式“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将是从小生产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到另一种更高的经济即共产主义经济的根本过渡。

可见,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件事,并不象雅罗申科同志所想象的那样简单。

如果象雅罗申科同志那样,企图把这件需要进行极大经济变更的复杂多样的事情整个归结为“生产力的合理组织”,那就等于用波格丹诺夫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

二

雅罗申科同志的其他错误

1. 雅罗申科同志从自己不正确的观点出发,作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对象的不正确的结论。

雅罗申科同志从每一社会形态有它自己独特的经济规律出发,否认需要有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学。但他是完全不对的,他在这里是与恩格斯、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背道而驰了。

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反杜林论》)^②。因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3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189页。——编者注

此，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某一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发展规律，而是各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发展规律。

大家知道，列宁是完全同意这点的，他在对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所作的评注中说，布哈林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局限于商品生产，首先是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这是不对的；他同时指出，在这里，布哈林是“比恩格斯倒退了一步”^①。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中所下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是与此完全符合的。在这个未定稿中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物质资料的社会生产和分配的规律”的科学。

这是很明白的。各种社会形态在它的经济发展中，不仅服从自己特有的经济规律，而且还服从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规律，例如，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生产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的规律，在一切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关系的规律。所以，各个社会形态不仅以自己特有的规律互相分开着，而且以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规律互相联系着。

恩格斯说得完全对：

“要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全面地进行这样的批判，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反杜林论》）^②

显然，在这里，在这个问题上，雅罗申科同志是和布哈林相呼应的。

① 见弗·伊·列宁《尼·伊·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批注》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0页。——编者注

其次，雅罗申科同志断定说：在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不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某些范畴如价值、商品、货币、信贷等等，而是健康地讨论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因而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是“探讨和发展生产力组织的科学理论、国民经济计划化的理论等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在丧失自己独立的作用，并被生产力吞没而成为它的组成部分。

必须说，在我们这里还没有一个发了疯的“马克思主义者”讲过这种胡说八道的话。没有经济问题即生产问题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吗？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用生产力组织问题来代替经济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取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雅罗申科同志正好是这样做的，——他在取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里，他与布哈林扭在一起了。布哈林说过，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政治经济学也必定消灭^①。雅罗申科同志没有这样说，却在这样做，却在取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诚然，他同时装出不完全同意布哈林的样子，但这是诡计，而且是一钱不值的诡计。事实上，他所做的正是布哈林所鼓吹而为列宁所反对的事情。雅罗申科同志是在跟着布哈林的尾巴跑。

其次，雅罗申科同志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归结为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归结为国民经济计划化的问题等等。但是他大错特错了。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国民经济计划化的问题等等，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而是领导机关经济政策的对象。这

^① 参看弗·伊·列宁《尼·伊·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批注》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3页，——编者注

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不能混为一谈。雅罗申科同志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所以他碰壁了。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经济政策则由此作出实际结论，把它们具体化，在这上面建立自己的日常工作。把经济政策的问题堆压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是葬送这门科学。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①；（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这个定义中没有用恩格斯定义中的“交换”一词。所以没有用，是因为“交换”一词通常被许多人理解为商品交换，这种交换不是一切社会形态而只是某些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现象，这有时就会引起误会，虽然恩格斯所说的“交换”不仅是指商品交换。但是，恩格斯用“交换”一词所指的东西，显然在上述定义中已作为其组成部分包括在内了。因而，政治经济学对象的这个定义，就其内容讲来，是和恩格斯的定义完全符合的。

2. 当人们谈到某一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规律时，他们通常是从下列这点出发的：一个社会形态不能有几个基本经济规律，它只能有某一个基本经济规律来作为基本规律。不然的话，每个社会形态就会有几个基本经济规律，而这是和基本规律的概念本身相矛盾的。然而，雅罗申科同志并不同意这点。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可以不是一个，而是几个。这是难以相信的，但这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编者注

是事实。他在全体讨论会上的发言中说：

“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总量的多少和比例，是由被吸引到社会生产中的现有劳动力和劳动力增长的前途来决定的。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它决定着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构。”

这是他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雅罗申科同志在同一发言中宣称：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比例关系，是由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决定的，而这种生产要有把一切能劳动的人口吸引到社会生产中来所必需的规模。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同时又是我国宪法根据苏联人享有劳动权这点所提出的要求。”

这是所谓的第二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最后，雅罗申科同志在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宣称：

“从这点出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在我看来，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的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

这已经是第三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了。

所有这些规律都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呢，或者仅仅它们中间的一个才是呢？如果是它们中间的一个，那么究竟是哪一个呢？对于这些问题，雅罗申科同志在最后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并没有给予回答。他在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表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时，想必是“忘记了”他在三个月前全体讨论会上的发言中他已经表述过的其他两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大概他以为别人不会注意这个很成问题的手法。但他的打算显然是落空了。

我们就假定，雅罗申科同志所表述的前两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已不存在，就假定雅罗申科同志现在认为在他给中央政治

局委员们的信中所表述的第三个公式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我们来看一看雅罗申科同志的这封信吧。

雅罗申科同志在这封信中说，他不同意斯大林同志在《意见》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定义。他说：

“在这个定义中主要的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这里表明，生产是达到满足需要这个主要目的的手段。这个定义使人有根据认为，您所表述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不是从生产占首要地位出发，而是从消费占首要地位出发的。”

显然，雅罗申科同志完全没有了解问题的本质，并且看不见，谈论消费或者生产占首要地位，这与问题毫不相干。当人们讲到某种社会过程对其他过程占首要地位时，他们的出发点通常是：这两种过程多少是同一类的。可以而且必须说，生产资料的生产对消费资料的生产占首要地位，因为在这两种场合下，我们所说的都是生产，因而它们多少是同一类的。但决不能说消费对生产占首要地位或生产对消费占首要地位，如果这样说，那就是不正确的。因为生产和消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诚然，这是两个互相联系着的领域，但毕竟是各不相同的领域。雅罗申科同志显然不了解，这里所说的不是消费或生产占首要地位，而是社会给社会生产定出什么目的，它使社会生产——比方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服从于什么任务。因此，雅罗申科同志关于“生产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基础，犹如是其他任何社会的生活基础一样”的说法，也是与问题毫不相干的。雅罗申科同志忘记了，人们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生产。他忘记了，跟满足社会需要脱节的生产是会衰退和灭亡的。

究竟可不可以讲社会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讲资

本主义生产或社会主义生产所服从的任务呢？我以为是可以而且应当的。

马克思说：

“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生产商品，而是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在其发展的形式上）；不是产品，而是剩余产品。从这一观点出发，劳动本身只有在为资本创造利润或剩余产品的情况下才是生产的。如果工人不创造这种东西，他的劳动就是非生产的。因此，所使用的生产劳动量只是在剩余劳动量由于它——或者比例于它——而增长的情况下，才会使资本感到兴趣。我们称为必要劳动时间的东西，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是必要的。如果劳动不产生这种结果，它就是多余的，就要被制止。

资本主义生产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是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在这种结果不是靠工人的过度劳动取得的情况下，这是资本的这样一种趋势：力图用尽可能少的花费——节约人力和费用——来生产一定的产品……

从这种理解来看，工人本身就象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的那样，只是生产资料，而不是目的本身，也不是生产的目的。”（见《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2册）①

马克思这些话之所以精辟，因为这些话不仅简要而精确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而且提示了应当向社会主义生产提出的主要目的，主要任务。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取得利润，至于消费，只有在保证取得利润这一任务的限度内，才是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在这以外，消费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就失去意义。人及其需要就从视野中消失了。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什么呢？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应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624—625页。——编者注

当服从的主要任务又是什么呢？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不是利润，而是人及其需要，即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象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中所说的那样，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雅罗申科同志以为这里所说的是消费对生产“占首要地位”。这当然是糊涂想法。其实，我们这里的问题不是消费占首要地位，而是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它的主要目的——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因此，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就是这样。

雅罗申科同志想保持所谓生产对消费“占首要地位”，于是断定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就是“社会的物质和文化条件的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这是完全不对的。雅罗申科同志粗暴地歪曲了和损害了斯大林同志《意见》中所表述的公式。在雅罗申科同志那里，生产从手段变成了目的，而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却被取消了。结果弄成生产增长是为了生产增长，生产是目的本身，而人及其需要就从雅罗申科同志的视野里消失了。

所以，毫不奇怪，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人既已消失，雅罗申科同志“概念”里剩下的一点点马克思主义也随之消失了。

这样，在雅罗申科同志那里，就弄成了不是生产对消费“占首要地位”，而好象是资产阶级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占首要地位”

这类的东西了。

3.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问题是要单独谈一谈的。雅罗申科同志断定说,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理论, 它不包含对于其他社会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可能有效的什么东西。他说:

“把马克思给资本主义经济制定的再生产公式搬到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上来, 是对马克思学说作教条主义理解的结果, 而且是和他的学说的本质相矛盾的。”(见雅罗申科同志在全体讨论会上的发言)

其次, 他断定说: “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不符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 不能作为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基础。”(同上)

讲到马克思在其中规定了生产资料的生产(第I部类)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第II部类)之间的一定比例关系的简单再生产理论时, 雅罗申科同志说:

“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是由马克思的第I部类的 $v + m$ 和第II部类的 c 这个公式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上述第I部类和第II部类在发展中的相互联系是不应当存在的。”(同上)

他断定说: “马克思所制定的关于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的理论,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适用的, 因为马克思这个理论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经济及其规律。”(见雅罗申科同志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

雅罗申科同志就是这样糟蹋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

当然, 马克思由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结果而制定出来的再生产理论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 自然也就具有商品的资本主义的价值关系的形式。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但是, 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中, 如果仅仅看到这个形式, 而看不出它的基础, 看不出它那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有效的基本内容, 就是

一点也不懂得这个理论。假如雅罗申科同志稍微懂得这个理论,那么他也会懂得这个显而易见的真理: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决不只限于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它同时还包含有对于一切社会形态——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有效的许多关于再生产的基本原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这些基本原理,比如关于社会生产之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的原理;关于在扩大再生产下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关于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原理;关于剩余产品是积累的唯一源泉的原理;关于社会基金的形成和用途的原理;关于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的原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这一切基本原理,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有效的,而且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计划国民经济时,不运用这些原理也是不行的。值得注意的是,雅罗申科同志本人虽然如此高傲地蔑视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但他在讨论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时却不得不再三再四地去求助于这些“公式”。

列宁、马克思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列宁对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的评注,是大家都知道的。在这些意见中,大家知道,列宁承认,马克思关于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比例关系的公式,也就是雅罗申科同志所极力反对的公式,不论对于社会主义或“纯粹共产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二阶段,都仍然是有效的。

至于马克思,那么大家知道,他不喜欢离开对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研究,他在自己的《资本论》中并没有研究过他的再生产公式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的问题。然而,他在《资本论》第2卷第20章《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这一节中论述第Ⅰ部类的产品在这一部类

内的交换时,顺便指出,这一部类内的产品交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下那样不断地进行。马克思说:

“如果生产是社会公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那么很明显,为了进行再生产,第 I 部类的这些产品同样会不断地再作为生产资料在这个部类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一部分直接留在这些产品的生产部门,另一部分则转入其他生产场所,因此,在这个部类的不同生产场所之间发生一种不断往返的运动。”(见马克思《资本论》俄文第 8 版第 2 卷第 307 页)①

因此,虽然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规律,但他决不认为他的再生产理论仅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才是有效的。恰恰相反,他显然认为他的再生产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生产也会是有效的。

应该指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时,是从他的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的,他认为这些基本原理对于共产主义制度是一定适用的。

也应该指出,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的那种“共同社会体系”和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时,也是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的,认为这些基本原理对于共产主义制度是一定适用的。

事实就是如此。

结果,在这里,在再生产问题上,雅罗申科同志虽然对于马克思的“公式”发出放肆的议论,却又碰了壁。

4. 雅罗申科同志在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的末尾,建议委托他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写道:

“根据我在全体讨论会和分组讨论会上以及这封信中所表述的社会主义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第 473—474 页。——编者注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定义,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我能在一年内,至多一年半,在两个人的帮助下,从理论上来解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基本问题,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个理论定会把这一科学变成人民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有效武器。”

不能不承认,雅罗申科同志所犯的毛病并不是谦虚。如果使用某些著作家的笔法,可以说:“甚至完全相反。”

上面已经讲过,雅罗申科同志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领导机关的经济政策混为一谈。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国民经济的计划化、社会基金的形成等等——并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而是领导机关经济政策的对象。

我更不必说,雅罗申科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他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使我们不能给予他这样的委托。

* * *

结论:

(1)雅罗申科同志对讨论会领导人的抱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讨论会领导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不能在自己总结性的文件中反映雅罗申科同志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2)雅罗申科同志提出委托他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请求,不能认为是严肃的,至少是因为他这请求中充满着赫列斯塔科夫^①的气味。

约·斯大林

1952年5月22日

^① 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角,一个招摇撞骗、虚伪轻浮、厚颜无耻的典型人物,后来成了撒谎家和吹牛家的代名词。——编者注

答阿·弗·萨宁娜和 弗·格·文热尔两同志

我收到了你们的信。可以看出，你们是在深刻地认真地研究我国的经济问题。信中有不少正确的说法和有意思的见解。但除此以外，信中也有一些严重的理论上的错误。我在这封回信中只想谈谈这些错误。

1.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

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断定说：“仅仅由于从事物质生产的苏联人的自觉行动，才产生出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这一论点是完全不正确的。

是不是在我们之外客观地、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地存在着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呢？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客观规律性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但是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的公式对这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这就是说，这两位同志是站在不正确理论的观点上，这种理论断定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的规律是由社会领导机关所“创造”、“改造”的。换句话说，他们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

当然，人们能发现这些客观的规律性，认识它们，并且依靠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改造”它们。

假定说，我们暂且采取不正确理论的观点，否认社会主义制度

下的经济生活中有客观规律性的存在,并宣告可能“创造”经济规律,“改造”经济规律。结果会怎么样呢?这就会使我们陷身在混乱和偶然性的王国,使我们处在奴隶似地依赖于这些偶然性的地位,使我们不仅失去了解事情的可能性,而且简直无法在这偶然性的混乱中找出头绪来。

这就会使我们取消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因为不承认客观的规律性,不研究这些规律性,科学是不能存在和发展的。取消了科学,我们就没有可能预见国内经济生活中事变的进程,即没有可能把哪怕是最起码的经济领导工作做好。

归根到底,我们就会听凭那班不理解和不考虑客观规律性而决心“消灭”经济发展规律和“创造”新规律的“经济”冒险主义者任意摆布。

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里曾经提出了如下一个马克思主义对这问题的经典说法:

“社会力量完全象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么,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象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象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象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

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①

2. 关于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 全民所有制水平的办法问题

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这当然不是全民所有制)提高到全民的(“国家的”)所有制的水平,必须采取些什么办法呢?

有些同志认为,应该依照从前处理资本主义财产的例子,干脆把集体农庄财产收归国有,宣布它是全民的财产。这个建议是完全不正确的,是绝对不能采纳的。集体农庄的财产是社会主义的财产,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象处理资本主义财产那样来处理它。无论如何不能因为集体农庄的财产不是全民的财产,就说集体农庄的财产不是社会主义的财产。

这些同志以为,把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财产转归国家所有,是唯一的或无论如何是最好的国有化形式。这是不对的。事实上,转归国家所有,这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好的国有化形式,而是原始的国有化形式,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关于这点所正确说过的那样。当国家还存在的时候,转归国家所有,无疑地是最容易理解的原始的国有化形式。但国家并不是永世长存的。随着社会主义的活动范围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的扩大,国家将日渐消亡,因而把个别人的财产和个别集团的财产转归国家所有的问题当然也就会消失。国家一定消亡,而社会是一定留存下来的。因此,作为全民财产的继承者的,已经不是将要消亡的国家,而是以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9—320页。——编者注

中央经济领导机构为代表的社会本身。

那么,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呢?

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所建议的提高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基本办法是:把集中在机器拖拉机站的基本生产工具出售给集体农庄,归其所有,这样来解除国家对农业提供基本建设投资的负担,让集体农庄自己负责维持和发展机器拖拉机站。他们说:

“如果以为集体农庄的投资应该主要用在集体农庄的文化需要上,而用于农业生产需要的投资,大部分仍旧应该由国家负担,那就不正确了。由于集体农庄已经完全能够把这一负担承当起来,解除国家这一负担,岂不是更正确些吗?为了使我国的消费品极其丰富,国家在自己的投资方面还有不少的事情要做。”

为了论证这一建议,建议人提出了几个论据:

第一,建议人援引斯大林所说生产资料甚至不出售给集体农庄这句话,而对斯大林的这一论点表示怀疑,宣称国家毕竟在向集体农庄出售生产资料,如象大镰刀、小镰刀以及小发动机等等之类的小农具。他们认为,既然国家把这些生产资料出售给集体农庄,那么国家也可以把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之类的一切其他生产资料出售给集体农庄。

这一论据是不能成立的。当然,国家是把小农具出售给集体农庄的,依照农业劳动组合章程和宪法,这是可以的。但是可不可以把小农具和象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那样的农业基本生产资料相提并论,或者,把它们和也是农业基本生产资料之一的土地相提并论呢?显然,是不可以的。其所以不可以,是因为小农具丝毫也决定不了集体农庄生产的命运,可是象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以及土

地这样的生产资料,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是完全可以决定农业的命运。

不难理解,当斯大林说生产资料不出售给集体农庄的时候,他所指的不是小农具,而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即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土地。建议人玩弄“生产资料”这个字眼,把两种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他们不知不觉地碰了壁。

第二,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又引证说,在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开始的时期——1929 年底和 1930 年初,联共(布)中央自己曾经主张把机器拖拉机站转归集体农庄所有,同时要求集体农庄在三年内偿清机器拖拉机站的价值。他们认为,虽然这事情当时“因为”集体农庄“贫穷”而失败了,但是现在,当集体农庄已经富裕的时候,可以重新实行这个政策——把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

这一论据也是不能成立的。在 1930 年初,联共(布)中央确实曾经通过一项把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的决定。当时是按照一部分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的建议,作为试验、作为尝试而通过这个决定的,为的是在不久之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加以考察。但头一次检查就表明这一决定是不妥当的。过了几个月,即在 1930 年底,就把这个决定取消了。

后来集体农庄运动进一步的增长和集体农庄建设的发展,使集体农庄庄员以及领导工作人员都最后地确信,把农业的基本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中,集中在机器拖拉机站手中,是保证集体农庄生产高速度增长的唯一方法。

我们大家都庆幸我国农业生产的巨大增长,谷物、棉花、亚麻、甜菜等等生产的增长。这种增长的源泉是什么呢?这种增长的源

泉就是现代技术，就是许许多多为这一切生产部门服务的现代化机器。这里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技术，而是在于技术不能停止不前，它必须继续日新月异地改进，旧的技术必须作废，代之以新技术，新的再代之以最新的。不这样做，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不断进步就是不可思议的，要取得丰富的收获，要使农产品丰富，也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要把几十万台轮式拖拉机作废，代之以履带拖拉机，把几万台陈旧了的联合收割机作废，代之以新的联合收割机，以及例如，为经济作物制造新的机器，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负担几十亿的支出，这些支出非经过6—8年之后不能完全收回。即使我国的集体农庄是百万富翁，它们负担得了这样大的支出吗？不，负担不了，因为它们没有力量负担要在6—8年之后才能完全收回的几十亿的费用。这种支出只有国家才负担得了，因为国家，并且只有国家才负担得起由于旧机器作废和换用新机器所受到的损失，因为国家，并且只有国家才能在6—8年之内承担这种损失，直到这笔费用收回为止。

既然如此，那么要求把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归其所有，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使集体农庄遭受巨大损失，使集体农庄破产，破坏农业的机械化，降低集体农庄生产的速度。

由此可得出结论说，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建议把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归其所有，就是向落后方面倒退一步，就是企图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

就暂且假定一下，我们接受了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的建议，并着手把基本生产工具、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归其所有。这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第一，结果就会是集体农庄成了基本生产工具的所有者，换句

话说,它们就会处于我国无论哪一个企业都没有的特殊地位,因为大家知道,在我国,甚至国有化的企业也不是生产工具的所有者。究竟用什么来作为集体农庄的这种特殊地位的根据呢?这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进步的、前进的考虑呢?可不可以说,这样的地位就会促使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就会加快我们的社会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呢?如果说这样的地位只会使集体农庄所有制离开全民所有制更远,不是使我们接近共产主义,反而远离共产主义,岂不是更正确些吗?

第二,结果就会是扩大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因为巨量的农业生产工具会投进商品流通的范围。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是怎么想的呢?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能不能使我们向共产主义推进呢?说它只会阻碍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岂不是更正确些吗?

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的基本错误是在于他们不了解商品流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和意义,不了解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大概他们以为,就是有商品流通,也可以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去,商品流通是不会妨碍这个事业的。这是由于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而犯的严重错误。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里批评杜林主张的在商品流通条件下活动的“经济公社”时,确凿证明商品流通的存在必然会使杜林的所谓“经济公社”走向复活资本主义的地步。大概,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是不同意这一点的。那就对他们更糟了。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从这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以及按照需要来分配产品的共产主义原则,是排斥任何商品交换的,因而也排斥把产品转化为商品,也就是把产品转化为价值的。

关于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的建议和论据的情形,就是如此。

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呢?

集体农庄不是普通的企业。集体农庄是在土地上工作,而它耕种的土地早已不是集体农庄的财产,而是全民的财产。因而,集体农庄并不是它所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

其次,集体农庄借以进行工作的基本生产工具,并不是集体农庄的财产,而是全民的财产。因而,集体农庄不是基本生产工具的所有者。

再次,集体农庄是合作企业,它使用自己庄员的劳动,按照劳动日把收入分配给庄员,而且集体农庄有自己年年更换的、用于生产的种子。

试问,集体农庄究竟占有一些什么?它可以完全自由地任意支配的集体农庄财产又是什么呢?这种财产就是集体农庄的产品,集体农庄生产的产品,即谷物、肉类、油类、蔬菜、棉花、甜菜、亚麻等等,而建筑物和集体农庄庄员园地中的个人副业不计在内。问题在于,这种产品的大部分,即集体农庄生产的剩余品,进入市场,从而列入商品流通系统。正是这种情况现在阻碍着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所以正应该从这一方面展开工作,来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

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必须将集体农庄生产的剩余品从商品流通系统中排除出去,把它们纳入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之间的产品交换系统。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我们还没有发达的产品交换制度,但是有产品交换的萌芽,即农产品的“换货”。大家知道,对植棉、种麻、种甜菜和其他的集体

农庄的产品早已实行“换货”了。诚然，这是不完全的、部分的“换货”，但总算是在“换货”了。要顺便指出，“换货”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应该用产品交换来代替它。任务是在于，要使农业的一切部门中都培植这些产品交换的萌芽，并把它们发展成为广泛的产品交换系统，使集体农庄用自己的产品换得的不仅是货币，而主要是必要的制成品。这样的制度需要大量地增加城市送交农村的产品，所以，推行这种制度不能过分性急，要随着城市制成品积累的程度而定。但是应该一往直前、毫不犹豫地推行这种制度，一步一步地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而扩大产品交换的活动范围。

这样的制度既缩小着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就使社会主义易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此外，它使我们有可能把集体农庄的基本财产即集体农庄生产的产品纳入全民计划的总系统中。

在我国现今条件下，要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这将是实际的和有决定意义的办法。

这样的制度对于集体农庄的农民是否有利呢？无疑是有利的。其所以有利，是因为集体农庄农民从国家手中获得的产品，将比在商品流通中获得的多得多，价钱也更便宜。大家知道，和政府订有产品交换（“换货”）合同的集体农庄所获得的利益，较之没有订立这种合同的集体农庄，要多得无比。如果把产品交换制度推广到全国所有的集体农庄，那么我国全体集体农庄农民就都能享受这些利益了。

约·斯大林

1952年9月28日

译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1952年版

答美国一些地方报纸编辑 提出的问题

问：现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比两三年前更加临近了？

答：不，不是更加临近。

问：大国首脑会晤有益处吗？

答：可能有益处。

问：您是否认为现在是德国统一的适当时机？

答：是的，我认为是这样。

问：在怎样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处才是可能的？

答：只要双方有合作的愿望，决心履行所承担的义务，遵守平等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和平共处是完全可能的。

译自 1952 年 4 月 2 日《真理报》

致苏联少年先锋队员

值此列宁少年先锋队组织成立三十周年之际，谨向少年先锋队员们和小学生们致以衷心的祝贺。

祝少年先锋队员和小学生们身体健康，在学习、劳动和社会工作中取得成就。

愿少年先锋队组织今后继续把少年先锋队员和小学生们培养成忠实的列宁主义者和我们伟大祖国的忠诚儿女。

约·斯大林

译自 1952 年 5 月 20 日《真理报》

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①上的讲话

(1952年10月14日)

同志们!

让我代表我们的代表大会,向所有派遣代表光临我们的代表大会或给代表大会拍来贺电的兄弟党和团体表示谢意,感谢它们的友好祝贺,感谢它们希望我们成功的愿望,感谢它们的信任。

我们特别珍视这种信任,这种信任表示它们决心支持我们为各国人民的光明的未来而斗争,为反对战争而斗争,为维护和平而斗争。

如果认为我们党已成为强大的力量而不再需要支持,那就错了。这是不对的。我们党和我们国家过去和将来始终需要外国兄弟人民的信任、同情和支持。

这种支持的特点就在于:任何兄弟党对我们党的和平愿望的一切支持,同时也就是对它们本国人民维护和平的斗争的支持。当1918—1919年英国资产阶级武装进攻苏联的时候,英国工人在

① 这次代表大会于1952年10月5—14日在莫斯科举行,议程是: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关于1951—1955年苏联发展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修改党章和选举党中央机构。大会通过决议,把党的名称由“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并把中央政治局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党监察委员会改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编者注

“不准干涉俄国”的口号下组织了反对战争的斗争,这就是支持,首先是对他们本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的支持,其次也是对苏联的支持。现在多列士同志或陶里亚蒂同志宣布他们国家的人民不会对苏联人民作战,这就是支持,首先是对法国和意大利正在为和平而斗争的工人和农民的支持,其次也是对苏联的和平愿望的支持。这种互相支持的特点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党的利益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利益不但不矛盾,反而是融合在一起的。至于苏联,它的利益是和全世界的和平事业根本分不开的。

自然,我们党不能不报答兄弟党,我们党也必须支持兄弟党和支持它们本国的人民为争取解放而斗争、为维护和平而斗争。大家知道,我们党正是这样做的。在1917年我们党取得政权以后,在我们党采取了实际措施来消灭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以后,兄弟党的代表对我们党的勇敢和成就表示敬佩,给予我们党以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的称号。他们以此表示,希望这支“突击队”的成就能改善在资本主义压迫下受折磨的各国人民的处境。我认为,我们党没有辜负这种希望,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粉碎了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暴政,使欧洲和亚洲的各国人民摆脱了法西斯奴役的威胁。

当然,只要这支“突击队”还是唯一的一支突击队,只要它还是几乎单枪匹马地执行这个先进的任务,那么,执行这个光荣的任务是很困难的。不过,这是过去的情况。现在完全不同了。现在,从中国和朝鲜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已经出现了人民民主国家这些新的“突击队”,——现在,我们党进行斗争是比较容易了,而且工作进行得也比较愉快了。

那些还没有取得政权而继续在资产阶级残酷法律的统治下工

作的共产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或工农的政党，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当然，它们工作起来是比较困难。但是，它们不象我们俄国共产党人在沙皇制度时期那样困难了，那时候，稍微往前动一动都被宣布为滔天的罪行。但是，俄国共产党人坚持下来了，没有为困难所吓倒，而且获得了胜利。这些政党也会这样的。

为什么这些政党进行工作，终究不象沙皇时期俄国共产党人那样困难了呢？

第一，因为在它们面前有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斗争和成就的榜样。因此，它们可以从这些国家的错误和成就中学习，从而便于进行自己的工作。

第二，因为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主要敌人——本身已经和以前不同了，已经大大地改变了，已经变得更加反动，已经失去同人民的联系，因而把自己削弱了。自然，这种情况也一定会便于革命的和民主主义的政党进行工作。

从前，资产阶级敢于实行自由主义，维护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从而在人民中间为自己树立了声望。现在，连自由主义的影子也没有了。所谓“个人自由”已经不再存在了，——现在，仅仅那些拥有资本的人才被承认有个人权利，而其他的一切公民则被当作只适于供剥削的人料。人人平等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被践踏了，代替它的是少数剥削者享有充分权利而占公民大多数的被剥削者毫无权利的原则。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旗帜被抛弃了。我认为你们，共产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政党的代表们，必须举起这面旗帜，打着这面旗帜前进，如果你们想把大多数人民集合在自己周围的话。除了你们以外，再也没有人能举起这面旗帜。

从前，资产阶级被当作民族的领袖，它维护民族的权利和独

立,把它们看得“高于一切”。现在,连“民族原则”的影子也没有了。现在,资产阶级出卖民族的权利和独立来换取美元。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旗帜已经被抛弃了。毫无疑问,你们,共产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政党的代表们,必须举起这面旗帜,打着这面旗帜前进,如果你们想成为本国的爱国者的话,如果你们想成为自己民族的领导力量的话。除了你们以外,再也没有人能举起这面旗帜。

这就是目前的情况。

自然,所有这些情况一定会便于尚未取得政权的共产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政党进行工作。

因此,有一切理由指望受资本统治的国家中的兄弟党能够成功和胜利。

我们的兄弟党万岁!

兄弟党的领导者们永远健康!

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万岁!

打倒战争挑拨者!

译自《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
讲话》1952年版

答《纽约时报》外交记者 詹姆斯·赖斯顿问

(1952年12月21日接到的问题)

问：在新年即将到来、合众国新政府即将就职之际，您是否仍然保持自己的信念，认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合众国在未来的年代里能够和平相处？

答：我仍然相信：不能认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两国今后也能够和平相处。

问：照您看来，目前国际局势紧张的根源在哪里？

答：在凡是表现出反苏“冷战”政策的侵略行动的一切地方和事情上。

问：您是否欢迎同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代表举行外交会谈，来研究您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就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问题举行会晤的可能性？

答：我赞成这样的建议。

问：您是否愿意在任何以结束朝鲜战争为目的的新的外交措施中进行合作？

答：我同意进行合作，因为苏联是希望结束朝鲜战争的。

译自 1952 年 12 月 26 日《真理报》

人 名 索 引

A

- 阿多拉茨基, 弗拉基米尔·维克多罗维奇 (Адорат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Викторович 1878—1945)——第 2 页。
- 阿尔捷米耶夫, 帕维尔·阿尔捷米耶维奇 (Артемьев, Павел Артемьевич 生于 1897 年)——第 462 页。
- 阿兰布鲁克, 艾伦·弗朗西斯·布鲁克 (Alanbrooke, Alan Francis Brooke 1883—1963)——第 527 页。
- 阿萨尼亚·迪亚斯, 曼努埃尔 (Azana Diaz, Manuel 1880—1940)——第 135 页。
- 阿提拉 (Attila 406 左右—453)——第 395 页。
- 埃尔基勒特 (Erkilet)——第 346 页。
- 艾德礼, 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 (Attlee, Clement Richard Attlee 1883—1967)——第 587, 588 页。
- 艾登, 罗伯特·安东尼 (Eden, Robert Anthony 1897—1977)——第 429 页。
- 艾森豪威尔, 德怀特·戴维 (Eisenhower, Dwight David 1890—1969)——第 679 页。
- 安德斯, 瓦迪萨夫 (Anders, Wladyslaw 1892—1970)——第 501 页。
- 奥尔忠尼启则, 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Григо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86—1937)——第

59 页。

奥斯特罗维佳诺夫, 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 (Островитянов, Константин Васильевич 1892—1969)——第 632 页。

B

- 巴比塞, 昂利 (Barbusse, Henri 1873—1935)——第 54 页。
- 巴尔金, 伊万·巴甫洛维奇 (Бардин, Иван Павлович 1883—1960)——第 36 页。
- 巴甫洛夫 (Павлов, В. Н.)——第 534 页。
- 巴甫洛夫, 伊万·彼得罗维奇 (Павлов, 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1849—1936)——第 305 页。
- 巴克莱-德-托利, 米哈伊尔·波格丹诺维奇 (Барклай-де-Толли, Михаил Богданович 1761—1818)——第 491 页。
- 巴图罗娃, 伊拉 (Багурова, Ира 生于 1919 年)——第 1 页。
- 巴维利奇, 安特 (Pavelić, Ante 1889—1959)——第 501 页。
- 巴扎罗夫,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Базаров,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74—1939)——第 211 页。
- 巴兹 (Базъ)——第 493 页。
- 白劳德, 厄尔·拉塞尔 (Browder, Earl Russell 1891—1973)——第 90 页。

拜杜科夫, 格奥尔吉·菲力波维奇 (Байдуков, Георгий Филиппович 生于 1907 年)——第 96、97 页。

贝尔纳斯, 詹姆斯·弗朗西斯 (Byrnes, James Francis 1879—1972)——第 511 页。

贝利, 休 (Baillie, Hugh 生于 1890 年)——第 511—515 页。

倍倍尔, 奥古斯特 (Bebel, August 1840—1913)——第 8 页。

比弗布鲁克, 威廉·马克斯韦尔·艾特肯 (Beaverbrook, William Maxwell Aitken 1879—1964)——第 308 页。

别尔金, 德·(Белкин, Д.)——第 578—581 页。

别利亚科夫,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 (Беля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生于 1897 年)——第 96、97 页。

别林斯基, 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 (Белинский,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11—1848)——第 305 页。

波波夫, 马尔基安·米哈伊洛维奇 (Попов, Марки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1902—1969)——第 381—383、384—385 页。

波茨措-迪-博尔哥, 卡尔·奥西波维奇 (Потцо-ди-Борго, Карл Осипович 1764—1842)——第 3 页。

波格丹诺夫,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 (Богда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73—1928)——第 211、647、649 页。

波克罗夫斯基,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 (Покровский,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863—1932)——第 495 页。

波扎尔斯基, 季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 (Пожарский, Дмит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578—1642)——第 313 页。

伯恩斯坦, 爱德华 (Bernstein, Eduard 1850—1932)——第 177 页。

博古斯拉夫斯基, 米哈伊尔·索洛蒙诺维奇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Михаил Со-
ломонович 1886—1937)——第 146 页。

布尔拉科夫 (Бурлаков, Н. В.)——第 233 页。

布哈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Бухарин,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88—1938)——第 162、264、265、653、654、661 页。

布拉穆利亚, 胡安·阿蒂略 (Bramuglia, Juan Atilio 生于 1903 年)——第 542 页。

布劳希奇, 瓦尔特·冯 (Brauchitsch, Walther von 1881—1948)——第 329 页。

布鲁克——见阿兰布鲁克, 艾·弗·布。
布瑟金, 亚历山大·哈利东诺维奇 (Бу-
сыгин, Александр Харитонович 生
于 1907 年)——第 61、64、65、66、71 页。

C

查理大帝 (Charlemagne 742—814)——第 553 页。

柴可夫斯基, 彼得·伊里奇 (Чайковский, Петр Ильич 1840—1893)——第 305 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
лович 1828—1889)——第 305 页。

D

达尔文, 查理·罗伯特 (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第 198、203 页。

达西, 塞缪尔·亚当斯 (Darcy, Samuel Adams 生于 1904 年)——第 90 页。

丹尼洛夫, 普拉东 (Данилов, Платон 生于1919年)——第1页。

道尔日耶夫, 尼古拉 (Доржеев, Николай 生于1919年)——第1页。

德罗布尼斯, 雅柯夫·瑙莫维奇 Дробнис, Яков Наумович 1891—1937)——第146页。

邓尼金, 安东·伊万诺维奇 (Деникин, 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1872—1947)——第116、191页。

迪亚斯——见拉莫斯·迪亚斯, 何·。

东条英机(1884—1948)——第533页。

杜林, 欧根·卡尔 (Dühring, Eugen Karl 1833—1921)——第204、662、670页。

杜鲁门, 哈里·斯· (Truman, Harry S. 1884—1972)——第546页。

多列士, 莫里斯 (Thorez, Maurice 1900—1964)——第54、676页。

E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第2—8、177、200、201、202、203、204、208、209、210、227、276、277、278、279、489、491、495、525、526、556、571、573、581、582、583、600、604、605、616、617、652、653、655、662、665、666、670页。

F

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安德列亚斯 (Feuerbach, Ludwig Andreas 1804—1872)——第201页。

费舍, 路特 (Fischer, Ruth, 1895—1961)——第156页。

冯·吉尔斯——见吉尔斯, 尼·卡·。

伏龙芝,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 (Фрун-

зе,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885—1925)——第405页。

伏罗希洛夫, 克利缅特·叶非列莫维奇 (Ворошилов, 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1881—1969)——第1、58、59、135、182页。

福特, 亨利 (Ford, Henry 1863—1947)——第15、16页。

富兰克林, 本杰明 (Franklin, Benjamin 1706—1790)——第226页。

富列尔, 斯· (Фурер, С.)——第578—581页。

G

高尔察克,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 (Колчак,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874—1920)——第116、191页。

高尔基, 马克西姆 (Горький, Максим 1868—1936)——第25、305、324页。

高尔斯华绥, 约翰 (Galsworthy, John 1867—1933)——第25页。

戈林, 赫尔曼 (Göring, Hermann 1893—1946)——第305、327、329页。

戈洛瓦诺夫, 亚历山大·叶夫根尼耶维奇 (Голова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Евгеньевич 1904—1975)——第382页。

戈培尔, 保尔·约瑟夫 (Goebbels, Paul Joseph 1897—1945)——第327、509页。

哥白尼, 尼古拉 (Copernicus, Nicolaus 1473—1543)——第210、211页。

哥尔查科夫,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 (Горч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798—1883)——第4页。

格奥尔格诺娃, 廖丽亚 (Георгиева, Леля 生于1918年)——第1页。

格林卡,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Глин-

ка,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1804—1857)

——第 305 页。

格罗莫夫,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
(Громов,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生
于 1899 年)——第 97 页。

古久里——见瓦扬-古久里, 保·。

果戈理,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 (Гоголь,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09—1852)
——第 117、186、187 页。

И

哈里曼, 威廉·阿韦雷尔 (Harriman,
William Averell 生于 1891 年) ——
第 308 页。

赫拉克利特 (Heraclitos 约公元前 540
—480 和 470 之间)——第 208、495 页。

赫鲁晓夫,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Хру-
щев, 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1894—
1971)——第 182 页。

赫斯, 鲁道夫 (Heß, Rudolf 生于 1894
年)——第 299 页。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
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
—1831)——第 200、204 页。

华莱士, 亨利·艾加德 (Wallace, Henry
Agard 1888—1965)——第 508、509、
540—541 页。

华西列夫斯基,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
奇 (Василев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Ми-
хайлович 1895—1977)——第 318、357
页。

霍华德, 罗伊·威尔逊 (Howard, Roy
Wilson 1883—1964) ——第 85—95
页。

霍洛波夫, 阿· (Холопов, А.)——第
581—586 页。

Ж

基洛夫, 谢尔盖·米龙诺维奇 (Киров,
Сергей Миронович 1886—1934) ——
第 29、32、137、138、268 页。

吉卜林, 约瑟夫·拉迪亚德 (Kipling,
Joseph Rudyard 1865—1936)——第
32 页。

吉尔摩, 埃迪·拉尼尔·金 (Gilmore,
Eddy Lanier King 生于 1907 年)——
第 503—504 页。

吉尔斯, 尼古拉·卡尔洛维奇 (Гирс,
Николай Карлович 1820—1895)
——第 4 页。

吉洪诺夫 (Тихонов, П. С.)——第 233
页。

季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顿斯科伊 (Ди-
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Донской (1350—
1389)——第 313 页。

季诺维也夫, 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
(Зиновьев, Григорий Езеевич 1883
—1936)——第 137、138、143、189、264
页。

加拉宁,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 (Галанин,
Ив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1899—1958)——
第 382 页。

加勒, 约翰·哥特弗利德 (Galle, Johann
Gottfried 1812—1910)——第 211 页。

加里宁,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Кали-
нин,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1875—1946)
——第 59、182 页。

加米涅夫, 列夫·波里索维奇 (Каменев,
Лев Борисович 1883—1936) ——
第 137、143、189、264 页。

加托夫斯基, 列夫·马尔科维奇 (Гатов-
ский, Лев Маркович 生于 1903 年)
——第 632 页。

加香, 马塞尔 (Cachin, Marcel 1869—1958) ——第 54 页。

伽利莱, 伽利略 (Galilei, Galileo 1564—1642) ——第 198 页。

伽利略——见伽利莱, 伽·。

杰尔昆斯基 (Деркунский, Н. М.) ——第 233 页。

杰姆钦科, 玛丽亚·索夫罗诺夫娜 (Демченко, Мария Софроновна 生于 1912 年) ——第 59、71、72 页。

金 (King) ——第 379 页。

久卡诺夫 (Дюканов, М. Д.) ——第 181 页。

居鲁士 (Kurush 或 Cyrus 约公元前 600—530) ——第 553 页。

К

卡冈诺维奇, 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 (Каганович, Лазарь Моисеевич 生于 1893 年) ——第 1、58、182 页。

卡捷尔科夫 (Казелков) ——第 188、189、194 页。

卡图科夫, 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 (Катуков, Михаил Ефимович 1900—1976) ——第 382 页。

卡西迪, 亨利 (Cassidy, Henry) ——第 333、354—355 页。

凯撒 (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 (G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 100 左右—44) ——第 553 页。

凯特尔, 威廉 (Keitel, Wilhelm 1882—1946) ——第 491 页。

康德, 伊曼努尔 (Kant, Immanuel 1724—1804) ——第 210 页。

康斯坦丁诺夫——见朱可夫, 格·康·。

考茨基, 卡尔 (Kautsky, Karl 1854—1938) ——第 490 页。

科尔帕克奇, 弗拉基米尔·雅柯夫列维奇 (Колпакчи, 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 1899—1961) ——第 382 页。

科基纳基, 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维奇 (Коккинаки, Владими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生于 1904 年) ——第 97 页。

科罗博夫全家: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 (老科罗博夫),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伊里亚·伊万诺维奇 (Коробовы, Ива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82—1952, 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1902—1965,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生于 1905 年, Илья Иванович 生于 1910 年) ——第 181 页。

科马罗夫, 弗拉基米尔·列昂节维奇 (Комаров, Владимир Леонтьевич 1869—1945) ——第 325 页。

科涅夫,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 (Конев, Ив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1897—1973) ——第 384—385 页。

克拉舍宁尼科娃, 叶· (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а, Е.) ——第 571—577、579 页。

克拉苏 (马尔库斯·利基尼乌斯·克拉苏) (Marcus Licinius Crassus 公元前 115 左右—53) ——第 492 页。

克拉索夫斯基, 斯捷潘·阿基莫维奇 (Красовский, Степан Акимович 生于 1897 年) ——第 382 页。

克劳塞维茨, 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 (Clausewitz, K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1780—1831) ——第 489—495 页。

克里沃诺斯, 彼得·费多罗维奇 (Кривонос, Петер Федорович 生于 1910 年) ——第 61 页。

克留京金, 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 (Крючкин, Васил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1894—1976)——第382页。
 克伦威尔, 奥利弗 (Cromwell, Oliver 1599—1658)——第20页。
 库图佐夫, 米哈伊尔·伊拉里昂诺维奇 (Кутузов, Михаил Илларионович 1745—1813)——第305, 313, 491, 492页。

L

拉德斯库, 尼古拉 (Radescu, Nicolae 1874—1953)——第501页。
 拉狄克, 卡尔·伯恩哈多维奇 (Радек, 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1885—1939)——第143, 144页。
 拉尔戈·卡瓦列罗, 弗朗西斯科 (Largo Caballero, Francisco 1869—1946)——第133—135页。
 拉法格, 保尔 (Lafargue, Paul 1842—1911)——第557, 565页。
 拉莫斯·迪亚斯, 何塞 (Ramos Diaz, José 1895—1942)——第98页。
 拉辛, 斯捷潘·季莫费耶维奇 (Разин, Степан Тимофеевич 1630左右—1671)——第28页。
 拉辛, 叶夫根尼·安德列耶维奇 (Разин, Евгений Андреевич 1898—1964)——第489—496页。
 赖斯顿, 詹姆斯·巴雷特 (Reston, James Barrett 生于1909年)——第679页。
 赖谢瑙, 瓦尔特·冯 (Reichenau, Walther von 1884—1942)——第329页。
 勒维烈, 乌尔本 (Le Verrier, Urbain 1811—1877)——第211页。
 李海, 威廉·丹尼尔 (Leahy, William Daniel 1875—1959)——第527页。
 李可夫,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Рыков,

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1881—1938)——第265页。
 李维诺夫,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 (Литвинов, 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1876—1951)——第85, 89, 90, 91页。
 里宾特洛普, 约阿希姆·冯 (Ribbentrop, Joachim von 1893—1946)——第289, 327页。
 里亚博沙普卡 (Рябошапка)——第181页。
 利夫希茨, 雅柯夫·阿布拉莫维奇 (Лившиц, Яков Абрамович 1896—1937)——第146页。
 利文, 赫里斯托弗尔·安德列耶维奇 (Ливен, Христофор Андреевич 1774—1839)——第3页。
 列昂节夫, 列夫·阿布拉莫维奇 (Леонтьев, Лев Абрамович 1901—1974)——第632页。
 列宾, 伊里亚·叶菲莫维奇 (Репин, Илья Ефимович 1844—1930)——第305页。
 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Ленин,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1870—1924)——第8, 9, 38, 43, 44, 52, 55, 74, 84, 106, 127, 152, 166, 167, 169, 170, 174, 186, 187, 188, 190, 191, 194, 198, 199, 205, 208, 209, 211, 277, 279, 280, 291, 294, 305, 312, 313, 332, 364, 369, 374, 387, 394, 395, 439, 458, 461, 480, 486, 489, 490, 491, 493, 494, 495, 506, 520, 524, 535, 538, 559, 560, 582, 606, 607, 609, 621, 625, 632, 648, 649, 652, 653, 654, 661, 663页。
 鲁登道夫, 埃里希 (Ludendorff, Erich 1865—1937)——第491页。
 鲁登科, 谢尔盖·伊格纳季耶维奇 (Ру-

- денко, Сергей Игнатьевич 生于1904年)——第382页。
- 罗金, 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 (Родин, Алексе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902—1955)——第382页。
- 罗科索夫斯基,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 (Рокоссовск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96—1968)——第363, 381—383, 384—385, 462页。
- 罗曼年科, 普罗科菲·洛格维诺维奇 (Романенко, Прокофий Логвинович 1897—1949)——第382页。
- 罗曼诺夫 (Романов, А. И.)——第233页。
- 罗森贝格, 马塞尔·伊兹赖利耶维奇 (Розенберг, Марсель Израильевич)——第133, 134页。
- 罗森霍尔茨, 阿尔卡季·巴甫洛维奇 (Розенгольц, Аркадий Павлович 1889—1938)——第264, 265页。
- 罗斯福, 埃利奥特 (Roosevelt, Elliott 生于1910年)——第516—519页。
- 罗斯福, 富兰克林·德拉诺 (Roosevelt, Franklin Delano 1882—1945)——第9, 11, 12, 13, 25, 89, 90, 91, 378, 518, 526页。
- 罗特米斯特罗夫, 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 (Ротмистров, Павел Алексеевич 生于1901年)——第382页。
- 洛克菲勒, 约翰·戴维逊 (Rockefeller, John Davison 1839—1937)——第15页。

M

- 马赫, 恩斯特 (Mach, Ernst 1838—1916)——第211页。
- 马克思, 卡尔 (Marx, Karl 1818—1883)——第103, 200, 201, 208, 209, 213, 214, 215, 219, 226, 229, 230, 276, 277, 279, 491, 525, 526, 555, 556, 571, 573, 575, 581, 582, 610, 616, 617, 646, 647, 651, 655, 658, 660, 661, 662页。
- 马斯洛夫, 阿尔卡季 (Маслов, Аркадий 1891—1941)——第156页。
- 马特洛索夫, 亚历山大·马特维耶维奇 (Матрос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атвеевич 1924—1943)——第386页。
- 马歇尔, 乔治·凯特勒特 (Marshall, George Catlett 1880—1959)——第620, 623页。
- 毛奇, 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德 (Moltke, Helmut Karl Bernhard 1800—1891)——第491页。
- 梅夏宁诺夫, 伊万·伊万诺维奇 (Мещанинов,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883—1967)——第568页。
- 美舍利亚科夫 (Мещеряков)——第490, 493, 494, 495页。
- 米尔左扬, 列翁·伊萨耶维奇 (Мирзоян, Левон Исаевич 1897—1939)——第164, 165页。
- 米高扬,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 (Микоян, Анастас Иванович 1895—1978)——第59页。
- 米哈伊洛维奇, 德拉戈留布 (德拉扎) (Михайлович, Драгољуб (Дража) 1893—1946)——第501页。
- 米宁, 库兹马 (Минин, Кузьма 死于1616年)——第313页。
- 摩根, 约翰·皮尔庞特 (Morgan, John

Pierpont 1837—1913)——第15页。
莫洛托夫,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
(Молотов, 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生于1890年)——第1, 53, 59, 65, 83,
135, 155, 182, 345, 346, 359, 528, 529
页。

墨索里尼, 贝尼托 (Mussolini, Benito
1883—1945)——第397页。

穆拉洛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Мура-
л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77—1937)
——第146页。

穆辛斯基, 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 (Му-
синский, Василий Степанович 生于
1907年)——第65页。

N

拿破仑第一 (Napoléon I 1769—1821)
——第4, 32, 141, 238, 289, 307, 342,
417, 492页。

瑙緬科, 尼古拉·费多罗维奇 (Науменко,
Николай Фёдорович 1901—1967)
——第382页。

尼古拉延科 (Николаенко) ——第171
页。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
——第28页。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见赫鲁晓夫,
尼·谢·。

尼米兹, 切斯特·威廉 (Nimitz, Chester
William 1885—1966)——第533页。

涅姆钦诺夫, 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
(Немчинов, Василий Сергеевич
1894—1964)——第256页。

涅谢尔罗迭, 卡尔·罗伯特 (瓦西里耶
维奇) (Нессельроде, Карл Роберт
(Васильевич) 1780—1862) ——第
3, 4页。

诺特京, 亚历山大·伊里奇 (Нотк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 生于1901年)——
第634—642页。

诺维科夫,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
(Нов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
вич 1900—1976)——第353页。

P

帕克 (Parker)——第377页。

帕帕宁, 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 (Папа-
нин, Иван Дмитриевич 生于1894年)
——第198, 199, 233页。

皮达科夫, 格奥尔吉·列昂尼多维奇
(Пятаков, 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1890—1937)——第143, 144, 146页。

普霍夫,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 (Пухов,
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 1895—1958)——
第382页。

普加乔夫, 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 (Пу-
гачев, Емельян Иванович 1740 或
1742—1775) ——第28页。

普列汉诺夫, 格奥尔吉·瓦连廷诺维奇
(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1856—1918)——第177, 198, 305, 490
页。

普罗宁 (Пронин, И. К.)——第61页。

普希金,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 (Пуш-
кин,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99—
1837)——第305, 550, 551页。

Q

齐奥尔科夫斯基, 康斯坦丁·爱德华多
维奇 (Циолковск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
Эдуардович 1857—1935)——第55—
56页。

齐格尔, 古斯塔夫 (Ziegel, Gustav 死
于1941年)——第305页。

契诃夫, 安东·巴甫洛维奇 (Чехов, 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1860—1904)——第193、305页。

契卡洛夫, 瓦列里·巴甫洛维奇 (Чкалов, Валерий Павлович 1904—1938)——第96、97页。

契科巴瓦, 阿尔诺德·斯捷潘诺维奇 (Чикобава, Арнольд Степанович 生于1898年)——第576页。

契斯佳科夫,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Чистяков, 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1900—1979)——第382页。

邱吉尔, 温斯顿·伦纳德·斯潘塞 (Churchill,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1874—1965)——第293、346、378、429、497—502、511、527、543、544页。

R

日丹诺夫, 安德列·亚历山德罗维奇 (Жданов, Андр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96—1948)——第29、32页。

S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米哈伊尔·叶夫格拉福维奇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Михаил Евграфович 1826—1889)——第113、114页。

萨哈罗夫 (Сахаров, М. Е.)——第233页。

萨宁娜, 阿·弗·(Санина, А. В.)——第664—672页。

桑, 乔治 (Sand, George 1804—1876)——第32页。

桑热耶夫, 加尔马·丹察拉诺维奇 (Санжеев, Гарма Данцаранович 生于1902年)——第576、577—578页。

沙波什尼科夫, 波里斯·米哈伊洛维奇

(Шапошников, Борис Михайлович 1882—1945)——第495页。

沙特汉诺夫, 阿弗里坎 (Шатханов, Африкан 生于1921年)——第1页。

舍夫洛, 奥拉夫 (Schefflo, Olav 生于1883年)——第156页。

舍斯托夫,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 (Шестов, 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96—1937)——第146页。

施本格勒, 奥斯渥特 (Spengler, Oswald 1880—1936)——第32页。

施利芬, 阿尔弗雷德·格拉夫·冯 (Schlieffen, Alfred Graf von 1833—1913)——第491页。

施米特, 康拉德 (Schmidt, Conrad 1863—1932)——第495页。

什蒂尔贝伊, 巴尔布 (Știrbei, Barbu)——第501页。

史密斯, 约瑟夫·金斯伯里 (Smith, Joseph Kingsbury 生于1908年)——第545—546页。

史塔生, 哈罗德·爱德华 (Stassen, Harold Edward 生于1907年)——第523—534页。

舒米洛夫, 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 (Шумилов, Михаил Степанович 1895—1975)——第382页。

舒米亚茨基, 波里斯·扎哈罗维奇 (Шумяцкий, Борис Захарович 1885—1938)——第38页。

斯达汉诺夫, 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 (Стаханов, Алексе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906—1977)——第61、64、65、66、71、72、131、198、199页。

斯列普尼奥夫, 马夫里基·特罗非莫维奇 (Слепнёв, Маврикий Трофимович 1896—1965)——第97页。

斯梅塔宁,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 (Сметанин, Николай Степанович 1905—1978)——第 61、66 页。

斯托莫尼亚科夫, 波里斯·斯皮里多诺维奇 (Стомоняков, Борис Спиридонович 1882—1941)——第 85 页。

苏里科夫,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Суриков, 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1848—1916)——第 305 页。

苏瓦林, 波里斯 (Souvarine, Boris 生于 1895 年)——第 156 页。

苏沃洛夫,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 (Суво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729 或 1730—1800)——第 305、313 页。

索柯里尼柯夫, 格里戈里·雅柯夫列维奇 (Сокольников, 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1888—1939)——第 143、144 页。

索科林斯基 (Соколинский)——第 65 页。

索科洛夫斯基, 瓦西里·丹尼洛维奇 (Соколо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Данилович 1897—1968)——第 384—385 页。

索森科夫斯基, 卡济米耶尔兹 (Sosnkowski, Kazimierz 1885—1969)——第 501 页。

T

陶里亚蒂, 帕尔米罗 (Togliatti, Palmiro 1893—1964)——第 676 页。

铁木辛科, 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 (Тимошенко, Семё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95—1970)——第 527 页。

图哈切夫斯基,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 (Тухачевский,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893—1937)——第 264 页。

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Тол-

стой,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8—1910)——第 305 页。

托勒密, 克劳狄乌斯 (Ptolemaeus, Claudius 约 90—160)——第 70 页。

托洛茨基, 列夫·达维多维奇 (Троцкий, 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1879—1940)——第 138、144、156、162、189、264、481 页。

托特, 弗里茨 (Todt, Fritz 1891—1942)——第 329 页。

W

瓦纳格,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Ванаг,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生于 1899 年)——第 27 页。

瓦图京, 尼古拉·费多罗维奇 (Ватутин, Николай Фёдорович 1901—1944)——第 353、381—383、384—385 页。

瓦扬-古久里, 保尔 (Vaillant-Couturier, Paul 1892—1937)——第 54 页。

瓦伊诺夫 (Вайнов, А. Р.)——第 164、165 页。

威尔斯, 赫伯特·乔治 (Wells, Herbert George 1866—1946)——第 9—26 页。

威廉二世 (Wilhelm II 1859—1941)——第 288、289 页。

维诺格拉多娃,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Виноградова, Мария Ивановна 生于 1910 年) 和维诺格拉多娃, 叶夫多基娅·维克多罗夫娜 (Виноградсва, Евдокия Викторовна 1914—1962)——第 61、71 页。

维辛斯基, 安德列·亚努阿里耶维奇 (Вышинский, Андрей Януарьевич 1883—1954)——第 542 页。

文热尔, 弗·格·(Венжер, В. Г.)——第 664—672 页。

沃多皮亚诺夫,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 (Водопьянов,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生于 1899 年)——第 97 页。

沃罗诺夫,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Воронов,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99—1968)——第 363 页。

沃罗热伊金, 格里戈里·阿列克谢耶维奇 (Ворожейкин, 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895—1974)——第 353 页。

沃斯, 亚历山大 (Werth, Alexander 1901—1969)——第 508—510、514 页。

乌博列维奇, 伊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 (Уборевич, Иероним Петрович 1896—1937)——第 264 页。

乌尔班斯, 胡戈 (Urbahns, Hugo 1890—1946)——第 156 页。

乌罗任科 (Уроженко)——第 188、189、193、194、195 页。

X

希姆莱, 亨利希 (Himmler, Heinrich 1900—1945)——第 327 页。

希特勒, 阿道夫 (Hitler, Adolf 1889—1945)——第 87、289、293、297、299、304、305、307、308、314、321、323、327、329、346、347、355、359、367、372、394、397、398、401、402、408、414、417、429、453、456、497、498、499、509 页。

谢德林——见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米·叶·。

谢皮洛夫, 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 (Шеилов, Дмитрий Трофимович 生于 1905 年)——第 632 页。

谢切诺夫,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Сеченов, 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1829—1905)——第 305 页。

Y

亚基尔, 约纳·埃马努伊洛维奇 (Якир, Иона Эммануилович 1896—1937)——第 264 页。

雅罗申科, 尔·德· (Ярошенко, Л. Д.)——第 642—663 页。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 1220 左右—1263)——第 313 页。

亚历山大大帝 (Александрос ho Mégas 公元前 356—323)——第 553 页。

岩本清 (1904—1976)——第 595—596 页。

叶卡捷琳娜二世 (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第 3、27 页。

叶廖缅科, 安德列·伊万诺维奇 (Ерёмченко, Андрей Иванович 1892—1970)——第 353 页。

伊斯门, 马克斯·福雷斯特 (Eastman, Max Forrester 1883—1969)——第 156 页。

伊万诺夫, 伊万·菲力波维奇 (Иванов, Иван Филиппович)——第 188—195 页。

伊左托夫, 尼基塔·阿列克谢耶维奇 (Изотов, Никита Алексеевич 1902—1951)——第 181 页。

尤什凯维奇, 帕维尔·索洛蒙诺维奇 (Юшкевич, Павел Соломонович 1873—1945)——第 211 页。

Z

扎多夫, 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 (Жадов, Алексей Семёнович 1901—1977)——第 382 页。

朱可夫,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 (Жуков, Георг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96—1974)——第 353、462 页。